



《全球通史》最新版本　首次授权翻译出版

从史前史到21世纪

全球通史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董书慧 王昶 徐正源 译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上

第7版







《全球通史》最新版本　首次授权翻译出版

从史前史到21世纪

全球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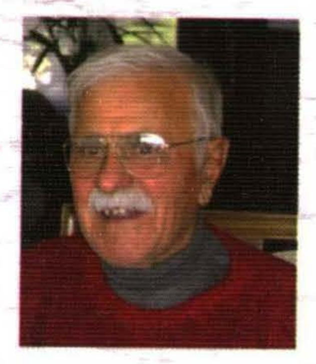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董书慧 王昶 徐正源 译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第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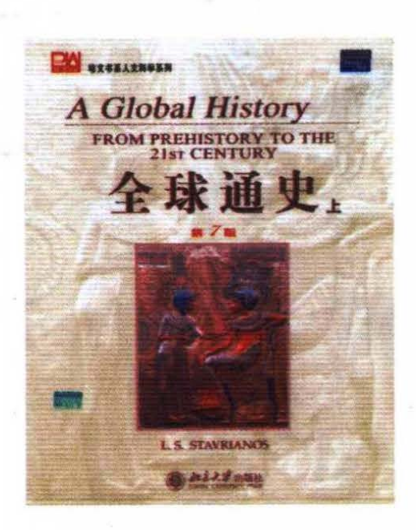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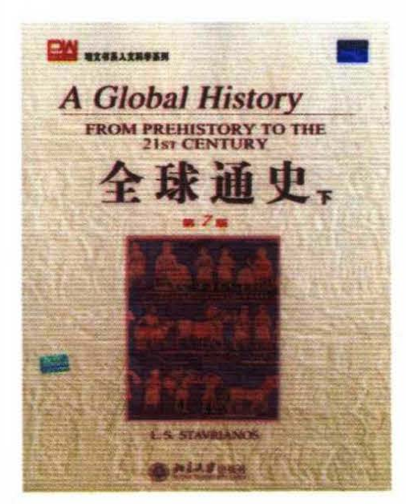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享誉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本书不但是斯氏《全球通史》的最新版本，也成了其最后版本。

英文影印版





（上下册）
ISBN 7-301-07656-8
全套定价：78.00元（16开 736页）
原著书号：0139238972 (Prentice Hall 2004)
原著定价：$82.00

责任编辑／徐文宁 苑海波
封面设计／奇文雲海装帧设计
010-84495201



从史前史到21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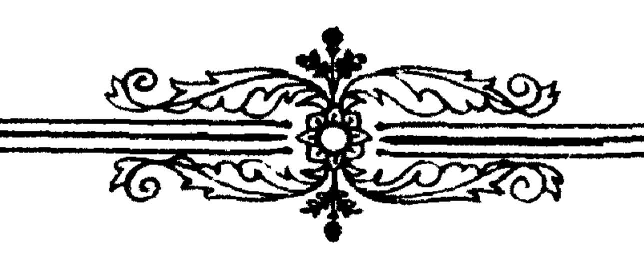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董书慧 王昶 徐正源 译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第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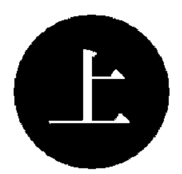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董书慧 王昶 徐正源 译

A Global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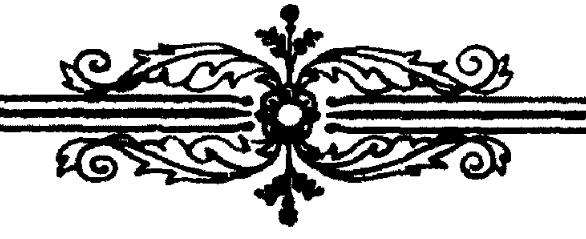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



第7版







从史前史到21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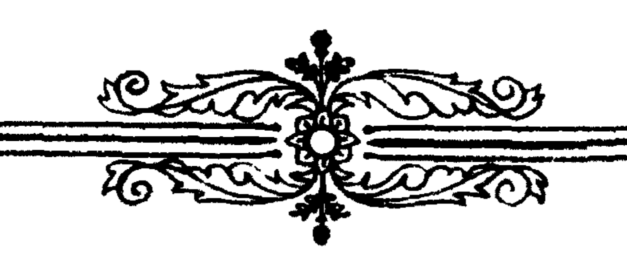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董书慧 王昶 徐正源 译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第7版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董书慧 王昶 徐正源 译

A Global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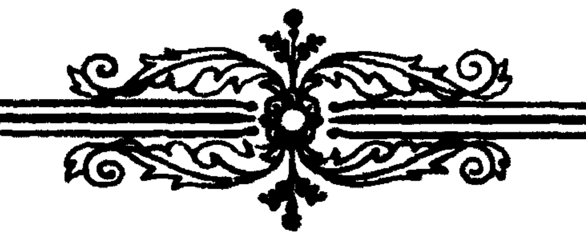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后的世界



第7版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2－628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 L.S.)著;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培文书系·人文科学系列)

ISBN 7－301－08420－X

Ⅰ.全…　Ⅱ.①斯…　②董…　Ⅲ.世界史:通史　Ⅳ.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9388号

书　　　名: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

著作责任者: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董书慧等译

责 任 编 辑: 徐文宁　苑海波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8420－X/K·0355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58874097　58874098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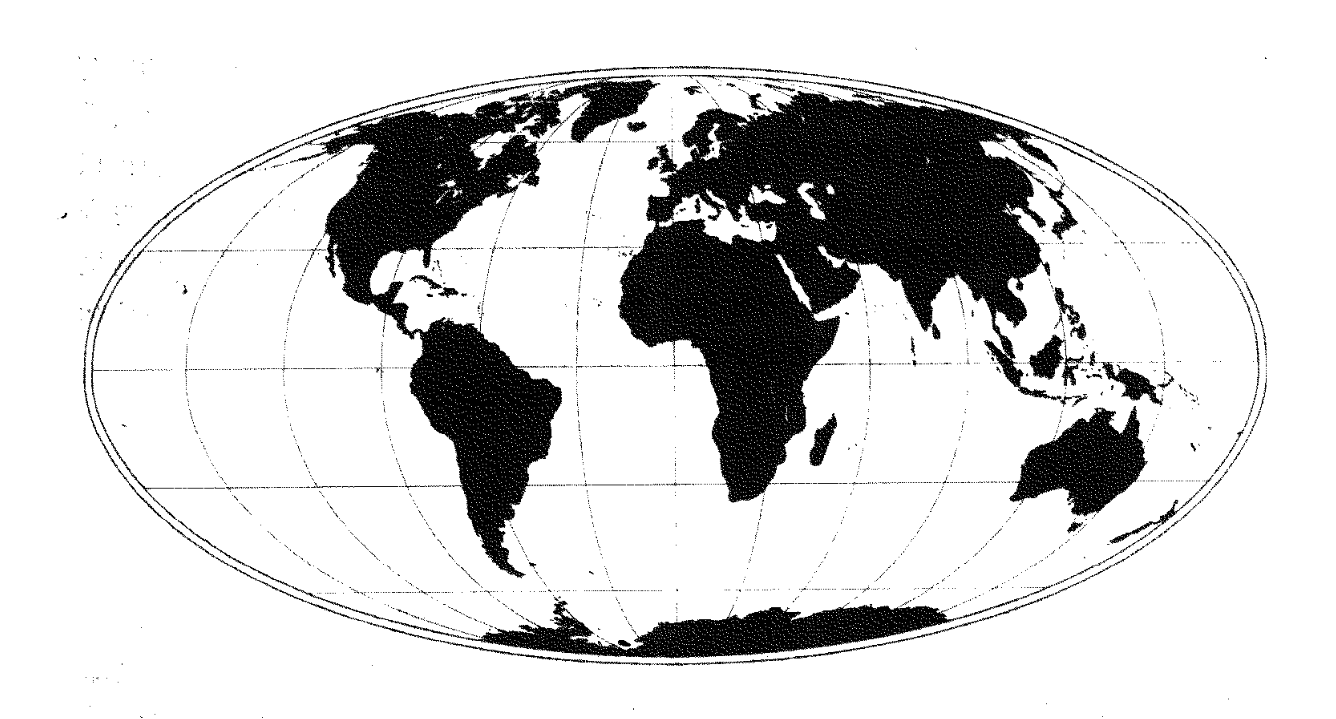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34印张　670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4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全球通史》第7版推荐序

刘德斌(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翻开这本书,人类的过去就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的忧虑与警示。不同于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强加给读者的历史学作品,这本书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没有教育人的口吻,却把读者引入到一种求索的境界,让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释卷。这本书就是享誉世界几十年、已经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全球通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尽管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讲过长难记,但它已经随着《全球通史》一起进入了中国人的知识殿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

毋庸讳言,阅读历史,特别是通史类的教科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书却可以让读者比较轻松地读下来。这本书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

为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有人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J. M.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等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可见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1] 作为历史教科书,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恐怕也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

一

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全球通史》何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观全书,读者首先会发现,《全球通史》虽是史书,但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例如,《全球通史》对伊斯兰教势力从中东不断地向周围扩张,直至非洲、中亚东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体会到当今世界围绕"大中东"的诸多矛盾冲突的缘起,体会到历史与现实是如何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作品的时代感或现实感问题。"古往今来"是通史类教科书的必然属性。但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埋头于"从过去到现在"的叙事,而对读者的求索目标和心态需求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历史作品的"受众"就只能局限于本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局限于以获取学分为目标的"专业读者"之内,而难以拥有历史专业以外的广大读者,历史作品就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大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或现实感。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是继施宾格勒1917年《西方的没落》发表之后的另一篇历史巨著。但与《西方的没落》不同,《历史研究》并不认为西方的没落在劫难逃,而是对其存续持乐观态度。很明显,《历史研究》不仅是"历史研究",而且也是对当时萦绕西方人心头的现实问题的正面回答。据汤因比先生本人说,他1924到1956年撰写《历史研究》期间,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他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

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本《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中,我同样是两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2] 汤因比在阅读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曾撰文指出,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却给他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3]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进入《全球通史》的意境之后就会发现:你不仅在阅读历史,而且也在了解现实;你不仅在与过去沟通,也在与现实对话。可以肯定,当你阅读了《全球通史》之后,会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会对这个世界的走向有一个自己的判定。所以我认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感。

二

《全球通史》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启蒙时代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但后来“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失了。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或二战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在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

人们一般都把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1967年的《当代史导论》、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同年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和1971年)和W·H·麦克尼尔的《世界通史》(1967年),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4] 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也把1960年代“世界历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出版和1970与1971年他的《全球通史》第1版的出版,看成是西方学术界从西方

中心论向全球史观转变的证据。[5]

巴勒克拉夫等人所倡导的"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6] 在《当代史导论》中,他明确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阐释体系。[7]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构建全球史学已经成为史学界多数人共识的今天,我们重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克拉夫等人的作品,不能不被他们的先见之明所折服。

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 1500 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 1500 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势。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众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它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 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无意这样为难我们。它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换言之,它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8] 正如美国学者威廉·迈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属于罗马帝国。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对于西方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9] 但是,对于"三分法"的否定并没有阻碍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分期上进

行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多少年来,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努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契合点。如沃尔夫从"家族秩序的生产方式—纳贡(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的分期[10],麦金德从"开放体系—封闭体系—开放体系—封闭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11],沃勒斯坦从"微型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期[12],霍奇森从"农业时代—技术时代"角度进行的分期[13],麦克尼尔从"前文明—文明—相互联系的文明—全球文明"角度进行的分期[14],格尔纳从"狩猎—农业—技术"角度进行的分期[15],迈克高希从"文化技术"(原始或表意文字、字母文字、印刷术、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角度进行的分期[16]和布赞与利特尔从"前国际体系—相互联系的国际体系—全球国际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17],等等。仔细研读这些分期后我们会发现,尽管它们的切入点不同,时间上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把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换言之,1500年是多数世界历史分期在时间上的共同契合点。这可以证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以1500年为界的基本划分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同时也给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以诸多参考和启迪。

三

《全球通史》不想在阐释体系上束缚住读者的想像力,作者的阐释手法更是让读者得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18]例如,《全球通史》打破地区和民族的界限,按照历史运动本身的空间来阐释历史,不仅让读者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整体世界史"的思考境界,而且可以从中悟出许多对现实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尤其对我们深入考察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形式遮盖之下的真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声言自己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但实际上他对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多种方法,如文明模式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文明交流理论、长时段和宏观历史理论等,都了如指掌,应用娴熟,从而为读者构建起一幕幕雄伟的历史画卷。不同领域的读者可以从《全球通史》的不同侧面,汲取不同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一本历史学的巨著应该做到的。当然,《全球通史》也阐释了许多人们共同关心的观点和话题。如作者在考察欧亚大陆文明兴衰时指出:如果其他地理条件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间的"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因为易接近性既为各民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制造了淘汰的压力;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部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历史;农业文明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

和黑人的优势;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里,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但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除了宗教领域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续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如希腊和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正是欧亚大陆的西方古典文明比其他文明遭受了更彻底的破坏,无法复原,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才使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西方衰落了,但西方开启的现代革命却蔓延到全世界,因而西方也是成功的,等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让读者对中国的历史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中国读者理解中国的历史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如他认为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还认为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只有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这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对中国的统一,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然,《全球通史》充满富有哲理的睿见,笔者常读常新,这里只是简单地举要而已。

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译本是这本享誉世界的历史教科书的第7版。该书第1版上卷问世于1970年,下卷问世于197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作者1999年推出的最新版本译出的。

同第1版相比,第7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覆盖的时间跨度增加了。作者把他所阐释的内容延展到1990年代末。新版本加入了冷战终结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的内容,最后以苏丹的饥荒和印巴核试爆结尾,更加凸显了他一直强调和忧虑的这样一个历史主题,即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第二,原来上下两卷的副标题分别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版上下两卷只有一个副标题:"从史前史到21世纪",突出全书是一个整体。第三,许多章节的内容都做了调整和简化,更加适应历史学专业以外读者的需求;同时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始文献资料,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新版本开辟一章专门介绍波利尼西亚即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从而更加显示了"全球通史"的完整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照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经典之作更加图文并茂。最后,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最新参考书目,进一步丰富了《全球通史》的信息含量。

关于这个新版本,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在"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时代

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19]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回答说:"答案与出第1版时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20]

五

最后,我们该来谈谈《全球通史》的作者本人了。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闻名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所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等。《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英文版出版于1981年,1993年我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全球通史》的延续和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采用冷战期间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界定,而是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认为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也与地理位置没有绝对的关系;最早的第三世界发端于东欧,之后才将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纳入进来;第三世界不是与西方偶有联系的遥远异域,而是西方自己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读的历史著作。在1997年发表的《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三个类型,即家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对世界历史提出了一种独特诠释。在每一个类型的内部,斯塔夫里阿诺斯又研究了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和战争四个生命线问题,并就与这四个生命线有关的21世纪可能的前景进行了展望。相信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本书也会给中国读者诸多启示。

当然,同其他学术作品一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在研读和欣赏这部20世纪的优秀作品时也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尽管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由于他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所以人们就对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另外,人们普遍认为西欧文化并没有在中世纪荡然无存,因此他关于西方何以从落后变为先进的立论

就不够坚实,他对整个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历史命运的整体解读因而也就不能说完全站得住脚了。

不过,这些问题都可以见仁见智,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别人优秀作品的时候应该具有一种批判精神,这样才能够为我所用,充实自己。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的链条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大国,是一个历史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我们迄今还没有奉献给世界一本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样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所熟知和欣赏的史学力作,我们甚至依然在用别人的模式理解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这是与我们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身份不相符的。中国的强大有赖于中国文化力量的发展和强大,其中包括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解读能力和阐释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其《全球通史》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无数的你和我。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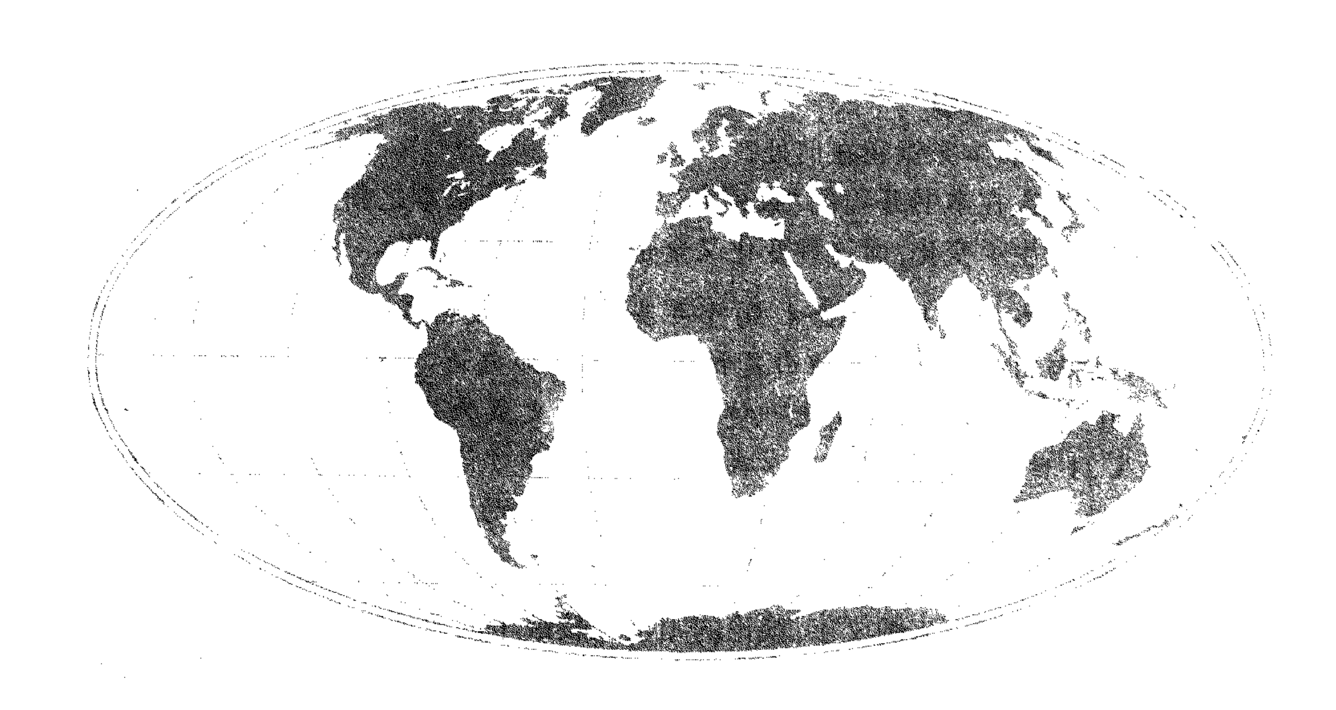
1. 邢宇皓:《百年回首——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光明日报》2000年1月6日。
2. 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第2页。
3. 张广勇:《从文明中心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88年中译本,第49页。
4.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264—266页。
5. L.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第XIII页。
6.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158页。
7.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6年版,第13—16页。
8. 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第342页。
9. 威廉·迈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第19页。
10. Wolf, Eric, R.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Mackinder Halford J. (190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13, pp. 421—437.
12.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3. Hodgson, Marshall G.S., (1993),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McNeill, William H., (1963),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Gellner, Ernest (1988), Plough, Book and Swor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London, Paladin.
16. 威廉·迈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17. 参阅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04 年中译本。

18.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中译本,第 54 页。

19. L.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英文版 XIII 页。

20. L.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英文版 XIII—XIV 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乐观与踌躇

高　毅(北京大学历史系)

盛行于当今西方史学界的"全球史"之风,刮了已经有几十年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首次把世界唤作"地球村"起,一些富于文化敏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西方史学家就感到了一种必要,那就是必须突破19世纪以来国别史和西方中心论传统,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以便提供某种参照,对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培育产生积极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世界史中政治方面的内容(这常常与起分裂作用的民族国家紧密相关),而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史学考察的重点,同时试图赋予过去长期被忽视的、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非西方民族以平等的历史地位,突出文化多元共存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各区域文明之间交往互动的历史推动意义——所谓的"全球史",就这样渐渐发展了起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全球通史》,就是这个全球史潮流的一部奠基性的杰作。它最初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而由于它的杰出,一经问世它就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所以如今它已经是一部风靡全球的全球史经典了。我国的读者对它当然也不陌生。90年代初起,它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首要参考教材之一,而它对我国高校世界史教材编写工作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是行内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书,较之以前的版本已有了

很大的不同,因为作者已根据21世纪世界的新需要,对本书从架构到内容都做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优化升级"。

那么,这个新版本究竟新在何处?

按照作者本人在本书开篇的"致读者"中的解释,新版本之新,主要就新在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全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 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结果,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

而"致读者"中接下来的文字,谈论的则全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和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人类生命"和"地球母亲"带来的双重威胁,从中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是: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世界的核心问题是由殖民地革命凸显的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的话,那么21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就已经转到了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方面了。

但那个"60年代问题"是否就此消失了呢?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实际上对于上述那两大问题(它们正是20世纪末以来全球史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作者在书中仍给予了同等的关注。也就是说,作者在敏感到现代科技负面影响问题凸显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对包括第三世界平等发展权在内的社会公正问题有丝毫的忽略,因而他也就没有忘却上面谈到的全球史初兴时的那份现实关怀,而那也正是全球史必须坚守的一份优良传统。

在本书的旧版本中,作者对"60年代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乐观。这份乐观来自汤因比。汤因比曾盛赞当今时代,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敢于认为可以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的时代。斯塔夫里阿诺斯深以为然,并由此浮想联翩:

> 这种由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组成的观念的确存在,应该同诸如种族冲突和引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之类的趋势一起得到承认。这种观念是从人们承认对本国较不幸的公民的福利负有责任开始的。……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

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①]

然而,事过30来年后,作者是不是还能这样乐观呢?看来有点困难了。实际上,类似的言论在新版本中已经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种种消极影响的令人沮丧的描述。作者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指的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多项技术突破,包括核能、人工智能、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革命、新农业革命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使本书的新版本成为必要的那种"科技的神奇影响"之源。作者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导致了第三世界经济的恶化以及富国和穷国差距的惊人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欠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时这一比率转变为15:1;而到20世纪末,预计这一比率还有可能达到30:1。[②] 同时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③] 当然,作者也没忘记指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乃至战争诸方面造成的各种有害的世界影响。至于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它归结为"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时间滞差,也就是说是因为受制于传统的人类总不能及时地变革社会以适应技术变化带来的新环境的缘故。

尽管如此,我们的作者仍然对未来满怀希望。他反对诸如人类将在"核冬天"中自我毁灭之类的悲观论点,理由是虽然今天的人类还在像其祖先那样不停地做着种种蠢事,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我们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那么这些优势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二是人权意识的全球觉醒,它们正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推动整个人类向自由王国飞奔——"这种新萌发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表明,现在的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④],这就是他的结论。

显而易见,作者在这里表达的,其实就是他对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应该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礼赞,

---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5—897页。

② 参见本书第44章。

③ 参见本书末:"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④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全球通史·下》(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pp.666—667.

尽管其曲调往往显得低回而不高亢。它试图展示人类社会从远古经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进步历程，这无疑还是启蒙主义的路数，还是所谓“宏大叙事”——只不过这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它符合全球民众对自由平等、社会公正的渴望，而且契合“全球史”的精神。在本文开头处我们曾提到，“全球史”写的实际上就是“文明史”（这使它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史、民族国家史），其目的是要推动地球村中某种健康的共同文化的建设。这种“共同文化”，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不是别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一点他虽没有明说，但我们仍可以很容易地从他在本书的老版本里写的这句话中体会出那个意思：

> 今天，欧洲三大革命（指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引者）向全球的传播虽然是在不同方面的支持下进行的，但似乎仍在以加速度创造一种尽管在细节上不同、但在基本特征方面将是一致的世界文化。①

这句话虽短，却说得很到位。它道出了“三大革命”与后来广泛流播于全世界的现代文明之间深刻的渊源关系，从而凸显了现代文明崇尚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本质内涵；同时它又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由现代文明的传播所创造的“世界文化”将是同质性与多样性的一种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在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即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同时，还将继续保留自己的某些可以与现代文明兼容的文化个性，从而继续维持各现代化社会之间的种种“细节上的不同”。显然，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关现代文明的理论信息。

只是很可惜，在新版本里，这段话随着内容结构的调整而消失了。但作者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似乎并没有变化，因为新版本的第七编中所阐述的，仍然是有关“欧洲三大革命”造就了某种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一些基本事实。不过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情况：作者对使用全球性的“世界文化”这样的词似乎有些顾虑——实际上这个词在新版本中已完全看不到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情况是：“现代文明”或“工业文明”这种本来应该成为本书主要关键词的词汇（因为本书的章节结构就是按从古典文明到中世纪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这个逻辑理路排列的），作者好像也不大敢用。甚至作者一直都不曾给现代文明下一个像样的定义：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它是一种“新型的、与欧亚乃至全球其他地区的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别的、充满活力与扩张性的文明”。②作者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这种畏缩躲闪，与他在谈论“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巨大潜力”时的那种眉飞色舞，显然不大合拍；而那所谓的“全球觉醒和现代高科技”，其实与现代文明，或与由欧洲三大革命的传播造成的那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本质上却是毫无二致的。

至于何以会出这种差池——恕我直言，很可能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余毒所致。

---

①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4页。

②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全球通史·下》（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 305.

毫无疑问，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赞成文化多元论而唾弃文化一元论的，绝无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高明那种粗俗观念。但是很遗憾，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他也难免受到了萨义德所说的那种“东方学”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本书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他始终把三大革命仅仅看作西方文明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就把现代文明看作了纯粹的西方文明，并进而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参见本书第七编)。这样做的问题，似乎是不恰当地忽略了广大东方民族对欧洲三大革命的诸多重大贡献，因而也就看不到现代文明中实际存在着的大量东方文明要素，结果也就无法深刻体认现代文明本身特有的那种世界性或普世性。如此说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现代文明理论上的闪烁其词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把一个在他看来纯属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说成一种全球一统的“世界文化”的本质的时候，他分明感到了一种道义上的不妥，以及一种理论上的踌躇。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已于 2004 年 3 月 23 日在美国加州拉荷亚去世，享年 91 岁。谨以拙文聊寄哀思。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睁开双眼，每天都有新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答。

——教皇保罗六世，1969年5月18日

致读者

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

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例如，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欧洲殖民帝国的消失就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发生了剧烈变动，从而显现出20世纪中叶涌现出来的这个新世界。

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西方导向的历史观是落后于时代潮流并有误导性的。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随着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世界却已经完成了其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和《世界历史杂志》的讨论以及本书第1版的出版已经一一证实了这种转变。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

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科技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难以抗拒的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着它的存在。20世纪后半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了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东西怎么会抵挡得住呢？

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生存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ques Cousteau）已经发出警告："在20世纪这100年里人类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以往全部人类历史时期还要多。"[1] 与此相似，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在其1989年的总结报告中说："到1999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就要来临。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就将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2]

出于对物种和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的悲观看法，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一系列著作已经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的物种链上小小一环的话，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

不过，这种统计却是误导性的，因为在人类物种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了高级智能的人类物种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物种是独一无二的、可以使环境适应于自己需要的物种，他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

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键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关系的变化来清晰地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它最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在其他大陆上的移民，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人口。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岛上的居民都因此而遭遇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开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人类已经完全能够控制天花病毒了，只有几个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最后一次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学家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的几个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根除，以防止它们传播

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已经制造出无害的天花 DNA 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 年 1 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董事会决定于当年的 6 月 30 日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经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它。由此可见,人类俨然已经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 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敌人或伙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讽刺却在于,这种主导性正是当今全球病态和恐惧的根源。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以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种新的与内在的自我(而不是外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但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技革命兴起的 17 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过科技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一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追求它的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3]

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学(F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 1970 年的 75 点降到 1991 年的 36 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

社会状况这一"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 7 点到晚 7 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 183 次。"

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保护你的。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 ……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4]

库斯托在《消费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毛泽东在 1949 年执政

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此后,随着人们的消费期望不断高涨,后来变成了“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加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经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 524辆增长到675 000辆左右,印度从354 393辆增长到1 100 000辆,而中国则从420 670辆增长到2 210 000辆。[5]

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但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则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6]

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面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名利、权位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

任何社会的第一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思考。也正是因为缺少对这方面的考虑,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

这种盲目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此人类现在正在“被迫地”致力于找到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正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指南针”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利用其超群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他在地球上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以及随之而来的遍布世界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人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在以下的章节里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一系列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见证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7] 即便是在占全球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这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融合了国家计划经济、终身雇用制和政府资助等特色的亚洲经济形态。

这种多样性显示出,21世纪在拥有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危险。虽然历

史学家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够准确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够基本确定地预测到，21 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意义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实践和机制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

注释

1.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ummer 1996), pp. 48, 49.
2.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s, *State of the World* 1987, 1989 (W. W. Norton, 1987—1989), pp. 194, 213.
3. Cited in A. Pacey,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1983), pp. 114—15, 178—79.
4. J. Cousteau, “Consumer Society Is the Enemy,”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ummer 1996) pp. 48, 49.
5.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6.
6.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pring 1989) pp. 4—8.
7.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87.

致　　谢

本书中以下章节开篇的引语是引自下列作者和出版商的作品，在此谨表示真挚的谢意：

第一章引语引自 Clyde Kluckholn, *Mirror for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49), p.11。

第二章引语引自 R.J. Braidwood, "Near Eastern Prehistory", *Science* vol.127 (June 20, 1958), 1419—1430。

第八章引语引自 Robert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 1962 by Max Leclerc et Cie, Prop. of Librairie Armand Colin and © 1966 trans. By J.M. Dent & Sons, Ltd., and published in 1967 by M. Evans and Co., Inc., New York, by arrangement with J.M. Dent & Sons, Ltd.。

第九章引语引自 Lynn White, Jr., "Tibet, India, and Malaya as Sources of Western Medieval Technolog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V (April 1960), 515, 526。

第十二章引语引自 W.C. Bark,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66。

第十四章引语引自 Lynn White, Jr.,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XL (1940), p.156。

第十七章引语引自 A.J. Toynbee, *Civilization on Trial*, © 1948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第二十一章引语引自 Lynn White, Jr.,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XL (1940), p.156。

第二十四章引语引自 B.H. Sumner,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3), p.1。

第二十六章引语引自 Herbert Butterfield,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London: G. Bell & Sons, Ltd., 1957), p.179。

第二十八章引语引自 Peter Chaadayev, *Apology of a Madman*, cited in H. Kohn's *The Mind of Modern Russi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5), p.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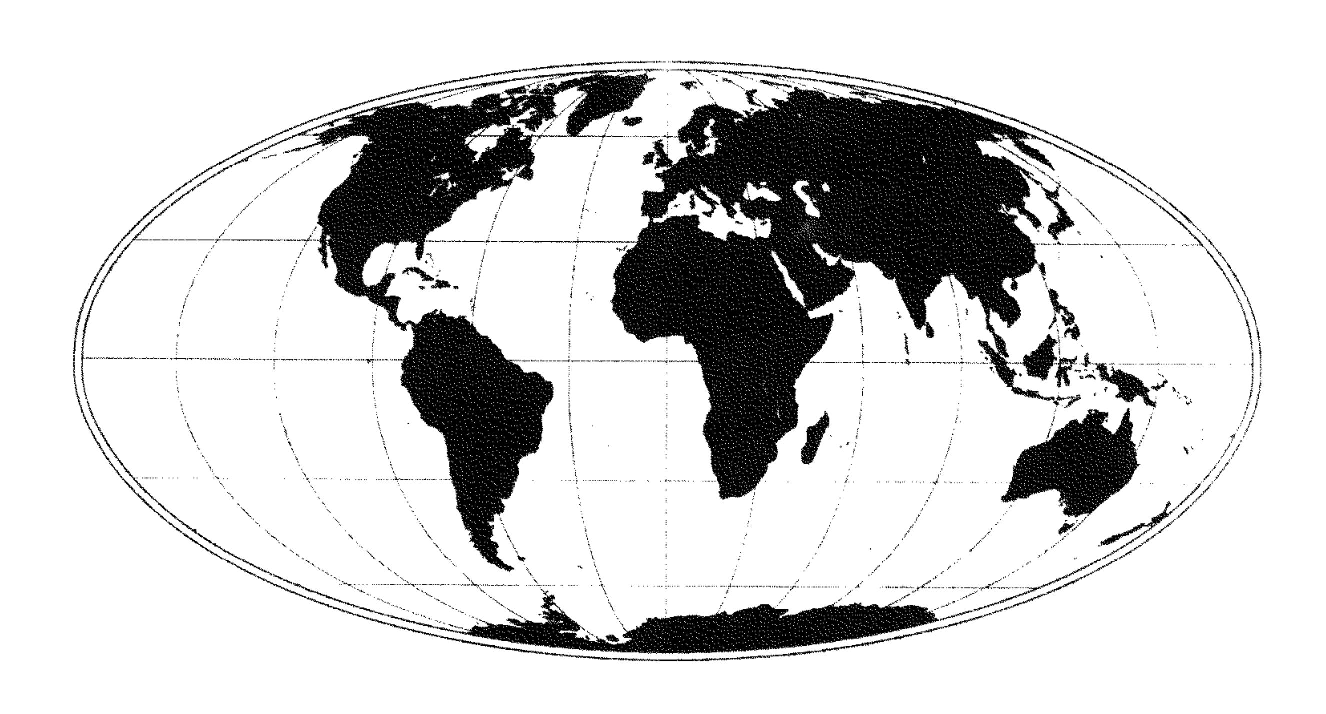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章引语引自 H.A.R. Gibb, "Social Change in the Near East", in P.W. Ireland, ed., *The Near Ea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43。

第三十章引语引自 Arnold J. Toynbee, *The World and the We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第三十一章引语引自 J.K. Fairbank,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Japan and China", from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I, No.4。

第三十六章引语引自 K.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第三十九章引语引自 Arnold J. Toynbee,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1。



简明目录

(上　册)

第一编　史前人类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

第三编 欧亚大陆中世纪的文明(公元500—1500年)

第四编 公元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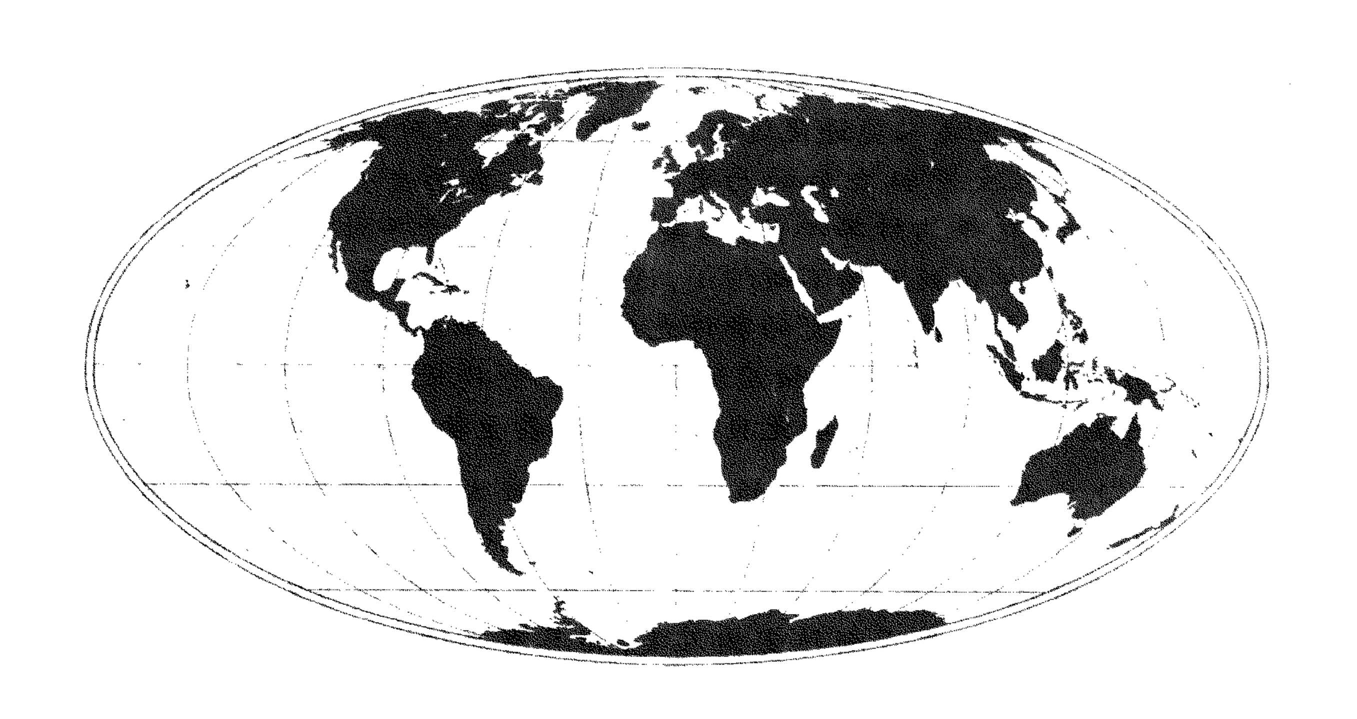
(下 册)

第五编 公元1500年以前各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六编　西方崛起时的世界(公元 1500—1763 年)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公元 1763—1914 年)

第八编　1914 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第一编
史 前 人 类

本书第一编着重论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长达400万年的历史，而其余篇幅则论述人类文明社会不足6 000年的历史，因此本书显然是以最简短的篇幅来论述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漫长的史前阶段。笔者之所以偏重考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历史，是因为人类历史一直在加速发展。地质年代以10亿年为计算单位，人类史前时代以千年计，而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后，纪年单位就开始不断缩小，逐渐变成以百年甚至十年计。时至今日，更是每天都有许多重大的事件无休无止地蜂拥而来，无情地包围着我们。而社会的加速变化也相应地引发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人类是否能够迅速地适应变化，以避免自身被淘汰、甚至被灭绝的命运呢？

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频率的不均衡性导致本书的研究也有所侧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而低估史前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意义。在史前时代的几百万年中有两大转变为此后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具有思维能力的真正的人类；其二是人类的先祖从坐享大自然恩赐的食物采集者转变成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这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就是第一编的两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人类学为人类提供了一面巨大的镜子，
使他们能够从中窥见自身无尽的变化。
——克莱德·克拉克洪

第1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现代人所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就是对过往历史的研究和再现，而古人对在他们之前发生的事情则知之甚少。希腊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德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就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对历史的无知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光荣和贡献。相比之下，我们这一时代比起过去任何时代都要更注重历史。而且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每年都还在丰富着有关我们早期祖先的知识。这个学科名单上还应该添上能被用来从卫星、航天飞机和飞机上探测地面和地下情形的空间技术。探测通过空间运载工具搭载的能够测量地面温度微弱差别的传感器来进行。由于沙地、耕地、植被和不同的岩石的温度各不相同，并且以不同的速率释放出它们自身的热量，因而传感器也就能够分辨出地面的松土是史前时代的耕地，还是古代的商路，抑或是古建筑的遗迹。此外雷达成像技术也已被用来绘制横穿中亚的古代洲际丝绸之路、危地马拉丛林中的玛雅人的道路以及哥斯达黎加阿热内湖畔的小径。

空间技术能使我们找回人类历史失佚篇章的一个最近的精彩例证，就是重新发现了中国长城的断失部分。长城的某些部分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被湮没在数层移动的沙丘之下。1994年4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利用雷达成像技术发现了这部分长城——这些图像显示，在距中国首都北京以西430英里的边远地区有一段长达47英里的长城。几个世纪以来北京近郊的长城一直都受到了很好的维护，从而获得了许多上镜的机会，比如说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就都曾在长城上漫步过；但是偏远地区的长城却是年久失修，无人照料。再加上这些地方的长城也并不是用石头砌成的，泥土和树枝是常见的替代品，所以时间一长很长一段长城也就逐渐损毁，终至湮灭，直到近来魔术般的现代技术重新又发现了它们。[1]

类似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考证已经将我们的认识拓展到了人类文明开始之前，即

便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录。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只是在大约5000年前才刚刚学会书写,而人类的祖先即原人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400多万年前。我们应当考察史前时期这漫长的几百万年,因为人类正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在此期间,人类的远祖居住在能够发现现成食物的地方,和其他动物一样以采集现成食物为生,而不是像他们擅长农耕的后代那样通过种养来获得食物。

一、从类人猿到人类

我们所在的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太阳只不过是我们银河系中数百万颗恒星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又只是整个宇宙几百万个星系中的一个。当本书在以后的章节中回溯人类的经历和追寻人类的思想足迹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此悬殊的对比。比较好记的一个类比就是,地球在宇宙当中小得就像太平洋上的一粒尘埃。

地球形成于约50亿年以前,但直到距今约40亿年前地球上才出现最早的生命——原生的单细胞生物。尽管在传统上人们都认为那种原始的生命也与非生物有着质的区别,但是现在的科学家们都已经不再接受这种将生物与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而是把生物看作由非生物自然进化而来的。他们按照组织的分类等级标准将所有的物质加以分类,在这一组织的某一等级上无机物转变成了有机物。更具体地说就是,电子、质子和中子相互结合形成各种原子,各种原子相互结合组成各种分子,各种分子再组成有机化程度不等的聚合体,其中有一类有机聚合体形成了生物。

接着生物又从低等级向高等级不断地进化:先由微生物进化到原始植物,如海藻;继而又进化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最终则进化到脊椎动物。这些脊椎动物和其旁系中的某些无脊椎动物及植物一起,于3亿年前左右成功地适应了陆上生活。最早适应陆地生活的是两栖动物,随后是史前时期的大批爬行动物,接着是鸟类,最后则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在生物界占据统治地位已达6000万年。

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这种说法:人类属于动物王国——更明确地说就是属于灵长类这一目;和人类一起同属于灵长类的还有鼩鼱、狐猴、眼镜猴、猴子及类人猿。好几个研究领域的成果都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大量证据。解剖学家发现,从总体来看,人类与其他高级动物在骨骼、肌肉和器官构造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胚胎学家注意到,人类的胚胎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显示出某些低等生物的特征,如:胚胎一个月时有半圆形的鳃,两个月时出现发育不全的尾巴。人类学家指出,人类化石连续地显示出人类由普通的类人猿逐步进化的过程。此外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许多能够表明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联系的类似迹象,如:猿类血液的化学成分和人类的极其相似,猿类和人类身上有共同的寄生物,而且猿类和人类学习的方式也很相似。

人类祖先的演变发生在有6—7次大冰期和5—6次间冰期的更新世时代。当时急剧的环境变化迫使所有的动物都必须不断地适应和再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而能否

从残酷的适应过程中脱颖而出,关键不是取决于蛮力,也不取决于耐寒的能力,而是取决于智力的不断增长,取决于能否运用其智力使自己较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当然,这也就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居于无可争辩的主宰地位的秘密。而其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人类与双臂柔软细长、只适应森林生活的长臂猿和有着厚实的白毛皮、只适应北极环境的北极熊不同,它能够利用自己的智力去应对各种环境。

人类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从一系列人类的祖先即近似人形的原人进化而来的。原人中有一部分已经能够使用简单的石制工具和武器。最早出现的原人是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它们一般被认为最早出现在400多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热带草原上。这种灵长类动物的骨盆和腿与现代人极为相似,但其脑容量却仅及人类的三分之一,几乎还不及现在类人猿的脑容量大。因此可以说,这种与人相像的两足动物(原人不再用四肢行走)的运动系统是与猿脑般的大脑结合在一起的。

对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灵长类来说,非洲大草原是它们的一个非常理想的生存环境。那里气候温和,即使缺衣少物也能生活得很好。而且辽阔的大草原与茂密的森林和荒凉的沙漠不同,那里有水源,也有可供食用的动物。因此尽管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工具很是简单,但它们却依然能够享用到丰盛的食物,包括蛋、蟹、龟、鸟、啮齿动物,还有小羚羊。小羚羊很容易捕猎到,因为它们一遇危险便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

更新世灵长类动物在非洲平原上漫游了200多万年,在此期间这个种类中先后有好几个物种都经历了产生、兴旺、最后又消亡的过程。由于每年都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而相关的理论又必须随着这些发现而作修正,因此人类学家们尚不能就那200万年中人类物种更迭的细节达成一致。比如说,最近在爪哇出土的人类化石就对传统的"非洲起源"理论提出了挑战。该理论认为,最早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从这里迁徙到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大陆。爪哇出土的化石古老得惊人,足以支持人类多地域起源论者的观点。该理论认为早期的人类在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独立地起源和进化。[2] 毫无疑问,将来每年都会有许多新的人类学考古发现,而随之而来也就会提出更多新的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新的化石发现。

尽管不知道确切的年代和准确的地点,但却可以肯定,早在40 000年以前,人类,或者说智人(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终于出现了。而最近的考古发掘则显示,人类的出现比这一时间还要早得多。从最宏观的视角来看,人类的出现是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二大转折点。第一大转折点是生命从非生命物质中进化出来。在第一大里程碑式的转折之后,所有的生物种类都通过适应其生存环境,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方式进化。也就是说,生物的基因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一点在气候变化剧烈的更新世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一进化过程发生了逆转。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今天,随着人类关于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知识不断增加,人类很快就能够既改变自己的

基因,又改变其所处的环境,地球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也即将来临。

人类,且只有人类,能够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环境——这一人化的环境被称为文化,因为只有人类能够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或抽象出概念和事件。只有人类能笑;只有人类才知道自己会死去;只有人类才思索宇宙及其起源,才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自身今后的命运。

由于其独有的变革环境的能力,人类不必经过生理上的突变就能很好地应对周围的环境。对其他动物而言,生活在北极离不开毛皮,生活在沙漠必须有水源,生活在水中要靠鳍;而人类则通过其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即经过新的非生物学的途径,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说,人类文化包括工具、衣服、装饰品、制度、语言、艺术形式、宗教信仰和习俗。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就使得人类既能适应自然环境又能调整人际关系。

当人类运用其超凡的大脑去改变其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基因,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任由环境改变生物的基因的时候,他就已经远远超出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了。这也解释了为何人类当年在非洲大草原刚刚起源时毫不起眼,而今天竟成了地球上居统治地位的物种。但是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人类现在显得不能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为什么人类日渐觉得自己创造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

答案就在于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根本差别之中。基因进化通过基因突变起作用。如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突变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它就会在生命史中短短几千年里成为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物种。其实这种进化模式也就是人类由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一直进化到智人所经由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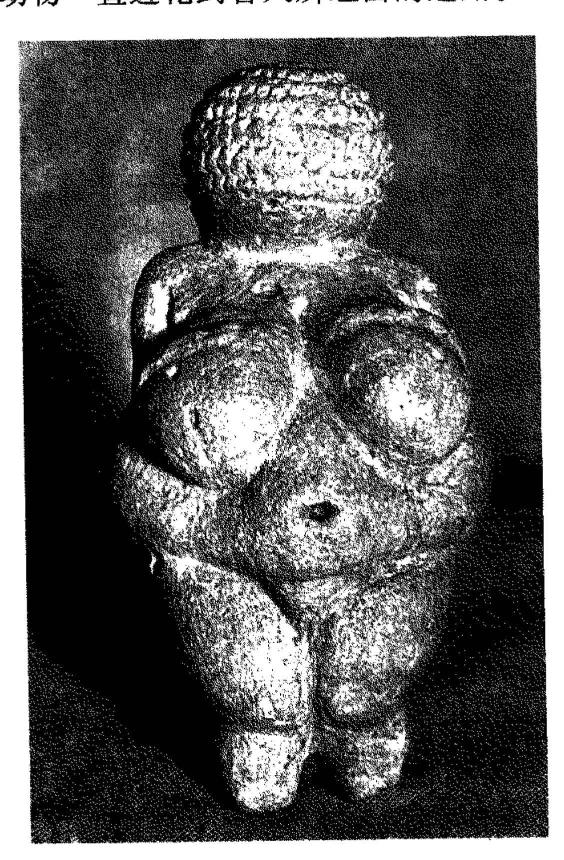


图1 威灵道夫的维纳斯

威灵道夫的维纳斯,是雕刻于公元前15 000至公元前10 000年的一尊石像。从该雕像中人物形体的比例可以看出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倾向。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文化进化通过引入新工具、新思想或新制度能够（并且已经）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整个社会。只要看看19世纪中期的蒸汽机是怎样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看看内燃机在20世纪里是如何发挥其功用，再看看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又是何等深刻地改造着我们的环境，你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何要警告我们：人类现在正在面临着的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

问题的关键是在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允许其大规模发挥效用所必需的社会变革的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是：技术变革因为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欢迎，所以马上就会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通常也就会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即人类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的同时，却不能使他们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而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正如爱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样，人类迫切需要学会在获得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智慧之间达成平衡。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这一平衡的结果。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平衡问题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反复出现，并在今天由于我们运用知识的智慧无法赶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而显得更为频繁和迫切。

二、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人类凭借自己优越的智力发明了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他们用压制法从石核上打制出长而锋利的薄片即“石刀”，并制作出各种新型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用的工具”。有些新型工具是由不同的材料组合而成的，如以兽骨、兽角或燧石作锋刃的长矛和装有骨制或木制把柄、石制刃口的刮削器。这时人类还发明了抛射物式的工具，如用于捕牛的一端系有重球的绳索、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这些新发明物刚开始使用时效率比较低，但是经过不断改进，却已俨然成为近代火器发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发明，如用骨头和象牙制的锥子、带眼的骨针、作腰带用的扣件，甚至还有纽扣——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马格德林时期的猿人已经穿上了用兽皮缝制的裤子和袖子缝制得恰到好处的上衣。

虽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与早于它100万年的初期技术相比是要先进得多，但是由于生产率低，这种技术仍然很原始。而且当时的食物采集者也没有成立正式的政治机构和配备专职的领导人，他们通常只是各自成群地结合成自治的团体，团体的人数一般是20至50人。不过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时期盛产鲑

鱼的美洲西北部,以及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山谷,也曾出现过人数更多的狩猎团体。根据现在狩猎的情形来判断,旧石器时代狩猎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当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所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而被自然地推举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的影响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

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一样都还只是粗具雏形,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和未完婚的子女组成。一夫多妻通常是被允许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家庭却极少。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男女平等比此后的任何时代都做得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女性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所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今天常见的所谓"男尊女卑"的观念,现实中的女性也不处于依从和卑下的地位。

通过一项对现在仍然存在的90个食物采集部落所进行的研究,人类学家们发现在这些部落中,男人负责狩猎动物、提供肉食,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能够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等。尽管男人捕猎的肉类极受欢迎,然而事实却是女人采集的食品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的猎物的两倍。因此纵然两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却也都同等重要。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女性不但生育和抚养了小孩,而且为部落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大部分食品。

不错,男人是负责部落的防卫并且掌控着武器,但是他们并不用武器来恐吓或镇压女人。事实上,当欧洲人最初在海外遇到食物采集部落时,他们普遍都对部落中的女性享有比欧洲女性多得多的平等感到好奇和震惊。耶稣会传教士保罗·列·居内(Paul le Jeune)在整个1633到1634年的冬天,都和居住在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半岛的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印第安人(Montagnais-Naskapi Indian)的一个部落呆在一起。"女性在这里享有极大的权力。"列·居内写道。他说他曾鼓动该部落的男人享受男人优越的地位,"我告诉他们,男人是女人的主人。在法国,女人是不能支配丈夫的。"另一个耶稣会传教士写道:"从决定计划、决断事情、确定旅程,到储备冬季物资,几乎每件事情都由家庭主妇决定。"人类学家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在她于1950到1951年研究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印第安人时发现这个部族中两性之间的关系依然如故:"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男女有别的教化,我们仍能看到他们坚持集体责任意识……以及两性平等自决的意识,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3]

在食物采集部落中不但男女平等,而且部落成员之间也都有着很亲密的血族关系。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人承担责任,当然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他们在寻找食物、躲避风雨和防御敌人的过程中互相帮助。虽然有时部落与部落之间也会因个人世

仇和争夺狩猎、捕鱼的地盘而发生争斗，但是由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总之，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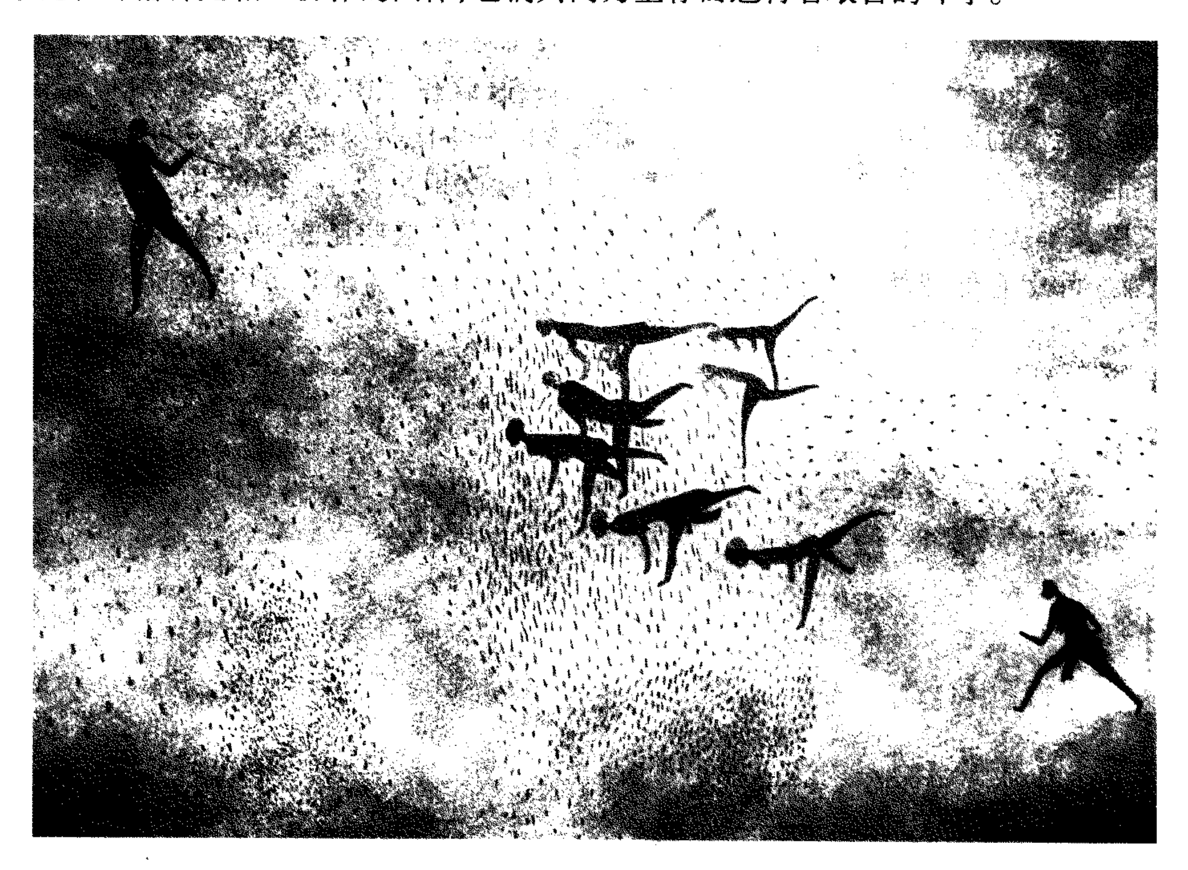


图2　塔西里·那杰岩画

塔西里·那杰岩画(the Fresco of Tassilli n'Ajjer)，一幅刻在撒哈拉沙漠岩石上的石器时代的绘画，出土于阿尔及利亚。一位学者认为，这幅美轮美奂的画作描绘了妇女采集谷物(画面上的黑点可能代表谷物)的场景。如果这一说法正确的话，这些谷物应该是野生的，除非这里的谷物种植出现得早得多(目前我们并未得到这方面的证据)。不论此画表现的是采集谷物，还是优雅地翩翩起舞，这些形体都告诉我们在这个曾经是绿树成荫的撒哈拉地区此时已有人类的存在。

在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地域的食物采集者的日常生活之后，人类学家R.B.李(R.B. Lee)总结道："一个真正的公社化的生活通常会被斥责为乌托邦式的臆想，会被认为只能存在于理论当中，而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诸多证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4]

人类学家近来将研究重点聚焦在我们史前祖先的社会组织形式和食物上，其中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他们以前吃什么对我们今天有借鉴意义。几千年前的人类吃什么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判断：其一是通过研究粪化石，即古人排泄物的化石。粪化石里含有许多东西，如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毛发以及蛋壳，因此一个粪

化石就提供了一个几百万年前食物的密封记录。另一个办法就是去观察今天的食物采集者吃什么:不管这些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还是居住在南非卡拉哈日(Kalahari)沙漠中的亢人(! Kung)。这类观察已经发现,即便是生活在其他人都不愿意居留的恶劣环境中,现代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供应也是惊人的丰盛和有保障。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丰盛的食物的一个原因就是食物采集者对他们的家乡有着超凡的了解,他们非常熟悉生活在那里的动植物,他们虽然不会阅读和写作,但却能够学习和记忆。比如说,亢人的记忆力就非常好,他们能用近500种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作食物、药品、化妆品、毒药或其他用品。其中单是昆虫,他们就吃甲虫幼虫、毛虫、蜜蜂蛹、白蚁、蚂蚁以及蝉。由于受到了传统偏见的约束,我们认为这些昆虫中的大部分都不能吃,而实际上它们却都富含营养。比如说,白蚁身上的45%都是蛋白质,这比干鱼所含蛋白质的比例都要高。



图3　新石器时代的村庄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绘图,它描绘了公元前2 700年左右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丹麦村庄。注意图中表现的从事不同种类的职业:狩猎者、木材采集者、火堆照看者、磨谷者、陶器匠以及织工。

食物采集者喜欢吃的食物数量众多,这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所需。食物采集者依靠大量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作为其食物来源,这使他们比农民过得更为充裕,因为农民只种植少数几种庄稼,所以一旦这些庄稼因为干旱、洪水、霜冻或虫灾而歉收,他们就要面临挨饿的危险。相比之下食物采集者就不会碰到这种危险:他们一旦发现某种食物供应减少,就会用他们能够发现的数百种食物来弥补缺口。比如说,1964年夏天研究亢人的人类学家们发现,当时的一场大旱饿坏了附近的班图族农民:他们的庄稼遭灾了,他们的家人都要挨饿。于是班图族的妇女也跟从亢人妇女找寻植物块根、青菜、浆果、坚果、鸟类、蛋类等等。而这数百种不同类型的食物则是永远都不会同时匮乏的,从而班图人也就仰仗亢人的技能顺利地度过了这场大旱。

亢人和其他食物采集者的食物不但供应充足,而且营养健康。这些食品都只含

有少量的盐分、饱和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而富含多价非饱和脂肪、粗纤维成分、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由于食物采集者长年享受着这些健康的食品，加上他们作为游牧民族生活充满运动，所以他们很少患上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大肠炎等工业社会的常见病。但在另一方面，许多亢人又因缺医少药、得不到疗治而死于意外伤害。因此科学家们发现，活过60岁的亢人约占其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与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工业国家的长寿人口比例大致相等。

上述关于史前人类的食物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得克萨斯A&M大学人类学家小沃恩·M.勃朗特(Vaughn M. Bryant, Jr.)的试验证明。勃朗特在得克萨斯西南的一处考古现场进行野外挖掘时，按照生活在该区域的史前人类的食谱进食。他是通过研究粪化石了解清楚这一食谱的。由于对这个新食谱感到很满意，在回到营地之后他仍然继续遵照它进食，并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锻炼——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爬楼梯而不坐电梯，步行而不坐车横穿校园——以便获得接近于史前生活的人类的活力。在改换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我都感觉好了许多。我觉得比以前更有精力了……

此后四年中我再也没有患过大病，也从未缺过一天班……在既没有计算卡路里也没有有意绝食的情况下，我在大约3个月里瘦了30磅……因为这些水果和蔬菜本来就只含有很少的卡路里……想吃零食对我也有帮助。当你整天都在吃零食时，你实际上比每日坐下来大嚼三顿饭要吃得少……仔细想想，这个食谱也不奇怪。我想自然已经设计好了要我们与灵长类动物吃相近的食品。这些猩猩们一般吃水果和其他植物、一些肉、一些复杂的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食品以及不多的脂肪。可能直到仅仅几千年前，人类才像我们今天这样吃东西。"[5]

在将我们的讨论由探讨社会制度和习俗转向探讨一般的信仰时我们发现，原始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基本上都不是抱历史的和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会与现在相同，就像现在和过去一样那样，因而在他们的头脑里既没有变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任何批评或干预现有制度和习俗的想法。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还将一成不变地延续到将来。各狩猎民族的创世神话，包括神话中半神式的英雄，都惊人地相似——这些英雄创造自然环境、安排供狩猎的动物、繁殖人类并教给人类各种技艺和风俗习惯。

下面这个安达曼群岛岛民们的创世神话就是这方面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就像蛋壳里的一只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节头里。大竹子破裂时，他也就跟着出来了。刚开始他还是一个小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小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有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遂用它在自己的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感到很孤独，就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黏土，捏了一个妇女的模型。那个模型活了过来，并成了他的妻子，她名叫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黏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教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黏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6]

原始人对于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很多，因为他们不能不关心周围的一切，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的知识代代口口相传。许多这类知识直到现在仍被得到承认和利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印第安人对一种名叫金鸡纳的速生长青植物的全方位利用。几百万年以来金鸡纳树在古代文献和村落文化中始终占有显著地位：它的树皮、树叶、花朵、种子和果实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从糖尿病、各种溃疡到便秘；它的树枝可被制成有杀菌作用的牙膏；它的油汁现在被用来制作牙膏和肥皂；它的萃取物则是一种很好的杀虫剂，对于杀死包括蝗虫、幼蚊以及棉铃虫在内的两百多种昆虫具有特效。

不过尽管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有着大量的第一手知识，但是由于他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在遇到洪水、干旱或是在捕捉不到很多的动物时，他们往往不能从自然界的角度作出解释。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怎样去用自然主义的手段来对付大自然，结果只好求助于超自然的魔力——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祈求或蒙骗大自然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起来。原始人相信：通过把某一种有用的动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和跳起模仿性的舞蹈，可以使得各种动物大量繁衍，食物来源丰盛；而且只要严格遵守有关图腾的种种规定，他们的团体就能壮大，食物的来源就能得到确保。

最初似乎所有的团体成员都参加宗教仪式，但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则出现了尚未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巫医或巫师。这些人被认为与那些被期望能够控制关系到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食物、繁衍和健康以及个人运气的自然万物的神力有着特殊的联系。他们渐渐地脱离了专门的生产食物和制作工具的活动而专司巫术，为大家祈福。今天，在包括布希曼人、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土人在内的几乎每一个食物采集文化幸存的地方都仍可见到巫师。法国三弗雷勒斯山洞里的"巫师"岩画是最早描绘巫师的画，它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可怕的杰作"。画中描绘了一个身披鹿皮、头顶一对牡鹿的角、脸像猫头鹰、长着两只狼耳朵、上肢似熊臂并拖着一条马尾巴的男子。这幅画附近画的一些别的画表明：这个山洞是当时的一位巫师召集氏族成员、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他在这里祈求动物的神灵保佑他们狩猎时能够满载而归，并

鼓励氏族成员勇敢地面对种种危险。

不过，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还供养不起像后来那样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有着很大社会凝聚力的神学。当时人们着重于个人的幻想，对上帝和神灵的概念都很模糊，而宗教也还没有被当作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人们的利益也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品行，而是受到了超自然现象的控制。一位爱斯基摩人对北极探险家努特·拉斯穆森说的话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之所以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饿的威胁，还因为我们希望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7]

对令人费解的超自然现象的恐惧和对人类能够控制它们的祈盼，不仅在宗教中存在，而且也通过艺术形式被表现了出来。旧石器时代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独树一帜的洞穴壁画，而其中最好的一部分壁画则集中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西北部。洞穴壁画通常都是取材于野牛、熊、马、犀牛、猛犸象和野猪等大型动物。这些画作中最好的作品色彩丰富，形象生动，充满活力。不过尽管从画中可以看出绘画者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但洞穴壁画的创作却是为了某种实际的用途。原始人一般都居住在山洞前端或洞口附近，但这些画却都绘制在山洞深处最黑暗和最危险的地方。而且这些画往往相互重叠，这表明画家们在绘制它们时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保存下来。由此看来，促使旧石器时代的画家们跑到山洞深处把他们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绘制出来的原因也就只能是，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使自己得到某种控制猎物的魔力。

总之，近来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的发现已经足以使我们承认并赞赏我们的史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整个人类遗产重要而有决定性的部分。我们总以为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做得特别成功，但即便是在这个领域，食物采集者也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基础作用。他们对住地环境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能够利用有用的动植物品种，而不去用那些无用或有害的品种。他们发明了许多种工具，包括刀具、斧头、刨子、锤子、锥子以及针。同样地，他们也创造了同样丰富的武器，如矛、投枪、棍棒、盾牌、盔甲、吹箭筒以及弓箭。他们的许多发明创造，诸如不下沉的独木舟、雪做的房子、带梁和桁的独木舟以及下毒技巧，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术。食物采集者们使用种类繁多的毒药来毒杀猎物和敌人，比如说，南美的印第安人就懂得从树薯粉分离出氢氰酸，将树薯粉留作主食，氢氰酸则被用来制作毒药。其他常见的毒药还有箭毒、蛇毒、毒胡萝卜和砒毒等。在储存食物和做菜方面，我们的早期祖先实际上也已经用上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全部技术。他们拥有泥质灶，使用石板烧烤技术，在北极圈内冷冻食物，通过风干来保存





图4 洞穴壁画

两幅来自法国的史前时代的洞穴壁画。

食物，并用牛油或兽脂来密封食物。除了塑料容器、煤气和电力等纯现代发明的用具外，旧石器时代的厨师对现代的厨房和烹饪技术一定会感到非常适应。

不过在应对疾病方面，史前人类也绝不是完全依赖于巫术。他们懂得利用夹板

来进行断肢再续，懂得使用止血带，懂得敷用药膏和绑系绷带，懂得将放血作为一种疗法，还懂得灌肠疗法——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使用橡胶注射器来进行灌肠。这些尚不知文字为何物的人懂得关于天体方面的知识，他们能够分辨出不同的星座并给它们命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史前时期波利尼西亚人就掌握了航海技术，他们那时就已经在夏威夷到塔西提之间长达2350英里的航线上作定期航行。在概览了所有进化阶段的生命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人类学家列斯利·A.怀特总结道："知识、技术、工具、机械的积累肇始于原始人的发明，史前人类为文明以及各种更高的文化形式奠立了基础……看到原始人在技术水平上在许多方面和当今是如此接近，真令人感到惊奇。"[8]

与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一样重要和引人入胜的是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在我们史前祖先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方面都极为有趣。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承担的义务和领取的报酬也都是大家公认的。虽然谁也不能预测未知的前景，但他们却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担忧或彼此疏远。直到现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仍是这样度过的：他拿起一块碎玻璃，熟练地把它制成一枚箭头或矛尖，装在投矛器或已上弦的弓上，然后动身去射杀猎物；回来后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晚饭；晚饭后开始讲故事，把白天的奇遇告诉很少离家外出的人，在故事声中结束一天。这样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其社会化程度也是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人所达不到的。

但是紧密维系旧石器时代社会的亲属关系的粘合力既给人慰藉，又使人感到压抑。在其作用下，个人完全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一支受到神灵世界所有无形神力福佑的由死者、生者和来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那种受羁绊的感觉，相反他们会把自己看作是这一队伍的成员。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置身于这一队伍固然有一种安全感，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确实能够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但这却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比如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部落里不存在任何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却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协商，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正是这种看似荒谬但却带有强制性的传统，构成了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旧石器时代，不但不遵守部落传统的人会被杀掉，而且在食物短缺时儿童和身体虚弱的人也会被杀掉。食物采集者被迫不断迁移，因为其住地附近的食物来源或早或迟都会被耗尽。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迁移迫使他们狠心地削减他们的物质财产，也迫使他们在某些时候狠心地削减他们团体的某些成员，如儿童、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显然，对于食物采集者来说，一个母亲在一段时期中只能抚养一个小孩，因而在前一个小孩断奶之前出生的其他小孩不得不被杀掉；同样，多胞胎中也只能留下一个。如此一来，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也就只有少数食物采集者能够养活自己，

从而当农业革命席卷而来时,他们很轻易地就被农民给逼退,因为农业革命能够产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养活更多的生产者——这也使得农民不可阻挡地拓展到人烟稀少的狩猎区。这一事实能够解释为什么一旦农业革命开始之后食物采集者团体就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也能解释为什么今天只有极少的食物采集者团体残存在农业因故无法存在的偏远地区。

食物采集者的生活

我们可以假设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公元15、16世纪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的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基本类似。当时的探险家以及跟随他们的移民和传教士对食物采集者的记述,为我们粗略地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以下报告为耶稣会传教士雅可布·比格特(Jacob Baegert)所作。他于1750年到1767年间曾与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 他关于"加利福尼亚人"的记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我们旧石器时代祖先的生活图景,并对人们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假设提出了挑战。

尽管食物粗劣、生活艰辛,加利福尼亚人却很少生病。他们整体强壮,能吃苦耐劳,而且远比那些数以千计衣食富足、每日享受着巴黎厨师烹饪出的最好的食品的人更健康……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加利福尼亚人也从欧洲人那里感染了天花,而且他们认为这种病的传染性最强。1763年一个出天花刚好的西班牙人送给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一段布料,也把天花传给了这个加利福尼亚人群体。在短短的3个月里就有100人患此病死去……

根据我已经介绍的关于加利福尼亚人的情况,也许会有人认为他们是人类祖先最悲惨、最可怜的孩子。但是这种推断完全错了,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毫无疑问他们过着比欧洲人更快乐的生活……整年中既没有什么事情使加利福尼亚人感到麻烦或苦恼,也没什么东西使他觉得生活讨厌或者活着没意思……嫉妒、猜疑和诽谤不会扰乱他的生活,他也用不着终日担心会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不必想着如何增加自身拥有的物质财富……加利福尼亚人不知道"我的"和"你的"这两个词的意思。而正如圣格雷格尔所说,这两个词使我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难于言表的罪恶。

虽然这些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似乎一无所有,但实际上他们却拥有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在他们贫穷的、条件极差的国家的物产之外垂涎什么,所有他们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毫无疑问,他们经常表现出极好的脾气,而且经常沉浸在欢乐和笑声中,显现出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则正是真正的

欢乐的源泉。

* 见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nual Report for 1863* (Washington, D.C., 1864),第 352 页到 369 页。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农业革命还触发了一场链式反应,它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以及社会分裂,从而损坏了原始社会令人神往的平等,但这一来它也打破了部落通过传统主义形成的约束性的结合,使人性得到了解放。而人性一旦解放就必然会使狩猎区变成大都会,使人类从利用自身的体力发展到利用原子能。不过在研究农业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全球的拓展及其后果。

三、种族的出现

人们通常都以为人口爆炸是当今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其实不然。实际上每一次壮观的人口剧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随之提高,从而使得可以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人类在实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导致了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 125 000 人,而到了距今 10 000 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总人口已增为 532 万人——人口增长 42 倍以上,这一增长比率足以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从旧石器时代的发展进程中还可得出另一个人口统计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曾多次重复),即在技术革命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人群的人口增长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得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口可以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起这一模式便一直成立,并与人类学家 M.D.萨林斯(M.D. Sahlins)和 E.R.塞维斯(E.R. Service)所提出的文化支配定律相一致。该定律认为:

> "……能够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消灭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张……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其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都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9]

无论何时,适应性最强的种类,即利用自然环境最有效的种类,总是会在活动范围中占据优势并不断地扩展其活动范围。因此,只拥有原始的卵石工具且又缺衣少

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也就始终无法使其活动范围超出温暖的热带大草原。相比之下直立人则因掌握了更复杂的技术,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也更强,所以他们不仅能够向南进入非洲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地区,还能朝北跨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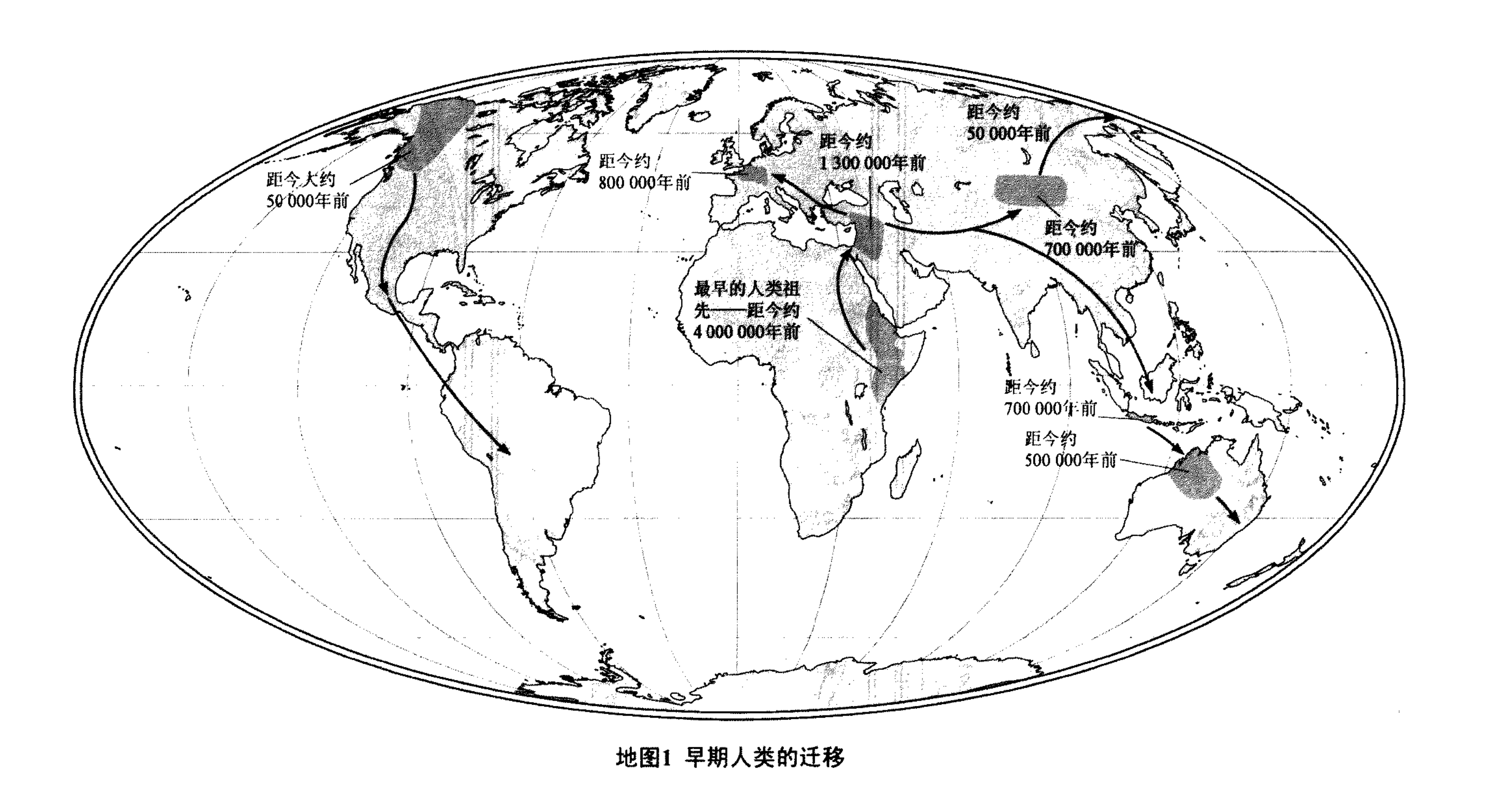
人类拥有的高超技术也部分地表现在他们能够建造不同类型的渡水设备。依照所运用的自然条件的不同,这些设备可被分为四个基本类型:皮划艇、树皮船、浮筏和独木舟。有了各种船只,早期人类也就能够横渡河流、湖泊,甚至能够穿越从非洲到欧洲、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从西伯利亚到北美的广阔洋面。这一迁移活动在冰河期进展得更为顺利,因为在这一时期,大量海水结了冰盖,海平面降低,大陆之间形成了陆地桥。至此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从而和狗一样成了世界上分布最广的动物(见地图1)。

在人类向各地迁徙的同时,也逐步开始有了种族上的差别,出现了各种在肤色、发型和面型上各有显著特点的所谓的种族。一般认为,这些种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各个地域集团适应了其各自不同的环境,而且相互隔绝。关于人种差别,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人种分野发生得很晚——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形成之后。因此,现代的各个种族都源自人类特征十分明显的同一祖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与他们所发现的所有地区的各个种族通婚;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在天生的智力方面并没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类学者的赞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或当代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与其他任何种族一样,只要能有机会接受教育,也都有希望从大学毕业。

不过各地区种族形成时的确切情形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永远也无法了解清楚。考古学家在人类起源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接受"非洲起源"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然后从这里迁徙到其他各个大陆。但是该理论和其他理论一道都正在受到质疑,因为几乎每年世界各地都会出土一些新的人类活动遗址。比如说,最近从澳大利亚北部发现的石制工具显示出人类早在176 000年前就在该地区活动,这就推翻了一些传统理论所宣称的人类是在50 000到60 000年前才迁移到这里的说法。同样地,传统理论所宣称的人类最早迁移到中亚的时间,也因为最近在该地区出土了年代更为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制工具而不攻自破。

由于在传统理论与当今考古发掘的发现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巨大差异,所以考古学家们正在修正过去被奉为圭臬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假设。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人类最早的起源地到底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另有人类多起源论者则认为人们永远不可能找到人类最初的起源地,因为全人类的发源地不是唯一的。相反,他们发现认为人类在不同地方独立进化的人类多起源理论要更可信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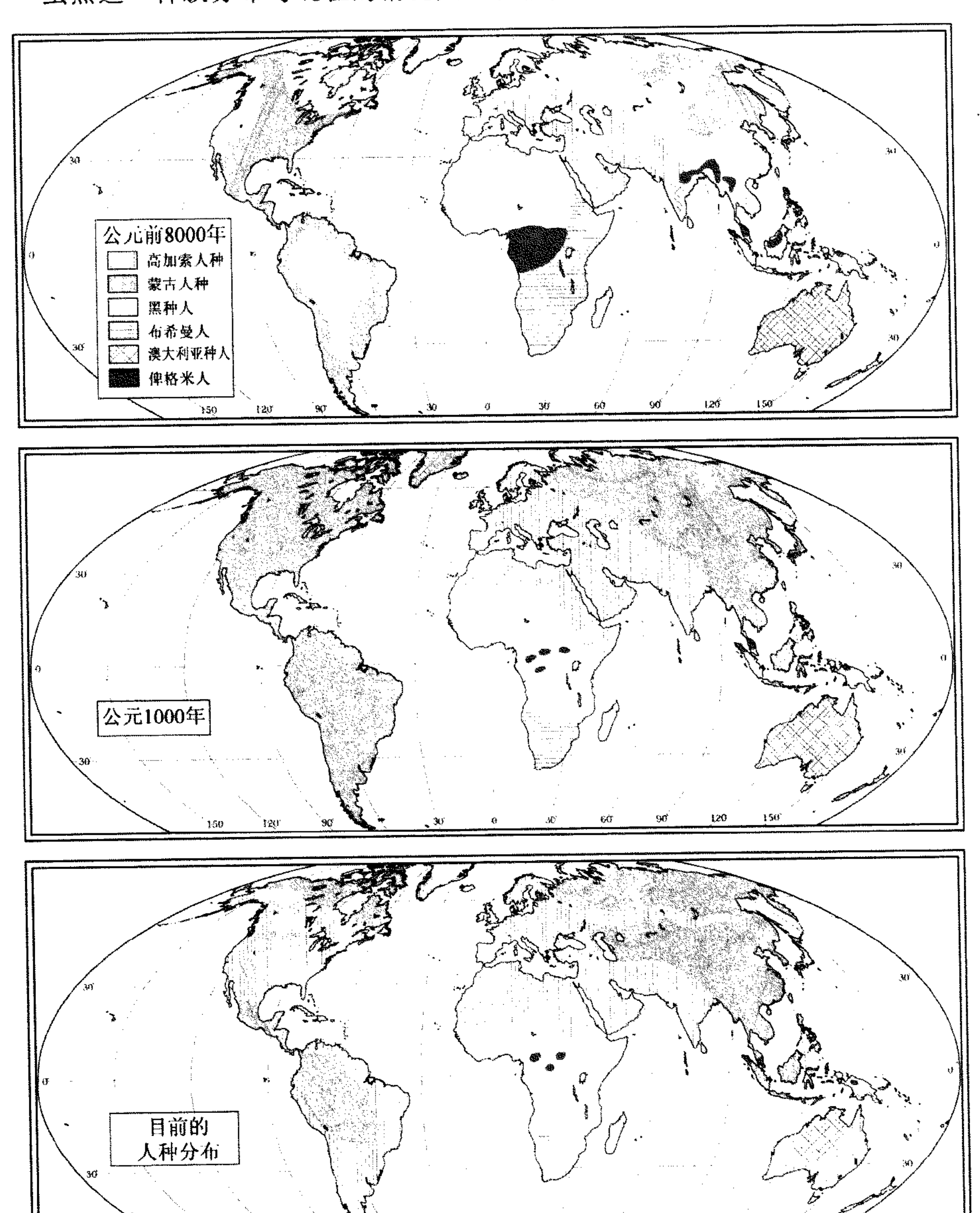
尽管现在人们在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距今约10 000年,即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末期,各种族在全球的分布已经和现在大致一样。高加索种人分布在欧洲、北非、东非和中东,并正在深入到印度和中亚;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那时水源比现在充足)和沙漠以南一带,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


距今大约
50 000年前
距今约
800 000年前
距今约
1 300 000年前
距今约
50 000年前
距今约
700 000年前
最早的人类祖
先——距今约
4 000 000年前
距今约
700 000年前
距今约
500 000年前

地图1　早期人类的迁移

人则与他们后来的情况不同，他们布满了非洲其余的地方；另有一部分俾格米人即小黑人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森林地带，而广阔的印度、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和澳大利亚则为澳大利亚种人所占据；最后，分布在东亚和南北美洲的则是蒙古人种。

虽然这一种族分布与现在的情况大致相似，但是全球人种分布图（地图2）却表



地图2　全球人种分布

明，到公元1000年时，全球各种族的分布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还愈演愈烈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是由后来的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而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会消失，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之所以会越来越少，其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技术革命。换句话说就是，1 000年前白种人与布希曼人的人数差不多，而今天布希曼人的人口却仅及白种人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其实际原因均在于此。

布希曼人的历史相对于高加索人和其他种族的历史来说有着天渊之别，但这并不能反映出各种族天赋才能上的差异。我们将在第四编的结尾“历史中的种族”一节中再度谈到这一重要课题。在那一节中我们将探讨造成不同种族的历史不近相同的原因。

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类分成了不同的种族，但是各个种族的身材却都在日益增高。人类早期祖先的平均身高是4英尺6英寸，而现在人类的平均身高则是5英尺10英寸。人们认为这一增长应归功于两点：一是人类获得了丰富而稳定的食物供应，尤其是充足的动物蛋白的供应；二是现在的小孩都接受免疫，这就抑制了妨碍生长的疾病的侵袭。目前人类的身材还在继续增长，像中世纪骑士们的盔甲现在的成年人就挤不进去了。

推荐读物

对研究世界历史有着基础性的辅导作用的书籍有G. Barraclough所著的*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Times Books出版社，1991年版）和W.L. Langer所著的*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2年版）。还有配有绝佳插图的*National Geographic Atlas of World History*（Washington出版社，1997年版）。

最近出版的关于早期人类历史的重要书籍有J.E. Pfeiffer所著的*The Emergence of Man*（Harper & Row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R. Lewin所著的*In the Age of Mankind*（Smithsonian Book出版社，1988年版），后一本书讲述了现在流行的关于人类史前和未来情况的理论。另有M. Wolpoff和R. Caspari合著的*Race and Human Evolu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叙述了关于人类起源的非洲起源论与多起源论的争论。最近发表的内容丰富的考察人类起源的著述是R. Gore写的The Dawn of Humans，见*National Geographic*（1977年5月号），该文还带有精美的插图。

有关旧石器时代妇女的地位，请参阅M. Ehrenberg所著的*Women in Prehistory*（British Museum出版社，1989年版）；R.R. Reiter主编的*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75年版）；M.K. Martin和B. Voorhies合著的*Female of the Species*（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5年版）；以及R. Briden-

tal 和 C. Koonz 共同主编的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77 年版)。

注释

1.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2. C.C. Swisher et al., "Latest Homo erectus of Java," *Science* (December 13, 1996): 1870—187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1996.
3. Cited by E. Leacock, "Women in Egalitarian Societies," in R. Bridenthal and C.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1977), pp.21,22.
4. B. Spencer, *Native Trib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London, 1914), p.36; and R.B. Lee, *The !Kung Sa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9), p.246.
5. V.M. Bryant, Jr., "I Put Myself on a Caveman Diet Permanently," *Prevention*, Vol.3 (September 1979), pp.128—137. Mor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can be found in Bryant's articles i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232 (January 1975); and in *American Antiquity*, Vol. 39, No.3 (1974).
6. A.R. Rad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 (Free Press, 1948), p.192.
7. K. Rasmussen, *People of the Polar North* (Lippincott, 1980), p.124.
8. L.A. White,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McGraw-Hill, 1959), pp.271, 272.
9. M.D. Sahlins and E.R. Service,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0), pp.75, 79.

现在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人类最早进行有效的食物生产所带来的影响，因为从生物学领域（包括食物、人口、疾病等）到文化领域（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都已焕然一新。

——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第2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学会如何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而进化成了“人”。这些本领使得他们远远地胜过了他们周围的其他动物，但是从另一个基本方面来说他们与其他动物仍然十分相似：他们仍像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杀猎物为生，仍像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而且由于人类当时依赖大自然，所以也就受到了大自然的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而且由于一个地方能够提供的食物也很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便是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1—2名食物采集者；如果是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地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1名食物采集者则需20—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本章将重点研究这一转变出现的原因及其后果。

一、农业的起源

当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生产者之后，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也就展现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了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一方面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不再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另一方面是他们食物来源的

大半或全部都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去获得的。而在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中，后者尤为重要。在前一方面，新石器显然较旧石器要更锋利也更经久耐用，像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是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加工而成的，所以使用起来才会更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成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石斧技艺，相对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而言，其意义远不能同日而语。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德们突然顿悟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一声"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人们确实是早在农业革命之前就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像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就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就像现代的原始人对农业毫无所知，可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幼苗，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里能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里却不行。对现代原始人来说，这一类知识的获得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生存就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去怀疑，反倒有大量证据可以佐证，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可是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那么为什么人类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将这些知识付诸实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缺乏这样做的动力。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忍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其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作为游牧群体，他们经常处在迁徙过程中，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由于没有畜养的动物来提供牛奶，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母乳来哺育每一个孩子。由于母亲无法同时为两个孩子哺乳，也不能同时带着他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所以当一个小孩出生后不久很快又生了一个小孩时，母亲一般会让后出生的那个小孩死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母亲们还是能够避免出现这种杀婴惨剧的，因为哺乳会抑制排卵，所以她们在喂养一个小孩的几年中一般不会怀孕。如果这一计划生育的天然形式失效了，我们的祖先们就会采取杀死新生婴儿、堕胎和停止哺乳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这样一来，狩猎社会也就能够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产生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

在正常情况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拥有充足的食物，而且他们的食物品种还很丰富。生活在南非的布希曼人就提供了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这些捕猎者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当中，但是他们的食物却也包括多达85种可食用的植物和223种动物。因此，他们食用的食物比起农民所吃的、自己种植的谷物和植物根茎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要多得多。从历史情况来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的食物来源最可靠，因为他们能够从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中获取食物。相反，如果天公不作美导致庄稼歉收的话，农民就会经常面临挨饿的危险。

较之种养食物的农民，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有着更好更可靠的食物来源，

而且他们获取食物所需要的劳作时间也更短。再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当中的布希曼人为例，他们当中的成年人每周平均仅花15个小时去狩猎和采集食物。这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只工作两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会对他们超常的健康状况感到惊奇了。事实上，有10%的布希曼人能活过60岁。当然游牧生活也有助于他们的健康，由于他们不断地搬迁，所以他们能够避免在不卫生的环境下感染上疾病；而农民们却在集满了人粪和垃圾的村落中度过一生。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了如何种养食物，但是直到10 000年前他们才转向于采用农业。人类之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则只有几十种。而且适于栽培的植物还必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收不到什么成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约200 000种开花植物中，只有约3000种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作为食物。而就在这些作为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超过30种是主要作物，它们包括4种草本植物(小麦、水稻、玉米和甘蔗)、淀粉为主要成分的植物(土豆、番薯、树薯粉和香蕉)以及被称为“穷人的肉类”的豆类(扁豆、豌豆、大巢菜、豆角、花生和黄豆)。

同样的道理，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够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而不能一见人就逃之夭夭。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够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由于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而使得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综上所述，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够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而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在距今10 000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农业。显然这是一次强制性的转变，因为没有一个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会自愿抛弃他那舒适而又可靠的生活方式，去做终日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或牧场上无休无止地劳作的农民。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的压力。上万年前，人类的数量增长缓慢，但还是造成了非洲、亚洲、大洋洲乃至美洲的人口迁移。最后，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都住满了人。随着此后人口缓慢但不断的增长，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以自己种植的食物来补充采集食物的不足。毫无疑问，他们并不喜欢呆在一个地方种庄稼或者养牲畜，但事实是，就每平方英里所能养活的人口而言，农业远远超过了食物采集。

农业首先在那些少数有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的地区成为主业。在这一驯化过程中，野生动植物长得越来越大，从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食物。这样一来，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也就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食物生产者，而不是食物采集者——最后

他们就变成了居住在村庄中的农民。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就从几个农业革命的中心地区逐渐传播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

二、农业的传播

从狩猎到农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在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独立地进行着。农业独立地起源于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属的地中海以东海岸地区——和墨西哥、中国北部地区、秘鲁。而每年发掘出的新证据则显示,在东南亚、西非以及其他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我们现在已经确凿地知道,中东和中美洲(大致指巴拿马以北的美洲的热带地区)是两个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这两个地区都拥有种类繁多的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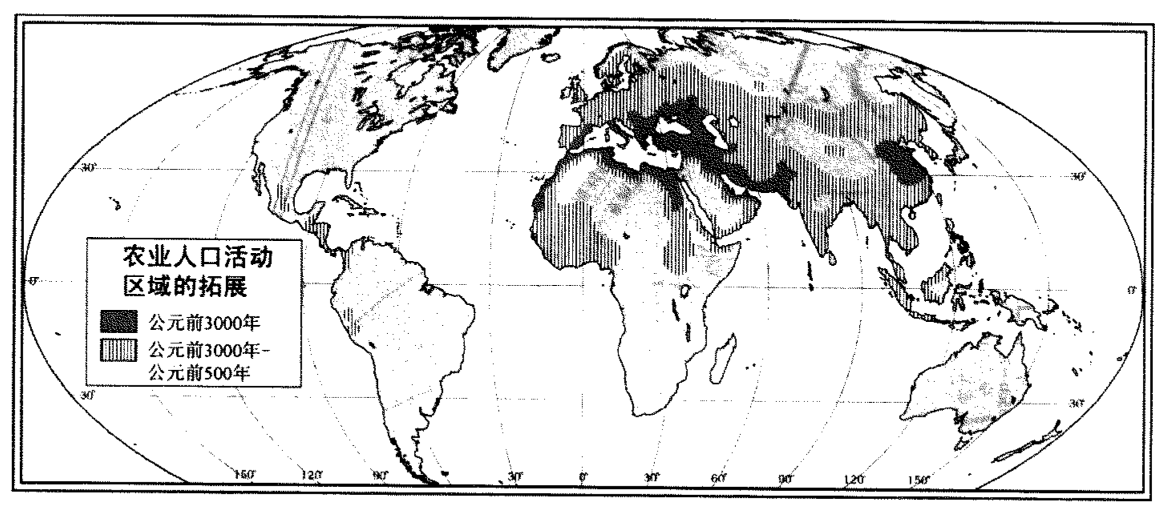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和大麦,以及山羊、绵羊、牛、猪等物种均起源于中东。而中美洲的两个小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仅为美国的1%,但其盛产的植物品种却不少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这是因为中美洲的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即使是在一个极小的区域内变化也非常大。因此在中美洲能够成功地栽培出几十种植物品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玉米、蚕豆和南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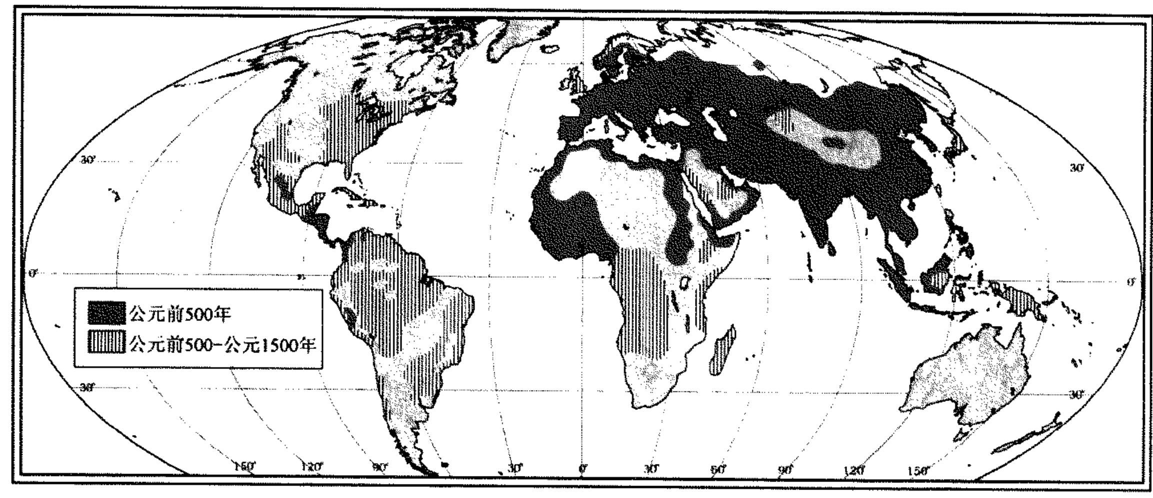
经过了许多世纪之后,人类已经能够让各种植物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并远播它方,从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和使人类生存有保障这两个显著优点。在这种地区,即便一种作物因为气候原因不能生存,其他对生长环境要求不同的作物却仍可以生长,从而使得密集的人口有了可靠的食物来源,人类文明也有了延续发展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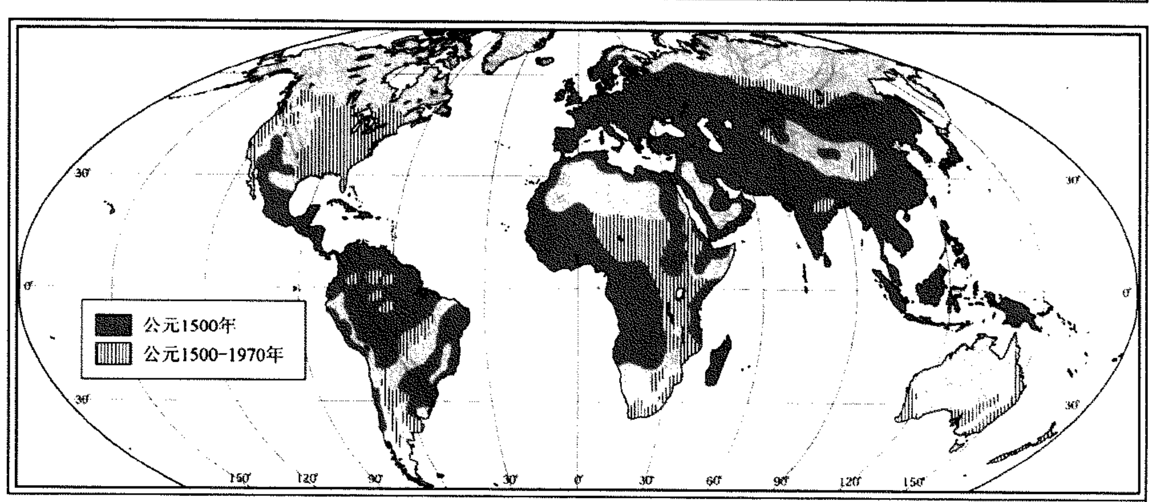
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即“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结束。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则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0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获取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该类食物也只占食物获取的三分之一。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利用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其产量大大提高,它才成为当地人食物的主要来源,由此也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

从中东和拉美这两个已经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从中国北部地区、从其他现在还不能确定的农业发源地出发,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这一传播过程由于早期农业的低效率——植物栽培时断时续,经常要转换地方——而得到了促进。一块土地经过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8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得被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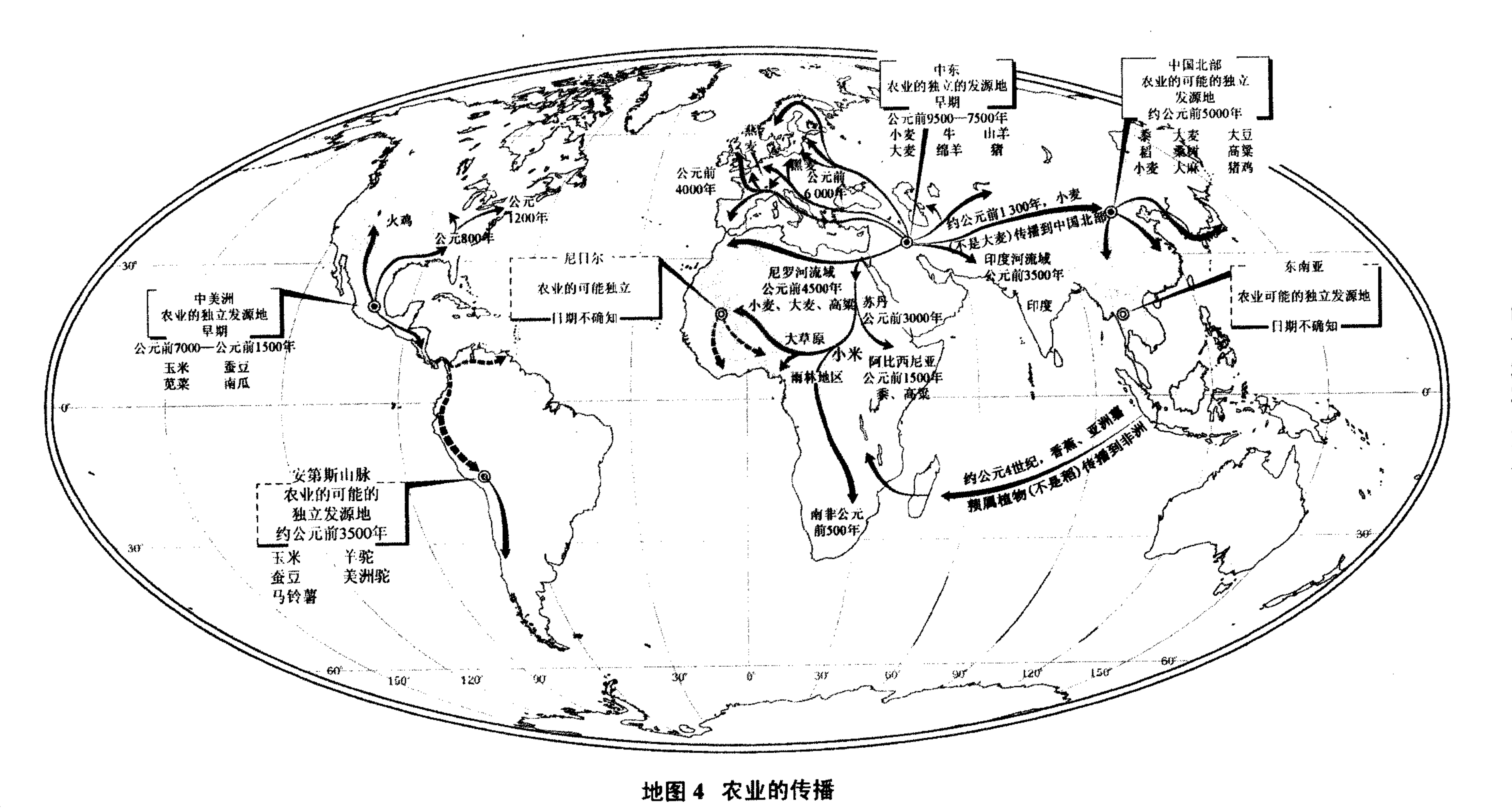
弃(即休耕)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的比例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 5:1 到 10:1 之间。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人类必须不断地进入新的区域。因此人类不断地“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其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参见地图 3 以及地图 4)。







地图 3　农业人口活动区域的拓展



地图 4 农业的传播

注：①日期表明该地区的某些人已实行“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
②箭号指示某些重要谷类植物培育的传播方向。

不过农业在这一阶段还远没有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较晚,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完全是由各不相同的当地环境所决定的。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农业根本不可能产生。在非洲、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于种植业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不发达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由于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农业的出现也因此而被推迟到了很久之后。而当铁斧取代石斧之后,清理森林的工作变得更加有成效,从而使得植物栽培的疆域也就被大大扩展,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

对于农业在各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在还了解得很不够。农业大致是以中东为中心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向北传播到中亚和东欧,向西传播到中欧和西欧。在中国,小麦和大麦是在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则有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就已经驯化了当地生长的植物,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中国人栽培出的植物包括中国南部地区的水稻和茶叶,以及中国北部地区的粟、高粱和大豆。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要算是桑树,它的叶子可被用来养蚕;还有漆树,它可被用来生产著名的油漆和漆器。



图5 印第安人的农耕图

在大多数土著美洲印第安部落里,妇女都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她们种植花生、豆类和其他作物,以供应部落大部分的食物来源。这幅16世纪法国人画的速写,表现的是印第安男人正在耕地,而印第安妇女正在整理过的土茬中播种。

非洲的农业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和公元前4000年时在尼罗河流域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不管其源头在哪里，非洲农业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都被局限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上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但是到了公元元年之后不久这些障碍就被两个重大发明给克服了：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新的植物物种——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一种植物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由于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也就和铁器的传入一道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在近代，非洲被各西方帝国所瓜分，非洲的农业也因之而遭受了挫折。欧洲的传教士、官员和科学家从欧洲带来了他们熟悉的作物，如小麦和谷类，并把他们所不熟悉的非洲作物视为低等作物。通过现代的包装和广告，欧洲作物被普遍接受为真正高等作物。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1996年美国科学院开始发表一系列名为《非洲丢失的作物》的报告，报告称非洲有比任何其他大陆种类都多的原生作物，包括一系列的非洲稻谷，富含蛋白质和铁元素的埃塞俄比亚薯以及高粱。高粱在美国主要被用来喂牲畜，但它也可被用来制成一种高质量的面粉。报告总结说："非洲被称为饥饿的大陆，但它又是许多未被利用的食用植物的聚生地。"[1]

农业在美洲大陆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和秘鲁两地，这里我们将重点考察墨西哥的玉米。玉米与小麦等其他作物有所不同，它的谷粒聚生在玉米棒子上而不会自动落到地面生根发芽。因此玉米需要人工栽培，这一点已经从考古现场出土的玉米中得到了印证。墨西哥城发现的玉米花粉化石表明，一些野生的玉米为现代栽培的玉米提供了基础。现代的玉米品种是古代玉米与野生蜀黍杂交的产物。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种杂交品种在墨西哥开始人工栽培。墨西哥地区最早开始人工栽种的作物还包括南瓜(约公元前7000年)和蚕豆(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

不过墨西哥的许多农作物也并不是同时开始驯化的，其向农业过渡的时期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该地区的人们一边种植已有作物，一边寻找新作物。

大约在公元前5600年时农业在秘鲁的山区已经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一地区人工栽培的作物包括番茄、花生、利马豆和土豆。而且在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秘鲁还出现了不同于墨西哥品种的玉米。农业就是从这一中美洲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开去的。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之前，玉米的传入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因为那时的玉米还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反而具有更好的经济效果。同样，直到约公元800年时，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三、农业的种类

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促使人们去培植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小麦和大麦是中东种植最为普遍的作物，但是当农民们向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却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人们就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当农民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在那里，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于是燕麦又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与之相似，农业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了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则使得橄榄树成了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但是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则标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其中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地区，降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由于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也就被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其中稻是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南北美洲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而在南美洲则有带甜味的和均是“爱尔兰”品种的木薯和马铃薯。

一般地说，上述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就是形成了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在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最近小麦已经取代水稻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这一超越应该归功于农业科学家培育出了具有更强的耐酷暑、耐严寒、耐干旱、抗虫害能力的小麦新品种。现在可以栽种小麦的地区要比过去多得多，1995 年全球小麦总产量已经达到了 5.42 亿吨。

早期的农民不但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种植了不同类型的作物，还发明了种植作物的各种农耕技术。最早的农耕技术被称为“刀耕火种”技术，这种技术是用来对付森林的，农民利用这种方法清空树丛和灌木以便播种。但是在人类历史早期，对于只有石制工具的农民们来说，清空树丛也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于是先民们就利用火烧光树丛，以开辟出空地来从事农业。然而由于活树本身存有大量的树汁，并不容易烧着，因此早期的农民们就先围着树干削一圈，中断树汁的输送，让树木死去。干枯的树木很容易点燃，而且燃烧后的灰烬也是很好的肥料。然后农民们就在已经清空、肥力又增加了的土地上播种，为种子发芽长出来的作物浇水、除草，并建起篱笆防止野兔或鹿等野生动物闯进田地，最后则要在作物成熟时收割它们。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使得农业得以大规模地拓展到原本是森林覆盖的地区。而且这一

技术至今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得到沿用。

另一个在所有大陆上至今都仍被运用得相当普遍的技术是梯田农业。梯田在山区是一种深受农民青睐的技术,因为在山区,一旦下起大雨洪水就会沿着山坡汹涌而下;这时农民就面临着庄稼被冲走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农民在山坡上筑起石头墙,并收集来泥土垒在墙后。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在石墙后不断聚积。当泥土多到足够积满梯田时,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在这些小块的平整田地上耕种作物,而不必担心洪水会把它们冲走了。这一技术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土豆,中国北部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玉米,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地区的国家的农民则用它来种葡萄。

第三种农业类型是块状根植物的种植,这一技术在热带地区应用得比较广泛。在这些地区有许多有块状根的植物,如芋头、薯蓣、树薯等。它们的活的根茎有一部分埋在潮湿的地下,并形成体积很大的隆起的块茎。这些块茎被采出来后,可以通过烤、煮、焙等烹调手法,制成菜汤、面条或蛋糕。这些纤维类的粮食作物搭配起来种植,可以一年到头不间断地提供食品。(这些淀粉类食物与鱼肉等肉类食品的搭配,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们的主要膳食结构。)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大约3000年前秘鲁山区农民发明的培高田地农业技术(raised field agriculture)。其后这一农业技术逐渐失传,并在几百年前就已被人们忘记。科学家们之所以又对这一古老的农业技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当人们发现了它的奥妙之后又重新用它来种植秘鲁当地的作物时,却惊奇地发现这样种出的作物比用贵得多的、采用化肥和机械的现代农业技术培养出来的作物要大得多。

这一技术中所使用的培高的田地宽为13—33英尺、长达33—330英尺、高约3英尺,它们由渠道间隔成大小基本均等的几块泥质平台,作物就种在这些泥质平台上。而培高这些泥质平台的泥土实际上就取自于开挖渠道时所挖取的泥土。农民们之所以要在这些培高的田地而不是在周围的平地上种作物,是因为如图6所示,采用这一培高技术有以下几个优点:

——渠水的温度可以保护作物免遭安第斯山区寒夜里经常出现的霜冻的侵袭。

——渠道可以及时地将多余的水排出,从而保护作物免遭洪水袭击。

——由于毛细现象作用,渠水可以及时地被吸收到田地;而且农民通过手工也可以很轻易地从渠道中取水灌溉,所以作物可以免遭干旱侵袭。

——作物可以从培高田地的泥土里所含的有机肥中吸取营养。这些富含有机肥的泥土取自旁边的渠道,含有绿藻、家畜排泄物和腐化的植物枝叶,其营养程度要优于化肥。它除了耗费劳动力以外不耗费其他任何东西,而当地的村庄中也并不缺劳动力。

——渠道中养的鱼提供的蛋白质,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民的膳食营养。

由于具有以上优点,在1984年秘鲁试验培高田地农业技术时,试验田每公顷产土豆30吨,而其旁边采用进口农机和化肥种植的对比田每公顷则仅产土豆8吨。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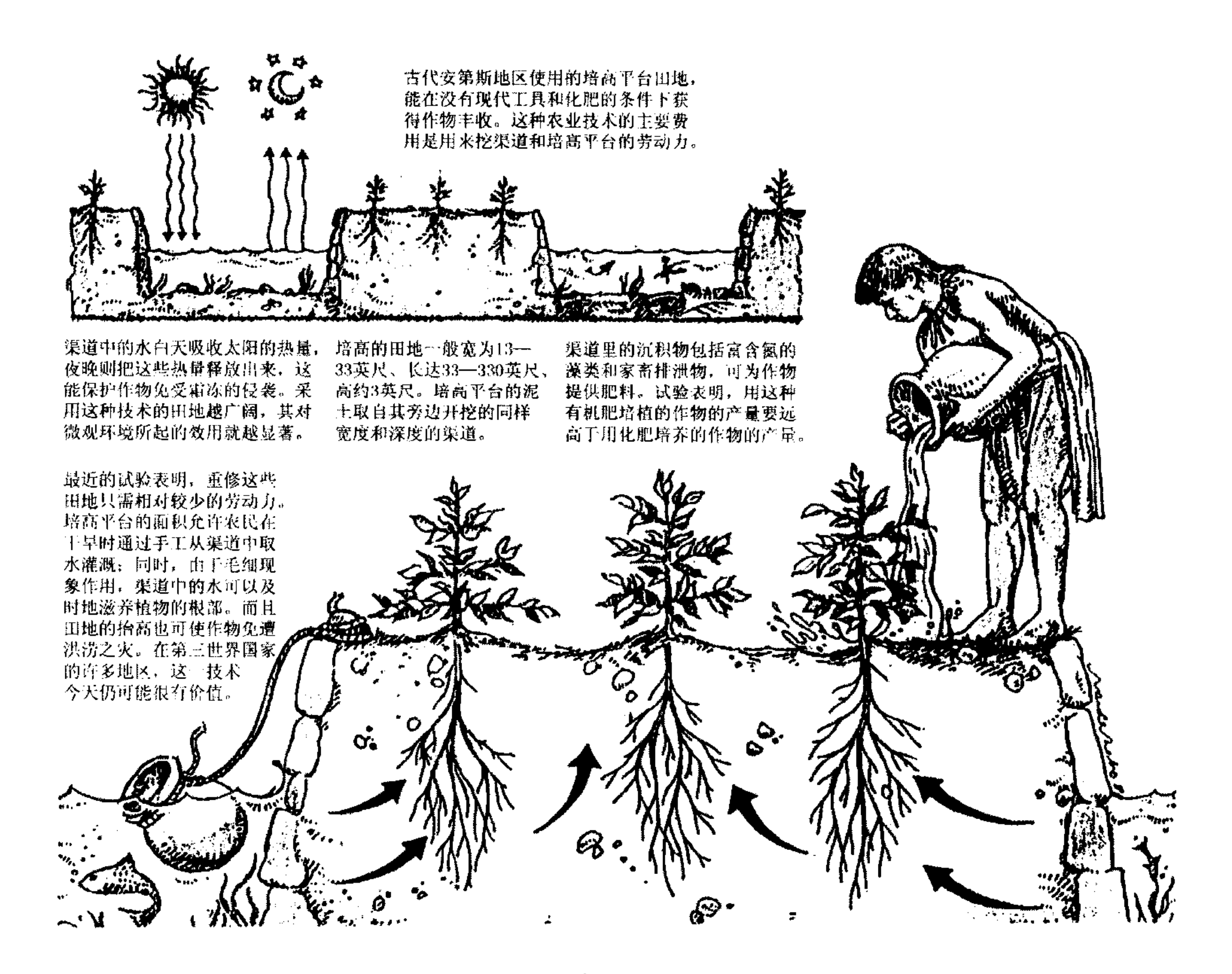


图 6　培高田地农业技术

于培高田地农业技术是一个自我支持而且生产效率更高的体系，它已经逐渐在美国、印度尼西亚以及好几个拉美国家得到了推广。或许这一最先发源于安第斯山区、其后却被人们忘记了数百年、最近又被科学家们发现和激活的农业技术，最终还是要在全世界重新得到运用。这一古老技术的成功运用表明，尽管现代的“高科技”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但即便是在技术领域，我们也仍旧可以从我们的史前祖先那里学到一些经验。

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那些雨量较少、不适于从事农业活动的区域，当地居民倾向于喂养家畜——他们致力于驯化当地的动物而不是当地的植物。他们最先驯化成功的动物是狗。最开始先民们也像对待其他动物一样，杀了狗吃肉。后来他们才发现狗的叫声能够吓跑野兽，所以可被用于看守营地，而且它们还能帮助猎人发现猎物。到公元前 10 000 年时，各个大陆的狩猎部落已经都有了他们自己的猎犬队。

此后，人类就开始驯化对他们有这种或那种用处的其他动物。而这样一来，他们也就由农民转化成了牧民，过起了游牧生活。今天，游牧生活不仅在非洲撒哈拉

沙漠以南的草原地区占据主要地位，还盛行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其他许多辽阔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一直等到马和骆驼得到驯化解决了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时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一旦畜牧业开始在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000年兴起，就发展起了多种多样的畜牧物种。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畜养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西南部主要是畜养牛；不过也有一些地区的牧人则畜养多种动物，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就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等。

可是不管畜养了多少种动物，牧人们的生活相对于生活在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民的生活来说，始终都是穷困的。在这些流域中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发展了起来，它的生产率很高，能够及时地支撑起伟大而富庶的文明。这些富饶的文明中心区对于那些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和中东以及北非沙漠中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为内乱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而游牧民族又随时准备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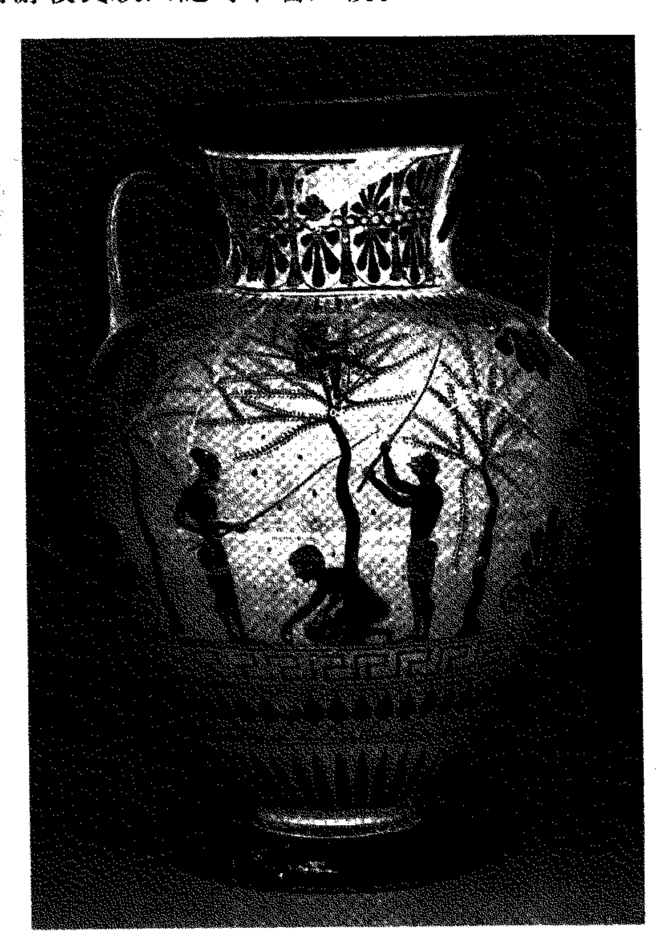


图7　收获橄榄图

这幅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制作的瓶子上所绘的图画，表现了人们是如何收获作为雅典最重要作物之一橄榄的。

四、食物生产者的生活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人类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也就取代了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成为了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到了今天还在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存在。

最近的考古发掘揭示，我们的早期祖先并不拘泥于只选择游牧和采集生活或定居农耕生活中的一种。如果当地的植物或动物食物来源非同寻常的丰富，以往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当地居民，也可能会在村庄上成年地定居下来。这一情形就曾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的阿布·哈热耶(Abu Hureyre)出现过。这一地区野生的谷物和豆类长得是如此的稠密，以至于它们产出的粮食就像把它们种植在田地里一样多。因此，这也就使得该地区能够供养起一个人数多达300—400人的村庄达数百年成为可能。同样优越的条件也使得食物采集者在其他一些地区永久性地定居下来，像北美大陆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含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英属哥伦比亚)，这里长年盛产鱼类。同样在太平洋东岸地区南部，沿秘鲁海岸一线，合适的洋流养育了涵盖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海洋生物：从浮游植物到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因此在这些地方，食物采集者也在永久性的村庄中定居，以采食海岸边大量的海洋生物为生。但是这些村庄只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一般说来，游牧生活是食物采集的自然结果，就像定居生活是食物生产的自然结果一样。

人们常常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而这样做则显然会使人误入歧途。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等方面知识的掌握极其缓慢而又费力，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是由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却滴雨不下，有时则又瘟疫横行，因此饥荒也就成了常事。而且定居生活使得粪便和垃圾的处置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爱吃粪，起到了清洁环境的作用，而且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总是跑到离住处较远的地方去解手，但这却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导致的各种疾病。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人们的饮食很不全面，因而营养不良也就是最常见不过的事。可以想像，在这些情况下，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出生率高往往又使得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但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漆黑，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其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了此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究其根

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倒不如说是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够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着流浪生活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则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舒适的家具、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粘土制作陶器。最初,他们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出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近东的居民们已经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被用来给陶器上釉。而上过釉的表面则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民们就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类似的进步也出现在利用纺织品方面。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就已经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经能用黏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像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去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纤维植物类,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不过造房子用的材料则因地而异。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够容纳十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黏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都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除了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有一层用布做成的床罩,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搁板的橱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或存放东西的地方。房间的中央则通常会生上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用来排烟。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各游牧民族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一般都是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每个部落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并以此相互区分。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形,几乎还处于游牧群体的水平。不过也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虽然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而且还根本没有后来文明所特有的基于阶级的排外性。

新石器时代村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通常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由于适宜于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而且这种大家庭还收养外来的流浪者。而当遇上大事,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这种大家庭也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这种大家庭还能有效地利用大块的土地,因为它能够

留下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而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

居民之间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是新石器时代村落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所有制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落所有，而村落则又是由各个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中，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曾经说过："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出现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的情况……"[2]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才使得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阻碍性因素——生产的数量只要能够满足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需要就可以了，绝对没有追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形式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一天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5 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要少于现代人，而且工作对他来说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一名社会平等成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去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落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因为期望对方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由于亲属关系。这种部落社会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是一个生产率低的社会，这一点从第 38 页所载贝恩巴(Bemba)部落的工作日程表中就可以看出来。

部落中社会关系的平等也惠及到部落中的两性关系。这一平等清晰地体现在土地的所有制上，部落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一位人类学家在考察了生活在婆罗洲中部种植水稻的相人(Siang)后在他的报告中提到，相人的寡妇在失去丈夫后仍然可以继续种植属于她们的田地。"总的说来，妇女能够像男人一样熟练地使用斧子。"如果某个寡妇受到孩子的拖累，"她通常会得到村庄中其他人的帮助。他们会无偿地赠予她稻谷和野猪，或者帮助她收割作物。这种帮助至少可以延续到她的孩子们长大到能帮上她的忙为止。"[3]

妇女们不但在农业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在使用村庄的新用品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人们在发掘位于小亚细亚地区凯特尔·哈玉克(Catal Huyuk)的一处公元前 700 万年的人类定居点时发现，当时的妇女已经能够种植当地的植物，用公社的公共烤箱烤面包，纺织羊毛和棉花，用麦秸编织垫子和篮子，并烧制陶器用来煮饭和储物。而且在这个特别的定居点中，妇女不只是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而是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这里的绘画雕塑、房屋装修以及墓葬遗址都显示出当时家庭等级的最顶层是母亲，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而父亲则位于最下层。

最后谈一谈宗教。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其实也就意味着新的神——新的宗教

信仰开始出现——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到这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农夫们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够保护他们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的神灵,他们通常会隐隐约约地认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不过,最为重要的则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大地之母,即丰产女神的崇拜。他们认定,粮食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决定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也就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的黏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而这也充分反映出农业从其发源地中东向外传播的历史。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则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1平方英里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总人口在距今10 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 300万足足增加了约25倍时,也就不必感到惊奇了。

部落社会的低生产率

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33年9月记录下了生活在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的贝恩巴部落里人们的工作情形。从中不难看出,所记录的时段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人们可以比平常多喝一些啤酒。不过该记录的如下节选部分却表明,贝恩巴部落的成员完全可以不必去处理现代工业社会中那些"繁重的日常工作"。*

1933年9月1日,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其中一葫芦给老人喝,另一葫芦给年轻人喝。有人生了一个小孩。其他村庄的妇女也赶过来祝贺,并在村子里呆了两三天。这期间妇女们种菜的活推后了。

9月2日,老人出去清理灌木。年轻人呆在家里喝剩下的、有点发酸的啤酒。更多的邻村的妇女赶来看新生的小孩。很少有妇女出门去侍弄菜地。

9月3日,年轻的男人和妇女去邻村参加由一个来访的教会医生主持的宗教活动。没人去种菜。

9月6日,年长和年轻的男人清晨6点30分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2点。晚上年长者和年轻人各喝一葫芦啤酒。妇女像往常一样做种菜的活计。

9 月 7 日,观察家所在的狩猎组杀死了一头雄鹿。男人们负责将鹿肉取回来。妇女们磨多余的面粉,就着鹿肉一起吃。又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人们从下午两点就开始喝酒。到 4 点钟的时候,年轻的男人开始醉醺醺地在村子里摇来晃去,四处滋事,最终争吵起来。晚上跳舞。老年妇女也兴高采烈,而她们的女儿们则指责她们在村子里的广场上跳的粗鲁的舞蹈。没有足够的啤酒给年轻一些的妇女,她们仍保持清醒,并对其他人的胡作非为表示不满。除了年老的男人的农活干完了之外,其他人的活都没完成。

9 月 8 日,上午 8 点,每个人都情绪高涨地下地干活。中午 12 点,人们回到家里。年轻的男人坐在茅屋里,喝了两个小时的剩啤酒,用苏格兰传教士教的全音阶唱法唱赞美诗。年青女孩出去搞了一个小小的毒鱼活动,但是什么也没抓到。

9 月 15 日,3 个男人在河边开垦旱季菜地。小男孩在学诱捕鸟类。年青女人都去了首都,还没回来。没有提供加餐。没人做像样的饭菜。

9 月 17 日,很热。年轻的男人整天泡在屋里,相互为对方梳头、刮脸,相互捉虱子。没有加餐。女人们太累了,不愿意做饭。

9 月 19 日,9 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 个女人在锄地。3 个女人在堆柴火。年青女人出去"毒鱼",抓到了一条鱼(约 2 磅重)。

9 月 22 日,3 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 个男人锄地。4 个年轻人和他们妻子中的 3 个人去钓鱼。3 个人在堆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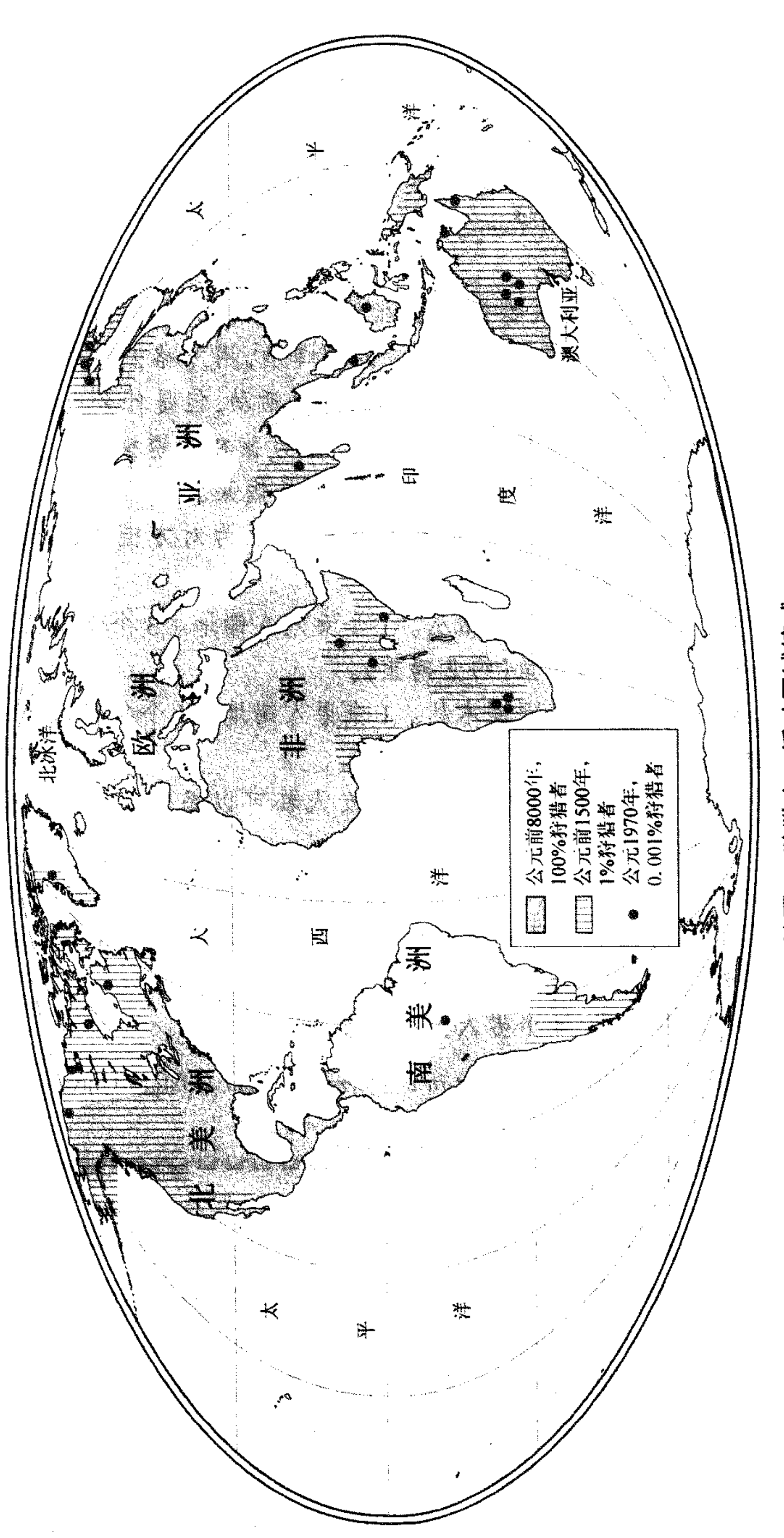
9 月 24 日,全村分享 4 葫芦啤酒。男人、女人都可以喝个够。喝啤酒的活动时断时续地持续了两天。

9 月 25 日,两个年长的男人在砍树。年轻的男人不敢爬树,因为"啤酒在眼前晃荡",他们在屋里坐着编篮子。只有一个女人在侍弄菜地。小男孩在诱捕鸟。剩余的啤酒被喝个精光。

9 月 30 日,更多的啤酒。4 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

* A. I. Richards Land, *Labour and Diet in Northern Rhodesia* (Oxford University, 1939), pp. 162—164.

并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长都一模一样,那些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就增长得最快。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妇女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乳房为孩子哺乳几年之久,而且在哺乳期间她们一般不会再怀孕。但是到了农业革命之后,母亲们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还能利用母牛、绵羊和山羊给孩子提供充足的奶水,因此她们也就再也不必自己为每个孩子哺乳好几年了。而一旦停止哺乳,她们重新怀孕的机会也就会大大增加。生活在喂养着驯化了的牲畜的村庄的妇女平均每人生 6 个孩子,这与几个世纪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食物采集者平均每人生 4 个小孩形成了一个明显对照。而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



地图5 狩猎人口活动区域缩减

到的在距今 2000 到 10 000 年间全球人口剧增的原因。

在农业人口快速增长并迁徙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中，食物采集者的人口总量被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而且其活动区域也被排挤出了大多数土地肥沃的地区。由于早期农业的生产率并不高，人口压力很快就在村庄中积累起来，从而使得过剩的人口被迫向附近食物采集者的土地上迁徙。有时候，人口处于劣势的食物采集者也就只得搬到不适于农业耕作的地区去。在非洲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布希曼人最终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俾格米人现在则住在茂密的丛林中（见地图 2 和地图 5）。

不过更为常见的情形则是，农业移民和当地的食物采集者相互通婚，产生出新的杂交人种。此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再度积累，新的杂交人种只得又一次向新的地区迁徙，从而再和当地人形成更新的杂交人种。通过这种方式，农业技术和作物也就被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而在这一杂交链条末端出现的人种也与其初始人种截然不同。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最初都发源于中东，但是将它们传入中国北部的却是纯正的蒙古人。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得农业传播到了全球各地，而这些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 8000 年时全体人类都是狩猎者，而到公元前 1500 年时狩猎者就已经减少到了仅占人类的 1% 多一点。而这一职业的转变进而又导致了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0 000 年以前，高加索人、蒙古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人这六个种族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见地图 2）。但到公元 1000 年时这一平衡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次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人、高加索人和黑人，但却不利于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而澳大利亚人之所以能够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种发现。这些岛屿直到 18 世纪时才被欧洲的探险家们发现，而当这一发现终于迟迟地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则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整体上来看，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它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高加索人和黑人在全人类中的优势地位。

推荐读物

关于农业革命起源和本质的理论正在不断地随着新发现而被修改。有关这个问题最新的观点体现在 C. Wesley Cowman 和 Patty Jo Watson 合著的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出版社，1992 年版），以及 R. D. Hurt 所著 *Indian Agriculture in America: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出版社，1987 年版）两书中。了解相关内容也可参阅下列著作：M. N. Cohen 所著的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77 年版）、S. Struever 主编的 *Prehistoric Agriculture*（Natural History 出版社，1971 年版）、L. R. Binford 和 S. R. Binford 共同主编的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eology*（Aldine 出版社，1968 年版），

以及 B.M. Fagan 主编的 *Avenues to Antiquity* (W.H. Freeman 出版社, 1976 年版)。有关中国农业独立起源的描述参见 Ping-ti Ho 所著的 *The Cradle of the Ea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 1975 年版)和 D.N. Keightly 主编的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 1983 年版)。C. Renfrew 所著的 *Archeolog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8 年版)一书分析了农业在欧洲的传播产生的文化方面的后果。J. Bertin 所著的 *Atlas of Food Crops* (Paris 出版社, 1971 年版)一书则阐述了农业革命对今日世界的影响。D. Price 与 J.A. Brown 合著的 *Prehistoric Food-Gatherers,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 (Academic Press, 1985)分析了食物采集者安土重迁思想的源起。

注释

1. Cited in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1996.
2. L.H. Morgan, *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 (New York, 1881), p.45.
3. J. H. Province, "Cooperative Ricefield Cultivation Among the Siang Dyaks of Central Borne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39, No.1 (1937), pp.80—91.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人性的本质

1971 年全世界都因为发现了塔萨代人而感到惊奇和兴奋。塔萨代人是生活在菲律宾所属的一个名叫棉兰老的、完全与世隔绝的岛上的食物采集者部落，部落总共只有 27 人。在至少 6 个世纪的时间里，塔萨堆人的先祖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这个小型族群最为明显和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完全没有侵略性。他们根本就没有“武器”、“敌对”、“仇恨”或者“战争”这样的词。不过自从与外部人群有了接触之后，他们就急切地用起了波罗刀(一种菲律宾人用的长刀)，因为用这种刀来采集食物、砍斫树木和劈开树丛，远比他们原来使用的石制工具先进。但是他们却拒绝使用矛和弓箭，因为他们不能用这些东西来采集食物。他们将采集到的所有食物(包括番薯、水果、浆果、鲜花、鱼类、螃蟹和青蛙)在族群的所有成员中仔细而又平等地进行分配。

对于塔萨代人这种生活状况的真实性，人们既有质疑的，也有认同的。但是由于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团体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被发现，因此作为人类学家承认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史前人类的代表，塔萨代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塔萨代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他们是食物采集者，这与农业革命前，即占人类历史 80%的时间中，所有的人类的身份相同。如果在这上万年的时间里全世界人类都像塔萨堆人这样爱好和平，那我们就不能接受人类天生就具有侵略性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观念。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世界认识到塔萨堆人的同时，另一个包括 30 人的族群——芬图人(Fentou)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也被发现了。这个部落的人都是凶暴的武士，他们不断地用弓箭进行战斗。同样矛盾的现象也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出现过：科曼奇人(Comanches)和阿帕切人(Apaches)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战士，但霍皮人(Hopis)和祖尼人(Zunis)却至今仍在培养他们的小孩过着和平的生活。

那么上述这些情况对我们认识人类的本性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历史记录显示，人类生来既不爱好和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教给他们的行事方法。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都拉(Albert Bandura)就曾专门进行过这项研究，他总结说，人类的本性

是"一种能被社会影响塑造成许多表现形式的潜在能力……侵略性不是人类与生俱来和不可变更的特性,而是一个鼓励侵略的社会环境的产物。"[1]

研究人类的本性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变得更加致命,而且其爆发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在占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段的旧石器时代,战争则并不多,因为小型的食物采集者群体只能占用那么大的地盘,占领相邻部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并无多大用处。事实上,他们很可能会在战争中失去一切,因为那时全球的人类少得可怜,而血腥的战争则极可能会把人类这个种族一举灭绝。小猴子只需完全依赖父母一年就可以独立生活,猩猩需要依赖3—4年,而人类则需要依赖长达6—8年。族群内的合作体系能够给小孩提供必要的食物和保护,从而更好地保证了他们在漫长的依赖期中的生存。简而言之,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相互合作的血亲社会之所以能够占据人类社会的主导地位的原因就是,它们十分适宜于保证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

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一切都变了。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不断增加,于是村庄拓展成城镇,城镇又扩张成拥有巨大的宫殿和庙宇以及聚敛来的财富的帝国。由于后来可以争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于是战争也就爆发得越来越频繁,也愈来愈具有毁灭性。尽管古罗马的士兵用短剑、中世纪的骑士用重武器杀死的人相对不多,但现代战争的伤亡却具有普遍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共造成了840万军事人员和130万平民死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造成了1690万军事人员和3430万平民死亡。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伤亡的数字肯定还会有更加惊人的增加。由来自30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于1985年9月报告称,核武器攻击造成的冲击波和辐射效应将会直接夺走几亿人的生命,而由此引起的饥荒更是会饿死全世界50亿人中的10亿到40亿人。核爆炸产生的黑色蘑菇云形成的巨大云层将会遮盖地球,使得全球的作物得不到热量和阳光,从而形成"核冬天"效应。

历史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因为人类的本性,而是因为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又是由人类组成的,因而它也可以由人类重新构建。这就是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总结出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要旨:"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有基因所赋予的做出各种行为的潜能,但这些潜能变成实际能力的方式则要取决于我们所受的训练,即取决于学习。……我们真正继承的是塑造和完善自身的能力,我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塑造,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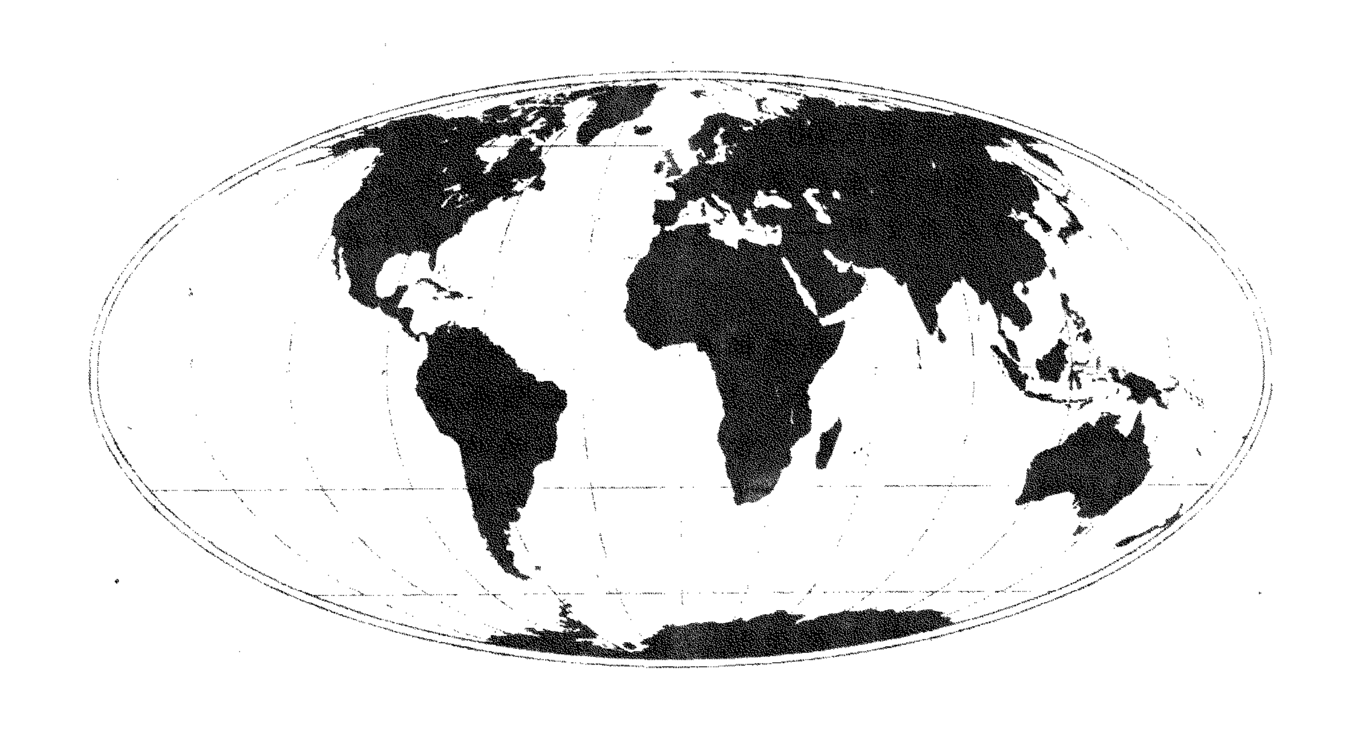
推荐读物

以下两位作者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富有侵略性的动物:R. Audrey 著有 *African Genesis*(Atheneum 出版社,1961年版),他还著有 *Territorial Imperative*(Atheneum 出版社,1966年版);D. Norris 著有 *The Naked Ape*(McGraw-Hill 出版社,1967年

版)。而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而不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这一观点体现在下列受欢迎的著作中:M.F. A. Montagu 所著的 *The Nature of Human Aggression*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6 年版)、A. Bandura 所著的 *Aggression* (Prentice Hall 出版社, 1973 年版),以及 R.C. Lewontin、S. Rose 和 I.J. Kamin 合著的 *Not in Our Genes* (Pantheon Hall 出版社, 1984 年版)。关于这一议题最近引起轰动的著作是 L.H. Keeley 所著的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96 年版)。

注释

1. A. Bandura, *Agression* (Prentice Hall, 1973), pp.113,322.
2.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1983 (Letters to the Editor).



第二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
（公元 500 年之前）

从第一编中我们已经知道，农业革命是猿人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这一革命促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得以发展出古代的大河流域文明。古代文明始于大约公元前3500年并一直延续到公元前的第二个千年，最后则被来自中亚高原和中东沙漠的游牧民族入侵者所灭绝。从此古代文明也就让位给新的古典文明——在这两个文明之间存在着几个方面的差别。

与古代文明局限在大河流域相反，古典文明则不断地向外扩张，直到相邻地域的古典文明相互接壤。于是，古典文明也就整个地覆盖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欧亚大陆。古典文明在实质内容和涵盖范围上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且与古代文明一样，每个古典文明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类型——自己独特的社会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伦理哲学——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必须注意到的是，和古代文明时期不同，在古典时代并非只有中东地区的文明才富有创造性。在这几个世纪中，欧亚大陆上的所有地域都在平等地进行着交流。所有地域的文明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且至今仍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影响。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能够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都分裂成了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而且这两个城邦总在相互交战。

——柏拉图

第3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000年）

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着的一片荒原上。尽管以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曾认为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但现在大家已经一致认定，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即《旧约全书》中所称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此地及其北面的平原以前统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约公元前3500年时，已有一些运用改进过的生产技术来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过渡。

其实公元前3500年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确定这样一个时间也仅是为了方便理解。实际上，无论将这次文明过渡的时间设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已经知道，人类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设想出农业而引起突变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古代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像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就导致过渡的。简而言之，这一过渡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而本章的目的就是要来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文明"一词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区分文明与新石器时

代部落文化的一些文明的特征: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治权力,纳贡或交税,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虽然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些特征,例如发源于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市,但是这些特征在判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确实可被用作一般性的标准。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的社会类型已给完全不同于此前那种崇尚平均主义的部落社会。那么这种从简单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转化到复杂的新文明是如何完成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最先出现文明的中东地区向文明转化的过程,来解答这一问题。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区,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还是在那片山区,人们当时又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即从山区迁移到两河流域,并逐步发展起了生产率更高的新灌溉农业和新社会制度。新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发连锁反应,最终产生了文明。

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在从高地迁移到低地后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降雨量不足,烈日暴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还是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还提供了大量木材,尽管这些木材的质地不是很好;那里的芦苇荡里生长着各种野禽小兽和鱼类,它们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新环境蕴藏了很大的潜力,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说在山区种植农作物时,降雨量还勉强够的话,那么到了地势很低的冲积平原上,降雨量对耕作而言就显得非常不足。因而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土,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于是最早的农人们就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所获农作物比他们早先在石块遍布的山坡上获得的产量有了惊人的增加。据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种籽量的86倍!所以农民现在的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样化了,而且由于实行了农业灌溉,食物的供应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导致了人口的增长,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开挖更多灌渠、开辟更多农田、生产更多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人们也逐渐掌握了新兴的冶金术。冶金术对缺少坚硬燧石的平原地区的远古移民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极其坚韧、可以锻造的石头,于是就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后来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这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铜可能是最早被提炼出来的金属——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冷却后能变成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其硬度可得到极大增强,边刃的锋利程度能超过石器。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经普遍懂得,在铜里面掺入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经过实践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掺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这样生产出来的青铜明显地胜过石器。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器易

碎，打仗时可靠性差。但是由于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所以它也就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运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也很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它由一棵小树制成：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留下一根树枝向外突出，树干的前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后端由扶犁人把着，当牛牵动树干时突出的树枝尖端便入地翻土。不过采用这一原始的发明翻耕中东地区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颇高。到公元前 3000 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已经普遍使用耕犁，而且该技术还被传入印度——到公元前 1400 年时它又被传入遥远的中国。用牛拉犁的意义在于，人类首次能够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来作动力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和核反应堆的先驱。

到公元前 3000 年时，风力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抽水等情况下借用的力量。当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已经先后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利用风力的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使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尽管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它仍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都是经由水路。



图 8　乘舟猎鸟图

这幅从埃及皇室陵墓出土的图画描绘了一个贵族家庭死后正乘船旅行去林中猎鸟，就像他们生前在生活中所喜欢做的那样。

车轮也是在这个富有创造性的千年间取得的一项重大发明。美索不达米亚平

原最早出现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它们被牢牢地钉在车轴的两端。到公元前3000年时,人们已经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而且轮子和车身也不再直接相连。此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但比起此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驴子等驮兽却要方便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人们先是利用这种战车冲击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用它作战台,兵士可以站在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陶轮中最简单的仅由一对盘形的车轮制成,轮盘之间直立竖放一根轴;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黏土放在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能够成批地生产陶器这种人类最早的工艺品。

伴随着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产生了同样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人口增多使得某些村落发展成为城市,这些城市由新兴的宗教贵族及后来形成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来统治。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则使食物有了剩余,从而使得社会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军队和官吏。虽然有不少人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技术进步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进步,但可以肯定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既非突如其来也不是单向的作用,这使人联想起一个关于人类进化的争论:是否因为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发明了语言和制造出工具?现在大家已经一致同意,这两者相互作用,语言使用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两者先是相互作用,然后共同促使城市产生和文明形成。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贵族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这一转化并非出于他们的意愿,也非出于强迫;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此后形成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它的起源可以从那些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当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落发展为城市后,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贵族。遵守农业活动的各种仪式(如求雨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巫师便成了村落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而后来新出现的祭司则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因为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得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转而又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文字就是祭司们发明出来用以记事的。从已知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还管理大量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的情景,以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他们还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建造及维修水坝和沟渠等等。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手工技艺的发展,因为当时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

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但到此时,宗教贵族们促成的社会成分多元化现象已经反过来开始侵害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就愈失去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次数也在不断增长,其起因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的供养能力,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客观上容易遭致战争劫掠。而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得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起初当一个公社偶而遭到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该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会举行大会,选举出一个人来担任这一非常时期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也就随之而变得越来越长,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了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则当上了国王。于是,宫廷便开始与寺院产生矛盾和争斗,直到双方逐步达成妥协,进行合作。通常,祭司们仍会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并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大量地招募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被用来建立帝国。

而自从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也就大大增加。大批生产的陶器和金属器具以及在一些质量更好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物品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不断增加的宫廷成员想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大批各种武器,不仅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此时的生产已经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有限的只用于能满足寺院需要的生产。

大规模生产与涉外商品交换有着重大关系。由于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原料都要靠从外面运来:比如铜来自于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而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依靠出口制成品作为交换。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产地。从公元前30世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人们没有忽视这一办法。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受虐待的阿卡德商人,率领军队越过无名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推翻当地统治者。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而随后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派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1]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费用对早期的城市国家来说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导致了传统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的开支,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反而日益被终身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则干脆被王权所取代。

阶级分化随着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这一点从陪葬品的差别越来越大就

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其细微的,但越到后来其差别就变得愈明显。到后来,绝大多数坟墓里都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出平民的贫穷;而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重金属制成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国王的陵墓更是与平民墓葬有着天壤之别,它的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权力和富足的殉葬者,包括国王的妻妾、士兵、乐师、马伕和普通的仆人。

从中国到安第斯的许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这表明了这些文明与它们所取代的简单的部落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我们对中东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化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它们使得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了第一批欧亚大陆文明(参见地图6)。

二、古代文明的传播

一旦文明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几个地区扎下根后,它便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正像农业革命导致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被古代文明所取代。造成这两个社会变迁过程的原因是一致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随着人口的增加,猎人们不得不转而从事农业,因为农耕技术的生产率要比狩猎活动高得多,同一块地养活的农民数量比猎人要多得多。现在类似的情形又在部落耕种者群体中出现了:他们也因为落后的生产率而惨遭淘汰。我们从第38页关于贝恩巴部落的工作日程的记叙中就可以看出来,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



图9 移民埃及图

这是一幅作于约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早期绘画,它描绘了许多部落的农民向埃及迁移。

活是多么闲适和随意。但是由于人们无法体会到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生产量的压力，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极其低下——部落成员只需要生产出能够满足自己家庭和需要帮助的亲属的生活必需品就行。

当部落人口增加时，需要的食物也就会相应地增多，这时部落社会这种组织形式就不能与生产率更高的文明社会相匹敌了。文明社会的生产率之所以会更高，是因为这种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阶级社会可以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僚机构人员、军事首领、传教士以及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努力地去工作。好好想一想贝恩巴部落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强度与下面一段话中叙述的埃及的农民和工人的工作强度的对比。这段话是公元前 3000 年一个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他通过对比大量下层人民的劳苦与少数上层人士的安逸，告诉他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写字就可以把任何重活都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吏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可以指挥别人……你不是也学着书吏写出来的东西吗？就是那东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人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边干活的金属制造工，他们的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子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收工之后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蜷缩着身子睡，而太阳一出来就还得再去干活。长年的劳作使他的膝盖和脊椎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一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走家串户，兜揽活计。就像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也只能填饱肚子……农夫一年四季只穿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像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又瘦又干。就算他能休息一会儿，也只能坐在烂泥地里。他不生病时，就得和牲畜一样干活；得病了，也只能在牲畜群中挤块地皮躺下……

儿子啊，用心学习吧，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比学习再好的事了。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完。[2]

显而易见，和那位埃及父亲提到的农夫、石匠、理发师以及金属制造工相比，贝恩巴部落的成员享受的生活更为闲适随便、无忧无虑。但也正是因为部落成员的生活安逸，他们也注定了将会被淘汰。与那些被迫辛苦工作以满足地主和税收官压榨的埃及同事比起来，贝恩巴人的生产率极为低下。因而就像以前狩猎者被部落耕种者挤出历史舞台一样，部落社会成员也被无情地逐出了历史舞台。

在部落文化传播到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时，欧亚大陆中心区的部落文化则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不断地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替代过程不可抗拒地重复着；到公元元年前后，文明实际上已经毫无间断地从英吉利海峡扩展到了中国海(对比地图6与地图7)。

如果我们认同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就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不过这些日期都只是一个大致的推测，它还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不断进行修正。实际上，人们最近已经发现，以前大多数史前年代所赖以确定的碳同位素测定法也会有正负几百年的误差。因此一些学者现在已经开始质疑传统的文明是从地中海东部向西欧传播的这种假设。

三、古代文明的类型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新旧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在农业与畜牧业的比例、种植的植物和饲养的动物的种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差别将各种文化区分开来。同样的道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也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古代文明中的每一个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都是一种独特的类型。而且这些类型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因此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都能立刻从该城市的建筑风格、社会风俗、食物风味和语言特色判断出这个城市是在中国、印度、中东或是西欧。

不过在看到各古代文明类型的独特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们也都具有某些共性，其中最显著的两个共性可能就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不平等。

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源于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这一事实之上。日常生活不再由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维系，而是由以税收、地租和劳役等体现的纳贡关系决定，因此那位埃及父亲提及的剥削现象并不是什么例外情形，而是普遍规则。而且还要看到，不但尼罗河畔的统治者对待那些农民、石匠和金属制造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现存的很多资料所描绘出的其他所有的文明也都存在同样野蛮的剥削。公元1世纪一位中国汉朝的观察家描绘一个农民是“腿像烧过的炭棒，后背结满盐痂，皮肤像锥子都刺不穿的皮革，拖着扭曲的脚掌和疼痛的腿脚蹒跚前行。”[3]

这种不平等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富裕的贵族流行在他们的每个乡间别墅都配上300—800个仆人。这些贵族买卖、质押、交换他们的农奴或“魂灵”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他们发布广告，将他们的魂灵和家庭用品以及其他商品一起出卖：“本人有意出售：宴会用桌布、两个经过训练的女孩以及一个农夫。”“本人

有意出售:一个举止得体的 16 岁女孩和一辆没怎么用过的二手马车。"[4]

古代文明的这种不平等甚至还波及到了死者身上。考古学家发现平民的坟墓中仅有一点陶制用具陪葬,有的甚至连一件陪葬品都没有。但是富人的墓葬中却是用贵重家具和珠宝陪葬;而王室的陵墓中则不仅有奢华的个人装饰品,还有大量的亲随,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太监、乐师和普通仆人——他们都被迫殉葬以便他们能在王室成员死后还能服侍他们,这也是为了反映出死者生前的富裕和尊严。在最近发现的秦始皇陵中,这位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用 7500 个陶俑组成的军阵将自己护卫起来。每个俑都有真人大小,其面貌特征各不相同,代表着 2000 年前皇帝统治下的各个少数民族。

更有甚者,就连坟墓中的骸骨也反映着古代文明时期生命之间这种残酷的不平等。对存在于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的危地马拉梯克沃(Tikal)坟墓中骨骼的研究表明,尽管一般的玛雅男人平均身高只有五英尺一英寸,但那些精美墓葬主人的平均身高却高达五英尺七英寸;而且他们的骨骼看上去也明显地更为粗壮,他们的寿命显然也要长一些。考古学家们总结认为,是"营养优势"使得玛雅的精英们能够充分发挥其在身高和寿命等方面的潜力。[5] 这种基于社会阶级的骨骼差异至今依然存在。英国卫生部在其 1984 年 12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在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体力劳动者为主的家庭成员的平均身高要明显低于非体力劳力家庭的成员。"[6]

除去社会的不平等之外,古代文明的第二个普遍特征就是两性间的不平等。我们已然知道,在旧石器时代妇女享受着同等的社会权利,因为她们作为食物采集者对食物供应所作的贡献甚至要大于男性猎人。同样地,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技术相当简单,妇女也能耕种居住地周围的土地,并能继续采集她们所能发现的各种食物,因而她们此时仍然是与男人平等的食物提供者,并保持着与男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但是自从犁和灌溉技术以及冶金等新技术出现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先进的新型农业为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也破坏了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从而也就破坏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妇女们发现自己参与到新型农业当中非常困难,因为新型农业要求人们从事驯服用来驮重的动物、砍伐树木、维护灌溉渠道、保养犁和其他农具等活计,而这类工作则并不适合女人做,因为它们要么太繁重,要么会让她们无法看护小孩。于是妇女们也就逐渐地不能再保持与男人平等的食物提供者的地位——她们在家里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照顾她们的小孩和丈夫。

这样一来男人也就逐渐垄断了新的农业技术和工具,而妇女则变得相互孤立且依赖男性,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妇女做的"家务活"和男人做的"家外活"的区分。当然家务活对家庭和社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却普遍将它看得不如男人做的家外活重要。由于女性被认为是做不那么重要的活计的,所以她们也就被看成是不那么重要的性别——"二等性别"。

另外,由于女人被"家务活"缠住了,男人不但在掌握新农业技术和工具上,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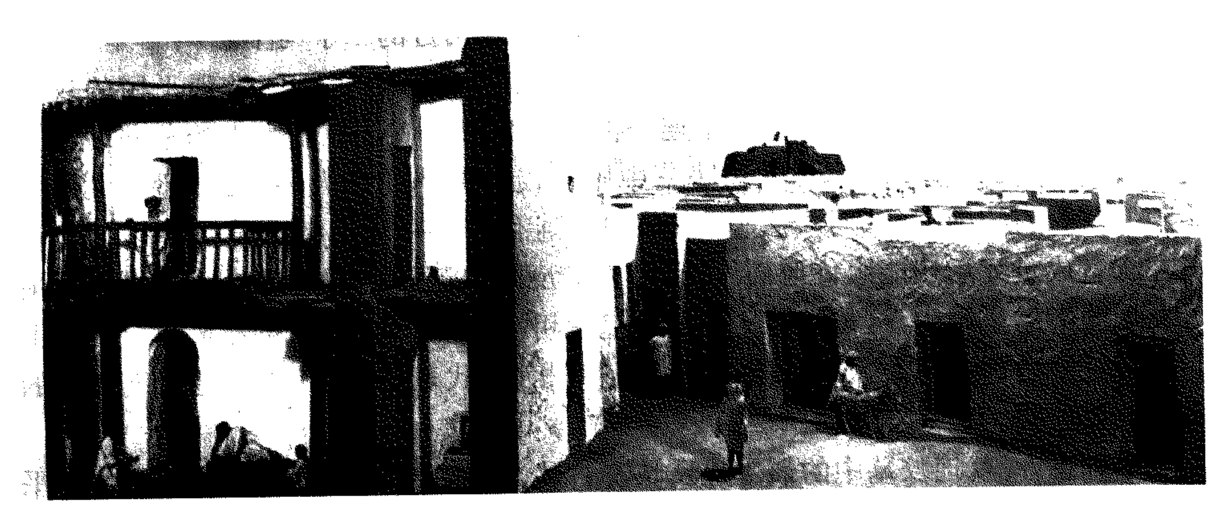


图10 乌尔城透视图

约公元前2000年时乌尔城(the City of Ur,在今伊拉克境内)风貌的透视图。

在获得国家新的位置上,也获得了垄断地位。他们占领了在议会、法院和军队中的领导职位。这样男人也就最终垄断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女性则变得依赖和驯服,并逐渐被叫成"弱势性别"。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欧洲人在15世纪进行海外扩张时,当发现在一些像生活在拉布拉多的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印第安人这样的食物采集者部落当中,妇女享有与男人同等的地位时,他们会感到惶恐不安。但是在诸如中国、印度和中东等一些海外文明当中,欧洲人则也发现妇女仍旧像在欧洲一样地受到限制和压迫,其惨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各个古代文明中妇女地位普遍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开始强调私人财产的继承。这使得男人竭尽全力要去保证他们名副其实地是其继承人的父亲,因为他的继承人将要继承他所有的财产。于是富裕的精英们就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和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活动。这些措施包括穿戴贞洁带、用簿记制度记录女性每次性生活的具体日期、阉割伺候统治者的嫔妃的男人以及广泛采用的割礼。割礼是通过割除妇女的阴蒂,达到减少或消除妇女性交时快感的目的。这一措施被认为能够有效地阻止妇女"偷人"。

众所周知,在这一男尊女卑的整体格局中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其中有几个明显的特例:野心勃勃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她迷倒了朱利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并试图通过他们恢复夺取埃及皇帝宝座的实际权力;阿斯帕西娅,伯里克利的情妇,她以学识渊博、聪慧过人、美貌无双而闻名于希腊;足智多谋的皇后艾琳,她推翻了她儿子的王位,自己成为了拜占廷帝国的第一个女性统治者(797~802年在位),尽管她的行为违背了传统,但官方文件仍称她为"正确的皇帝艾琳";还有女皇武则天,她贬黜了她的儿子,不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女性统治者,而且是中国最能干和开明的统治者之一。这些著名人物以其超凡的天资和过人的成就在史册上占有显赫的位置。但是除了她们的名声,她们的经历对于她们那些不知名

的姐妹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庇隆夫人、英吉拉·甘地和科拉松·阿基诺并没有显著地改进阿根廷、印度和菲律宾妇女的日常生活一样。

在考察过了所有文明在社会和性别方面由平等到不平等的转化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考虑每个文明的特殊类型。

美索不达米亚

文明的先驱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城市类型的文明，它的第一个中心出现在苏美尔。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经出现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而相互征战不休，结果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致使他们很轻易地就被北方来的印欧人入侵者和南方来的闪米特人入侵者击败。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部印欧人入侵者与闪米特人入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区而展开的长达数千年的斗争史。

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276—公元前2221年)就是作为该地区第一个帝国的奠立者而名垂青史的。他以两河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逐渐拓展，最后建立起了一个南达波斯湾、西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另一个伟大的帝国创立者也是一个闪米特人，他名叫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4—公元前1662年)。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他因制定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了近代，继汉谟拉比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

不过尽管这些帝国幅员辽阔，城市却仍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基本的单位。大多数平民都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牧民来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工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来代替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量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最终就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农田都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其所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牲畜一起，租赁给为他们服务的农民。作为回报，农民则靠自己的劳动经营这块份地，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寺院、宫廷或地主。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主要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的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主要的纺织原料。最常见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菜、洋葱、小萝卜、莴苣和黄瓜；水果则有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下详细的账目，像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饲料的数量、下次播种所需种子的数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

所有繁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管理事务和账目都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人类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为楔形文字，它显然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智力游戏或文学活动才发明的。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那样，"文字并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强烈的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7]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化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类等所要录写的事物画下来。不久图形符号就固定成统一的格式，而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像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图形符号不能被用来表达抽象的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边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抽象意义，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不过苏美尔人当时还不能全面系统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0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但它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然显得累赘。在这种情况下书吏也就变得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书吏掌握了繁复的书写规则，因此他们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最初的文字	后来的楔形文字	早期的巴比伦文字	亚述文字	初始的或引申的意思
				鸟
				鱼
				驴
				牛
				白天
				谷物
				果园
				耕作
				投掷
				站立/走

图 11 楔形文字

几个楔形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背景中找到原因，但它的影响却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它使人们能够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通过世代相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它还能使人们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变得更加鲜明、更为巩固。这样文字就成了使人类各种类型的文化实现融合的主要手段。

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苏美尔人不仅发展了文字，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现存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畜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创造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 3000 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有其实用主义的目的，因为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了天体的运动，因此只要弄清了天体的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就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消融，常常会引起特大洪水，它们不只充满了灌溉沟渠，还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在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如下这样的词句：

> 滔滔肆虐的洪水啊，无人能和它对抗，
> 它使苍天动摇，让大地颤抖……
> 庄稼成熟了，肆虐的洪水却来将它淹没。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上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感到，自己正在独自面对着许多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苏美尔人在一首诗中写道："只有人，寿命不久长，无论做什么，都如轻风一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他们所处的不安全的自然环境。他们认定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的，而神的意志和行为则是无法预测的，因而他们就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其中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个方法则是剖肝占卜术，即通过察看和分析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占星术，它是通过观察星辰的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在美索不达米亚，每个人都供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把它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由它而被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各位地位更高的神。



图 12 苏美尔人所制群像

特尔·阿斯玛(Tell Asmar)出土的苏美尔人制成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间的雕像。这组群像埋在现在巴格达附近的一个寺庙的圣坛旁边。在这组包含诸神、传教士和信教者的群像中,最高的那座雕像是阿布(Abu)神像,它是"植物之神"。

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纂完备的法典来减轻笼罩着他们的不安全感,而《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汉谟拉比法典》的宗旨是明确而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此这部法典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指导了当时的社会行为。以下是该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 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惩罚原则:"如果一个人伤害了贵族的眼睛,判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断了贵族的手足,判还折其手足。"(第196条,第197条)

2. 阶级歧视,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能得到的赔偿要低于社会地位高的人:"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第203条,第205条)

3. 施行严格保护商业社会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应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应处死刑。"(第6条)

4. 颁布许多类似"福利国家"政策的规定,主要有:确定生活必需品每年中的价格,限制利息率不能超过20%,周到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

的信誉,城市负责赔偿未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第23条)

5. 具有现代社会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即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静止不变的。法典是转达神的命令,是为了公正地对待人类的利益而颁布的。法典生动而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他统治期中,人民会怨声载道,政权的寿命不会久长,国家会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会永远被人遗忘……他的灵魂在地狱里也会喝不到水。”(结语)



图13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

该石柱上刻着用以规范社会的《汉谟拉比法典》,共包含约300条法规。

最后,《汉谟拉比法典》和其他所有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法典一样都以明确的法律术语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优越地位——婚姻关系是其主要的应用领域。由于当时的婚姻关系是作为医疗保险、残疾保险、养老保险缺失的一种替代,所以婚

姻不能由可能会被爱情蒙蔽的新郎和新娘来选择，而是要由双方的父亲、或者在父亲去世的情况下由其母亲或长兄作决定。结婚后，丈夫是法律承认的无可争辩的一家之主，他的妻子和孩子必须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作为家庭的首脑，丈夫在法律上是他妻子和儿女的主人。为了还债，他可以把她们当成普通物品一样地典当或出卖。

妻子如果通奸将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通常是对她和她的奸夫处以死刑。而对丈夫而言则没有不忠这一说，因为依照法律他不但能够拥有一个正妻，还可以纳一个妾和许多女奴，以满足他的"需求"和保证后继有人。事实上，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有义务给她的丈夫找一个妾，以保证他能有后。丈夫想离婚十分容易，他只需指称妻子不能生育或是个挥金如土的人抑或宣称她蔑视他。但是如果是妻子想要离婚的话，那就是一场致命的赌博。法典规定，她必须接受调查："如果她为人谨慎且从无过错，而她的丈夫又已离家出走，且曾非常蔑视她，那她可以带着她那部分财产（她的嫁妆）回到她娘家去……但是如果她被发现为人不检点、离家出走、毁坏家庭、蔑视丈夫，她就将被淹死。"

埃　及

不同于属于城市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是一种帝国文明。这一文明之所以能够非常稳固且延续很长时间，主要得益于其地理环境。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得到了特别好的保护，并且还不易遭受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而无须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样时刻都在准备着应付外敌入侵。而且埃及也没有因不时的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迭。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水流使得北上的航行变得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显得毫不费力。这样埃及人就拥有了一条宝贵而又可靠的交通运输线，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

在埃及从公元前3100年得到统一到它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征服这2500年间，有三个帝国统治过埃及，而且相继的帝国之间的间隔也都相当短暂，因此埃及文明是稳定而保守的。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自信而乐观的文明——正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突如其来的爆发泛滥使得苏美尔人感到不安全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可以预知且又水势平缓的泛滥则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苏美尔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为恶神，而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喜神。

重视死亡，为各人——尤其是国王——的来世作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埃及人认为，国王死去后其生命并未终结，所以国王的尸体被用香油等药料涂上防腐，并与食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一起，被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在所有的巨石金字塔中，法老胡夫的金字塔规模最大：占地 13 英亩，塔高 481 英尺，全塔约用 2 300 000 块巨石砌成，平均每块重约 2.5 吨。很难想像，这么宏伟的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当时的埃及甚至连铁滑轮都制造不出！

据说当时埃及的农民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一位能够决定他们共同幸福的神建造宅邸。当然也有人认为，不管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过前一种说法的确有力地反映了我们目前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众神之王，而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分，这一观念的确令人费解。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才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制定法典——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被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强化。宰相被称为“全国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其下设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每一分署均设有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当年景不好时，还负责分配种子和牲畜）、管辖各省的省长及其下属的管理城市和周围村庄的市长。



图 14　内菲太尔皇后

在专司生育和繁殖的伊西斯女神引导下的内菲太尔皇后。

埃及文明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尽管在当时的埃及社会中已经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它们却不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在埃及，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活动，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这些税收既被用来支付国家的开支，也被用作荒年时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都由国王负责"。除了缴纳赋税外，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服徭役的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图15 斯芬克斯像

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像。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举世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都还无法超越。他们的搪瓷制品、象牙和珍珠镶嵌工艺品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给玻璃着多种颜色并最早开始鞣制皮革，他们创造的鞣革方法至今仍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得到运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均匀，不逊于今。埃及人可能很早就发明了化妆品，并发明了制造化妆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头发的方法。常用的化妆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发等等。

克　里　特

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它的贸易，它专做中转贸易，将地中海此端国家的商品转卖到地中海彼端国家去。由于四周都是陆地环绕的地中海并没有辽阔的大西洋中那样凶猛的风暴，因此克里特岛的商人们可以在一直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而且克里特岛上的山区长满了森林，并不缺乏建造单桅商船的木材。米诺斯人驾着这种海船，满载着来自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来自叙利亚的马和木材，来自爱琴群岛的银子、陶器和大理石，来自塞浦路斯的铜，以及自己岛上产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

商业对米诺斯文明的影响无处不在。米诺斯国所有的城市都不用设防，因为它拥有一只强大的海军，足以保护该岛不受侵犯。克里特的村庄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庄更奉行平等主义。大陆的城市中一般都会有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其周围则是一片贫民区，而克里特岛则主要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露天宗教活动的地方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都住在用木头和灰



图16　米诺斯王宫

建于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

泥建造的具有独立结构的房子里。此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家庭奴隶，但数目不会多，因为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供奴隶住的房屋。因此克里特的单桅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来充当划桨手的。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想仅仅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他们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的都是他们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所有场景都可以被拿来当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致敬的妇女，都值得描画。克里特岛人在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建筑物外表，而是使用者的舒适度。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结构复杂，明显是历经了好几个世纪才建成的。宫中有国王的大殿、接待室和起居室，占王宫一大半面积的是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也比较符合从事贸易民族的特征。而最了不起的则要算克里特人建造的复杂的给水和排水系统，一直到近代都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克里特岛远离战争，又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和国家建设，因此新石器时代起源的血亲体系在这里保存得比在中东大陆要好。其结果是，在克里特岛上，男人没有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取得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上的垄断地位。壁画、印章的纹饰显示出，克里特岛的妇女做起“家外活”来和做“家务活”一样积极。从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到，妇女们在田间劳动、在园林中跳舞、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斗牛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了战争，这明显不同于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妇女。在这里，妇女既能像男人一样拥有财产，也能像男人一样方便地提出离婚。在这方面，克里特文明是所有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中一个伟大的例外。

印　度　河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我们可以从这里的城市建设中看出这一特色，这些城市都是按照一个统一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6—7平方英里。所有的城市布局都呈格子型，宽阔的主干道环绕着长方形的街区，每一街区长约400码、宽约200码，比现在城市中常见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多用石材建成，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晒干的砖，而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建筑物则是用烧制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制砖的模子都采用两种标准尺寸：11×5.5×2.5英寸和9.2×4.5×2.2英寸。可见，印度的度量衡是统一的。这样整齐划一的城市布局和有条不紊的建设安排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该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但在此后的1 000年中它实际上极少变化，这种墨守成规的状况甚至达到了在有些城市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在其原址上重新建起的新城市也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而又

连续的传承在这个世界上真是绝无仅有，即便是埃及也无法望其项背，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因为该文明没有留下军事装备和城防工事的遗迹。



图 17　印度石印

印度的石制印章。上面所绘的是印度常见的隆背牛。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也主要是农业文明。这里种植的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有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等作物，而且印度河流域是所有文明地区中最早使用棉花织布的。此外印度与外部世界也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它主要出口孔雀、猿猴、珍珠、棉织品、铜、象牙以及象牙梳等象牙制品——当时的梳子与今天印度仍在使用的梳子是同一造型——梳子是古人必不可少的用具，因为人们要用它将虱子从头发中梳出来。这里的许多对外贸易都是与美索不达米亚开展的，进出口商品是用帆船沿着波斯湾运到那里的。一旦他们的船看不到海岸了，印度人就放出乌鸦，让它飞去找寻最近的海岸。这一方法正是《圣经》中诺亚在方舟中希望找到陆地时所使用的那种办法。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原因和具体过程尚不清楚。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由中亚的入侵。不过最近又有人提出，印度河流域文明也许是被泥浆淹没了。按照这种说法，地壳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了印度河的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淹没了印度河文明的首都摩亨约·达罗。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毁损，河水冲出堤坝，大河又恢复了其原先的水道，不过，摩亨约·达罗这座城市已被毁灭。从摩亨约·达罗旧址上覆盖着一层又一层的淤泥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五次以上。最后一次洪水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使得欧亚大陆边沿地区文明的力量遭

到极大衰退，从而也就未能抵挡住欧亚大陆中心区域文化的同化。

但是这一切毕竟都还只是推测，目前尚无从证实；因为人们至今仍无法解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印度河流域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后来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的书法”，也有人形容这种书法“就像牛犁地一样”。

商　朝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与所有其他欧亚大陆文明迥然不同。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仍旧是独特而惟一的，其独特性主要是由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造成的。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由绵延的山脉、沙漠和高原与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中国的东部面对着浩瀚的太平洋，而北部则是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平原。

尽管中国在地理上比较封闭，但她也没有完全摆脱来自外界的影响。早期商朝文明之所以会出现在黄河流域北部，正是因为这一地区是各类文化的交汇点，它同时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来自西边的农耕民族以及来自南方的森林居民的影响。就连远隔万里的中东文明也在中国北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公元前1500年建立商朝的入侵者学习和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能。运用这些技能，这些入侵者征服了散布在中国北部的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落。

发生在以后入侵者身上的事，也发生在商朝入侵者的身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商朝人最终反被当地文化所同化，而中国人则仍旧保持着其传统特色。尽管来自中东的大麦、小麦、绵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物品丰富了中国文化，但这些发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明传统。于是我们看到，尽管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就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仍以其一直延续下来的全球最古老的文明而骄傲。

其实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第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而另一个特点则是中国人不普遍食用动物的乳汁。事实上，中国人对吃动物乳汁和乳制品的反应和西方人对吃虫子和蚂蚁的反应是一样的。另外，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主要特征。中国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姓氏就与这一崇拜有着密切联系。中国人总是将家族的姓氏放在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将其放在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出了在中国社会中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典型的中国建筑中屋顶富丽堂皇，由一排排木柱支撑，这种建筑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已存在，就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用筷子而不用刀叉一样。

在殷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的文化历史都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的甲

骨文。幸存到今天的商代甲骨文大都书写在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境、狩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然后将烧得通红的小棒子烙这些切口，使其产生裂缝。然后占卜者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由于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的许多才得以幸存下来。它们不仅揭示了商朝的甲骨文，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商朝人日常生活的许多场景。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和官吏。而且在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使用的只是一些轻武器，而像两匹马牵引的战车和重装的青铜盔甲等重武器则只有占据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只要将商朝统治者结构复杂的宫殿和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互对照一下，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而商朝统治者陵墓中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工艺品、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



图18　商朝甲骨文

商朝印有甲骨文的兽骨，它是在动物骨头上刻写出文字，然后加热，使其产生裂缝。占卜者再详细察看裂缝与文字的关系以断吉凶。这一文字是中国语言的先驱。图中兽骨上所刻的是中文古文的象形文字。

中国文明也像其他文明一样在两性地位上存在不平等。重男轻女的偏见从小孩一出生时就开始表现出来,所以女婴比男婴更容易遭到杀害。在儿童时代,女孩子就被迫缠足,这使得她们走路蹒跚,不可能离家太远。至于她们的婚姻则更是由父母一手包办,结婚时心惊胆战的新娘由父亲的统治下被移交给婆婆统治。在一个境况较好的家庭,她还可能不得不接受丈夫娶第二个妻子或纳妾的现实。当她不能生养一个男性继承人时,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

中国性别间的不平等也反映在中国独特的阴阳世界观中。中国人认为,世界是阴和阳这两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元素的产物。阴代表女性、黑暗、弱小、被动;阳代表男性、光明、强大和主动。尽管男性和女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但女性却天生就是被动和服从的。从这一哲学命题出发,男性理学家们几千年来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妇女应该如何行事才是恰如其分地做到了服从和被动。

部落居民和农民

文明的一个代价就是将人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下文所述是荷兰官员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发现。当地的巴布亚人从不知文明为何物,并拒绝向荷兰人打躬作揖,因为他们自认为是自由人。但是居住在阶级社会中的印度尼西亚人就愿意接受荷兰人为他们的主人。以下是一名美国记者的报道,它揭示了文明是如何影响人类之间的关系的。*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两个巴布亚人的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看见荷兰官员就赶忙站起身,必恭必敬地站着;而那两个巴布亚人则只是抬起头冲他微笑着,却连身子也没动一下。

一天晚上,大约九点钟,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招待处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了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在酒吧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想借这一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习俗的部落居民见识一下现代武器的威风。

部落居民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一个人对荷兰人说:

"不错,你们有枪有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劲弩想来你们是不会用的,我们却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一段时间、习惯于高人一等的荷兰官员,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后却要让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进入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习惯于尊重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殖民者是主人，并被当地人当作主人对待。

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根本就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政府。除了敬重各种神灵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揖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接受，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是巴布亚人却回答他道：

"我们都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 见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1957. © 1957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四、游牧民族获得权力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不管是在中东、印度还是远在中国，所有的古代文明纷纷崩溃。那么造成整个欧亚大陆政治崩坏、社会离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的入侵呢？要对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给出一个肯定而确切的答案是极为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在决定事态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各个古代文明内部的虚弱。由于当时黄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因而不能用来大规模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得君主及其所属的政治、军事集团实际上垄断了武器，从而也加强了该社会集团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能够得到武装；因而当古老的文明不得不面对全民皆兵的游牧民的进攻时，兵力动员不足也就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而且昂贵的铜价使得农民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等笨重的石器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在劳动效率和耐用性方面都比不上金属工具。

内部虚弱不堪的古代文明很容易成为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目标(有关游牧民族的起源，参见第二章)。对各古代帝国的崩溃起了主要作用的游牧集团有三个：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人、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大致发源于里海地区，起初在那里以放牧为生，并在里海岸边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好的牧场，他们就会用大牛车装上所有的行李朝那里迁徙。迁徙时整个部落总在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也全都投身其中。印欧人就这样

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经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地区为根据地，不断地威胁着在其攻击范围之内的各个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大草原西部居住着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居住着的蒙古-突厥人中间隔着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更恶劣，牧场也更贫瘠，放牧羊、骆驼和马可以，牧牛却不行。这种自然条件的不平衡造成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出现了一次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以难民的身份，或以征服者的身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人旋即填补了西徐亚人留下的真空进入中亚，并一直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最东端向西推进，并于13世纪侵占了欧亚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这些大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由于占有地利，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不时地侵入中国。

在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大草原西部各民族的种族组成状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至少在里海以西的地区内，原先的高加索人种占优势的状况变成了蒙古人种占优势。这一转变始于公元前1000年末，并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讲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又利用西方技术——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演变趋势发生了逆转。

最后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广大地区。他们最早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绵绵不绝的迁徙浪潮贯穿了其整个历史。早先闪米特人用驴来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像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一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人的许多部落都移居到了城市附近，他们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却又时刻都在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对周围的游牧部落来说，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就像一块块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那里拥有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游走在大草原和沙漠地区的饥饿的游牧民。因此，各古代文明中心也就不时遭到侵掠。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比起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要更易受到侵掠。毫无疑问，游牧民族的这种行为使得所有文明的定居居民都非常讨厌他们。一个埃及官员称闪米特人："他们的名字散发出比鸟粪更难闻的恶臭。"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一位中国的朝臣同样骂蒙古人是："胸怀狼子之心……不入人类之列。"

不过，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才开始发生逆转，各个伟大的古代文明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族的生存威胁。马的驯养和较迟出现的冶铁技术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它们使游牧民族获得了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件事约发生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后。不过,在初始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原因很简单:当时驯化的动物只有牛和野驴,牛的速度太慢,野驴个子又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技能后来却向北传到了出产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 2500 年时这两种动物都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的形体大、体格壮、速度快,它很快就得到了俄国南部游牧民族的喜爱。他们用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形体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 13 手宽(一手之宽约合 4 英寸),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则为 15 至 16 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形体很快就会缩小到像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族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它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有了极大的改进。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结合到一起,使游牧民族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在他们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游牧民族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了最早的入侵浪潮。战车进攻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没有几个步兵能够长时间地抵挡箭阵,更不用说抵抗紧接着猛攻而来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游牧民族用骑兵取代战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人可以直接骑驭。而且游牧民族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和马嚼子,另外又发明了角状的马鞍和马镫,这使他们在策马飞奔时还能腾出双手射出密集的箭雨。由此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他们能够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族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战术上,这一战术在 13 世纪成吉思汗凭借它完成了一系列惊人的征服时达到了它的顶点。各文明中心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才从游牧民族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生活在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来说,骆驼的作用不次于马。骆驼分为阿拉伯单峰驼和大夏双峰驼两种: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这两种骆驼也都还能生活,它们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可以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 1000 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就已经全部依赖于这种"沙漠之舟"了。

冶铁技术的发明也极大地增强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该技术终于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但是直到约公元前 1200 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离散各地,才使得他们拥有的技艺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这么迟才出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冶铁的工艺与冶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截然不同。

冶铜时,较重的铜金属溶液沉于炉底,熔渣等杂质浮在上面,两者很容易分离。而在冶铁时,由于古代的熔炉无法达到使铁完全液化的高温,最后产生的是一种灰色的多孔铁块,技术上称之为生铁块。生铁块烧红后经过反复锤打才能成为熟铁,由于工艺极其复杂,这一发明出现得比较迟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熟铁与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对比也绝不是明显的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并要耗费更多的燃料,而

且铸成的兵器锋刃还较易钝化。后来工匠们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并投入冷水中淬火，再经与木炭接触，就可以使其变得坚硬。当时获得新型的铁器不仅需要发现一种新金属，还需要发明一套新的冶金技术，这绝不是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所能做到的。

虽然改进冶铸方法后铁器变得比过去坚硬了，但它们却仍极易生锈。不过，这一缺点由于铁矿的分布远比铜矿和锡矿广泛、制作成本也更加低廉而得到了弥补。当时的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农业范围也扩展到了从前石斧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而且它对欧亚大陆达成新的军事平衡也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族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用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来装备自己，但是现在几乎每个地区都有铁矿，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出比青铜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此游牧民族的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武器装备上也不输于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

五、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

在同时拥有马和铁制武器后，游牧民族便发起了两次席卷各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入侵发生在约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发生在约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骑着马，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并不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游牧部落入侵，而只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其军事技术上的优势，通过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各个被征服民族。

除中东外，各地文明最终均毁于这两次入侵。其他地方的帝国都是骤生骤灭。中东之所以例外，并非因为它没有遭到入侵，事实上，由于它地处交通要冲便于外界入侵，它所遭受的入侵次数最多。不过中东文明本身却依然经久不衰，它的城市、宫殿、寺庙、书吏、商人和政府官员也都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东文明源远流长，植根深厚；另一个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时中东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区域十分广阔，它们不可能同时全被征服或摧毁；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入侵中东的通常并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迁徙而来的最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就居住在边缘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而这些入侵者还在征服的过程中就已经部分地被中东文明给同化了。

中　　东

约公元前2000年，印欧语系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开始了他们对中东地区的

首次入侵。入侵者经过与当地各民族的融合，在以后若干个世纪中建立起了一个统治着叙利亚大部分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不过该帝国却从未将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在内。赫梯人走后又来了两股属于印欧语系民族的入侵者：喀西特人和胡里安人。即便是地理环境易守难攻的埃及，也在这场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中遭到了喜克索人的入侵。喜克索人是以闪米特人为主广泛联合其他种族的游牧部落组成的。到公元前1500年时第一次蛮族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此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中东地区三大帝国间的均势被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严重破坏。当时赫梯帝国与埃及帝国之间长年征战不休，结果导致两败俱伤。三支闪米特人的入侵民族则趁机开始填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占据了地中海沿岸一带；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约公元前1100年，强大的第二亚述帝国利用其拥有的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置于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开始进行扩张。到公元前7世纪时第二亚述帝国定都尼尼微，其统治区域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但是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持续反抗最终则导致了帝国的一场灾难——公元前612年敌手的联盟摧毁了尼尼微，终结了亚述人辉煌的历史。

亚述人之后是波斯人，他们建立了迄今为止中东地区史上最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公元前529年在位)的率领下，波斯人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征服了南抵尼罗河、东达印度河的所有中东地区。整个中东第一次处于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而蛮族部落也因此受到了有效的抑制。

希　腊

与中东文明的经久不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却都没能在蛮族入侵中幸存下来，因为这些边缘地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达不到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于是在这些地区也就出现了新的古典文明，其宗教、社会和哲学体系都是崭新的。

属于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在公元前20世纪最早开始不时地侵入希腊。亚该亚人主要是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其总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属于希腊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时亚该亚人已经吸收了大量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并在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亚该亚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离克里特岛最近，所以其文化发展最先进。迈锡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发展起来的新兴文明即以其名字命名。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迈锡尼的希腊人居留地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国王和臣僚居住在山顶上巨大的城堡里；而平民们的住房则建在城堡外，但当遇

到危险时平民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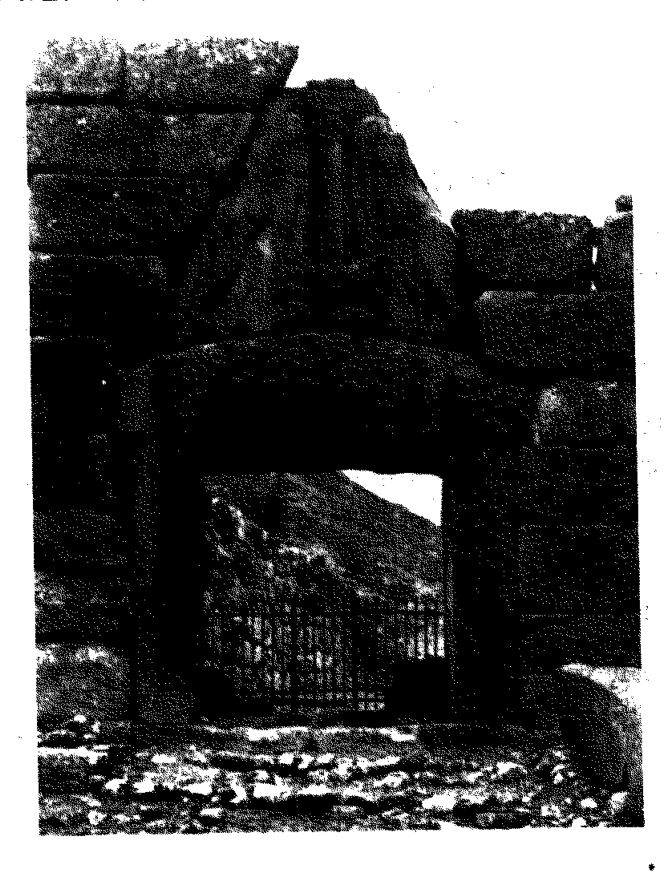


图19 迈锡尼的狮子门

建于希腊迈锡尼的狮子门。

迈锡尼人与入侵并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游牧部落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海上力量。他们抓住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商业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建立了海外殖民地。他们瓦解了此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上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时他们又进而劫掠了克里特岛。岛上所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该岛的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得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经被灭绝。

而与此同时，新入侵的多里安人又使迈锡尼人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同样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他们凭借其所装备的铁制武器，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和城市。随着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逃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倒退回了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笼罩着整个希腊的这一黑暗时代一直持续到了约公元前800年各个城邦国家的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由此向海外扩张，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如迈锡尼的难民等，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由此远渡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段，在那里建立起以著名的爱奥尼亚为代表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了整个希腊文明社会中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

斯博斯岛,再由此前往小亚细亚北部。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一直未能扩张到内地。尽管只能建在沿海地区,由于这些殖民地很繁荣,它们还是在希腊文明的历史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现在人们对希腊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要比对印度遭受蛮族入侵时期的了解详尽得多。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希腊人自己留下的宝贵遗产:即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诸神的诞生》(《神谱》)这四大史诗。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王公贵族的生活,而赫希奥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几个世纪中原始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衣。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奢侈品。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偶尔也会被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当时每个希腊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居统治地位,有权领导战争;后者由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组成。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其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会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都是动员人民支持国王与贵族们此前共同作出的决定。入侵希腊的印欧语系的部落普遍采用这些简单的制度,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尚处于萌芽状态。

印　度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它在约公元前1500年时也被游牧民族部落推翻——游牧民族凭借其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这一军事上的优势,很轻易地就推翻了还在使用铜制武器和牛拉战车的当地人。这些入侵者自称"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属于印欧语系。居住在西方的一些雅利安人的分支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另一些雅利安人通过小群小群的渗入很轻易地就推翻了早已腐朽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半叶,印度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资料非常缺乏。与古代印度河文明留下了大量遗物但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解读的文字资料不同,雅利安人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因为他们的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也没有集聚成大城市,不过他们倒是留下了大量以吠陀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因而,可被用来考证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以考证印度河文明的材料的形式正好相反。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于印度教徒来说,就像基督教徒的《圣经》、伊斯兰教徒的《古兰经》,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有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

也被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了同等的神圣地位。如果说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锡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那么《梨俱吠陀》就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赞歌1028首,其篇幅庞大,大抵相当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总篇幅。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其所征服的土著居民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没有鼻梁,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雅利安人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一个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身披金色盔甲,快活地冲锋陷阵,一餐能吃掉300头水牛的肉,能喝光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在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他们主要靠牧牛为生,其财富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随着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了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即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的个人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它也会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而且在某些部落它还会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印度河流域早期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但无种姓;祭司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的社会极为相似,但与其后数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

中　　国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到了遥远的中国北部黄河流域。当时统治那里的是一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商文化——入侵者为商文明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他们自己也被该文明同化吸收。正如在中国所一贯发生的那样,这些蛮族入侵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这与这些入侵者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于是,独具特色的中国文明也就毫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发展到现在,虽然中间也曾有过一些调整,但它却从未被毁灭或转型。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周人曾经长期居住在处于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了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入侵者推翻了商朝,但却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字系统、祖先崇拜和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完好,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朝还变得更为明显。周朝统治者将其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这一制度也是沿用了商朝旧制。一开始诸侯们必须定期到朝廷觐见述职,

但后来这一制度逐渐废弛。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变得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也就开始统治起其周围的农村。

公元前 771 年周朝都城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被迫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洛阳以继续它的统治。这样周朝公元前 771 年迁都之前的一段时期就被中国人称为“西周”，而此后的一段时期则被称为“东周”。到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旧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统辖的诸侯们还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也就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够幸存到公元前 256 年，主要就是由于他们提供了精神领导。此外周王朝也起了一个高级祭司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了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的政治不稳定，但其文化却获得了巨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也是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大约同时发展起来的时期。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就是第二编里剩余章节中所要论述的主题。

推荐读物

有关各文明起源的描述，参见 J. Gowlett 所著的 *Ascent to Civilization* (Knopf 出版社，1984 年版)、P.R.S. Moorey 主编的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Clarendon 出版社，1979 年版)、C.B. Heiser, Jr. 所著的 *Seed to Civilization* (W.H. Freeman 出版社，1973 年版)、J.E. Pfeiffer 所著的 *The Emergence of Society* (McGraw-Hill 出版社，1977 年版)，以及 A.C. Renfrew 所著的 *Before Civilization* (Cape 出版社，1973 年版)，他的著述挑战了文明扩散理论。

对各个文明分别进行考察的著述有：K.C. Chang 所著的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0 年版)、O.R. Gurney 所著的 *The Hittites* (Penguin 出版社，1980 年版)、C.Y. Hsu 所著的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8 年版)、T. Jacobson 所著的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A History of Mesopotamian Religion*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1976 年版)、N. Postgate 所著的 *The First Empires* (Elsevier 出版社，1977 年版)、J. Hawkes 和 L. Woolley 合著的 “*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收录于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 1 (Harper & Row 出版社，1963 年版)、M. Hammond 所著的 *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2 年版)、J.G. Macqueen 所著的 *The Hittites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in Asia Minor*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1975 年版)、B.M. Fagan 主编的 *Avenues to Antiquity* (W.H. Freeman 出版社，1976 年版)、R.F. Willetts 所著的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Cre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7 年版)，以及附有精美插图的由 Life 编辑部主编的 *The Epic of Man* 和 *The Damn of Civilization*（McGraw-Hill 出版社，1961 年版)。

关于游牧入侵者的著述有：E.D. Phillips 所著的 *The Royal Hordes: Nomad Peoples of the Steppes*（Thames & Hudson 出版社，1965 年版)、O. Lattimore 所著的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 出版社，1962 年版)和 *Inner Frontiers of China*（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出版社，1940 年版)，以及 A. Guha 主编的 *Central Asia: Movement of Peoples and Ideas from Times Prehistoric to Modern*（Harper & Row 出版社，1972 年版)。对今天的游牧民族进行考察的著述有附有精美插图的 *Nomads of the World*（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出版社，1971 年版)。

注释

1. Cited by N. Bailkey, "Early Mesopotamia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967), pp.1, 225.
2. Adapted from J. Hawkes and L. Woolley, *UNESCO History of Mankind*, Vol.1, *Pre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Harper & Row, 1963), p.467; and V. Gordon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Mentor Books, 1951), p.149.
3. Cited by A.J.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anford University, 1959), pp.19—20.
4. Cited by G. Soloveytchik, *Potemkin* (Butterworth, 1938), p.25.
5. W.A. Haviland, "Stature of Tikal," *American Antiquity* (July 1967), pp.316—325.
6.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84.
7. E.A. Speiser,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Mesopotamia," *Supplement to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December 1939), p.27.

> 在古典文明之前，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每个活动仅能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是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
>
> ——波里比阿

第4章　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一致性（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

古典文明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此期间首次形成了欧亚大陆一致性。对比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欧亚大陆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欧亚一致性的程度（参阅地图6和地图7）。此前欧亚大陆上各个帝国的活动疆域几乎完全局限于其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以至于在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就像野蛮地区形成的汪洋大海中的几座孤岛。然而到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得各个帝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是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跨地区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各地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而且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也已经更为密切、持久和形式多样。不过，即便是到了古典时代末期，在欧亚最东端的中国和欧亚最西端的罗马帝国之间也还是未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而且两个帝国的人彼此也都没有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的、符合实际的情况。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几百年中，欧亚大陆一致性的影响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初级阶段一致性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将要论述的主题。

一、一致性的根源

技术进步是造成欧亚大陆一致性的根源。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从人类历史肇

始之日起人类活动范围的大小就一直取决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各个人类群体的活动范围都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而当人类掌握了农业、冶金术和造船等技术后,其活动范围也就随之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比如说,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的统治范围就涵盖了整个大河流域。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并形成了一些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最终横贯了整个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器的发明及其广泛使用。

冶铁技术是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被发明应用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向周边地区传播开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期的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不过从冶铁技术的发明到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铁器,其间也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都能用铁来制造时,这一技术的应用就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但是铁器的普及过程却非常缓慢:印度大约是在公元前800年,中欧是在公元前750年,中国是在公元前600年。廉价铁器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得人类能够砍伐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从而也就使得农民们能够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推进,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则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到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凭借铁器向东推进,砍伐了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民则借此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了广阔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拓展使得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相应地被扩大。文明核心区经过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500年的发展,获得了比由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3000年的发展快得多的速度。人类在此阶段实现加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生产率的惊人增长。农业区域的拓展不仅使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而且新开发的中欧地区、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人类能够有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而贸易量也随之增长,这一变化在构成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体现得尤为明显。各种工匠也持续地涌现,他们为新建立的农业公社提供必要的服务,也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都不方便。于是交换媒介就开始发展起来,人们尝试用谷物、更常见的则是用贵重金属条块来作为支付手段。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即为了防止欺诈,每成交一笔买卖都必须检查贵重金属的重量和纯度。

约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重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证明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对此做法加以改进,用贵重金属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都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的使用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

或跨地区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进行易货贸易,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其最终结果是,它们大大促进了各种商业的发展,相应地也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通过经济专业化的全面深化提高了经济活动效率和生产率。这样廉价商品的制造者也就第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开始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比如说有些中国农民专门种桑养蚕,而有些希腊农民则专门生产橄榄油。

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够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也更多。文明社会的海外扩张最初受到了海盗行为的阻挠,那时海盗行为和土匪行为一样被人看成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希腊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从事半海盗、半贸易的探险活动,以至于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遇到其他人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它渐渐地从经常性的大规模航海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由于海路运输的成本比起陆路运输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 18 世纪修筑出良好的公路之前,人类一直以海路运输为主。

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蛮族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都盛行起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成对比的是,到古典时代末期,商队的路线已经绕遍了整个欧亚大陆。除去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该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又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甚至到了中国(当然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得到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起来,其中尤以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控制下的地中海、印度人控制下的东南亚为盛。

随着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蛮族入侵活动中所获得的显赫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日趋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正在经历变革;个人的依附效忠关系正被市场需要所代替。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统一对旧秩序而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被王国或后来的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反过来,后者的建立又促进了前者的发展。新建立的这些跨越欧亚大陆大片区域的伟大帝国,强化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保障了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从而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比较有代表性的驿道网如波斯帝国修筑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直通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 英里。沿途设有 111 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朝廷驿差调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全程需要花费 90 天时间,而朝廷驿差则只需一周。随着波斯帝国的扩张,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到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之后罗马

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修筑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被使用。

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则精心地修筑了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交通网——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由此促进了海外贸易;而朝西北方向修筑的驿道则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漫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驿道的主干道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中央和地方官员负责修筑并养护驿道,他们要是玩忽职守就会受到弹劾。同样,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坦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图 20 阿庇乌大道

有"驿道中的皇后"之称的阿庇乌大道,它连接着罗马和意大利南部,至今仍在使用。

上述发展变革引起了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样普遍的根本性变动使人惶惶不安,令人无所适从。它促使人们深刻自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也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评估他们各自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方面。

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整个文明核心区域都在提出和探讨以上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表人物,如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等,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这绝非巧合。因为当时各个文明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其各自做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其各自思想的发展方向也就明显不同。实际上,上述四大文明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它们各自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这些特征经过此后数百年的发展定型之后一直持续到现代。

各文明间观念和制度的独特性将在后面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详细分析。

本章余下部分将要考察这些文明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当时的欧亚混血人非常清楚这些相互关系，而且他们肯定也已经意识到历史舞台正在扩大——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日渐增多的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145年间的历史大事时说："可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已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关联，所有的事件最终都能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特点表现得特别鲜明，这点就连当时的人也都感觉到了。这就是跨地区的商业纽带和文化纽带，亦即下面两节的论题。

二、商业纽带

商业活动是各古典文明地区之间主要的物质联系方式，但却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不仅货物流转于各地，身怀技艺、携带所培植的植物的人们也在四处漂移。从以下几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农作物和家禽交换的范围是多么广泛：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等作物，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的交流也有类似情形。水车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约公元前65年诞生于米思里代蒂国王统治下的本都国，该国位于黑海南岸；而中国的第一部水车则是在约公元前30年时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因而水车绝不可能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相距遥远的中国和中亚两地实现直接传播，而只能是从两地之间某一不为人所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大陆各地区间的这种相互影响跟贸易有着密切联系，毫无疑问，要不是区内贸易和跨区贸易在古典时代达到全面繁荣，这种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会小得多。

贸易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来进行。这两条主干线既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都是既靠陆路，又靠海路；通常是在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但是各条陆路和海路又都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贸易就有可能会转向其他路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在进行。当时，埃及商人就曾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并曾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地向西航行，最后与苏美尔商人建立联系，他们初次会面的地点可能是在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米诺斯人相比，都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米诺斯人是古代伟大的海上商人，他们往

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古代文明时期一度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也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其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他们操闪语,居住在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经过他们的努力,繁盛的中介贸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量买进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并从海外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销往外地。其中用自产的羊毛织成的纺织品是他们主要的出口产品,而其中的纺织染料则是从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出的有名的绛紫红。





图 21 古希腊银币

这是一枚古希腊人用的面值4个德拉克马(drachm,古希腊货币单位)的银币,铸于公元前5世纪(约公元前440年—公元前430年)。正面(左边图像)是雅典娜女神的头像,背面(右边图像)是女神的智慧的象征——猫头鹰。铸造这些货币所用的银子主要产自位于雅典南部的苏流恩(Sunium)的国有银矿。

在拓展贸易的进程中,腓尼基人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日益向西拓展的远洋贸易。他们在公元前11世纪开始与塞浦路斯进行贸易,并在该地建立了殖民地;然后,他们又以塞浦路斯为据点向爱琴海扩展。到公元前9世纪末,他们已经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一些商业据点和殖民地。他们甚至还大胆地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梦寐以求的锡。

从约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腓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大部分地中海上的海上贸易。此后不久,希腊人迫于人口压力开始与腓尼基人展开贸易竞争。他们首先设立了一些商业据点;这些商业据点后来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都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者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却完

全不受母邦的控制。因此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便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希腊殖民的一个主要区域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立的殖民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该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希腊人在大陆上向北远推到那不勒斯，并在那里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伊特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虽然受到了曾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缚，但还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比如马赛就是希腊人的一个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无主土地；刚进入黑海地区时，他们曾不适应当地寒冷、多雾的气候，但最终他们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的经济利益非常丰厚：黑海中盛产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还可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经布满繁荣的希腊商业据点和殖民地。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则正在全力营建一个全盛时统治着从尼罗河流域一直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航海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他们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从事这一工作。他们曾经派过一个叫斯西拉克思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510年从印度河起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凿一条运河，而且似乎还为实现这一计划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伴随着这些努力贸易极大地繁荣起来，并在贸易额和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上都超过了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承者将波斯人的贸易拓展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派出了更多地理知识更丰富的探险队，并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再装上船，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环印度洋贸易活动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各港口起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绕过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接着希腊和埃及商人在交换到东方商人的货物后，再将这些货物经由红海沿岸各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不过所有这些都还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一个序幕。这一大发展始于公元前后，约持续了两个世纪。贸易大发展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中亚不断增长的影响。中国打通了好几条陆上商路，促进了丝织品这种最重要的跨地区贸易品种的销售。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后面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整个地中海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内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治下的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经绝迹，关税壁垒和各种杂费也几乎全被削减。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

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这些奢侈品。

因此罗马人和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都很兴旺。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1世纪某位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该水手发现季风可被用来加快轮船穿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再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发现了这一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语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十月至来年四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此后，水手们就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而再也无需花费很多时间紧靠漫长、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定居下来，这有印度的文献资料可以作证。"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各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即他们那个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向东越过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最终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沿途各国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会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会衰微。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这几个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和文明核心与帝国扩大的缘故，贸易量总的来看是在上升。不过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状况的影响，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例如在欧亚大陆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商路安全因此就有保障，从而贸易也就能获得迅速发展。

比如说，西徐亚人就与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蜡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同样，中国人则往返于著名的丝绸之路买卖商品。丝绸之路由中国西北部出发，经过中亚，抵达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中国主要出口丝织品，也出口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交换，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石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以及来自罗马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但是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在公元2世纪以后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贸易渐渐衰微。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在7世纪征服整个中东并扩张到中亚则更是给了陆上贸易以致命一击。在穆斯林阿拉伯人于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人后，中亚

也就成了穆斯林的天下。但是巨大的穆斯林帝国却成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最后随着陆上道路的关闭,贸易也转移到了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重新打开陆路,并为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了道路。

综上所述,尽管贸易路线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却始终未变:与古代时期相比,古典时代的贸易范围和贸易额都有了质的增长。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仅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日益成为跨地区贸易。

三、文化纽带

商业纽带和文化纽带既不是毫无关联,也不是完全相互依赖。希腊文化传遍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完成的。同样,印度佛教传播到中国的历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追寻到。不过各种文化交往也有其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的推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此之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结构复杂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文字体系是由西奈半岛的闪米特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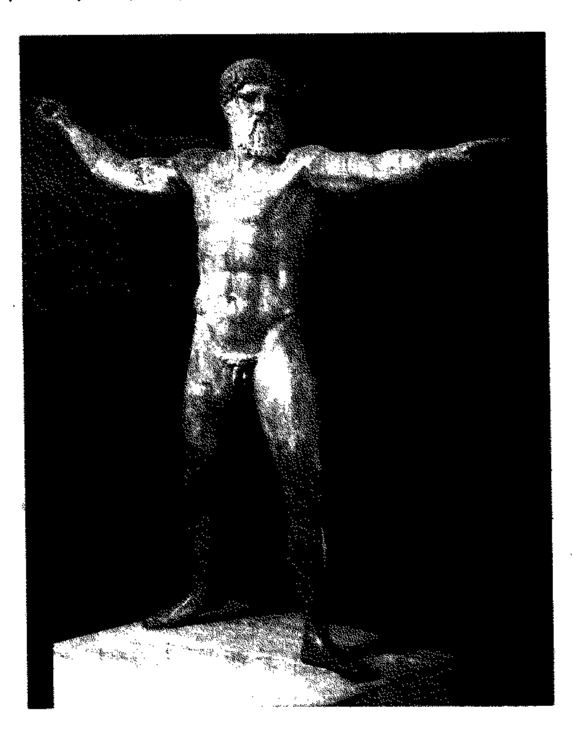


图22　阿特米修神像

在阿特米修出土的走姿神像是一尊青铜塑像,约公元前460年制成。阿特米修位于希腊辽阔的优布依岛(Euboea)北端的海滨。此雕像现存于雅典考古博物馆。此像到底代表哪位神还有待考证。有人认为他是手持三叉戟的波司登,也有人认为他是正在释放雷电的宙斯。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它都是早期古典时代希腊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是他们的文字却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希腊字母。这些希腊字母在经过一些改进后,又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经拜占廷人传播到东方。

字母文字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突破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独享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一直到公元前后他们都仍在继续使用传统文字。中国因为与世隔绝也仍然在使用其原创的文字,这种文字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经过多次改进,一直沿用至今。但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则都采用了字母文字,只是在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其各自不同的语言。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论在哪里,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到来而不断扩大的知识差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极大地消弭,但多少也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缩小这种差距一般都是支持的,因为他们在国家中居于垄断地位,需要追求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这种潮流却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他们在国内煽起某种骚动,从而影响到了政治和文化两个领域。印度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赫鲁在写作他的著作《世界史概览》时,就在写给他十多岁的女儿英吉拉·甘地的一系列的信中承认了这种骚动的重大意义:

> "当时应该是有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思潮,一股对现状不满并憧憬更好生活的思潮。不要忘了,伟大的宗教创立者总是追求更好的东西,总是试图改变他们的人民,完善他们,并减少他们的痛苦……"[1]

在古典时代,欧亚大陆各文明中显著的、普遍的文化交流模式是,各地方文化分解成独立的要素后,融入拥有各自独特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其他地区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处处可用、人人想要,而祖先崇拜、种姓等级制度和城邦制度则一旦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就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一致性的早期阶段,地区间的商业纽带通常要比文化纽带所起的作用更广泛和更有影响。

不过,文化纽带也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希腊文化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古典时代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佛教,也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它们不只是要求某个群体的人信仰,而是要求全人类皈依。

我们先来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语的"Hellas"(意即"希腊")一词派生出的。希腊文化之所以能够传遍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第5章中将要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

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当他在公元前323年去世后,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其后它又为西方的罗马人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希腊在军事上占据优势,这就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其中有许多都是用这位伟大的将领的名字命名)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了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虽然新统治地区的居民多数都没有希腊化,但是重要的城市却基本上都希腊化了,它们都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了整个中东的共同语。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而且他还在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此外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并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却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殖民王国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则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民众仍在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由于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因而它也就不能永久地在它的移植地生存。当中世纪的穆斯林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孤岛似的存在于中东的希腊文化制服了。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还很低。若不是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就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虽然早在公元前6世纪时罗马人就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是直到3世纪,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开始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已经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技艺高超的主厨。当罗马统治阶级上层听到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高水准的雄辩和演说时,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就在他们面前展现开来。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人送青年子女去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接受教育已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文学方面罗马人刚开始时只是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著作,后来他们才逐渐地转向以他们自己的生活为主题。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建筑设计也有很明显的影响。虽然罗马的建筑更为富丽堂皇和规模宏大,但所有这三种希腊建筑形式——陶立克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都被罗马人采用了。因此意大利的城镇也就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

现出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影响之下的相同景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并对之进行适度改变，然后将其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其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开始向外传播。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传遍了整个欧洲，佛教则赢得了亚洲的大部分。这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点：其一，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其二，都坚持平等主义——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大门，不论男人或女人、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崇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也就使得这两大宗教能够对信徒的日常生活产生有力的影响。

上述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后期的几个世纪里特别能够吸引人，因为当时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大城市，许许多多人都感到漂泊无定，心无所依；而基督教和大乘佛教则给他们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基督教也给予了回答。因此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下、无所皈依的人，这也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也是在中国于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这两大宗教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特点，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或者大乘佛教的前身原始佛教中，则均没有这些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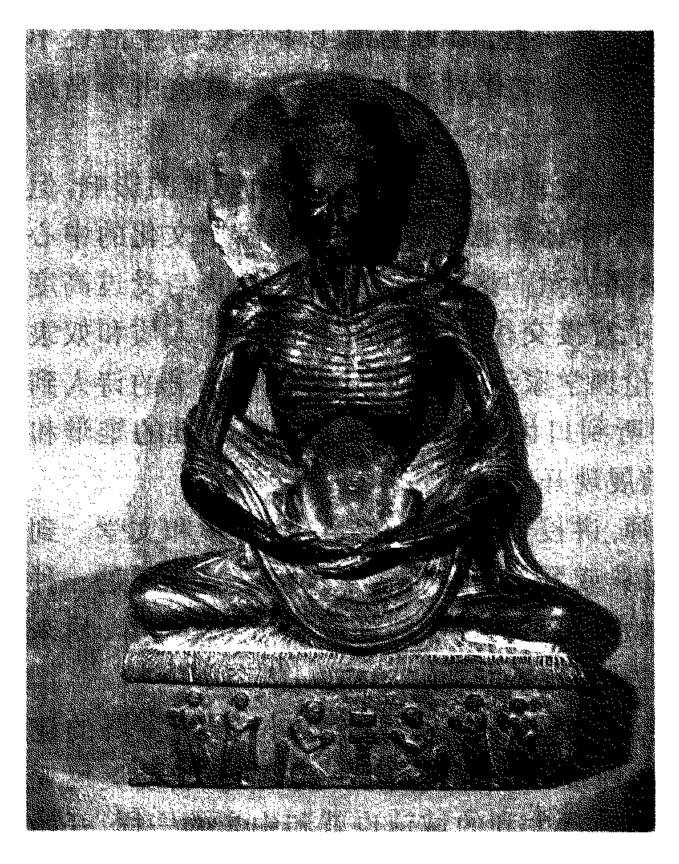


图23 绝食的佛陀像

此为绝食的佛陀像。在释迦牟尼修炼到“中途”之前，他已进行了为期六年的苦修。根据一个古典文献的记载，佛陀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容貌：“我的四肢像枯萎的藤蔓，关节外突；我的臀部就像水牛的硬蹄……我的肋骨就如破败的房屋的屋椽；我的眼珠深深地陷入眼窝深处，就像深井底部泛出的水光……”这尊甘达拉（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的佛陀雕像成像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它反映出了希腊文化对于早期佛教雕塑的影响。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 12 世纪崇尚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信奉的一种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十诫》中的第一条。这一条的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惟一的神，而是说他是庇佑以色列人惟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而脱俗的，不如说是入世和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就是，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仅仅是，人类应该“追求正义、援救被压迫者、识别生父不明的人、为寡妇辩护”。

但是从公元前 6 世纪起，犹太教徒在波斯人和其他一些统治者的宗教的影响下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这些犹太人受到希腊文化的长期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阐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也就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观念——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则将堕入地狱，遭受永久的惩罚。



图 24　耶稣受难图

此为罗马帝国后期所制的描绘耶稣受难场景的象牙雕版，图中耶稣正扛着十字架走向刑场。

一开始，基督教对于世界各地持不同信仰的人群并没有直接的吸引力；在耶稣生前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不久这段时间里，基督教仍只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教徒。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惟一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这样基督教也就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是发展成了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信奉的宗

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仅只能吸引犹太人,而且还能够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了官方的迫害,但它仍旧稳步地发展了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受到宽恕。399年,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600—800年间传播到英格兰和日耳曼各民族,在800—1100年间,又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民族;其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6章中将要提到的那样,它产生于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姓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过程中。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对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深感苦恼而舍弃优越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生活。最终他在似乎受到上天启发的刹那间达到了彻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 人生是苦的;(2) 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 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 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教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意即"无为"、"寂灭"。

佛陀本人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们宣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树立宗教信仰的宗教团体。这些团体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感到很满意,但是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遵从。因而,与"希那衍那"(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即大乘佛教)就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其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大"了,它兼容并蓄了更多佛教产生以前印度流行的思想以及人们改信大乘佛教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它和小乘佛教偏好默祷不同,而是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遵行的戒条。于是只要信仰这些戒条,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但却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这样一来涅槃的含义就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修炼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来世进入天国,而只要乐善好施就能死后升入天国。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救赎,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要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后又靠印度僧人和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教徒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其国内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后期,中国西北部90%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开始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以后又传入西藏和蒙古。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

亚。像佛教传播这样的情况，在以前或此后再未发生过，它体现了东南亚地区曾经一度出现的、历时几个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现象。

佛教在取得这些成功之后就开始在许多国家衰落下来。在中国，它在约 700 年时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很快就衰落下来。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经济活动，这一切引起了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在 841—855 年期间，有 4600 余所寺院和 40 000余个祠庙被拆毁，有 26 万多僧尼被勒令还俗，他们和约 15 万人寺院奴隶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经过这次打击之后，佛教再也没有在中国达到其鼎盛时期的局面。再往后它也就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个宗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也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经很难找到佛教信徒。不过在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它却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泛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亚洲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到了伟大的文明融合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而且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一个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僧人在传播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的。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还有罗马文化和君士坦丁堡文化。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新兴的欧亚大陆一致性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中心，在那一段时期里它对人类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创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已经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是犹太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过去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确实也曾有过很大影响。而且由于琐罗亚斯德教试图用光明、真理和正义等原则来取代当时盛行的波斯人的粗野习俗和迷信，因此它作为一种崇高的宗教信仰在宗教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佛教在印度和中国

欧亚大陆的一致性开始于古典时代，联结它的纽带部分是商业的，部分是文化的。佛教是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这一作用体现在一个名叫玄

奘的中国僧人的下列经历上。他于公元629年到645年间访问了印度的许多寺庙。当他在纳兰达寺(Nalanda Monastery)宣布返回中国时,其他僧人做出了如下反应。*

纳兰达寺的僧人听到玄奘的决定后,纷纷请求他留下来。他们说:"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虽然他已不在人间,但他的遗迹尚在。世间还有什么比依次寻访佛陀遗迹,赞美他、歌颂他更幸福的事情呢?另外,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她的国民都是不重要的野蛮人,都不信奉宗教和佛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不诞生在那个国家的原因。中国人眼界狭窄、冥顽不化,圣人和贤人从不去那里。那里气候寒冷、国家破败,你必须三思而后行啊。"

法师(玄奘)回答说:"佛陀创立教义是为了传播到所有地方的。谁愿意舍弃未学佛法之人而独享佛法呢?另外,在我的祖国,官员穿戴威严,法律人人谨遵。皇上仁慈,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伦正义深受崇尚,老人贤人受到爱戴。此外,中国人的知识深不可测,他们的智慧不逊鬼神。他们效法上天,知道如何计算七个天体的运动;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厘定了一年的四季……像这样的话,你怎能说佛陀会因我国不重要而拒绝去呢?"

* 见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Volume I, pp.209—210.

不过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与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已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有许多古典时代时形成的并在很多情况下一直存续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各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创造。因此本书后面三章就主要来论述这些地区的各个文明——希腊和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不过在考察这些文明之前,我们应当注意到至今仍可感受到的伟大的欧亚大陆宗教的影响。比如说,它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教导,对于生活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人民依然有启发意义。孔子就曾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同样,在《旧约》中,先知弥迦也有这样的伟大见解,而且这一见解至今仍被联合国奉为格言:"他们应当铸剑为犁,熔矛为镰;国与国之间不应挥剑相向,他们也不应当再学习有关战争的知识。"这些伟大宗教的共同理念在1986年10月27日得到了一次清晰的展示,这一天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一齐来参加教皇保罗二世主持的"世界和平祈祷日"。以下就是他们献给世界和平的祈祷词,也是他们其他方面的信念:[2]

佛 教

唯愿世间万物,凡受身心之折磨者,皆可获无尽之幸福与欢乐。

基督教

我对你们这些听众说,爱你们的敌人,善待那些怨恨你的人,赞美那些

诅咒你的人，祝福那些痛骂你的人。如果有人打了你的一边脸颊，给另一边让他打；如果有人取走了你的斗篷，不必再留住你的上衣。对每个乞求你的人，给他们所要的东西；对拿走了你的东西的人，不要再找他们归还。如果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他。

犹太教

我们的上帝在天堂。和平之神将会同情和怜悯祈求他的同情和怜悯的地球上的人民。让我们祈祷和平，让我们追求和平。

非洲万物有灵教

万能的上帝啊，您是我们打结时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拇指，您是能劈开大树的咆哮的雷电，您是站在高处能看清地面石块上留下的羚羊脚印的洞察一切之神。您从不吝惜及时地满足我们的要求。您是和平的基石。

美洲印第安人

在抽烟的时候，我会邀请我的家人和我分享；现在，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情来为今天的世界和平祈祷。我祈祷，不管是在家庭内或在部落里还是在国家中，我们都能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努力。我为在地球母亲上行走的所有兄弟姐妹祈祷。

推荐读物

欧亚大陆之间的跨区域联系在这本写得很好的研究著述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G.F. Hudson 所著 *Europe &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Edward Arnold 出版社，1931 年版）。另外，还可参阅 J. Needham 所著的多卷本著述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54 年版），该书的第一卷从整体上考察了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交流，包括关于文化传播的理论分析。有关欧亚大陆商业联系的各个方面在下列著述中得到了较好的阐述：A. Toussaint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66 年版）、S. Chandra 主编的 *The Indian Ocean: Explorations in History, Commerce, and Politics*（Sage 出版社，1987 年版）、D. Harden 所著的 *The Phoenicians*（Praeger 出版社，1962 年版）、E.H. Warmington 所著的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28 年版）、Ying-shin Yu 所著的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67 年版）、J.I. Miller 所著的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C.—A.D. 641*（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9 年版）、C.G.F. Simkin 所著的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9 年版）以及 P.D. Curtin 所著的 *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4 年版）。

关于欧亚大陆的文化联系,可以参阅 H. G. Rawlinson 所著的 *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16 年版)、E. Zurcher 所著的 *Budhism: Its Origin and Spread* (St. Martin's 出版社, 1962 年版)、R. MacMullen 所著的 *Christianzing the Roman Empire*, A.D. 100—400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4 年版)、以及 J. Pelikan 所著的 *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5 年版)。

注释

1. Jawaharlal Nehru,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1982), p.35.
2.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986.

雅典教出来的学生又都成为其他民族的老师；雅典文化的辉煌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第5章　希腊—罗马文明

在接下来论述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古典文明的三章中本章的篇幅最长，因为本章将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这两个虽然截然不同但却又相互联系的文明集中到了一起来进行论述。古典时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与印度和中国全然不同。所有这三大文明起初都是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逐步扩展到涵盖所有周边地区：希腊文明是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印度文明是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中国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正如第三章中所述，铁制工具的发明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并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到新的沿海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到了古典时代，这一共同模式却不复存在。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由其起初的文明核心地区主导支配，而西方则不同，罗马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土，还征服了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在这一征服过程中，罗马为西方历史开启了一个虽与过去有联系但仍属于西方文明的新阶段。希腊和罗马这对姊妹文明的进程和性质就是本章论述的主题。

一、希腊文明的形成时期(公元前800年—前500年)

随着公元前12世纪多里安人的大举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见第3章第5节)。这一时期的希腊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在政治上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其活动范围则仅限于爱琴海区域。但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部

落制让位于城邦制，其他社会等级联合起来向贵族阶层发起挑战，工商业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希腊的殖民地也又开始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希腊世界形成时期的全面转变，并为它后来顺利地进入古典时代打下了基础(参见地图8)。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基本原因。希腊地区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能合理地加以开发和利用则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帝国的必要前提。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连绵不绝的山脉，不仅限制了当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把乡村隔成了互不相连的小块，结果造成希腊人没有天然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地理政治中心。而入侵者在侵入之后就会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所。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被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所的地方则被称为"卫城"或"高城"。各城邦多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移民，以便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彼此相互隔绝，但却又生气勃勃地独立发展。

刚开始时诸城邦主要靠种粮、放牧和捕鱼为生，但到公元前8世纪初时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已经因为人口日渐密集而遭到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或者像当时普遍的做法那样，同时从事这三种活动。到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已经布满了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了克隆母邦样式的海外城邦(见第4章第2节)。

殖民地的建立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改变了整个希腊世界。殖民地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交换酒、橄榄油和布匹、陶器等制成品。这种贸易促使希腊本国的商品经济急速发展。希腊的土壤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而不适于作麦田，现在既然小麦可以进口，那么岩石密布的山坡也就可以被用来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这一转型使希腊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以前种植粮食作物时增长了2—3倍，而且它对制造业的促进也很大，这可以从人们不仅在地中海周围，而且在俄国中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北部也发掘出大量希腊陶器这一事实上看出来。与此同时，希腊商船队也在贸易运输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时的贸易物品与奢侈品截然不同，体积都很庞大，希腊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将其运销各地，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希腊人还率先使用硬币来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经贸活动的发展。

不过农业的商品化对其经营者来说在意味着获利的同时也意味着负债，这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就更是如此。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碰上年景不好时由田地所有者与承租人共担风险。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的结合则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风险，一旦年成不好他们就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

免地导致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农民们激烈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城市里新兴的富裕阶层也站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得到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等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便开始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独掌政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7世纪时希腊社会的改革运动大大加强，这应归功于以往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此时已为穿戴盔甲的重装步兵所取代。重装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形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在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他们也能以密集的阵势将其击败。这一新军种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自己提供进入方阵必需装备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共同作用，从而引发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起初实行君主政体，后来则都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7世纪时各城邦都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在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独裁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了个人权力。"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未经过当时合法的政治推选程序而进行统治的人，并没有道德谴责的含义。实际上，僭主通常都是支持平民而反对贵族特权阶级的，他们常常——虽然并非总是如此——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民主政治的趋向正好相反的一个典型。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斯巴达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变成了奴隶，称其为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泯灭了其向海外扩张的想法。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因此而为保证自身安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进步，他们只能过着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而且为了控制大批受其压迫的当地居民，斯巴达人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组织得像一个军营，让一切都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被遗弃在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得到抚养；男孩从7岁起就住到兵营里受训练，所有不满60岁的男子都得接受军纪的约束；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消。人们每天早晨都不得不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训练、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头砍制而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些困苦在整个希腊都出了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等活动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也使得他们对剧本创作、雕塑艺术或哲学思辨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而与此同时，雅典人则发展起了一个与斯巴达截然相反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在怀有敌意的土著居民中的一伙入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转型为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不过和斯巴达大不相同的是，

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过去。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到一起要求实现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既简单而又严厉：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沦为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在政治领域，梭伦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当时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十分有限；另外梭伦还规定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并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行使部分权力。总之，梭伦的主要贡献就是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立了基础。

但是在梭伦改革后的30年中，由于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雅典依然充满了斗争。虽然奴隶制这时已经是非法的，但是贫民们发现谋生却仍很艰难。同样，贵族的特权虽然也多少受到了些约束，但它却仍能阻拦人民立法。在这种情况下，庇西特拉图在约公元前560年时成为雅典历史上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30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国家补助。庇西特拉图死后，他的儿子们继位为僭主，但是由于他们个个昏庸无能，所以雅典的政治斗争也就变得更为尖锐复杂，直到约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局势才有所改观。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规定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500年时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政治，而此时的斯巴达则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

二、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年—前336年)

伯里克利曾在他那篇著名的、悼念公元前431年在与斯巴达人战斗中殉国的雅典士兵的追悼辞中骄傲地宣布："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这番看似有些自我夸耀的话其实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相形见绌。伯里克利时期是雅典的黄金时代，也是全希腊在古典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够占有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此外，这与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劳里昂银矿也多少有关。雅典人在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并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希波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征服了小亚细亚地

区的希腊城邦。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并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考虑到那时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正越过俄国南部从北面威胁巴尔干半岛各国，希腊本土各城邦对小亚细亚城邦的求援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但到公元前494年，尽管得到了希腊本土城邦海军的援助，小亚细亚诸城邦还是被波斯帝国制服了。接着，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在希腊本土负隅顽抗的希腊人进行惩罚，他派出一支远征军，于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敌对几乎是独自作战，但他们的方阵还是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从而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抵抗的，雅典人当属第一批；在此之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不寒而栗。"

十年后波斯人又卷土重来，这次集结的武力比十年前要强大得多，大军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陆路杀奔雅典。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希腊联军为了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死。虽然波斯陆军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则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军队；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又一次赢得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就陆续摆脱了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完全击退了波斯这个统治中东的庞大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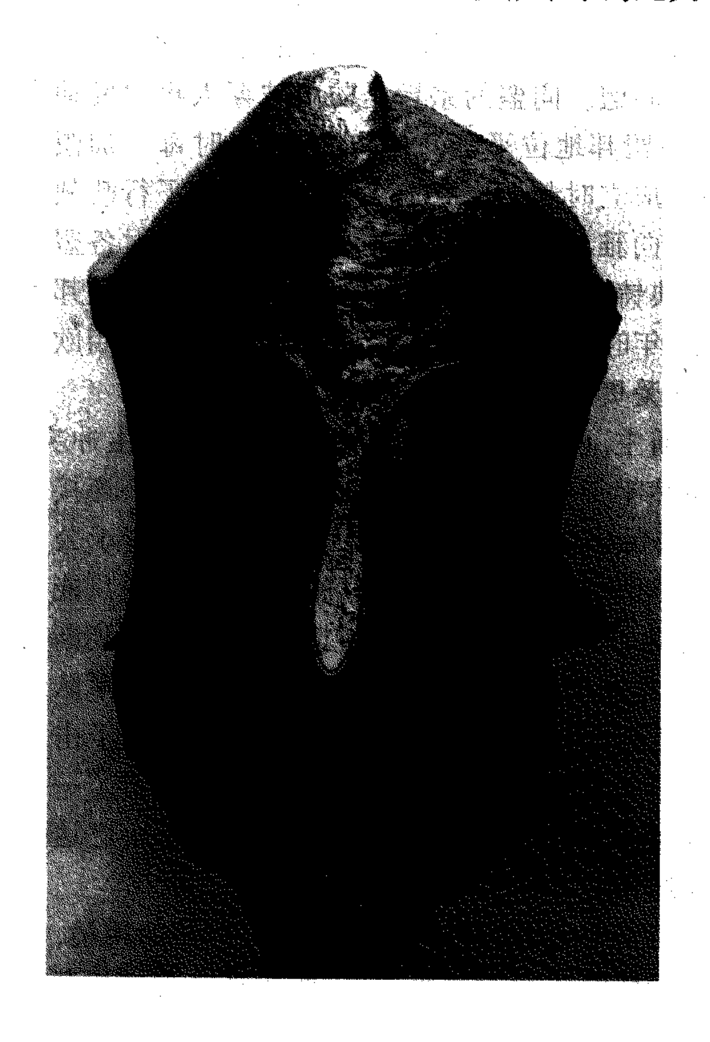


图25 纪念希波战争胜利的青铜头盔

米尔梯尔兹(Miltiades)献给宙斯的青铜头盔，用来纪念公元前490年雅典抗击波斯战争的胜利。

希腊人赢得希波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使希腊人免遭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身民主政治的特色,从而为人类文明做出其独特的贡献。其次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没钱将自己装备成重装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次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装步兵还要重大。而这自然也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它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461—前429年)达到其最高潮。

伯里克利虽然出身贵族,但却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雅典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40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召开临时会议。它不仅要解决一般的政策性问题,还要对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所有活动做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以便使贫民也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起许多由陪审团做最后决断的民众法庭,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此伯里克利完全有理由在他的演说中自豪地宣称:“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导致其最终建立起控制整个希腊世界的雅典霸权,而斯巴达则由于其一成不变的小农经济和经常受到国内希洛人起义的威胁而停滞不前。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了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起初设在提洛岛上,故称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备波斯人再次发动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都有一票表决权,但实际上从同盟刚成立时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了行政领导权,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雅典还逐渐加紧对各盟邦的控制: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入盟各城邦不得退出同盟。这样一来,到公元前450年时同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斯的话来说就是,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是海上霸主,斯巴达是陆上霸主,两个霸主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战争绵延达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却始终未能攻破连接雅典和大海的长城,这个长城是雅典用来保证物资供给的。而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429年遭受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公元前415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却以惨败告终。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失,什么也未能留下。”雅典盟邦趁机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公元前404年雅典因受到围困、迫于饥饿,只好宣布投降。雅典仅保留了一个城邦的地位,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就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斯巴达强加其上的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结束。

这场毁灭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整个希腊世界都陷入了民穷财尽的困境,而存在的问题却一个也未得到解决。由于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

护而结成新的联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达人遭遇了其200年来第一次军事上的惨败，并在以后十年里称霸希腊本土；紧接着，血腥的相互争斗又一轮爆发，各城邦再一次被卷入由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混乱之中。这一混乱阶段的存在使得外来强国得以征服并用暴力统一了希腊。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施进一步东侵的计划便于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继承人是其举世闻名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至此，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终结，希腊化时代即将开始。不过在论述希腊化时代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总结一下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一般认为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精神的一个伟大胜利。

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

雅典领袖伯里克利留下了对处于伟大的黄金时代中的雅典城邦文化的经典描述。公元前431年他在纪念为抵抗斯巴达人而殉国的战士的葬礼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有以下著名的叙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相反，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了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长处，就能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种提拔是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参政的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家境有多黯淡。我们在政府工作中享受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中也可得到。我们绝不因彼此嫉妒而相互监视，也不因邻人做他自己喜欢的事而生气……我们喜爱美丽的事物，但是我们的品味很简朴，我们充实头脑，但又不泯灭天性。我们不用财富相互炫耀，而是用它来做实际的事情。在我们之中，公开告知贫困并不丢脸，丢脸的是不去设法摆脱贫穷。雅典公民不因照顾小家而忽视国家，连我们当中从事商业的人也有很好的政治观点。如果一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不认为这是无害的品质，而认为它是无用的性格。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政策的制定者，但我们所有人都是称职的政策决定者。我们认为，行动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讨论，而是来自于为准备行动而进行的讨论中知识的匮乏，因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我们都有特别强大的思考能力……

总之，我要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我已根据法律的要求，用我认为合适的词语，对烈士们表达了敬意。表示敬意的行动也已部分地开始。烈士们已经英勇殉国，他们的孩子在长大以后也应该发扬他们这种为公共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之后，希腊将把这一稳固的精神，

连同我们为烈士献上的花环,一起献给她活着或逝去的儿子。

* 见 B. Jowett, trans.,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Tandy-Thomas, 1909), book 2, pp. 35—46.

三、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在提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会说起的一些溢美之词。

我们以后就会看到这一文明也有它的缺点,不过那些溢美之词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半也是应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希腊"天才"赖以产生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里所说的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所以只有将希腊人的历史发展与定居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印欧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比较,才能找到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

经过对比,可以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作出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受益,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又没有近到使希腊人不能保持自己的特色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使希腊人能够同时做到吸收外部文明的精华和创造自身的特色并同时从这两者中获益。

城邦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非凡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保证。当然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所独有的制度,像在印度河流域,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雅利安人移民就曾在某些地区也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被并入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割据性君主国,只有希腊人将他们的城邦形式保持了几个世纪之久。

城邦能在希腊长久存在的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群山密布,不具备建立大一统帝国所需的地缘政治基础(见本章第1节)。另一个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拥有直接的出海口,这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能与外部世界直接交流促进,而且能独立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但也必须看到,希腊人为这种各自为政的城邦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各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将统一强加给它们,这种外力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不过它们也享受到了城邦制的好处,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了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似乎是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希腊古典文明不是原始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了过去的文

明,如中东文明的成果。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文明成果,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最终都烙上了希腊人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虚心、勤于思考、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其阅历之丰富就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也都相形见绌。希腊人在旅行时总是带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来进行观察。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柏拉图在《申辩》一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被自己的理智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也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他宣称:"……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所作的申辩就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 "雅典人啊,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为我自己而申辩,我是在为你们而辩……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打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害将会超过对我的残害。"[1]

这种狂放不羁的自由思想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至少就其普遍和激烈程度而言是如此。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就是完满地展示自己的个性。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而充满想像力地去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意义重大、引人注目。

希腊人这些独有的特点清晰地反映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生活习俗中。希腊人把神看得实际上是和自己很相似,神比人高明的地方仅在于神更有力、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所以感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之所以祈祷和献祭,完全是祈求诸神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正如希罗多德指出的,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尽管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的《诸神的诞生》概述了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但希腊宗教却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纂出一部宗教经典。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尤其明显。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世界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专为诸神建造庙宇和供奉祭品的,因此履行建造庙宇和供奉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是人类产生和存在的理由。这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观念截然不同。色诺芬说:

"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躯体，穿戴和人一样。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像马，牛会把神画得像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模样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则称，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2]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宗教是城邦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渗透到了城邦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祭祀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一个主要源泉。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有许多人就是在宗教活动中偶然培养起某一门特殊的技艺。最先奇迹般地成为技艺高超的医生的那些古希腊人，就是在科斯岛上进行崇拜传说中的医神埃斯科拉庇俄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最杰出的一员就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医生，他写的医学论文极为客观，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以免将疾病的诊断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他在论及"圣病"羊痫风时断定：

"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疾病更神圣。实际上，它和其他疾病一样都是起于纯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都一样，都有客观的起因。"[3]

同样，演员则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的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让人回味的悲剧和令人捧腹的喜剧。这种文艺形式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想像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资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平衡而稳健的发展应该归功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湾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希腊诸神，可是他真正关心的却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创造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高尚而可敬的人、为不能为之事的人、作恶多端的人、遭受严惩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精髓，它多少揭示出了一些人生的意义，并提出了一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如果说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那么欧里庇得斯则更是对宗教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画希腊诸神的缺点，入骨三分地讽刺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世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鼓吹战争。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里充满了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旧时代的保守

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描述了一群妇女，她们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而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尖刻地嘲讽了民主制度：[4]

卖香肠的人：请您告诉我，像我这样一个卖香肠的小百姓，怎样才能成为克里昂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了享有这一职位的一切条件：卑贱的出身，在市场中受过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还有点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我对天起誓，完全不是这样！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要做政客，惟一的麻烦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你可千万别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

希腊的艺术也是城邦文明的独特产物。由于神庙成为城邦文化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的核心，艺术和建筑水平在神庙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这些神庙是受人尊崇的男女保护神的住所，如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就是为供奉雅典娜女神建造的。雕刻是建筑的侍女，诸神的庙堂均用雕刻进行装饰。菲迪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等雕刻大师不仅在神庙的主墙壁和垛墙上进行雕刻，而且也为神庙塑造所供奉的神像。希腊的所有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如果我们逐一来比较一下帕台农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以及在此之前中东各族的夸张的雕塑品，这一基本思想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

希腊古典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艺术上的差异也明显地体现在其哲学思辨中。在世界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沿岸的爱奥尼亚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首先站起来挑战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他们试图对“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解答。泰勒斯推测万物皆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则主张气为万物的根本。他论证说，气稀薄时，便化为火；逐渐凝聚，就转变成风、云、水、土和石头。如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观点都是极其朴素的，但重要的是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不是将答案简单地归结为神的创造，而是通过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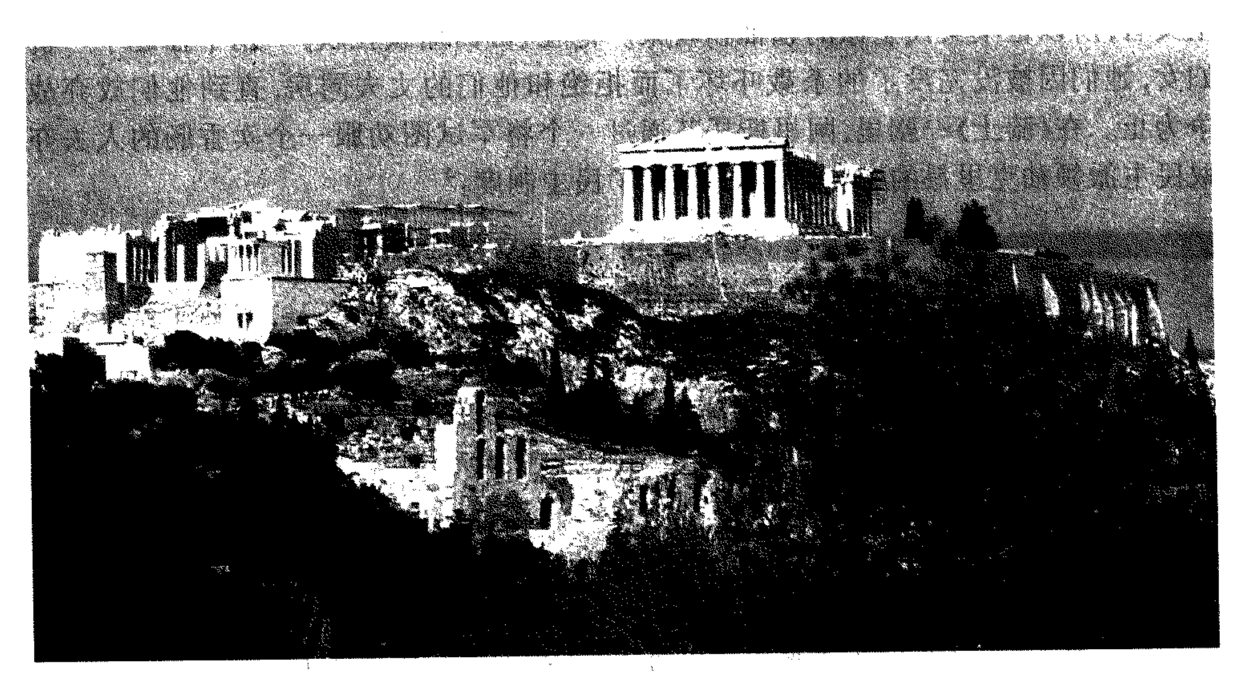


图 26　雅典卫城

雅典卫城既是雅典的宗教事务中心,又是它的社会活动中心。它由伯里克利及其继任者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最终建成。位于这幅图片中心位置的就是帕台农神庙,它的左边是厄瑞克修姆神庙。

主地运用理性来提出问题、寻求解答。

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随着希腊社会变得日渐复杂,哲学家们也将他们的关注点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了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犬儒学派最杰出的代言人普罗塔哥拉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意即对一切事物的解释皆因人的需要而异,因此世上没有绝对真理可言。对人的重视使得犬儒学派谴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但在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则担心犬儒学派的相对主义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明确的生活准则的缺失使他深感忧虑。他无休无止地和朋友们谈话,从中发展起了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托词的犬儒学派的相对主义根本不同,它们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74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深为雅典自豪,但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他的这种不信任更是进一步激化为仇恨。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能为贫苦阶层接受的社会。他设想的"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该神话宣称,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制造出来的。柏拉图曾经希望叙拉古的统治者能够接受他的学说,将其付诸实践,以实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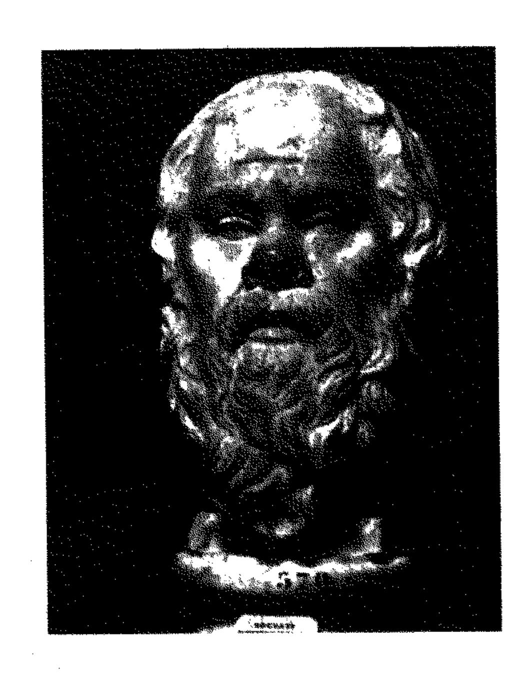


图 27 苏格拉底像
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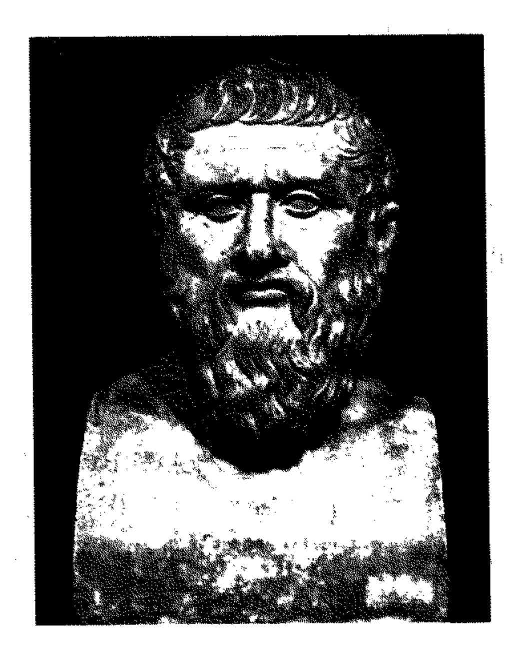


图 28 柏拉图像
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头像。

的政治理想,但却未能如愿。他只好回到雅典,在此后长达 40 年的时间中给一批批弟子讲学。

这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位伟大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年—前 322 年)。他是柏拉图的弟子,他在老师去世后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学问的收集整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他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汲取了各方面的知识,涉及的知识领域之广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卓越贡献主要是开创了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和人文学科等学科。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试图找到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在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其上是植物,再上是动物,而

人类则处于最高层级。这一等级证明,人类天生地划分出主人和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写道: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还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它又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命运安排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5]

谈到古典希腊就不能不提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叙述了他们那个时代各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并在叙述过程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又来到使波斯人遭受破天荒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功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一篇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伟大颂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希罗多德赞同的某位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

"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每个方面都能不受约束;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比你的臣民害怕你更甚。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必须那样做;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怎样的敌人,法律也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要么战胜敌人,要么以身殉国。"[6]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则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住自己的情感,要求自己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内在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但是他的某些思想实际上已经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对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不要偶尔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也不能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眼所见,或是我直接从亲眼看到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认定的。就是这样,真理也不容易发现: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边,或者偏袒另一边,或者记得的不完整。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并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

虚构的故事。但是只要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一贯的)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留存千古。”[7]

在介绍了希腊人在如此众多领域里的非凡成就之后也需要指出他们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却并未得到任何公民权。另外,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很低,这一点与其他地中海和中东国家的情形一致。而雅典妇女的地位则比其他城邦的更不如: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政治权利,包括没有选举权、不能担任法官等。丈夫们控制着小孩,这种控制权甚至延伸到杀婴的决定权也都完全在男方。各种公共设施,如法律设施、医疗设施和剧院都不对妇女开放,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准女性参加。主流的剧作家和哲学家都宣扬女性天生地位低下,并警告如果女人得到了太多的权力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女性要受人尊重,就必须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伯里克利对寡妇们建议:“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能做到尽量不被男人们提起。”德谟斯梯尼在提到雅典有三种女人时绝妙地总结了这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他说:“我们有情人供我们欢娱;有小妾和妓女满足情欲;还有妻子替我们养育后代。”[8]

就像其他文明一样,希腊文明也只能将隔绝妇女的严格规定应用在上层社会的女性身上。家境不富裕的家庭是无法做到让女性终日闲坐在家中而不去抛头露面的,她们不得不出去干活,帮着养家糊口。在街上和市场里很少能看到大家闺秀,但劳动妇女却四处可见。她们或在作坊做工,或在市场贩货,或在富人家中作女佣、保姆或丫环,以挣钱补贴家用。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书中提到过,由于穷人家没有奴隶,所以他们不得不允许妇女走出家门,抛头露面。因此他总结说,是阶级状况决定了女性生活的实质。

尽管这些缺点都是事实,但在评价古典希腊时,不应挑剔它哪些没做到,而应肯定它做到了什么。如果运用这条标准,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显著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都是古典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四、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36 年—前 31 年)

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到了整个中东,从而形成了一个新文明;“希腊化时代”一词就来源于这一新文明(见第 4 章第 3 节)。公元前 336 年,亚历山大在继承了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首先严厉地镇压了底比斯的反

抗，使其他希腊城邦只好默认他的统治；接着，他又于公元前334年率领马其顿士兵向东方的波斯人发动进攻。马其顿部队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首先侵占小亚细亚，然后攻占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并最终于公元前330年击败波斯国王大流士，占领其国都波斯波利斯。第二年，亚历山大率军继续东征至兴都库什山和大夏，再从那里向印度进发，深入旁遮普。只是由于士兵们拒绝再前进，亚历山大才不得不从印度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因患恶性疟疾而病逝，终年33岁。



图29 亚历山大像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

亚历山大病逝后，他的部将为了争夺对庞大帝国的控制权而长年彼此征伐；到公元前3世纪初，马其顿帝国分裂为三个王国：一个是马其顿王国，它回复原状，成为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它虽未能直接统治其南面的希腊各城邦，但也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地区；另外一个是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最后一个是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正是因为这些王国拥有大量土地物产，它们才被迫要跟周围的许多敌人进行连绵不绝、败多胜少的战争。它们先是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让给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接着又将小亚细亚割与凯尔特族入侵者，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割与帕提亚人。最终，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顺便也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至此希腊化时代结束，罗马时代开始了。

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但继其而起的各个王国却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个世纪；在这期间，中东地区也希腊化了。由于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其吸引，纷纷从其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从而为新的希腊化文明——一个实际上各方面都与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创造物——奠定了基础。

由于城邦遭到破坏，日渐衰微，所以其政治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城邦为了生存下去，试着建立同盟。亚该亚同盟包括除斯巴达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埃托利亚同盟则包括除雅典以外几乎整个希腊中部。不过虽然常被描绘成联邦组织，但它们实际上却只是些中心权力机关并没什么权力的同盟。由于这些联盟过于软弱，建立得也太晚，所以各个城邦在罗马军团到来之前，只能在邻近一个或另一个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活动。



图30　大流士纳贡像

此石像描绘了大流士一世正在位于波斯波利斯的国库里接受一个进贡者的纳贡。注意国王前面的香炉和进贡者表示敬意的姿势。大流士手持的权杖和荷花是他的王权的象征。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泽色斯(Xerxes,公元前491年—公元前486年在位)站在他的身后。

就后起诸王国的城市来说，它们与古典时代的城邦完全不同：它们的内部由于希腊移民和土著民族间的隔阂而分裂，而且它们总是完全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帝国。如果城市居民由于暴虐的国君，或者更坏，由于懦弱的国君而遭难，城市也无能为力。实际决定不是由公民大会作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战场上作出的。因而也就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积聚财富，贪图享受，而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而这样一来，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也就被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经济状况和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希腊本土不仅政治晦暗，而且经济衰落。过去它主要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到公元前三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经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

不过虽然希腊本土经济衰微，许多希腊人却因移居现已向他们开放的中东而致富。他们以其冒险精神和先进的商业、金融方法作出了许多贡献。他们发现了波斯王朝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使之流通；他们采用或更广泛地使用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车、螺丝钻子和水压机等技术发明。希腊人还掌握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国营企业，包括灌溉系统、矿山、采石场、盐田、“皇田”和制造华美织物和陶器的工场。其最

终结果就是，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发展，地区贸易和生产率也赢得相应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分配却极为不公。投机商利用收益的增长大发其财，而奴隶数目却在不断增加，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日渐加剧的时期。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无所适从。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并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统治者试图通过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一类的称号来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主义转向神秘主义。这一点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在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在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没有妒忌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这类哲学中。虽然这些哲学在许多方面的差别都很明显，但它们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就与之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迦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这样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现在也就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考察哲学和宗教的这些特点，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甚至超过了 17 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这部分是因为亚历山大征服提供了经济上的黄金机会，极速扩张的市场激励着人们去改进技术、增加产量。而后起的各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则产生了对更为先进的武器的渴求。此外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作用。最后由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 50 万至 70 万册的图书馆。当时还曾发生过早期的“人才流失”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

人，由于受到舒适且催人上进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酬的吸引而纷纷来到埃及。

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欧几里得。他的《几何原理》从公理和基本假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将大部分数学知识系统化。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权威性著作。而最有独到见解的则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规模宏大，认为居于宇宙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支持他这一观点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认为其理论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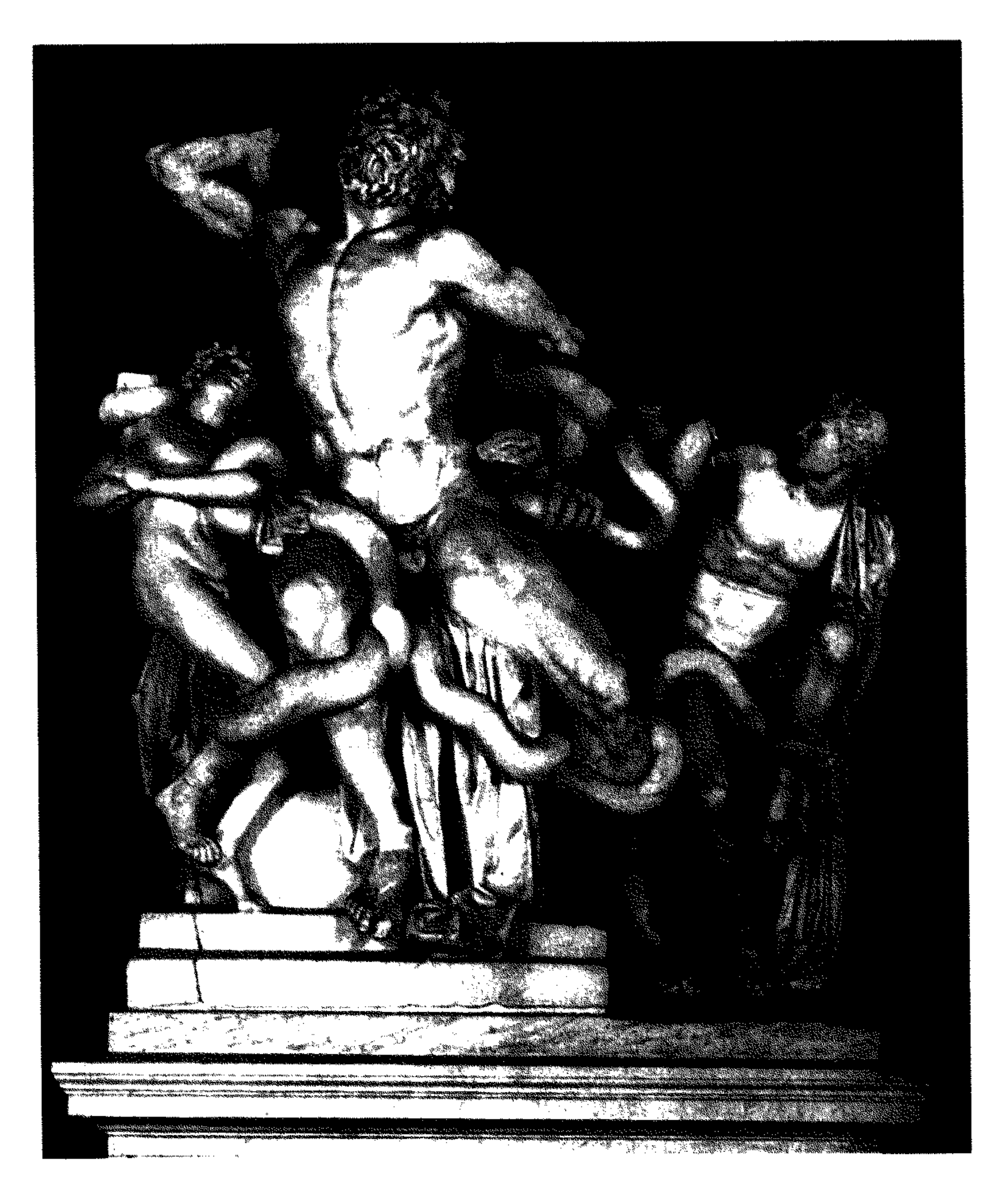


图 31　拉奥孔雕塑

这是一尊罗马人复制的希腊化雕塑杰作之一——拉奥孔雕塑。在传说中，拉奥孔是一名牧师，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希腊人的木马运进城。这尊雕塑描绘了他因此所受的惩罚——保佑雅典人的女神雅典娜派来的几条大蛇，当着吓呆了的特洛伊人的面，吞食了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

日常经验相悖，是邪恶的，因而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在整个中世纪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天文学的进步也促进了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致力于计算地球的周长，得出地球圆周为24 700英里；这一结果与实际数值仅相差250英里，直到18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地球上的海洋曾经都联在了一起，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岛屿。

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卓越贡献多半体现在医学和力学方面。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人脑的脑回。这方面的知识，大都是通过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医学家加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至于直到近代为止医生们始终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被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曾说过一句豪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总之，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型，使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要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核心区——来看待。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这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了西方，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

五、罗马历史上的早期共和国(截至公元前264年)

在希腊化城邦一如既往地彼此征战的过程中，它们也组织了一些同盟，比如说亚该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等，但是没有一个同盟能够做到持久而有效。尽管得到许多警告，四分五裂的希腊人还是忽视了罗马人日益崛起的势力。而罗马人在击败他们在西地中海最大的敌人迦太基之后就转而东征，先是强迫马其顿和希腊城邦臣服，最后则强迫整个希腊化东方归顺。

那么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成为整个地中海乃至全部欧洲的主人？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早期历史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正如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是沿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那样，印欧语系的拉丁人则是沿意大利半岛抵达台伯河南岸的。罗马是当时形成的拉丁社团中的一个，它定居于可以在台伯河上方便地架桥的地势最低处和小船能够抵达的地势最高处，其战略位置颇有些类似于泰晤士河旁的伦敦。这种地理优势使罗马从一开始就比其他拉丁居留地更宜



图 32 伊特鲁斯坎人的精饰棺

我们对于伊特鲁斯坎人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他们的丧葬艺术。图中的雕塑就是一对伊特鲁斯坎人夫妇合葬墓的精饰棺的一部分。

于经商和更易于受到外来影响。

此时对罗马人的外来影响主要来自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伊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伊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他们于公元前800年前后迁移到台伯河北面，然后征服河南岸的拉丁人。在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之前，伊特鲁斯坎人将他们所信奉的男、女诸神，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以及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等典型的东方习俗传给了罗马人。希腊人出现于伊特鲁斯坎人到来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其中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他们对拉丁人的贡献主要有字母表、部分艺术与神话、某些宗教观念和习俗，其中还包括借用希腊诸神的概念创造出的一些罗马诸神，比如说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就转化为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人驱走了它的最后一个伊特鲁斯坎国王，开启了独立城邦的历史。它在短短几年里就征服了周围各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邦的制度有些类似：最初国王拥有主权，即最高权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公民大会对国王有一定的约束力。后来，就像希腊所发生的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主权这时也就转到了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作为主要的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即使在它接纳了若干平民后，其性质也仍未改变。

当罗马完成了希腊城邦力所不逮的事业，即征服和统一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之

后,它与希腊城邦的发展表现出很大的不同。那么罗马能够制服意大利半岛,而各希腊城邦却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希腊本土,更不用说整个巴尔干半岛了,其原因到底何在?其一是两者的地理环境显著不同。巴尔干半岛群山环抱,实际上,"巴尔干"一词就是从土耳其语的"山脉"一词派生而来的。希腊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山脉,而意大利却只有一条南北走向、中间没有横断山脉、不难翻越的亚平宁山脉。因而意大利半岛在地理上没有被隔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相应地也就更易于实行和维持统一。例如,由于没有像巴尔干那样的山脉,罗马的公路网,尤其是顺着靴子状的意大利半岛从靴子中部的罗马一直通到靴子跟部的布朗迪西恩的阿庇乌大道,将整个意大利联为一体。实际上,阿庇乌大道现在仍然存在,而且在英国和美国的军队于1943年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还被使用过。

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民族非常宽容。早先,雅典向这些民族征收贡物,且从不增加其享有公民权的人数。而罗马人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都享有拉丁公民权。拉丁公民权是一种广泛而不充分的公民权。让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将会造成的惟一缺陷就在于国家不能控制外交事务,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但这一政策还是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各意大利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最后,罗马人获胜还在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军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在与邻邦作战时罗马人认识到,传统的由8000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在多山地区作战时尤其如此。所以他们就将军队组织成120人一个"支队";30个支队,即3600人,组成一个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侧翼。除了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等兵器外,罗马人还用有效的进攻武器即铁尖标枪来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集中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阵出现的缺口进攻开始溃逃的敌人。

到公元前295年时罗马人已经夺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到地处半岛"后背"位置、繁华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曾被汉尼拔誉为"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士在与罗马人作战时获得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受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75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为后备部队。所以皮洛士被迫于公元前272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远见地预言:"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了一个多好的战场!"而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就在西西里岛开战。

在论述布匿战争(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称叫布匿克斯而得名)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举措。由于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了人力,所以他们处于要求贵族在政治上作出让步的有利地位。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其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他们有权选举保民官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其他事

务。平民在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制定相关法律条文并公之于众；限制任何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最高额。

这样到公元前265年时，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设想，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会有，最终也会由于现在罗马已经卷入一系列对外战争而被战争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的国内制度，民主化变革的夭折就是其中的一个灾难。

六、罗马文明的后期共和国(公元前265年—前27年)

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半岛上的小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其转变过程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可以解释其暴发性的扩张。它们都发展起了优良的军用器械和高超的军事技术；而且它们与波斯帝国和各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它们没有像这些国家一样社会衰微、四分五裂，反而都具有社会生气勃勃、团结一致这一十分重要的优势。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最初是建于公元前850年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由于几乎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贸易运输，迦太基逐渐变得富裕强大起来。它倚仗着其活动范围广泛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最初，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冲突，因为它们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半岛南部时冲突就形成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而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响则日渐增长，这使罗马人深感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前241年)迫使罗马人第一次重视海战。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近身格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这时，两大强国间的殊死搏斗已经不可避免。罗马花了20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增加了其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其在西西里岛上的损失，就加强了对西班牙的控制。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地侵入意大利半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前201年)。他连续在好几场战役中，尤其是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败罗马人。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却使得汉尼拔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队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回师驰援，并最终在本国惨遭失败。这样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对手的力量。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城下之盟，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都城的城墙和仅够驱逐海盗的十艘舰只。不过尽管迦太基人遭到了这一毁灭性的打击，但在经济上他们却获得了非凡的复兴。但这却只能导致罗马的惊恐，使它无情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

前149年—前146年)。结果,迦太基被攻陷,城市被彻底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了一个胜利的连环:征服引发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无可匹敌的力量;它在清除掉迦太基后成了地中海头号霸主。另一个原因是,征服能够带来明显的利益,从每个新行省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挑起和发动战争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帝国疆域的不断拓展相联系。例如,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移师攻击马其顿。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人又在中东几大强国——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战争。

通过一系列征战,罗马人迅速地连续蹂躏和吞并了马其顿、希腊以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又征服了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则于公元前31年吞并埃及。罗马人还通过这一方式接管了东方各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过在亚洲,他们仅在地中海沿岸一带获得若干行省,整个内地则被帕提亚占领,因此帕提亚就成了罗马在东方的首要对手。当时尤里乌斯·恺撒在罗马享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58年—前49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地区。最后,从公元1世纪起,罗马开始了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以巩固其新占领土。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止于上述地区。



图33 罗马夫妇半身雕像

共和国时期的一对罗马夫妇的半身雕像。尽管有些人认为雕像表现的是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以及他的女儿波西亚(Porcia),但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这种说法。

罗马对待其新获得的行省并不像起初对待意大利半岛上的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各行省总督只要保证向罗马本国缴纳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一政策引致各行省官员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和敲诈勒索。西塞罗在以下控告中描述了总督盖尤斯·威勒斯在西西里岛(公元前 73 年—前 71 年)的恶政。其实这种恶政在当时比比皆是，并不罕见。他描述道：

> "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威勒斯从农民钱袋中榨取到无数的金钱；他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像对待民族死敌一样；他任意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像他们是奴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用钱买到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受到放逐；他听任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劫掠。他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活活饿死；尤其让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良的舰队被轻易击毁，化为乌有。珍贵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来自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全被这位总督劫夺、霸占。他不仅这样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同样地洗劫了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有一个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准，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民。"[9]

和外部属地一样，罗马本国也受到了这些政策的不利影响。意大利半岛上的许多自耕农由于汉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而被迫破产。廉价的粮食和成群的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种地无利可图，因此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暴发阶级。那些暴发户急欲积聚更多的地产，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营农业仍是有身份的人的惟一体面的职业，所以在公元前 2 世纪时的意大利，为新兴地主所有、由奴隶们集体耕种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们竞争工作机会。而官方关心的则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却至少是令人兴奋且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仍旧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被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为"公共厕所"的罗马城。

罗马帝国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济方面一样，也是苦涩的。早期的民主化趋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挥的战争节节胜利、其威望和权力大大增加而逆转了方向。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是民主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帮他们解脱困境的煽动者。此外，军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一支破坏性的力量。帝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仅是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所以罗马公民中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

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最后，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至此，士兵们首先效忠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而将军们自己也愈来愈开始把委派给他们指挥的军团看成自己的附庸军，并利用附庸军来中饱私囊。

罗马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的传统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就被人置之脑后。疯狂地争夺金钱，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性地挥霍浪费，以及漠视人类一切社会准则，成为罗马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经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这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过种田人。"

从以上所述中不难看出，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愈演愈烈的军人干政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存亡。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一度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试图利用自己由竞选合法取得的保民官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却对此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阻挠改革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12年后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其对国家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悲惨下场说明，温和有序的改革在罗马共和国不可能成功。此后帝国就一直被上层将领们的争权夺利和下层奴隶的起义所困扰，其中最严重的起义活动是公元前73年爆发的伟大的斯巴达克起义。该起义曾一度威胁到罗马共和国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政府获得了胜利。斯巴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满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起义追随者。

这次起义的最终胜利者是高卢的征服者尤里乌斯·恺撒，他统领着一支强大而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隔开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半岛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至此，恺撒成为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至于恺撒得到统治权后究竟准备干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他在公元前44年就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给暗杀了。

恺撒死后，他的养子及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独揽大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七、早期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号,这标志着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虽然屋大维声称他更喜欢共和国“第一公民”(元首)的称号,但实际上他已像皇帝一样,罔顾元老院和公民会议的权益,独揽大权于一身。他创立了由他亲自监督的中央集权制度,直接控制各行省的总督,严厉惩罚他们中犯有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罪行的人。他规定收税标准,使收税成为国家的职权,而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包税人的私人聚宝盆。他严密控制军队,让士兵们得到很好的待遇,使他们直接向他宣誓效忠。他还创建了一支常备海军,镇压海盗,保护帝国各地区间的商品和军队的运输。

屋大维后来逐渐被称为“奥古斯都”,他通过上述措施建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从而确保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能够维持长达200年之久。确实,奥古斯都之后的四个皇帝——提比留(14—37年在位)、卡里古拉(37—41年在位)、喀劳狄(41—54年在位)和尼禄(54—68年在位)——都是不称职的昏君,但是帝国经受住了他们的暴政,并在此后的“五贤帝”——涅尔瓦(96—98年在位)、图拉真(98—117年在位)、哈德良(117—138年在位)、安东尼·庇护(138—161年在位)和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的统治下再度繁盛起来。在“五贤帝”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极致,其文化也处于鼎盛时期。

当时,从福斯湾到克莱德湾的防御工事是帝国最北面的边界线,莱茵河和多瑙河则是东北面的天然边界线,这条东北面的边界线进一步向东绕过多瑙河的北面囊括整个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是罗马帝国的属地,不过这两个地区间的边界线紧靠地中海沿岸,从而把一大块内地留给了帕提亚人,公元224年后,小亚细亚以南的内地又归萨萨尼亚人所有。同样,在北非,罗马人以撒哈拉沙漠为南部边界线,控制了埃及和大西洋间的沿海地区。

这个庞大的、有着牢固天然边界线的帝国是一个繁荣的、实际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在数百年间,促使帝国经济繁荣的因素有许多,包括适当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广泛的贸易等。帝国内的自由贸易保证了来自埃及的小麦、纸莎草纸和玻璃制品,来自叙利亚的亚麻布、毛织品和各种水果,来自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小地毯,来自意大利的酒、油和各种制成品,来自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以及来自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物,能够畅通无阻地销往国内各地。罗马人还从帝国外面进口某些商品,如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和奴隶,以及占有重要贸易地位的来自亚洲的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香料、宝石、调味品和最受欢迎的丝绸(见第4章第2节)。由于国内外贸易都很发达,主要商品和奢侈品从近至高卢、远至中国的地方源源不

断地涌入首都,其数量之多使得重要商品足以满足100万人的衣食穿用,也使奢侈品足以满足西方世界统治者的挥霍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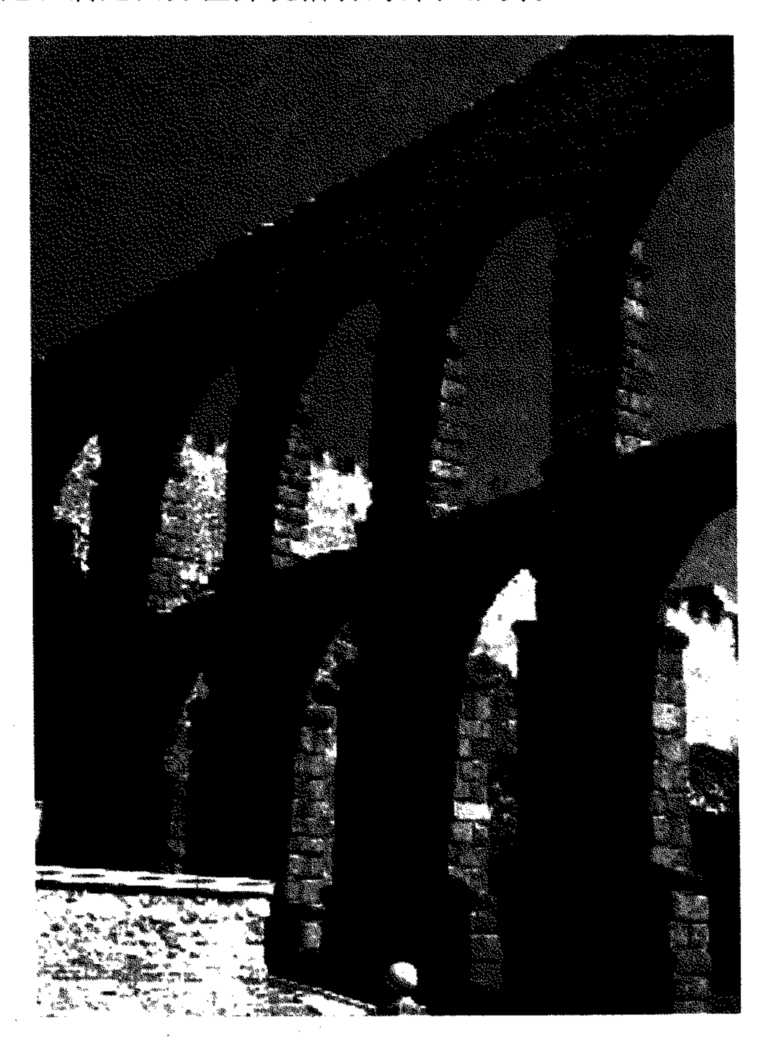


图34 罗马石渠

作为罗马帝国时期所取得的最伟大的建筑成就的一个代表,这个石头构筑的渠道建于图拉真统治时期,至今仍在被使用。

在文化方面,罗马人的主要成就是把城市文化同它所带来的一切附属物传播到中欧和北欧。在这方面,罗马人在西方所起的作用和希腊人在中东所起的作用类似。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在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建立了许多城市,将希腊文化传播到远至印度河和贾克萨尔蒂兹河一带。现在,罗马人也建立了许多城市,如不列颠的伦敦和科尔切斯特,高卢的奥顿和瓦依松,以及德意志的特里尔和科隆。这些城市的占地面积从20英亩到500英亩不等,但比起克里特人和日耳曼人建立的相当肮脏的山顶要塞和村庄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进。甚至这些城市中奴隶住的下房也比当时土著村民住的茅舍要卫生。此外,这些城市还拥有使人身体舒适的公共澡堂、让人心情愉快的公共剧场,以及住宅区、自由市场和商店。正是这些城市构成了帝国文化和帝国统治的基本细胞。

当然,帝国最伟大的城市还是罗马城。它占地5000英亩,其人口据估计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就已达到了100多万。游览者可能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

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但却又能看到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这一特点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在罗马很常见,罗马法中就曾有多处提到这一习俗。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一片漆黑。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富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白天街道上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击硬币,修补匠抡动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也没安歇下来。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因而太阳一落街上就会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赶车人组成的队伍。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富裕到能够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之所以还能过得下去,主要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人们舒适地消磨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都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当然比结构简单的浴池的服务项目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设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体现了"健全的头脑长于健康的身体"这一理念。

最后,罗马城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如前所述,这一文化基本上源于希腊,尤其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更是如此。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也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建筑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络、修建桥梁和铺设公路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修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为建造得好而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到现在还在使用。此外,和希腊不同的是,罗马的建筑物主要是些世俗性的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在于,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那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已经不能继续满足现实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那么遇上这种情况该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要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各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却只有少数几条。因此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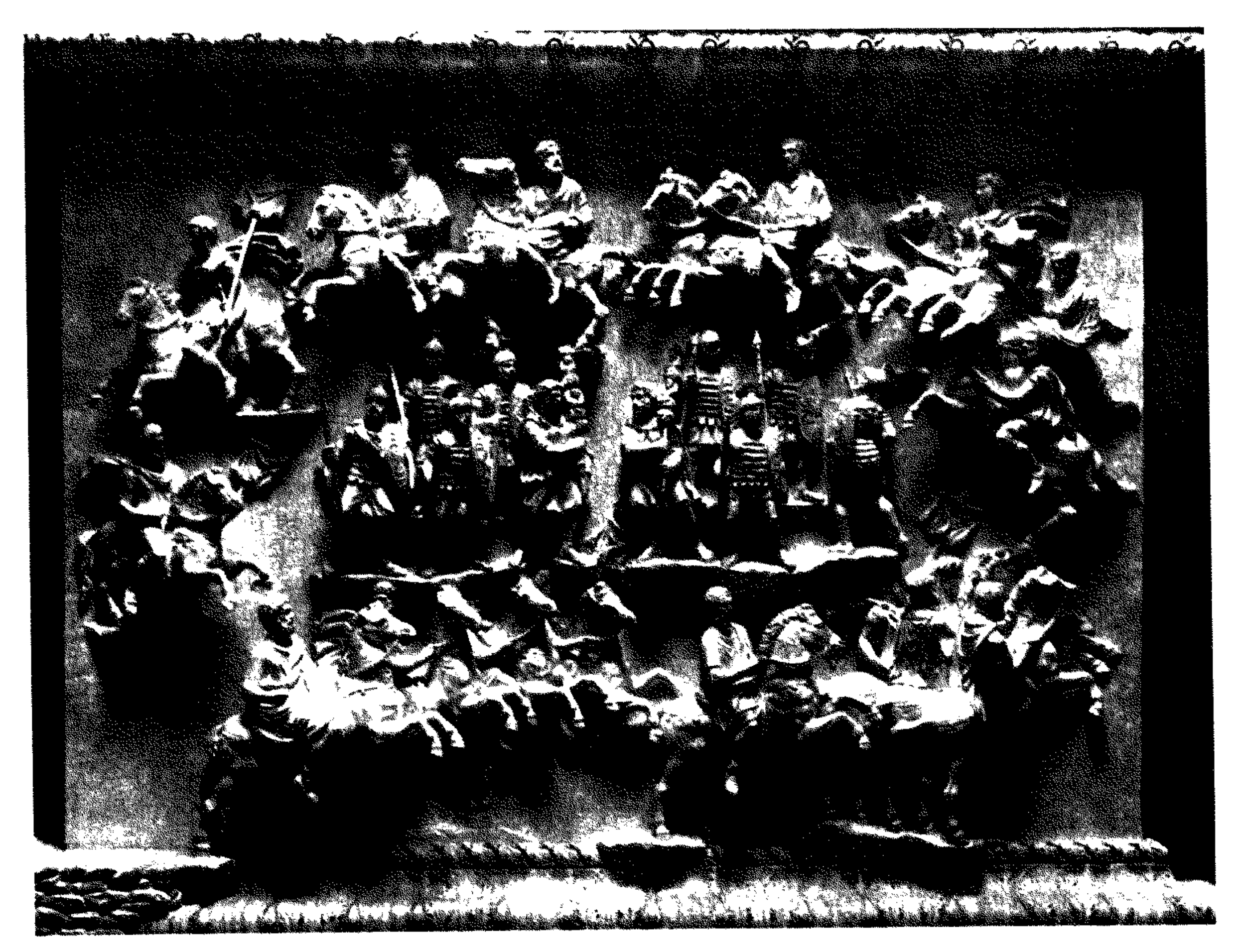


图35 罗马浮雕

安东尼·庇护圆柱上的浮雕，图中描绘的是被骑兵包围的罗马步兵。

《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罗马妇女的从属地位，她们必须服从家庭中最老的男性继承人，即家长的权威。法律体系体现了父系继承制原则，规定了丈夫是一家之主。因此丈夫享有绝对的权力，包括拥有决定家庭中任何成员生死的权力和将家庭所有成员出卖为奴隶的权力。但是与希腊妇女有所不同的是，罗马妇女享有继承财产和获得不动产的权力，并能在不事先征得她们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自主处分自己的财产。此外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罗马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一直把妇女关在家里。由于在从共和国转到帝国的过程中社会风俗有一些变化，所以不容易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是整体说来，罗马妇女的处境要好于希腊妇女，尽管她们依然从属于男性。

八、后期罗马帝国(公元284—467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

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却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了继承人，而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193 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昏庸。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经尾大不掉、难于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能够掌权。在从公元 235 年至 284 年这一时期中有过近 24 个皇帝，但却只有一个是自然死亡。而中央的分裂则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了各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也受到了在萨萨尼亚人手中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 3 世纪时，罗马帝国的衰微进程由于坚毅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284—305 年在位)和君士坦丁(306—337 年在位)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这两位皇帝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就是其中的一项，这也是应各种紧急需要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弃耕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 301 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依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调整；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 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的禁止出口。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则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还被扩大到各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行业。



图 36 君士坦丁像

君士坦丁皇帝的半身雕像，他生于公元 280 年，卒于 337 年。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项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皇帝将国土划分成两部分，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

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建立起一个新都城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城选择这一地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此，君士坦丁堡也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引以为豪的首都。

在较后的数世纪里，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涉及基督教与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继续通过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明历时数世纪的对基督教的一贯敌视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期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宣扬救赎的宗教以寻求安慰，这和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4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而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则在世界观、行为准则以及免除罪恶和死亡的途径等重大方面，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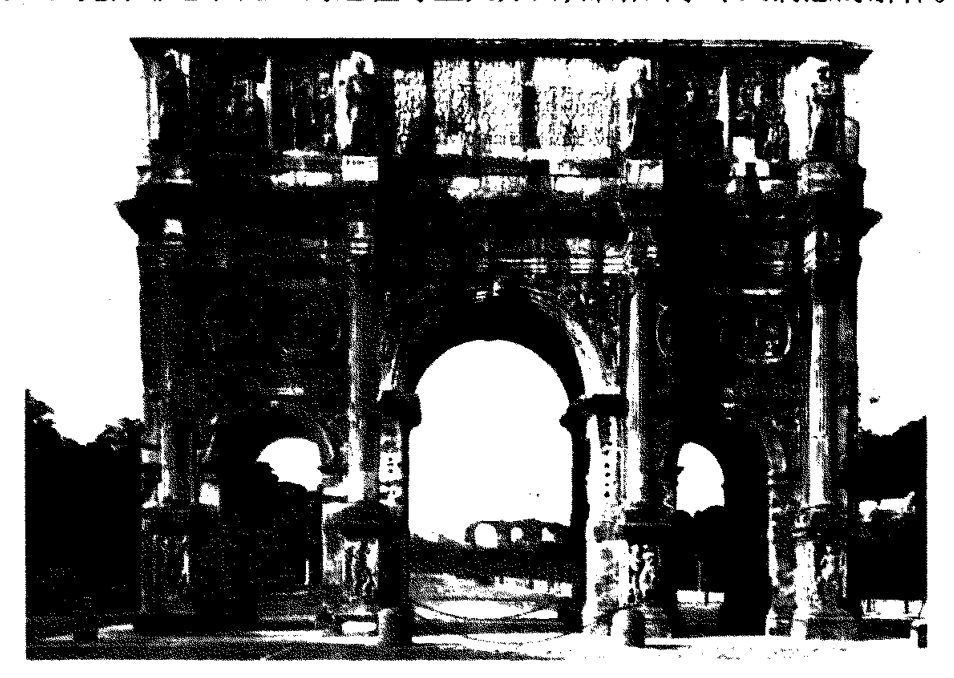


图37 君士坦丁拱门

君士坦丁拱门，建于公元312年到315年，以纪念罗马伟大的皇帝君士坦丁。

在新的宗教当中，基督教的解释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理念，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广为传播的东方一神教的崇拜对象。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天花乱坠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基督教在一个动荡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普遍感到无家可归、为生

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难得的友谊。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够鼓舞人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精神和希望。

到公元 64 年罗马城遭逢大火时，基督徒数目大增，以至于尼禄相信，罗马帝国最开始决定谴责基督徒为祸水并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是非常明智的。仅仅是殉难者死后将会得到神圣的名声，就驱使更多的人努力改信基督教。在 4 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公元 313 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 年在位)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卫道士尤里安皇帝(361—363 年在位)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 4 世纪末时还是基督教占据了统治地位。

正像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是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自我加冕为“第一公民”的奥古斯都不同，他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在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一副神圣的架势。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便被解释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装饰着宝石的皇冠，身穿镶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必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官成为“负责神圣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公元 3 世纪和 4 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执著地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很可能会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的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虽然只是暂时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所得到的最后结果却只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从 406 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就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长期的大规模入侵，而且他们也未能制止 410 年和 450 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城这一奇耻大辱。最后，也就是 476 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黯然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在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它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它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我们坚持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弄清罗马帝国经历这一长期然而又是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首先要对“罗马陷落”负责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10]这一判断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证明，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在较早世纪中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无数小部落后来合并成法兰



图38 象牙浮雕的汪达尔武士

古罗马象牙浮雕，制成于公元395年稍后一点的时间，表现的是一个名叫斯迪里欧的汪达尔人武士。他在罗马军队中因战功而被擢升到显要位置。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军队已经越来越多地由外国雇佣军组成。

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等较大的政治单位，这一判断也就变得似乎更可信。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去克敌制胜。据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西哥特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但帝国衰落的机制性原因是经济。”[11]实际上，这一“机制性原因”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各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文明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

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未能极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而技术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公认的组成要素。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像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本书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已经宣称，有些人生来就是统治者，而有些人则生来就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统治者就要像追猎“野兽”一样追逐、直至捕获他们，这“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有多方面的危害。它使奴隶失去了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而在另一方面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以获取，主人也就丧失了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此，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他命令在罗马圣皮特罗广场竖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家提出了一项可以极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制造技术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掌握，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竭之时它才为罗马所采用。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同样是有害的。因此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

> “（伟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锡腊库萨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算转化为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
>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以当时的理论方法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他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世俗化，需要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这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而攻讦的结果就是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12]

奴隶制度通过以上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持续不断地阻止了技术革新。而且奴隶制度在经济方面也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因为奴隶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帝国这些结构上的根本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的涌入而得到掩盖。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

上，帝国的扩张也受到了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困难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一旦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至开始萎缩，于是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也就渐渐开始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必要源泉，但它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沉重而无法摆脱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臃肿起来的官僚机构，到了收缩时期，也难以忍受精简的阵痛。过度的行政开支导致了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6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 000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则涨为200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以至于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易货贸易，而且这一趋势还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的传播而加速。促进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还拥有各种工匠，因而它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是可以自给自足，帝国经济也就愈是分解为无数单个的自给自足的单位。

伴随经济上的分散而来的必然是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收入的减少，帝国大厦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甚至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由于帝国的疾病是“机制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不过，严格管制不是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危机先于严格管制”。[13]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同步崩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半岛的农业从未像中东冲积平原流域的农业那样高产。意大利半岛的粮食产量平均不超出播种量的四倍。因而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它们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所以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机制性原因”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却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1000年。

不过尽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它确实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物质方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神庙、水渠、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马系语言。如前文所述，罗马法至今仍然大量存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主要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治下的和平”曾带来长达两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了一个代替希腊人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传统。在此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正是这一传统激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统治者或

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推荐读物

最近出版的同时考察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著作有由 J. Bordman 和 J. Griffin O. Murray 共同主编的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7 年版), 单独研究希腊历史的著作有:M. Grant 所著的 *The Rise of the Greeks* (Scribner's 出版社, 1988 年版)、R. Sealey 所著的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 1977 年版)以及 R. Meiggs 所著的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2 年版)。关于希腊历史和文明的某些特定方面的著述有:A. R. Burn 所著的 *Persia and the Greeks: The Defense of the West* (Edward Arnold 出版社, 1963 年版)、J. Boardman 所著的 *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 1982 年版)、C. Kerenyi 所著的 *The Gods of the Greeks*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 1979 年版) 以及 R. Flaceliére 所著的 *Daily Life in Greece at the Time of Pericles* (Macmillan 出版社, 1965 年版)。

关于希腊化世界,标准的史学著作有 W.W. Tarn 和 G.T. Griffith 合著的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Edward Arnold 出版社, 1952 年版);简短的概览性著作有 M. Grant 所著的 *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 (Scribner's 出版社, 1982 年版);学术性的人物传记有 N.G.L. Hammond 所著的 *Alexander the Great: King, Commander and Statesman* (Chatto & Windus 出版社, 1980 年版);相关的详细分析可参见 M. Rostovzeff 所著的三卷本的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Clarendon 出版社, 1941 年版)。

还有几本很好的单卷本的研究罗马的著作,包括:A.E.R. Boak 和 W.G. Sinnigen 合著的 *A Hitory of Rome to* 565 A.D., 第五版(Macmillan 出版社, 1965 年版), 以及 M. Grant 所著的 *History of Rome* (Scribner's 出版社, 1978 年版)。有关罗马前 3 个世纪的历史,可参见 M.P. Charlesworth 所著的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1 年版);此后的历史则可参阅 A.H.M. Jone 所著的 *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 (Longmans 出版社, 1966 年版)。特殊的专题在下列著述中涉及:J. Carcopino 所著的 *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40 所版)、R. MacMullen 所著的 *Christianizing the Roman Empire*, A.D. 100—400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4 年版)、以及 M.I. Finley 主编的 *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Heffer 出版社, 1960 年版)。

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地位在下列著作中论述得最好:S.B. Pomeroy 所著的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Schocken 出版社, 1975 年版)、V. Zinserling 所著的 *Women in Greece and Rome* (Schram 出版社, 1973 年版)。M.R. Lefkowitz

和 M.B. Fant 共同主编的 *Women'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出版社，1982 年版)是一本有用的相关原始材料的汇编。另外，M.W. Bingham 和 S.H. Gross 合著的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cient* 丛书的第一卷 *Greece and Rome* (Glenhurst 出版社，1983 年版)中，也有相关精彩论述。

最后，关于为什么罗马会衰落的问题在以下两本论文集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S.N. Eisenstadt 主编的 *The Decline of Empires*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67 所版)以及 D. Kagan 主编的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D.C. Health 出版社，1962 年版)。这两本书既方便了我们阅读相关论文，也提供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详尽书目。

注释

1. Plato, *Apology*, trans. B. Jowatt in Dialogues of Plato.
2. Cited by F.M. Cornford, *Greek Religious Thought* … (Dent, 1923), p.85.
3. Cited by C.J. Singer, *A History of Biology* (Schuman, 1950), p.4.
4. From *The Greed Mind* by W.R. Agard. © 1957 by 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D. Van Nostrand Company.
5. Aristotle, *Politics*, I, 5, 2.
6.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 G. Rawlison, Book VII, Chap.104.
7.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B. Jowatt, Book I, Chap.22.
8. Cited by S. Pomeroy, *Woma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Schochen, 1976), p.8.
9. Cicero, *First Part of the Speech Against Gaius Verres at the First Hearing* (New York, 1928), Chap.5.
10. A. Piganiol, *L'Empire Chréti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4), p.422.
11. R.S.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M. Evans, 1967), p.23.
12. *Life of Marcellus*, from *Plutarch's Lives*, Vol. 3, trans. J. and W. Langhorne (London, 1821), pp.119ff.
13. J. Levy,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ed. J.G. Bira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7), p.99.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考底利耶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为全世界谋福利。

——阿育王

第6章　印度文明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我们便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只是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呈现出的在工种、饮食、住宿和服装等方面的差别，其差别要比这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等基本观念和制度有哪怕些微类似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则又决不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而不实用的抽象概念；事实上，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就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时间也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其他一切欧亚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色。

正如本书下一章中将要谈到的，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考察中国这一特色要看到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况。而印度在其早期阶段则似乎与其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如前文(第3章第4节)所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入主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等印欧人种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宗教神灵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居住在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并非不可逾越，所以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几百年来一直翻山而过、穿梭往来。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都超过了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于是，自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形成一个与他们西

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在可以得到的证据很少,尚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一个最简单而又可能的解释就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在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庞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见地图9)。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被征服、受到鄙视,但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无法被灭绝、赶走或同化,因而其原先的文化也就无法消除。相反,当雅利安游牧者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则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近距离地生活。像这样的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在持续几个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只能是文化融合。这一文化融合的情形、性质和结果就是本章所要论述的主题。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利安人在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地区的多雨地带,因为那里有大片的草地可供放牧。后来他们渐渐地开始拓展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随着雅利安人在约公元前800年时开始使用铁器,其扩张的步子也就随之大大加快。这时,雅利安人的主要活动也由畜牧业转向农业——而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则也比较适宜于栽种水稻,在旁遮普,栽种水稻比种植小麦和大麦的产量要高很多。因此人口密度的中心也就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雅利安人最初建立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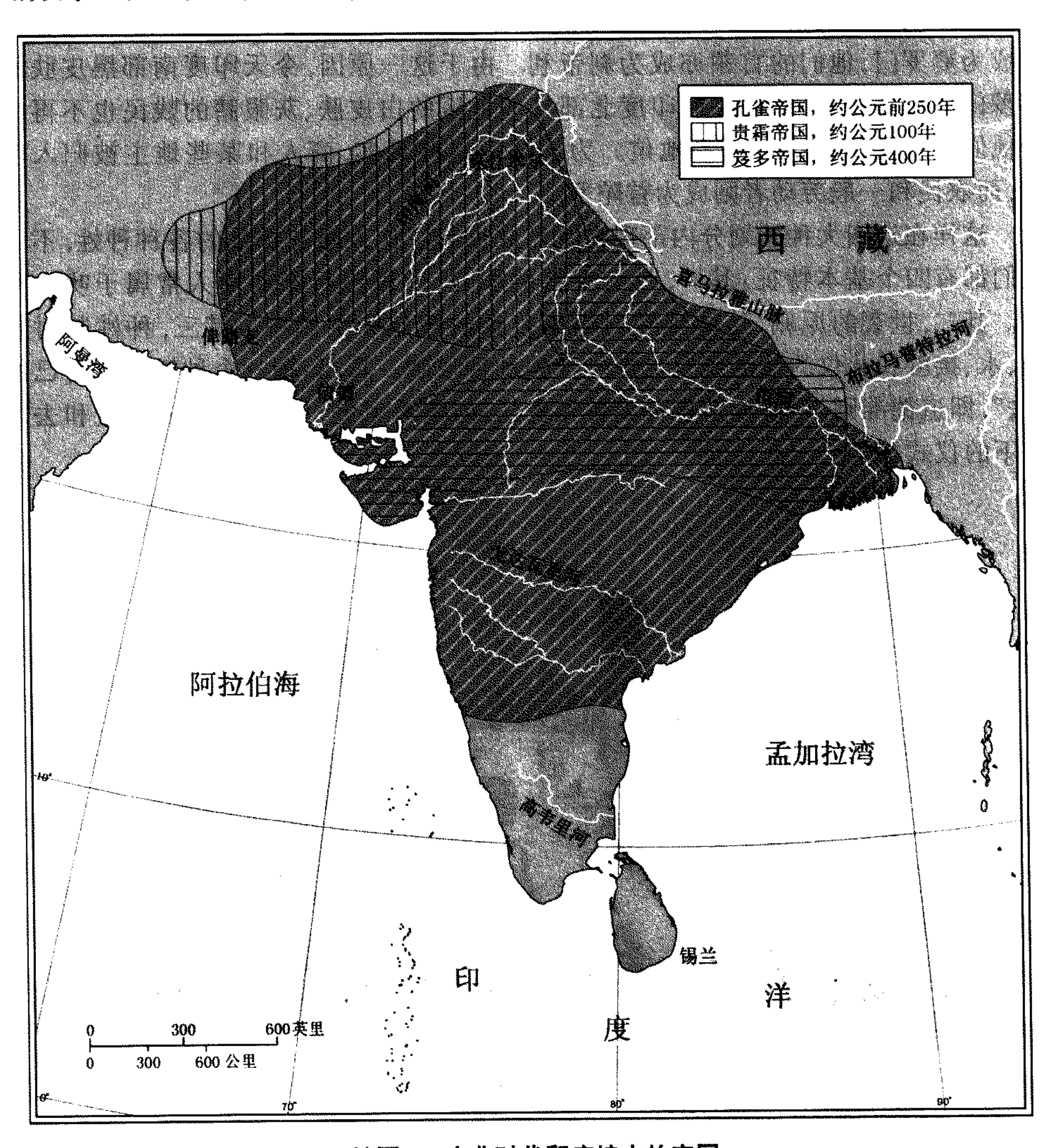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的发展。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粮食的交通干线,农业的进步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易货贸易,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雅利安人最初使用的度量衡恰恰正是其入侵之前的印度文明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逐渐从原先的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统一。原先,印度雅利安人像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老议会和部落大会认可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商路的交汇处,又控制着铁矿丰富的地区,因此它很快就强盛起来,并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

公元前4世纪成立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系统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印度王朝。他们开凿沟渠,修建灌溉工程,创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陀王们现被称为印度最早帝国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却并没有实际建成印度文明的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

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同时进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分成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相关的种种限制,如职业世袭制、等级内通婚制、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却已经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发挥作用。虽然关于种姓等级制度起源的理论不一,但学术界也都普遍同意,肤色是促进等级划分的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地图9 古典时代印度境内的帝国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印度土著人在肤色上的差别，并将土著称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所以他们极力避免与受其鄙视的臣民混合，并为此专门发展起划分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是由雅利安人自己享有的职业等级，它们由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则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准参加宗教仪式，也不能拥有征服者所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现实。某些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语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司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亦成为刹帝利。由于这一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可以提高地位。为了适应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农民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这样在这四大种姓划分内部现在就已成长起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种姓，不过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舍种姓。其二，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其三，种姓制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其四，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举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图39 婆罗门

一位婆罗门（印度种姓制中的祭司等级）正在向信徒们布道。

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现在他们约占印度人

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能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玷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要夺去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渔民、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皮革匠和清道夫，而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就是遭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玷污各种正规种姓的成员，换而言之，他们不得与正式种姓的成员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能被这些人看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贱民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他们仍旧必须敲打一对拍板以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而且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遭受到心理上的摧残，这种摧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会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就是因他们前世犯下了罪孽所以今生才必须受苦。这样一来改善来世的地位也就成了贱民们惟一的希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受到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共同作用，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而且，种姓制度里也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这使得一个人只要遵守规定便能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牢固的构架。虽然它现在已受到改革者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着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也是印度宗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利安人最初所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如因陀罗是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是神圣的令人陶醉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游牧民来说是很适合的，然而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而信奉新的神，从而也就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遗址中发现的文物惊人地类似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时的雅利安人自然会沿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适应农耕文化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司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同样来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古印度文明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学会了土著人的巫术和习俗；那时留下的一些遗迹也显示了祭司集团统治一切的高度集权的气象。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祭典时由婆罗门大声朗诵。它们通过世代口口相传而留存下来，由于它们在人

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播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份，提出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婆罗门向赠送他们礼物的人保证，他将在今生和来世获得相应的报答。对赠送"土地这种礼物"婆罗门评价最高，称其"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而它自己则也由此得到了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可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而且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能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无法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忠实地履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这义务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屈辱，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个人做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无理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导致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则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再一个因素就是，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非雅利安人虽然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司处于支配地位也非常不满。现在一般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就属于蒙古种族，而不是雅利安人所属的印欧人。这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也就促成了那两个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人们开始要求自由——自由是一种比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风气。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明了各种训练(如瑜伽修习)人心无旁骛、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那种专注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而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引发了许多改革运动，此中最重要的就是佛教。这个新的宗教排除了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位置，它要求所有的经文都能被全体信徒所理解，而不仅仅是由处于上层的少数祭司垄断。佛教还废止了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随后不但在印度，而且在欧亚大陆中部、东亚和东南亚，佛教都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但从公元600年起佛教就渐趋衰落，最后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因是，它未能为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做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世俗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相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了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优势确保了他们尽管遭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来。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设计的通向自由

和解放的道路。

婆罗门教导说，弥漫整个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全宇宙的灵魂和无处不在的精神，而其他一切则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束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被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此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发挥现实作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其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的反改革运动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在印度间接存在。



图40 青铜湿婆雕像

印度南部出土的一尊青铜湿婆雕像。湿婆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神之一。这尊线条流畅、结构平衡的雕像描绘了被称为"舞王"的湿婆同时操持着宇宙的创造和毁灭。这一既有艺术性又有神秘色彩的造型被认为是掌控着世间万物的流动。(雕塑成像于13世纪，尺寸为33.5×24.8厘米)

三、孔雀帝国

现在让我们将关注点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政治领域中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文所述，当雅利安人移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政治活动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印度半岛西北地区正自行其是，凭借其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

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518年时，波斯帝国的大流士皇帝就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将旁遮普西部收编为波斯帝国的第二十个省。两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从西北部入侵印度。但他在印度仅呆了两年，而且在他离开后不久，旁遮普的希腊殖民政权就完全消失了。不过，尽管亚历山大待在印度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其中一个影响就是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最后抵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方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一直致力于促进这一贸易达200年之久。

但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影响还要数亚历山大在废除了印度西北部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当地的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正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了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就连后来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都毫不费力地击退了他。

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在阿育王统治时期，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帝国时期的印度国富民强，政治清明高效，就像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无数的驿道上，成群的商人、士兵和王室信使往来不绝。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也促进了贸易发展，帝国设立了一个海事部专门负责维护航道和港口。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因其公园、公共建筑物、9英里多长的河边绿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经常都会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帝国的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有9000头大象和10 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常被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它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已经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他在用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也经历了一场急剧转化。他自己描写说看到十多万人被杀死后，他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从此以后，阿育王便开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根据佛教教义颁布自己的敕令，告诫人们发扬佛陀

的美德——俭朴、富于同情心、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更关心的是人民而不是他的政府，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会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医疗，驿道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团体去外国传教。

阿育王并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各教各派都予以慷慨的捐助。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处事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合乎道德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



图41 狮子柱头

鹿野苑阿育王圆柱上的狮子柱头。这是阿育王(公元前273年—前232年)朝代的作品，是这位孔雀帝国的统治者为纪念佛陀而下令竖立的许多石柱中的一个，现陈列于新德里博物馆。

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种态度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被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就被推翻了，他的帝国也遭到了毁灭。

其实上述历变已经成为印度古代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印度则恰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间以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这从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高于任何政治制度这一点可以证实。因此可以说，印度文明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的同时又在另一个范围里破坏了政治统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随着公元前2世纪初孔雀帝国溃灭而至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统治。不过在此期间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它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就是涌来了不计其数的入侵者。最初是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人，其后是帕提亚人，再后来是西徐亚人，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而这还仅仅是数了那些最重要的。这些人建立的帝国都是兼跨印度、中亚或中东，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商路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同时这也是一个使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的跨国贸易欣欣向荣的时期。就像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经商和殖民一样，印度人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经商和殖民。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播者也在这几个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了周围所有的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各民族之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被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惟一的回报只是有可能遭到天谴。因此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也就被传播到了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一切文化获得共同发展。不过文化的交流决不只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也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文化。公元1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公元52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他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他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他的布道在东海岸遭到了强烈反对，他自己也于68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却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到今天。

五、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都被印度文明同化、各路文化潮流融会贯通、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这个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媲美。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之际再一次将其势力扩张到由贵霜帝国崩溃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致。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拓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流域为止。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统一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隔为两半的有效屏障。南方各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但在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了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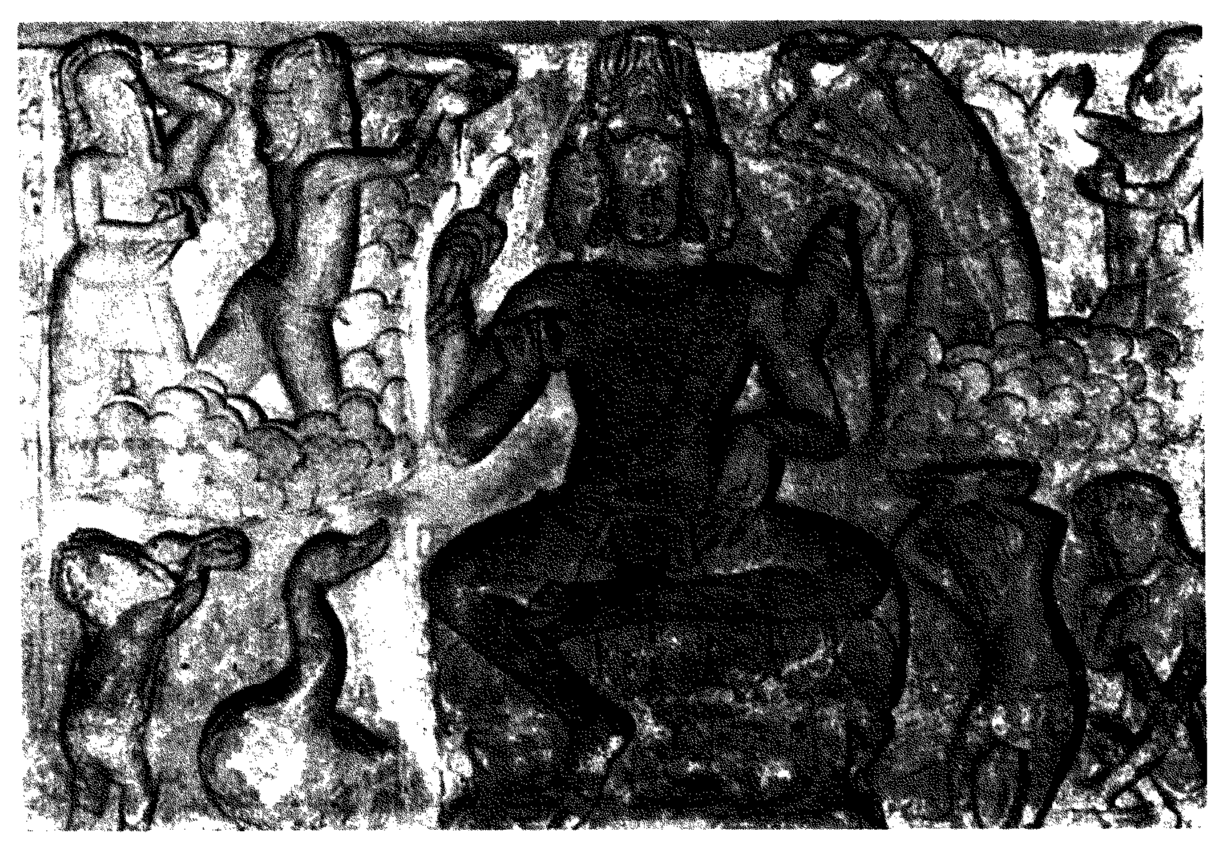


图42 梵天

约公元600—700年的浮雕：梵天。

用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各民族截然不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固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笈多帝国似乎曾经拥有过引人注目的繁荣,而且这一繁荣还由于旃陀罗笈多二世实行货币改革、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无论是半岛的内部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笈多统治之际的安全状况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降低这一点上可以反映出来:孔雀时期的贷款利率为240%,而到笈多时期则已降为20%。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门类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纹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得到大量生产。其他重要的行业则有冶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珠宝加工业。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来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要温和。东晋僧人法显曾在其逗留印度的401—410年间周游了各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繁荣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笈多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而且乡村也是一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像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此外法显还注意到:

> "(印度)人口众多,人民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成。如果他们想迁居,则去;如果他们想定居,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酷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名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其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1]

一个中国僧人眼中的印度

中国来印度朝圣的佛教徒留下了关于古典时代印度的极为宝贵的描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玄奘,他在公元629年至645年间访问了印度的各个地区,并留下了下列生动的记述。*

城镇和村庄都有几座城门,城墙又宽又高,城内街道和小巷曲曲折折,道路蜿蜒逶迤。交通要道都是土路,店铺设在道路两旁,上面挂着合适的标志。屠夫、渔夫、舞女、刽子手和清道夫不能住在城里。这些人在屋外行走时只能走路的左边。他们

的屋子都建在郊区，被矮墙围起来。这里的泥土柔软而泥泞，城镇的墙大多是用砖和瓷砖建造的。城墙上的塔楼是木头和竹子搭建的；房子都有阳台和瞭望台，这些建筑也是用木头建造的，上面抹了一层石灰和胶泥，屋顶盖着瓦片。各种各样的建筑都和中国建筑的样式类似，盖屋顶的材料有茅草、瓦片、树枝和木板。屋里的墙上抹着大量的石灰和泥浆，还掺杂着用来起粘合作用的牛粪。不同的季节里印度人抛洒不同的花朵，这似乎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习俗……

印度人对个人卫生十分在意，在这方面任何时候都来不得半点马虎。他们在饭前要洗手，他们从不吃上一顿剩下的东西，他们不相互夹菜。木制和石制的器皿在用完后必须销毁；金、银、铜、铁制的器皿在每顿用完之后都要清洗和擦亮。饭后他们用柳条漱口刷牙，并要洗手。

不洗浴完毕的话，他们不会彼此接触。每次如厕之后他们都要洗干净身体并喷上香水。

最常见的食物是牛奶、黄油、奶昔、绵糖、冰糖、蓖麻子榨的油和各种玉米作的当主食的蛋糕。他们一般吃新鲜的鱼肉、羊肉、羚羊肉和鹿肉，但有时也腌着吃。他们严禁吃牛肉、驴肉、象肉、马肉、猪肉、狗肉、狐狸肉、狼肉、狮子肉、猴肉和所有带毛的动物的肉……

家庭用品并不缺乏。尽管他们有煎锅和炒锅，但他们却不知道用来煮饭的蒸锅。他们有许多干泥制成的器皿，他们很少用红铜器皿；他们吃饭时只用一个器皿，所有的饭菜都放在一个盆里，他们用手抓着吃。他们没有汤匙，也没有茶杯，当然也不用筷子。

* 见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 S. Beal (Kegan Paul, 1884), I. pp. 70—89. Reprinted by Paragon Reprint Corp., New York (1968).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笈多时代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梵语这种从前为婆罗门学者所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现在又卷土重来，并被运用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在王室的慷慨资助下，诗歌和散文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被称为“印度的莎士比亚”的迦梨陀娑所写的著作，他将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或抒情诗。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自从在18世纪后期被译成英语后，一直受到普遍的赞赏，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佚。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编定的样式出现的版本。不过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成了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世代代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很杰出。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了

有益的交流。公元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断定地球是一个球体,绕着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一个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

无疑,印度人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一基点可以采用任何数位;印度人选取10大概是因为他们靠十个手指来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0,1,2,…9。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中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要表示成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来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然而尽管具有明显的优点,这些数字却长期受到藐视并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因为它们太易伪造了,短短的一划就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造的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从而也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它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等发明相比肩。

推荐读物

关于印度文明最有用的原始材料汇编是W.T. de Bary等所编的*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58年版),以及A.T. Embree主编的*The Hindu Tradition: Readings in Oriental Thought*(Vintage出版社,1972年版)。另一本价值不可估量的参考著作是J.E. Schwartzberg主编的*A History Atlas of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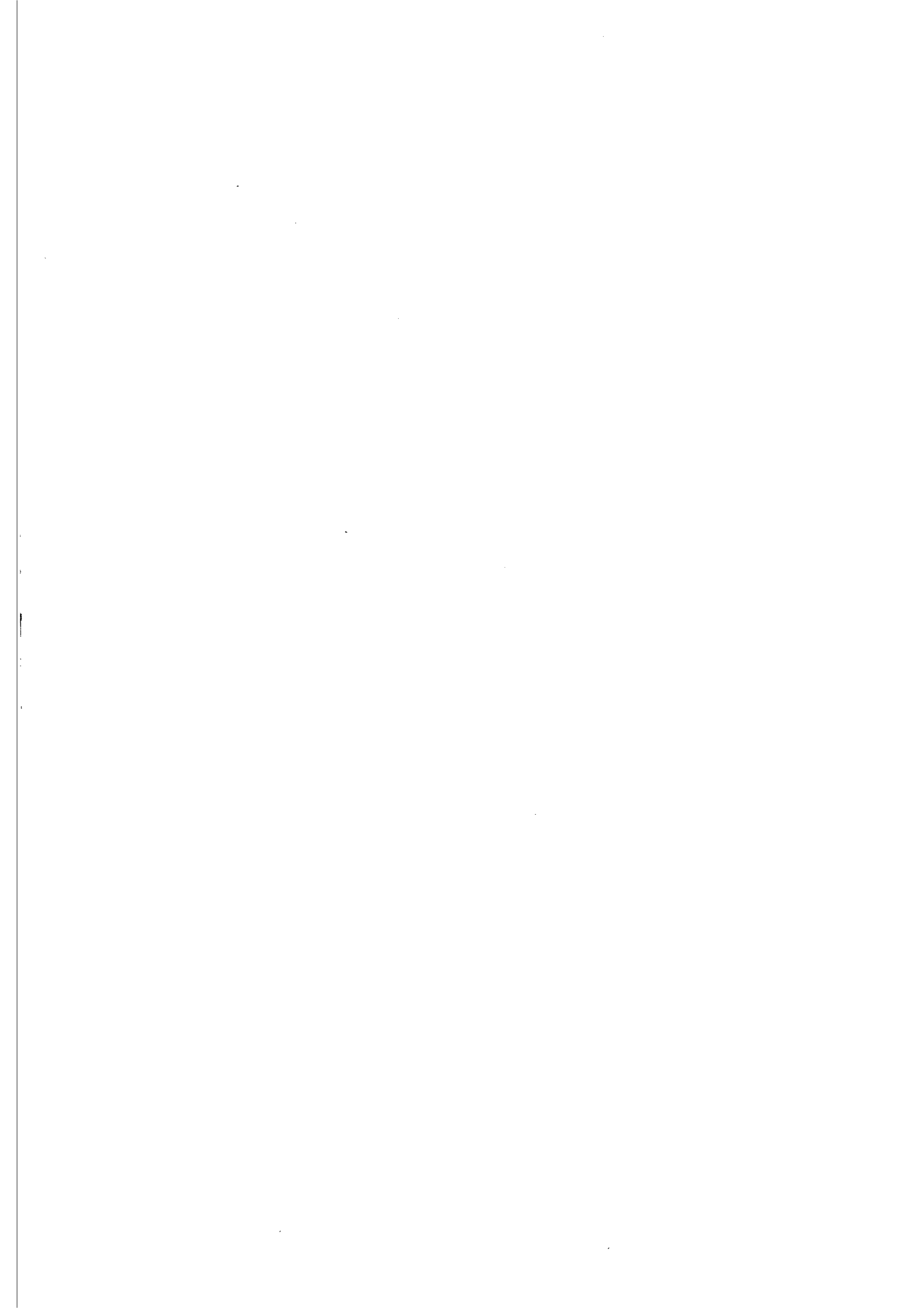
一本写得很好的关于印度的通史是S. Wolpert所著的*A New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年版)。也可参考下列四本著作:P. Spear所著的*India: A Modern History*(University of Michigan出版社,1961年版),R. Thapar所著的*A History of India*(Penguin出版社,1961年版),D.D. Kosambi所著的*Ancient India: A History of Its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Pantheon出版社,1965年版),以及H. Kulke和D. Rothermund合著的*A History of India*(Croom Helm出版社,1986年版)。

关于印度社会学的解释参见D.G. Mandelbaum所著的*Society in India; Continuity and Change*,两卷本,(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70年版)和B.S. Cohen所著的*India,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a Civilization*(Prentice Hall出版社,1971年版)。在下列书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有趣的材料:J. Auboyer所著的*Daily Life in Ancient India from Approximately* 200 B.C. to A. D. 700(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社,1961年版),以及M. Edwardes所著的*Everyday Life in Early India*(Batsford出版社,1969年版),此书对生活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700年间的印度人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分析。另可参阅K. W. Morgan所著的*Asian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nduism, Buddhism, Islam, Confucianism, and Taoism（Washington 出版社，1964 年版）。

注释

1. Fa-hien, *A Record of Buddhist Kingdoms*, trans. J. Legge (Clarendon, 1886), pp. 42—43.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孔子

第7章　中国文明

与印度文明的分裂和间断相反，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文化突变不同，中国的发展史上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虽然也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建立了某些王朝；但是最后的情况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游牧经济，而是入侵者自己被迅速而彻底地中国化。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封闭，仅仅受到西北边陲游牧民族的侵袭。中国无需像印度那样，不得不与一批批具有较先进的文化，因而在文化上难于被同化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从最初起就都是蒙古人种，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入侵的游牧民族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其整个历史上保持着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民族的同一性在古典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这使得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的人能够互相交流。而印度的情形则截然不同，那里今天仍有 14 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就是，它在其他 13 种语言中起着“联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政治统一性。这种政治统一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惟一的在所有历史阶段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祭拜苍天，但是他所履行的宗教职责始终从属于他的统治职责。因此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中国也没有类似于印度史诗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灵魂的救赎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君臣

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主义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稳固而根本的基础——这一基础还因为中国人在古典时代即实行独特的科举制度(一种通过全国性的竞争考试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固。而与此类似的情形在西方或全球其他地方则过了2000年后才出现。

上述历史背景有助于厘清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56年)朝廷软弱无力,列国相互混战不休,表面上看来是个多事之秋(见第3章第5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与印度相同,都是由于铁器得到运用。铁器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铁器发生影响的方式人人都很熟悉。比以往工具生产效率更高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起初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在大河流域地区兴修大批的排水工程、为远距离运输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在西北干旱地区进行的打井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而生产率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并最终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很早就已开始被使用,它通常是以贝壳的形式出现。而此时则又出现了铜币,它日趋广泛地被应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货币贵族,并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向村社头领收取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基础。由于当时新开垦的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被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而日益加大对盐铁生产和分配的垄断。这样一来,诸侯们就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各自封国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非常缓慢,但在其发生的地方,均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周王朝的统辖权。实际上,秦国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措施

并从中大受裨益。我们将在本章第3节中来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本章前面所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家,迫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民族的传统思想,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而又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佛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局势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世俗的特性,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成为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自的哲学学派。当时各种思想都十分活跃,因此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下面我们就来探讨流传了几千年、对中国文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几大思想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并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中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那里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参考手册。

在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五经",它们由诗歌、社会礼仪知识以及历史文献组成。这些经典由哲学导师加以研究、利用,比较起来这些哲学导师中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且恒久,以至于在过去20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孔子(孔夫子的尊称)于公元前551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下等贵族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所面临的世界却是没有希望的,到处都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机构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列国宫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能够采纳其理想政治见解的统治者。他确实也得到过几个较小的官职,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他转而教育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最终发现了自己的特长并将其充分发挥。他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被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版本似乎成于他去世约100年时。这本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使一个人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反省自我。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相当的幽默感。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也坚持统治者

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求国王做一个贤人，并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人。

孔子在当时那个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仍坚持做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们坚信梦的预兆意义、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却基本上对它们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被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流行起来，并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此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而另一原因则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并认为道德原则是统治者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还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西汉帝国政府的建立而产生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

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200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时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在那之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民国总统蒋介石全力主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运用其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台湾地区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一个大的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的教育

儒家首先是一个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实用性道德体系。它主要强调信义和社会责任，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原则中看出来：*

个人

人无信不立。

信义原则是培养人格的工具。它使人远离异常和乖张，增加人性中美好的品质。用它来要求自己，可以改正错误；用它来要求别人，可以免入歧途。

家庭

一个超越常人的人必须做到：当他的父母健在时，尽心奉养父母；当他的父母过世后，全心供奉父母。他主要想的是如何在一生当中都不使父母受辱。

孝有三个等级：最高级是让父母以自己为荣；其次一级是不使父母受辱；最低一级是仅仅能养活他们。

当父母健在时，对他们表示尊敬和爱戴；当他们过世后，则要对他们表示伤痛和悲哀——这就履行了活着的人的全部义务。

政府

好的政府能做到使近的人感到快乐，远的人受到吸引。

民为贵……君为轻。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当君主喜爱遵守适当的统治原则的时候，他的臣民就乐于听从他的召唤来为他服务。

如果君主要求他的臣民拥有某些品质，那他自己就必须首先拥有这些品质；如果君主想要他的臣民弃绝某些品质，那他自己就要先弃绝这些品质。

教育和文化

要维持一个教育体系，一个难点就是要确保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只有确保了此点之后，教师所教的知识才能得到尊重；保证了这两点之后，人们才知道如何尊重学习。

学者应当不断追求道德，并寻求在艺术中再现道德。

音乐产生快乐，这种快乐是人性存在所不可或缺的。

* 见 M.M. Dawson, *The Ethics of Confucius* (Putnam's, 1915), pp.2—5, 167—168, 255—257.

在儒家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不难理解，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从而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儒家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思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在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健硕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人民的肚子……无为而治。”

与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侍奉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够通过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必须动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同时则需要强迫人民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对待。他们主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等传统美德，而应是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

法家的这些原则在为秦国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开始显现。秦国统治者利用

这些原则征服其他诸侯,建立了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其一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政权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激起了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也因之而名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但是胜利了的儒家学者却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一来其他学派渐渐也就被淡忘了;道教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而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它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和政府官员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曾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则发生在1949年,它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地处中国西北部渭河流域的秦国的领导人。这一地理位置本身就有助于秦国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易守难攻,秦国的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而且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国的军队由于经常要因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铁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国获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国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极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国的力量,使秦国与其他列国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早先马其顿与各希腊城邦的关系。最后,秦国的统治者都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参见地图10)。

凭借上述有利条件,秦国的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了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们恐惧地称秦人为"野兽",把秦国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到公元前221年时秦王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成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分封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郡县,每一郡县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原秦国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列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并把秦国原来的卫戍部队派



图43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陵墓中出土的真人大小的陶制军士组成的军阵。

到全国各地。此外,秦始皇还通过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经济集中化。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诸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特质而被实践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国家统一的粘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音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成,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尽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声音。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概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因此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它经过数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现在)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常常听不懂彼此所操的方言。基于同一原因这种文字也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或越南人都能阅读汉文,但却不会说一个汉字。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在整个东亚的影响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当时的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么充分,却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因而

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正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秦始皇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于是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保存了下来。但是“焚书”计划实际上却失败了，因为那些文人学士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书藏起来，或者在交出之前将它们整本地背下来。后来，秦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献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书和老人们的回忆而恢复原状。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东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好在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了补偿。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秦朝修筑的驿道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向各个方向连接到大部分边远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驿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两轮车的车轴长度——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车轮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使每一辆车子要么循着现有的车辙走，要么以新的车轴来适应之。秦始皇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将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在西北面，他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他还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延绵 1400 英里。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 2000 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起这一事实：有 100 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正如文人学士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诅咒皇帝。

正是这种普遍的憎恶，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造成民众奋起造反，以至于公元前 207 年、也就是秦始皇去世才四年，秦王朝就覆灭了。不过，尽管秦朝的统治是如此的短命，它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烙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使中央集权制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由秦(Ch'in)而来，那是恰当的。

四、汉帝国

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不过继秦而起的汉朝皇帝汉高祖则更重实际且更为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起初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起从前周朝的分封国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还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州县之间。后来，公元前 127 年时，汉武帝又下了一道诏令，规定各封国的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也渐渐恢复，只是社会上已经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此汉帝国繁荣了 4 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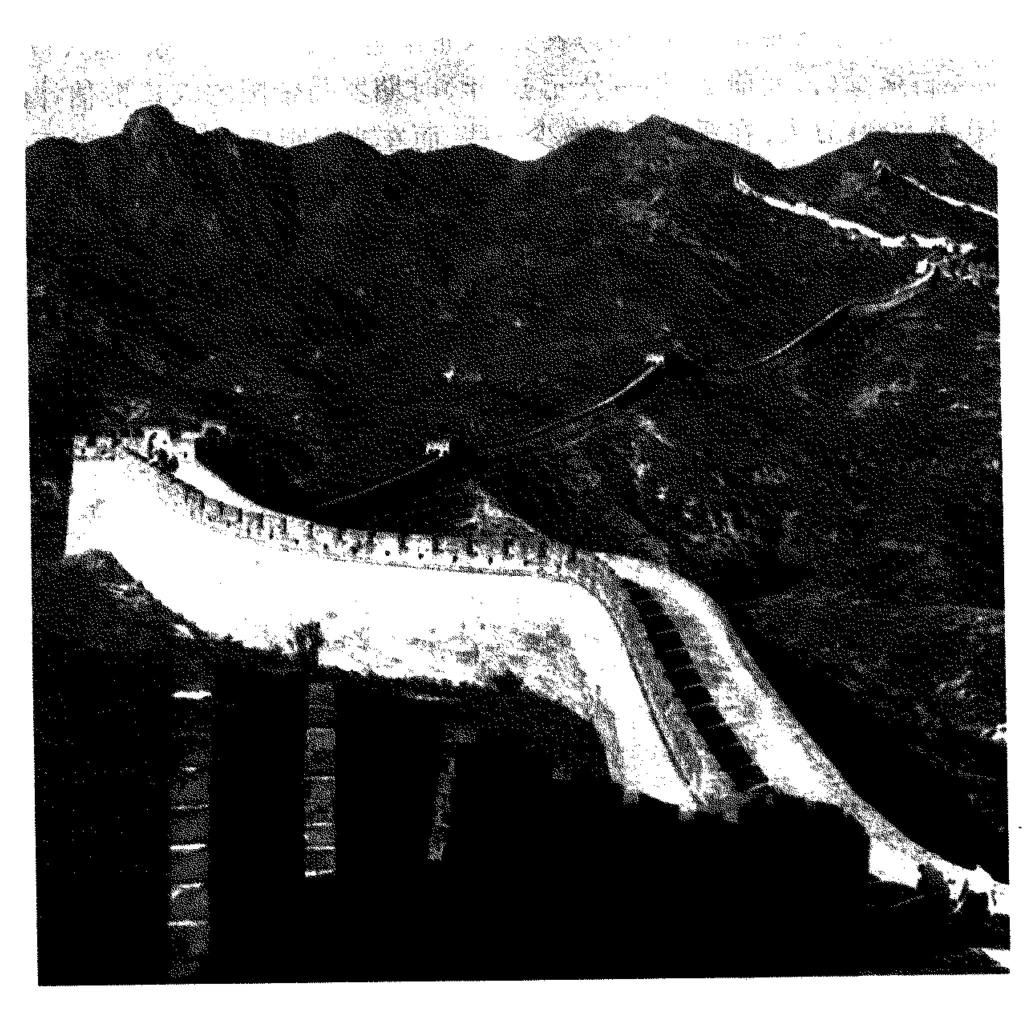


图44 长城

中国万里长城的一段。长城最先修建于公元前3世纪秦朝的时候，其后于明朝重修。

汉帝国的领土也和罗马帝国一样辽阔。在建国之初的60年间，汉朝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元气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时期，帝国的疆界急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不过在帝国的这一部分地区开始由操汉语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也经历了长达好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移居该地区和当地各民族被同化的过程。规模最大的扩张发生在西面。在西面，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的贸易量(见第4章第2节)。

仍是游牧民族的匈奴在骑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大量取之不尽的马匹。事实上，中国人为了获得武装自己的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往。但是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战国时代后期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栝，一扳扳机，就射出箭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以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经开始初步呈现出现在中国所具的规模。

汉帝国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都与罗马帝国相仿。公元元年

进行的人口普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0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而在非洲则只有不到2000万人。

居于汉帝国最高层的是皇帝,他不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权力,而且还要对其臣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负责。对皇帝本人尊严的强调体现在其日常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在朝廷或神殿里举行主持的长时间的仪式中;体现在为每一种场合所规定穿的龙袍上;体现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监和嫔妃侍候在他身边,有漂亮的马车供他去旅行,还有宏大的陵墓供人们日后用庄重的仪式去安放他的遗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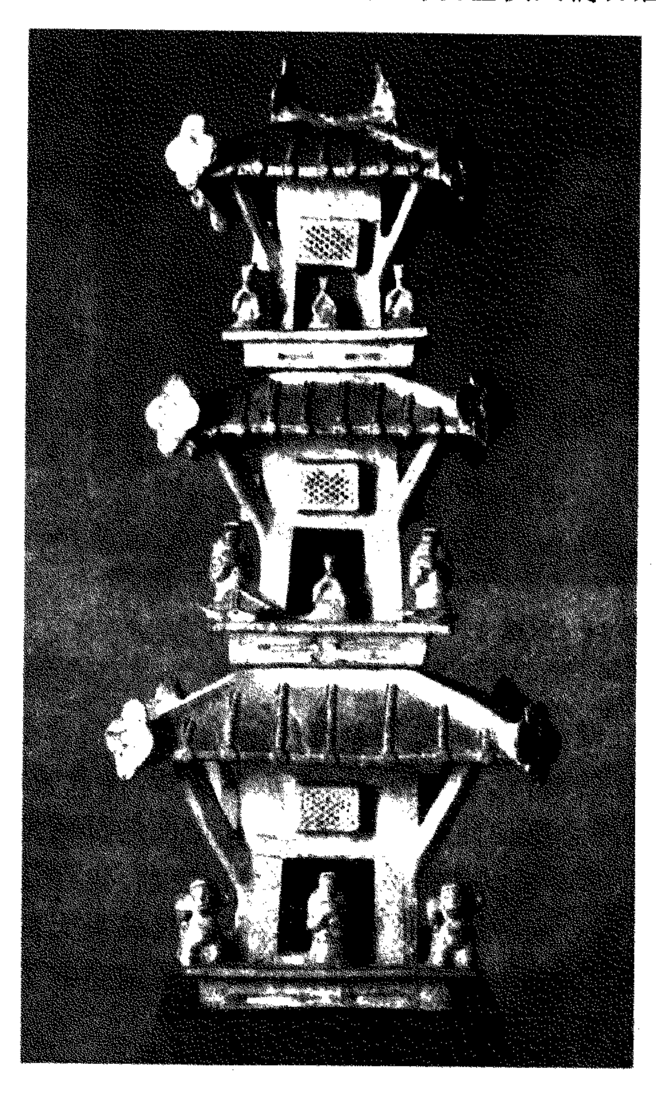


图45 绿釉陶制塔楼

一个东汉时期的绿釉陶制塔楼模型(规格为87.6×35.6×38.1厘米)。注意它与以后中国佛塔的相似性。

位居皇帝之下的是两名丞相,他们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和首相。他们经常与皇帝接触,负责政府的实际运作。在他们之下的是九卿,九卿分掌如下职责:宗教礼仪,宫殿警卫,照管御用车马,惩处罪犯,接受外国领导人的朝拜和进贡,记录皇族、宗室的名籍,征收国家税收,管理帝国财政。

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往下依次还有管理州、郡、县、乡的地方官僚机构。基层官

吏承担如下任务：征收捐税（包括谷物、纺织品或现金），捉拿罪犯，养护公路、运河和粮仓，提供驿马和维护一连串的驿站来维持帝国的邮政。

据说公元前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一名官吏。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非常小。不过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这种现象也很典型，它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中国有句箴言，"治大国如烹小鲜：过犹不及"。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分工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朝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朝廷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即太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到3000人；而在汉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则已超过30 000人。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举行；通过任何一级的考试均可获得三种学位中的一种。这三种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但在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能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儒家原则来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其家族势力。结果由此形成的行政制度，在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上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考试制度也有它的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儒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则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虽然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朝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并驾齐驱，而且在许多领域里都还处于领先地位，其优势则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朝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竹木简。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简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佚应归咎于纸。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则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了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的角度考虑也是一大进步：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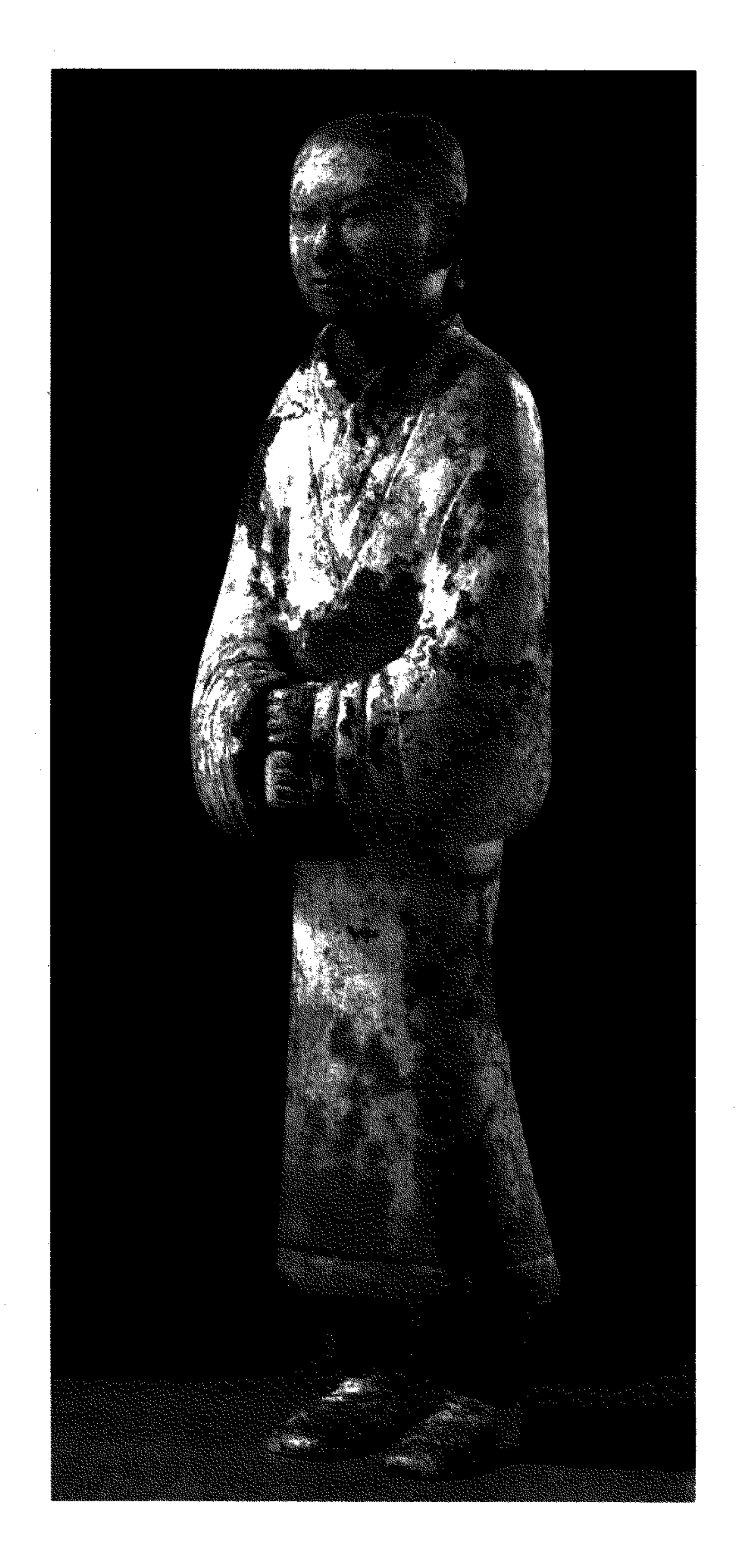


图46　西汉侍从俑

西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制作的陪葬用的直立侍从俑。

汉朝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史书撰写上。历史著作是一个试图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中国的五经里已经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在公元前1世纪时则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此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且复

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人们通常认为该书的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作为朝廷的史官，司马迁有遍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而在游历期间他还充分地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这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

这种方法有其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作品缺乏在早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在另一方面，它确实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各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并都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也就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以上天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天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此虽然中国的史学家也意识到了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但他们却又总是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也就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而解释出来的各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五、汉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都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说法掩盖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各王朝的兴亡的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就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仍是朝下坡路走，直到再来一次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则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

要王朝刚建立时普遍具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秩序的重新安定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会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朝廷就会提高赋税。而赋税大部分则又沉重地压在自耕农(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头上。在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日益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由于地主凭借与其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赋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收入就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也就愈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财政收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则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边防可能也会被忽略,从而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就是这种内部动乱和外来侵略的结合,使得摇摇欲坠的王朝最终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就是东汉时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帝国的资源也被耗费殆尽。为了应付危机,汉武帝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财政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则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紧跟着大规模的起义就爆发了,甚至在朝廷内部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天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实际上,汉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9—25年)。王莽原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臣,他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地处理根本性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得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而与此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则使得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并驱使破产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他们洗劫了首都长安,并于公元23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西汉皇帝的一位远亲刘秀。

东汉(公元25—222年)的历史基本上与西汉相同。在东、西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随后纳税农民就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也就又一次开始了。最后大规模起义就爆发了,当时的形势与罗马帝国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像。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

身的保障。大家族把庄园改造为要塞,实际上在其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所以贸易也就相应地衰落,城市也相应地缩小。公元222年东汉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陷入一个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这一点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十分相似。

推荐读物

最好的关于中国的通史是 E.O. Reischauer 和 J.K. Fairbank 合著的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 1978 年版); C.O. Hucker 所著的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5 年版); 以及 W. Rodzinsi 所著的 *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Free 出版社, 1985 年版)。如想了解更多相关的细节,可参阅正出版的十卷本的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8 年版)。

关于中国的学术和宗教的一手资料的汇编可以参阅 W.T. de Bary 等所编的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0 年版)。描述最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的书有 H.G. Creel 所著的 *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 (John Day 出版社, 1949 年版);以及 A. Waley 所著的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llen & Unwin 出版社, 1938 年版)。关于现代社会以前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可以参阅 M. Loewe 所著的 *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utnam* 出版社, 1968 年版) 和 J. Gernet 所著的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0 年版)。最后,还可看 J. Spence 所著的消遣性作品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Knopf 出版社, 1974 年版),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 1661 年以来中国皇帝的作品的译文。

总而言之，蛮族入侵给那些盛极之后就停滞不前而且似乎注定要消亡的古典文明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现今世界上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其废墟上重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罗伯特·洛佩斯

第8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大陆核心区占据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族却最终践踏了这四大文明，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其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得古典文明在3—6世纪中面对蛮族猛烈的冲击时无能为力。

游牧民族的入侵在不同的地区所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它们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幸免于难；拜占廷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京人的侵略，因而其古典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也就比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破坏正是导致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上能够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将叙述古典文明的意义及其衰落，阐明西方开始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情况和原因。

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如上所述，各个古典文明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其生产技术水平的相对停

滞不前，而这种技术水平的停滞状态则又导致社会生产率长久地保持在较低水平。约翰·梅纳特·凯恩斯是这样描述这一停滞状态的：

> 史前至近代初期，没有出现很多重要发明这一情况引人注目。近代史开始时，全世界拥有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但在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又不复存在了。[1]

凯恩斯的这一论断非常有道理。事实上，在文明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就已经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了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但在发生过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的发展进程随即受阻。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器、字母和铸币。耐人寻味的是，这三大发明都不是起源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起源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古典时期的进步都以更早期的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够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它们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就容易因挽具压迫而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出来。在此之前，马匹仅被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来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寺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面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每天要花大量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可以大量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起水磨，而且即便如此水磨在当时仍较为罕见。

发人深思的是，唯有战争提供的动力才能稍稍抵消一些当时普遍存在的技术上的萧条状态。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即公元8世纪发明的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器械的汽油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解决古典时代各文明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各古典文明也就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来增加财富。但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而这则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各文明之间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

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文所述，当时就已开始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这种情况更是有史为证。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从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性质。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该帝国的技术落后。他说：

>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在技术上比中世纪欧洲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休耕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人们只得用牛耕地拉车；水磨虽已出现，但数量很少，主要还是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支撑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没有一个中世纪国家像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专业常备军和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2]



图 47 《罗马法汇编》早期手稿

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编纂的《罗马法汇编》早期手稿中的一页。这一页画的是一位蛮族国王、一位主教、一位伯爵和一位公爵。像这样一部法规汇编有助于维护罗马法中的各项原则。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当时的技术发展实际上已经濒于停滞，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的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已有的财富，而不知道去开发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的新财富。从建造金字塔、寺庙、天主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上可以看出，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了需要有力的社会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的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使得它们只能长期停留在农业阶段。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也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的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办好宗教仪式。公元1世纪，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制造出一种能够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而同样是在这个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则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起石柱的机械，并解释说："让百姓们有活干，能够得到一些食物吧！"尽管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却正是这种观点使得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社会的产业中心。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引以为耻。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在中国，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古典文明的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则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缺乏高贵的色彩，与美好的名声格格不入。"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他写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帖耳，毕恭毕敬"。他在信中写道：

>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充足的阳光透过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的底部及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保证池内水温恒定……还有速记术，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演讲的人讲到哪儿，记录的人就能记到哪儿。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它并不是为了训练人的手，而是要做人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它绝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匠。[3]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相分离的观念阻止了欧亚大陆各古典文明的技术发展。而也正是哲学家那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所拥有的实践经验和传统知识这两者的相互影响，才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技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等级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各古典



图 48　一名中国贵族的长指甲

一名中国贵族的长指甲，他把指甲蓄得这样长只是为了证明他不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对此没有兴趣，而下层工匠则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解释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兴亡的情势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够突破这种定势，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所以古典文明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也就迥然不同。W.W.罗斯托在以下这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启划时代和开拓性“起飞”以前的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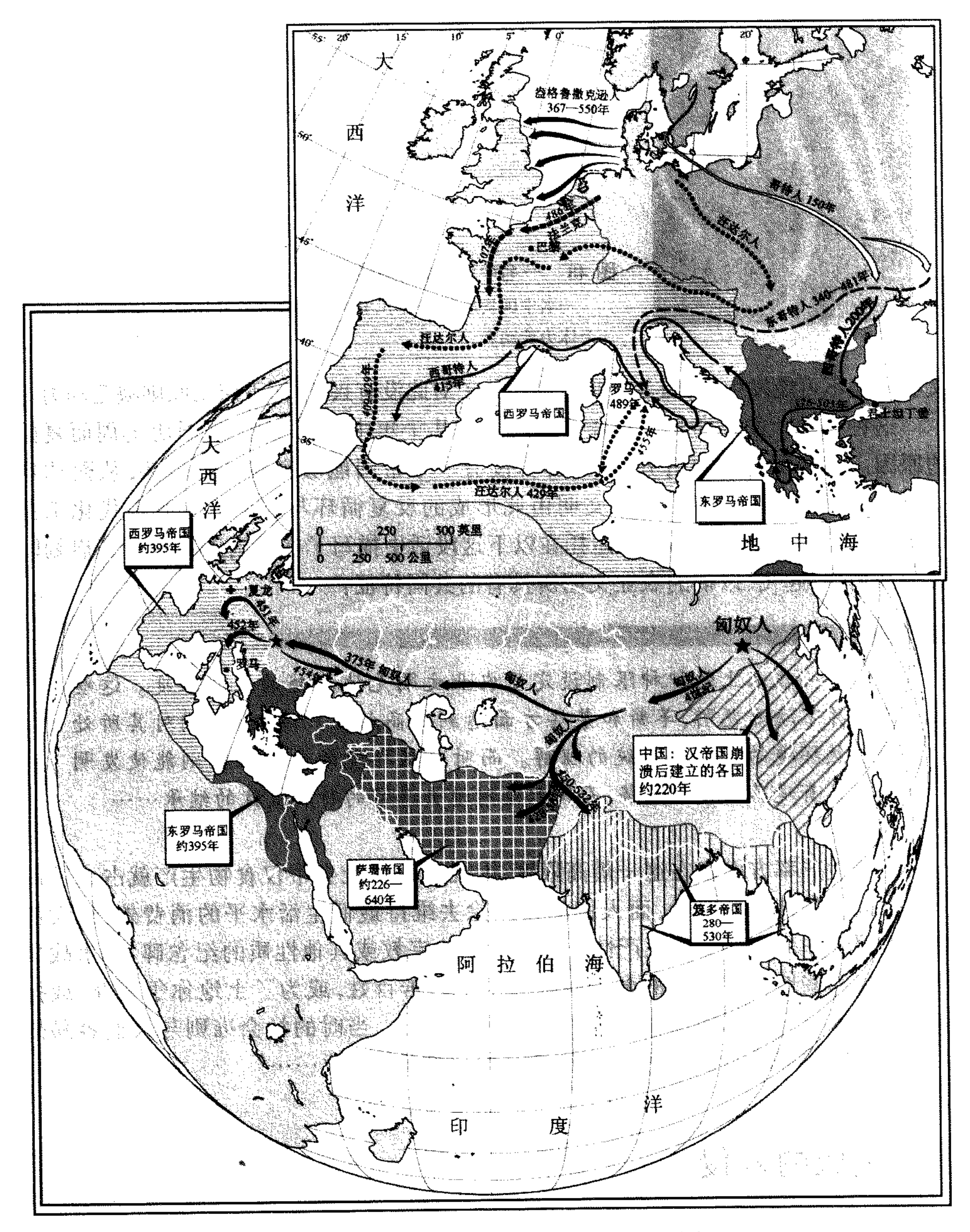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设定了农业文明无法超越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方面达到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确缺乏系统的理解。而对自然环境的系统理解则能使发明成为具有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只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方面存在这一最高限度，因此在古典社会中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四分之三以上的社会总劳动，而人们的收入除去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都被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或其他性质的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或葬礼上。当时的社会准则与人们容易想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4]

二、蛮族的入侵

3—6 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蛮族入侵的时期，此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 20

世纪因生产技术上青铜和铁制武器的使用而引发的入侵。正如公元前20世纪的入侵完成了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6世纪的入侵则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见地图11）。



地图11　欧亚大陆的蛮族人侵（公元4—5世纪）

游牧民族的迁移方向一般都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得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从而吸引着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见第4章第4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在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根据地，袭扰周围各欧洲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蛮族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族都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导致蛮族入侵的另一因素是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邻近的帝国边境地区。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会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者提供了获胜希望时，这种新增长的经济、军事力量就会被使用。此外蛮族入侵还常常是一个冲击力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攻不破中国长城，以及蒙古族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往往使得游牧民族不断向西入侵、挺进，在经过了一系列冲击波式的向西入侵之后，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大规模蛮族入侵。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蛮族入侵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攻；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被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为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而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斯拉夫人、维京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蛮族入侵所造成的后果就像入侵者的成分一样不同。在中国，公元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打败并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以及西部的蜀国。在三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游牧民族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迁，逃到南京，从此它只能统治着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中国则由此而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通过这些事实就不难理解，中国史学家为何将这几个世纪称为“乱世”。

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则在政治、文化和种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住在这里的中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它可以吸收和消融涌入的游牧民族，而不必经受激进的变革。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了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都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维持了中国的特性，而且南方也已被中国化了。这样一来北方出现的部分野蛮化的倾向就被中国文化的向南扩张所抵消，而从南到北的中国化特性也被极大地加深了。因而当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就又恢复了其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匈奴蛮人

在3—6世纪之间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被野蛮的入侵者所践踏。在以下节选的文章中,中国史学家班固描述了征服汉帝国的匈奴游牧民族。*

匈奴人居住在北方,以游牧为生。他们饲养多种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居多,骆驼和驴等其他动物则相对较少。他们经常迁徙,去寻找水和牧草;因此他们不耕种庄稼,不定居建房,也不建造城市。但在不同的部落之间却要对土地进行划分。

匈奴人没有文字语言,因此所有的协定或承诺均由口头作出。小孩子们学习骑马、射鸟和打松鼠。当他们长到稍大一些的时候,就要开始射狐狸和兔子。匈奴人以肉而非谷物作为主要食物。所有四肢健全的男子都是技艺精湛的射手和他们各自部落骑兵的成员。

在正常情况下,当谋生相对容易时,匈奴人就通过饲养牲畜过活,并通过捕猎来扩大牲畜群。当生活较为艰难时,所有的男子就会被教授打仗的本领,积极准备发动战争。可以说,匈奴人天性如此。当敌人距离较远时,他们使用弓和箭,如果和敌人相距咫尺,则改用刀和矛。当他们自信稳操胜券时就会发动进攻,但如果他们认为战况对自己极其不利就会逃走,而并不以此为耻。他们总是唯利是图,且不懂得讲究诚信和礼节……

从国王到普通民众,所有的匈奴人都以动物肉类为食,以动物毛皮为衣,并将皮毛织成毯子。年轻强壮的人具有享受最好食物的优先权,而老人们则只能吃一些残羹剩饭。他们仰慕年轻和力量,对老弱病残则嗤之以鼻。当父亲去世后,儿子将娶其继母为妻。同样道理,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则可以娶其嫂子进门。

可汗(统治者)清早要朝拜东升的旭日,傍晚则要对月亮顶礼膜拜。在座位的排序上,在所有的座位中左边面北的位置最为尊贵。死者被埋入棺中,并陪葬金、银和衣物。但是墓地上并不以树作为区分的标志,吊唁者也不穿丧服。一旦可汗驾崩,大约100名宠臣和爱妾将被处死,好让他们的灵魂跟随可汗。

在一场军事战斗中,匈奴人仔细跟踪月亮大小的变化。当月亮大而亮时他们就会发起进攻,而当月亮小而阴暗时他们就撤退。如果匈奴士兵杀死一个敌人,就会被奖赏一杯酒,以及他从被杀者那里获得的所有物质资料。如果他俘获了一个男人或女人,那么俘虏就成为他的奴隶。所以,在战场上,所有的匈奴士兵都为各自的物质利益而浴血奋战。他们像秃鹰一样汇聚在一起,一旦遇到挫败,他们又像流云一样迅速分散开去。他们最得意的战略是先把敌人引入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方,然后包围敌人。战斗之后,将战死士兵的尸体带回来的战士将继承死者所有的遗产。

* From Dun J. Li,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 Van Nostrand, 1967), pp. 211—213.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比中国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于其鼎盛时期。然而到了公元 5 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就已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 6 世纪前半叶崩溃。至于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目前人们只知道阶段性的入侵仍在继续，对其他具体情况则知之甚少。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的人数已经多到了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集团。这些移民中最突出的是拉杰鲁特人，它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杰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杰普特人属于军事贵族，他们在入侵后即逐渐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也以信仰印度教为荣，并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 19 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印度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杰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印度尽管经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当地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入侵者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在历史进程中重新出现，而她在古典时期后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居住在西方的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欧洲的情形却与印度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有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都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沟通。但值得罗马人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像攻击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从而使得罗马帝国还能幸存那么长的时间。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日耳曼文化就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记载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实际上，偷牛经常引发日耳曼人的内部纷争。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处于中间阶层的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则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土地所有者进行人身买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雏形。

日耳曼部落的主要权力集中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每次战役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也依此法产生。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通

常根据继承权来选举“王”,但在选举军事首领时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劈砍,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的成人仪式便可获得佩剑的权力,中世纪欧洲流行的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这种仪式。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拱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推动了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佗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却又盛赞他们拥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奉为罗马人的道德典范。他还盛赞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在中世纪的欧洲,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经常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

日耳曼部落中妇女们的地位要远比罗马帝国的妇女们高得多。塔西佗注意到,日耳曼妇女继承并控制着财产,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她们都享有与丈夫平等的地位:“自古以来,都是妇女们为早已胆怯和退却的(日耳曼)军队重整旗鼓。”塔西佗还观察到,日耳曼妇女在部落事务的管理中表现积极:“人们甚至还相信女性具有某种预知未来的神力,从不轻视她们(妇女)的意见,也不会对她们提出的答案不屑一顾。”[5]由此看来,日耳曼妇女的地位要比同时期罗马的妇女以及中世纪



图49 赤陶塑像

匈奴时期中亚的赤陶塑像:骑马人。这尊塑像系巴黎的私人藏品,表现的可能就是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本人。

欧洲的妇女们优越得多。同时期的罗马妇女被限制在家务劳动中，而中世纪的基督教规则要求妇女们要虔诚和顺从。

其实早在公元前 1 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已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的罗马军团十分强大，保卫边境绰绰有余。但是随着帝国的衰微，罗马军团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日渐松弛。因此罗马人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日耳曼人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事出无奈，罗马人也不得不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境内，以此作为策动他们反对境外其他日耳曼人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日耳曼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而到 4 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进攻的闸门便被冲开了。

这次进攻是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的，他们那可怕的外貌及组织周密的恐怖政策使得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是“几乎粘在马上”的人，说他们“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 稍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屠戮殆尽……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房屋，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地方，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地方，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地方。[6]

很明显，是其他游牧民族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 372 年渡过伏尔加河。他们在俄罗斯平原上迅速地击败了居住在欧洲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逼使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败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并于 410 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了整个帝国，但不久之后这种洗劫就再度发生。

最后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仿效西哥特人也在匈牙利平原建起王国，并以此为基地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各省。452 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是由于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这位匈奴首领才使罗马城幸免于难。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是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的帝国在他死后便随即崩溃，匈奴人就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坏却打断了罗马帝国对西部各省的控制，实际上此时的日耳曼部落已经可以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他们从新建的王国

出发转而由海上发动进攻,455年一支汪达尔人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从此深深扎根该地;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地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王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此后欧洲的事态发展就是人所共知的了:西罗马帝国同中国汉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罗马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也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则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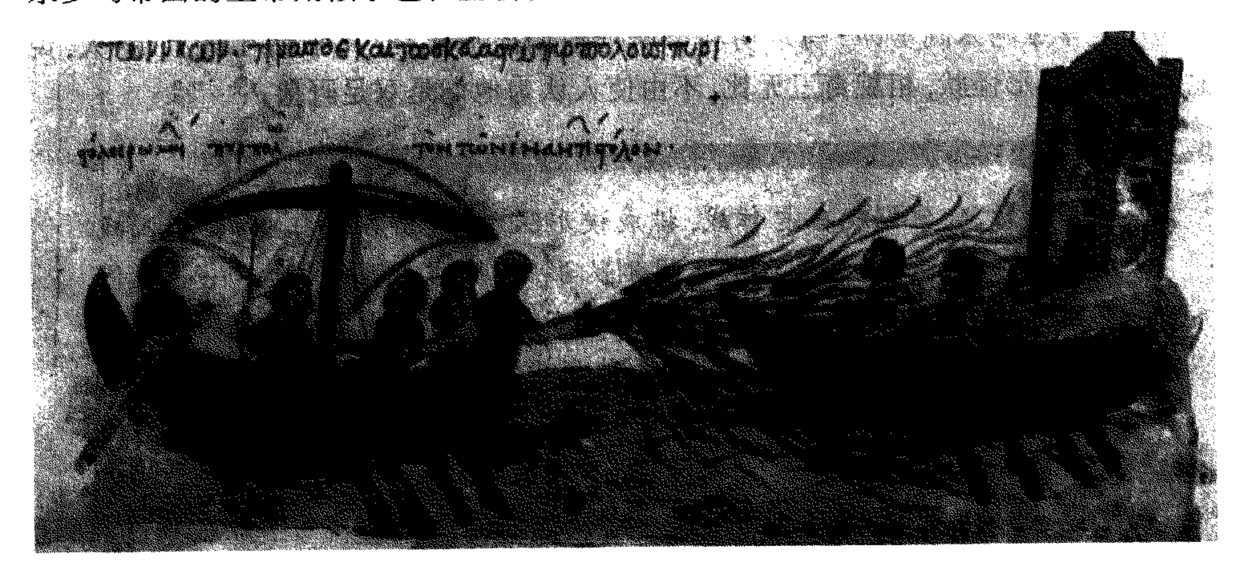


图50 拜占廷的希腊火

拜占廷之所以能在公元717—718年间的君士坦丁堡战役中击退阿拉伯人进攻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拥有一件秘密武器——希腊火。希腊火是由石油、硫磺和沥青混合而成的一种极易燃烧的物质,即使落在水面上也能燃烧。在这幅14世纪的图上画着拜占廷的海军正在用铜管向敌舰喷洒希腊火。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世纪中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法兰克人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在位),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统一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了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一时间,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在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其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无险而安然无恙



图 51　查士丁尼一世的雕像

一块公元 6 世纪的象牙雕板，其上的画面将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描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从公元 500 年至 1100 年，拜占廷帝国一直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中心。

——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坐落在欧亚大陆间海峡的岬角上。蛮族的侵略虽然摧毁了罗马城，却攻不破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君士坦丁堡在 1453 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又在东罗马帝国的控制下生存了 1000 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了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被称为拜占廷帝国——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主要是由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限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 年在位)所不能接受的。查士丁尼在血统上是伊利里亚人，但在感情深处

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并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来的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接着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在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都又变成了罗马的内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四、蛮族对西方的持续入侵

但是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完全同化入侵者，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还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蒙古内部的动乱又一次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着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一开始还不为西方所知晓，他们像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挤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占据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图52 查理曼大帝

查理曼：768—814年任法兰克国王，800—814年任查理曼帝国皇帝。

8世纪中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并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从而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职、意志坚强的宰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杰出，“马特”意即“铁锤”，他从714年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732年)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到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

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不甘心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宰相，他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该王朝最著名的国王，他在其768年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不断征战，扩充疆域，他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时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



图53　北欧海盗船

出土于1904年的北欧海盗船“奥斯伯格号”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维京人的船只。现存列在挪威奥斯陆维京人船舶博物馆中。

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在800年的圣诞节那天，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秘书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然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一波侵略浪潮就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从而严重地破坏了海上贸易。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札尔人于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邻近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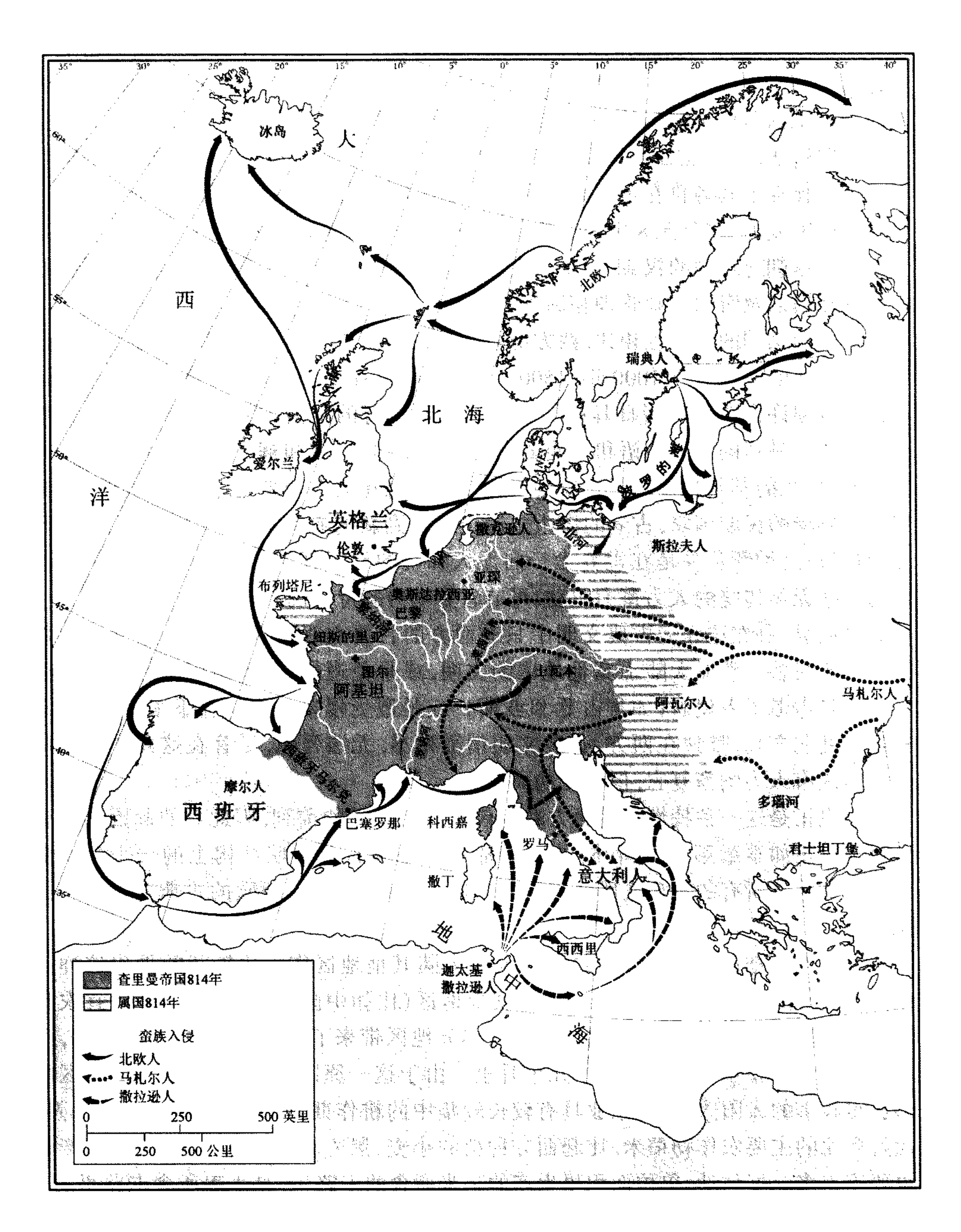
北欧人，即维京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族相同的海上游牧民族。维京人制造了一种船来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京人正是乘坐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陵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还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南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京人就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溯流而上进入俄罗斯腹地，再沿着南流的河流下来，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就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们给团团围住。起初，在8世纪末和9世纪时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由于维京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能够幸免于难。在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京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是无论他们定居何处，他们最终都被当时的基督教国家所吸纳。例如，法兰克国王为了进一步防止维京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京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是西欧最黑暗的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还从未经历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过如此凄凉的前景(见地图12)。

五、西方历史的独特性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蛮族入侵活动，不难看出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迥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廷帝国因其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而在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



地图12　蛮族对西方的持续入侵(9—10世纪)

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人王朝。萨萨尼亚人通过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起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此波斯能够击退奥克苏斯河沿岸游牧民族的进攻浪潮；但其同拜占廷的战争则弄得双方两败俱伤，致使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夺变得易如反掌。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都并不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也都保存了其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8世纪初复活过来，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同小异，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与中印文明的连续性相比，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就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欧洲复活，他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及其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崇拜。他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经瓦解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在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在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开展的，而种种新行业则是使用一些无需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显而易见，在这几大古典文明中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欧亚大陆上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消散殆尽，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也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它，但均无功而返。

但也正是这一独特性才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须受到重视。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各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只有西欧的古典文明会垮掉呢？

其实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的西欧并不像其他地区（比如中国）那么富饶。在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夏季的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则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够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都是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其亩产量也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卡路里，是小麦所含卡路里的5倍。因而中国的生产率也就大大高于西方，而这则又导致了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中国能够更好地维持

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则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都是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要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从而其军事威胁也就更大，更长久。由于上述那些原因，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其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因此西欧也就出现了古典时代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的意义十分重大，以至于它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古典文明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得出了如下结论：

> “总而言之，蛮族入侵给那些盛极之后就停滞不前而且似乎注定要消亡的古典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现今世界上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其废墟上重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7]

但是这里所说的“文化”其实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够设法从这些蛮族入侵中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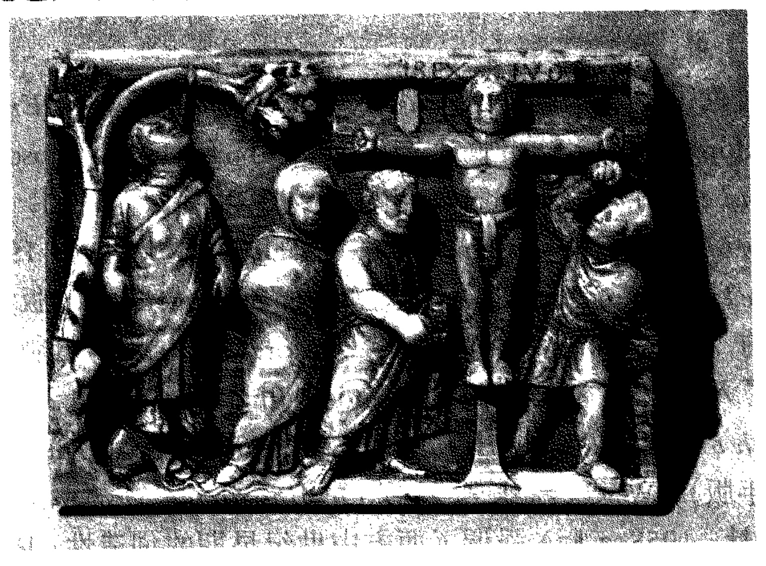


图 54　罗马晚期的艺术

这块罗马帝国晚期的象牙雕板描绘了耶稣升天的场景。帝国晚期的艺术正处于从此前的古典艺术到此后的中世纪艺术的过渡当中。

存下来,获得重生。但是这种重生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从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开端。

回顾历史,西方文化的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便显得十分明显。在古代时期的几千年中中东曾经一直都是创始力的中心,许多主要发明也都由此传播出去。而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则都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地落在后面。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而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却是所有地区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而也就只有西方能够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并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即新的中世纪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就像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一样,远远胜过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停滞不前"的古典文明,从而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推荐读物

以下作品中论及帝国的兴衰问题:S. W. Eisentadt 主编的 *The Decline of Empires* (Prentice Hall 出版社, 1967 年版);和 C. M. Cipolla 主编的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Methuen 出版社, 1979 年版)。P. Brown 所著的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Harcourt 出版社, 1971 年版), S. Magzarino 所著的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Faber and Faber 出版社, 1966 年版)和 F. W. Walbank 所著的 *The Awfu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出版社, 1969 年版)阐述了对于罗马衰落的不同观点。

以下书中讨论了罗马帝国的入侵者:R. MacMullen 所著的 *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7 年版); E. A. Thompson 所著的 *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 (Clarendon 出版社, 1948 年版); O. J. Maenchen-Helfen 所著的 *The World of the Hu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 1973 年版); T. S. Burns 所著的 *A History of the Ostrogoths* (Indiana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4 年版); G. Jones 所著的 *A History of the Vikings*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8 年版)。以下书中分析了入侵之后的发展:J. D. Randers-Pherson 所著的 *Barbarians and Romans: The Birth and Struggle of Europe, A. D. 400—700* (University of Oklahoma 出版社, 1983 年版); W. C. Bark 所著的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8 年版) 强调了西方中世纪早期的创造性; R. S. Hoyt 主编的 *Life and Thought in Early Middle Ag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出版社, 1967 年版) 将这一时期诠释为过渡和转变的时期。近期, M. Grant 在 *Dawn of the Middle Ages* (McGraw-Hill 出版社, 1981 年版)一书中又提出了此观点。

注释

1. J.M.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Harcourt, 1932), pp.360—361.
2. A. H. M. Jon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e Empire," *History*, XL (October 1955), p.220.
3. Cited by F. Klemm, *A History of Western Technology* (Allen& Unwin, 1959), p.23.
4. W.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2nd ed. (Norton, 1962), pp.311—312.
5. Cited by S.H. Gross and M.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 (Glenhurst, 1983), p.11.
6. Cited by M. Hadas, *A History of Rome* (Doubleday, 1956), pp.204—205.
7. R.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M. Evans, 1967), p.58.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

每个文明中都不乏厚古薄今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认为史前时期的人是未沾染上文明的不良影响的“高尚的野蛮人”。很久很久以前,“在天地之初”,在令人惊叹的人类生存的初期,人间是一个乐园。在印度史诗中就有赞美田园诗般的过去的段落,称颂当时种姓制度并不存在,人类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话。同样,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历数了从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一直到作者所处的悲惨的现时代的人类不断衰落的命运。

人类最初生活在乐园中这一观念是有某些史实根据的,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言,文明时代到来之前的部落成员在获得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方面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经济权利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特征。但是当部落成员变成农民之后,他们就不再享有自由获得土地的权利,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他们的具体义务随地区的不同而变化,但受盘剥的最终结果则是无论到哪儿都一样。在按国家、教会、地主和高利贷者的要求支付完租税之后,农民所剩下的只及他们劳动成果的一半或更少,而这则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活。历史学家估计,在全球各个文明中,上层统治阶级仅占总人口的1%—2%。然而,他们不论在哪里都占有整个种族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这一悲惨事实说明了为何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每年都会爆发农民起义以及沙皇俄国为何被1801至1861年间的1467次起义摧毁、农奴最终获得解放的原因所在。

文明的到来使得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也会受到内部和外部的一些制约。但是到了文明时代之后,原先的部落首领和头人已被国王或皇帝所取代,被无处不在的官吏,如宫廷大臣、行省和地方官员、法官、教士和会计等所取代。同帝国行政机构关系密切的是教会统治集团,该集团的产生也是文明的一个根本特征。被称为“全职专家”的祭司代替了以前曾是“业余专家”的萨满,这为官方神学的产生和祭司统治集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种神学和祭司集团都是为维持现存的社会制度服务的,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政治领袖以神

的制裁力和神的属性。例如,埃及的法老就不仅是其国家的统治者,而且也是“活着的神”。这种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结合给社会现状以强有力的信仰支持,因为很少有人敢冒既在今生遭受当即被处罚的危险,又在来生遭受永久被处罚的危险。

这种由文明引起的文化变化是根本的和持久的。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是自主的和单一的,所有的成员都具有同样的知识、同样的风俗和同样的见解,且其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一个远为复杂的新社会出现了。除了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通晓神秘书写艺术的书吏的文化,知晓上天秘密的祭司的文化,擅长绘画和雕刻的艺术家的文化和懂得如何与沙漠和大海以外地区交换商品的商人的文化。因此社会也不再只有单一的文化,而是形成了所谓的雅文化和俗文化。雅文化传播于城市的学校、寺庙和宫殿之中;俗文化则存在于乡村之中。雅文化通过哲学家、神学家和文人学士以书面形式流传;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口口相传。

各种文明的雅文化和俗文化虽然其具体表现各异,但其本质却很相似。就雅文化而言,它们都以诸如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以及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样的“圣书”为基础。由于这些经文是知识的基础,因此它们主导着教育。任何想要取得成功的人都必须记住大部分经文。这些圣书还被用来向人们灌输忠诚和服从的思想。任何拒绝接受官方学说或反对社会制度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不赦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在所有的雅文化中“地狱”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它是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的永久集中营。

所有文明的俗文化也都基本相同。各地农民都拥有相当多的关于饲养牲畜和种植植物的实践知识。他们都把勤劳看作美德,轻视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所有的农民都想拥有一块土地、几头牲畜和基本的种田及做工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意味着独立和安全。为了得到它们,所有的农民都曾经并一直在顽强地抵制外来干涉,不论它是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时政府性质的机构。不过乡村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则正好与农民这种“粗鲁而朴实的利己主义”相抵消:好的邻居不仅乐于帮助邻居盖房子,参加乔迁宴请、丰收节庆和其他社会活动,还总是乐于给予他们急需的帮助和同情。

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很紧张。一方面,农民有优越感,认为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与城市生活和各种职业完全不一样,从道德上看是“富裕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又隶属于城市。地主、税吏、祭司和士兵通通都来自城市,他们的傲慢和专横十分清楚地表明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虽然显贵们实际上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富裕生活的,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自身智力和品德较高的缘故。几千年来,显贵们的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农民的心里扎下了根,致使他们变得卑贱和顺从。

显然文明的到来对人类的平等来说是一种反动,不过文明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成就。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公平和剥削,历史仍然向前迈进了

一大步。这与工业革命很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了令人痛苦的社会分裂和人类苦难,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却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能力和生活福利。文明的到来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中一般部落成员过的生活很可能比文明社会中一般农民或城市工人过的生活更完美、更自在,但恰恰因为部落文化是轻松闲适、毫无紧迫感的,才造成它的生产力也是比较低的。因而尽管税吏、祭司和地主的要求是苛刻的,但他们也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各大河流域农村人口的剧增便是生产率得到提高的确凿证据。而且生活标准也随人口的增加而提高。世俗的、宗教的最高统治者和高级官员普遍都能享用到各种食物和酒,并享有华丽的服装和豪华的宅第,这是部落首领们永远都无法想像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员和教士——也能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差不多的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就连普通民众的境况——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单从物质方面来看——也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

因为有了书写这门新艺术,文明社会遂能使知识不断累积并代代相传。各门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医学也都因此而能在文明社会中扎根、繁荣。富裕的上层阶级的出现,也为建筑师、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提供了机会。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印度的泰姬陵和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等杰作便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种创造力的结晶。

这些宝贵的成就使少数人得到的收益大大超过多数人得到的收益。归根到底,为雅文化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重要的是人类的确取得了进步。而也正是数千年中积累的这些进步最终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战胜自然,获得了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和少数人一起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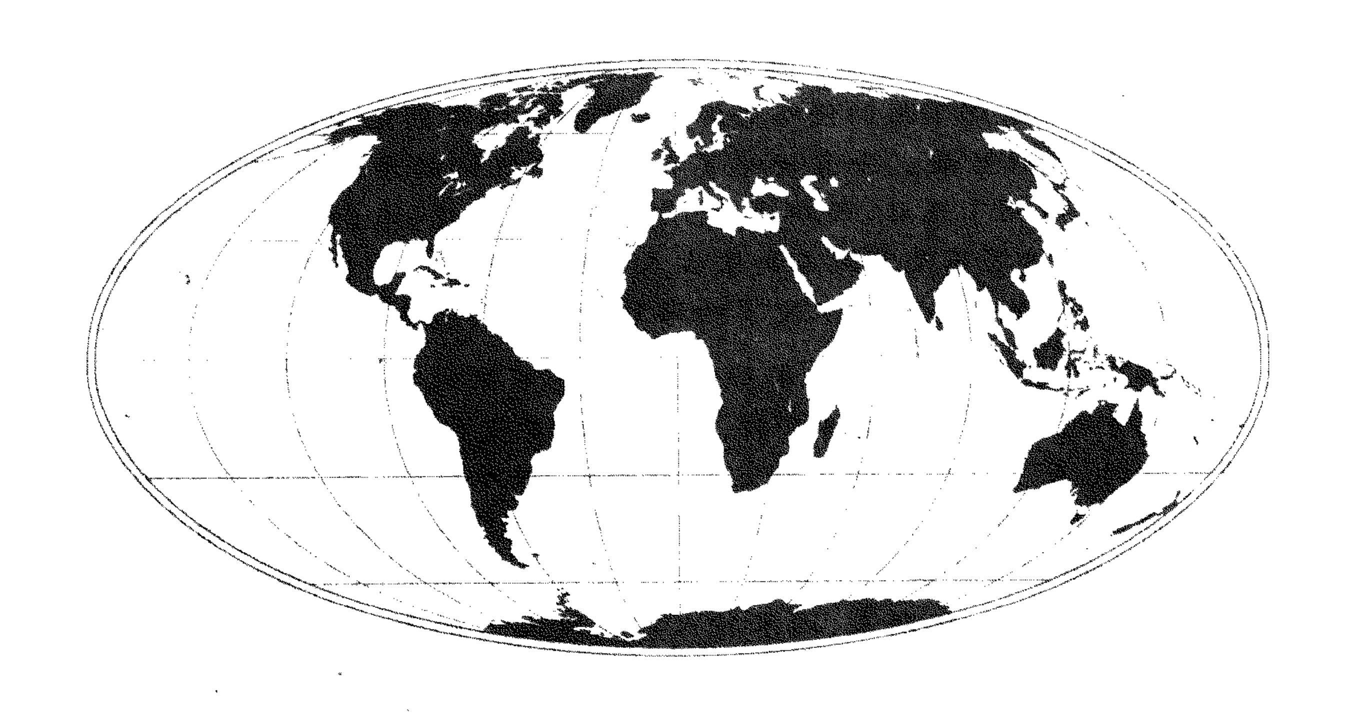
的确,现在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未能接受教育、患有疾病和受饥饿煎熬。但这种情况远不及 14 世纪中叶占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被黑死病夺去生命的情况悲惨,两者不是一个性质。1846 年 100 万爱尔兰人因马铃薯疫病而饿死,1876 年 500 万印度人因粮食歉收而死于饥荒。这些瘟疫和饥荒的牺牲者不可能获救,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缺乏克服这些困难所必需的知识。

今天我们已经拥有那样的知识,因此我们有使自己从数千年的灾祸中摆脱出来的潜力。但可悲的是,这种潜力还远未被人们认识到——不过它确实存在。而它之所以存在则是因为人类不同的文明在过去都取得了进步。因此,让我们还回到题目中所提的问题上: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答案是:在过去它两者都是;而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从过去文明中积累的知识是被用于毁坏的目的还是被用于建设的目的。

推荐读物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写了一些关于文明价值很有见地的书,其中比较突出的有:Chang Kwang-Chih,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2 年版), V. Gordon Childe 所著的 *Man Makes Himself* (Mentor 出版社, 1951 年版)、R. Redfield 所著的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to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 1956 年版)、L.A. White 所著的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McGraw-Hill 出版社, 1959 年版) 以及 W. Goldschmidt 所著的 *Man's Way* (Holt 出版社, 1959 年版)。另外著名哲学家 K. Jaspers 在他的著作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3 年版)和 *Man in the Modern Age* (Doubleday Anchor 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所表述的观点也值得关注。其他值得关注的观点来自于 W. W. Wagar 所著的 *Building the City of Man* (Grossman 出版社, 1971 年版), 以及 H. Baudet 所著的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en*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三编

欧亚大陆中世纪的文明（公元500—1500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的序幕也是以各种侵略拉开的：古典时期开始时有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中世纪肇始时有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然而，与古典时期不同的是，中世纪每个世纪都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告终；这些侵略遍布欧亚大陆各地区。从7世纪开始，伊斯兰教武士靠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但这还不及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他们占领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部分陆地。

这些大规模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却并不像古典时期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后，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汉民族文化老路上来。在庞大的穆斯林帝国里，土生土长的希腊—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灭绝，反而融会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第8章所述，在这个普遍性的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彻底夷灭。因此，只有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截然不同，它是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的。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具有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发动海外扩张、控制世界海道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应该指出的是，中世纪不同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它不是因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而结束，而是因西方的海上冒险而终止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扩张，标志着人类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帝国和汉朝以后出现的所有情形，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元的双向交流。交流的规模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这种交流进行得非常艰难，但它的存在说明在这个世界上，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互相联系交流的、统一程度远比我们认识到的要高的王国之中。

——小林恩·怀特

第9章　中世纪文明形成欧亚大陆一致性

正如最初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区分开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的多方面影响，促成了最初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4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在这几个世纪中，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更多地得益于政治原因：中世纪初期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既不像古代时期的帝国那样，只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也不像古典时期的帝国那样，仅仅拥有整块的地区，而是横亘数个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则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其国土从西欧的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腹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留下的印象则更加深刻，其版图东起朝鲜、中国，涵盖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帝国。

中世纪形成的几个帝国的疆土是如此空前的辽阔，这使得欧亚大陆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重点叙述由于这种交流而产生的新的商业纽带、技术纽带、宗教纽带和知识纽带的性质。

一、商业纽带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长久存在，促进了跨大陆商业的全面发展。而这两个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得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通过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商道；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商道。其中从中东出发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穆斯林商人多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中有很多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达），然后以此为根据地，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方季风航至广州，在广州度过夏季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耗时一年半。

在首批穆斯林于671年来到广州后，他们中有相当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在得到中国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的许可后，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像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任职。到了758年，穆斯林的人数已经多到足以进攻广州，作为应对这一情况的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外贸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继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北宋（960—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中国已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配置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马可·波罗在他于1291年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搭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引人注目，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中国的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其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图55 宋朝的沿海港口

17世纪制作的皮制壁画，表现了宋朝时期沿海港口的兴盛景象。

中国的航海活动在明朝(1368—1644年)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获得的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明朝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航海地位。这七次远洋航行在其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上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有28 000人参加，用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路抢劫，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的航程更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当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还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见地图13)！

1433年，皇帝突然下诏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的威望，或是为了替明成祖搜捕据称已遁世隐居当和尚

的侄儿建文帝。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趁机开始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又恢复了其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可是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是由于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创建出中国人在短期内就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就建立起了他们主导的西方海上霸权。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政权，其领土包括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的大部分欧亚大陆。14世纪中叶，意大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揭示了蒙古治下和平时期商业的重大意义：

>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走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最糟的时候，如果有60个人在这段路上同行，那也会感到如同呆在家里一样的安全。”[1]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草原上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自动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都是沿着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来到忽必烈新



图56　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

马可·波罗在宫廷中觐见忽必烈汗。

朝廷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他们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通过两条路线被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抵达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先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运到前一条商路最终到达的那些港口。第一条商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负责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坐着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顿河而上，随后可能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可经由波斯湾直接去往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是多么的便宜，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商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从中赚取了多么巨大的利润。

欧亚贸易在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的恢复只是暂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1368 年，建国不到百年的蒙古人就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就此全面崩溃，从而使得中亚再度陷入分裂，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也因此而被中断。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 年)改信伊斯兰教，自然不会再允许欧洲人继续使用去香料原产地的陆上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这使得阿拉伯和威尼斯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因此他们就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避开穆斯林帝国这一障碍的新航道，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二、技术纽带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加速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前阿拉伯人使用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因为它在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由于阿拉伯帆船操纵起来更加灵活，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不久它便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 11 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布地中海海域。尽管这种三角形帆船是由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它在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这一发明也使得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1620 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发展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2]

培根正确地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每页书分别刻在一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典《金刚经》。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1041至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经中东传入欧洲。1423年,欧洲人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欧洲人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古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国就已在用火药制造鞭炮。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使用火药的武器,即"突火枪",它由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却没人知道它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240年,在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地提到了磁石指南针。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仅被用于风水先生的相地活动。不管怎样,1125年,指南针开始被用于航海——这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有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抓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1150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都被取代。事实证明,造纸术的价值十分显著:如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耗费300张羊皮。

此外还有一些中国的发明也传遍了整个欧亚大陆并具有深远影响,如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肩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还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基本上都是经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橘子等,橘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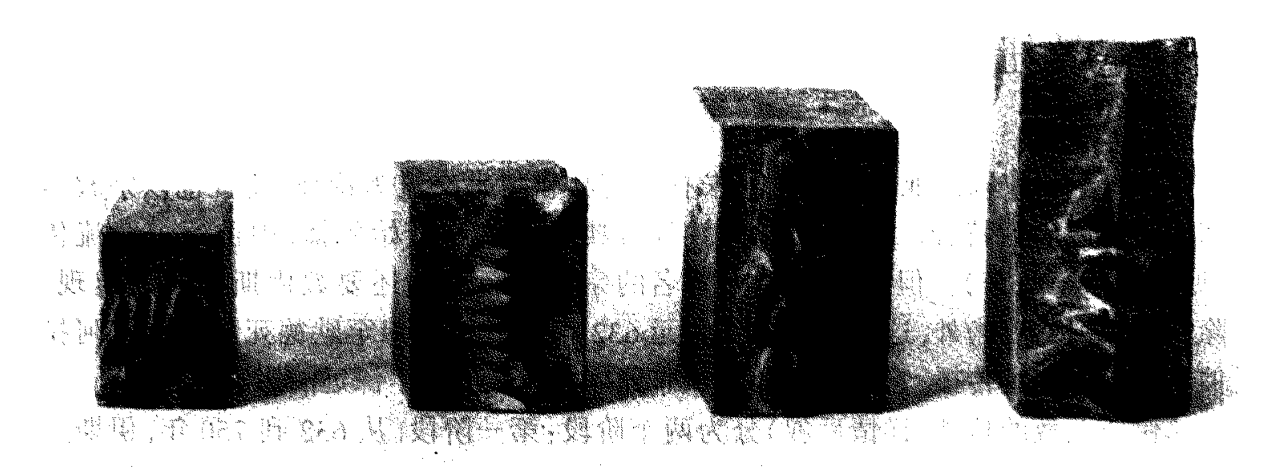


图 57　中国的活字

木制的中国活字:四个活字印模上刻着文字和符号。



图 58　阿拉伯人的手稿

15 世纪阿拉伯人的手稿,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画的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女儿法蒂玛。

三、宗教纽带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基督教和佛教从古典时期末就开始传播，中世纪继续流传(见第四章第三节)。但中世纪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还要数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见下章)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其创始人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它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后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32到750年，伊斯兰教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其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世界的内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急剧扩张自然会使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也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们的心理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固然使他们丧魂落魄，然而正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况也并非一片漆黑，因为蒙古人也给予了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以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们希望能使蒙古异教徒也像以前的马札尔人和维京人那样皈依基督教。

教皇派出了两个传教使团，前往坐落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传教士试图劝说可汗皈依基督教，参加教皇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但是由于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传教团没有达到使可汗改信基督教的目的。然而，他们却首次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蒙古社会风俗和军事战略方面的可靠信息。他们也了解到，从哈拉和林往东走上20天就会到达中国的神秘领土。中国受到欧洲人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它很富庶，也因为它不信奉伊斯兰教，因此被看作反对穆斯林的可能联盟。

由于中国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264年忽必烈从哈拉和林迁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如前所述，最早来到首都的欧洲人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交他给教皇的复信。在这封信中，忽必烈请求教皇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来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仅就提出这一要求就断言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打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网罗人才：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也确实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在各部分人之间保持势力平衡。

四、扩大的视野

蒙古帝国的建立带来了欧洲人认识世界方面的伟大突破，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其影响正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向人们揭示，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可以匹敌，甚至还将超过欧洲。另一方面，这种认识上的突破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让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马可·波罗的新世界

在地中海到中国、再到东南亚这一路线上往返旅行的商人成了中世纪联系欧亚大陆的纽带。以下摘自马可·波罗游记的片段清楚地记述了中世纪人们视野的开阔程度。*

谈到这个城市(大都，或现代北京)的规模，人们一定知道，它方圆24里，每一面长6里……城内共有12个门，每个门上都有一个雄伟而气势磅礴的城楼……街道笔直宽阔，你可以沿着街道从一端看到另一端，也可以透过一个门看到其他的门。整个城市上下，到处都有美丽的宫殿、数目繁多而豪华的客栈，以及大量精美的房屋……

首先让我们谈谈(中国的)船只，这些船载着商人们往返于印度的各小岛之间。它们用杉木制成，只有一个甲板，但却有50或60个船舱，商人们每人一间，悠闲舒适地呆在里面。每艘船只有一个船舵，但有四个桅杆，有时船上还有两个额外的桅杆，人们可以很随意地将它们升起或落下……每艘大船至少需要200个海员(有的船需要300个)。这些船规模巨大，每艘能装载5000到6000篮胡椒。

日本是东部公海上一个很大的岛屿，距陆地1500里。岛上的居民皮肤白皙，文明开化，很有天赋。他们崇拜偶像，不依赖于任何人。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们拥有数不清的金子。

如果从印度尼西亚出发，沿南部到东南部之间的航线航行1500英里，你就会到达一个叫爪哇的大岛。岛上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海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方圆3000多英里。它臣属于一个国王，不向世界上除他以外的任何人纳贡。岛上居民都崇拜偶像。这个岛极其富庶，盛产黑胡椒、肉豆蔻、松香、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各种香料……

当你离开锡兰岛，向西航行大约60英里，你就会到达玛巴省，它号称是印度之都，位于大陆，是印度条件最好的地段……居民都崇拜偶像，很多人崇拜公牛（神牛），认为牛是一种富有美德的生物。他们从不吃牛肉做成的任何东西，也无论如何不会屠宰牛。

* H. Yule编译，*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Scribner's, 1903), vol.1, pp.423—426; vol.2, pp.249—250, 253—254.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殖民；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应聘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1278年，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班·巴尔·索马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对其反对伊斯兰教的援助。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伊斯兰教徒伊本·拔图塔(130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又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被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北上到达西班牙，随后又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到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已至少旅行了75 00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他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去中国时，他也随同前往，并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经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他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像别的石头一样，是从山里挖掘出来的，但却可以像木头一样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去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他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并在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佩戴着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它们修得高于周围地面，以易于排水；在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在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见过的大得多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是如此光怪陆离，以至于显得有些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马可·波罗起了个绰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

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马可·波罗也为同时代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帝国封锁陆上道路之后为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而继续前进。

推荐读物

论及欧亚大陆所有各种互动关系的最重要的著作有 J. Needham 所著的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4 年版)的第一卷; J. H. Bentley 所著的 *Old World Encounters*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93 年版); J.L. Abu-Lughod 所著的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9 年版)。以下著作描述了海上贸易: G.F. Hourani 所著的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1 年版); P.D. Curtin 所著的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4 年版); K.N. Chaudhuri 所著的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5 年版)。Needham 著作的第三部分第四卷阐述了中国人的航海探险精神,包括明代的航海活动。以下书籍对陆上贸易进行了论述: G.F. Hudson 所著的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Beacon 出版社, 1961 年版); P. Yung 所著的 *The Silk Road: Islam's Overland Route to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6 年版)。C.G.F. Simkin 所著的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9 年版) 对欧亚贸易进行了概括的分析。关于技术交流的基本著作是刚刚列举的 Needham 的多卷本研究成果。

以下作品中论及马可·波罗和其他旅行家的经历:R.E. Latham 翻译的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Penguin 出版社, 1958 年版); L. Olschki 所著的 *Marco Polo's Precursors* (Johns Hopkins 出版社, 1943 年版); I. de Rachewiltz 所著的 *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ans* (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1 年版); R. Dunn 所著的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 1986 年版) 一书描述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引人入胜的生活全貌。

注释

1. H. Yule,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I (London, 1914), pp.152, 154.
2.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Book I*, aphorism, p.129.

仇敌从旷野、从令人恐怖的地方袭来，
就像南方刮来的旋风一般席地而过。

——《圣经·以赛亚书》

我把阿拉伯《古兰经》赐予你，好教你警告居住在"城市之母"麦加及其周围的人们；好教你警告他们"末日审判"必将来临。到那天，一些人将永居天堂，而有一些人则将堕入火狱。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

第10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600年至1000年间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出现了，这是欧亚大陆及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穆斯林战士就像大约1000年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通过一系列气势恢弘的扩张和征服，又一次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在7、8世纪，伊斯兰教的大举征服使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信德省，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都统一到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

伊斯兰教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比起他们的军事扩张更为显著。尽管被征服的地区曾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但到11世纪时中东地区的语言已经阿拉伯化，文化也已伊斯兰教化。阿拉伯语成为从波斯到大西洋广大地区的日常用语。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既吸收了前犹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精华，又具有自身独创性的文化综合体。这种语言和文化的转变从此定型，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伊拉克人和摩洛哥人的关系，就像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关系一样，两者在语言和文化上至今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穆罕默德

毫无疑问，穆罕默德是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生于569年，是麦加一位

商人的遗腹子。六岁时母亲即去世,祖母和伯父将他抚养成人。他青少年时期的情况很少为世人所知。传说他12岁时曾随伯父跟随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了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25岁时,穆罕默德同一位富翁的遗孀结婚,两人生了几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但儿子都早夭。

穆罕默德约40岁时有一段时间精神极度紧张,在此期间他开始相信上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有人询问他受诫的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都保存在天国里,他每次只能得到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穆罕默德当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安拉的惟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必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对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对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穆罕默德死后不久,他的教诲被记录成书,成为新起的伊斯兰教的圣典。"伊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没有建立专职的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教徒灵魂的具体圣事,但却要求信徒们遵从一定的仪式,即伊斯兰教"五功"。它们是:

(1) 念功:信徒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2) 拜功:信徒应每天做5次礼拜,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个时间内举行。信众脱掉鞋子,跪在一张毯子上,头叩地,面朝麦加方向祈祷。

(3) 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一种虔诚的行为。

(4) 斋功:穆斯林必须在每年十月,每天从日出到日落间,斋戒禁食。

(5) 朝功:穆斯林一生只要条件允许就应争取朝觐麦加一次。

这"五功"极大地加强了信徒们的社会团结。他们一起祈祷、斋戒,一起为遭受不幸的兄弟们提供帮助;不论富人或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还是黑人,他们都一起到麦加去朝觐。不仅如此,《古兰经》还对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争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它不仅为信徒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与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伊斯兰教世界也并不严格区分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以及世俗和教会。在伊斯兰教中,凡属于哈里发的就是安拉的,而属于安拉的也就是哈里发的。"沙里亚",即圣典,直到近代仍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国法,至今在个别国家里它仍是主要的法律。

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人们皈依伊斯兰教教义。首先是他的直系亲属和私人朋友,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先知的同伴",享有崇高的威望。当穆罕默德发展出这一小股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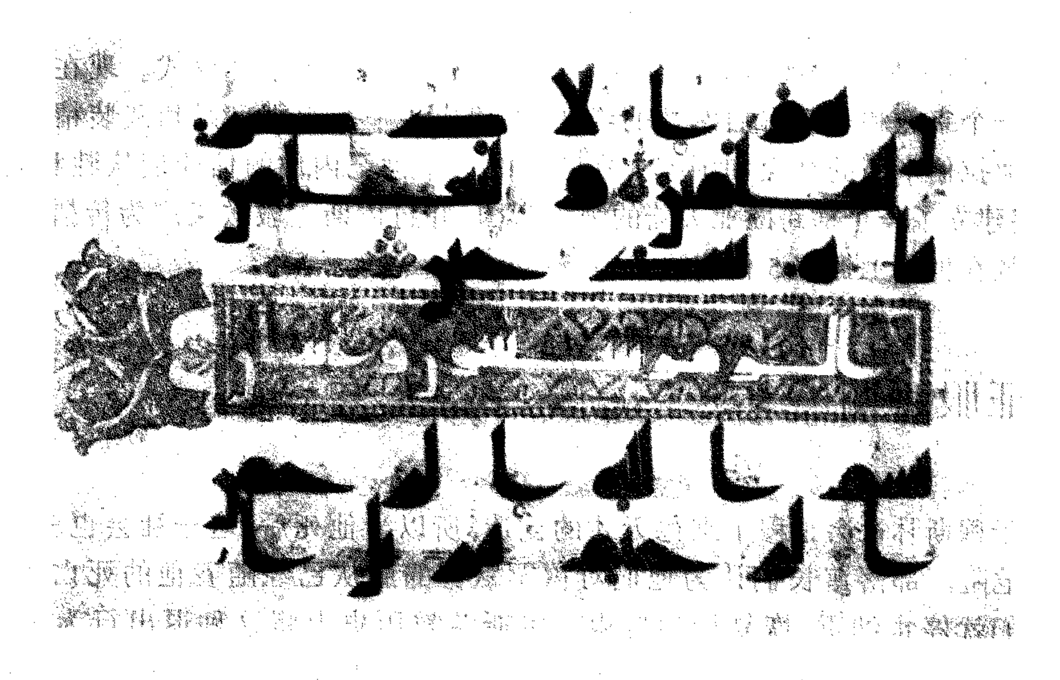


图59 阿拉伯文字

公元8或9世纪用库法字体书写的《古兰经》的一页(23.8厘米×35.5厘米)。由于穆斯林厌恶图像，书法很早就变成了伊斯兰艺术的一种主要形式。阿拉伯文手稿的发展主要是为了使《古兰经》文本尽可能地做到精确，相应地书法艺术也就随着这一过程而同步发展。这种横向拉长的库法字体是阿拉伯文书法的最早形式，它在其产生后的三个世纪中在书写《古兰经》时一直占有统治地位。

依者，麦加的富商开始感到惊恐，他们害怕穆罕默德的教义将会削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对麦加圣物"黑石"的礼拜。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即麦加以北约300英里处的商路上的一座绿洲城市。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在这里穆罕默德被当作仲裁者受到欢迎。622年，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阿拉伯人称这一事件为"希吉拉"，伊斯兰教历则以这一年为纪元元年。

由于伊斯兰教教义主要源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穆罕默德希望麦地那的犹太人能将他当作犹太教先知的继承者并欢迎他，但麦地那犹太人却嘲弄了他。于是穆罕默德也就转而反对这些犹太人，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信徒。从此，伊斯兰教开始具有更加鲜明的阿拉伯民族的色彩，麦加取代耶路撒冷成为穆斯林必须朝拜的地方。穆罕默德逐渐说服了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并以他的教义为基础建起了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此后，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不断袭击麦加商队。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普遍接受的一种经济活动。如今，他们聚集在"先知"的旗帜下，既能获得战利品，又能顺便得到灵魂的拯救。到630年时，穆斯林已经强大到完全有能力占领麦加，因而穆罕默德就将收藏在麦加天房克尔白里的黑石定为伊斯兰教的朝拜圣物。然后他与麦加商人达成了和解，以此维护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

都已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过去，穆罕默德发现国家内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偶像崇拜仪式。现在，他将其统一为一个宗教和一部有启发性的经典，并建成了一个组织良好和武装精良、统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和国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内他的信徒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并将伊斯兰教教义广为传播。如今，这一宗教在世界上拥有5亿信徒。

二、征服时期

由于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创造，所以当他死后，这一社会也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部落酋长们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经随着他的死亡而完结。于是他们就停止纳贡，恢复行动自由。伊斯兰教历史上将这种退出行为称为“变节”，即叛教。叛教引起了一系列战争，最终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们回归伊斯兰教社会。但是被征服的部落成员心怀不满，显然一有机会他们就还会叛离。穆斯林的领导者意识到，应该转移他们要求叛教的注意力，而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发动一些能为每个贝都因人带来其喜爱的战利品的对外袭击。因此，这种袭击起初并不是宣传教义的宗教战争。穆罕默德并没想到伊斯兰教会成为世界性信仰，也不认为上帝曾选派他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传教，所以阿拉伯人发动袭击正是为了让骚乱的贝都因人一心忠于麦地那。

领导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的作用是作为先知的世俗代理。当然，哈里发不可能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但是作为伊斯兰教社会的世俗首领，他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伊斯兰教的世俗保护者，而不是宗教领袖。正是在艾卜伯克尔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被迫重新回到信徒行列，同时阿拉伯人也开始了他们最早的对外侵略。

634年，欧麦尔继艾卜伯克尔之后当选哈里发，在他的领导下早期的对外侵略发展成了正式的征服战争。之所以会有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貌似强大的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久便暴露出其外强中干的实质。这两个帝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削弱了它们各自的实力，而它们的人民对繁重的捐税和宗教迫害也极为不满。此外，当整个部落被有关财富的迷人传说所鼓动从阿拉伯半岛各地向北迁移时，穆斯林军队也就由小股游击队变成了大规模的武装部队，任何想让他们返回贫瘠家园的企图都将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变节”。结果，穆斯林首领只好因势利导，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亚。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征服表明，这一战争的性质并非是伊斯兰教的侵略，而是阿拉伯部落的扩张。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这些扩张多次向北进入“肥沃新月”地带。那时这一扩张之所以能够达到空前的规模，部分是由于两个对手异常虚弱，部分是因为新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促成的团结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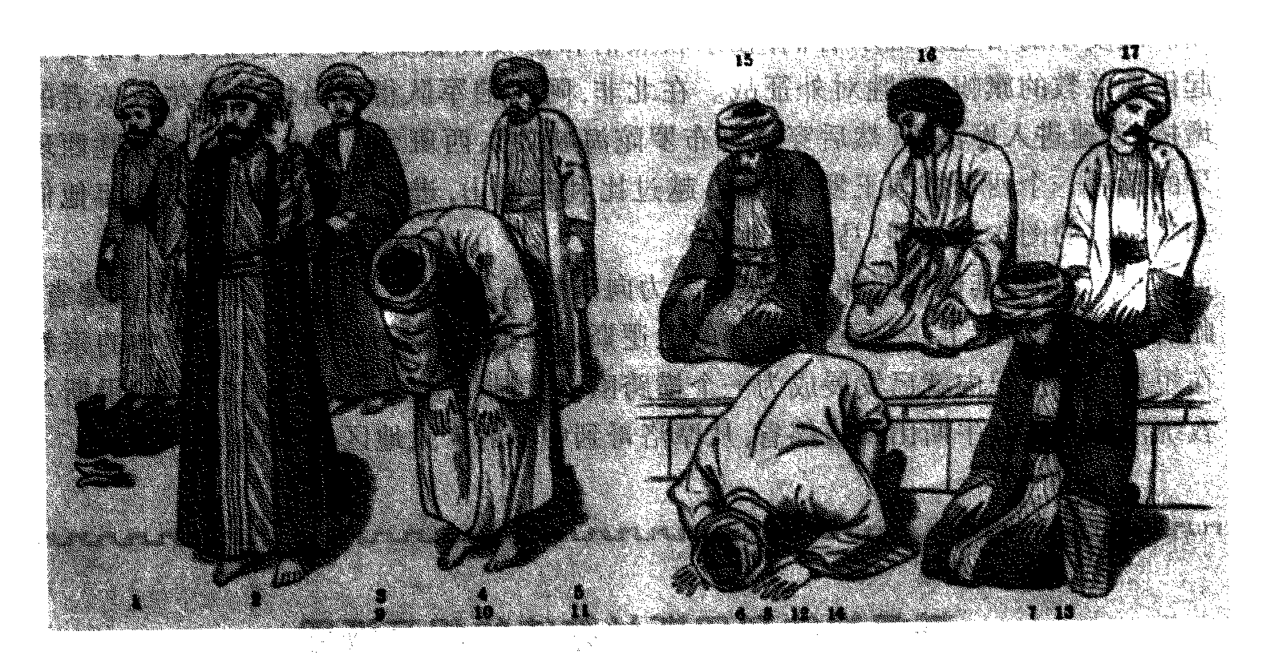


图 60　朝拜仪式

阿拉伯人朝拜或祈祷的仪式。这些插图表现了穆斯林每天必须进行五次朝拜仪式的顺序。每个位置和动作都配有不同的引自《古兰经》的称赞语或祈祷语，并要背诵《古兰经》的词语。这一仪式表明了穆斯林对安拉的绝对服从，并且承认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他是永恒的、万能的宇宙之王。

一旦侵略开始，阿拉伯人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像拜占廷人和波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既可以随意发动进攻，而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中的安全地带。正如后来的维京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欧洲沿海一样，这时的阿拉伯人则利用他们的"沙漠之舟"进攻富庶的帝国。无怪乎阿拉伯人在被征服的省份里都选择沙漠边缘的城市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如果有地理位置合适的现成的城市，如大马士革，他们也会加以利用，在当地驻守；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建立新的城市，如伊拉克的库费和巴士拉，埃及的伏斯泰特。这些军事重镇满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国的需要，就像后来的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新加坡满足了不列颠海上帝国的需要那样。

636 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谷决定性地击败了拜占廷人。他们乘着遮天蔽日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由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教徒组成的混合部队。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士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随即转入进攻富裕的邻邦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经部分地皈依基督教，他们对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很是不满。在阿拉伯人于 637 年夏天在卡迪西亚取得的伟大胜利中，这种不满情绪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波斯皇帝被迫仓皇撤出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他们此前闻所未闻的财富，也使来自南部沙漠的大批贝都因人前来加盟，队伍进一步壮大。阿拉伯军队对他国的边境造成了势不可挡的压力，他们如洪流滚滚向前，向西进入埃及，向东进入波

斯。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族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班牙。711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然而,732年他们却在法国的图尔被查理·马特打败。

与此同时,其他穆斯林势力也在大力向东扩张,并进入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此后,他们继续北上,一直到达中亚的怛逻斯。至此,这样一个源起于沙漠中的宗教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就已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750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省,从摩洛哥到中亚的广大地区(见地图15)。

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相互诋毁

在中世纪,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在欧洲、中东和海外的战场上相互厮杀,而且互相蔑视。以下两段论述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第一段论述出自一个来自西班牙托莱多市的穆斯林法官之口。他将北欧人置于民族排序的最底层。* 第二段则是一个基督教主教的论述,他表达了西方世界对穆斯林道德堕落的共同看法。**

赛义德·安德鲁斯(Sa' id-Andalusi)法官说,这个排序中的其余民族对科学发展没有起到任何促进作用,它们与其说是人类,还不如说是动物。那些居住在极北地带的人与太阳相距甚远,这造成了当地气候寒冷,空气凝重,人因此也变得性情冷酷,言语粗俗。结果,他们长得体形庞大,脸色苍白,还留着长头发。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缺乏智力和洞察力上的敏锐性,处处显示出无知和愚昧。荒唐和盲目在人群中盛行,就像在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邻近民族中盛行一样。

萨坦尼亚(Sultaniyah)的主教威廉·亚当曾说:在穆斯林教派中,任何性行为不仅不被禁止,反而被允许和赞扬。于是,在他们当中既有无数的妓女,也有许多男宠,他们剃光了胡须,脸上涂满了脂粉,手腕和脚踝上戴着镯子……而丧尽了廉耻的穆斯林却无耻地被这些男宠所吸引,并且公然和他们住在一起,就像我们社会中的夫妻一样地公然生活在一起。

* 见 *Islam and the West* by P. K. Hitti © 1962 by Litto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c.

** 见 N. Daniel, *Islam and the Wes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0), 第144页。

三、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帝国

在完成第一阶段的扩张之后,阿拉伯人便暂时安顿下来,享受他们的胜利果实。他们实际上是其属国的占领军,大多数都居住在军事重镇里,以此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哈里发欧麦尔曾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因此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其中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税要高于向穆斯林征收的。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更多的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实际上,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统治者欢迎,因为这意味着减免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其实是统治绝大多数属国臣民的阿拉伯骑士贵族享有的特权。

不久,日益增长的"麦瓦利",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新教徒成群结队地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满足阿拉伯贵族的需要服务。同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却未得到承认。尽管"麦瓦利"也在伊斯兰教军队中服役,但他们通常只能作为步兵参战,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战利品要低于阿拉伯骑兵。

随着伊斯兰帝国的扩张,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麦瓦利"的人数和财富也在不断增长,但他们却仍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也就成了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社会地位。人们开始有充分理由认为,阿拉伯伍麦叶哈里发王朝是征服战争完成后百无一用的一个寄生集团;伍麦叶王朝曾于661年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因此,对阿拉伯贵族的抵抗运动,是一场既有民族性、又具社会性的反抗运动。

750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了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的结束。该王朝的建立远非普通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它意味着"麦瓦利",尤其是波斯人,此后代替了腐朽的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它已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麦瓦利"的控制下,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加入市民和农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则重新过起了游牧生活。

阿拉伯帝国的结构也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尤其是762年从大马士革往东迁都巴格达,而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这实际上意味着,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转而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长,而是一个享有神权的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他的权力并不来源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备军的基础上。

因此,同前泰西封、波斯波利斯和巴比伦的许多君主政体相类似,哈里发统治也已成为东方的君主政体。在这一君主政体所提供的秩序与保护下,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

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伊斯兰教不再仅仅是上层骑士贵族的法典，而成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文明。

四、伊斯兰教文明

哈里发曼苏尔在选定巴格达作为其王朝的首都时，阐述了这一选择的美好前景：

> "这个东濒底格里斯河、西临幼发拉底河的岛屿城市，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沿底格里斯河溯流而上的所有船只都将在这里停泊；顺底格里斯河而下，以及经幼发拉底河运来的货物，也将停卸于此。这里将是山区、伊斯法罕和霍拉桑等地区居民的交通要道。感谢安拉为我创造了这块地方，并使在我之前来到这里的人们忽视了它的价值。真主啊，我要在这里建筑城市，并终生居住在这里，我的子孙也将居住在此地。我坚信，它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1]

曼苏尔的预想很快就得到了全面实现。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就达到近100万。城市的中心是一座直径约两英里的城堡，里边建有哈里发的宫廷、官员们的官邸和禁卫军的营房。该城堡外围建立了巨大的商业中心，由富饶的两河流域地区提供城市所必需的充裕的产品。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各行省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如产自兴都库什山脉的白银，采自努比亚和苏丹的黄金，来自伊斯法罕的铜以及来自波斯、中亚和西西里岛的铁。阿拉伯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都蕴藏着宝石，波斯湾水域还盛产珍珠。帝国的工业也很繁荣，按从事生产的人数和产值比较，纺织业最为重要。从中国战俘身上学到的造纸技术，迅速传遍伊斯兰教世界，并于900年传入西班牙。

这样繁荣的经济区遍布辽阔的阿拔斯帝国，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跨地区的贸易。如上一章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陆路经过中亚，或从水路同印度、锡兰、东南亚和中国通商。他们还与非洲进行着广泛的贸易，以此获得黄金、象牙、乌木和奴隶。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发现的大批铸于7至11世纪的穆斯林硬币，证实了穆斯林商人当时曾同北欧国家有过贸易往来。如此辽阔的贸易范围促进了银行业的高速发展，到后来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在巴格达开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得到兑现。

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证，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786—809）。他是一个有文化素养的统治者，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常见的室内游戏是下象棋、投骰子和玩十五子棋；室外运动主要有打猎、放鹰、马球、射

箭、击剑、掷标枪和骑术比赛等。哈伦与查理曼大帝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各自的首都,巴格达和艾克斯拉沙佩勒在繁华程度上简直无法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巴格达无法同巴黎相比一样,不过当时两者的位次正好与现在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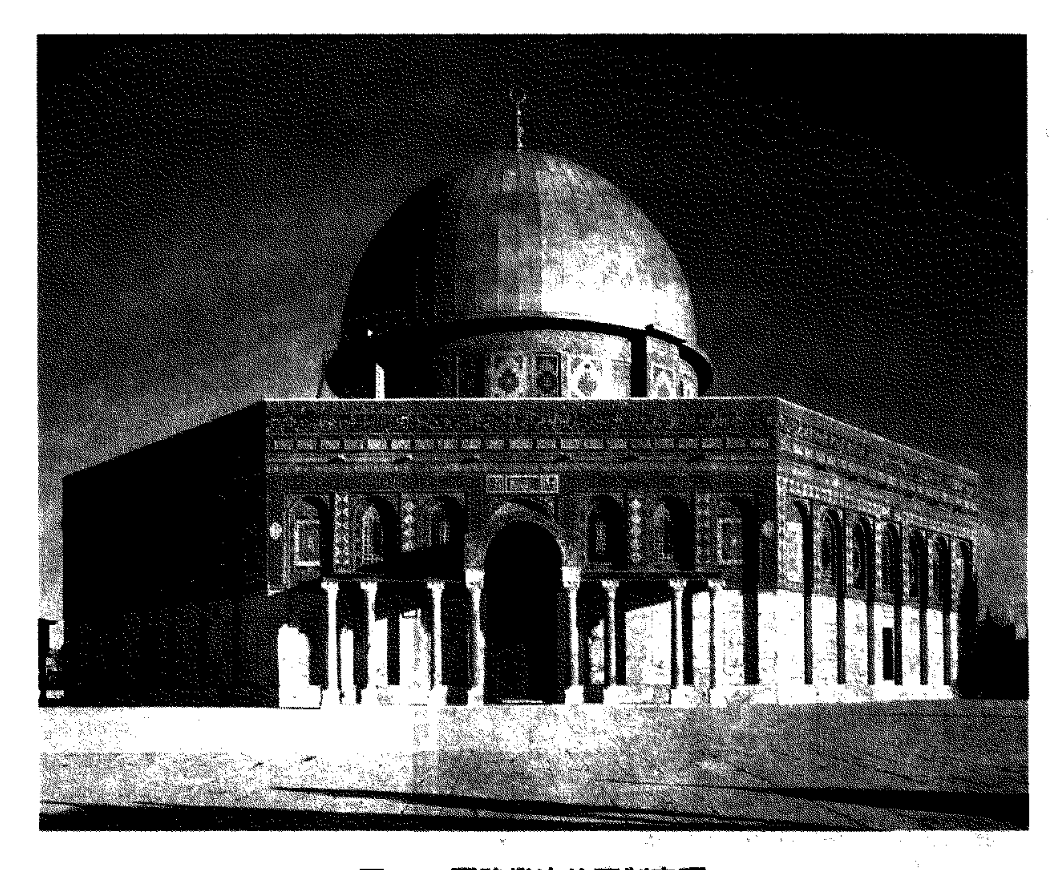


图 61　耶路撒冷的石制穹顶

位于耶路撒冷的石制穹顶。它是早期伊斯兰建筑(但不是清真寺)的范例,始建于公元 7 世纪第一轮阿拉伯扩张浪潮时。它建在一块岩石之上,穆斯林认为那块岩石是穆罕默德的升天之处,而犹太人认为它是亚伯拉罕准备牺牲以赛亚之处。

阿拔斯王朝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于世,而且以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较为自由而闻名,很明显这种自由在当时的西方是绝对没有的。这部分是因为伊斯兰教教义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是《圣经》的信徒,就像穆斯林是《古兰经》的信徒一样;并承认两种宗教都有一部圣典,即成文的启示书。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信仰被承认是真实的,不过还不完整,因为穆罕默德已代替了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尽管宽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却对他们进行了某些限制和处罚。

阿拔斯王朝还因科学领域的显著成就而享有盛名。但是,该王朝在科学方面的主要特色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比鲁尼(973—1048)曾说过:"我们应限于从事古人所从事的事业,完善可以完善的东西。"[2] 然而,帝国的庞大规模,它同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实际联系,以及它从其他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都有助于伊斯兰教科学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例

如,自称为"智慧之城"的巴格达,就拥有一批翻译、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那里的学者们翻译并研究了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

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基本上接受了前希腊人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阿拉伯天文学家们毫不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900年的天文记录,为他们发现重大天文理论提供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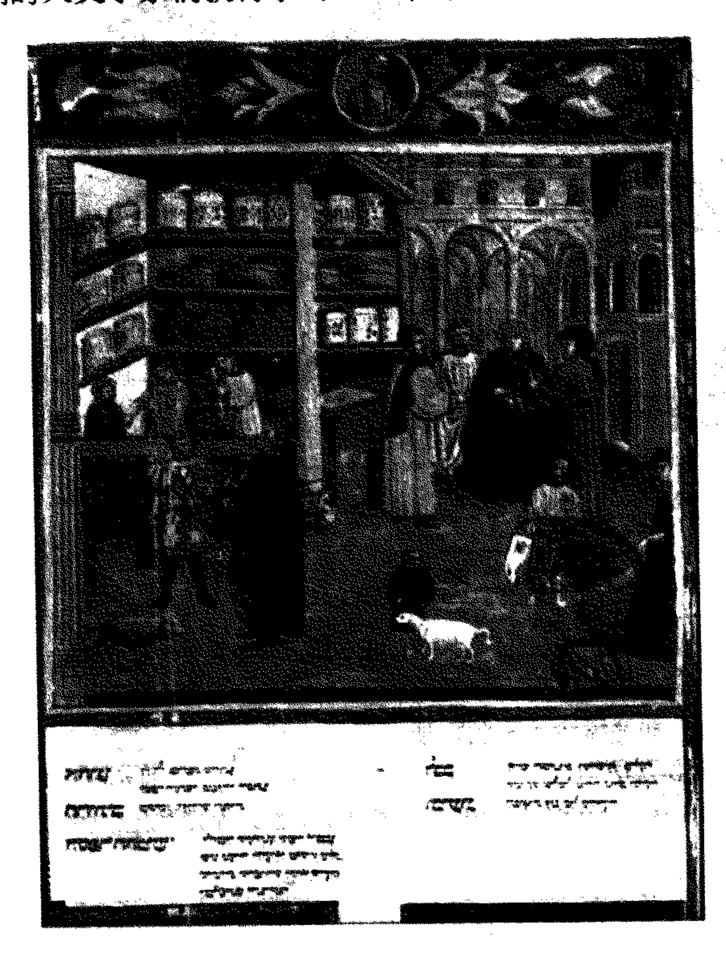


图62 14世纪的手稿

14世纪的手稿,表现的是阿维森纳和学者们。这一页摘自阿维森纳的著作《医典》,现存于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

与在天文学方面一样,穆斯林在地理学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理论上的成就。但庞大的帝国疆土、广泛的贸易范围,也使他们积累了一些有关欧亚大陆的系统、可靠的地理资料。例如,比鲁尼关于印度的名著,不仅描写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且描写了印度人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科学成就。在这一点上,直到18世纪才有人能与他比肩。穆斯林还绘制了航海图和地图。不过就像当时的基督教制图者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一样,穆斯林所绘制的图中自然以麦加为中心。

除去自身创造的成就外,穆斯林还在翻译和改编古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伍麦叶哈里发不信任任何非阿拉伯人,对他们的文明也不感兴趣。阿拔斯哈里发则不同。他们因为曾得到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有力支持,因而其气量也显得更为宽宏。"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

的翻译家侯赛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就是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并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多著作,包括希波克拉底、加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另一大翻译中心在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莱多市。12、13 世纪,居住在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这种翻译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后来的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翻译活动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学术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图 63 迪奥斯科里斯手稿

迪奥斯科里斯手稿的一页:咳嗽药的配方和一位正在配制此药的医生。阿拉伯人对医学界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大批药品从这里通过意大利船只运往欧洲。

最后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是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这两条基本纽带将哈里发统治下的各民族联结到了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效果更为显著。到 11 世纪时,阿拉伯语已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米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流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所有人共同使用阿拉伯语这一现象说明,在阿拉伯帝国内,尽管有苏丹黑人以及占优势的闪米特人,有基督教黎巴嫩人、科普特埃及人以及占优势的穆斯林等不同民族,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彼此认同的情感。甚至在这片已经永久阿拉伯化的辽阔地区之外,阿拉伯语对其他穆斯林民族的语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词汇在这些语言中,就如同希腊和拉丁语汇在英语中被普遍使用一样;其中有些语言(如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和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的土耳其语)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

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的纽带，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生活方式。如同语言为阿拉伯世界打下基础一样，宗教信仰也为伊斯兰教文明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文明在穆斯林征服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阿拉伯宗教的成分，并融入了希腊—罗马、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行政、文化和科学各成分的综合体。因此，它不是古代各种文化的一种简单拼凑，而是已有文明的崭新融合，它已成为一种新兴而独具特色的文明。虽然它的来源不一，但它却明显地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特征。

五、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在哈伦·赖世德哈里发统治时期，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但随即它便衰落下去，其情景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帝国疆域过于广阔，这在用马和船只作交通工具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边远省份远离首都达3000英里，首都难于遥控。因此，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0年就顺势先后摆脱了帝国的统治。

其次，和罗马帝国一样，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而且没有保证。巴格达朝廷的极度奢侈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浩大开支，超过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由此导致的财政危机迫使哈里发委派各省总督充当当地税务的包收者。这些总督用他们征来的税收支付地方军队和官员的薪俸，并向国库交纳指定的款额。这一情况使得总督兼包税人不久便和军事将领达成协议，两者一起成为各省的实际统治者。到9世纪中叶哈里发已失去其对军事和行政的控制，并逐渐被土耳其雇佣军随意废立。

帝国的衰弱自然招致了蛮族的入侵。正如罗马帝国遭到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蛮族侵略一样，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受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敌人的进攻。十字军由北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利亚，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也为十字军的入侵提供了便利。在西西里岛，在当地王朝于1040年灭亡后紧跟着就爆发了一场内战，而这也给了诺曼底人从意大利南部入侵该岛以可乘之机。到1091年整个西西里岛都被征服，混杂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也都全部被归于诺曼底国王的统治之下。

在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也于1031年被推翻，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由各“党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进行统治。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当地前穆斯林伊比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又被称为“欧洲奴隶”。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得北部基督教国家得以向南扩张，1085年他们占领了重要城市托莱多。

到 13 世纪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

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就此永远失陷于基督教国家,但叙利亚的情况则与之相反。这里的几个穆斯林国家自相残杀的内讧,使十字军从 1096 年起得以迅速向前推进,抵达叙利亚海岸,进入巴勒斯坦,并建立了四个国家:埃泽萨伯国(1098 年)、安条克公国(1098 年)、耶路撒冷王国(1099 年)和特里波利伯国(1109 年)。这些国家都采纳了西方的封建制度,由于它们缺乏根基,因而从未将其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同化,它们往往要依靠欧洲零星到达的援兵的支持才能维持统治。而且,这些国家都位于沿海地区,很容易遭受来自内地的有组织的穆斯林抵抗运动的袭击。但只要周围的穆斯林世界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国家就能生存下去。萨拉赫丁,即西方人所称的萨拉丁,结束了穆斯林的这种分裂状态。他统一了穆斯林叙利亚和埃及,包围了十字军公国,并于 1187 年开始反攻。在 1193 年他逝世以前,穆斯林已收复了耶路撒冷,并把西方人从所有地区驱逐出去,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在随后一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也被攻陷,穆斯林的第二次征服也由此宣告完成。

除了北面遭到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这两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进攻。这些部落席卷利比亚和突尼斯,到处劫掠破坏。正是这一入侵,而不是 7 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摧毁了北非文明。

最后,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侵袭区域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范围及其影响,完全可以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征服相匹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许多突厥人和蒙古人在皈依了伊斯兰教后又将他们的信仰扩展到了遥远的新占领地区。下章将分析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过程及意义。

推荐读物

以下研究成果记述了穆罕默德及其创造的教义:T. Andrae 所著的 *Mohammed* (Scribner's 出版社, 1936 年版); E. Dermenghem 所著的 *The Life of Mahomet* (Dial 出版社, 1930 年版); H.A.R. Gibb 所著的 *Mohammedanism: An Historical Survey*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3 年版); 以及 M.M. Pickthall 所著的 *Koran* (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社, 1953 年版)翻译本的简易版。

有关阿拉伯人及其全史的权威性描述,见于 A. Hourani 所著的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91 年版); P. Hittin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Arab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第五版,(St. Martin's 出版社, 1951 年版); B. Lewis 所著的 *The Arabs in History*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出版社, 1966 年版)。关于阿拉伯人的征服和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参见 M.A. Shaban 所著

的 *Islamic History* A.D. 600—750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2 年版); F. M. Donner 所著的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1 年版)。在最初的征服后,伊斯兰教通过不露声色的传教继续扩张,以下书籍描述了这一过程:T.W. Arnold 所著的 *The Preaching of Islam: A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Muslim Faith* (Constable 出版社, 1913 年版)。

以下著作对伊斯兰文明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T. Arnold 和 A. Guillaume 主编的 *The Legacy of Islam* (Clarendon 出版社, 1931 年版); W. Montgomery Watt 和 P. Cachia 所著的 *A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Doubleday 出版社, 1967 年版); A.G. Chejne 所著的 *The Arabs*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9 年版); A. Lewis 主编的 *The Islamic World and the West*, 622—1492 A.D. (Wiley 出版社, 1970 年版)。

注释

1. 引自 B. 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50), p.82.
2. 引自 A. Mieli, *La Science Arabe* (Brill, 1939), p.376.

在世界走入末日和毁灭之前，人类不可能看到比歌革和玛各之战更惨烈的灾难……。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丝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剖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

（穆斯林历史学家，1160—1233年）

第11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入侵

公元1000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变化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其辽阔的原居住地中亚的崛起。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成就是，他们合力改变了游牧民族和文明民族之间的传统关系。几千年来，游牧民们一直居住在文明地区的外围地带，贪婪地艳羡着文明民族的繁华。但是，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这种传统的平衡状态发生了急剧变化，游牧民族成了欧亚大陆的主人和统一者，而不再只是草原上的动物饲养者。

在这几个世纪中，突厥人和蒙古人耀武扬威，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这些令人震惊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是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充当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给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注入了活力和侵略能力，并通过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在第二阶段，即13世纪，蒙古人开始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00—1500年）是蒙古帝国的崩溃。这为突厥人的复兴和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逐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意义。

一、突厥人的入侵

突厥人不是同一种族,但他们因都说突厥语系的某种语言而被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从种族上看突厥人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的体貌特征却更像高加索种人,而不像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草原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强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与此同时,如同以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参加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作为机动灵活的骑兵射手,他们很快就表现出其过人的军事素质,从而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雇佣军一样,反客为主。他们在巴格达废立帝国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越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0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得到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已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是在1071年,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获全胜,并俘虏了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该战役是中东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小亚细亚的农民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欣慰地欢迎突厥人的到来。从此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相继在11至13世纪之间,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而拜占廷则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在失去这些地区之后,君士坦丁堡就像一个架在枯瘦躯体上的大脑袋。所以,它的衰亡虽发生在1453年,但其衰亡的原因却可以追溯到1071年。

在塞尔柱人向西进入小亚细亚时,其他突厥人也在南部向着巨大的宝库印度扩张进军。其中以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最为著名,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保留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衷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印度教的偶像,因而被人称为“偶像破坏者”。在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的鼓动下,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另外,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社会冲突问题，即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也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

来自阿富汗的其他突厥入侵者也跟随马哈茂德的脚步而来。他们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 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首都。在这次入侵中，印度的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至于佛教从此再也没能在其发源地上得到恢复。

突厥人之所以能够毫不费力地在一个人口远远超过他们的国家里扎根下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人还在使用着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 1500 年前印度人使用的、不足以击败亚历山大的战术一样，根本不适应当时的需要。印度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也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在这种制度下，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欢迎入侵者的到来，皈依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曾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史上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像前突厥人苏丹那样驻扎在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的征服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遥远的蒙古开始他的征服生涯。他发起的征服最终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成吉思汗（也可以拼成 Chinggis, Chingis, Jenghiz 等），原名铁木真，生于 1167 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 12 岁时父亲中毒身亡，因此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的复杂艺术，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够扭转其早年地位低下的逆境，并在转而反对他的首领和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统一了所有讲蒙古语的部落。1206 年，在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至此，成吉思汗的地位已经足以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来自于胜利：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论野蛮和劫掠，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最终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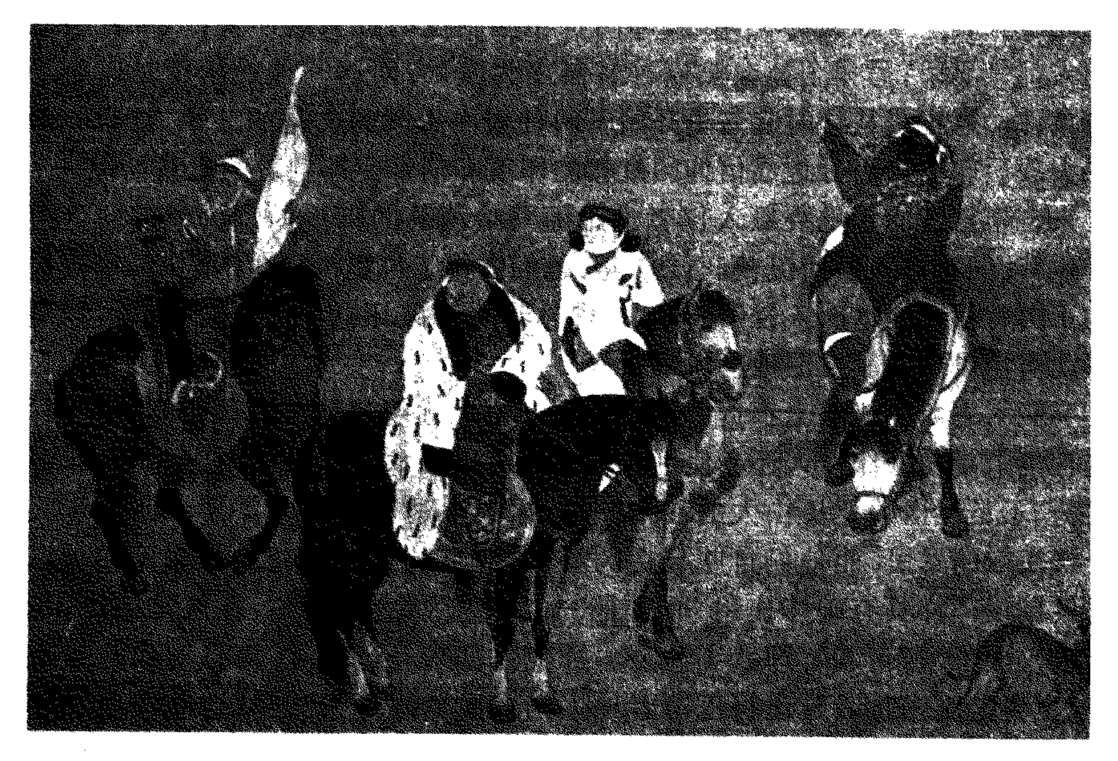


图64 成吉思汗狩猎图

15世纪中国的绘画,表现了成吉思汗狩猎的场景。

吉思汗没有其他游牧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 000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首先注意充分开发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相结合。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与进餐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充气之后又能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依靠农村获得给养,然而如有必要他们也会喝马血、马奶。从小即能娴熟运用的打猎技术使得他们能够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使用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诱使敌人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比较常用的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使人误认为是大部队在行军。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所用的穿甲箭能在600英尺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骑兵们能在骑马飞奔时连续射出其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会有一支带挂钩的长矛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在漫长的严冬里它们没有避寒之所,也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料。这使得它们虽然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成吉思汗还为军队引进了

新的技能和装备来增强自身力量，它们绝大多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并为其无可匹敌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这种武器必不可少。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会尽量收集有关敌方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并派间谍在敌后方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恐惧畏战。在战斗中，他们则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斗志：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如果稍遇抵抗他们就会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若是处在汉朝或唐朝，统一强大的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遏制他。然而 13 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北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绿洲城市之上的喀拉汗国；再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剌子模，继续往西就是建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 至 1209 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其附庸国。1211 年他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并进而于 1213 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 1215 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掌握了攻城技巧的中国人和掌握了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知识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其总战略，成吉思汗此时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在其凌厉的攻势下，1216 年满洲沦陷，1218 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国灭亡。在征服了上述地区之后，成吉思汗已经接近了花剌子模边境，并于 1219 至 1221 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才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为西夏起而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征服，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战功，不久以后，他即于 1227 年去世了。遵其遗嘱，他被埋葬在他生前选择的家乡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其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见地图 16)。

三、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窝阔台在位期间(1229—1241 年)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 5000 英里的中国和欧洲进行征战。在中国，1234 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 45 年，最终南宋亡国。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 15 万进攻欧洲西部。1237 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的重要性远不及现在的城市莫斯科。到 1238 年 3 月拔都已逼近波

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由于担心春雪可能会将骑兵困在泥泞中，他又突然撤兵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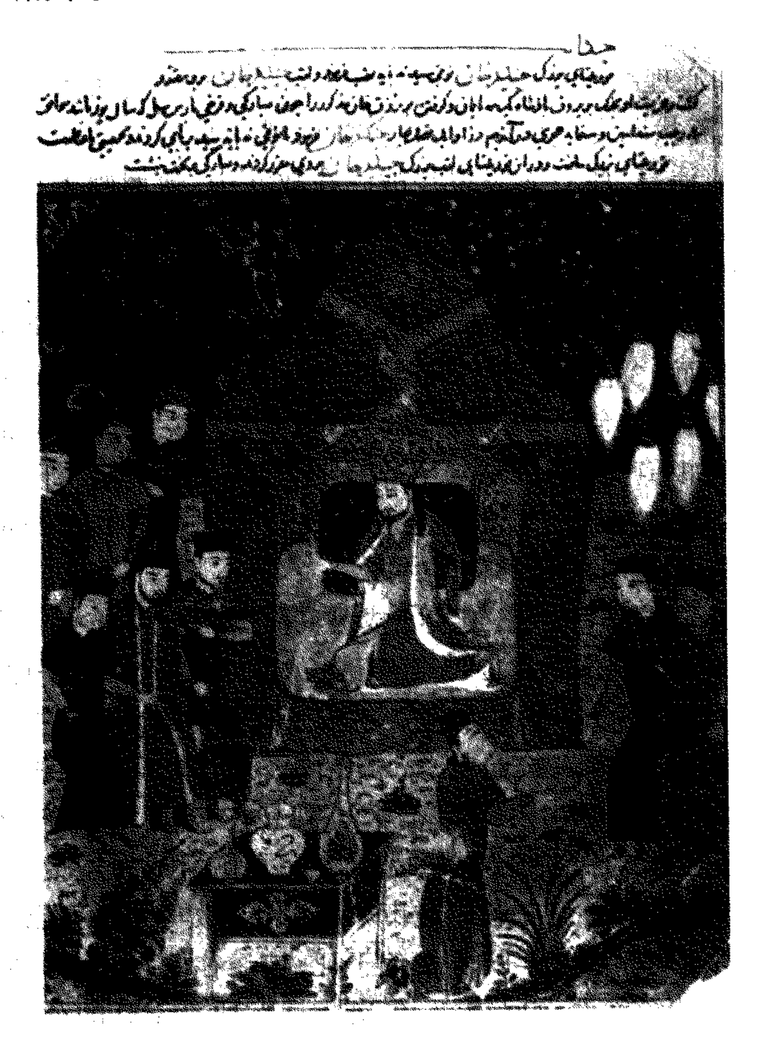


图65　成吉思汗的朝廷

13世纪波斯人所著的蒙古历史书中的插图：成吉思汗的朝廷。成吉思汗坐在王位上，他的三个儿子站在左边。其中一个儿子窝阔台于1229年继承了其父的王位。

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其高加索根据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并于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而且生不如死，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里亚海到日本海之间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年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并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呈金色，故被名为金帐汗国。

窝阔台的继承者决定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并推翻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在中国，蒙古人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时断时续地持续了数十年。1277年，蒙古军队占领南方大港广州。新大汗忽必烈将帝国首都从蒙古草原上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尔后他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

和日本。

与此同时，其他的蒙古军队则在中东横行践踏。1258 年，蒙古军队占领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被送往忽必烈的朝廷外，该城的 80 万居民被屠杀殆尽。粗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征服整个穆斯林世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埃及马木留克军队却于 1260 年在巴勒斯坦大败蒙古人。这次失败标志着蒙古帝国在中东开始由军事胜利走向衰败，就像其在日本和爪哇的类似失利标志着它在远东的衰败一样。由于不能够继续扩张，蒙古帝国便迅速瓦解，其瓦解有如其建立一样的迅速。

四、蒙古帝国的衰落

蒙古衰落的首要原因在于人口上的劣势：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并且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不懂亚里士多德和代数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居住在被征服地区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仰为其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在文化上远没有阿拉伯人先进，因而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而且蒙古人还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告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汗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大都的决定恰好反映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他也必将演化成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际权力仅限于中国。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最初，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控制着突厥斯坦的堂弟海都也与他争位，从而引发了长达 40 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

在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定都大不里士，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蒙古大汗)。1295 年，旭烈兀的继承者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当地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是，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就只有蒙古草原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他们接受佛教的影响，并由此湮没无闻。

马可·波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即便是为伟大的忽必烈汗服务，他也预见到了蒙古的衰落。在对他的旅行所做的叙述中，马可·波罗对蒙古人被其所征服的臣民所同化的情形作了以下重要的分析：

"我所告诉你们的一切有关真正的鞑靼人(蒙古人)的行为和习俗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也必须提出,现在他们已经极大地退化了;因为他们中居住在中国的人已经采纳了这个国家的偶像崇拜仪式,而荒废了自己的制度;而那些居住在黎凡特的人则接受了撒拉森人的风俗。"[1]

五、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所有显要的位置,就如同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占据高位一样。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他为塔米兰。他于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帖木儿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边境;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的崩溃还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和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压的消除,印度突厥人开始向南扩张,沿半岛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得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但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致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于16世纪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就是这样分裂成一盘散沙。

此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侵占拜占廷王朝的领土的情况下,使得伊斯兰教的疆土在中东不断得到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最初是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并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隔开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不到50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宣布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而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一个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进行征服的第一步就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

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这一征服于1340年宣告完成。接着，奥斯曼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欧洲，并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起一个要塞。他们进军欧洲的时机选择得非常精当。这时，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内讧与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征战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而且西方基督教国家也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有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之心，也无其力；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也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扫清了道路，事实上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在1362年占领阿得里安堡和1384年夺取索菲亚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却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此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不过帖木儿的统治也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帖木儿的去世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并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其统治长达1000年的拜占廷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了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详情见第12章第4节)。

六、突厥人和蒙古人入侵的意义

公元1000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入侵活动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其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起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其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其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也正由欧亚大陆核心区向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通过两大中心稳步地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并使得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在这里蓬勃兴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来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与非洲等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一样，这里的人民很愿意皈依伊斯兰教，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所有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须反复念诵“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句话即可。新增加的伊斯兰教仪式，通常都会接受并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此，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们默默无闻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当地的习俗，同当地的妇女通婚，从而改变他们的新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已经向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

就像大家可以想见的那样,从整个东南亚来看,伊斯兰教的中心就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以及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5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其领土几乎增加了两倍,并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教就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世界的内海;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内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295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在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的存在使得欧亚大陆上跨地区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从而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地方势力。这一点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事务的进程。现在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分,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全世界18%的人口的信仰,起因都在于伊斯兰教在这500年中的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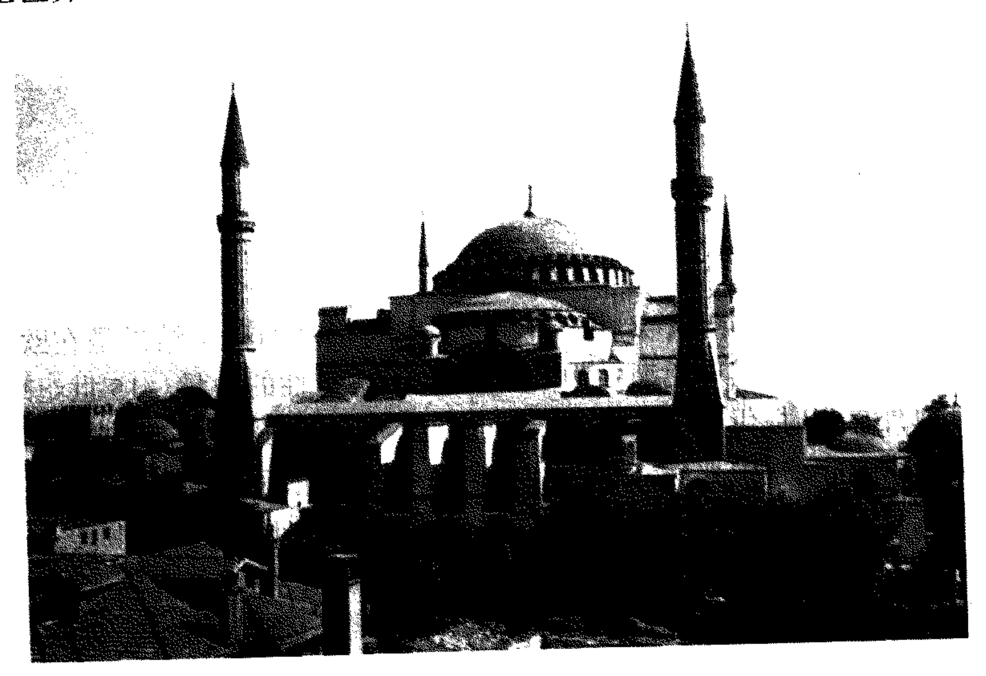


图66 艾勒汉卜拉宫

1248至1354年间建在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国王的宫殿艾勒汉卜拉宫。遍及欧亚大陆的著名伊斯兰教建筑是公元1000至1500年间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标志。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众所周知,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中国的技术发明的大批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9章第2节)。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波斯因其处于枢纽性的地理位置,同时受到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据了解,在蒙古军队中服役的中国炮兵曾去过波斯;有位名叫傅

梦之的人曾在波斯传播中国的天文学原理；在伊儿汗朝廷里也曾有中国医生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们的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完婚以后，就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有助于使欧亚大陆变得更为紧密。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中国观察家汪力(1314—1389)所提及。对于在他眼前展现的前所未有的融合，他留下了以下非凡的叙述：

> "……四海之内已成一家，文明到处传播，再无任何障碍……许多(新到中国的人)忘记了他们的故乡，而在我们的江河湖泊中快乐地旅行。当他们在中国定居很长一段时间后，许多人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他们的家庭在扩大；由于远离故土，他们不再渴望葬回故乡。人们之间的兄弟情谊肯定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2]

最后，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其他各文明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它却非常善于借鉴已形成的伟大文明的成果，创造出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这也引起了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必然、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持希腊古典名著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则与他截然相反，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测，认为它们将导致异端邪说和无神论。

当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时，这就意味着经院哲学取得了胜利。中世纪早期，在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中，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了。如同在西方一样，这里的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赎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仰。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受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直至19世纪末以前它却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在其《哲学的矛盾》一书中猛烈地攻击了所有的世俗学派。他宣称，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不应用于建立自我信任，而应信任天国的神灵。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

(1332—1406),在其著作中也反映出正统经院哲学的影响之广。他最先将历史看作是关于各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记录。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无用且危险的。他说:

> “我们应该清楚,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而言无足轻重,因此我们不必加以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从事相关研究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思想的侵蚀。”[3]

由于经院哲学的阻碍,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思想极度活跃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公元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处于领跑位置,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距。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完成了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了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经被关闭在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外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奠立了社会基础。

在这一整体保守的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8章第5节),蛮族入侵的毁灭性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成长。后面几章将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性的西方文明。

推荐读物

关于突厥人在不同地区的入侵,见 T. T. Rice 所著的 *The Seljuks* (Thames & Hudson 出版社 1961 年版); C. Cahen 所著的 *Pre-Ottoman Turkey* (Sidgwick & Jackson 出版社, 1968 年版); S. Vryonis, Jr. 所著的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

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1 年版）；H. Inalcik 所著的 *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Weidenfeld & Nicolson 出版社，1972 年版）；J. A. Boyle 主编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 5，*The Seljuk and Mongol Periods*（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31 年版）。M. Nazim 所著的 *Life and Times of Sultan Mahmud of Ghazna*（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31 年版）讨论了印度的突厥人。H. Lamb 所著的 *Tamberlane the Earth Shaker*（McBride 出版社，1928 年版），J. J. Saunders 主编的 *The Musli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66 年版）中也全面地收集了一些这方面文章.

关于蒙古扩张主义的演变，见 O. Lattimore 所著的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Mouton 出版社，1962 年版）中的不同文章，以及他写的文章"*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1963 年 8 月，pp. 55—68。R. Grousset 所著的 *Conqueror of the World*：*The Life of Chingis-Khan*（Viking，1972）中收集了成吉思汗的几篇传记，包括主流性的记述；B. Y. Vladimirtsov 所著的 *The Life of Chingis-Khan*（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30 年版）中进行了学术研究；H. D. Martin 所著的 *The Rise of Chingis-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Johns Hopkins 出版社，1950 年版）一书擅长于蒙古军事组织方面的论述。J. J. Saunders 所著的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Harper & Row 出版社，1972 年版）中则对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J. A. Boyle 所著的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1971 年版）；B. Spuler 所著的 *The Mongol Period*（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社，1995 年版）中则对此有权威的评价。

注释

1. R. Latham, *Travels of Marco Polo* (Penguin, 1958), p. 71.
2. 引自 J. H. Bentley *Old World Encounters* (Oxford University, 1993), p. 145.
3. Ibn Khaldun, *Muqaddimah*, trans. F. Rosenthal (Pantheon, 1958), pp. 250—258.

拜占廷1000年的存在只产生了灭绝；而西方在中世纪1000年中的努力却产生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并最终产生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第12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拜占廷是欧亚大陆上历经蛮族入侵而幸存下来、并从古典时代一直毫不间断地发展到近代的少数几个传统文明之一。然而这段持续不断、延续了1000年的历史最终却遭致废弃和灭绝——从政治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因为拜占廷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灭绝的命运。而比如说中国，由于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与之相反，拜占廷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扩张成性的西方的进攻，以及复兴的东方的袭击。蛮族对它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蛮族入侵类似，西方的进攻是指以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为主体的进攻，而东方的袭击则首先指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还可持续到1912年，而拜占廷则于1204年就已崩溃，后又于1261年得以部分地恢复，并一直苟延残喘到1453年最终灭亡(见地图17)。

一、拜占廷的出现

在帝国统治的持久和范围方面，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能与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在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将其重建为新罗马之前，它就已经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其希腊文名为拜占蒂翁，拜占廷是它的拉丁名字。可是尽管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却始终只

是一座二流的商业城市。而且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继续切断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一流地位。直到后来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才结束了它的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廷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都已非常稳固，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的面前岿然不动。

君士坦丁堡扮演拜占廷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长达1 000年，直到1453年它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其疆域也随着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征服而不断得到拓展，最后则包括了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前君士坦丁堡一直统御着这一广大地区，但在这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则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安全地带即安卡拉城。

君士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它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由于它的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这座城市就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起来，从而也就可以阻断无论是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拜占廷皇帝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4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通道。因此在拜占廷长达10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遭到围攻的军事要塞，但却一直得以保存下来。

在西罗马帝国的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皇帝于476年被废黜之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仍认为他们是恺撒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一心想将恢复罗马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从蛮族那里夺得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见第8章第4节）。但是，这个刚刚恢复的帝国的寿命却十分短暂。查士丁尼死后不久，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就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同斯拉夫人向南涌入巴尔干地区；而在东部，波斯人则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在伟大的希拉克略皇帝（610—641年在位）的领导下，拜占廷对周围的敌人进行了反击。627年希拉克略大败波斯人，并使他们退还了所有占领的拜占廷土地。但与此同时，在多瑙河边境希拉克略却发现，斯拉夫人此时已经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并定居在此地。他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为入侵的斯拉夫人指定了一块定居地，作为回报这些斯拉夫人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也就渐渐地从侵略者变成了移民。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散居在巴尔干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以及居住在黑海

沿岸其他地区，不久便自称为保加利亚征服者的斯拉夫人。

7 世纪后期拜占廷帝国再次受到威胁，这次是阿拉伯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的双重威胁。阿拉伯人发展了海上力量，并凭借这支力量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从 669 年起，君士坦丁堡数次受到阿拉伯人的围攻。与此同时，拜占廷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当时这些保加利亚人正占领着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

拜占廷这次再度被上苍所赐的帝国首领拯救，这次完成这一任务的是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717—744 年在位)。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长官，他趁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拜占廷政权，然后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并将他们赶出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与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缩小许多，其中意大利已被伦巴第人占去；巴尔干北部被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侵占；而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则丢给了阿拉伯人。

然而，这一收缩后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其疆界退守到托罗斯山脉，实际上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拜占廷；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和日渐形成的伊斯兰教核心地区之间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因为穆斯林世界的内部骚动



图 67　查士丁尼和他的随从

查士丁尼和他的随从，绘于拉文纳圣·维塔修道院的壁画上。

而得到加强。阿拔斯王朝于750年建立后，结束了这种骚动。伊斯兰教帝国从大马士革迁都巴格达后伊斯兰教的扩张重点也随之转向东方，而不是转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廷帝国和穆斯林帝国尚能和平共处。

8世纪的拜占廷帝国比起查士丁尼时期那个寿命短暂的帝国要小得多，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它的民族构成更加单一。东、西方各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已被抛弃，剩下的核心部分即便不完全是、也基本上是希腊成分占绝对主导。这样，从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转变也就完成了。8世纪时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文化上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帝国和西方的新欧洲都截然不同的国家。

二、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由主管行政和军务的将军统辖。希拉克略皇帝将行政军事化，作为应对外来危险的一项应急措施。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农民们负担了巨额的捐税，提供了军需储备，充实了国库。

自由农民村社也是拜占廷经济的一大基础，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支柱性的作用。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赞叹拜占廷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运经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



图68 查理曼加冕

14世纪的法国金泥写本：公元800年教皇为查理曼大帝加冕。这一事件促使君士坦丁堡于812年授予查理曼“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独立。

这些货物包括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使得拜占廷的皇帝们能够再次发动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像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颇具实效。他们重新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阻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随着战争的进展而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居住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此前一直是帝国的重大威胁，1014 年巴西耳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这一时期在文化上是一个稳定、统一的时期。拜占廷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是帝国通用的书面语和口头交流语言。被再次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以及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都皈依了东正教，这促进了宗教的同一性。865 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了报答拜占廷对他发动的征服的承认接受了东正教。在随后几年里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就像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

拜占廷皇帝和东正教主教之间密切的互相支持，也使得帝国更加稳固。东正教教会必须依附于拜占廷朝廷的原则是举国公认传承已久的准则。拜占廷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沙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10 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地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而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但这种候选人必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其能胜任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拜占廷与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关系，因此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内向型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朝的中国，下章将专门论述明朝的特点。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 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正如日中天、无可争辩。帝国北部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此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对帝国构成威胁。而西方出现的不拘什么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东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和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短短半个世纪里，拜占廷帝国便陷入困境，又过了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即 1204 年，首都就落入了不为时人所齿的西方蛮族手中。

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1261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是拜占廷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拜占廷史学家尼希塔斯·车聂提斯(Nicetas Choniates)的以下论述揭示了希腊人对拉丁人以及实际发生的征服的憎恨。*

……我该如何讲述这些穷凶极恶的人所犯下的罪行!啊呀,我们原本应该崇拜的偶像,却被他们用脚践踏!啊呀,崇高烈士们的遗体被扔到了不洁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了别人听起来不寒而栗的事情,比如,基督的神圣躯体和血肉喷溅满地或被四处抛散。他们攫取神圣的遗物箱,将其中的装饰品搂在胸前,用那些破损的器物作锅和饮水杯使用……

对大教堂[圣索菲亚教堂]的侵略听起来也令人动容。由各种各样珍贵材料制成并被整个世界所敬仰的神坛被打成了碎片,分发给士兵们。所有其他的华丽绚烂的神圣财物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用稀有材料制成的优雅的神瓶和用品,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性;用金子装饰的上等银饰镶嵌在法庭和讲经台的屏风上,手工极为精巧;它们和许多其他的装饰一起都被当成战利品掠夺一空。骡子和装上马鞍的马匹被迁到了寺庙的神殿,有一些牲畜不能在华丽壮观而表面光滑的路面上站稳,而一摔倒就会遭到刺戳,以至于神圣的路面被鲜血和污物玷污……

最困难、最费力的事莫过于通过祈祷使这些暴怒的野蛮人变得温顺善良,每说一个令他们不快的字就会使他们气得快要吐出胆汁,什么事都可以使他们大发雷霆。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都会被嘲笑成神经不正常或饶舌妇。他们通常会拔出短剑对付那些胆敢反对他们或拒绝他们要求的人。

每个人都深陷于这种悲哀。在巷子里、街道上、寺庙中,到处可闻抱怨、哭泣、悲叹、痛苦之声,男人们呻吟着,女人们悲鸣着,伤害、强暴、囚禁、骨肉分离充斥着每个角落。贵族们倍感耻辱地四处游荡;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眼含热泪;富人们也变得贫苦。这样,在街道上、角落里、寺院里、书房中已经找不出一处免受攻击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为这些恳求者提供庇护。到处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啊!不朽的上帝!人们的苦难和不幸何其深重啊!

* D.C. Munro, trans.,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European History*, rev. ed., series 1, vol.1, number II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12), pp.15,16.

导致拜占廷的实力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

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虽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因此当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朝廷也就更难控制。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削弱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继承者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朝廷收入更是锐减。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开支的猛增又使得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骑兵的袭击致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无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也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外来侵略。西方的诺曼人冒险者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进攻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拜占廷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地,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后,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反客为主,于 1055 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复兴了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重新统一了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陈兵将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

这就是 1071 年拜占廷帝国发生两大灾难时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该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就此开始了。其中一个灾难发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廷惟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个灾难,也是更为决定性的打击,发生在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次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一战役使得小亚细亚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了突厥人的根据地。在这一战役结束之后,敌对双方的皇帝为了争夺拜占廷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由此突厥人也就可以随意进入小亚细亚,并渐渐地将小亚细亚从东正教拜占廷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精明顽强的拜占廷皇帝亚历克塞·康危努斯(1081—1118 年在位)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同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但他得到的却并不是他想要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十字军是由诺曼人领导的,而亚历克塞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这些诺曼人。东、西两个基督教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暗地怀疑和公然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在此背景下发生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被形象地称为"商人的东侵"。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财富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廷觊觎王位者的奉承,拉丁人心中对其认为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所有这一切使得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改变了方向,由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 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一位拜占廷编年史家写道,即使是萨拉森人,"也



图 69 十字军屠城

1204年春，十字军在佛兰德温的指挥下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城，烧杀抢掠三日整。这是19世纪欧仁·德拉克罗瓦的一幅绘画中描绘的这一场景。

比他们仁慈。"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终结果却是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尽管1261年拜占廷帝国恢复了元气，但它却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一直处于一种无望的虚弱状态，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四、拜占廷的灭亡

胜券在握的拉丁人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衷于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道路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然而，这些新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至死都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

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块地区，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拉丁人不仅面临着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着三个相继建立的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雷比藏德，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够凭借它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外来统治。

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在此情势下，1261 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的欢呼声中住进帝国皇宫。

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 1261 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 1453 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在同突厥人的作战中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两个世纪中，刚刚恢复的帝国仅由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雷比藏德。

这个可怜、残存的帝国的前景，并不比此前的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面对的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残留在希腊的各拉丁小国和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去这些外部威胁外，它还有其内部危机。这时，帝国的经济已经破产，在意大利商人对贸易的束缚仍在继续。因此 14 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热那亚居民区的收入已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七倍。皇帝们被迫将自己的货币贬值，并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但是不断增长的捐税对政治上有权势的却极少有效。为了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得城市四分五裂。

1342 至 1349 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派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寺院的土地，分给穷人；他们采取公共民主制，让市民参加公民会议，由公众选举官吏。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受到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政治纲领的影响。但是已经日暮西山的拜占廷帝国仍然不能忍受蓬勃发展的西部自然形成的这一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消灭了他们的共和政体。然而，这一事件却表明当时存在着尖锐且普遍的冲突。以下这段当时的记述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冲突：

"起义像可怕、残酷的瘟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经温和、稳健的人。……于是，所有的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造成的痛苦之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凶暴的武装起义，因为他们憎恨富人……"[1]

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被削弱。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助以抵御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拜占廷皇帝曾先后三次（1274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年在罗马；1439年在佛罗伦萨）许诺，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但这些许诺毫无意义，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廷内部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憎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和意大利商人的盘剥作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认为土耳其人更好的呼声过去时有耳闻，但15世纪中叶的情况却更为特别，当时的土耳其人已经能够接受邀请。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之后他们又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攻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到1453年，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后攻陷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减少到50 000至70 000。所有能参加守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 000人。仅靠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军大炮轰出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80 000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士坦丁的英勇领导下，拜占廷守军屡次击退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连续屠掠三日。当时的拜占廷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绘了拜占廷帝国1000年历史终结时的情景：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二世］终于同意放船出港。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民众、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物品。”[2]

五、拜占廷的遗产

综观历史，拜占廷显然在各个领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一，它起到了屏障作用，使其后的西方能够自由地发展起自己的文明。这方面的意义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体现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攻陷该城后仅用半个世纪便打到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第二，拜占廷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发动机，而它的货币则是当时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

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第三，在文化领域，拜占廷挽救了不计其数的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连同其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廷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还传下了一门直到现在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宗教艺术，以及由严谨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文明时期和希腊文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

最后，拜占廷帝国对东斯拉夫人而言，就如同罗马帝国对日耳曼人所起的作用一样，都是该民族伟大的教育者、伟大的引导者以及宗教和文明的源泉。早期的俄罗斯公国沿河流航线依次排开，与拜占廷开展了繁荣的商业往来。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等汇集基辅，以换取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细纹衣料、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希腊物质产品的涌入也引来了希腊的文化制度。其中，对东斯拉夫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东正教。大约在988年，俄罗斯公国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东正教。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且意味着形成了以拜占廷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集团的首领是基辅大主教，由君士坦丁堡最高一级的主教任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东正教还给俄罗斯带来了新的宗教文学和法律文学，其中包括《圣经》、拜占廷收集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的译本。石头建造的教堂、镶嵌工艺、壁画、油画、尤其是肖像画等拜占廷艺术这时也被引入俄罗斯。而且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青出于蓝胜于蓝，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俄罗斯—拜占廷风格。另外，东正教还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廷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与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等各个方面的案件。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加强了俄罗斯各公国大公的权力。如同西欧的罗马教皇曾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也将各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变成了“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附属于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像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

拜占廷被消灭后，这个神权附属于王权的传统还在俄罗斯继续。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俄罗斯皇帝表示忠诚和顺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

综上所述，拜占廷文明因其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成就而在历史上地位显赫。然而拜占廷却缺少古希腊文明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远不如它光彩夺目。尽管如此，相较而言，希腊在国土面积和存在时间方面都不如拜占廷重要。确切地说，其原因是拜占廷的作用是保守的。这并不是说拜占廷停滞不前：从始至终它都在随着变化的时代和环境调整自身。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使命更在于保留，而不是创新这一事实。它于罗马帝国内诞生时就早已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在过去的强权和光荣的阴影中成长，并试图维持和恢复这种权力和荣耀。在它的内部连续产生了一些卓越的领导者——行政长官、将军、学者和神学家——但囿于其工作环境，他们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却为数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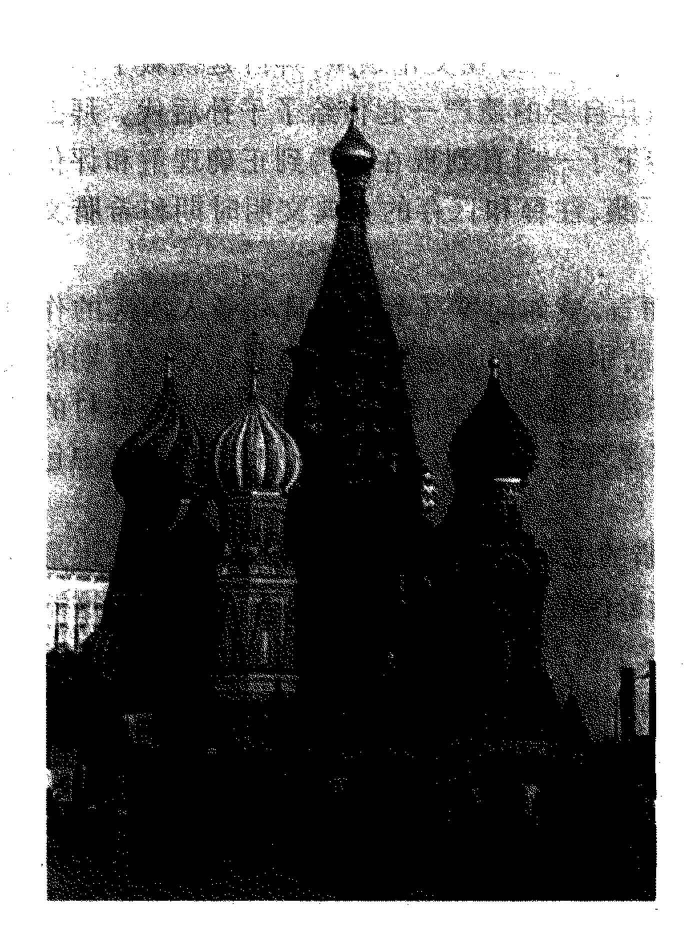


图70 圣巴西勒教堂

位于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巴西勒大教堂。

东罗马帝国比西罗马帝国整整多存在了1000年，这在开始时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在5到11世纪之间，与位于博斯普鲁斯的东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显得原始和无足轻重。但是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一切均在从头开始，西方正为新文明的诞生打基础，而拜占廷却在其辉煌但有约束性的遗产上生存着。这就是为何从11世纪起西方能随其经济的日益蓬勃、国家君主政治体制的兴起、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扩张主义的动态发展而不断向前进步。其中，扩张主义首先体现在地区内的征讨，随后又表现在海外拓张，最终在几个世纪内成就了全球霸权。相形之下，让人觉得可怜的是，在这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拜占廷一直未能突破光辉的历史对它的束缚，因而变得陈腐守旧，跟不上时代。1453年它发动了为维持其地位的战争，虽然英勇，但却最终免不了要遭受注定失败的屈辱结局。

推荐读物

最好的全面研究拜占廷的史书是 G. Ostrogorsky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Rutgers University 出版社，1957年版）；最好的简述成果则是 S. Vryonis, Jr. 所著的 *Byzantium and Europe*（Harcourt 出版社，1967年版）。后一本书的作者还著有关于拜占廷历史决定性转折点的权威性著作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71 年版）。关于拜占廷人、南部斯拉夫人以及与基辅和伊斯兰教关系的各个方面，最好的信息来源是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4（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66 年版）。另一本讨论了文化和政治事务的标准性著作是 A.A. Vasiliev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Byzantium Empire*, 2 vol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出版社，1958 年版）。集中对国家、基督教和拜占廷思想进行考察的短篇作品是 D.A. Miller 所著的 *The Byzantine Tradition*（Harper & Row 出版社，1966 年版）。关于拜占廷文化的其他阶段，见 D.T. Rice 所著的 *Byzantine Art*（Penguin 出版社，1961 年版）和 A. Grabar 所著的 *Byzantine Painting*（World 出版社，1953 年版）。最后，主要材料的来源是 D.J. Geanakoplos 所著的 *Byzantium: Church,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85 年版）。

注释

1. G.L. Seidler, *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World* (Pergamon Press, 1968), pp.116—117.
2. S. Vryonis, Jr., *Byzantium and Europ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7), pp.190—192.

我幸福，因为我属于人类，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夷；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好的城市洛阳。

——邵雍(新儒教教徒，1011—1077)

第13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隋、唐继承了汉朝的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这种情况与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所发生的独特变化形成鲜明对照(见第8章第3至5节)。此后的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就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到了中世纪中国更是突飞猛进，成为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向为数众多的人提供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感和舒适度使得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然而，与此同时，如第14章所述，由于技术发展起步早、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西方社会正发生着变化。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一种推动力，最终导致西方主宰了整个世界。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但这一点却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整整1000年中，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一、隋朝和唐朝

隋朝(589—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比其约早8个世纪的秦朝相类

似。两者都在中国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同时也都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它们又都沉重地压迫了人民,因而遭到了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至于其创立者刚死,王朝便都崩溃了。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展拓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穷尽民力财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运河系统的主干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是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此项工程的发起者隋炀帝也因此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从而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开疆拓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得帝国的疆域扩大到了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最北部三个辽东王国的企图却惨遭失败,这三个王国由朝鲜分裂而成。隋朝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队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并于618年被暗杀。几个觊觎王位的起义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

唐朝最明显的成就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了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了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和印度河上游地区。在当时世界上只有穆斯林阿拉伯帝国能与之匹敌。

中国国内重建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对外征服成为可能。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弱,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且享有免税权的地产,并在这上面建造起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不断增多的土地也与帝国政府争夺资源。隋朝和唐朝政府提出了解决这种政治分裂的办法。它由"均田制"组成,即: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约合19英亩的几块土地。农民得到的土地并非来自剥夺大家族所占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才能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并非所有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实施的确有助于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强唐朝统治。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大地产的膨胀,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并被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建立了一支能管理全国事务的精干的官僚队伍,以此来巩固帝国政权。此前隋朝就已恢复了汉朝时实施的在全国公开性竞争考试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唐朝根据儒家"征召有才能的人才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种种问题"的基本信条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而拒绝采纳西方通过改革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国家事务的

典型方式。这一制度发展成熟后包括了举行一系列选拔考试,这些考试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首先是乡里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然后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县城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资格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考生能通过会试这一"篙



图71 隋朝立佛像

一尊塑于隋朝(589—618年)初期的立于莲花基座上的立佛像。这帧作品由砂石雕成,且有着色痕迹。(现存中国陕西省天龙山,规格为68.5×17.8×15.24厘米)



图72 中国石像

6世纪的中国石像，现藏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笆”，并获得担任较高官职的资格。这些人中通常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从而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开始进行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育和政治时事等。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到文法和儒家正统观念上。最终则形成了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它却只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学习和准备的阶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来统治中国，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而稳定的行政管理。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旧能够相对孤立地主导着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机勃勃的西方的侵入，这种科举制度带来的稳定性转而阻止了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1905 年，科举制度最终被彻底废止。

唐朝首都长安是一座有着约 100 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了元朝这段蒙古人统治的短暂时期外，唐朝时的中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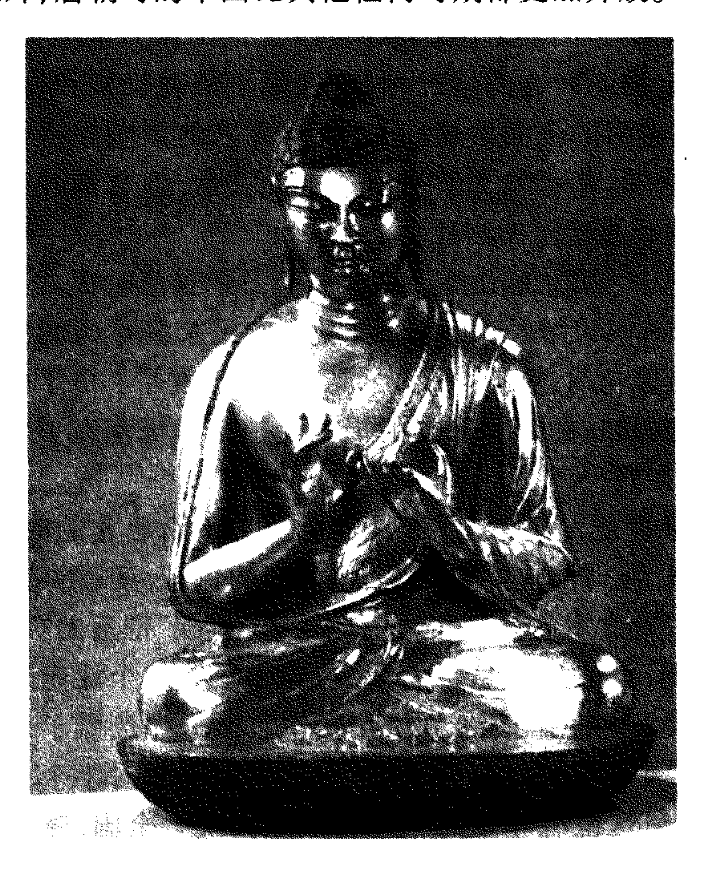


图 73　唐代坐佛像

唐代坐佛像，唐代始于 618 年，终于 907 年。

思想自由在宗教信仰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开放,致使许多外国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为明显。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在汉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里它开始向官方儒教发出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道和家庭忠诚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佛教的影响迅速增长,并于唐朝初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积聚了大量财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却完全被中国化了,并变得非常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种佛教宗派相继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教派,它后来传入日本,又被称为"禅宗"。禅宗强调默坐专念和自主自立,是唐朝之后惟一能够继续蓬勃发展并具有学术性的佛教教派。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这一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来控制,甚至补贴、拉拢寺院和庙宇。

从长期来看这种控制的企图还是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佛教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针锋相对。僧徒、尼姑完全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这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宗教迫害同西方的情况相似,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介入的影响显得微乎其微。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却并不像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重塑了中国社会。

在帝国统治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唐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财政入不敷出;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搜刮农民,大肆实行土地兼并。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因此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也就都落在了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却正在减少。

唐朝皇帝又勉力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的管理不善和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得许多省份都发生了叛乱。朝廷虽然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了朝廷的控制,公然违抗皇帝的命令,并为争夺这个注定要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而在相互之间展开斗争。最终,907年叛军首领朱温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是四分五裂,由此也就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的"五代"时期。最后,赵匡胤这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样持续了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



图74　昭陵六骏

唐朝皇帝唐太宗(597—649)墓前的浮雕昭陵六骏之一：一匹栗色的战马。

二、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的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得十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族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幽云十六州)，但却也惨遭失败。他的继承者则干脆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已经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满洲的东北领土，也没夺回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则正是到达西方的陆上通道的必经之地。

宋朝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使游牧民族的入侵变得十分容易。"送礼"政策顺利地实行了一个半世纪，但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也就降临了——他非但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游牧民族对中国北部的大规模入侵。宋朝的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960—1127年)则被称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陲各省，后来又丢失了整个北边的半个中国，这在后来遭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固然正确，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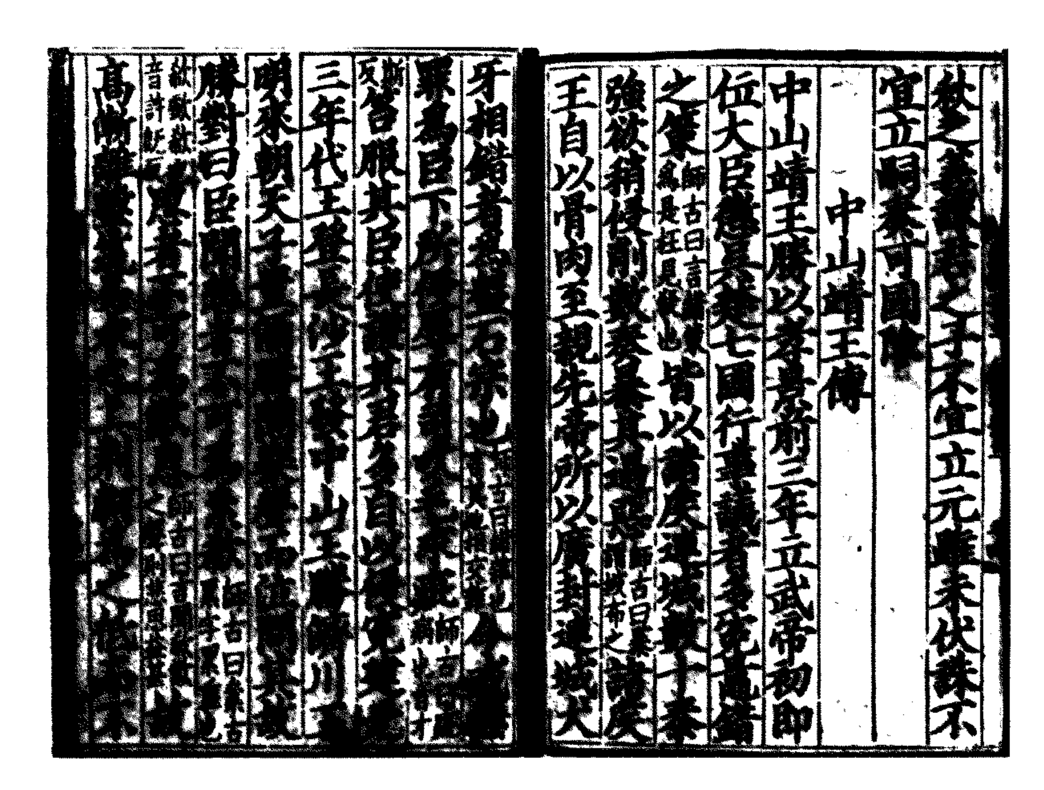

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傳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
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

图 75　雕版印刷术

用雕版印刷术印成的《汉书》(汉朝的历史)的书页。印制于 1208 年至 1224 年前。这本书是宋版印刷的最好范例之一。

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像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用来印制大量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它们至今才被充分理解(见第 9 章第 2 节)。

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对整个欧亚大陆都具有重大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能。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农业区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外，宋朝新修的水利工程也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 至 12 世纪中国的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的提高为人口的相应增长提供了保障，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活动而不是以政务活动为中心的大城市。

比国内贸易大发展更引人注目的是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从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就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中国的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其次，航

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穆斯林是亚洲海上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上商道——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世界主导地位，这表现在以下事实中：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则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还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直接从事对外贸易，而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可以说，宋朝时的中国正在朝着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致命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却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社会产生的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见本章第 4 节）。

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尽管南宋的疆界只限于半个中国，但其统治却显得格外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部则由满族的一支女真人统治，国号金。大约 1215 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共同反对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并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力量，就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 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回归到他的统治之下。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国南部以示报复。由于在这期间蒙古人忙于占领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直到 1279 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才最终灭亡。而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则就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 1368 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族统治；这些游牧民族并未因其早期同中国的交往而部分地中国化。这些蛮族征服者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不久他们就发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政策，还应采用更有利的选择。一个中国顾问陈述了这种选择：

> “既然你们已经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出产中抽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 50 万盎司的白银、8 万匹丝绸和 40 万担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1]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基本类似于中国以前的统治者所建立的行政机

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经历使他们在语言、习惯和法律方面与其臣民不一致。他们还有意雇佣许多外国人任职,以抗衡可疑的多数中国人。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都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式来安抚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在朝中任职的外国人的数量表示不满,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已转变成了一个国际行政机构;他们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等各种外国宗教不满(见第12章第4节)。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外来政权的性质和持续时间较短而没有给中国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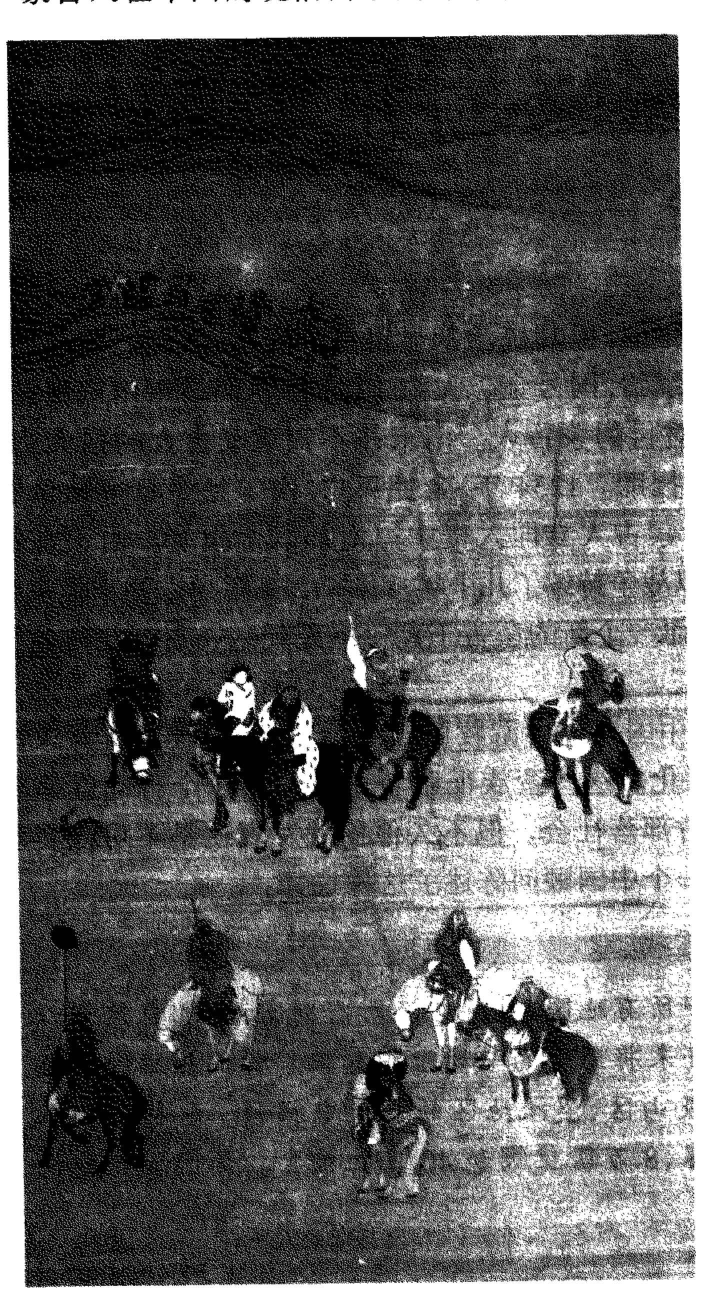


图76 忽必烈汗狩猎图

身着白色毛皮外衣的忽必烈汗和他的蒙古武士一起正在狩猎。注意画面山后的骆驼商队。

下深刻的印记。或许，定都北京是其最持久的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满州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进一步推动其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 “中国的地主把外国商人们带入中国的所有现银放入他的库存，以中国的纸币作为交换媒介。……用这种钱你可以轻易地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任何其他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2]

雄才伟略的忽必烈死于 1294 年，终年 80 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颇具才干的铁木耳。但铁木耳享位不长，而在他之后的大汗们则都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声色。为了争权夺位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得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是由于起义领袖间的内讧，才使得蒙古人的统治能够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朱元璋)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像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时机，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他于 1368 年建立了汉族人重新统治的明朝，明朝的统治一直延续到 1644 年。

四、明朝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内向性

从推翻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 年)、清(1644—1911 年)两朝统治了中国 500 多年。这几个世纪的中国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范例。出现这一空前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东西显然不是只去死记硬背儒家经典，因而有许多儒家学者都在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 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但他对这两者都不满意，遂又转而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杰出的综合才能他发展了一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把佛教、道教的成分融入儒家，这使得儒家学说更能令人满意，也更能适应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他基本上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的唯

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性本善及其可完善性;他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就会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忽视和缺乏教育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曾经将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入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学综合体。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外来的前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和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践行他的学说。"[3]

自朱熹批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通过对社会存在的学术推理,使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得到加强。这从根本上有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有些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可以归因于新儒学,也可以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同时占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稀缺使得他们能够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则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事实上,中文"贵族"一词的含义首先是体现社会地位的。但实际上,拥有土地则是获得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取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联系密切且互相支持。新到一个省份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会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他就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如果能对官僚和贵族进行严格意义的区分的话,那么可以说明清两代的中国是由这两者联合统治的。帝国官僚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对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从始至终保持合作。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对农村中的贵族统治提出挑战。

中国稳定性的根源

外国观察家们都被中华文明的久远性与稳定性所深深震撼。19 世纪中期在中国任职的英国领事官员 T.T. Meadows 根据他所获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对这些特性作出了以下解释。*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同一的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无与伦比，人口也持续稳定增长……其真正原因可归结为三个原则和一种制度……这三个原则是：

1. 以德治国优于凭武力治国。

2. 选拔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实现国家的政治清明必不可少的条件。

3. 如果君主道德败坏、醉生梦死，并由此导致高压的暴政，那么人民有权力处置这样的君主。

一种机制是：

公开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制度……

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直十分严格且竞争激烈的科举制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原因：正是这种科举制保存了其他各项事业，并使其得以有效运转。这种考试引导着全国上下深谙其中奥妙的父母们直接向他们的儿子灌输经典著作的文学知识，其中就有上述三个原则，和许多其他有利于培养较高精神境界的知识。这种考试为政府招募所有贤能的人，以使政府保持清廉。这种考试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也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并未设置不公平的障碍来阻挠他提升自身的地位……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依靠道德力量进行统治，而不是暴政。军队和警察的数量只够镇压小规模的起义，如果要镇压令人讨厌的愤怒的人民，那么他们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性质上都是绝对不够的。但是尽管政府并不实施暴政，它在形式上和机制上却都是一个纯粹的官僚机构。在一个地区内，地方长官就是绝对的权威；在一个省内，巡抚就是自己王国内的国王。中国古代的人民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自行收税、弹劾统治者以及限定和停止纳贡的权力，因此他们只有起义的权力。起义在中国传统上是一种宪法赋予的合法手段，人们经常以此种方式来阻止武断而暴戾的立法和行政。

* T.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Smith, Elder, 1856), pp.23, 24, 401—403.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并能发人深省的事实是，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

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影响最大的差别。在西方,正如第14章中将要提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不断增多。中国的确也存在着商人阶层,但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都出自中国。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性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八章第五节所述,中国历史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直到1911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可以说,是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利用新儒学作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并没有立即形成新的帝国,相反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等新技术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约束力太强。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技师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技师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技师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技师同样需要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等。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能够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去操纵国家垄断商品来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对内限制政策的另一个实例是竭力反对海外扩张。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经慢慢移民到了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 000人,而西班牙人则大概只有1000人。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正是这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一次大屠杀,而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数典忘宗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1712年清朝皇帝颁布了一条诏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清朝又发布了另一条布告,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海外华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清朝再次颁布法令,规定了海外华人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者再不许回国。这种政策同西方国家形成了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都在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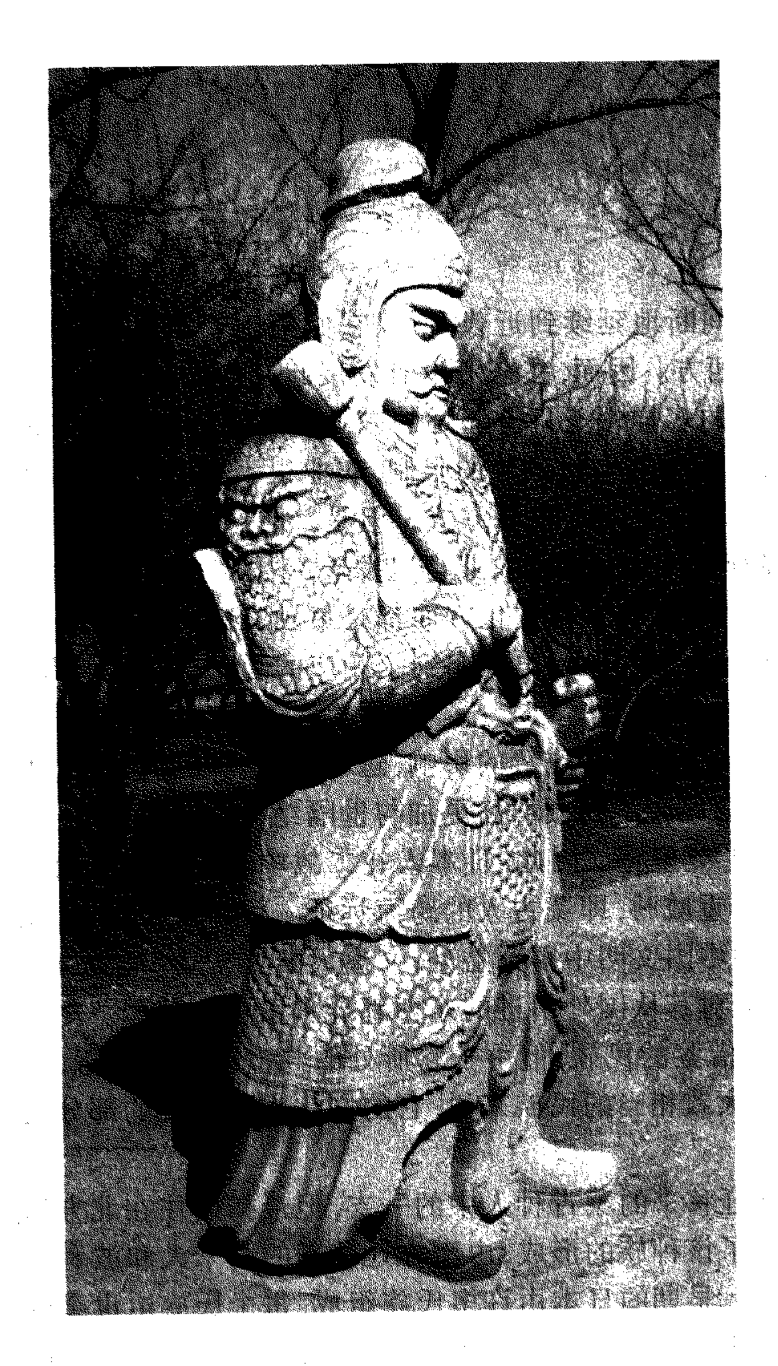


图 77　中国将军石像

中国将军石像。它是列于北京明十三陵墓道两旁的许多护卫石像中的一尊。

在 15 世纪早期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中，明朝的航海业以其杰出的技术和惊人的航程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的领先地位。然而，随后明朝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禁海令(见第 9 章第 1 节)。这就是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一个最鲜明、最重大的表现。

虽然下禁海诏书的确切动机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却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够颁布禁海令，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由于制度结构上和海外拓张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中国的力量却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如此一来，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伟大的“天朝”在此后几个世纪里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却走向了

历史的前台。

五、中国文明在日本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毫不间断地延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持久地控制西方。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东亚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很不发达,因此游牧民族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但是,邻近中国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它们的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以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是最独立的,基本上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它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历史。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列岛比起不列颠群岛更加与世隔绝:日本列岛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则只有21英里宽。因此,日本人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即蒙古人的跨海远征。可以说,日本人既离大陆非常近,近到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又离大陆非常远,远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其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擅长于借鉴的民族,但由于它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较之其他在人数和发展水平上与其大致相当的民族来说,它的文化中有更多的部分是它自己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也促进了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日本民族的神。

6世纪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成为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则更为重大。他们鼓动变革,最终导致日本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样板将日本改革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唐朝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天皇和国家议会授权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进行统治。所有的土地都以天皇的名义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

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田赋)和劳务税(徭役),前者多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图78 泥塑武士

从日本古墓出土的泥塑的着铠甲的武士像。

实施这些改革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日本帝国的权力——与前氏族组织相比这些变革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但实际上,此时日本天皇还远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无可争议的首脑。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了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科举考试择优录取,但实际上旧贵族仍然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通常都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双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

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而在日本它却一直被保持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日本同样采纳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日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也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得十分明晰。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达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几乎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当新的封建时期到来之时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时引进的中国帝国体制,在日本有效地运作了较长时期。但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已经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导致其崩坏的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优美的京都,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自己留在京都。另一个原因则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贪得无厌,他们无休止地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行为使得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这也就意味着自耕农的税负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居住在那里的虾夷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就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也因此而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贵族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但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服役期间也不得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于739年被废除。国家的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挂名充任。结果反对虾夷人的战争则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则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是反过来他们也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日本已经处在各封建领主集团的控制之下,各集团之间为了争取尽



图 79　日本园林

京都众多美丽的园林之一。京都是足利将军的都城所在。

可能多的土地而相互争斗。结果,大地主,即"大名",最终兴起。16 世纪初日本的大名已达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七、日本的内向性和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的农作物亩产量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贸易也更加繁荣,进而促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 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海港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或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其内外贸易的发展。早在 12 世纪,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其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后来他们渐渐扩大活动范围,到 15 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已经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同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不受打断地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会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一个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日本却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发展。如果没有西方人出现,日本人很可能会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殖民地。然而这时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列岛上的惊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退回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强制离开日本,其信徒被要求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的外国人都只得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九州岛上的长崎港经商。另外,锁国政策还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就开始了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

最终结果是,日本没有成为近代向外扩张的民族国家;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藩篱"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为了追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国引入了儒家学说和制度。他们采纳了儒家对社会的四阶层划分法——即武士管理者、农民、文士和商人,借用了儒家哲学,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尊卑次序,还在艾斗建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儒家学派——日本人民渐渐被中国哲学的道德准则所影响。佛教虽然仍是大众信仰的主流宗教,但儒教却已慢慢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思想力量

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为此付出了社会制度僵化陈腐的代价。不过,两国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相反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帝国的裂痕。因此,在面对19世纪西方的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还能做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推荐读物

第8章的参考书目中已经列出了关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著作。在此基础上还应加上由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参考书目的说明性文章:J. K. Fairbanks 所著的 *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Washington 出版社, 1968年版)。这个参考书目列举了关于官僚国家的崛起、商人的作用和社会阶层的结构和流动性等主题的近期著作。

关于220至1644年之间中国历史的一些更重要的研究是:W. Bingham 所著的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Waverly 出版社, 1941年版); E.A. Kracke 所著的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3年版); J.T.C. Liu 所著的 *Reform in Su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9年版); C.O. Hucker 所著的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1368—1644 (University of Arizona 出版社, 1961年版); E. Balazs 所著的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Yal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4年版)。以下两卷分类别的学术会议纪要中分析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趋势:A. F.

Wright 主编的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53 年版）；J.K. Fairbank 主编的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57 年版）。另一本有用的书是：J.M. Menzel 主编的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Career Open to Talent?*（Heath 出版社，1963 年版）。最后，M. Elvin 所著的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3 年版）一书中分析了为何中世纪时中国在技术上的天赋没有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J. Needham 所著的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George Allen & Unwin 出版社，1969 年版）中对此也有所论及。对于那些认为 Needham 的不朽著作太长的人来说，更容易理解但却很可靠的记述是：R. Temple 所著的 *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1987 年版）。主题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读物是：P. Snow 所著的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Weidenfeld & Nicolson 出版社，1988 年版）。最后 W. H. McNeill 所著的 *The Pursuit of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82 年版）一书从全球的角度分析了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成就。

关于日本，美国历史协会历史教师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个方便而通用的参考书目，即 J.W. Hall 所著的 *Japanese History: New Dimensions of Approach and Understanding*, 2nd ed.（Washington 出版社，1961 年版）。详细阐述的标准书目是 B. Silberstein 所著的 *Japan and Korea: A Critical Bibliography*（University of Arizona 出版社，1962 年版）。关于日本政治、道德和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由 R. Tsunoda et al. 所著的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1958 年版）一书中提供。G.B. Sansom 所著的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修订版（Appleton 出版社，1944 年版），以及他的 *A History of Japan*（Stan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58—1964 年版）中规范、概括地描述了历史。最好的介绍性的报告是 E.O. Reischauer 所著的 *Japan Past and Present* 的修订版（Knopf 出版社，1953 年版）。

注释

1.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4), pp.1, 140.
2.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Hakluyt Society, Series 2, XXXVII (London, 1914), p.154.
3. 引自 L.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per & Row, 1943), p.200。

中世纪后期西方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因素之上，这一现象是前所未有的。

——小林恩·怀特

第14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然而它们还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引人注目。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正是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1] 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选择出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而这一选择十分正确。然而这三大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它们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政权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在中国只能被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巩固了皇帝的统治，而没有促成正在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的诞生；指南针除了被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被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基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具有多元性，且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正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革命的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时世界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西方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

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2]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准确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阶层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各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未能重新建立起帝国组织，因此这三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很独特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究竟如何运作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拥有地产的人同时拥有政权。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就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在西方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资金支付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这时惟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将地产作为他们从事公共服务的报酬，但接受地产的封臣们却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期间权力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为私人财产。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领主应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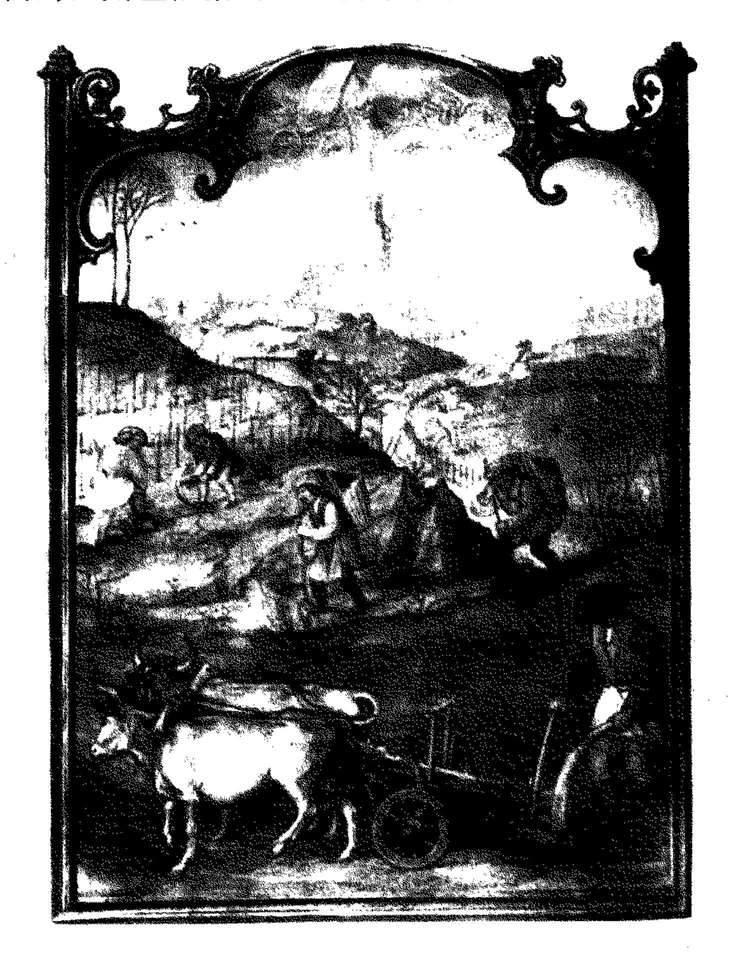


图80　农奴制庄园

作为封建制度的继承形态，庄园制度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奴经济的基础上的。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迅速得到推广。由于大封建主采邑所具有的正当、合法权益名义上来自皇权，所以即使封建主们无意尊重国王的统治权，他们也会非常谨慎地选择国王。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终止而安顿下来时，各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渐渐能够维护他们的封建权力，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构成了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是随着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则是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采邑是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以其劳动养活教会或世俗的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各不相同，其居民少则二十人，多则数百人。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获得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必需耕种属于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所有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

由于远距离贸易、集中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消失，采邑必须为自身提供几乎它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特点，采邑的技术水平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水平相比一点也不逊色。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的村庄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铁匠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3节所述)超过了希腊—罗马时代的水平取得了更大进展，并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罗马天主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即恰恰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教皇才变得更为强大。他无需像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断言“是主教，而不是世俗统治者，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此外拜占廷皇帝一心防备着穆斯林和其他敌人的进攻，这也为教皇在西方加强自身的地位提供了时机。教皇通过两种方式来加强其自身的地位：一种是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结成联盟，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另一种是教皇派出传教团，去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他们成功地组织了承认教皇权威的新教会——如597年成立的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的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的德意志教会等。

当时西方新的多元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下：独立于而非听命于皇帝的教会；取代了帝国朝廷的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了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各自开垦荒地的自给自足的采邑；产生于城市、发展顺利从而对贵族、高级教士、甚至君主有所冲击的新兴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1000年后的500年中是如何发展和调节，以及最终怎样培育起对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的，将在以后

几节中予以解析。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超越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欧洲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而使它在公元1000年后免遭侵略。只要看一看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上发生的事件——13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等，就会明白西欧地处偏远位置的优势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免遭蛮族入侵的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一个地理因素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季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这里的河流终年不冻，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而锯齿形的海岸线则更是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

当然，这些自然资源一直存在，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它们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这种对适当技术的要求在各地和各时代都适用。例如，19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庞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同样证明了技术的必要。中世纪的西欧也是如此，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三、技术的进步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超过了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时期所取得的进步。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奴隶制往往会阻碍技术革新。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边远地区的环境和条件不好，这促进了节省劳动力的装置的发明。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阶层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为了对生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必须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这样一来体力劳

动也就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不具备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欧的技术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从反对古老帝国社会的暴行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教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宣称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教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由此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修建新的修道院他们将定居的前线推进到了北欧和东欧的森林，还引入了先进的农业方法。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首先是"三田"轮作制。这一技术从 8 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任何时候都只有三分之一的田地休耕，而过去使用"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置。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明。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该装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重型轮式犁与原始的爬犁完全不同，爬犁通常用于耕翻地中海盆地贫瘠的砂土；而重型轮式犁则使耕种欧洲中、北部地区那些肥沃但难以耕翻的洼地成为可能。

更有效地利用马的力量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古时候由于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所以马很少被用于农业。然而到 10 世纪时人们发明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于是马拖重物时也就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从而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动力。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它使马驮重物以及耕地变得更为容易。

最后必须说到十分重要的水车和风车。制造水车和风车的技术在希腊—罗马时期就已为人们所掌握，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且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这些技术。而在欧洲北部地区因为不存在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遍及几乎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般性的动力机械。于是，水力开始被用于铸锤和锻造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粉碎机。事实上，英格兰 1086 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中登记了 5000 家磨坊，也就是说每 50 户人家就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 至 1300 年西欧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就出现了 14 世纪的经济大萧条。这次大萧条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其中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斗争。粮食歉收和饥荒在 1315 至 1316 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 1349 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

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爆发。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此以后经济发展就呈现一种普遍上升的趋势。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中欧和北欧地区的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不列颠列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有丰富的木材和松脂,此时对这些物产的开采范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欧洲北部地区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为提高。农民首次开垦了村庄周围的荒地。一个令人惊诧却又千真万确的事实是: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得到开发和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逐渐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迁徙的西进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则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共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万到20万殖民者经营。日耳曼殖民者渡过易北河挤走了东欧的斯拉夫民族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其他殖民者进入了穆斯林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则挺进了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塞尔特人聚居区。



图81 市场透视图

一幅绘于15世纪的透视图,画的是一个11世纪或12世纪的市场。中世纪妇女正在积极开展各种贸易活动,尤其是进行食物和衣物的交易。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也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虽然10世纪时欧洲各地就已有商人存在，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都仅限于奢侈品。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边缘性活动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当时用于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用英国羊毛制成的佛兰德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等。尽管当时从事商业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后期西欧商业



图82　意大利银行

图中所绘为14世纪末的意大利银行。

的巨大发展却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作为地区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形成。意大利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它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在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与内地的联系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后,商人们就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在西欧内地商路沿途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另外沿内地商路发展起来的大集市对商品流通也很重要,其中尤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单就人口和贸易量而言,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这些城市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的地位显得十分独特。可以说,恰恰因为它们是刚刚形成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而这种精神正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可以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社团,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订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附属地区。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规定产品标准、销售价格和工作时间。因而城市也就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事例中得到充分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并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称:“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实体。例如,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打击海盗,并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它们也凭此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城市权力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威的地位。例如,在中国,政府的职位由学者占据;在日本,武士享有权力;在马来亚地区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贵族管理政府,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占据要津。只有在欧洲商人才能获得稳步增长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以及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的利益以及后来的海外冒险事业。

五、新君主国的崛起

到 10 世纪时西欧已经遍布封建小国，这些小国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行将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在随后几个世纪里，西欧社会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发生冲突。诸城邦有时则结成像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联合阵线。然而，与这些组织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是，当时还存在着一股为实现统一的罗马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他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在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的继承者"罗马"皇帝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交织在一起，使得不同层次上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同盟和联盟。

整体来看，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 至 11 世纪，教皇和皇帝总体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罗马教皇权威相对立的拜占廷教会势力。1073 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力开始达到顶峰。教皇和皇帝为了争夺日耳曼主教的任免权而发生冲突，结果格列高里七世获胜，从而削弱了帝国的行政权和皇权。到 13 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上已经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在传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时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颁布《教皇训令》(1302 年)，坚定地阐明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获得救赎所完全必需的前提。"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时却不再能让人心悦诚服。各国君主及其议员们重视各自国家的繁荣远甚于尊重教皇的愿望。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不久便抑郁而亡。1305 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被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就任，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 70 年间阿维尼翁教皇成了法王的爪牙，失去了其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至尊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贡献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作为回报，新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保护商人利益而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各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和国家法令的实施，民族君主国出现了。到 15 世纪，民族君主国的范围已初步涵盖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强大而新兴的政治实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的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却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地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航海冒险家。

六、文艺复兴的酝酿

中世纪西方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且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因为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构成了西方文化史上的“黑暗时代”。在当时那种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的状况下，也是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虽然修道院的教士们的确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侧重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也就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教会的一个补充，完全依附于教会。



图83 博洛尼亚大学的讲座

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大学以其作为罗马法复兴中心的地位而著称于世。这幅绘于一位博洛尼亚大学法学教授墓中的浮雕表现了学生们正在听他的一堂讲座。

11 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明显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也不像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而是又另外开设了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 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在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也创办了一些大学。14 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又建立了一些大学。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这一培养重点是当时背景下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

随着大致从 1350 年至 1600 年间文艺复兴酝酿时期的到来，这种教育和学术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开始，因而它反映出当时意大利社会的基本情况和价值观念。意大利当时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社会，建立了蓬勃发展的工业，并在西欧和富庶的拜占廷以及伊斯兰教帝国之间进行贸易。较大的商人家族主宰着政治、贸易和手工业，并控制着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和比萨等繁华城市。正是这些商人家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的资助者。尽管这些资助者中也包括像米兰的斯福尔扎这样的公爵家族和尼古拉斯五世、庇护二世、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九世等一些教皇，但商业家族的需要、兴趣和品位却更多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因而文艺复兴的世俗主义和人道主义也就更关注现世而非来世，更注重异教的经典而非基督教神学。

文艺复兴的天才

绝顶聪明的里昂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中的一位卓越人物。他使其所处的年代变得生机勃勃，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如此多的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是因为他乐于施展他的才华。三十岁时，他给米兰公爵写了以下这封信，后者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并雇用了他。*

1. 我为建桥制定了计划。桥要建得轻巧、稳固，以便于运输，这样就可以追逐敌人，并屡次打败他们；而有些桥则要设计得非常坚固，无法被烈火和进攻所破坏，同时还要便于我们撤退和部署兵力。我也制定了焚毁和破坏敌人桥梁的计划。

2. 当一个地方被包围，我知道如何切断引自壕沟的水源；我还懂得如何建造大量的桥，如何制造盾牌、云梯和其他与军事相关的器具。……

4. 我还打算制造大炮。这些大炮应该便于运输，能够投掷冰雹般的小石子，它们落地产生的烟尘能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惧、迷惑和损失。

5. 为到达某一个固定地点，尽管有必要在壕沟或水下行进，但我还有办法通过

洞穴和蜿蜒的秘道悄无声息地到达那里。

6. 我还能制造安全而不受攻击的装甲车。这些装甲车可以进入敌人密集的阵列里，尽管他们装备了大炮也无济于事。手持武器的人的力量还远不能攻破它。步兵可以安全地跟在后边而不受攻击。……

9. 如果战斗发生在海上，我打算建造许多既适合于进攻又适合于防守的发动机，以及能够抵抗最猛烈炮火和烟尘的船只。

10. 在和平时期，我相信在建筑上、在公私用房的建造上，以及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引水工程上，我一样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令您完全满意。……

如果有谁认为上述事物不可能实现或不实用，我很乐意在您的公园里或阁下喜欢的任何地点进行试验。再次对阁下表示最真诚的敬意。

* J.P. 和 I.A. Richter 主编，*The Litreary Works of Leonardo da Vinc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92, 93.

文艺复兴提倡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均有体现。所谓的文艺复兴文学之父，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修养的手段和社会行动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与此类似，文艺复兴时期成立的新寄宿学校并不是培训牧师而是培养商人的子弟。学校开设的课程注重古籍研究和体育训练，对课程的设计围绕着教育学生快乐而健康地生活，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公民。

文艺复兴的精神在艺术中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自从教会不再是艺术家的惟一资助者后，艺术家们便被鼓励着转向圣经这一传统主题以外的其他主题。虽然宗教主题仍然频繁出现，但是在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提香等大师的作品中，其创作重点已越来越转向揭示深层灵魂的奥秘，和试图以醒目的色彩和形式来使人赏心悦目。

文艺复兴并不只局限于意大利，16世纪这股革新风潮传播到了北欧。有两个因素对这种传播发挥了作用，即意大利的外交官和将领，他们被北部的君主国和印刷行会所雇用，这加速了书籍和思想的流通。由于北欧地区比欧洲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文化水平高，因此印刷业在北欧尤其具有影响力。大量印刷读物的涌入煽动起人们对政治和宗教事务的极大热情，从而对改革和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起了极大的作用。

那么归根到底，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的意义何在呢？显然，对于人类可做到的事情的关注，比起先前的中世纪世界观来说，更有助于海外扩张的进行。在西欧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酝酿，而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则没有出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二者在大规模引入方面的根本差异。

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主导着社会。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革新发明，因而它成为在各方面保持现状的最佳工具。这种和谐而正统的气氛阻碍了思想的继续发展，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在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上取得了最初的辉煌成就但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这些早期发明此后并未

形成一个以科学原理为基础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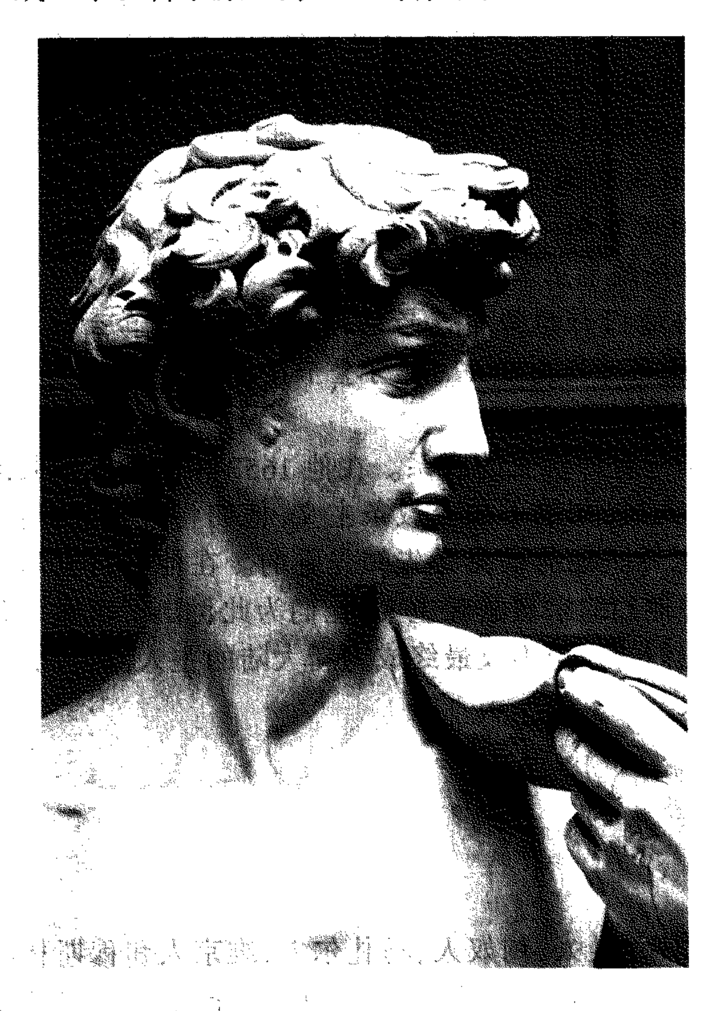


图 84 大卫像

年仅 26 岁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于 1501 年雕成的大卫像成为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象征，并被陈列在维奇洛宫 (Vecchio) 的前面。本图突出的雕像的细节，展现了雕像赖以成名的压抑的情感和尊严。

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情况基本相同。比如说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比较看重神学、法学、修辞学，为此而放弃了天文学、数学、医学。从这些学院出来的学生对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了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穆斯林土耳其人不相信那些基督教异教徒能教出哪怕一丁点有价值的东西。不过，时不时也会冒出一位稀有的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留意这张正在将奥斯曼帝国与其周边基督教徒分离开来的知识铁幕的危险性。生活于 17 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土耳其书志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历史学家卡提比·舍勒比，就是这些大声疾呼的人中的一员。由于家境贫寒，舍勒比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学校教育，但就像古话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也因之而得以免受当时那种典型的奥斯曼教育，即潜心进行肤浅而教条的穆斯林神学研究。舍勒比的自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他能对西方知识保有思想上的开放性。

在舍勒比众多的著述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这本手册是他在 1656 年土耳其舰队在海上遭遇一次惨败经历后有感而发而编写的。他在书中前言里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

>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是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与其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率军征战时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了解敌国的情况，同时使得边防前线的保卫变得容易。征求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的意见是得不到满意的效果的，即使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不能完整地绘制出本地区的草图。
>
> 能充分并有力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必要性的证据是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他们学习并应用这些知识发现了新大陆并占据了整个印度市场。[3]

舍勒比发现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在他1657年临死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舍勒比警告他的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在他身后土耳其人仍然像其他非西方人一样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基督教的异教徒通过运用他们的知识不仅最终成为新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至10世纪之间，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札尔人、维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10到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见地图18）。各路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东正教拜占廷帝国。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在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随后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他们攻击异教徒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一段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性的进展，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征基本上是这些进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力充沛，十字军东征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向前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开始加速，从而使得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了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探险者及其支持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

于宗教方面的考虑。13 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而希望他们能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还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传说中约翰是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首领一直梦想与他建立联系，然后从东、西两面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然没有找到祭司约翰，但却在非洲和美洲偶然发现了一些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它们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皈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是最强烈的世俗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想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并发财致富。"[4]

西方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也直接促进了其对外扩张。1200 至 1500 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600 吨到 800 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 150 吨到 200 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 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舵，迅速代替了陈旧的、低效率的边舵。14 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集中了北欧、地中海和中东船只各自的技术革新精华。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耗费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 100 到 200 个划桨手及其食物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图 85 法国教士给一个印度人进行洗礼

这位身着特色鲜明的天主教教袍的基督教教士正在新法兰西给一个印度人进行洗礼。法国基督教教士在容忍印度人皈依基督教后至少保留一些自己的习俗方面做得比其他欧洲的教士都要开明一些。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与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齐头并进的。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的领先地位。过去的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并在甲板上展开的肉搏战。16 世纪前 20 年，佛兰德和德意志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 300 码内的船只。

海战因此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达4个世纪之久,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全歼俄罗斯人,取得了东方人划时代的胜利。

伴随着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技术革新。意大利复式簿记法的发明方便了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另外货币日渐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也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现,以及中世纪基督教逐渐放弃对贷款和收取利息的谴责和排斥,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更是极大地加强和促进了商业经营。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得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其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能竞争得过东印度公司和东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逊湾公司等大型合股公司。

最后,上述几种因素的结合使得欧洲具有催人奋进的、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从欧亚大陆对15世纪穆斯林世界扩张的各种反应中就可以看出来。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当时的伊斯兰教呈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随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向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入侵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军人、商人、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区。它占领了欧亚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对从当时到现在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确切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回了。蒙古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更是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中国的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敕令发出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从而自愿放弃了其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则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无止境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理视界和商业野心,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给了他们以沉重打击,让他们留下了对该帝国的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各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被困在了欧亚大陆的西端。诚然,由于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往来,并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这使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作为经纪人获利甚厚,他们为此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就并非如此幸运,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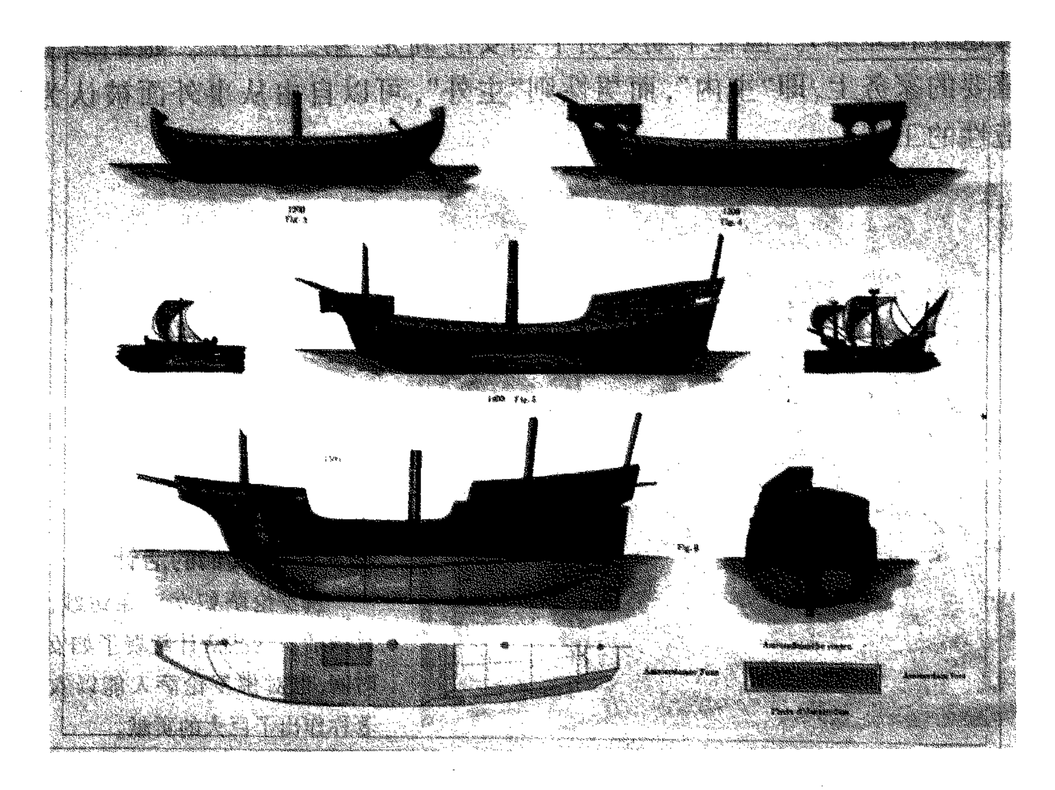


图 86　帆船的演变

在欧洲人能够安全地在大西洋上航行之前，他们需要得到更大、更易于操作的船只。这幅草图表现了帆船从中世纪到 15 世纪的演变历史。技术上的改进包括建造更大的舵、设立更多的桅杆，以及对风帆进行重新布局。

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他们的追求注定要成功，因为他们具有专门技术、经济实力和活跃的思想，并面临着其他君主国的激烈竞争。欧洲没有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还就此展开了狂热的竞争。另外欧洲确实需要并强烈要求外国产品的进入，对此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即使哥伦布当时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做到这些。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就必将扫清海路，势不可挡地向全球扩张。

八、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考虑到当前全世界不同社会中人们对女性地位的争议，有必要探讨一下中世纪欧洲新文明的出现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在旧石器时代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两性之间的关系比此后任何时候都要平等。随着农业和文明的先后出现，妇女逐步丧失了其平等地位，变得顺从而且依赖。不平等的程度因地区而异（如在希腊的不同城邦中就各不相同），也依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不平

等的程度也存在差异)。但在早期文明中妇女的确是"第二性别"。她们的工作局限在不太重要的家务上,即"主内",而男性则"主外",可以自由从事外面被认为是重要而有创造性的工作。



图 87 妇女们的活计

佛罗伦萨妇女正在纺纱、织布和做针线活。这些活计耗费了妇女们的许多时间,也对佛罗伦萨人能以衣着夺目而著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世纪的几千年中这种局面持续存在。在此期间,一种革命的新文明逐渐在西方出现。但新文明中的某些修正应当引起注意,它们对当今女性的地位仍有一定意义。

在西方新文明中女性的地位主要由两种制度决定——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在理论上讲,教会主张两性之间的平等,这类似于它主张的种族平等和阶级平等。"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孩子,应对基督表示虔诚。"圣保罗写道,"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约束,也没有自由;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因为在基督的眼中,你们全都一样。"[5] 然而,在实践中教会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却极度含混不清。它将女人视为夏娃,即亚当的妻子,因此是诱惑男人的人,是拯救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教会也将妇女看作"有福的"玛丽亚,她是圣母,是贞洁的女王,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节者。因此中世纪的妇女发现她们自身的地位上下摇摆不定。在教会内部,妇女不能被授予牧师的神职,也没有布道的权利。

然而教会却专门为中世纪的妇女设计了一个重要机构,即女修道院。它被描述成"针对特定阶层的机构"[6],因为要做修女的人必须带来一份嫁妆——这一点虽然教规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却约定俗成。尽管这份嫁妆不如丈夫们所期望的多,然而它却表明了女修道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来自贵族家庭以及中世纪后期商人家族中有钱妇女的。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妇女都要结婚,而且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有少量的妇女找不到丈夫,或许是因为非法出身或生理畸形,也可能是缺少嫁妆,或是甘愿一辈子做基督的新娘,而不是某个男人的新娘。

对于这些个别情况,女修道院为这些妇女提供了婚姻生活之外的一种选择。此外,修道院里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比外面的生活优越。修女们通常能比他们世俗的兄弟姐妹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修女出奇地有野心、有才干,那么她可

以升到女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上，担负管理大量地产和 80 名修女的责任。在这些修女中，有一些在侍奉圣父的幽静生活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少数人还作为伟大的圣徒被人怀念。另有一些人则在修道院中找回了自尊和对社会的尊重，以及免受男人权威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女修道院中才能获得。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悲哀地将自己视作社会的弃儿："我自身条件不好，配不上男人，所以被留给了上帝。"[7]

对中世纪妇女影响最大的第二种制度是封建制度。在这种体制中地主将土地分给诸侯以换取他们的军事保护，因此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封建地产和军事义务被传给单身的男继承人——只有在没有男继承人的情况下女人才能继承。中世纪的妇女一生中都在男人的监护之下——首先是她的父亲，然后是她的丈夫。如果丈夫死了她就成为封建地主的被监护人，封建地主将她的地产所得揣进自己腰包，直至她再嫁为止。地主有权决定她应该嫁给谁，所以地主可以将她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反过来如果这名妇女不想嫁人，或想要自己选择配偶，那么地主可以从她那里强行获得一笔钱。这种状况司空见惯。而贵族妇女还要忍受闲极无聊和漫无目的生存的苦恼。打理家务、照看孩子的事情一般都会由管家和女佣来做。因此如果她们的丈夫没有去打仗或出席朝廷的会议，她们就会无所事事。本质上，这些贵族妇女悲惨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社会上政治经济联盟的形成充当工具，以及为她们所嫁入的家族生育继承人。

在很大程度上，村镇中的劳动妇女则可以摆脱这种依赖和边缘的生活。因此，令人费解的是，中世纪妇女地位的高低"大致与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反比"。[8] 农村女子中的绝大多数都会结婚，并在操作每一种农活时都与她们的丈夫不分上下。少数几个不结婚的女子通常都是出身于最贫穷的家庭，所以她们会离开自己的村庄，到城里去做女佣，或在邻近的村子中受雇做农活，以此来养活自己。以下这条中世纪时期的谚语反映了当时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辛劳程度：

> 天气不好会使丈夫们能有片刻的喘息之机，而家庭妇女的活儿却永远也做不完。[9]

与此类似，城镇中的妇女几乎活跃在各行各业中。这在 13 世纪时厄提尼·伯依路(Etienne Boileau)所著的《行会介绍》(*Book of Trades*)一书中表现得很明显，书中列举了巴黎所有行会的规章。在名列其中的 100 个行会中，有 86 个行会有妇女存在。中世纪时，常在一些英语单词后加上"ess"或"ster"的后缀来描述由妇女从事的工作，这也表明了妇女的角色是何其重要。例如：

Webster：	女纺织工
Brewster：	女啤酒师
Baxter：	女面包师
Laundress：	女洗衣工

Seamstress: 女缝纫
Spinster: 女纺纱工
Governess: 女教师

中世纪妇女承担与男性同等的负担和责任,但却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在农村里,家庭主妇总有做不完的活儿,但她们却被排除在决策机构之外。她们不能担任公证人、教区牧师、领地法庭书记的职务;村里地主的会议通常只由男人参加,妇女不能参加,但未婚或孀居的女地主除外;拥有土地的已婚妇女由其丈夫代表参加所有的村会。而在城镇中,妇女虽享有诸如参加行会、拥有财产以及从商的经济权利,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这样她们也就不能选举或被选入城镇的政府机构。

在中世纪的欧洲,两性关系中的内在不平等性在当时常见的一些做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一是丈夫殴打妻子,这在当时较为盛行。正如一句佛罗伦萨谚语所说:"一个好女人和一个坏女人同样需要棍棒的管教"。13世纪时法国有一条法律规定:"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男人打了妻子,男子可以免于惩罚。当一名妇女侮辱了她的丈夫,丈夫有权力殴打她,只要别把她打死或殴残就行。"[10] 性别不平等还表现在传统上人们一直对通奸所持有的双重标准。国王、贵族和商人可以公开供养情妇并非法生育孩子,但是偷情的妻子却要被羞辱并受到严厉惩罚,她们的情夫会被割去睾丸或杀掉。而且人们还想当然地认为上层社会的男子可以随意获得下层社会的妇女。12世纪时一本名为《高尚爱情的艺术》的书鼓励一名对一个农家女孩想入非非的勋爵"毫不犹豫地用强力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去拥抱她。"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应安心做一些"女人的琐事",而男人则要忙于做一些"大事",这种观念同样体现出当时两性间关系的不平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利奥·巴蒂斯塔·阿尔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5世纪30年代写道,男人应该把对"小事的操心"留给他们的妻子,以使自己能不受牵绊做一些"有男子汉气概的、光荣的事业"。[11]

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农业革命之后两性关系所发生的关键性转变,当时在女性从事的无足轻重的"内务"和男性从事的重要"外务"之间出现了区分,女性由此而丧失了平等的地位。一旦这种区分被接受,它就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变得根深蒂固。但重要的是,这种区分不仅贯穿于相继出现的古代文明,而且在西欧出现的新文明中也有所体现。在中世纪末期,不管技术如何进步、经济如何发展、政治如何改革,欧洲妇女的地位仍然深受过去习俗的影响。几个世纪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发展并未改变人们固有的性别歧视观念。过去战胜了今天,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今天,就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样的情况仍旧依稀可辨。在以下1915年卡贝尔县(Cabell位于西弗吉尼亚)教育董事会在学校公报上颁布的"女教师行为准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 在合同期限内不得结婚。
2. 不得同男人交往。
3. 除参加学校活动外，晚 8 点至早 6 点之间必须在家。
4. 不得在城中的冰淇淋店闲逛。
5. 除非得到董事会主席允许，否则不得出城旅行。
6. 除父亲和兄弟外，不得与其他任何男性共乘马车或汽车。
7. 不得抽烟。
8. 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衣物。
9. 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染发。
10. 至少穿两件衬裙。
11. 裙子不能短于脚踝以上两英寸处。
12. 为保持教室清洁整齐，每天必须至少清扫地板两次；每周必须用热肥皂水擦洗地板一次；每天擦黑板至少一次；早 7 点生火，以使 8 点钟时教室能够保持温暖。[12]

推荐读物

关于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之后西欧的发展见第 12 章的参考书目。能从全球角度对中世纪欧洲作出重要而有启发意义研究的读物是：R. L. Reynolds 所著的 *Europe Emerges: Transition Toward and Industrial World-Wide Society* 600—175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出版社，1961 年版)。关于中世纪西方历史优秀而有概括性的著作是 R. S. Lopez 所著的 *The Birth of Europe* (Lippincott 出版社，1966 年版)。

对封建制度的最好介绍是：J. R. Strayer 所著的 *Feudalism* (Van Nostrand 出版社，1965 年版)；和 M. Bloch 所著的 *Feudal Society*, 2 *vo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61 年版)。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参见 J. LeGoff 所著的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Economy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 (MIT 出版社，1988 年版)；R. H. Bautier 所著的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Europe* (Harcourt 出版社，1971 年版)；R. S. Lopez 所著的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71 年版)；B. H. Slicher van Bath 所著的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 (Arnold 出版社，1963 年版)；L. White Jr. 所著的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s* (Clarendon 出版社，1962 年版)。关于君主国家的兴起，见 B. Guenee 所著的 *States and Rulers in Later Medieval Europe* (Blackwell 出版社，1984 年版)。对文艺复兴的优秀的概括性的介绍是：W. K. Ferguson 所著的 *The Renaissance* (Torchbook 出版社，1940 年版) 和 P.

Kristeller所著的 *Renaissance Thought*, 2 vols. (Torchbook出版社, 1961—1965年版),以及W. Pater所著的 *The Renaissance* (Meridian出版社, 1961年版)。最后,为何是西方而非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在海外扩张中居于领先地位,在以下读物中进行了分析:J.R. Levenson主编的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 1300—1600 (Prentice Hall出版社, 1967年版); D.L. Jensen主编的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Heath出版社, 1967年版); El L. Jones所著的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 1981年版)。关于为何欧洲领先于其他大陆一问题的最新著作是A.W. Crosby所著的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 (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 1996年版),其中强调了新技术和从精确计量的角度对宇宙形成的新思维的作用。

关于中世纪妇女研究的先锋性著作是一项至今仍很有价值的调查,即E. Power所著的"*The Position of Women*," C.G. Crump和E.F. Jacob主编的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 (Clarendon出版社, 1926年版), pp. 401—434. 近期重要的作品是:S. Shahar所著的 *The Fourth Estat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Methuen出版社, 1983年版); F. and J. Gies所著的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Crowell出版社, 1978年版); S.M. Stuard所著的 *Women in Mediev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出版社, 1976年版);和S.H. Gross和M.W. Bingham所著的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 (Glenhurst出版社, 1983年版)。

注释

1.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aphorism, p.129.
2. Cited by R.S Lopez, *The Birth of Europe* (Lippincott, 1967), p.146.
3. Cited in manuscript by L.V. Thomas, *Ottman Awareness of Europe, 1629—1800*.
4. Cited by J.H.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3), p.19.
5. Galatians 3:28.
6. Eileen Power: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C.G. Crump and E.F. Jacob, eds.,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 (Clarendon, 1926), p.413.
7. Eileen Power,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c. 1275—1535* (Cambridge University, 1922), p. 31.
8. F. and J. Gies,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 (Crowell, 1978), p.232.
9. S.H. Gross and M.W. Bingham, *Women in Medieval-Renaissance Europe* (Glenhurst, 1983), p.84.
10. Ibid., p.46.
11. Ibid., p.228.
12. Republished in "Dear Abby" column by Abigail Van Buren,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7, 1979.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发达社会与“遏止领先”

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默默无闻中崛起。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即从约500年到1500年，西方都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然而西欧的这种不发达较之中国的发达反而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反过来成为抑制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意识基础的儒家学说。于是中国人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并将外国人视为“野蛮人”。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认为从这些奇怪的“大鼻子野蛮人”身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值得他们学习。

这种态度尽管可以被理解，但它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能发生变化。相反，西欧人却恰恰因为自身比较落后，所以他们渴望学习并积极创造。他们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成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这一转变的先锋和受惠者。

在从一个历史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中落后的边缘地区反过来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形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各古代文明期间(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中东是发达的文明中心地区，它在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革新。但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地区在从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的转变中却落后了。而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边缘和比较落后的地区，在古典时期富有创造力的革新中充当了先锋。这些革新中产生的新事物包括儒家学说、印度教和基督教等新的宗教信仰，以及冶铁术、铸币和字母表等技术的有效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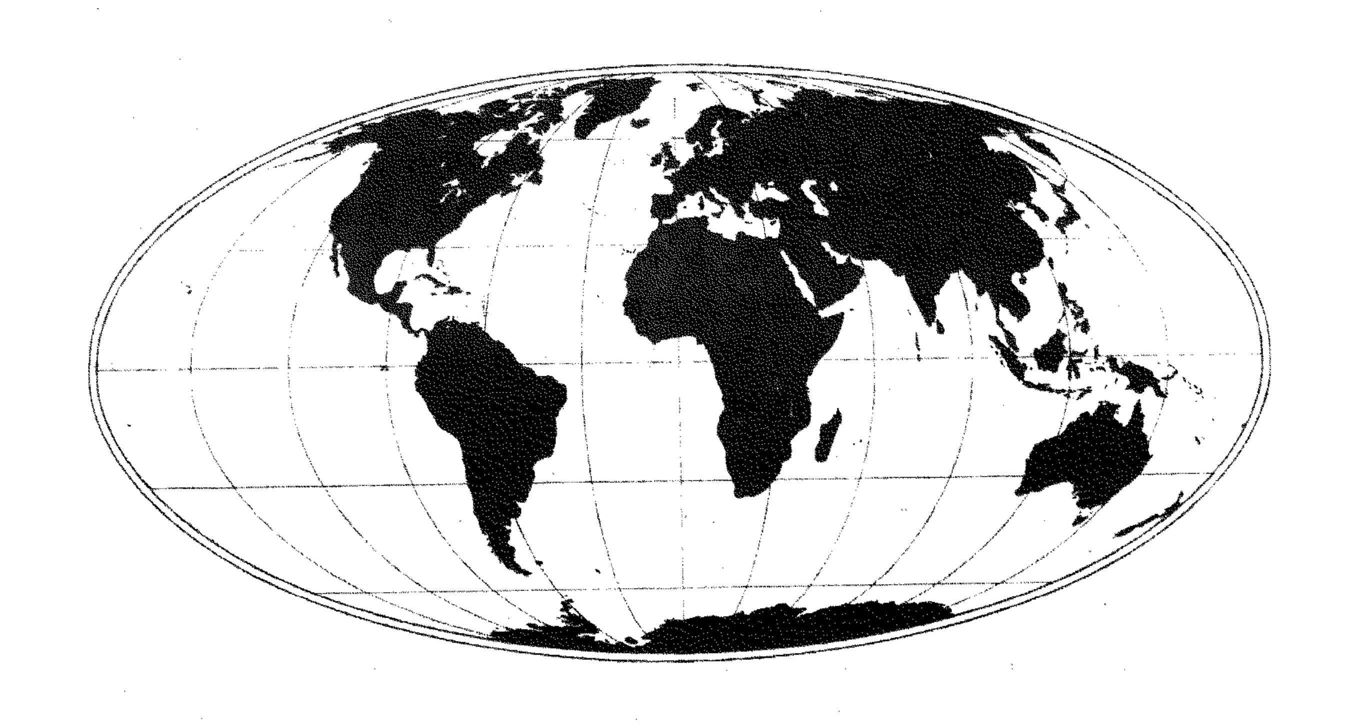
这种发展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事事领先”，人类学家将此称为“遏止领先法则”。该法则认为，在转变时期起先最发达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将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则可能更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逐渐处于领先地位。

今天，西方社会作为中世纪西欧的继承者，已不再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而

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法则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明显的。而且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转变的时代,历史发展的速度与中世纪相比已大大加快。仅从二战后几十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来看,这种加速发展也十分明显: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从战争的蹂躏中迅速恢复;苏联突然间发生政治解体,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世界地图上的一个空白地带。在这样一个变化不断加速的时期,适应能力对个人和种族的成功——或许应该说是对个人和种族的生存——至关重要。林顿·B.约翰逊总统告诫其美国同胞的格言对这种情况做了最好的概括:"我们必须以变应变。"

推荐读物

"遏制领先"一词的完整含义见 M.D. Sahlins 和 E.R. Service 主编的 *Evolution an Clu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出版社,1960 年版)和 E.R. Service 所著的 *Cultural Evolutionism: Theory in Practice*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出版社, 1971 年版)。



第四编

公元 1500 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此编之前，我们一直在集中论述欧亚大陆世界的历史。现在我们开始考察世界的非欧亚大陆部分的历史。之所以将这两部分历史区别对待，其原因在于在此前的历史阶段中，事实上欧亚大陆部分的历史与非欧亚大陆部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发展、互不相干的。公元1500年以前的历史中，欧亚大陆与非欧亚大陆部分很少有什么交流。从范围上来讲，这几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历史，而不是全球范围的历史。一旦人类分散到各个大陆，各个群体之间就失去了联系。随后几千年里，人类各种群封闭地生活在各自的大陆。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人类技术水平的发展不但导致了人类在早期的分散和封闭，而且在之后又使得他们逐渐交往、重归统一。

我们早在第1章第3节中就注意到，在旧石器时代，当我们的祖先刚学会如何使用工具、缝制衣物、控制火源的时候，他们就有能力离开人们普遍认为是他们最初的故乡的非洲，四散开去，占领了除南极洲以外所有的大陆。但一旦安顿下新家之后，他们却再也无法和留在家乡的亲戚保持联络了。因为他们的技术太原始了，根本不能让他们往返穿越将各大陆隔开的海洋。尤其是在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连接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大陆桥和南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中转岛屿被淹没之后，人类就更难跨洲互访了。由于这一原因，人类各移居点在地区封闭的情况下存在了几百万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造船和航海技术高度发展之时，当时技术的进展使得中国人能经由东南亚作穿越印度洋的航行；同样，西欧人也能取道非洲南端和南美，作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环球航行。如此一来，散布在全世界的人类又能重建彼此间的直接联系了，由此掀开了人类历史世界性阶段的崭新一页。

由于欧洲在海外扩张中领先，他们的教科书着重强调了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强调了他们的发现以及随之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态度对全球历史来说是不适当的。全球性的观点不仅要考虑扩张中的西方，而且要考虑西方扩张所至的各地区。毕竟，这些地区的人们构成了人类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发展演进过程也不能被忽视。另外，非欧亚大陆的国家、民族和制度在决定西方扩张主义的结果方面，同西方人一样，是十分重要的。鉴于这些原因，本书接下来的两章将叙述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历史。

树木葱茏的尼日尔河谷，
旁侧是蜿蜒曲折的沃尔特平洼；
乞力马扎罗山的山坡，
披覆着冰雪的晶莹光华。
这里是广袤而难以捉摸的非洲，
那个历史悠久的亚非利加。
——米歇尔·德-阿隆(加纳诗人)

第15章 非 洲

在世界地图上一眼就能看出非洲位置居中。北面，地中海将它与欧洲分开。地中海水域狭窄，易于穿越，它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快捷通道的功能。东面，西奈半岛提供了一个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则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于穿越。印度洋虽然非常辽阔，但它的季风可以使来往于东非和南亚的交通非常便利。

然而在历史上非洲却被错误地看成与欧亚大陆以及世界的其他部分相隔绝，孤悬于其他地区之外。这种以为非洲十分孤立的观念影响了这片大陆的历史进程。与之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在强调这个大陆的孤立，强调在这个时期非洲从外部世界借鉴了许多东西。但是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当有意义的交流和互动发生时交流才能存在。本章将考察非洲内部的发展及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

一、地理环境

综观非洲大陆，其南北两端是小而肥沃的狭长地带。这些狭长地带很快就让位于广袤无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绵延起伏的草甸或大草原，北部以苏丹草原最为著名："苏丹"这个阿拉伯词意为"黑人之国"。然后是热带雨林，要穿越其最稠密的地区比穿越沙漠还难。

非洲大陆广阔而又富于变化，这种地理上的多样性经常给非洲人提出挑战，但

它从未被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是在非洲地理上条件最差的部分，土著人也创造了重要的文化和文明。

非洲经常被人为地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划分为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但是在历史上撒哈拉沙漠从来就不是非洲大陆的分界线或隔离物。在非洲大陆的早期历史中，这种观念上的障碍使得外人以为非洲难以穿越和征服，因而阻止了他们的入侵。然而非洲并未完全与外界隔绝，纵横交错的商路联通着非洲的各个地区，它们还穿越红海、地中海以及印度洋将非洲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在很早的时期非洲就建立了比较高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它们有效地控制着贸易、商路和市场，并在大多数时候使潜在的入侵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考察非洲大陆的政治组织时，非洲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都会非常强调集权制的王国、诸侯国和帝国的作用。除了有组织的国家之外，非洲还存在许多团体，它们不是集权制的，但也演进为运转顺利、能很好地为当地人服务的统治结构。比如说，生活在尼日利亚的、数以百万计的伊格波斯人(Igbos)就从未建立过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二、农业和铁器

人们经常以为非洲的技术和农业是从欧亚大陆引进的。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正改变着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这些发现表明，非洲许多地区早在公元前就掌握了冶铁知识、制造出了铁器。不同地区出现铁器生产的时间如下：在大湖地区，即现在的坦桑尼亚，是公元前7世纪；在梅诺(Meroe)是公元前5世纪；在西非的诺克(Nok)是公元前4世纪；在东非的北部大湖地区是公元前3世纪。这意味着在很多地区铁的使用可能都是在当地独立发展的，而并非从外部世界引进。这些最初使用铁器的人们可能一直没有将这一秘密外传。但是在公元2世纪到5世纪之间，班图族农民获得了铁器技术，并将其传播到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人们通常都认为班图人从西非到中非、东非和南非的迁移是一种大规模的移民，但实际情况却是班图人常常是小规模的缓慢移动，并且经常与当地人通婚。班图人在公元前5世纪到达现在扎伊尔所在的地区，但是2世纪到5世纪之间铁器的广泛传播使得班图人能够更加迅速地渗透到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铁器的出现给欧亚大陆带来了广泛的影响，非洲也是这样。在欧亚大陆，铁器的使用使农业能够扩展到中欧、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非洲，铁器作锄刃的锄头和铁器包头的斧头也将农业带进了非洲的森林。结果是提高了农业产量，也有了剩余的农产品可以用于贸易。正如在欧亚大陆一样，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了社会分工——在原来只有简单血缘关系的地方产生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划分。接下来在约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成型的国家结构；另外作为对国家

必要的支持，军队与行政管理和税收来源也都已经具备了。



图 88　锻造铁制锄头

早在欧洲人来到非洲之前很久，非洲人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制的工具了。这幅取自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所著的《最后的日志》一书的插图，表现的就是非洲人正在锻造铁制锄头。

技术的进展情况影响了非洲大陆的种族构成。黑种人能够得到先进的技术，因而率先采用先进的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获益；而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则因无法得到这些先进技术，自然也就无法从农业和冶铁技术中得益。因此黑种人数量的增加远远超出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他们凭着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向南推进，使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绝大多数讲黑人语言，它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公元初期渗透到刚果盆地，并在那里与人口逐渐减少的布须曼人形成了共生关系。公元 600 年到 900 年之间他们又从刚果盆地向南推进到了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征服了布须曼人(原文如此)。这些迁移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到达的时候黑种人是主要的种族集团，而在 1000 年以前他们却和高加索人、布须曼人、俾格米人一起非常平均地分享着这块大陆。

非洲农业

在距今 7000 年前撒哈拉变成沙漠以前，这片地区曾经支持了一个畜牧社会，这里放牧着成群的牛羊。那里的人们也用镰刀来打鱼和放牧——在这里的古代遗迹中人们发现了这些镰刀。

现在还无法得知当地人开始种植作物的确切时间，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这一地区的农业系统在不断发展，并且养活了大量的村庄人口，形成了大片的市场和贸易中

心。诺克、贝宁、加纳、马里和其他苏丹以及东非王国的文化都是在这些贸易中心的基础上出现的。

作物与非洲人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其他地方的人民也莫不如此,即使上溯到人类的最初阶段,人类与作物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农业在埃及的出现是公元前6500年左右的事,但是用于大面积收割的整套工具和粮食作物的出现却可以追溯到距今18 000年前。有证据表明,这些整套工具是非洲的,而不是近东的。在埃及的考古证据显示,该地区最早的农夫在6500年前也放牧牛羊,并在凉爽的季节种植诸如大麦、二粒小麦、亚麻、小扁豆和鹰嘴豆等作物。



图89 非洲传统农业技术图

一位现代非洲画家绘制的非洲传统农业技术图。图前部左边的妇女正在一个大石臼里碾米,而她们后上方的男人则正在锄地和收割。

在西非森林地区早期也种植橄榄油、豇豆、高粱等作物。这些作物的培育技术并不是外来的。例如,在热带大草原地区培育的水稻就被认为是当地原产的;而且在埃塞俄比亚培育的作物也是非洲本地的,没有从外地引进的证据。

三、伊斯兰教

非洲确曾受到伊斯兰阿拉伯人的影响，后者在公元7世纪横扫整个北非，随后以商人和殖民者的身份沿非洲东岸扩张。伊斯兰教从这些沿海的基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生活的外在方面，如姓名、服饰、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方面。此外，它也表现在随着与外界交往的扩大而带来的农业与技术的发展上面。例如，在东非阿拉伯人就从印度引进了甘蔗和水稻。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结在一起，促进了贸易。比起罗马人，穆斯林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他们增辟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从而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的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



图90 迪京格热伯清真寺

坐落于廷布克图的迪京格热伯(Djinguereber)清真寺。这座由泥土和木头建成的建筑是一座具有典型的苏丹西部风格的清真寺。清真寺突出的塔楼是伊斯兰教存在的标志物。它证明伊斯兰教曾经由陆上的商路传到过中非和西非的廷布克图等地方。

珠宝、贝壳念珠和在贸易中占首要位置的盐。盐在苏丹全境十分紧缺。反过来，非洲则提供象牙、黑奴、驼鸟毛、可制香水的香猫，以及最重要物品——产于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上游的黄金。产于该地区的大量黄金最终流到了欧洲。事实上这些黄金的数额十分庞大，它们对平衡中世纪欧洲对东方贸易的巨额赤字起了重要作用。在苏丹与北非的贸易中，双方都有利可图，以至于到了15世纪整个西非商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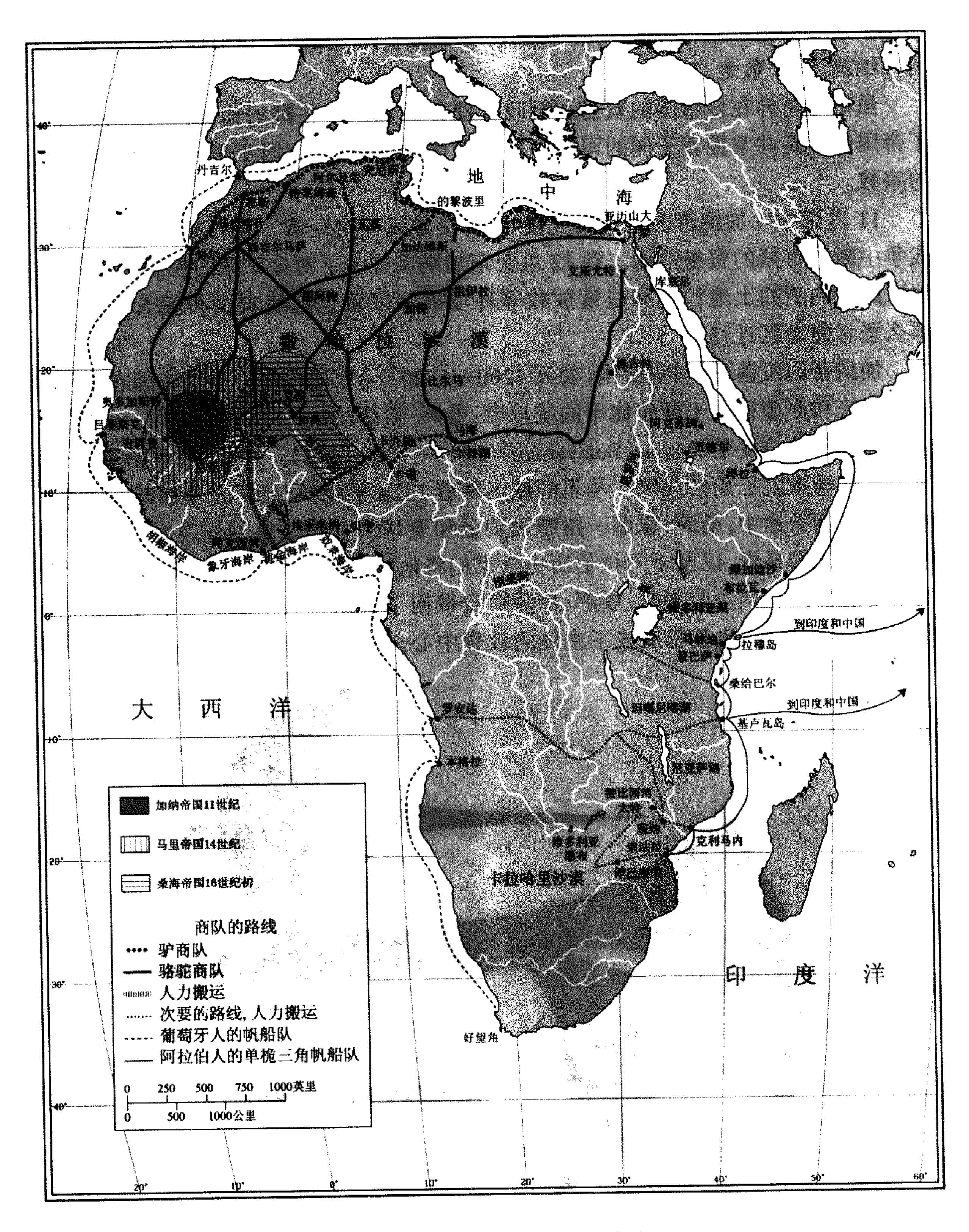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类似的贸易模式也在东非发展起来。呆在沿海地区的穆斯林中间商派代理人去非洲内陆，从今天津巴布韦所在的地域收购象牙、奴隶和黄金，从加丹加收购铜。这些商品通过当时由穆斯林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还从非洲内陆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则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在非洲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口城市和城邦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即如地中海成就了北非与中东和欧洲的人民之间长达好几个世纪的交流一样，印度洋也成就了东非与中东、印度、南亚以至于远东的人民之间的类似交流。

现在我们来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极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教会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布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它为菲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一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辽阔，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和谐。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臣子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还会领导自己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协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伊斯兰宗教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帝国权力拴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服务的人。

四、贸易与苏丹帝国

伊斯兰征服者给跨撒哈拉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使这一贸易与实施依赖黄金的货币制度的穆斯林世界联系起来。最先与跨撒哈拉贸易相联系的是加纳帝国（约公元400—1200年）（参见地图19），该帝国由居住在撒哈拉以南草原上讲所尼基语



地图 19　非洲大陆的帝国和商路

(Soninke)的非洲人建立。尽管我们不知道加纳帝国建立的准确日期,但在公元5世纪时它就已经存在了。加纳帝国的名声远远超出撒哈拉地区,并远播到巴格达。曾在位于该城的阿巴西德(Abbasid)哈里发的宫廷中居住过的阿拉伯作家阿尔-法扎里将加纳描述成“黄金之国”。

虽然穆斯林在该帝国的贸易和行政管理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国王却控制了帝国的贸易并掌控着王国的司法。尽管有穆斯林的存在,国王仍旧坚持自己祖先的宗教。

11世纪中叶加纳帝国达到其全盛时期,接着就开始衰落。宗教冲突和毁灭性的战争中断了帝国的贸易活动。到12世纪末加纳又失去了对金矿区的控制。此外,该地区产生的诸如土地沙化和过度放牧等环境破坏因素也迫使农民和商人向环境不那么恶劣的地区迁移。

加纳帝国没落后,马里帝国(公元1200—1500年)取而代之。马里帝国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和声望得益于两位能干的统治者:曼萨·穆萨(Mansa Musa)(1312—1337在位)和曼萨·苏拉亚曼(Mansa Sulayaman)(1341—1360在位)。在曼萨·穆萨朝代,伊斯兰教在马里就已蔚然成风。马里的威名随着1324年曼萨·穆萨去麦加朝圣而远播异域。在朝圣途中,曼萨·穆萨一路赠送黄金和奢华的礼物。路过埃及时,他散发的礼物是如此的昂贵,以至于阿拉伯历史学家们将他的访问记载为1324年埃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朝圣归来时,曼萨·穆萨随身带回了伊斯兰教学者和传教士,从此马里主要的商业中心也就都变成了主要的教育中心。曼萨·穆萨归来后将马里的各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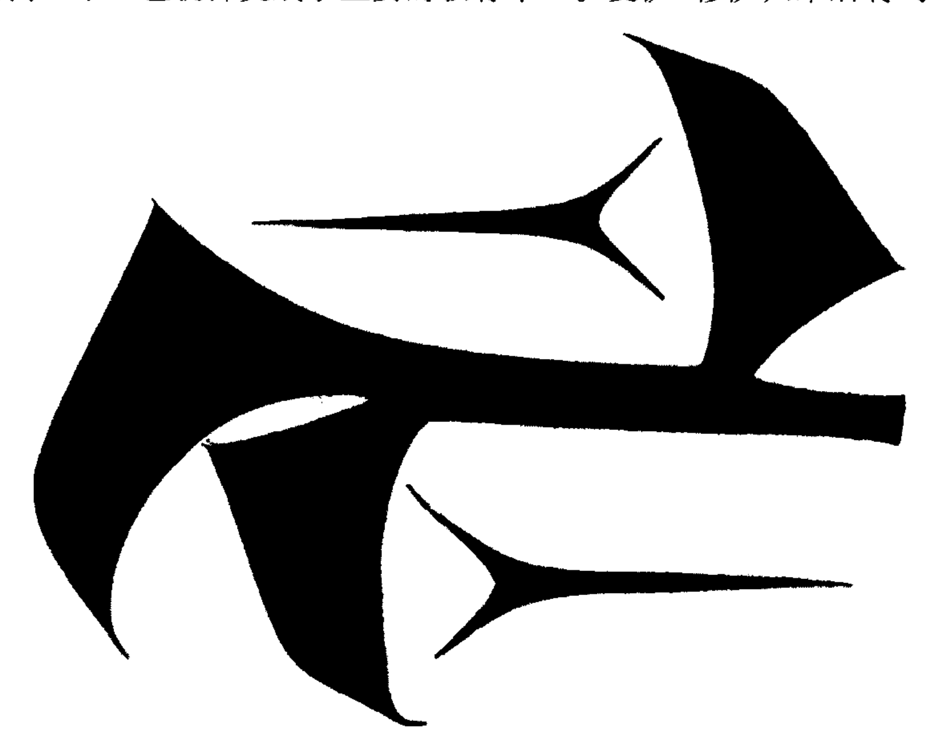


图91 非洲古代的铁制钱币

非洲赤道附近地区发现的铁制钱币的实物。

伊斯兰教派统一为穆斯林派。尽管在商业上和政治上都成绩斐然，马里还是在内部政治问题和外敌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开始衰落。西部苏丹的最后一个大帝国是桑海帝国(公元1350—1600年)。该帝国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它的兴起得益于跨撒哈拉贸易的兴盛和它坐落在肥沃的苏丹草原这一良好的自然条件。同时，王国坐落在尼罗河边也为它的渔业发展提供了机会。当桑海成为帝国时，它的人民可以分成三个专业阶层：索库人(Sorko)大多数是渔民；杜尔人(Do)大多数是农民；以及杲沃人(Gow)或加比比人(Gabibi)大多数是猎人。

14世纪后叶桑海摆脱作为马里的一个属国的地位取得独立并从此开始扩张。但作为一个帝国它却仅辉煌了约一个世纪：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到16世纪前期结束。

桑海帝国的拓展和稳固可归功于两位皇帝：桑尼·阿里(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奇亚·穆罕默德(1492—1528年在位)。后者夺取了战略要地廷布克图并复兴了对于帝国至关重要的贸易。在意识到伊斯兰教的重要性之后，阿斯奇亚开始积极地与穆斯林世界进行接触。他接见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并鼓励教育。在廷布克图，他设在桑克莱清真寺的大学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其中一位学者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廷布克图的学术生活的描述：

> 在那些日子里，从马里省到马格里布最偏远的地区，若论学术机构的完备、学术气氛的自由、教义原则的纯洁、人们生活的安全、对外国人的体贴和热情、以及对学生和学者的尊重，没有哪里能与廷布克图相比。

到过这一区域旅行的莫尔(Moorish)历史学家里奥·阿福利卡纳斯(Leo Afraicanus)写道：

> 这里储备了大量的医生、法官、教士以及其他有知识的人。国王用自己的钱给予他们款待。在这里，潜水员捞上来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手稿和书籍，能卖到比任何商品都高的价钱。

尽管不乏财富和知识，桑海帝国仍因为内乱和摩洛哥的入侵而衰落。到16世纪末桑海已只是它以前的一个影子而已。苏丹的三个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根本特征：首先，它们都以商业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向外扩张，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对这些商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买卖的征税。而这些财政收入则渐渐使得帝国的行政管理更为复杂和完善成为可能。因此，桑海帝国比起前两个帝国要更加复杂：全国明确划为几个省，每个省设一名长期任职的省长；帝国还有早期的职业军队，甚至还有几个部，分管财政、司法、国务、农业、林业以及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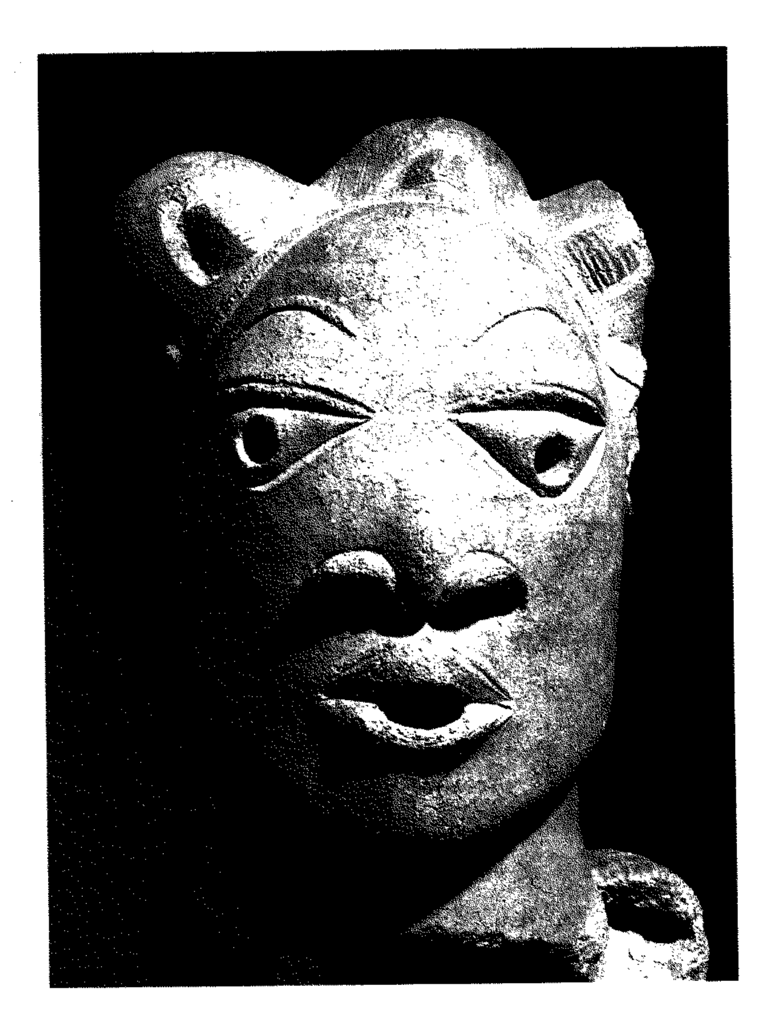


图92 西非的陶制雕像

西非诺克(Nok)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雕像，高36厘米。诺克文化从约公元前900年到公元200年左右在苏丹西部兴盛。这种陶制雕像的成型可能采用了木质原型作范模。

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促进贸易发展并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和促进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还将苏丹由非洲大陆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将马里也包括在他的旅行范围之内，他的这次旅行向东最远曾到中国。1353年6月拔图塔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黑人们具有一些极好的品质。他们很少不公正，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加憎恨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的苏丹不宽恕任何犯有哪怕是只犯最轻罪行的人。他们的国家绝对安全。在帝国内，不论旅行者还是居民都无须害怕强盗或暴力者。在他们的国家去世的白人，即使是留下了数不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相反，他们会将其财产交给白人中可以信赖的人代管，直到逝者合法的继承人前来继承为止。他们小心地遵守礼拜祷告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聚众祈祷，并以此教育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便拥挤不堪，若不一大早去，就可能找不到一块做祈祷的地方。"[1]

在苏丹各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但应该指出该宗教当时主要还是一种流行于城市的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皈依为穆斯林，而乡下人则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促使帝国强大的原因，又是导致其衰微的根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曾有过很多贡献，但它的基础比起当时去过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过的观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薄弱。因此，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在危急时刻才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苏丹各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容易遭致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独特的信仰强加给别人。1076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与之相似，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则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终结。用17世纪廷布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困代替了富足，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2]

五、王国与诸侯国

上面提到的三个苏丹帝国是中世纪非洲最著名的政治组织。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也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还存在着某些与苏丹帝国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地中海盆地一样，东南非也因同样的物产而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黄金贸易培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15世纪另一种贸易也支撑了非洲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岛城邦。"莫诺莫塔帕"一词是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现在的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因而它同苏丹各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该神庙的围墙高达32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仪式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基卢瓦岛的商人统治者以苏丹自居，是贸易的经纪人，他们控制着莫诺莫塔帕和穆斯林商船之间的商品交流。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岛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拔图塔这样评价。后来马里帝国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

正如苏丹各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所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帝国和基卢瓦岛城邦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人的掠夺。在达·伽马于1497年绕道好望角航行后的十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的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像它是一个葡萄牙内海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不过在1500年有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岛避难。但是五年后，另一支葡萄牙舰队却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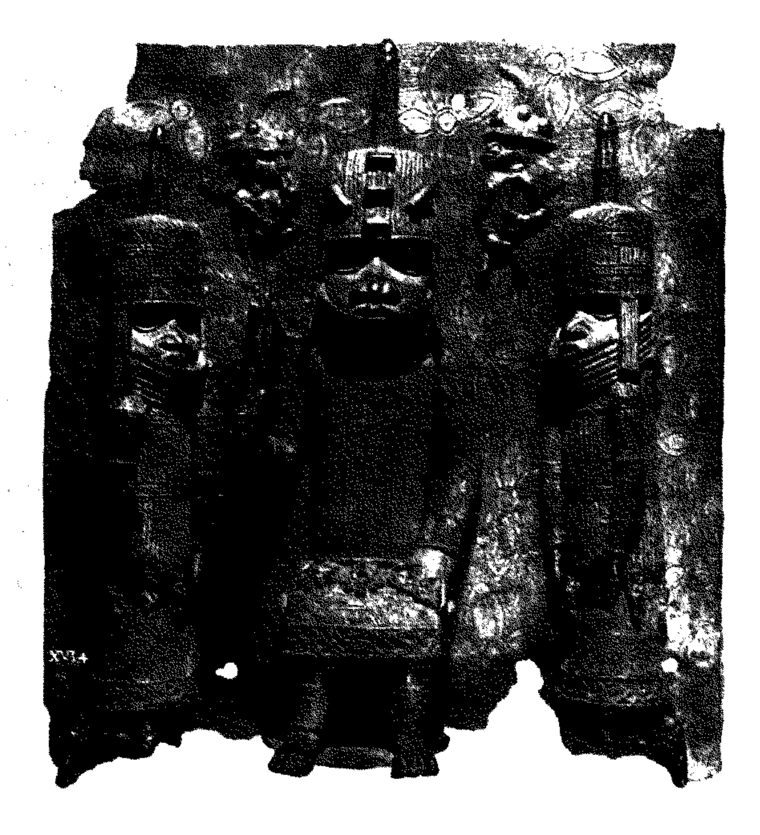


图93　贝宁国王和随从

贝宁国王和随从像，尼日利亚出土，成像于约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5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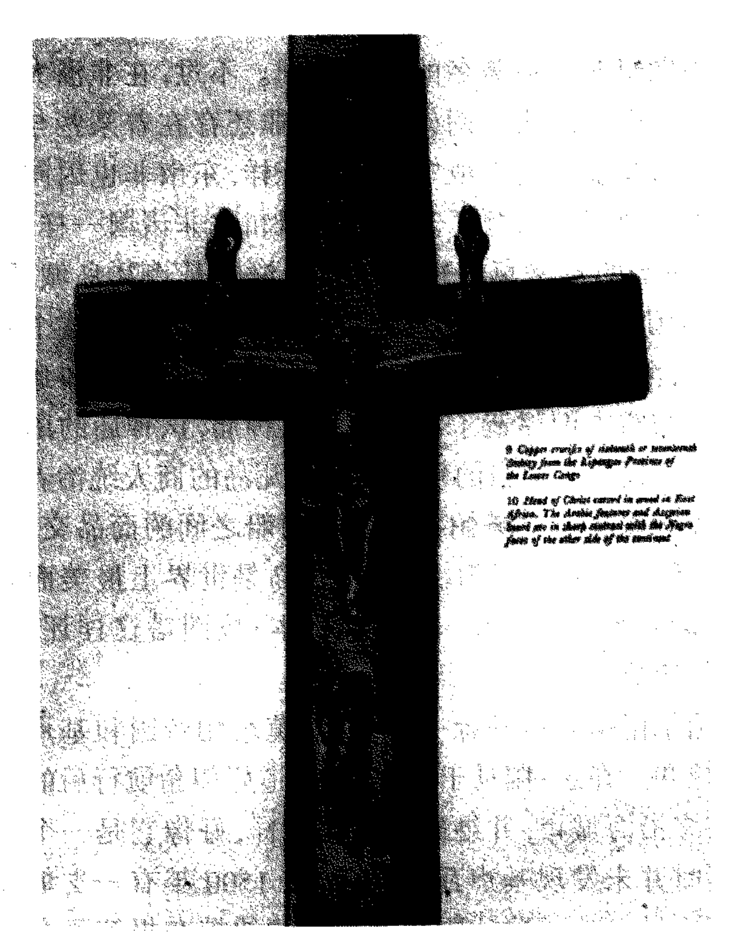


图94　绘有耶稣受难图的铜十字架

一个16或17世纪制作的、绘有耶稣受难图的铜十字架。在下刚果河流域克潘格省出土。

人的好客。一位舰队的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在岛上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代理主教和教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舰队队长做完了祷告后，大家就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4]

后来，葡萄牙人沿着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同样的方式劫掠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侵略者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然后向四面八方扩展，直到 1628 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进攻为止。凭借他们的火器葡萄牙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又出现了几个小王国。

结 论

与流行的观念相反，欧洲扩张之前的非洲绝不是孤立的，它与外界的接触和内部的联系自从 7 世纪开始就在伊斯兰教的促进下而不断发展。由于更为有效的交通方式的出现，跨地区的贸易不断增长。骆驼以前只是用在北非，但从 7 世纪开始它就被用于整个非洲。中亚的双峰驼和阿拉伯单峰驼的杂交繁殖出了两种骆驼：一种是步伐缓慢而能负重行远的，另一种是步速更快而便于急用的。贸易的增长也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并且使得阿拉伯人在与东非和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进行的贸易中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遍布非洲大陆的商业城镇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斯蒂摩挲(Sidimasa)成为跨撒哈拉贸易的中转站，开罗是东方穆斯林和西方穆斯林以及草原地区的贸易的中心。阿沃达胡斯特(Awdaghust)是联系北非和草原地区的中心市场。在东非沿岸，穆斯林商品在诸如摩加迪沙、马林第、蒙巴萨、奇沃华和索法拉等商业城市集散。

大量的商品被用于交易，这些商品包括诸如铁、亚麻、棉花、橡胶和靛青等原材料；诸如高粱糖、稻米、黄油、粟、橄榄油、盐、鱼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黄金、象牙等奢侈品。

在公元 1500 年前的几个世纪中，非洲大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在公元 1500 年之后，世界的其他部分则在发展方面超越了非洲。正如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要提到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 1500 年之后非洲的内部发展以及破坏性的外部联系。

英国非洲学家托马斯·何杰金写到：

> 即便是考虑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学术环境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一个 14 世纪的廷布克图市民仍会发现他对同时代的牛津感到相当亲切和熟悉，在 16 世纪他仍能发现两座大学城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到了 19 世纪，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已经非常大了。[5]

何杰金描述的这一过程并非非洲独有。我们从以前的章节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仅仅因为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结果就将其他社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从而使得西方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差异成为全球普遍性的现象。但是西方与非洲之间的差距远比西方与其他社会的差距更大，这也是一个事实。与伦敦、巴黎和柏林相比，伊斯坦布尔、德里、北京的确是落后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像廷布克图一样落后到几近消失的境地。

推荐读物

了解非洲历史极有用的读物是 J. F. A. Crowder 主编的 *Historical Atlas of Africa* (Longman 出版社, 1985 年版)。在非洲地理方面，可以参考 W. A. Hance 所著的 *The Geography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5 年第二版), 以及 G. W. Hartwig 和 K. D. Patterson 共同主编的 *Disease in Africa History* (Duk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8 年版)。

可以提供原始资料汇编的是 B. Davidso 主编的 *The African Past: Chronicles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 (Little, Brown 出版社, 1964 年版), 还有 P. J. M. McEwan 主编的 *Afric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8 年版)。目前最权威的讲述西方入侵前的非洲史的书籍有: Curtin 博士等所著的 *African History* (Little, Brown 出版社, 1978 年版); 以及 J. D. Fage 所著的 *A History of Africa* (Knopf 出版社, 1978 年版)。更为详细的著作还有: R. Oliver 和 J. D. Fage 共同主编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5 年起, 八卷本); UNESCO 主编的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 1981 年起); 以及 P. J. C. Dark 所著的 *An Introduction to Benin Art and Technology* (Oxford: Clarendon 出版社, 1973 年版)。

有关非洲艺术的著作有: M. Posnansky 主编的 *Prelude to East Afric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6 年版); J. F. A. Ajayi 和 M. Crowder 共同主编的 *History of West Africa* 第一卷 (Longman 出版社, 1985 年第三版); B. Davidson 所著的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Thames and Hudson 出版社, 1970 年版); 另一本 B. Davidson 所著的 *The Africa Genius* (Little, Brown 出版社, 1969 年版); 以及 B. H. Dietz 和 M. B. Olantunji 合所著的 *Musical Instruments of Africa* (John Day 出版社, 1965 年版)。关于伊斯兰教在非洲历史上的作用，参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以及 N. Levtzion 所著的 *Ancient Ghana and Mali* (Methuen 出版社, 1973 年版)。后者是一个对已知材料的透彻研究。

注释

1. Cited by C.M. Cipolla,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Pelican, 1970), p.105.
2.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trans. H. A. R. Gibb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9), pp.329—330.
3. Cited by T. Hodgkin, "Kingdom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Dawn of Africa History*, ed. R. Oliver (Oxford University, 1961), p.43.
4. Cited by. Davidson, *Africa in History* (Macmillan, 1968), p.63.
5. Ibid., p.168.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各民族来说，所有由这些事件(欧洲的扩张)产生的商业利益都已消失在由这些事件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斯密

第16章　美洲和澳洲

11世纪维京人偶然发现了北美洲，在此后长达约100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试图在那里经营居留地，但却没有成功。15世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这次后果却与先前完全不同。伴随发现而来的不是殖民者的失败和撤退，而是欧洲人对南美洲和北美洲大规模的、势不可挡的入侵。这一对比反映了这500年间欧洲实力和活力的增长程度。

欧洲人对美洲的迅速入侵和开发，与其迟至几个世纪后才得以侵入和殖民非洲，形成了鲜明对比。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地理环境：美洲大陆在地理上更易接近，更吸引人。另一个原因则是印第安文化的总体性质使得他们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如果说这一点符合美洲印第安人的特点的话，那么对于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来说就更是如此。本章将叙述哥伦布登上西印度群岛和詹姆斯·库克船长登上新南威尔士之后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自然背景和文化背景。

一、土地和民族

与非洲相反，美洲在地理上向欧洲移民彻底开放。美洲海岸没有阻碍登陆的沙洲，其锯齿形海岸线上的港口也常常要比非洲平直的海岸线上的港口更易进入。此外，美洲拥有发达的、相对而言障碍更少的内河航道，它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通路。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密西西比河和圣劳伦斯河宽阔雄伟，水流平缓，这样的河流是非洲所没有的。探险者们不久就学会了使用美洲的桦木独木舟。他们发现

只需携带少量物品,便能划船从大西洋顺圣劳伦斯河进入五大湖;再由此南下,沿密西西比河就可以抵达墨西哥湾;如果北上,沿马更些河可以到达北冰洋;而如果西进,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则可以直达太平洋。

整体来看,美洲的气候也比非洲更加宜人。诚然,亚马孙河流域气候炎热、空气潮湿,南北美洲两极地区气候异常寒冷,但英、法移民在其殖民地格兰德河北部地区却很滋润。同样,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也感到很安适,墨西哥和秘鲁是他们殖民的两大中心。那里的气候同西班牙的气候相差无几,因而毫无疑问它们与气候闷热、疫病流行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了舒适的对比。

欧洲人在美洲见到的印第安人,是从西伯利亚渡过白令海到达阿拉斯加的移民的后裔。直到近期人们还一直认为印第安人首次渡海来到美洲大陆的时间是在约10 000年以前,但是考古新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却彻底纠正了这一结论。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同意,人类在大约30 000年以前就已生活在美洲大陆上。印第安人最后一次大规模迁移大约发生在3000年以前。接着到来的是爱斯基摩人,他们不停地往返于白令海峡两端,直到现代的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这一边或另一边为止。总之,在离亚洲最近的美洲地区,当时的人口已经十分稠密,从而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对于这些早期的移民来说,渡海到美洲大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冰河时代末期海水大量封冻,海面下降了460英尺,露出了一座宽1300英里、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大陆桥。如此大的"桥"实际上是一块大而新的次大陆,为当时动植物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通道。而且这一地区由于海面猛然低落下去,所以它不是被冰覆盖着,而是被湖泊、沼泽、草地和冻土带的各类灌木所覆盖。这些植物为当时的大型哺乳动物如乳齿象、猛犸象、麝牛、北美洲野牛、驼鹿、麋、山羊、羚羊、骆驼、狐狸、熊、狼和马提供了牧场。由于这些动物越过大陆桥来到美洲大陆,所以尾随它们而来的便是以捕捉它们为生的猎人。

即使此后由于气温回升使得海面增高、淹没了这个大陆桥,最终形成的海峡也很狭窄——可以在看到对岸的情况下乘坐粗制小船毫不费力地渡过。后来的更先进的移民可能是乘船从亚洲来到美洲,然后沿西北海岸继续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登陆和定居。

渡海来到阿拉斯加的大多数亚洲移民,越过育空高原中部冰封的山峡继续进入北美内地。当初是迫于寻找新的狩猎场地的动力和后方部落不断向前挺进的压力,他们才移居美洲大陆;现在这两种力量继续推动着他们向前迁移。这样,分散的狩猎部落不久便布满了南、北美洲两块大陆。

在种族分类上,所有的印第安人都属于蒙古种人。他们具有颧骨高凸、头发硬直粗黑、脸上和身上汗毛稀疏等体态特征。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长得一样。那些生活在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比起美洲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来,脸和鼻子更为扁平,眼睛也更加狭长(蒙古人式的纹路)。对这种差异有两方面解释:第一,

美洲最早的印第安人比后来的印第安人更不像蒙古种人，因为在今天所谓的亚洲蒙古种人完全进化之前他们就已离开东方。第二，移民到达美洲后立刻向四面八方扩散，并以近亲繁殖的小集团散居在气候各异的地方。因此尽管它们都出自同一个蒙古种人大家庭，它们却仍然演化出各种独特的生理特征。

二、美洲的土著文化

迁居美洲大陆的移民几乎没有带来什么独特的文化，因为他们先前居住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就是欧亚大陆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当然，他们都是组成小集团的猎人，仅拥有粗糙的石器，没有陶器；除狗外也没有其他驯养的动物。由于进入的是一块无人居住的大陆，因此他们能够毫无约束地形成自己的风俗，而不像雅利安人迁移印度河流域或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移居希腊时那样被当地居民的文化所同化。

在以后的几千年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确发展起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他们不仅适应了其所面临的广阔的自然环境，而且他们彼此间也已相互适应。虽然有些印第安人仍停留在狩猎团体的阶段，但另一些印第安人则已建立了王国和帝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所有已知的宗教类型，其中还独创了一神教。他们使用约 2000 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有些语言相互间的差异就像汉语和英语间的差别一样。这表明在这里如同在整个东半球一样，语言的变化极为丰富。据悉，公元 1500 年存在于东半球的语言约有 3000 种。这些语言不论在词汇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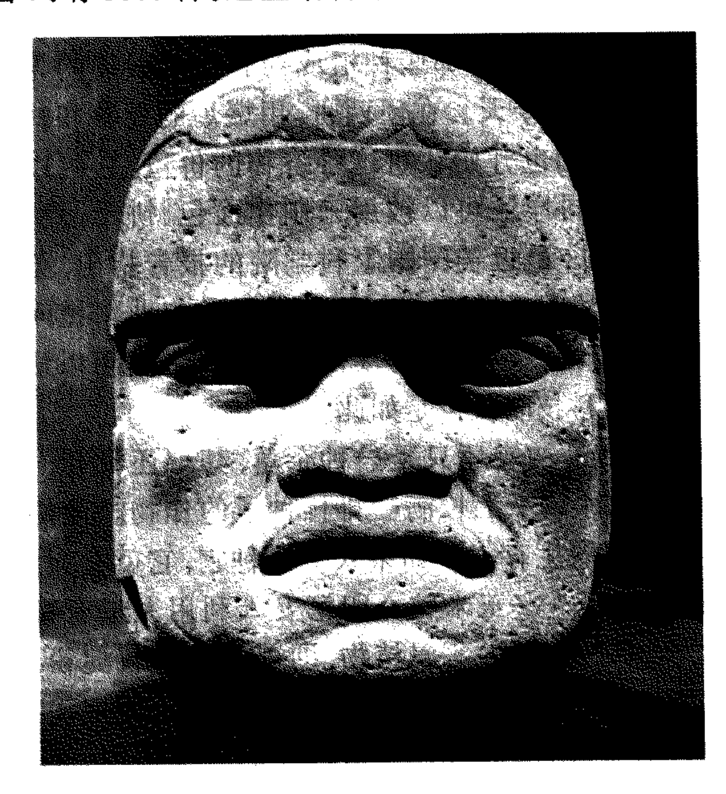


图 95　奥尔梅克头像

奥尔梅克头像。这个巨大的头像出土于圣洛伦佐，现存于墨西哥城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该头像由玄武岩雕成，表现的可能是一个奥尔梅克人首领的头像。奥尔梅克文化兴盛于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800 年间。

大约24 000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7000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则使用了27 000个词,被认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民族之一的火地岛上的雅甘人至少也拥有30 000个词。

人类学家根据不同类型的制度和习俗将美洲大陆分成大平原地区、东部森林地区、西北沿海地区等22个文化区。一种更简单的分类法是以获得食物的方式为标准将其分成渔猎采集文化、中级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三类。这种分类不仅更加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也显得更加科学,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入侵的不同反应。

高级农业文化分布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级农业文化一般集中于高级农业文化的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位于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和北美洲西部和北部。在美洲农业首先起源于那些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中东极为相似的地区,即高原地区,这具有重大意义。在高原地区,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砍伐森林,那里有足够的降雨量使各种作物得以生长,而且还拥有大量可栽培的、具有潜在高产特性的土生植物。

印第安人培植了100多种植物,与整个欧亚大陆所培植的植物一样多,这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50%以上的农产品都来自于由印第安人培植出的各种作物。而且我们正在逐步认识到,欧洲移民忽视了印第安人种植的一些植物中所蕴含的巨大食品价值。例如,苋菜谷物对于阿兹特克人来说就如同玉米和大豆一样重要。他们把苋菜谷物同人血混在一起,按做蛋糕的方式做成神灵的神像,并把这些神像给那些虔诚的人吃。西班牙移民认为这种仪式太野蛮,并把它作为基督教教会聚会时的谈资笑柄。因此西班牙人通过严厉谴责那些种植或拥有苋菜谷物的人来杜绝这种仪式。但是这种植物却一直存活到今天。在墨西哥,用爆炒的苋菜和蜂蜜制成的蜜饯仍然颇受欢迎。同时,科学家们也开始认可这种谷物的价值:它可以磨成面粉吃,也可以像爆米花那样爆着吃,同样还可以被用来制作面包、饼干、点心、汤、粥、面团和饮料。除了上述多种用途外,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指出,苋菜含有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其他谷物都要多。正如以前提到的农业培植问题(见第2章第3节),现在人们已经将苋菜确认为"未来的粮食",这表明我们可以从远古的祖先那里学到经验,即使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也是如此。

玉米几乎是所有地区的主要粮食,但最初它还只是一种杂草,其穗还没有一个人的拇指甲大。印第安人将它培育成一种棒子上长满一排排种子的作物。他们彻底培植了玉米,使它变得只有依靠人类才能生存——如果人们不种它,它就会灭绝,因为培植后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种子——玉米粒。印第安人利用大量有毒植物的技术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之一是木薯属植物,即美国的木薯淀粉,印第安人能够去掉其中致命的毒素,保留下淀粉。印第安人种植的其他重要植物有:南瓜、马铃薯、西红柿、花生、可可豆、烟草,以及含有大量蛋白质的豆类植物。印第

安人留传下来的药用植物有:药鼠李、可卡因、山金车花、因皮卡克和奎宁等。在发现新大陆前美洲种植的植物中没有一种是在东半球培植的,这个事实最终证明了两半球的农业各有其独立的起源。

印第安人的农业发源地也是他们最早继续发展农业并逐渐形成"高级农业文化"的地区。这反过来又深深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总的看来,农业在该地区发展的结果和在欧亚大陆一样,大大增加了定居的人口,促进了那些与最低限度生存没有直接联系的文化活动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在这些高级农业文化中才有可能发展起在某些方面可与西非相比较的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不幸的是,美洲本土的这些文明却突然被西班牙人所冲击,结果除去他们培植的珍贵的植物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留下。

三、美洲的土著文明

美洲印第安人创造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英属洪都拉斯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从厄瓜多尔中部到智利中部、延绵 3000 英里的印加文明(见地图 20)。玛雅人创造了美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文明,并以其艺术和科学的显著进步而闻名于世。他们独自发展了表意文字,用字母或符号作为表达思想的传统符号。为了计算时间、预言未来和为献祭和主要的丧葬事宜推算吉日,他们还研究了天体的运动。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祭司搜集的天文学知识非常广泛,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知识不相上下。玛雅人的复杂圣历以共同周期为基础,这种周期在其倍数与时间相一致时便并入更大的周期。玛雅人的有些历法计算能够跨越几百万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最近在欧洲世界的创造是如何被确定在公元前 4004 年的,我们就会意识到玛雅人这种涉及时间范围方面的观念会给人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

玛雅人的城市,如果它们称得上是城市的话,是举行仪式的中心,而不是要塞、居住地或行政首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玛雅人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这种农业在两三年内便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迁移村庄驻地,开垦新的田地。为了平衡这种暂时的生活方式,玛雅的耕种者们在经常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建立了一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以此来表示他们的社会统一。这些建筑物包括巨大的金字塔庙宇和公共住宅,祭司和新入教者可能就住在这里。这种建筑物完全靠石制工具建成,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在美洲是无与伦比的,现在它们也已经被列为世界伟大的艺术之一。



地图20　西班牙征服前夕的美洲印第安人帝国



图96　玛雅文化雕像

一尊玛雅文化的雕像，它表现的是一个尊者或一个祭司。

在4至10世纪期间玛雅文明非常繁荣，但随后它便衰落下去，衰落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因为土壤的肥力耗尽，或者是因为疫病流行，也可能是由于反对供养包括祭司集团在内的宗教中心的农民革命。总之，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被废弃并逐渐被周围的森林所吞没，直到近几十年它们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

同爱好艺术、富有知识的玛雅人相比，阿兹特克人显得粗野好战。这一对比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的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明显差别。实际上，阿兹特克人是后来才进入墨西哥的。在几个世纪内这里相继形成了一系列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这些社会很容易遭到北方蛮族的攻击，因为当时北方正遭受干旱，这些蛮族自然会被南方肥沃的土地所吸引而迁移南下。最后一批入侵的北方蛮族就是阿兹特克人，他们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然后占据了阿纳瓦克谷地的大部分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岛屿变得非常拥挤，阿兹特克人通过建造"浮动园地"来扩大耕地面积。"浮动园地"是一些在湖底丛生的杂草上面铺垫上湖土、由生长的杂草将底土固定在湖底的浮岛——直到今天某些地区仍在使用这种耕作方法。每次播种之前，农民们都要挖些新的湖土铺在"浮动园地"上，因此"浮动园地"的表面也就随着一次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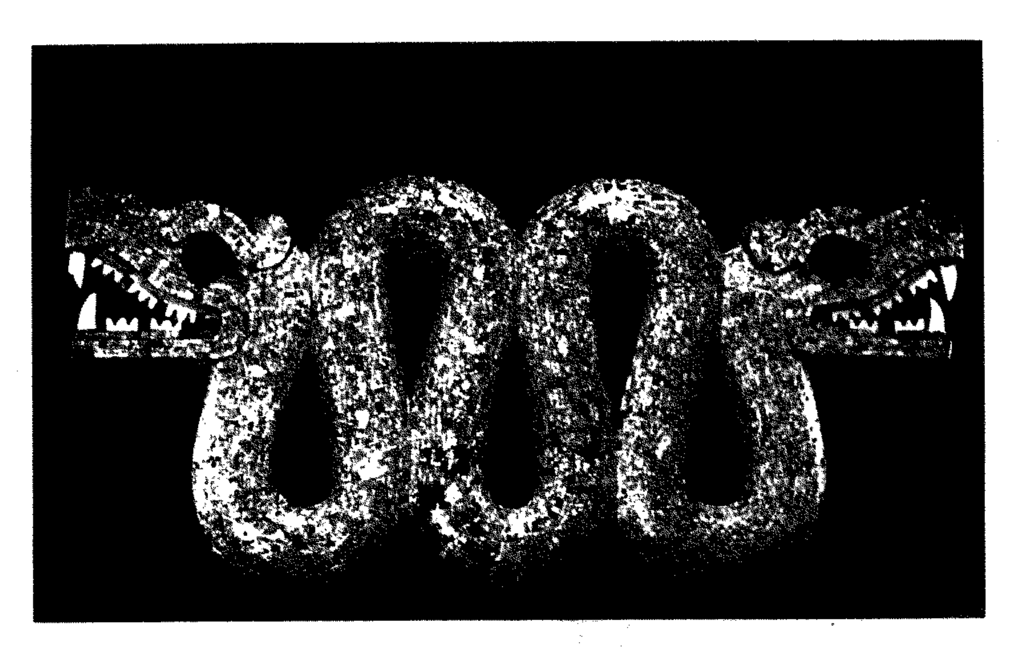


图97 双头大蟒蛇

属于阿兹特克文化的镶嵌绿松石的双头大蟒蛇。

耕种而不断增高。然后农民们再挖去表层的泥土,用于建造新的“浮动园地”,由此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浮动园地”使得阿兹特克人的人口和财富剧增。15世纪早期阿兹特克人与特斯科科湖沿岸各城镇结成联盟,并从他们的驻点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经常对外远征袭击,迫使其他民族以实物向他们进贡和为他们服劳役。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阿兹特克人的统治西至太平洋,东达墨西哥湾,南边几乎到达尤卡坦半岛,北抵格兰德河。其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0万到30万人口的大城市,它通过几条道路与海岸相连。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将这个首都同威尼斯相提并论,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阿兹特克人的力量建立在全民皆兵的基础上:所有男人都要携带武器,国家军火库始终备有武器,供需要时使用。凭借有效的军事机器,阿兹特克人从其臣民那里榨取到数量惊人的贡物。据现存资料记载,除其他各种物品如军服、盾牌和宝石之外,他们每年还能征集到玉米1400万磅、豆类和苋菜各800万磅、棉花200万包。

阿兹特克人首都的壮丽和贡物的丰富使西班牙人断定,阿兹特克人的首领孟特祖玛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阿兹特克人的附属国在履行国家职责方面仍相当独立,并实行完全的自治。它们同特诺奇蒂特兰的惟一联系就是纳贡,它们之所以纳贡是因为害怕阿兹特克人的远征。除秘鲁印加人的国家外,没有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国家组织得比城邦更大。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不同,他们并不想使其臣民受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化,以免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

西班牙人不仅为阿兹特克国家的富有和豪华而眼花缭乱,而且也为其在宗教仪式上大肆屠杀一排排献祭用的人而感到毛骨悚然。西班牙人不久便认识到,金字塔

是人们献祭用的祭坛，这些到处可见的、用于宗教仪式的金字塔的顶端就是献祭用的人遭到屠杀之处。献祭仪式在中美洲很普遍，但没有一个地方像阿兹特克人那样实行着魔似的大屠杀。实际上，阿兹特克人的侵略目的不仅是迫使附属国向其纳贡，而且还包括去捕捉俘虏，用以献祭。

阿兹特克人认为捕捉俘虏甚至比活的贡品更为重要，因为祭司告诫他们世界可能会被洪水淹没、太阳也有熄灭的危险，因此需要用人来献祭以抚慰天上的神灵。但这一做法却使阿兹特克人陷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防止普遍的灾难需用人来献祭，而献祭用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献祭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反过来又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用的人。贝尔纳·迪亚斯曾记叙了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

>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镇区[索科特兰]中庙宇附近的那块地方。那里十分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头颅——可以肯定有 10 万多个，我再重复一遍，10 万多个。同样，在这个广场的另一角落，你还能看到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残骸，数目多得不可胜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头悬吊在道路两旁的柱子上。……在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城镇，我们都能看到同样可怕的情景。"[1]

最后谈谈秘鲁的印加人。应该指出的是，"印加"是其君主的称号，因此虽然西方人习惯上把印加人称为印加印第安人，但严格地说这样称呼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是起源于克丘亚种族的一个部落，擅于饲养美洲驼和种植马铃薯，操克丘亚语。12 世纪他们在库斯科谷地定居下来，不久便统治了这个地区。在早期阶段他们的战争首领逐渐建立起一个王朝，而他们的部落成员则成为其他部落中的贵族。世袭王朝和贵族阶层相结合——这在美洲大陆是独一无二的——构成了维系帝国的有效工具。由于一代代印加即国家首领的杰出才能，他们的帝国也十分强大。印加男子惟一合法的妻子是他自己的亲姐妹，因此每个印加都是兄弟姊妹近亲通婚所生育的后代。这种近亲繁殖大约持续了八代；而最早的祖先一定非常强健，因为正如西班牙人所看到的那样，王子们都是些英俊、精力旺盛的人。

印加人从坐落在秘鲁高原上的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向外派出军队和使节，向西到达沿海地区，向南和向北沿大山谷前进。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们已将其版图从厄瓜多尔扩大到智利中部，南北长约 2500 英里。这样，他们统治的领土就比阿兹特克人的领土还要大得多，这使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

这一帝国在地理上由完整的道路系统紧紧地连接成一体。这一道路系统包括用芦荟藤编织成的索桥和用浮力很强的芦苇制成的浮桥，其中有几百英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大面积的灌溉系统同样很重要，它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昌盛的农业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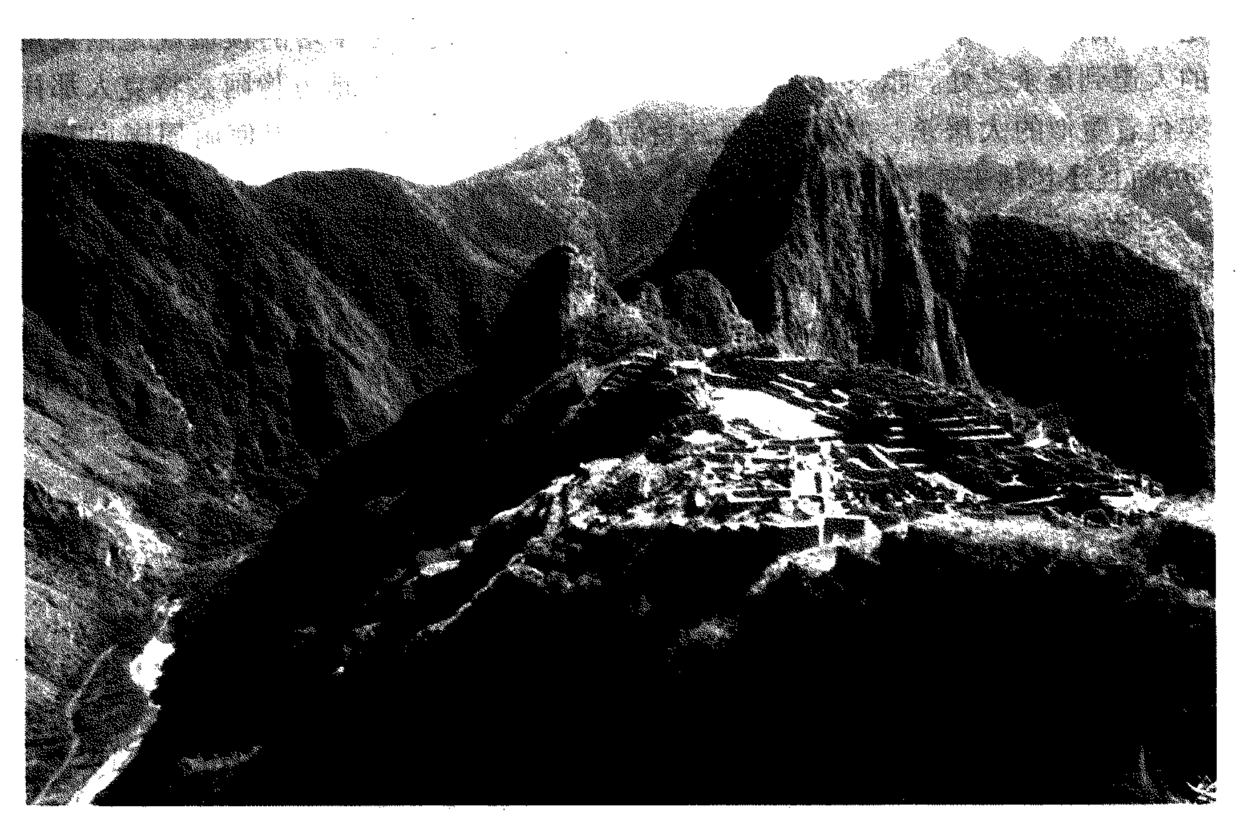


图 98 印加文化城市

位于马丘比丘栖居地的印加文化城市,它位于安第斯山脉东坡的两座山峰之间的一个鞍形坡上。

其中部分灌溉系统至今仍在使用。当时的通讯靠由驿站和邮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邮差能迅速地将信件送往全国各地。

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则进一步加强了帝国的统一。这一宗教认为"印加"是太阳之子,在向太阳献礼的仪式中他起着重要的作用。帝国的其他统治方法还包括:土地、矿藏和牲畜归国家所有;为了税收和军事目的,编制详细的人口普查表;废黜世袭的地方首领;强迫被征服的居民迁到新地区定居,以同化他们;国家主持国民的集体婚礼。由此我们对印加帝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

四、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

虽然美洲印第安人的这些成就让人印象深刻,可事实却仍然是:尽管美洲大陆的这三大文明拥有数以千万计的稠密人口,但仅一小撮西班牙冒险者便能很轻易地推翻其政权并彻底消灭这些文明。西班牙轻易取胜的原因最终应归结于美洲大陆的与世隔绝上:不仅美洲印第安文明同其他大陆各文明没有形成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局面,而且各印第安文明彼此之间也在很大程度上互不往来。

[一位考古学家说],从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形成时期[约公元前1000年]到西班牙人入侵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件实物或一篇记录足以证明秘鲁和中美洲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接触。[2]

换句话说就是,在2500年中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中美洲和秘鲁各文明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即如我们所知,在这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正处于频繁的、硕果累累的交流之中(后者在程度上要低一些)。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甚至是居住在安第斯山脉和中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要远远落后于欧亚人,尤其是落后于技术发展格外早的欧洲人。直到1500年美洲大陆才刚刚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达到的文明阶段。

那么当西班牙人入侵美洲、双方发生对抗时,这一发展程度的差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印第安人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于侵略者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都不能掩饰他们在大多数物质领域里极为落后的事实。这种悬殊差别在中美洲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在安第斯山脉地区也非常明显。农业上,印第安人虽在栽种植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其生产率却相当低。他们的耕作技术从未超过养活全体居民这一最低限度,而他们的人口也很难达到东半球的人口密度。印第安人的工具多用石头、木头或骨头制成。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将其用于装饰目的。他们所制造的船只有独木舟和远洋木筏。至于陆上运输工具,印第安人还不会利用轮子;他们虽已知道轮子,但只是用其作玩具。除美洲驼和羊驼外,人是惟一的运输工具;美洲驼和羊驼虽被应用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但却不能被用来运载重物。

当然,我们也不应无限夸大这一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在经历了最初的惨重打击之后,印第安人已经渐渐习惯了火器和骑兵。此外西班牙人不久便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其实非常锋利耐用。他们甚至更加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盔甲。一位征服者叙述道:

"(阿兹特克人)……有两座军火库,里面装满了各种武器,其中许多武器上都装饰着黄金和宝石。这些武器包括大小不等的盾牌、军刀和一种大砍刀。这种大刀需用双手挥动,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适合砍杀。此外,阿兹特克人的长矛也比我们的长,全长达一英吋,长矛的矛尖也是用几种锋利的燧石制成的。这种长矛非常锋利坚硬,能刺穿最坚固的盾牌,用起来像剃刀一样便利,墨西哥人甚至用制矛尖

的燧石刮脸。另外，他们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门用于弹射的皮条，以及特制的圆石投石器和一种大盾牌。这种盾牌的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只是到战场上才展开，它能从头到脚将人的整个身体遮盖住。”[3]

由此可见，除去技术上的悬殊差别外，促使西班牙人获胜的还另有原因。一个原因是，印第安各民族之间不团结。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经常利用对库斯科和特诺奇蒂特兰的暴虐统治不满的附属部落。印第安人还被过于严格的统治所约束。他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绝对执行命令的思想，并对此习以为常，因此当其首领被推翻后，他们便不能自行组织抵抗。所以当国王孟特祖玛和阿塔瓦尔帕落入西班牙人手中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就群龙无首，抵抗手段彻底瘫痪。

这种绝对服从思想因为宗教的禁锢而被进一步固化。入侵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和秘鲁的皮萨罗最初都被当地印第安人认为是返回大地、实现古老预言的神。库斯科的阿塔瓦尔帕和特诺奇蒂特兰的孟特祖玛之所以会出现动摇以至自取灭亡，原因就在于此。对阿塔瓦尔帕来说，西班牙人就是造物神维拉科查及其追随者。为此，



图 99 太阳金字塔

太阳金字塔位于提沃提华肯(Teotihuacan)中央大道——死亡大道——的南端。

这位统治者温顺地等待着侵略军首领皮萨罗的到来，皮萨罗和其手下的 180 人则趁机迅速地控制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同样，对孟特祖玛来说，入侵者科尔特斯就是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他正返回大地，要求他的合法王位。因此，这位统治者就也无精打采地恭候着西班牙人在其首都安营扎寨。

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同样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他们认为战争是短期的，是为宗教仪式尽力，而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则是捕捉俘虏，用俘虏的心脏祭神——他们发动的战役常常是出于祭祀礼仪的需要——因此在战争中最好是以最低限度的混乱和破坏来捕捉俘虏。这种军事传统显然是一大障碍，因为西班牙人以大肆屠杀来获胜，而阿兹特克人则只想捕捉俘虏。



图 100 西班牙征服墨西哥

一幅 16 世纪阿兹特克人的图画，描绘了西班牙征服墨西哥过程中的一场战斗。

其实美洲印第安人不只缺乏抵抗欧洲人的技术和内聚力，他们更缺乏抵御欧洲人所带来的疾病的免疫力，后者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由于印第安人在千百万年前渡过白令海峡之后就不再与其他大陆上的民族发生联系，因而他们对欧洲人及其非洲奴隶所带来的疾病缺乏生理上的抵抗力。这些传染性疾病包括：天花、麻疹、伤寒、黄热病等。

近几年对 1492 年前新大陆上土著人口数量的估计有着较大的增长变动。现在

人们认为居住在南北美洲的人口总数可达4300万至7200万。可以想见，绝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中美洲的三大文明的统治区内。但是无论居住在哪儿，一旦他们开始与欧洲人有所接触，其因感染恶性传染病而导致的死亡率就变得十分惊人。早期殖民者常常能发现被遗弃的田地和无人居住的村落并将其轻易地接管过来，原因就在于此。据估计，1492年时墨西哥人口多达2500万，但到1608年时就已减少了100万。其他地区的人口也出现了急剧下降。1508年，黑斯班尼奥拉岛(Hispaniola，即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拥有6万美洲印第安人，1554年时这一数字已减少到3万，至1570年仅剩500人。以下1586年秘鲁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地揭示了这种大规模的死亡及其带来的恐慌：

> "流行性感冒并不像钢刀那样寒光闪闪，但却没有印第安人能逃过它；破伤风和伤寒比一千只目露凶光、牙爪锋利的灰狗更能夺人性命……天花比枪害死了更多的印第安人；鼠疫的流行吞噬了这些地区；每一个感染的人都倒地身亡，它吞噬着人的身躯、眼睛，切断人的喉管，所有这些都散发出腐臭的气味。"[4]

后来，当大批移民开始从欧洲移居美洲时，印第安人终于被绝望地击溃了。最早到来的是欧洲商人，他们几乎未遭到任何竞争和抵抗便布满了整个美洲大陆；因为美洲不像非洲，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土著商人阶层。其次是移民，他们被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从而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即使有个别印第安人在绝望中偶然拿起武器，但由于他们缺乏团结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也就注定要失败。这一点在格兰德河以北地区尤其如此。那里的印第安人一开始时就十分稀少，因而活下来的更是寥寥无几，最后他们被赶到了保留地。在阿兹特克、印加和玛雅地区人口一度比较稠密，在欧洲移民潮到来之后很多人都活了下来。随着他们渐渐形成对欧洲人和非洲人传染病的免疫力，幸存者的人数也在逐渐反弹。今天，在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等国，印第安人构成了人口的主体。1990年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总数是190万，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查拉几(Cherokee)族(308 132人)，其次是那哇尤(Navajo)族(219 138人)、齐佩瓦(Chippewa)族(103 826人)、苏(Sioux)族(103 255人)。

很明显，美洲地区的殖民侵略与当地抵抗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非洲地区。地理条件不利，人口较少，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印第安人，但却使得欧洲人能够迅速占领南北美洲；而这时在非洲，欧洲人仅在沿海地区占有几个不稳定的小据点。尽管美洲印第安人不能有效地抵抗欧洲入侵者，他们对人类的发展却仍然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这些贡献中最重要的是培育了多种植物，它们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日常饮食的主流部分。最突出的有玉米、马铃薯、大豆

(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果汁、西红柿和巧克力。总之,美洲培植出的植物与整个东方一样多——这真是一种非凡的成就。今天,美国 50%以上的农作物都来自于印第安人的培植,而美国又是世界粮食市场的主要出口国,因此可以推断,如果没有美洲印第安人这一先锋者,现在的世界人口数量将要少得多。

最后,持续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不断地修正自身对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理解,这一点值得注意。例如,最近的文物发掘暗示我们,除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之外,在南美的亚马孙丛林中可能还存在着第四种文明。这个发现很有趣,因为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早期的食物采集者缺少在热带雨林中生存的技术和技能。然而现在考古学家发现并分析了留在亚马孙河口附近洞穴中的人工制品和熏制的食物,它们足有几千件,这表明 11 000 年前这里曾有人居住过。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因为热带雨林中的印第安人不像其他美洲印第安人那样靠大规模狩猎为生,他们主要是在河中和森林中搜集食物——其主要食物是鱼、软体动物、海龟和鸟类。

五、澳大利亚

澳洲大陆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但也正是因为其与世隔绝,古代的生物类型才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诸如桉树属的植物和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的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古代的人类类型也被保存下来。当首批英国移民于 18 世纪后期来到这里时,当地土著人仍处于旧石器阶段。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土著居民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尚未确定。最新考古发现表明,土著居民到达这里的日期至少在 50 000 年以前。这意味着,土著居民的祖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手,因为当时要从东南亚到达澳洲的陆地,必须横渡 40 英里的广阔水域。

最初有三个不同的种族渡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三个种族在今天的土著后裔中仍可辨别出来。大多数土著属于身材细长、四肢较长的民族,他们皮肤棕色,身上没有什么毛发,头发、胡须卷曲呈波浪形。他们之所以能够大批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对白人没什么用处的沙漠地区。在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生存着一个人数不多但体貌特征却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浅棕色,身上多毛,胡须浓密。而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边惟一的稠密热带雨林地区里则居住着第三个种族集团。他们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鬈发蓬松,皮肤黝黑。

这些土著民族的文化并不相同。居住在东南角的民族文化最先进,因为这里雨水充足,适合长期居住。但整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他们停滞不前的发展状况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除去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由简单的露天防风林组成,而在潮湿地区则是低矮的圆顶小棚,这种小棚由任何可得到的材料拼凑而成。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梭镖、梭镖发射器和飞镖,所有这些都是用木头

制成的。他们不知道制造陶器,所使用的器皿只有少数编织的提包和篮子,以及偶然用树皮或木头制成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技艺高超,非常机灵。他们以种类繁多的植物及动物为食,他们熟悉这些食物的种类、习惯和特性,并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率。但土著居民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的方法是举行宗教仪式,而不是耕种。一个典型的仪式是:在希望增加猎物和植物的地方将血和土混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几乎与其技术水平一样落后。与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集中在一定的地区内活动。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此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比如说,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一天归来的妇女,要按严格规定将其所获分给本家族所有成员。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当一个人打喷嚏时,所有听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具体位置随他们同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澳大利亚社会这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非常复杂,因此它们对于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来说是一件乐事。但这些事物的过早发展,在18世纪后期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对土著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说具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无法抵抗白人的话,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就更是如此。何况澳大利亚土著的人数极少,在欧洲人来到时总共才约30万。这意味着在有利的沿海或大河流域地区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两个人,而在干旱的内地每30到40平方英里才有一个。除了人数少这一弱点外,土著居民还缺乏进行有效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手段。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他们不愿意获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都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从拥挤的监狱用船运往此地的无法无天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杀和大批没收土地,使得当地土著的人口锐减到今天的45 000人,外加同异族通婚所生育的80 000混血儿。1853年一位维多利亚移民在下面这句典型的描述中暗示了澳大利亚土著人所受的待遇:"仿佛是天意注定,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莫希干人和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将在文明拓展的面前从其本土消失。"[5]

推荐读物

关于美洲人口居住情况最新的信息,见R. Shutler Jr. 主编的 *Early Man in the New World* (Sage出版社,1973年版),此书中也相应地包含了一篇关于澳大利亚人口居住情况的文章。关于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所产生的冲击,以下读物中的分析具有启发意义:F. Jennings所著的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出版社, 1975年版)。关于美

洲印第安人数的最新估计，见 M. Denevan 主编的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149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出版社，1976 年版). 关于欧洲人扩张对生物造成的致命影响在以下读物中进行了分析：A. W. Crosby 所著的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6 年版)。

以下书中对美洲印第安人从移入美洲大陆到现在的生活进行了丰富的描述：*America's Fascination Indian Heritage* (Reader's Digest 出版社，1978 年版)。以下读物的阐释具有启发意义：P. Farb 所著的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 as Shown by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 . .* (Dutton 出版社，1968 年版)，书中还包括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经历对现代人的意义的分析。其他值得注意的研究是 A. M. Josephy jr. 所著的 *The Indian Heritage of America* (Knopf 出版社，1968 年版)；C. Beals 所著的 *Nomads and Empire Builders: Native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South America* (Chilton 出版社，1961 年版)；以下这本书收集了几篇优秀的读物：H. El Driver 主编的 *The Americas on the Eve of Discovery*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64 年版)。V. W. Von Hagen 对美洲三大主导性文明全都进行了记述，值得一读：*The Aztec: Man and Tribe* (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社，1958 年版)，*The Incas: People of the Sun* (World 出版社，1961 年版)和 *World of the Maya* (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社，1960 年版)。关于爱斯基摩人的最好的全面论述是 K. Birket-Smith 所著的 *The Eskimos* (Crown 出版社，1971 年版)。近期在智利关于早期印第安人的考古发现有一些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以及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问题在以下读物中进行了讨论：*Science*，9 月 18 日，1998 年，pp. 1775—1776，1830—1835。

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标准读物是 A. P. Elkins 主编的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第 3 版，(Angus 出版社，1954 年版)；W. E. Harney 所著的 *Life Among the Aborigines* (Hale 出版社，1957 年版)；R. M. 和 C. H. Berndt 所著的 *The World of the First Australia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Life of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64 年版)；A. A. Abbie 所著的 *The Original Australians* (Muller 出版社，1969 年版)；G. Blainey 所著的 *Triumph of the Nomads: A History of Aboriginal Australia* (Overlook 出版社，1976 年版)。

注释

1. J. J. Lockhart 翻译，*The Memoirs of the Conquistador Bernal del Castillo* (London 出版社，1844 年版)，I，238.
2. R. M. Adams, "Early Civilizations, Subsistence and Environment," in *City Invincible* 主编，R. M. Adams and C. H. Krael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1960 年版)，p. 270.
3. Lockhart, *op. cit.*, I, 231—232.

4. 引自 E. Galeano, *Memory of Fire: Genesis* (Pantheon 出版社, 1985 年版), p. 158.
5. 引自 A. G. Price, *White Settlers and Native Peoples* (Melbourne University 出版社, 1949 年版), p. 121.

……西方凭借着一场技术革命战胜了同时代的所有其他文明，并强行将它们联合成一个差不多覆盖了全世界的社会。西方人的革命性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跨越海洋，统一了整个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大陆。

——A.J.汤因比

第17章　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在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的1000年中世纪中全球的势力均衡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时，西方只是欧亚核心区的一个骚乱多发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频发的侵略而屡遭毁坏。直至12世纪时，英国编年史专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世界的划分是如此不公平。在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亚洲占为其世袭家园；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的面积等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创造出它的分枝，基督的所有使徒，除两人外，也都在这里逝世。但现在，这些地区中就算还有基督徒的话，他们也是靠土地勉强维生，并向其敌人纳贡；他们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带回他们已经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用武力占领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更大，因为非洲人从前曾供养过这些最傲慢的、精灵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这一停滞不前的大陆与基督教《圣经》的影响被隔绝，其时间可以如拉丁语的存在那样久远。第三部分是世界上剩下的部分——欧洲。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谁又愿将基督徒的名声给予那些居住在

遥远的海岛上、像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长达300年之久，并一直期望着吞并欧洲其他地区。[1]

但到12世纪时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生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一点首先在旷日持久的反对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的成功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其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相形之下，中国的明朝正在撤回到闭关自守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试图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印度洋失败之后沮丧地认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而将海洋赐给了基督教徒。"同样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水军也从未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全世界的海洋就都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而他们也迅速地利用了这个大好机会。这一事实对世界的重要意义在一位奥斯曼帝国观察家于1625年作出的下述评论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向各地派遣船只，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通常都是先被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转运到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西方基督教国家），再从那里转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溢价五倍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那里的过境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就将统治伊斯兰教各国。"[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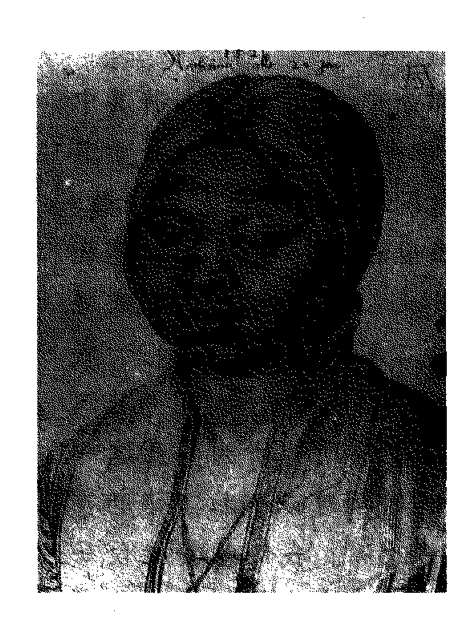


图101 欧洲黑奴像

这幅由杜尔（Albrecht Durer）绘制的凯瑟琳娜的画像提供了16世纪在欧洲存在黑奴的证据。凯瑟琳娜是葡萄牙经济部长布热道（Joao Bradao）的仆人，而葡萄牙则是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杜尔于1520到1521年在欧洲低地国家逗留期间成为了布热道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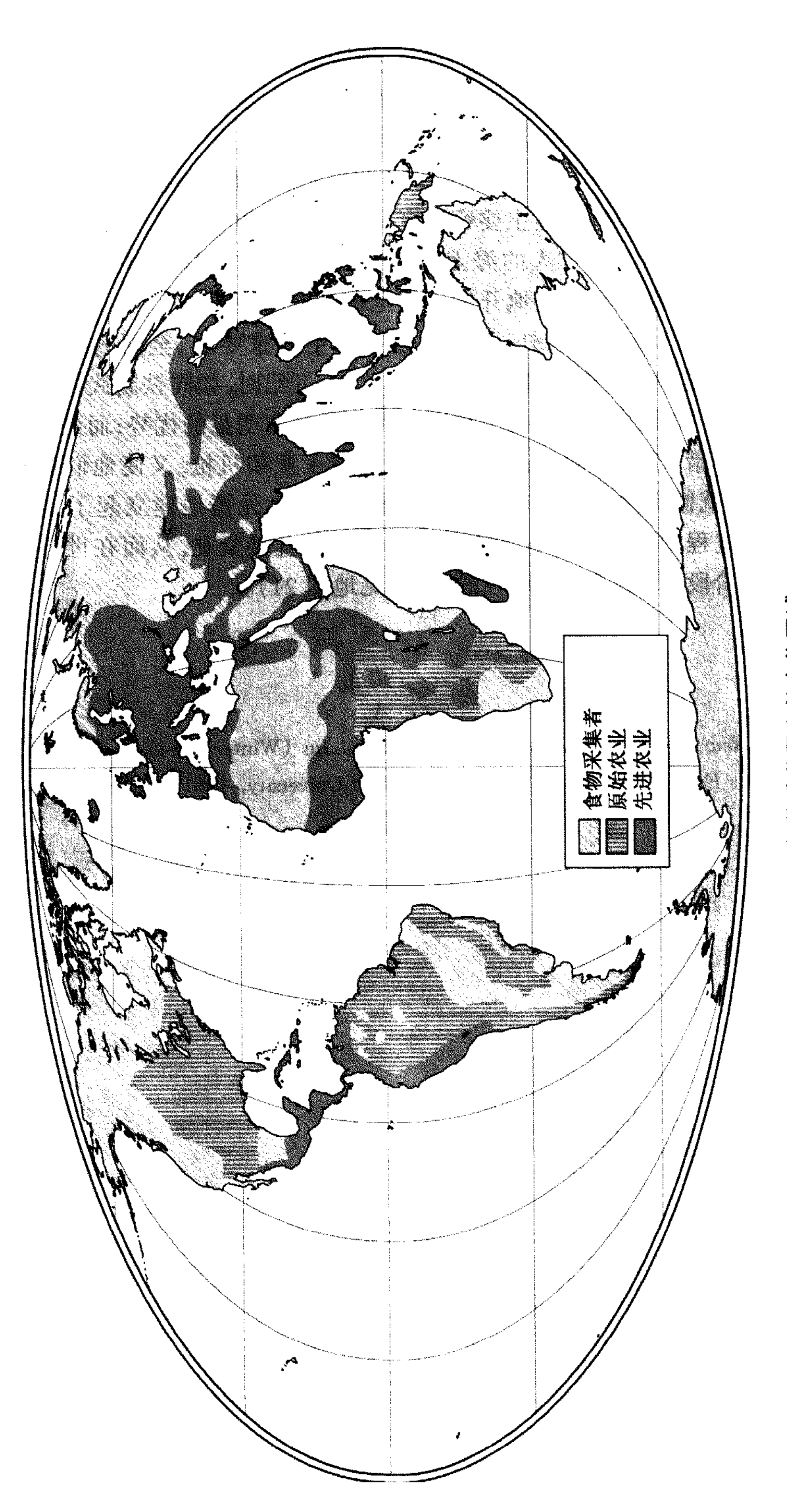
如果将这一切中肯的分析同 500 年前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做的分析进行一下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世界结构发生了明显而根本的变化。确实，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它标志着西方居于优势地位的近代时期的到来。

先前的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由于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而开始的；这些游牧民族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主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文明中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时期则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发轫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全世界海洋上活动，并进而势不可挡地开始了其全球规模的活动。

除了无可匹敌的海上优势外，西方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全面的技术优势——这一优势在以后数世纪中得到稳步增长。因此 16 世纪时，如同铁制武器远比铜制武器具有优势一样，欧洲人的航海帆船和海上大炮也享有明显的优势；而到 19 世纪时，就如同农民优于猎人那样，西方人的轮船、大机器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更巨大的优势。所以，就像班图人取代布须曼人一样，欧洲人无情地建立起了他们的全球霸权。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了直接交往，从而在世界历史上结束了欧亚大陆阶段，开始了其全球性的阶段（见地图 21）。

注释

1. W. Clark, "*New Europe and the New Nations*," *Daedalus* (Winter, 1964), p.136.
2. B.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1961), p.28.



地图 21 1500年前后世界上的文化区域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中的种族

当他们开始其航海探险时，西欧人发现各种族的人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例如，中国人所处的文明繁荣富足、高度发达、统治严明，以至于许多欧洲早期的来访者都认为中国文明比欧洲文明优越。而海外有些种族这时还是赤身裸体的、游牧的食物采集者，欧洲人将他们视为野蛮人，从而或将他们逼进沙漠或丛林，或把他们变成奴隶，甚或追捕他们，消灭他们。而且在做这些残暴的事情的时候欧洲人还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正当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将其优越的文明之光带给世界上落后的劣等种族的优等种族。

这一论调引发了一个至今仍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各种族到底是天生平等的，还是有些种族天生就是优等民族，而有些种族天生就是劣等民族呢？尽管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各种族天生就是平等的，但1952年9月召开的自然人类学者和遗传学者国际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却很具有代表性：

> “对于所谓的人类不同种族与生俱来在智力和情感发展的能力上存在差异的观点，现有的科学知识并未为此提供依据。……遗传上的差异在决定人类各种族间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时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

如果遗传基因不能解释欧洲探险者在海外各种族身上发现的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那么什么能解释它呢？这在现在仍是一个热点问题，并引出了种族主义的论调。种族主义主张：一个种族相对于其他种族的优越性是由各种族的生理特性引起的。教皇约翰二世对种族主义思想尤为警惕，并向主教委员会呼吁“去帮助培育和唤醒种族间的相互尊重”。1988年，主教委员会报告说，种族主义是一种近代现象，古代并不存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相信他们的文化优越于野蛮人，但却并不认为所谓的野蛮人是因为其先天的生理原因而处于劣等地位。在近代以前，建立在基因优越理论上的种族主义并没有紧迫的现实需要。原因很简单，此前不同种族居住的区域互相孤立，跨区域的交往或征服都非常困难。但是，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随

之而来的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征服和奴役，种族主义有了为这些残暴行为辩护的用武之地，因而它也就被轻而易举地合理化了。有种族主义者声称，“应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那样对待西印度和南美大陆的居住者，并让他们专门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1537年，教皇保罗二世对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予以了谴责，并说：“因此我们决定并声明，所谓的印第安人，以及基督教徒将来要遇到的其他种族，即使不信基督教，其自由和财产也不可剥夺……；相反，他们有权享有他们的自由和财产……她（教堂）对每个人提出了‘每个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的建议，并打算推行这个建议。”[2]

回到上述问题，为什么欧洲探险家发现了海外种族在发展水平上的极端差异？著名的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提出了一种理论，该理论似乎能与历史事实相吻合：

> 人类的历史证明，文化的进步取决于某个社会群体拥有的向其邻近社会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社会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社会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就越大。文化最简单的部落基本上是那些与世隔绝较长时期、因而无法从其邻近部落的文化成就中获益的部落。[3]

换句话说就是，造成人类发展水平不同的关键是不同种族的易接近的程度。那些最有机会与其他种族相互影响的种族，是最有可能处于领先地位的。但也不可否认，它们是被迫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既选择了机会也选择了压力。如果机会没有抓住，这种接近就包含着不断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种族则既未受到刺激也未遭受危险，因为它们没有选择压力。因此几千年来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就相对保持不变，其生存也未受到危险。

如果将这一假设运用于全球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文化上是所有主要种族中最易受到外力遏止的种族；其次是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再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最少受遏止，同时进步最大的是欧洲大陆各种族，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处于经常不断的、日益增加的接触之中。自然，这就是公元1500年以后被欧洲探险者发现的各种族在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这时仍处在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正从旧石器时代的加利福尼亚部落转向给人深刻印象的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文明；非洲黑人则与美洲印第安人相差不大，尽管他们的综合发展水平更高一些；最后是在欧亚大陆发现的非常高级和极其深奥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南亚的印度教徒和东亚的儒教信徒——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更高水平上。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天生优越，它仅仅表明“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获取了天时地利而已。而在历史的其他时期，情况则完全不同。例如，在古典文明时代，处于文明世界中心的、因而也

是最易接近、最发达的种族是地中海沿岸各种族。而北欧人当时则处于边缘地区，所以他们与世隔绝且不发达。于是，我们便能感觉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写给他在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的含义："你最好不要从英国购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蠢，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以至于他们无法成为雅典人家庭的一部分。"[4]

同样，在中世纪文明时期地中海仍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北欧仍然是落后种族的、与世隔绝的地区。因此，11世纪时在西班牙的托莱索有位穆斯林这样写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种族性情冷淡且永远也不成熟；他们虽然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但在智力和才能上完全缺乏敏锐性和洞察力。"

西塞罗和托莱索的那位穆斯林在他们那个时代都轻视北欧人，认为他们"愚蠢"且缺乏"智力"和"才能"。他们的观点似乎都是正确的。但是，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北欧人的"落后"并不比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落后"与遗传基因的因果关系更紧密——即并不比当今世界不发达种族的"落后"与遗传基因的因果关系更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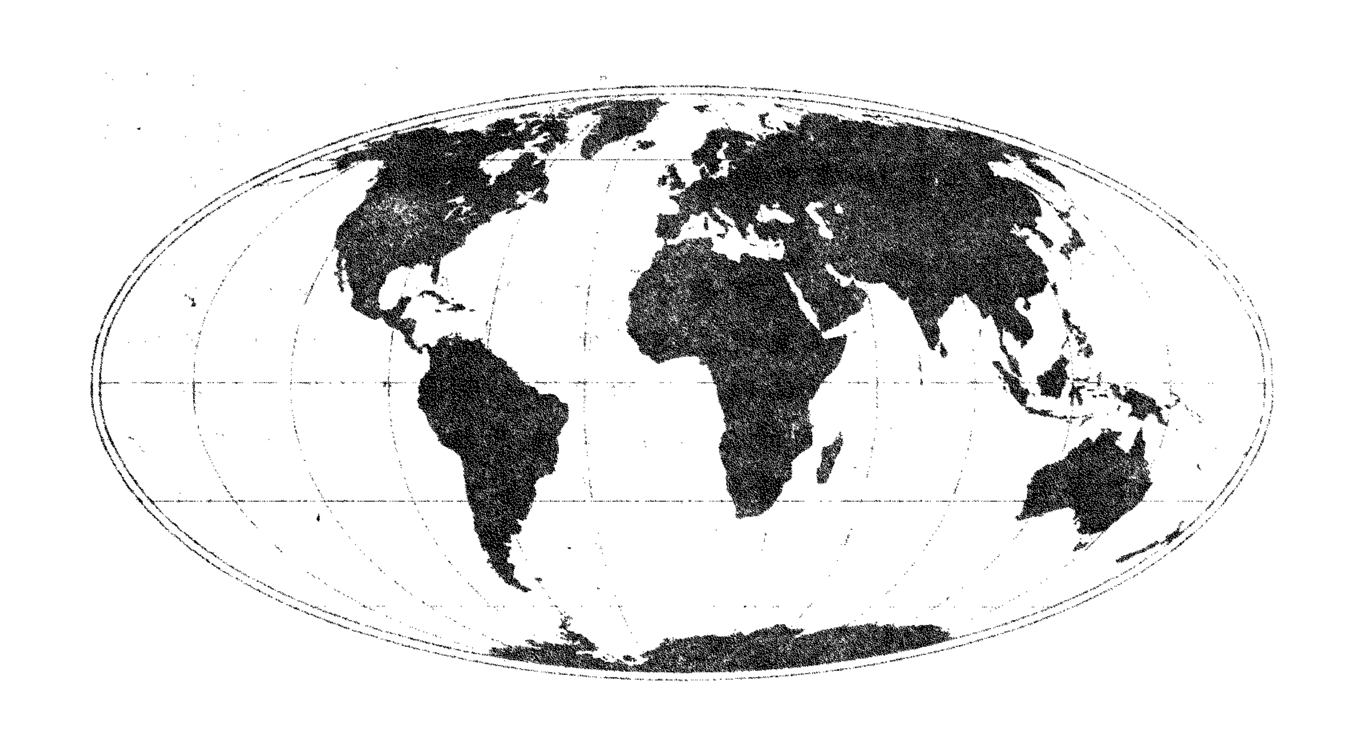
但是不管在世界历史上的哪个阶段"落后"都意味着脆弱，因为"落后"种族在人数和技术上都不如其他种族。这在有60亿人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尤为明显。结果，据估计，从1500年至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类文化已经消失——或被取缔，或被同化。因此美国人类学协会建立了"人权委员会"。与此类似，1972年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拯救文化"(Cultural Survival)机构。这个机构为了保护现存文化曾为一些土著种族大声疾呼，如受亚马孙河谷淘金潮危及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Yanomama)、尼日利亚境内被石油公司的开采所干扰的欧格尼(Ogoni)部落以及被危地马拉军队侵害的玛雅印第安人。这些濒临灭绝的种族被人们称为土著种族，他们的生存状况十分危急，而且他们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高达5%。[5]

推荐读物

关于种族的性质、意义和结果最有价值的读物是：P. Mason 所著的 *Race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70 年版)。UNESCO 是国际上一些科学家写的论文集：*The Race Question in Modern Science* (Morrow 出版社，1956 年版))。所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同意，一个种族的成就由历史和社会背景、而非基因决定。与此相反的观点则收在以下读物：A. R. Jensen 所著的 *Bias in Genetics and Education* (Harper & Row 出版社，1972 年版)；和他的 *Bias in Mental Testing* (Free 出版社，1980)。Jensen 的发现已被 L. J. Kamin 在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 (John Wiley 出版社，1974 年版) 一书中反驳；最具娱乐性和权威性的读物是 S. J. Gould 所著的 *Ever Since Darwin* (Norton 出版社，1981 年版)。J. Dower 所著的 *War Without Mercy* (Pantheon 出版社，1986 年版) 则对二战中太平洋地区种族的作用进行了重要分析。

注释

1. UNESCO, *What Is Race*? (Paris, 1952), pp.85, 86.
2. F. Boas, "*Racial Purity*," Asia, XL (May, 1940), p.231.
3. R. Benedict,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rev. ed. (Viking Press, 1943), p.7.
4. Ibid., p.8.
5.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96.



第五编

公元 1500 年以前各孤立地区的世界

本编主要关注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研究世界史应从公元1500年开始？为什么偏偏是西方人在16世纪的巨大发现和惊人探险中起了主要作用？前一问题将在第18章中做出回答；后一问题则是本篇余下各章要讨论的主题。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做出那些改变人类生活道路、开创世界新纪元的历史性发现。这种假设是完全无根据和站不住脚的，尤其是考虑到中东的穆斯林和东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航海传统时，情况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是西方率先开拓了至今影响仍存的海外事业呢？第18、19章将分析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的传统社会，第20、21章将考察与此形成对照的西方社会的动力来源。

如果有谁想见证当今时代最光辉的一面，他再也找不到比土耳其更合适的地方了。

——H.布朗特，1634年

第18章　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要回答为什么是哥伦布而不是中国人或阿拉伯人发现了新大陆，就一定要了解当时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的情况。在本章和余下的章节里我们将分析为什么尽管中国和中东也都是高度发达和富足的地区，却没有出现西欧的扩张现象。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这些地区的高度发达和富足使得他们自鸣得意、自我满足，才使它们未能适应变化的世界。

一、现代穆斯林帝国的崛起

如果公元1500年前后有人在月球上观察地球，那他对穆斯林世界的印象一定会比对基督教世界的印象要深得多。这位神话中的观察者一定首先会对穆斯林世界的辽阔版图和它不断进行的扩张印象深刻。最早的穆斯林是阿拉伯半岛上在宗教领袖穆罕默德领导下第一次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穆罕默德相信自己已经获得神谕，警告人们会有末日审判，有信仰的人将进入天堂，而邪恶的人则将在地狱受罚。他号召他的信徒们举行一些仪式，这些仪式后来成为伊斯兰教的五个支柱（包括每日祈祷、捐献救济品、斋戒、去麦加朝圣等）。这五个支柱和《古兰经》的规训不但造就了一个宗教，而且形成一种社会准则和政治制度。信徒们感到他们彼此都是有共同使命的兄弟，这有助于将当时还很涣散的阿拉伯民族团结起来。

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阿拉伯人冲出了阿拉伯半岛，并迅速蔓延到中东的拜占廷帝国和萨桑王朝。然后他们向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北非和西班牙扩张。

到公元750年穆斯林扩张的第一阶段结束时，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印度、从摩洛哥到中国的广大帝国（见地图22）。阿拉伯人穆斯林于7世纪和8世纪在中东进行了最初的迅猛扩张后，在公元750年至1500年间又进行了另一阶段的扩张。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渗透到中欧，向北扩张到中亚，向东入侵到印度和东南亚，向南深入到非洲腹地。于是穆斯林世界也就随之扩大了一倍，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东端的儒家世界。

虽然1500年左右的穆斯林世界的领地已经是最为辽阔的，但它随后仍在继续大力向外扩张。在那一时期里，向外扩展疆域的并非像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有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抵达海外的同时，穆斯林世界也正在陆地上进行扩张。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一个帝国。但就在这时，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中亚民族——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正在闯入中欧，蹂躏匈牙利，并于1529年围攻哈布斯堡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同样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杰出的皇帝也正在稳步地向南扩展自己的帝国，直到他们成为几乎整个半岛的主人。此外，伊斯兰教则继续在非洲、中亚和东南亚传播。

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张是由于它有力地改变了非穆斯林的信仰，尽管穆斯林并不像基督教徒那样惯于使用强制的手段。比起强制性的粗暴措施，穆斯林商人和传道士潜移默化的传教工作要有效得多，他们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尤为成功。惯常的情形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劝人改变信仰和推销商品结合起来。商人的职业使他可以与其所要劝服的人们建立起经常而密切的联系。此外，这种传教也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即使商人与村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他多半还是会娶土著女子为妻。这种通婚常常导致该女子的家庭成员接受伊斯兰教。有了孩子之后，孩子们很快就需要有宗教指导，于是学校也就建立起来了，通常穆斯林子女和异教徒子女都可以去上学。他们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及礼仪。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教自创立之时起在争取皈依者方面就远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成功。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教在非洲与基督教进行的竞争中仍占据上风，因为它对非洲土著文化的适应能力之强是独一无二的，而基督教则往往被认为是代表白人奴隶主的、外来的文化。

除了不断扩展疆域外，约1500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还以它的三大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而闻名于世。这些帝国当时都已臻于强盛，统治着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

这些帝国之所以会在这一特定阶段里崛起，一个重要因素是火药的发明及其在火器和火炮上的应用。火药和火器加强了穆斯林世界的核心力量，正如它加强了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力量一样。不过，火器绝非可以说明这三个穆斯林帝国崛起的惟一因素。同样重要的两个原因是，建立王朝的首领极有才干，以及当时的形势对它们特别有利。现在我们就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结合起来使这三个穆斯林帝国得以崛起的。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了这个以他们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他们最初来自中亚(而闪米特阿拉伯人则来自阿拉伯半岛)，是广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先前的数世纪里，突厥部落不断地成批迁入中东富饶地带。早在 8 世纪时他们就来到中东，渗入伊斯兰教帝国，最初他们是充当雇佣兵。10 世纪时蒙古西征的压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迁徙到中东，其中包括一支塞尔柱突厥人。这些新移民在 1071 年具有决定意义的曼齐克尔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廷军队，突破了小亚细亚沿托罗斯山脉的传统边界——这条边界已经保护罗马和拜占廷帝国达 1400 年之久。这一胜利使得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为塞尔柱帝国的一部分，只剩下西北角留给了拜占廷人。

不过塞尔柱帝国后来也走向了衰落，它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或苏丹国。13 世纪后期成群新来的突厥移民使局面变得愈益混乱，其中有一伙人定居在塞尔柱帝国最西北边缘的地区，那里距分隔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达达尼尔海峡还不到 50 英里。1299 年这伙人的首领奥斯曼向塞尔柱帝国最高统治者宣布独立——从这一低微阶段起步，以这位原本藉藉无名的奥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这个辉煌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亚细亚夺取拜占廷的残余领土。到了 1340 年整个小亚细亚都已处于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之下。1354 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加利波利建立要塞，从而获得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土耳其人如要侵入欧洲此时应该是最有利的时机——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普遍陷入衰落和分裂：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夺走了许多基督教国家居民的生命；灾难性的百年战争使英法两国无暇他顾(这场冲突的起讫日期颇值得注意：战争开始于 1338 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们对小亚细亚的征服；结束于 1453 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诸国因为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长期争斗也无力反对土耳其人；巴尔干半岛则由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异教的鲍格米勒派三者间的宗教斗争，以及早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拜占廷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相互间的争斗而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与小亚细亚一样，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农民也对其帝国统治者极度不满，因此他们对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很少抵抗甚至放弃抵抗。

这些条件解释了奥斯曼人从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基地所进行的扩张何以能取得惊人成功。1384 年他们攻占索非亚，其后不久就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5 年后，他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这些胜利使得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的领地团团包围。1453 年这座被围困多年的都城终被攻占，长达千年的拜占廷帝国也由此而历史性地终结了。

接着，土耳其人又南下进犯穆斯林富国叙利亚和埃及。1516 年他们经过一场旋风似的大战占领了叙利亚，次年又占领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后阶段的征服是在中欧进行的。他们在著名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在 1526 年的莫哈奇战

役中一举击溃匈牙利君主国。3年后，苏里曼率军围攻维也纳，但却被打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遇上了连绵数日的阴雨天，使他无法将笨重的火炮运至前线。土耳其人尽管受到这一挫折，但后来仍又进行了一些扩张：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年夺得克里特岛，并在此后10年中又占领了波兰的乌克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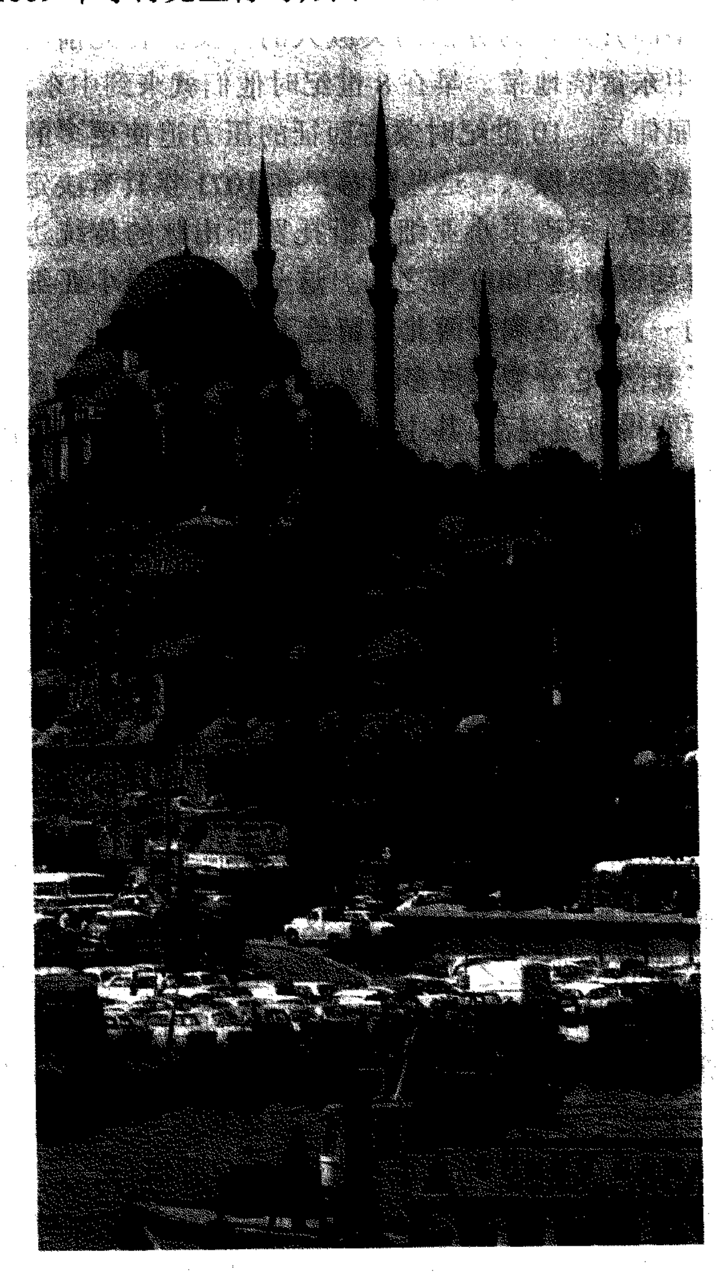


图102 苏里曼寺

苏里曼寺是伊斯坦布尔最辉煌的寺庙之一，其高度超过了位于伊斯坦布尔第三座大山的金角。它以其创建者苏里曼的名字命名，在建筑师西奈的组织下于1557年建造完成。西奈是一个奴隶身份的新兵，通过步步升迁最终达到了较高的位置，后被葬于此寺庙中。

奥斯曼帝国在其臻于鼎盛时的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帝国。它的腹地在土耳其小亚细亚，但人口的大多数则是由南到阿拉伯半岛上的穆斯林和西到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徒构成的多数。它地跨三大洲，拥有5000万人口，而那时英国却只有500万人口。无怪乎当时的基督教徒对这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是"一团日益旺盛的火焰，不管遇上什么都会把它熔化，并继续燃烧下去。"[1]



图 103　苏里曼的征战
苏丹领袖苏里曼率军讨伐匈牙利人。

萨菲帝国

这一时期的第二大穆斯林帝国是波斯的萨菲帝国。它和小亚细亚一样曾为塞尔柱突厥人所征服。但是虽然小亚细亚突厥化了，波斯却依然保持了波斯即伊朗的种族和文化。这很可能是因为小亚细亚从前曾为基督教拜占廷帝国之一部分，而波斯则早在 7 世纪穆斯林扩张的第一阶段就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因此波斯没有像小亚细亚那样遭到穆斯林武士的蹂躏，波斯社会也没有在人数相对较少的突厥行政官员和士兵的统治下发生什么根本变化。

塞尔柱突厥人对波斯的统治从约公元 1000 年一直维持到 1258 年蒙古人入侵。这些新来的蒙古统治者被称为伊儿汗，他们起先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在约 1300 年前后已转变为穆斯林。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城市和灌溉工程，使波斯遭受了永久性的巨大破坏；但是这一倒退到 1500 年伊儿汗王朝为萨菲王朝所取代时也就终止了。

萨菲王朝的君主们是几个世纪以来波斯最初的土著统治者。沙·伊斯梅尔一世

是这一新王朝的缔造者，他在位24年，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宗教政策统一了整个波斯。他宣布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为国教，并无情地镇压了敌对的逊尼派。波斯人认为自己是什叶派，这就将他们与大部分是逊尼派的土耳其人和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区别开来。

萨菲王朝最杰出的统治者是国王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队，使波斯军队现代化。在他的统治下，波斯成为获得国际承认的一大强国。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波斯，请求与波斯结成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事实上，当时这两个穆斯林国家在欧洲各国的外交上均占有突出地位。例如，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曾与苏里曼一世合作，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开战；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又与波斯人合作，反对他们的这两个共同敌人。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交往在当时被谴责为“不虔诚”和“渎圣”；但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当时都已成为欧洲任何外交家都无法忽视的世界强国。

莫卧儿帝国

正如萨菲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在波斯创建了一个“民族”王朝那样，莫卧儿王朝两位杰出的统治者巴布尔和阿克巴也在印度缔造了一个“民族”王朝——这对印度教占优势的地区中的穆斯林统治者而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计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长时间。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伯穆斯林掀起，他们于712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区。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内地，因而他们对印度的影响很有限。

第二次入侵浪潮发生于约公元1000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开始从阿富汗境内的根据地不断侵略印度之时。侵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个世纪，给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最后的结果是：在北印度建立了许多穆斯林王国，而南部则继续存在着一批印度教国家。但是即使在北印度，大部分人依然在种族上是印度人，在宗教上信奉印度教。他们并未像小亚细亚人那样伊斯兰教化和突厥化。其原因仍在于，从北方南下的突厥人与印度原有的千百万人相比，仅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能填满的仅是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农民、商人和大部分官吏仍要靠印度教臣民来充当。的确，在某些地区已有大批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尤其是一些被压迫的种姓——他们想通过这一新宗教摆脱剥削。然而，当1500年第三次穆斯林入侵浪潮随着莫卧儿人的到来而开始时，印度仍是一个印度教占压倒优势的地区。

这些新的入侵者也是突厥人，他们的首领是伟大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别名为“跛帖木儿”)的直系后裔、引人注目的巴布尔。1524年他率领装备了火绳点火滑膛枪和火炮的12 000人的小部队打败了印度的10万大军。他乘胜占领德里，作为自己的新都。四年后巴布尔去世，其未竟的事业由其子嗣继续完成，帝国迅速发展。在巴布尔的孙儿、著名的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期间，帝国臻于鼎盛。

阿克巴是到他为止莫卧儿王朝所有皇帝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征服了西方的拉杰布达纳和古吉拉特、东方的孟加拉和南方德干高原上的几个小邦，使帝国领土大为扩展。当时莫卧儿人的统治已经从喀布尔和克什米尔扩大到德干高原，后来在奥朗则布(1658—1707 年在位)的统治下更是进一步扩大——几乎扩大到半岛最南端。除了赫赫战绩外，阿克巴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非凡人物。他虽未受过教育，但却多思好问、才思敏捷；对此，就连那些熟识他的耶稣会教士也不得不表示钦佩。他活动范围之惊人，会使人联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这位俄国沙皇一样酷爱机械，他在冶金方面也颇有研究，能设计火力更大的枪炮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学习绘画，热爱音乐，精于打马球，而且会演奏各种乐器——锅鼓是他最喜爱的一种。阿克巴甚至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宗教“丁—伊拉赫教”，即“神圣宗教”。它的教义是折中主义的，糅合了许多宗教，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义。阿克巴希望共同的信仰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团结起来，但实际上它却未对国家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宗教需要的智力太高，不能吸引大众，甚至在宫廷中也没有多少皈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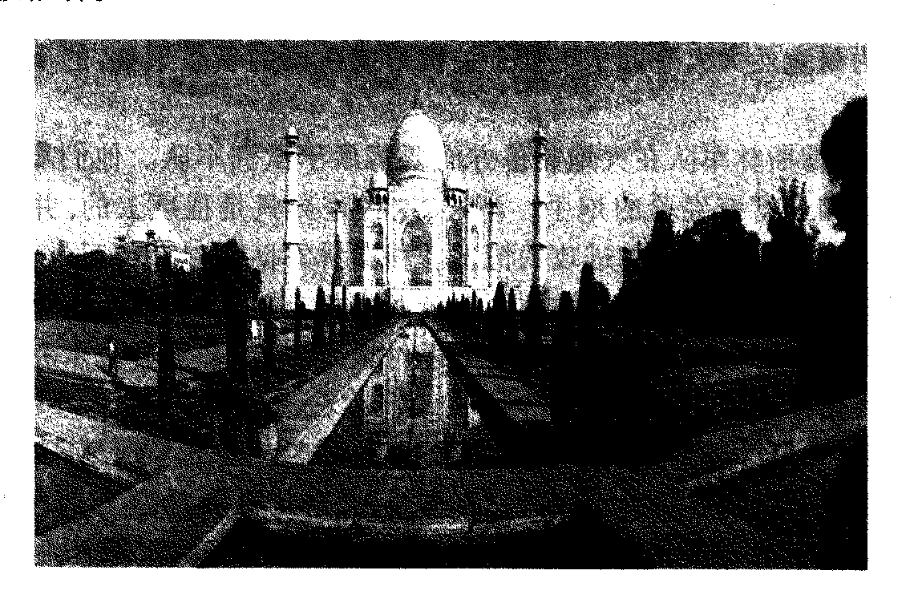


图 104　泰姬陵

泰姬陵或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陵墓。1631 年至 1653 年，沙贾汗王为他的爱妻泰姬玛哈建成了这座陵墓。它坐落于莫卧儿首都阿格拉城的亚穆纳河南岸，至今仍是莫卧儿建筑中的瑰宝。

然而，阿克巴借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东西，在他结束对印度教徒的歧视、规定他们与穆斯林地位平等时却获得了。他废除了印度教徒前往圣地朝拜时须缴纳的香客税，取消了对印度教徒的人头税——这种税，所有穆斯林国家都向它们国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征收。阿克巴还允许印度教徒担任国家高级职务——这也使得印度教徒不再把莫卧儿帝国看做敌国。由此阿克巴梦寐以求的新印度——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组成的分裂的国家也就开始出现了。

二、穆斯林帝国的辉煌

军事力量

这三个穆斯林帝国都是头等军事强国。关于这一点,在1525年12月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发给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的呼吁书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明。这份呼吁书请求土耳其人进攻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苏里曼于1526年做出响应:渡过多瑙河,侵入匈牙利,从而减轻了弗朗西斯的压力。而这则仅仅是土耳其人多次远征中的一次——这些远征不仅援助了法国(顺便为土耳其人带来了更多的领土和战利品),而且还援救了路德教异教徒——因为土耳其人的远征将哈布斯堡皇室的注意力从德意志转移到受威胁的多瑙河边界地区。穆斯林的军事力量竟然大大有助于正处于关键形成阶段的新教事业,的确似乎有悖常理。

通常来说,穆斯林军队在火炮装备方面要落后于欧洲军队。他们靠欧洲人供给最先进的武器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不过,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不存在穆斯林帝国因缺乏火炮而无力抵御进攻的情况。穆斯林军队可以获得足够充足的装备,只是这些装备并不像当时最好的欧洲军队装备那样有效,操作情况也不理想。穆斯林,特别是土耳其人,懂得为西式火炮和炮手付钱,但他们却没有技术和工业来跟上西方装备的最新进展。

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庞大兵力则给欧洲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估计,阿克巴时期整个印度常备军的总数达一百多万人,这几乎是1914年时印度军队的两倍。而且在诸穆斯林帝国臻于鼎盛时,这些庞大的军队仍都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于显而易见的地理上的原因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非常熟悉,他们有着大量的与之打交道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使得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印象深刻,充满敬意。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布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的报告是颇有代表性的。1555年德巴斯贝克参观了一所土耳其兵营之后,在他致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像哈布斯堡皇室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制度之间的争夺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他们所属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完整无损、军队训练有素、经验丰富、胜利接连不断、士兵吃苦耐劳、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时刻警觉。而在我们方面

则是国库空虚、奢侈无度、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军纪涣散、到处是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而最糟的是，敌人习惯于胜利，我们却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惟一的障碍是波斯；波斯地处这些侵略者的后方，迫使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对波斯的畏惧给了我们一段喘息时间，但这仅仅是暂时的。”[2]

行政效率

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对他们的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的好坏也就取决于帝国首脑的才能。16 世纪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出众的人。可以肯定，苏里曼、阿拔斯和阿克巴堪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比肩。阿克巴拥有一支组织出众的官僚队伍，官吏的品级用骑兵的军衔来表示。由于在莫卧儿帝国的行政部门任职待遇优厚且有望迅速晋升，因而吸引了印度和国外最优秀的人物。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国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余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后，其财产由皇帝继承，职位成为空缺。这就减少了贪污腐化和世袭占有等弊病，而这些弊病当时则正困扰着西方各国。

由于阿克巴的官僚机构向所有臣民开放，因此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标准就是才能而不是宗教。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斯贝克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一行政管理制度也确切地作了相同的说明：

“苏丹在任命官员时并不重视那些因拥有财产或地位而自命不凡者。……他根据是非曲直来衡量每件事，并仔细考察所要提升的人的品行、才能和性格。在职人员只有立功才能晋升，这一制度保证了任人唯贤。……因此，对土耳其人而言，荣誉、重要职位和法官职务是作为对杰出才能和卓越贡献的报答。如果有谁不诚实、惰怠或做事粗枝大叶，他就会始终留在官阶的最低一级，成为人们蔑视的对象。……我们的想法与此不同，在我们那里，空缺职位决不留给那些立功的人；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出身；显赫的出身才是在政府部门得到晋升的惟一关键所在。”[3]

经济的发展

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穆斯林各国用现在的术语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

当时那些为了抵达传说中遥远的印度和香料群岛而愿意面对任何艰险的西欧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奥斯曼帝国离西欧人的老家较近,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单位。它幅员辽阔,保证了实际上的自给自足。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比奥斯曼帝国更令人着迷的是遥远、奇异的印度。印度能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纺织品,尤其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的细纹棉织品。从罗马帝国早期起印度就使欧洲的金银向外流尽。

穆斯林商人对南亚贸易的控制,与穆斯林帝国的财富一样具有重要意义。在只晓得用盐处理食品、对其他食物保存技术知之甚少的世界里极受欢迎的香料贸易尤其重要。在好几个世纪里,香料与其他许多商品如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棉织品一起,沿着南、北部的商人路线来回运送。北部的路线是从远东穿过中亚而抵达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各港口;南部的海路是从东印度群岛和印度沿着印度洋、再上溯波斯湾或红海而抵达叙利亚和埃及各港口。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陷入无政府状态,1340年以后北部的商路实际上已被关闭。此后,大部分商品都汇集到此前受控于穆斯林商人的南部的海路,沿海路运往各地。

这一贸易为穆斯林世界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不仅以关税形式为政府提供了税收,而且还为与贸易直接或间接相关联的成千上万的商人、职员、水手、造船工人、赶骆驼者和码头工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印度商品在被卖给亚历山大的意大利中间人时,其价格是其成本的20倍以上这一事实可以说明牟利程度。

葡萄牙人在其于1498年闯入印度洋后,迅即控制了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的大部分。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的商品质优或者经商手段高明,而是由于他们的海船和枪炮占有优势。实际上我们将发现,葡萄牙人最初的境况十分窘迫,他们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换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将他们从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的是不久之后从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中滚滚而来的大批金银。

三、穆斯林帝国的衰落

16世纪的穆斯林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帝国相匹敌。然而,17世纪时这些帝国就已开始衰落。到18世纪它们已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至今仍然落后。

有一种解释是统治这些帝国的王朝都很腐败。1566年谢里姆二世继承苏里曼一世,他懒惰、愚钝、放荡,嗜酒如命,其臣民都称他为酒鬼谢里姆。在波斯,阿拔斯的继承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不过,王朝的没落并非造成穆斯林国家毁灭的惟一因素。所有的欧洲王室都曾有过昏聩无能、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国家却并未因此而衰亡。

对于穆斯林世界的种种不幸还有一个更根本的解释:它缺乏欧洲那样的动力。

它未经历过将在第 22、23 章提到的、正在使欧洲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的种种影响深远的变化。例如，在经济领域，无论其农业、工业、金融方法或商业组织，均未发生根本变化。如果在 17、18 世纪时有位旅行者进入穆斯林国家，那他一定会看到 500 年前十字军战士就已目睹过的经济惯例和经济制度。正如巴斯贝克所说，只要统治者强悍、开明，专制帝国就能顺利、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衰弱了，那么朝臣、官吏和军官们就会勾结起来压榨社会的生产阶级，不管后者是农民、工匠或商人。他们的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扼杀了私营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平民百姓中凡是稍微露富的，其财产就会成为被肆意充公的对象。因此商人们都藏匿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公开投资去扩大自己的买卖。



图 105　勒班陀之战

1571 年 10 月 7 日勒班陀之战在希腊沿海打响。在这场 16 世纪规模最大的海战中，西班牙人和他们的意大利盟军在奥地利的唐·约翰的指挥下一举击溃了土耳其舰队，从而消除了奥斯曼人对西地中海的威胁。

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的这种态度部分源于宗教偏见，部分则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最大、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与基督教欧洲有关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 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奥同盟成立，它标志着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却得到奥斯曼帝国政府草率无礼的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4] 不感兴趣。这种态度在 16 世纪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在 18 世纪那就是自取灭亡。

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

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里，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他们不但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那时他们自己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将来要做的任何动力。

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

18世纪末英国领事和商人威廉·伊顿在奥斯曼帝国呆了许多年。他那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情况和机构的绘声绘色的报告，反映出与其全盛之日相比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到了何等地步。*

由于以上的原因，一般性知识即便培养起来了也是不成气候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只需了解自己的事务和专业知识，有了专门的知识他们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而任何其他干涉都会被认为是愚昧无知和不合时宜的。在基督教治下的欧洲，拥有一般性科学知识的人比比皆是，且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人没有名气。除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炮、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的。这种狭窄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不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这种极端荒谬的情形还和他们的胡乱猜测交织在一起……

从穆夫提(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到农民都普遍相信，地球被一根大铁链固定悬挂着，它的外面有七个天堂；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至少也有奥斯曼省那么大，它是因为要给地球提供光明和热量而形成的；月食的发生是因为有时候一条巨大的龙想要吞食月亮；星星是用铁链固定在最高的一层天堂中的……

他们用不同的蔑称来区分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土耳其人经常用绰号来称呼那些非奥斯曼人并贬损那些人建立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人	卖下水的人；
亚美尼亚人	吃垃圾的人，扛包的人；
波斯人和巴尔干人	懒汉
基督徒	偶像崇拜者
荷兰人	奶酪贩子
英国人	无神论者
佛兰芒人	皮条客
法国人	没有信仰的人
格鲁吉亚人	好吃懒做的人
德国人	渎神的异教徒

希腊岛民	傻瓜
意大利人或弗兰克人	杂交人种
犹太人	污秽的狗
摩尔多瓦人	懒惰的人
波兰人	傲慢无礼的异教徒
俄国人	疯狂的异教徒
西班牙人	懒人
鞑靼人	吃腐肉的人
瓦拉几亚人	吉普赛人

有一桩真事:几年前有一个博学的法官瞎了一只眼。他得知君士坦丁堡有一个欧洲人很善于制假眼,做的假眼看上去和真的一样,就立即去买了一只。但是当他把假眼安到眼窝中时,他马上怒气冲冲地跑去找造假眼的人,骂他是一个骗子,因为他用假眼根本就看不见东西。造假眼的那人生怕到手的钱又被讨回去,就向法官保证不久之后他的假眼就能和真眼一样看东西了。骂人的法官平静了下来,撒谎的人得到了回报。他立即处理完剩下的假眼存货,跟着就离开了那些希望用他的假眼看到东西的土耳其人……

* W.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 (London, 1809), pp.190—193.

可以说明穆斯林帝国衰落原因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这三大穆斯林帝国都是陆上帝国。它们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儿人都是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因此他们的帝国都面向中亚的陆地,背朝大海。这些帝国的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极其漠视,因此当葡萄牙人开始夺取印度洋上所有的战略位置时,他们都未采取行动加以制止。

这种形势的意义在于,欧洲人能够在不遭受穆斯林反对的情况下成为世界贸易路线的主人,以往欧亚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一向控制在穆斯林手里。这一事实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对世界贸易的控制使得欧洲人大大富裕起来,并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愈来愈富裕、生产力强大,动力十足,愈来愈实行扩张政策,而一度令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国则因很少参与新的世界经济而仍处于静止状态,并愈来愈落后。

推荐读物

与本章直接相关的是J.J. Saunders编著的 *The Moslem World on the Eve of Europe's Expansion* (Prentice Hall, 1966). T.W. Arnold 所著的 *The Preaching of Is-*

lam (修订版, Constable, 1913)描述了自穆罕默德时代至19世纪末伊斯兰的扩张。

关于各伊斯兰帝国,可以参见 H.A.R. Gibb 和 H. Bowen 所著的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第一和第二部分(Oxford University, 1950, 1957); H. Inalcik 所著的 *The Ott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Weideneld and Nicolson, 1972);多卷本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Cambridge, 1968ff.); N. Itkowitz 所著的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0); S. Wolpert 所著的风格轻松的 *A New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1977); R. Dunn 所著的 *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ler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总体看法发人深省。

最后,论述穆斯林各帝国衰落的著作有: J.J. Saunders 所著的 The Problem of Islamic Decadence, *Jounal of World History* 7 (1963), 701—720; T. Stoianavichs 所著的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Ottoman Society in the Balkans, *Slavic Review*, 21 (December 1962), 623—632, B. Lewis 所著的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 选自 C. M. Cipolla 所编的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Methuen, 1970), pp.215—234.

注释

1. Mehmed Pasha, *Ottoman Statecraft: The Book of Counsel for Vezirs and Govenors*, W. L. Wright, ed. and tr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35), p.21.
2. C.T. Foster and F.H.B. Daniell, ed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London, 1881), pp.221, 222.
3. Ibid., pp.154, 155.
4. Cited by W.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London, 1809), p.10.

我们大可不必对中国人的成就念念不忘，以致竟承认其帝国体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1764 年

第 19 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与当时的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鼎足而立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被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是朝鲜和日本。这两个世界在一个基本方面上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内向型的社会。它们的变化速度缓慢，且局限在从早期承袭下来的基本社会框架内。另一方面，儒家世界则因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相异。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派别斗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其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而是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久远有其地理方面的原因：它与人类其他文明世界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中国却不具备类似的地理条件。相反，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四面一直被山脉、沙漠以及辽阔的太平洋所隔断。这种隔绝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国的文明更具连续性，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庞大无比的人口也有助于其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数量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好。在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的降临使得农作物能够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都要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在汉朝时拥有人口5950万——比罗马帝国疆界拓展到顶峰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就已多达1亿,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的人口已经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能够延续自己的文明。他们曾先后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并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像欧洲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商朝时期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尽管各地区的中国人的方言差别很大,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之间的不同,但他们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原因在于,这种书面语是由表意的汉字组成的。这些汉字的发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其含义却是同样的。这也就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念数字8时发音各自不同,但8的含义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在整个东亚它都起了这种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经全部或部分地为周边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被推行了近2000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儒家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较之于西方特有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征召有才能之士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问题。这一制度在发展到其比较完备的时候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县试,然后是省城的乡试,最后是京城举行的会试。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这些考试渐渐地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并最终形成一种制度,从而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而稳定的行政管理典范。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人的创造力,滋养了一味顺从的社会风气。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于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其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碍中国人对这种制度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

应，直到 1905 年科举制度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及其在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教诲组成。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的英文名字 Confucius 是 K'ung-fu-tzu 即"孔夫子"的拉丁语化的词形，或称"孔圣人"。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现世建立一个组织良好、人人幸福的社会。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则应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才能做到，法律制度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中国文明在重视道德价值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而孔子则是这一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图 106　孔子施教图

孔子正教给弟子们建立一个幸福、有序的社会的学说。

对于解释约始于公元前 1500 年的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而言，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则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不例外：约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它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 1000 年后它又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颠覆性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两度为外来王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并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替，而并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生。

二、皇朝的更替

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其中反复出现的某些特点来解释。每个新皇朝统治之初，通常都能有效地治理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激发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兵征讨游牧民和扩展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

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争斗而逐渐衰弱。这种腐化堕落和倾轧争斗暗暗削弱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最终要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的农民的赋税负担更加繁重。此外,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对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赋税也就不断增加。随着政府越来越懈怠,发展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也被忽视掉了。

这样一来,日益贫困的农民就不得不承受越来越重的税收负担。当遇到农作物歉收和饥荒时,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也就爆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局部的起义逐步扩大为大规模的暴动。大规模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此时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忧外患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中国第一个皇朝为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的商朝(公元前1523—前1028年)。其时中国人已经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并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越性明确区分"中国人"和"野蛮人"。

继商朝之后是周朝(公元前1028—前221年)。它虽绵延数百年,但却始终未能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政府。周朝的政治结构与中世纪的欧洲有些相似。周朝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最高领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对这种动乱的政治局面的担忧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构成了中国文明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朝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是十分突出的。

周朝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短暂,却以一个组织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朝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一直持续到1911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它由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一个官僚机构、军用驿路和北方的长城组成;所有这些使中国得以维持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东北(或"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而著名。汉帝国在幅员、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崛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改变和进步,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延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国人的皇朝。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经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这些蒙古统治者在人数上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中国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因此,一旦其军事力

量衰落,其政权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推翻。

中国在驱逐了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皇朝即中国人的明朝(1368—1644年)和满族人的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都是外族人,但却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行政控制时给了中国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在普通的时代里这种秩序和持久或许可被看作幸事。但是现在却是在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噩梦,而非幸事。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相对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当时在西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与中国人的观念却仍是背道而驰的。明朝时中国人停止了其壮观的海外远征(见第21章第五节),就充分说明了中国与欧洲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

三、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中国与西方才开始了持续的交往。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5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才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则向中国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这里面没有一样是欧洲货,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17世纪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进行挑战。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此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商船,并进行非法贸易。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不过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和工业优势日渐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在印度设有其他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展开同中国的贸易。中国人以同样方式做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管制贸易。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边界的三个地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立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必须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双方进行了少量的易货贸易——俄国用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交换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



图107 俄罗斯远东扩张图

俄罗斯人横穿西伯利亚地区，沿黑龙江设置堡垒，企图打开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基督教传教士充当翻译和顾问，中俄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早期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这几个世纪传教活动的最终结果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比起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中国人依然极度自信和自给。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点；处理国际事务时，基本上仅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学说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面临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四、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在16世纪欧洲人首次出现在东亚时，日本与中国相比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经发展起了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随后，他们就同中国人一样开始反抗这些"无礼的蛮人"，并在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从而迅速地超过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良师益友的中国人。

就日本历史而言，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在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类似。不过，前者比后者更加孤悬海外：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宽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仅宽21英里。所以日本人到近代败于美

国之前，仅在13世纪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近到日本人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他们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民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成分中也包含原先居住在日本岛北部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种的虾夷人，可能也包含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太阳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公元6世纪中国文明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起到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同样的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带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它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造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日本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

筹划这些改革是为了强化天皇的权威，而且是在与前部族结构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人改变和调整了他们从中国借来的一切东西。他们通过允许贵族保有大地产限制了天皇的权力，他们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了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原则，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他们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

五、德川幕府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不过，到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原因之一是，国司们过于喜爱京都的优美，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豪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这使得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从而也就意味着自耕农的税负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虾夷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可以免除赋税，得到保护，但付出的代价则是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10%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必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士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也不予减免。到739年时这一规定已经难以实行，于是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虚职。结果，对虾夷人的战争完全

靠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至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就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面含义是“服务的人”）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必须绝对服从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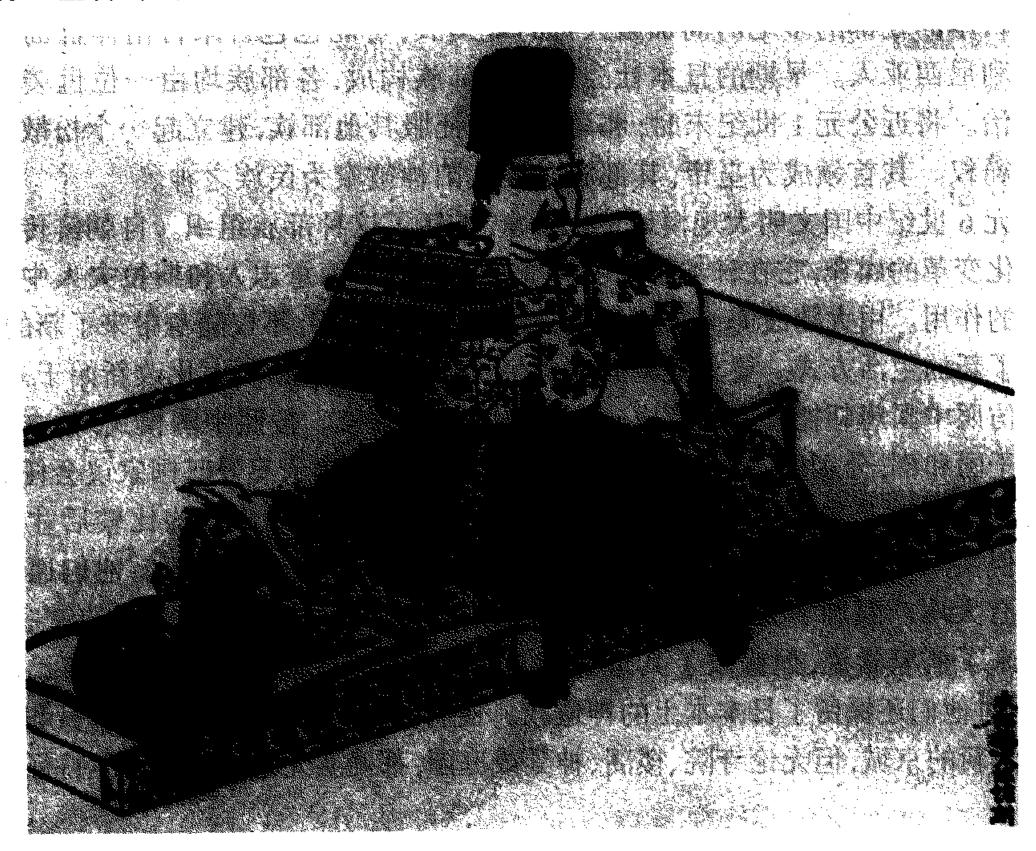


图 108 镰仓将军像

赖朝（1147—1198年）是镰仓幕府的创立者。此后，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就是幕府将军，而赖朝是他们的领头人。

到了12世纪，日本已经被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最后一个封建领主脱颖而出，从天皇那里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后日本就处于幕府将军统治之下，而天皇则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式的生活。这些家族中最重要的是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其对全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人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续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国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各战略要地的大庄园组成；这些大庄园构成了防范有异心的大名（即地方地主家族）的控制点。幕府高级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既不履行政治职能也没有政治权力。

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努力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居于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

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从一又四分之一至 85 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贵族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得城市居民的人口和财富大大增加。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来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在任何社会组织里都应遵守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置疑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都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合法性的伦理基础和一切保守的品德。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融为一体。在日本，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和谐远远超出中国，从而为其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民众基础，进而又为其 19 世纪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便利。

六、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16 世纪中期葡萄牙商人最早来到日本，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往来。于是葡萄牙人便迅速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生意大为兴隆。葡萄牙商人还将贸易活动与传教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 1549 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非比寻常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会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时惨遭蹂躏的农民的情感需要。

到 1603 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与少数英国商人已经和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已经能对传教士采取行动而无须担心贸易损失。而且他们也的确想限制传教士，因为他们恐惧传教士的成功会破坏日本的传统社会。于是 1614 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 30 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一命令被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由于很难区分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日本人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 年下令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起来最富有侵略性。1637 年又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因为荷兰人从未对传布天主教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成为得到通商许可的唯一的欧洲人，而且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 1636 年还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这样，日本就开始了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成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也是富有成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像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焕发生机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也没有海外扩张。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为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付出了沉重代价: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快地感受到了这种明显。

推荐读物

全美历史教师协会服务中心提供了相关的书目:J.W. Hall 所著的 *Japanese History* (1961年版)、C.O. Hucker 所著的 *Some Approaches to China's Past* (1973年版)、以及 J.K. Fairbank 著的 *New Views of China's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1968年版)。有关东亚文化的材料有:W.T. de Bary 等著的 *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 1960年版)和 R. Tsunoda 等所著的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8年版)。

对整个东亚进行研究的一本权威性著作是 E.O. Reischauer 和 J.K. Fairbank 合著的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 (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 1978年版)。标准的中国通史是 W. Rodzinski 所著的 *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Free 出版社, 1984年版)和 C.O. Hucker 所著的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d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5年版)。另外,值得一看的是 M. Elvin 所著的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d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73年版),该书分析了为何中世纪中国人的科技本领没有促成一场工业革命。有关日本历史的著作有 E.O. Reischauer 所著的 *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 (Knopf 出版社, 1970年版),以及 G.B. Sansom 所著的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Prentice Hall 出版社, 1644年版)和他著的另一权威性著作,三卷本的 *A History of Japan* (Stand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58—1964年版)。

最后,有关东亚与西方的最初接触的历史,可参见 D.F. Lach 的多卷本著作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出版社, 1965年版)、W. Franke 所著的 *China and the West* (Blachwell 出版社, 1967年版),G.F. Hudson 所著的 *Europe and China: A Stud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800 (Beacon 出版社, 1961年版)、C.R. Boxer 所著的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Martinus Nijhoff 出版社, 1948年版)、C.R. Boxer 另著的一本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 1951年版),以及 J.D. Spence 所著的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Viking 出版社, 1984年版)。最后这本书通过 Ricci 的经历,绝妙地对比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

只要人们愿意，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利昂·巴蒂斯塔·艾伯蒂

人们只有通过信仰，而不是其他任何手段，才能回报上帝。

——马丁·路德

通过永恒和不可变的意志，上帝始终决定着他愿意拯救的和他所诅咒的人的一切。

——约翰·加尔文

第20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中世纪的欧亚地区发生了一些神奇而又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方面，伊斯兰教和儒教帝国日益僵化衰退；另一方面，欧亚地区的西端则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变革。西欧地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与欧亚乃至全球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别的一种新的充满活力、扩张性的文明——现代文明，从而开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的速度日益加快，它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决定了当代世界的发展。

一、现代化

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人类逐步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唤醒和激发大众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兴趣，认为人类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制于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直至目前才树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信赖。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无情地使欧洲成为了世界的主宰。因为现代化不但为欧洲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促进了欧洲社会

和政治的融合，为之增添了活力。比如，英国商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和统治印度次大陆，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脆弱，而不是因为英国人的军事技术高超。相反，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些印度军人和商人会为了开展贸易和获得战利品而在英国登陆。而这则曾经激励过那些在印度发了财的英国人。认为印度人在英国也会像罗伯特·克莱夫和沃伦·黑斯廷斯在印度时所做的那样的想法看起来是如此荒谬，以至于没有人会去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在英国和印度这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后者是一盘散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要比前者大得多。尽管克莱夫和黑斯廷斯在印度能够挑起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王公之间、地方势力和封建官僚之间的相互争斗，同时村庄里的广大农民对此却无动于衷，但是来到英国进行统治的印度人总督则将毫无疑问地面临着由清教徒、天主教徒、政府、公民(包括特权阶层、城镇居民和农民)组成的联合抵抗。

这是一场决定世界命运、将传统社会与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分离开来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不是短暂的——它一直持续至今并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就如我们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将要提到的，中世纪后期和现代历史前期的现代化内容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济扩张、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建设和海外企业的兴起。这些发展引发了科学、工业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详见第26章和27章)，而这些变革则塑造了人类从17世纪到现在的历史。

二、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是有争议的，其含义是新生或再生。它是由15世纪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时代是在他们所称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之后、代表了古典文化再生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解释为19世纪的人们所接受，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已不再认同这是中世纪的漆黑一团和文艺复兴的炫目阳光相对立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中世纪人们对古典的兴趣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其中某些特征还在文艺复兴时代有所体现。因此现代历史学家虽然没有丢弃“文艺复兴”这个熟悉的名词，但更多的是把它定为从中世纪转向现代文明的一个过渡时期，大概从1350年到1600年，而不是一个明显的断代时期或转折点。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因此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情况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喧闹的城市社会，它建立在繁荣的工业和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廷及伊斯兰帝国的利润丰厚的贸易基础上。意大利人是这一贸易的中间人，并由此致富。到140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的船队已由300条大船、3000条小于100吨级的船和45条总计由28 000人操作的大帆船组成。威尼斯码头还雇佣了6000名木匠和其他工人。意大利其他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和罗马的情形也差不多。这些城市由商人家族控制，他们掌握了政治、商业和手工业，同时他们也是文艺复兴艺术家和作家的赞

助人。在这些人中包括公爵贵族,如米兰的史佛拉、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教皇庇护二世、教皇朱利斯二世和教皇利奥十世,他们的需要、兴趣和口味点缀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同时并存的部分原因。文艺复兴关心的是人活着时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人死后的世界;它主要关注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

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他或她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再需要关注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本身的潜能。阿尔贝提(1404—1472)写道,"只要人们愿意,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他本人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达到这种极限的可能性。这个佛罗伦萨的贵族集建筑家、数学家、考古学家、作家、文艺批评家、风琴演奏家、歌唱家于一身,而且年轻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跑步、摔跤和登山运动员。

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反映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中。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得拉克(1304—1374)强调古典艺术在提高自身素质和指导社会行为方面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新建的学校培养的也不是牧师,而是商人的儿子。课程强调学习古典艺术和体育锻炼,目的是教育学生健康、快乐地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市民。

文艺复兴精神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当教会不再是艺术家惟一的资助人后,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圣经体裁以外的事物。乔托(1276—1337)的作品标志着绘画向自然主义的过渡。这种趋势进一步体现在具有独特创造性视角的马萨奇奥(1401—1428)身上。与中世纪的绘画作品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强调光和阴影的效果,表现人物和景物的景深。

到 15 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达到成熟阶段。在佛罗伦萨,马萨奇奥后又出现了波提切利和全才的达·芬奇,达·芬奇既是雕刻家、音乐家、建筑师和工程师,同样也是一位画家。因此,达·芬奇被视作是"新文艺复兴人"的代表。1994 年 11 月 15 日他的著名的 72 页笔记——在伦敦以 3080 万美元的价格被人买走。他在这本手稿中分析了天为什么是蓝的和为什么在山顶上发现了化石,并预测了潜水艇和蒸汽机的发明。

大约到 1550 年,经历了两个世纪活跃的发明创造活动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衰落。原因之一是 1494 年法国的入侵引发了其后几十年欧洲国家对意大利的战争,使意大利半岛遭受了严重破坏。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航海家达·伽马 1498 年 5 月 22 日在印度加尔各答港的登陆给意大利经济以沉重打击,它结束了意大利在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使印度人成为西欧和东方贸易的中间人。在 1502 年至 1505 年的 4 年中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每年平均只进口 100 万英镑价值的香料,而在 15 世纪的最后几年,他们进口的香料价值达到 350 万英镑。相反,葡萄牙所进口的香料价值则从 1501 年的 22.4 万镑上升到 1503 年至 1506 年 4 年中的平均每年 230 万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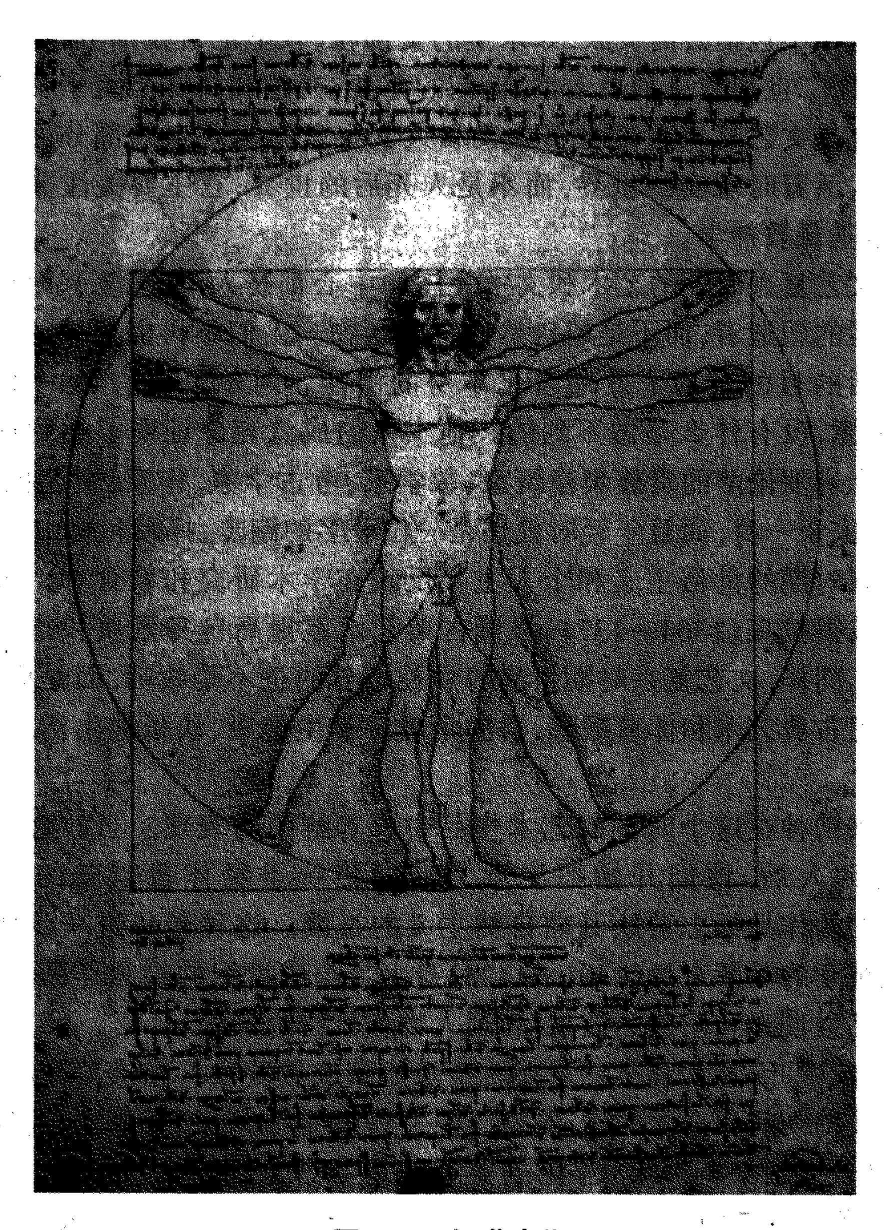


图 109 达·芬奇像

真正的"文艺复兴人"——列奥纳多·达·芬奇(画家、雕刻家和发明家)。达·芬奇的著作《人体研究》(1492 年)展现了他在多大程度上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

工业的衰退比起商业来更为严重。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向北欧和近东出口工业产品,并从其银行服务业和海洋运输业中赚取了大量利润。但是到 16 世纪末,英国、法国和荷兰已经超越了意大利。意大利在这方面的发展受到了规定僵化、税收和工资成本高昂的阻碍,并未能生产出适合人们口味的产品。1560 至 1580 年佛罗伦萨的毛织品产量是 30 000 匹,但在 1590 至 1600 年间却下降到 20 000 至 30 000 万匹,到 1650 年则只有 6000 匹。同样,威尼斯的毛织品产量在 1600 年是 20 000—30 000 万匹,但到 1700 年却下降到 2000 匹。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因为殖民地贸易的日益兴盛而逐步扩大,意大利城市由于没有海外殖民地而被排除在

殖民地贸易之外。

按照现在的说法,曾经是中世纪欧洲发达地区的意大利此时变成了“欠发达地区”。因此意大利只能以向北欧国家出口原料(石油、酒、小麦、羊毛和原丝)来换取工业产品。这就意味着城市和贵族在意大利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重要性已被具有封建特征的土地拥有者所替代。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文艺复兴的遗产

文艺复兴并不是仅发生在意大利的个别现象,它的发明成果通过意大利外交官、受北欧国家君主雇佣的意籍将军和印刷制品在 16 世纪被传播到北欧国家。印刷制品加快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在北向传播的过程中,文艺复兴的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而在北欧则更多地反映在宗教和道德领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德国画家丢勒(1471—1528)和小霍尔贝因(1497—1543)的作品、芬兰画家凡·艾克和皮特·布鲁亨尔的作品。布鲁亨尔是北欧最反正统和贴近社会的艺术家。他从前人的传统主题——宗教事务和对富裕的商人家庭的描绘——中脱离出来,主要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他同时用艺术手段来反抗西班牙人在荷兰的统治,他的绘画作品《无辜平民大屠杀》描绘了西班牙士兵杀戮妇女和儿童的场景。

由于北欧人的文化水平要比东南欧洲高,因此印刷品在该地区也就更有影响力。大量的书面材料激起了大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关注,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宗教改革和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的爆发。印刷制品同样也刺激了早期现代历史上全国性文学流派的发展。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奠定了德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同样詹姆斯国王版《圣经》和莎士比亚(1564—1616)的戏剧则奠定了现代英国文学的基础。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以其小说《堂·吉诃德》也为民族语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法国,拉贝莱斯(1490—1553)和蒙田(1533—1592)担当了同样的角色。这些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 1653 年法兰西学院建立时得到了承认,建立这个学院的目的是对国家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作官方规定。

那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显然,对人本身和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视比中世纪的世界观更能推动海外扩张。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夸大,因此需要对其做进一步调整。实际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以科学为导向的,其代表人物对美学和哲学精神的重视更甚于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继续崇尚和相信不可知和幻想的事物。他们仍然试图找到哲学家们所说的能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的石头。他们继续相信占星术,并把它与天文学相混淆。

伊比利亚半岛的海外探险家绝不是“文艺复兴人”,比如说航海家亨利王子,他

被他的同代人认为是固执、虔诚的,又具有侠义和苦行者风格,但他却并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虽然亨利是水手和地图绘制者的慷慨的资助者,但他对学术和艺术并没有兴趣。有关他资助一个在萨格雷斯的天文和数学学校的故事仅是传说而已。新知识分子阶层的迅速扩大是1600年以后知识爆炸的推动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并不是1500年以前欧洲人向外扩张的根源。欧洲的对外扩张的确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极其活跃,而在欧亚地区的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比如说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比较看重神学、法学、修辞学,为此而放弃了天文学、数学、医学。从这些学院出来的学生对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了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穆斯林土耳其人不相信那些基督教异教徒能教出哪怕一丁点有价值的东西。不过,时不时也会冒出一位稀有的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留意这张正在将奥斯曼帝国与其周边基督教徒分离开来的知识铁幕的危险性。生活于17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土耳其书志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历史学家卡提比·舍勒比,就是这些大声疾呼的人中的一员。由于家境贫寒,舍勒比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学校教育,但就像古话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也因之而得以免受当时那种典型的奥斯曼教育,即潜心进行肤浅而教条的穆斯林神学研究。舍勒比的自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他能对西方知识保有思想上的开放性。

在舍勒比众多的著述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这本手册是他在1656年土耳其舰队在海上遭遇一次惨败经历后有感而发而编写的。他在书中前言里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

>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是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与其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率军征战时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了解敌国的情况,同时使得边防前线的保卫变得容易。征求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的意见是得不到满意的效果的,即使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不能完整地绘制出本地区的草图。
>
> 能充分并有力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必要性的证据是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他们学习并应用这些知识发现了新大陆并占据了整个印度市场。[1]

舍勒比发现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在他1657年临死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舍勒比警告他的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在他身后土耳其人仍然像其他非西方人一样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基督教的异教徒通过运用他们的知识不仅最终成为新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

古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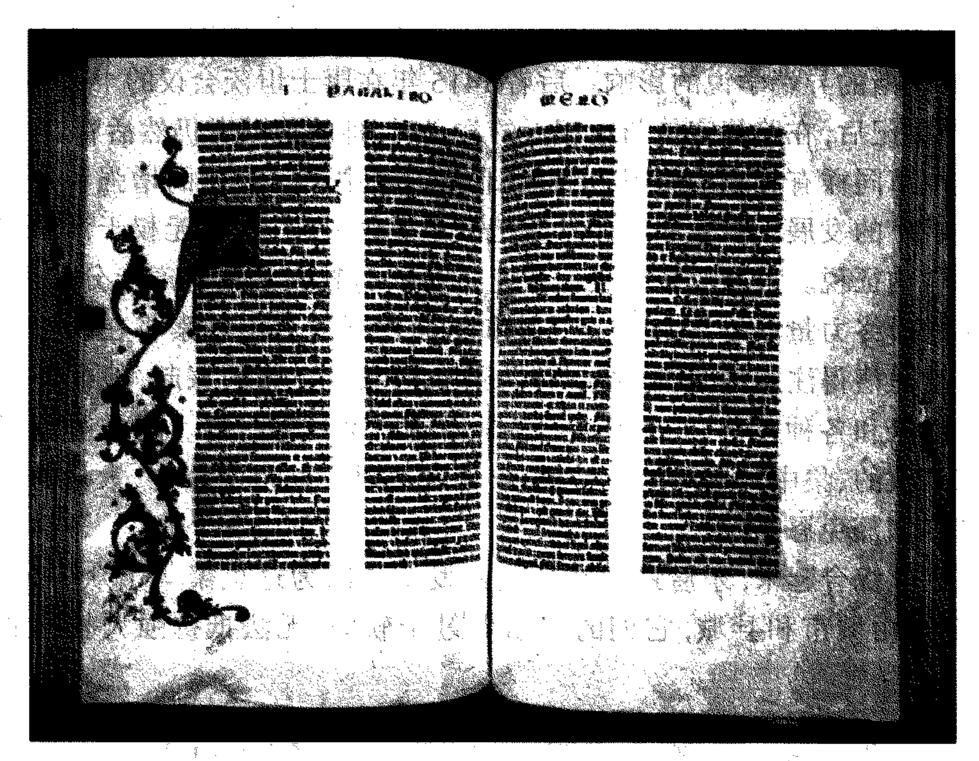


图 110　印刷品图

印刷制品使得文艺复兴时代知识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当时没有别的书比《圣经》更能激发人们的思想。随着 1454 年古登堡版《圣经》的发行,广大学者获得了可靠和标准的《圣经》,能够对《圣经》进行讨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四、德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这个词一样有误导作用。路德一开始是一个改革家,但最终却成为了一个革命者,这是他与罗马教会坚定抗争导致的结果。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释为对教会某些腐败落后现象作出的反应,其中包括:在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文盲现象、部分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出售宗教场所、不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权和豁免。尽管这些很能激起人们的抗议,但它们仅是清教徒进行宗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实际上,当宗教改革开始时,教会内部虔诚的天主教徒已经试图在改变这些情况。为了解释这场打破了西方基督教统一世界的重要运动,有必要透过这些教会的腐败落后现象去考察已经积累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原因。

其中一个因素是,14 世纪的"巴比伦俘虏"事件削弱了教皇的权威,当时法国国王菲利浦四世的士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此后,教皇的首都迁至阿维尼翁,在那里教皇被迫受制于法国。对教皇名誉损害更大的是 14 世纪末的"大分裂"事件,

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各自宣布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对方逐出教会。引发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先前例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波希尼亚的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的影响。后者1415年在康士坦茨会议的十字架上被烧死了，但一个世纪后，在路德宣传与他相近的教义时，他的追随者仍然活着。

宗教改革同样有其政治原因，比如说北欧国家中国家观念的增强和许多国家内部"新君主制"的发展。君主和平民日益把教皇看做外国人，他无权干涉国家事务和在本国疆域内征税。大众对教会收税和遍布西欧的教会土地财产十分憎恶，这成为宗教改革的最终力量。经济利益的分歧和不断发展的政治因素将在以下章节作详细阐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产阶层和国家君主制的兴起，他们开始觊觎教会的土地财产和各种首饰、艺术作品、金银和高档家具等财富。同样被垂涎的是从各个国家征收的、集中到罗马的什一税、出售教会财产获得的资金、大量的诉讼费和教会的特权和豁免恩惠。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矛盾最初在德国爆发了。因为这里聚集了众多公国、教会城市国家、自由城市和县城，它们的统治者过于软弱，无法抵抗强大教会的过度勒



图111 胡斯被送上在康士坦茨的十字架

胡斯被送上康士坦茨的十字架时的画像。执行死刑后，他的骨灰被撒入了莱茵河以避免其追随者将其作为遗物收藏。这幅水墨画出自乌尔里希·李赫特尔的《康士坦茨会议纪事》(约1450年)。

索。其中一个例子是，1517 年教皇决定在整个欧洲兜售大量的赎罪券来获得维修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费用。在德国引发了宗教改革的这些赎罪券向民众许诺“不管你的罪恶、犯罪和放纵等错误有多少，你都将被豁免……；当你死的时候，接受惩罚的大门将被关闭，看到天堂阳光的大门将向你敞开……”在批判这些不受约束的赎罪券的过程中，当时还是维滕堡大学牧师的路德将其 95 篇论文张贴到了教堂门口。他的论文并不具有革命性，但他的确主张“上帝之语”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这就大大削弱了教会的权威。

教皇利奥十世把此事当作“修士们间的争吵”来处理，但他的话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流传开来。公众的激烈反应说明路德的论文是全国民众不满情绪的写照。随之而来的公开辩论为路德散布他的以信仰为核心的革命性思想提供了机会——其思想要点是教堂和祈祷场所并不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1520 年末路德和教会彻底决裂，并宣扬先前威克里夫和胡斯的异端学说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义。



图 112　马丁·路德和维腾堡改革派与依莱克特·弗雷德里克

马丁·路德和维腾堡改革派与萨克森的选帝侯弗雷德里克（1532—1547）在一起，此画约作于 1543 年。左边第一个为路德，前排右边第一个为菲利浦·梅隆森。（此油画作者小卢克斯·克瑞雷奇，1515—1586，德国人。规格为 27-5/8 × 15-5/8 英寸。）

1520年10月路德焚烧了教皇的驱逐令牌。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几次被叫到位于沃尔姆斯的皇家国会会议上接受控诉。路德拒绝改变其主张，他说："除非你们能用《圣经》或别的明确的理由说服我。"皇帝强行通过了谴责这个顽固修士为异教徒的法令。但富有同情心的依莱克特·弗雷德里克在他的庄园为路德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于遭受与胡斯一样的命运。

在被流放期间，路德继续从事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工作，并着手创建德国独立的教会组织。国王查尔斯五世由于卷入了与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无暇来彻底消灭影响日益扩大的路德的异端学说。1546年他刚得以从战争事务中脱身，即开始镇压路德派的骨干分子以恢复教会的统一。查尔斯五世获得了教皇的资金和军队支持。但是路德派教徒在施马尔卡尔迪克聚集起来，并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国王的支持，该国王更关心他的王朝而不是宗教。双方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签署才告结束，该协议赋予德国王公选择天主教派或路德教派信仰并强迫臣民接受的权力。德国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在这个国家形成了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几乎平分天下的局面。

五、德国以外的宗教改革

《奥格斯堡合约》为各种异端学说的涌入敞开了大门。它不但承认了路德教是天主教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且使清教主义也在整个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路德的个人解读《圣经》的思想引发了众多对《圣经》的不同解释，也产生了多种清教主义。如瑞士的加尔文在反对善于通过"工作"获得拯救的教义方面与路德是一致的，但他也反对路德通过"信仰"获得拯救的说法。加尔文宣扬宿命论——每个人的命运在其出生前就已由上帝决定了。"因此，根据《圣经》，我们断言，以永恒和不可变的意志，上帝始终决定着他愿意拯救和他所诅咒的人的一切。"加尔文与路德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主张教会应积极干预社会生活以保证消灭各种异端学说、亵渎上帝的行为和邪恶事务。在他在日内瓦的辉煌时期(1541—1564)，他的长老院将这座城市改造成了一个基督教社区，其简朴和神圣震惊了游客。而且加尔文利用印刷出版工具把日内瓦变成了宣传改变宗教信仰运动的总部，也极大地影响了波希尼亚、匈牙利、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和其13个美国殖民地。

清教主义中一支完全与众不同的派别是它的再洗礼教会，其宗教和社会激进主义使他们遭受了天主教、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迫害。依据路德每个人都应遵循他的意识的理论，再洗礼会教徒要求全部的宗教自由，包括教会与国家分离。同样激进的是他们的社会教化——反对个人积累物质财富、反对阶级和地位差别、反对参军和反对因发动战争而需交纳的税收。这些主张显然危害到了整个宗教和政治组织的权威，因此再洗礼教徒在欧洲受到迫害和屠杀也就不足为怪了。哈特派信徒

和门诺派教徒是他们中的幸存者,他们善于保护自己才得以留存到今天。

决定一个国家宗教状况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国王所做的决定。假如他支持与罗马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取得胜利;如果他反对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失败。有大量的现实利益促使国王们支持清教主义。如果他成为全国教会的首脑,其政治权力的增长要比他接受教皇的封赐多得多,其经济地位也将得到提高,因为他可以没收教会的土地、动产和控制流向罗马的财富。但是尽管反对教皇可以得到如此多的好处,许多国王仍保持忠诚而不与教皇决裂,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遭受由教皇支持的查尔斯五世帝国军队的攻击。很多国王也发现只要他们保持天主教身份,同样可以从教皇那里得到与成为清教主义国王差不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在路德死后,欧洲的宗教地图就呈现出一个各种教派混合的局面。

最终这张宗教地图中有一半的德语国家信仰路德教派,包括波罗的海的日耳曼语地区、丹麦—挪威和瑞典—芬兰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英国的亨利八世仍坚持天主教义,他和法国国王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所做的一样,控制着天主教的牧师。但是,亨利在1534年最终建立了独立的英国教会,因为他已决定与其来自阿拉贡的妻子凯瑟琳离婚。教皇也不愿迫使他改变决定,因为凯瑟琳是皇帝查尔斯五世的姨妈,而查尔斯的军队则在不久前洗劫了罗马。因此亨利成为了新英国国教的首脑,并得到了贵族的支持。他将没收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但是在他在位时期,新教会仍然公开维持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仅有的改革是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亨利的继任者则又根据他们个人的喜好进行了改革。爱德华六世(1547—1553)快速转向清教主义,玛丽(1553—1558)又转回到天主教,伊丽莎白(1558—1603)则主张温和的清教主义。

在当时的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宗教和政治相纠缠导致了长年的战争。荷兰北部省份的多数人都成为了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他们与虔诚的西班牙天主教统治者菲利浦二世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同样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荷兰人反对菲利浦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并憎恶他征收的重税和对商业的严格控制。1556年荷兰的抵抗演变成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为争取国家独立而发动的革命。当英国女王参与支持荷兰反叛者时,这场革命变成了国家间的战争。1558年菲利浦将其由132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向北派遣。但是机动性更强的英国战船迫使无敌舰队向北绕过苏格兰,又向南回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遭受了失败。血腥的战争直至1609年西班牙妥协,承认北部几省以荷兰共和国名义获得独立后才宣告结束,但是南部比利时几省仍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与此同时,加尔文主义则在法国得到了传播,它的拥护者被称为胡格诺派教徒。这里的国王不准备加入清教,因为弗朗西斯一世已经通过1516年的《波伦亚协定》基本上获得了在国内对教会组织和其收入的控制。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残酷地迫害胡格诺教派教徒——只要拥有一本《圣经》就会被指控为异教徒。亨利的在世为胡格诺教派教徒创造了机会,不管皇后凯瑟琳,还是她软弱的

儿子都没能像伊丽莎白在英国那样享有大众的支持。尽管凯瑟琳曾试图妥协,整个国家还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胡格诺派教徒和广大的天主教教徒之间形成了对立。随后的宗教战争在1572年8月24日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达到了顶峰,当时全国有成千的胡格诺教派教徒被杀害。即使是这样的杀戮也不能使新信仰屈服,斗争仍在继续进行。胡格诺教派教徒获得了英国、荷兰和德国清教团体的支持,天主教派则得到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的人力和资金援助。直至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保障胡格诺教派教徒心灵自由的南特法令,和平才得以恢复。在一个国家内给予两种宗教以法律承认和合法地位,这种解决方法是欧洲宗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与同意一国国王在两种宗教之间作出选择的《奥格斯堡和约》有共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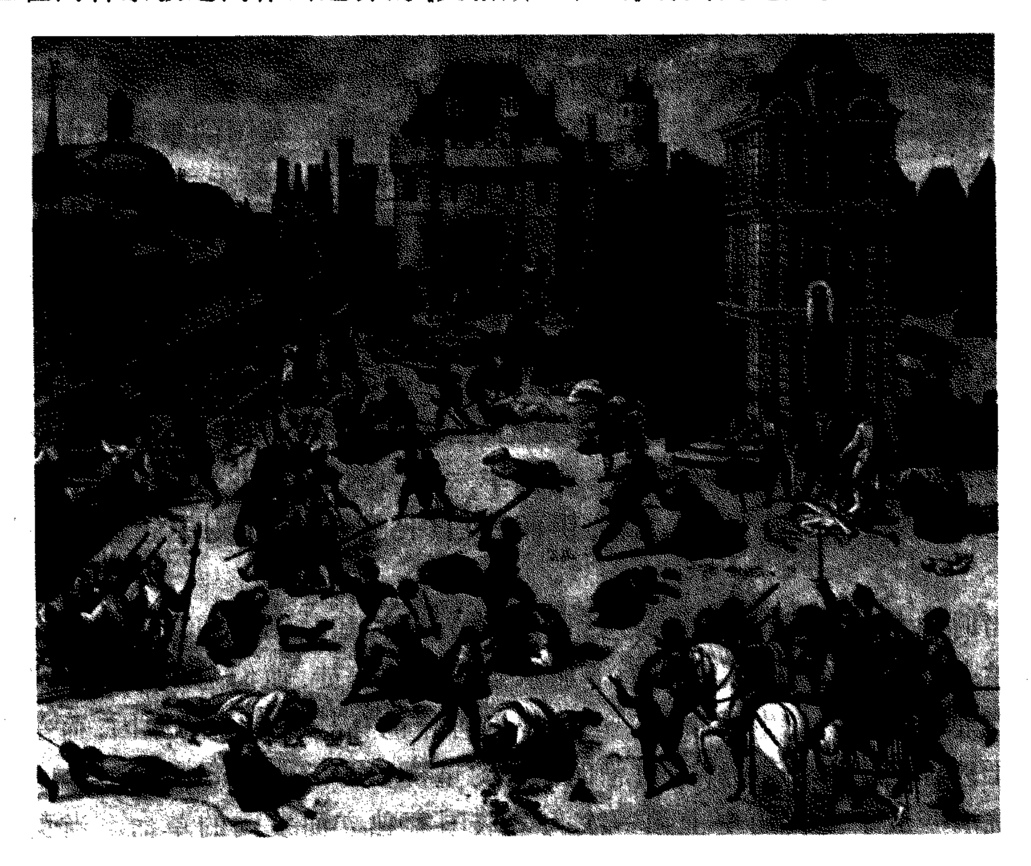


图113 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

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由当时的清教徒画家弗朗西斯·杜拜斯所作。在这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中,3000名清教徒被杀害,整个法国有20 000人死亡。这场大屠杀使法国的宗教斗争由政治权力斗争变成了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生死决斗。

六、天主教改革

以前天主教改革被认为是“反‘宗教改革’”,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承认它并

不仅仅是一场反清教运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前路德时代，因此天主教改革是与清教宗教改革相似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 15 世纪后期和 16 世纪初期，各国的天主教领袖开始整治教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并重新提出一些精神价值观。他们重建宗教秩序，如设立方济各会的托钵僧，来恢复对天主教的虔诚和改善社会服务。但是这些改革家力图保持他们沉默和高雅的风格，未能发动大众和赢得罗马教会上层的支持。直到在德国面对路德日益严峻的挑战，天主教改革运动才呈现出一点活力和效力。教会中的改革者对发动一场针对清教徒的反抗运动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西方基督教世界会因此造成不可挽回的分裂。教皇长期无视路德，认为他仅是过去众多批判家和异教徒之中的一个，也会像他们一样被镇压或转化过来。直到 16 世纪末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 年在位)和他的 3 个继任者主持罗马教会时，天主教教皇才意识到清教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保罗三世采取了两项最重要的措施，它们决定了天主教改革的进程和特点。一是他召集了“宗教裁判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在 1545—1563 年间不定期地举行会议；二是 1540 年批准建立耶稣协会的耶稣会士准则。宗教裁判委员会的主要成就是以坚定反对清教主义的措辞强调了传统天主教教义，并采取实际措施消除教会中的腐败现象和恢复教会纪律。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出售赎罪券，禁止任何主教占有一份以上的俸禄，规定每个主教辖区必须修建一个神学院以培训牧师和出版天主教教徒必须阅读的书籍目录。

耶稣会士准则是由西班牙巴斯克贵族伊格内修斯·罗耀拉(1491—1556)创建的。罗耀拉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负伤，在恢复过程中他读了大量的宗教小册子，引发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决心改变过去玩弄女性和惹是生非的生活，要全身心地为上帝服务。他与军队中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了耶稣协会。它的成员不像以前的天主教改革者那样过着冥思苦想的生活。相反，他们把自己看做耶稣的战士，严格遵守罗耀拉的要求，无条件地忠于各级教会的准则。

这些耶稣会成员的纪律性和军人风格保障了宗教裁判委员会改革的进行。许多成员担当了审讯工作，这项工作自 1542 年开始，目的是铲除任何地方出现的异端学说。其他成员创建学校，培养新一代牧师和世俗民众，向他们灌输坚定的神学信仰并使他们树立让清教教徒畏惧的信心。这些经过培训的学员和耶稣会的公关人员成为对付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波兰清教主义的主要力量，他们转化了许多异教徒。除了与欧洲基督教的异教徒进行斗争之外，这个组织的成员还将他们的工作推广到全世界——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异教徒中传播上帝的福音。像在日本的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在中国的利玛窦、在印度的罗伯特·洛比利和在美国的教父雅克·马凯特的职业生涯中都体现着耶稣会成员活动的性质和内容。

七、宗教改革的遗产

宗教改革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它引发了不同教义间的冲突和互不相容,并导致了一系列血腥的宗教战争。由此造成西欧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迫使各宗教派别认识到任何一种教派想要获得垄断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各教派也都逐步学会了宽容——当然这一过程进展得很慢也很艰难,以至于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宗教改革在涉及个人地位的问题上也是模棱两可的。路德支持以个人的方式来解读《圣经》,但这导致了再洗礼会教徒的激进主义和农民暴乱,他号召当权者镇压从事烧杀掠夺的群众。但提倡阅读《圣经》的确提高了大众的识字率,为书籍和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宗教改革意义的不明之处还在于它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宗教改革促进了妇女的进步。清教领袖抛弃了中世纪认为禁欲主义是高尚的道德观念的认识,认为婚姻生活至少有三个好处:生养孩子、满足性欲和伴侣之间相互照顾。这种观点鼓励了一个新的、对男性和女性不再区别对待的道德标准,并产生了一个新颖的权力观念,即将要结婚的新郎或新娘有权拒绝他们不想要的婚姻。当然这种新旧转变是缓慢和不稳定的。清教的神学家极力反对男女偷情行为,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远远落后于这些规定。如果一个小伙子没能选择一个相配并且合适的妻子,那他将被认为是愚蠢和可怜的,这种当时盛行的观念往往为父母们所强调。

主要的清教领袖从来不考虑也未对妇女地位进行过系统的评价。他们强调夫妻之间应相敬相爱,但又想当然地接受丈夫在家庭中的首要地位。路德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确,"男人有宽广的胸脯和瘦小的臀部,但女人有狭小的胸膛和肥大的臀部,因此女人理所当然地应呆在家里操持家务和生养孩子。"[2]

与主流清教主义有很大不同的是一些激进的分支派别,如罗拉德教派、再洗礼派和平均派。他们主张离婚自由,允许女人管理教会事务和做祷告,甚至有点支持男女之间的性自由。这些派别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不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且还有技术上的因素。平均主义者派的领袖格拉德·温斯坦雷承认家庭之外的性生活使母亲和孩子变得脆弱,"因为男人会离开他们,认为她们不如别的女人……当他经历了这种快乐之后,女人们就得小心……为了追求他们的自由,他们会寻找别的女人。"[3]温斯坦雷承认在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之前,只有男人才有性自由的权力。

就宗教改革产生的间接历史影响而言,它将中世纪统一的教会组织拆分为大量的地方教会,有些是省一级的,有些则仅局限在一个城市。这些地方教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由世俗统治者控制。不管是否仍然坚持天主教教义或是拥护清教信仰的一个派别,都由世俗权力机构控制教会神职人员的任命和教会的财务。宗教改革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是权力由教会向政府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代

表了现代民族国家演进史中的一个时代。这也是下一章的主题。

推荐读物

这段时期的标准通史有 W.K. Ferguson 所著的 *Europe in Transition*：1300—1500（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62 年出版）；E. Breisach 所著的 *Renaissance Eruope*：1300—1517（Macmillan 出版社，1973 年出版）；J.L. Abu-Lughod 所著的 *Before Europe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由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具有全球性的视角。此外还有 E. Troeltsch 所著的 *Protestantism and Progress*：*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ism to the Modern World*（Beacon 出版社，1966 年出版）和 E.I. Eisetein 所著的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2 vols（Columbia University 出版社，1979 年出版）。

关于这几个世纪欧洲妇女的地位问题，S.M. Wyntjes 所著的 Women in the Reformation Era 一文（见 R. Bridenthal 和 C. Koonz 编辑的 *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一书，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 1977 年出版，第 165—191 页）作了很好的总结。R. Bainton 在其所著的 *Women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and Italy* 和 *Women of the Reformation in France and England*（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出版社，1971 年和 1973 年出版）中有对这一问题的详尽阐述。

注释

1. Cited in manuscript by L.V. Thomas, "Ottoman Awareness of Europe, 1650—1800."
2. Cited by S.M. Wyntjes, "Women in the Reformation Era," in R. Bridenthal and C. Koonz, 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1977), p.174.
3. Cited by C.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Viking, 1972), p.257.

"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当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

——小林恩·怀特

因此，对一个想维持生存的君主来说，他必须学会如何做非正义的事，并视情况的紧急程度决定是否运用他的所学。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第21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西欧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当时识字率提高，思想十分活跃，大众的觉醒和参与程度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都无法匹敌的。然而，对西欧现代化进程更直接的贡献还是来自于同时发生的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它们为欧洲扩张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动力。塑造了世界历史的欧洲扩张并不仅仅是因为哥伦布向西航行在美洲大陆登陆。11世纪时维京人也曾在美洲登陆过，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维持他们在当地的定居点，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相比之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欧洲各国的人们就开始潮水一般地涌向北美和南美。11世纪和14世纪这种不同的反应表明，在这之间的500年中欧洲取得了某种使它能够并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某些进展。这些进展就包括了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一、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公元900年至1300年欧洲经济

稳步增长,但在14世纪时它却开始出现衰退。这是由下列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它夺去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的生命,此后它又周期性地发作,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等国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欧洲经济开始复苏,此后其发展趋势通常是向上的。

因而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过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增长的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札尔人和维京人停止进攻而告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袭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袭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战败时为止。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10至14世纪中欧和西欧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的人口大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相当的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农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产量的增加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同时,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当时的轭在马用力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坏。此外,由于没有马掌,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掌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被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同拉一车货物。此后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也就成为农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荒地。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其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乍看起来令人吃惊,然而却是千真万确。当时,余下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耕种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地广人稀的东欧和南欧。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见地图18)。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也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余粮用船从新垦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拓殖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一发展极其重要,它表明西北欧开始崛起。后来这一趋势则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变得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的内部贸易在发展,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增长。此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京人劫掠活动的停止而开始;维京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气氛曾在9和10世纪笼罩在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征。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立使得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的环境和服务周到的线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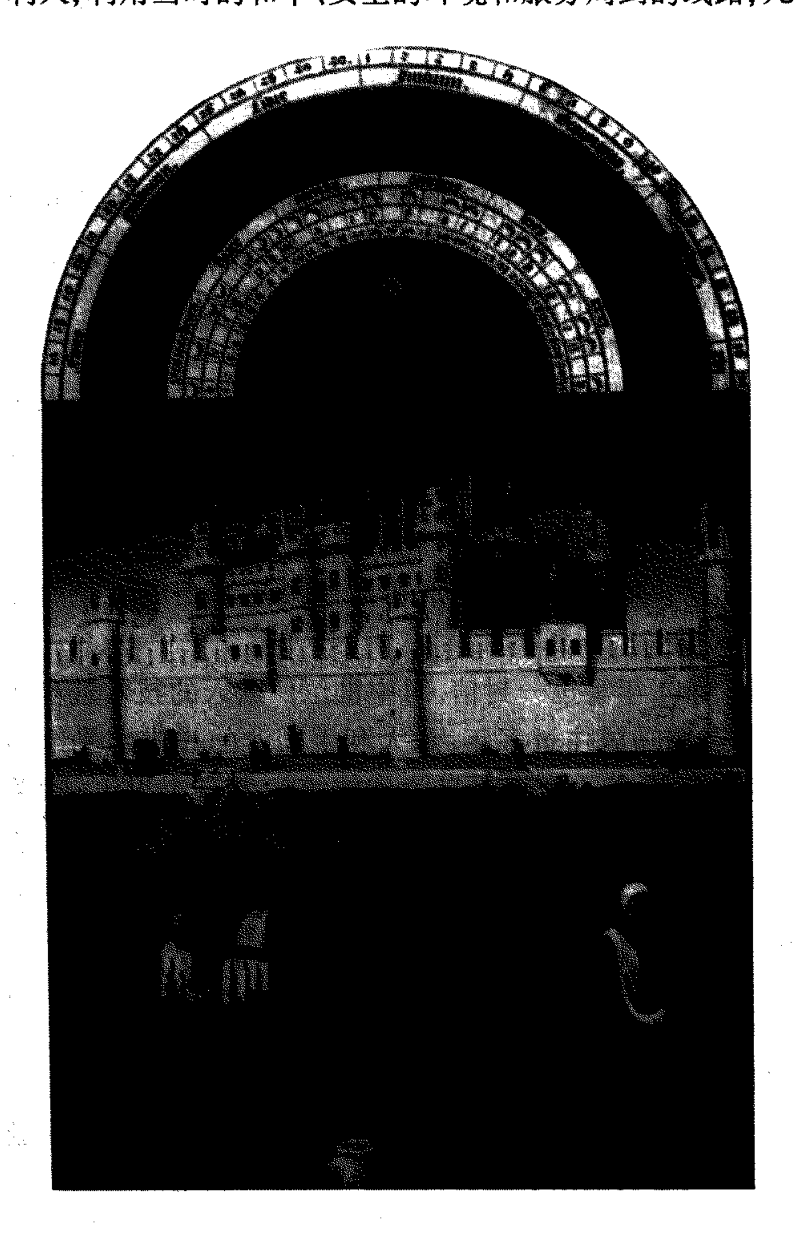


图114　农夫耕作图

自8世纪以来,三次间作的农业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产量。

贸易的扩大和强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对国际贸易的适应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较为自给自足的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变得习惯于

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人口压力加上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驱动着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路线和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截然不同;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英里,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5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长颈鹿之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显然,由于地理上的原因,欧洲远远达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二、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扩展密切相关的是技术的发展,它为欧洲扩张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和技术,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之所以能在这方面取得技术上的成功,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不惊人但却极其重要的进步。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所说,"中世纪后期最主要的进步"是"非人力动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用于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的水车和风车是非人力动力的典型。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刨子、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的确,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他们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的所为。

希腊学者贝萨里翁主教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西欧人的技术进步作了一个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曾在罗马居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致函当时拜占廷摩里亚自治省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理解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淘汰了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自动锯机切割木头,和水车运转得极快、极整齐"。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收缩,将金属从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的技术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1]

就欧洲扩张而言,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与造船方面的进步并驾齐驱的是航海术的发展。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当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罗盘,但至今仍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

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磁罗盘。虽然罗盘在任何时候对航海者来说都是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必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公元 800 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 1485 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就被结构较简单且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测量经度方面的问题也很多。虽然用沙漏可以大致进行估算，但直到 17 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才能精确地计算。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航海图是最早的精确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高度发达的军事强国时，他们具有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在 16 世纪的前 20 年中，佛兰德、德国和英国（稍后）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很轻，容易安装在船上，但具有强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 5 至 12 英尺，能发射重达 5 至 60 磅的巨石，后来还足以击毁 300 码射程内的船体，能发射沉重的铁丸。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就达到每艘军舰平均能装备 40 门炮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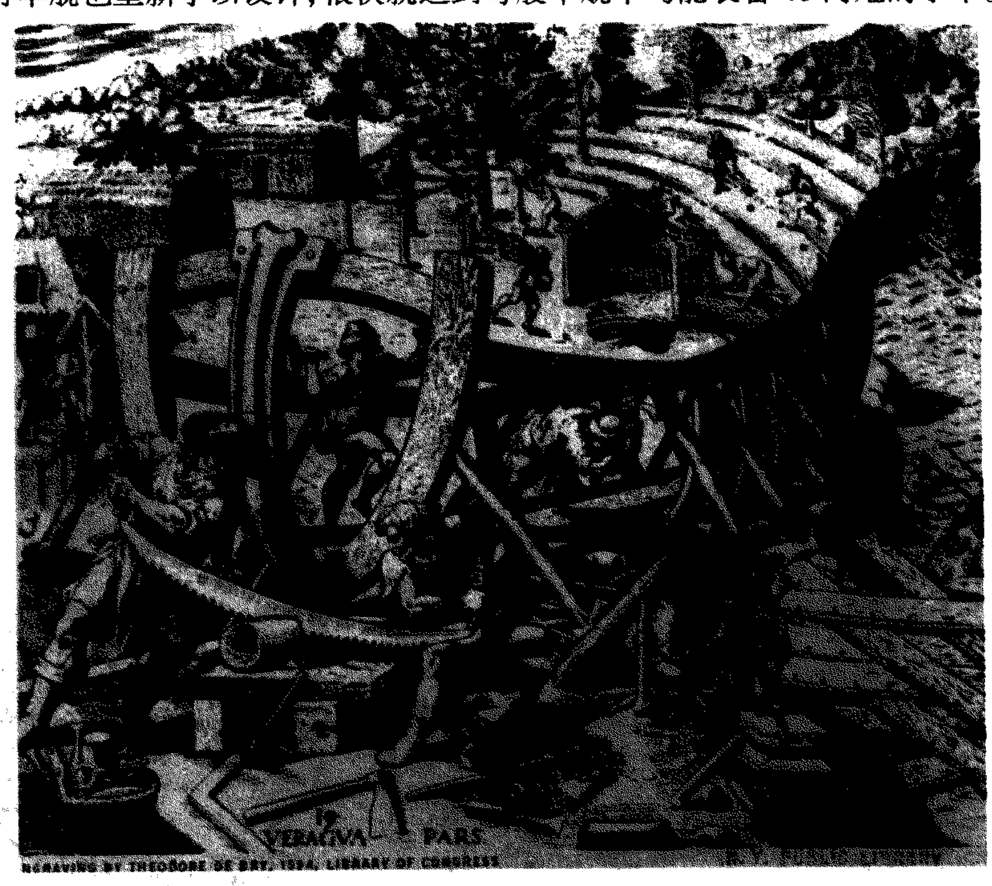


图 115　造船图

1500 年的造船术——一个技术进步助长了欧洲扩张的实例。

欧洲人在这方面的决定性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夺取并控制浩瀚的大洋。东方的

统治者也赶忙武装自己的船只，但这些船的设计不适宜安装火炮。在他们能够重新设计自己的舰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以致两者间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不断扩大。因此，在日本人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的胜利之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无可匹敌的主人。

与机器技术方面的进展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大气环流系统。哥伦布从葡萄牙航海者那里得知，他可以随着信风向西航行，而且他确信再向北可以找到西风带他回家。同样，达·迦马也从当地航海者那里学到了印度洋上季风的基本规律。到1522年麦哲伦的船只在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回到西班牙的时候，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海风的规律都已经为欧洲人所知。现在他们可以自信地在各大洋上航行。

欧洲在造船技术方面取得了进步，掌握了大气环流的规律，现在他们就可以利用它们，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横跨大西洋，获取美洲新大陆的财富了。当然，西非也像伊比利亚半岛一样伸入大西洋，但是几个世纪以来西非的商业线路一直是跨过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的。东非的索法拉港口也进行海外贸易，但它自然只是向东跨越邻近的印度洋的。索法拉比加那利群岛（哥伦布的出发点）离美洲还要远3000英里，中国就更远了。所以地理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和其他因素一起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



图116　铸炮图

熟练技术工人是中世纪城市商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图展现了佛罗伦萨一家工厂铸造大炮的场景。

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鉴于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只有欧洲经历了从美洲大量涌入的金银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这些金银数额巨大，以至于16世纪欧洲的银储量增长了两倍，金储量增长了20%。除了这笔从美洲飞来的横财之外，欧洲也由于各种海外事业而变得更加富有。利润不断地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海盗劫掠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内部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的使用不断增长。

货币化削弱了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秩序。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扩大中的城市和东部边疆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能永远保持下去了。地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要面临失去劳动力的风险。西欧农奴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而不是劳动来支付地租——就这样封建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是西欧扩张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够积累资本，提供组织，解放探险、征服和移民事业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各国海外事业的成功程度与封建束缚的解放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同样，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封建行会。行会对手艺、定价和行业行为都有严格规定，其目的并非赚钱，而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靠牺牲同行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绝对违背基督教精神的。但是这些观念和行为随着企业家的出现都消失了。这些企业家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材料提供给乡下闲着的手艺人，支付计件工资。这种"外包"制度的逻辑是利润，而不是"公平价格"。企业家们在原材料和人力上尽力压缩成本，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成品，这样就能保证其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欧洲经济变革的原因不仅仅是货币的广泛使用，还由于铸造出了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和银行以及信用票据的发展。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都纷纷仿效。早在12世纪时意大利便已出现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产生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

于是，这一切都开始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今天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获利的渴望为根本动机、使用各种精巧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利用大量积累的资本赚取利润的制度。"[2]

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不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货币在中世纪还处于边缘，很少使用，但到中世纪晚期它已经为欧洲日后流星般的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只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物质生活的水平——但是资本

主义却恰恰与之相反。利润被用来进行再投资，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背后的逻辑。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

为了"赚钱"，富格尔和他的同行们需要自由地向贷款收取利息。但是中世纪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利息，因为利息会导致高利贷这种道德犯罪——"在上帝眼里最丑恶、最可憎的罪。"但到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开始请求接受"适度、可接受的高利贷"。这种修正很快就让位于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态度："获取高利贷的人去地狱，不这么干的人只好去贫民窟。"如果让你在死后下地狱和生前受穷苦之间做选择，无疑高利贷会胜出。因此，富有的欧洲银行家就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从而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



图117 梅第奇像

梅第奇(1389—1464)，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和政治家，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都是该城最富有、最成功的政客。该画像由本托姆所绘。

早期的合股公司是今天跨国公司的雏形。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小钱做投机生意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他们所承担的风险只是他们所投资的股票，对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们都无需进一步负责。而且各投资者也无须相识，无须彼此信赖，无须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这些具体事宜都被委托给根据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来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在各地的人们——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来能够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将笔笔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财力的限制，又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因此无法指望他们去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进行竞争。合股公司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工具。世界商业落入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逊湾公司等公司手中。

这就是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总结说，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不是哥伦布、达·迦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携带着资本的企业家们。他们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但是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让整个欧洲都发了财。”[3]

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在现代化的早期主宰了世界经济，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信条中找到：利润或者死亡。为了避免死亡，资本家们通常会通过两种方式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工人工资和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曾被广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为显然工人必须健康地活着才能进行生产活动，这就需要有最低工资保障。第二种技术进步的战略则可以无限地继续。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的事态也正是这样发展的。技术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更新，今天的高科技就是明证。这种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解释了为什么早期欧洲资本家能以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合股公司控制世界，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继续以他们的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和跨国公司继续统治世界。正如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开垦殖民地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渗透到中东和远东的市场一样，今天同样的内在动力驱使跨国公司不断地把工厂从一个大陆移向另一个大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建造起金色的拱门，甚至在北京富有历史意味的天安门广场也建起了一个可容纳500人的肯德基餐厅，在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像。在北京的新餐厅使用相同的广告词，只不过用中文将它翻译成了“好吃到吮手指”。

四、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同时期"新君主国"的出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相提并论。新君主国创建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结构。到15世纪末，民族君主国的趋势已很明显，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1479—1516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结构都已非常强大。这些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封建领主再也不能躲在城堡后面抵抗皇室的权威了——只有民族君主掌握着购买枪支、火药、子弹和供应后勤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机构。

新君主国力量的另一个来源是与成长中的商人阶级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国家从商人阶级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得到能干、恭顺的官员来满足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的需要。作为回报，皇室力量的巩固也帮了商人阶级的忙：皇室结束了封建战争，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征税站，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数个，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所费将是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因此消除这样的国内壁垒显然是对企业主的一大恩惠。君主们还特许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行业，像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

与所有的政治制度一样，此时自然也出现了为新的君主们辩护和使之合理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59—1527)。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他为渴望统一分裂的意大利半岛、摆脱法国和西班牙入侵的君主们提供了一些指导。他用无情的现实主义拒绝任何道德制约，从而将政治从宗教和哲学中分离出来。

遵从《君主论》中"君主"观念的民族君主们一定会与当时欧洲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教会和帝国。西班牙王朝通过联姻造成的轰动性的崛起使得这一冲突尖锐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这一结合的产物查理继承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萨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属地。他同时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土地(奥地利的公爵领地、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即克思腾、卡尼欧拉和蒂罗尔)。此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还留给了他勃艮第领地、法兰克—孔德、卢森堡和富饶的尼德兰。为了使这个广大的帝国变得更加完满，尽管遭到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和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反对，查理还是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一来，19岁的查理五世所统治的疆域甚至比7个世纪前解体的查理曼帝国都要广阔。



图118 马基雅维利像

一时间，西欧似乎又要在一个广大的跨国机构下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其他的王朝，特别是法国决心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其结果就是长期的半是宗教战争、半是王朝战争的一连串战争。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具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大陆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要牺牲者是平民，因为他们处于常常拿不到军饷、军纪涣散的雇佣兵的蹂躏之下。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城市和乡村到处哀鸿遍野。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的领土条款并没能维持很久，但它整体上的影响却是确定无疑的。此后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国家间的关系被置于公认的外交实践的原则之下。由此一个由拥有无限制主权的国家组成、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也就诞生了，这一国际社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五、扩张前夜的西欧

现代世界的历史主要由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随后20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所

主导。欧洲的宿命式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本章分析的各种历史力量的产物：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由此带来的经济生产力和资源，动力十足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新君主国的兴起。正是这些欧洲君主国向合股公司发放了特许状并支持他们，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动用他们的海军。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皇室就为哥伦布和达·迦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可以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得到有力的说明。明朝1405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宦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28 000人。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但是最大的船则宽180英尺，长444英尺。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英尺、长120英尺的"圣马利亚号"相比，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还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到亚丁和波斯湾口；还有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此时葡萄牙人还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他们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伟大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被突然停止。停止的原因正如开始的原因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欧洲这种停止完全是无法想像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相比之下欧洲则绝无这样的皇帝，这里只有一些互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而且没有任何帝国权威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保证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实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则完全不同。

总之，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在推动欧洲——牟利的欲望和机会。西欧的这种独特性在当时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作品中也都有所反映。1618年时张(Chang Hsieh)写道："在和那些野蛮人打交道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们惟一应该真正担心的事情是掌握海上风浪的规律，最可怕的危险是对利润的贪婪。"[4] 相比之下，葡萄牙船长乔·里贝罗则在1685年吹嘘道："从好望角往前，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逃脱我们的控制，我们急于在从索法拉到日本的5000里格的广大土地上放手去干，没有一个角落我们不想控制。"[5]

在中世纪，一系列事件孤立和局限了西欧人，从而进一步激发了西欧人天生的、到海外冒险的倾向。当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各国的据点已经丧失，蒙古帝国也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直抵维也纳城下。由于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欧洲商人再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其变成穆斯林的独占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而另一方面，十

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各国的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购欧洲大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取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为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对此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够直接前往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会出现许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像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缝隙喂养的巨人”。[6] 但是，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禁锢不了他多久了。

推荐读物

下列著作为欧洲社会的扩张主义做出了一般性解释：E. L. Jones 所著的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81 年出版)；E.R. Wolf 所著的 *Eru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出版社，1982 年出版)；M. Beaud 所著的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1500—1980 (Monthly Review 出版社，1983 年出版)；L.S. Stavrianos 所著的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William Morrow 出版社，1981 年出版)；J. Baechlev, J.A. Hall 和 M. Mann 编辑的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Basil Blackwell 出版社，1987 年出版)；F. Braudel 所著的三卷本的研究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Harper and Row 出版社，1981—1984 年出版)也是非常重要的。

下列著作对早期现代的欧洲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41—1963 年)的头三卷；B.H.S. van Bath 所著的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500—1850 (Edward Arnold 出版社，1963 年出版)；F. Braudel 所著的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Harper & Row 出版社，1973 年出版)；H.I. Miskimin 所著的 *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1300—1460 (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69 年出版)。分析这一时期欧洲技术进步的研究有：L. White, Jr. 所著的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2 年出版)和 *Machina Ex Deo: Essays in the Dynamism of Western Culture* (MIT 出版社，1968 年出版)；C.M. Cipolla 所著的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Pelican 出版社，1969 年出版)和 *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Pelican 出版社，1970 年出版)，后者主要论述枪支、帆船和钟表问题。下列著作富有启发性地解释了欧洲经济和技术上的嬗变：R.H. Tawney 的经典著作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Mentor 出版社，1926 年出版)；M. Weber 所著的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Scribner's 出版社，1948 年出版)；近期出版的 A.O. Hirschman 所著的 *The Passion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社，1977 年出版)。

下列问题论述了为何欧洲人比欧亚大陆上的其他民族在海外扩张方面领先的问题：J. Needham 所著的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1956 年出版，特别是第 4 卷第 3 节论及包括明朝下西洋在内的中国航海技术）；C.G.F. Simkin 所著的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 出版社，1968 年出版）；J.R. Levenson 所编辑的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1300—1600（Prentice Hall 出版社，1967 年出版）；J.M. Blaut 所著的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Gulford 出版社，1993 年出版）。上述最后一本著作在挑战"欧洲奇迹"观念和强调海外土地在刺激欧洲确立全球领先地位方面是独树一帜的。

注释

1. A.G. Keller, "A Byzantine Admirer of 'Western' Progress: Cardinal Bessario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XI(1955), pp.343—348.
2. S.B. Clough and C.W. Col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D.C. Heath, 1952), p.66.
3. T.K. Rabb,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Historical Journal*, XVII (1974), p.676.
4. Cited by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IV,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1), p.533.
5. Ibid., p.534.
6. R.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Growth of Capitalism* (Murray, 1925), p.68.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5个世纪前,哥伦布登上了圣萨尔瓦多——一座巴哈马群岛中的小岛。他以为自己到达了东南亚,因此把当地居民称为印第安人——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哥伦布去世后不久,1513年巴尔博亚抵达了太平洋,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的探险队完成了环球航行,此时哥伦布的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美洲是一个新世界",这种认识引发了人们对印第安人起源的思考。他们要么就起源于当地,要么就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了美洲。认为美洲大陆人类独立起源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将意味着存在两个"创世纪"——在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园里也有一对亚当和夏娃——这与旧约教义是水火不容的。于是人们一致同意,印第安人一定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但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子孙是怎样从旧世界移居到新世界的呢?这个问题历来争论不休,在过去四个世纪里差不多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不断有新的理论冒出来。

绝大多数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的依据是信念而不是理性。各种时髦理论走马灯般换来换去,每一种都反映了当时的见识和偏见。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最早的一种流行理论是犹太失落部落说,因为在当时《旧约》记载的古代希伯来人种学材料几乎是"原始"生活方式的惟一已知模式。因此早期的理论家确信,印第安人是公元前721年亚述王征服并从撒马利亚带走的希伯来部落的后裔。一些失落部落说的拥护者认为,那些希伯来人是穿越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到达新世界的,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他们是从波斯到中国、再穿越白令海峡到达那里的。

18世纪时,欧洲人对古代地中海各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的成就印象十分深刻。腓尼基人以其航海成就而闻名,据信他们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并曾跨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然而在19世纪在埃及发现了大量古迹后,埃及开始被认为是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由于中美洲的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非常相似,该理论被广泛接受为事实。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时髦理论随兴随灭。这样,我们的"红皮肤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蔑称——译者注)的起源,便被追溯到希腊人、特洛伊人、罗马人、伊特鲁斯坎人、塞西亚人、蒙古人、中国佛教徒、曼丁哥人或其他非

洲人、早期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北欧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甚至“缪”和“亚特兰蒂斯”这两个“消失的大陆”的幸存者那里，而这两个大陆相传在11 000年以前就分别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沉没了。

所有这些说法都无法被证明，或至少值得质疑，只有一个例外：10世纪末期北欧人定居纽芬兰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为什么这么多人曾经相信或仍在相信如此众多毫无根据的理论？原因之一是人们错误地认为，相同的习俗就意味着共同的起源。相反，你可以到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有关人类关系领域的档案处，要一份世界上所有民族具有某些特定习俗——如表亲联姻的详细目录。你可以很快得到几十个具有相同婚俗的例子，他们这种相同的婚俗不可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但是，由于早期的作者不熟悉现代人类学这门科学，所以会想当然地认为在遥远的过去，相同习俗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

同样，表面上相似的制度或结构一旦经过仔细考察，也会被证明彼此差异很大。埃及和中美洲都发现了金字塔，但是中美洲的金字塔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而埃及的金字塔则是巨大的陵墓。以下事实也同样重要：最新的发掘工作揭示出中美洲的金字塔几千年来是逐步演进的。中美洲金字塔经历长期发展这一事实，推翻了金字塔建造技术是从大西洋彼岸完全成熟地移植过来的理论。同样，在加利福尼亚一种叫“尤基”(Yuki)的土语中，*ko* 这个词意指“go”(“去”)，*kom* 意为“come”(“来”)，然而没有人根据这个例子能得出结论说，尤基语和英语存在历史联系。

即使古代旧世界的少数航海者确实到达了新世界，他们的文化将立即统治新世界的习俗这种说法也是大有疑问的。那些认为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或其他民族的一小群人能够到达新世界，并在辽阔土地上的土著居民中传播他们的文化的人，必须考虑一下18个西班牙人(16个男人和2个女人)的经历，他们在科尔特斯到来的6年前曾因海难到达尤卡坦海岸。除两个男人沦为当地酋长的奴隶外，所有的人都被作为牺牲献祭吃掉。其中一个幸存者完全成了土著人，他戴着精巧的鼻塞以及他所皈依部落的耳环，拒绝重新加入科尔特斯的队伍。同样，我们也知道维京人确实到过纽芬兰，但他们都因当地印第安人的敌视而被迫放弃了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因此，直到现代的连发来复枪和机枪发明之前，小群体到达后要么被全部消灭，要么就被当地文化所同化。

这就是为什么1968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得出如下结论的部分原因。其结论是：“到目前为止——除了维京人的接触(那是在纽芬兰)——在哥伦布之前的时代，还没有关于从这一半球到另一半球的人造工具的确凿的考古发现”。这次讨论会还一致认为：“目前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之前人类曾跨越大洋把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从旧世界引入新世界，或者从新世界引进到旧世界。但这也绝不是说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1]

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类讨论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它提出了人类文明如何发展的基本问题——人类文明是从一个或若干早期的中心扩散开去，还是在世界

各个不同地区的独立创造。这个问题不仅触及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而且牵涉到全球各个文明的起源。文明是从中东向西北欧、北非、南亚和东亚传播的呢，还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对此扩散传播论者和独立创造论者长期以来都在争论。

现在我们已经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扩散传播和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创造两者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先入为主的看法基础上的浪漫想像，而是取决于艰苦的研究和对结果的客观评价。考古学家对人类史前史的发现越多，就越认识到人类的所有分支对其环境的反应都是具有创造力的。他们的反应和成就的性质以及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背景，特别是前面述及的受外界刺激影响的程度。

同样值得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许多门外汉仍然认为，各色欧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高举文明的火炬，在前哥伦布时代踏上了新世界的海岸。事实上，今天的人们仍像旧石器时代最初的人类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与事实不符也仍然如此。我们以采集为生的祖先依赖图腾、巫师或者巫医。现代人对于飞碟、占八卦、纸牌算命以及占星术也有同样的迷信。本文的读者将会认识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天文学教授埃布尔（G. Abel）下述报告的重要性：

> “我曾对选我的《天文学概论》课程的普通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对占星术感兴趣，并且相信占星术。通过与国内同行们的讨论，我了解到别的地方的比例也差不多，这也许相当准确地反映出美国人信仰占星术的比例。据估计，美国大约有不下 5000 名占星学家在这个领域谋生，有 1200 家以上的日报辟有占星术专栏。”[2]

埃布尔教授的报告作于 1975 年。此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相信占星术的人在逐步增加。1980 年到 1985 年间，美国 13 岁至 19 岁的青少年中，相信占星术人数的比例从 40%上升到 55%。[3] 考虑到从 16 世纪现代天文学发轫之时起，相信占星术的人就日渐减少的事实，今日占星术的卷土重来确实值得人们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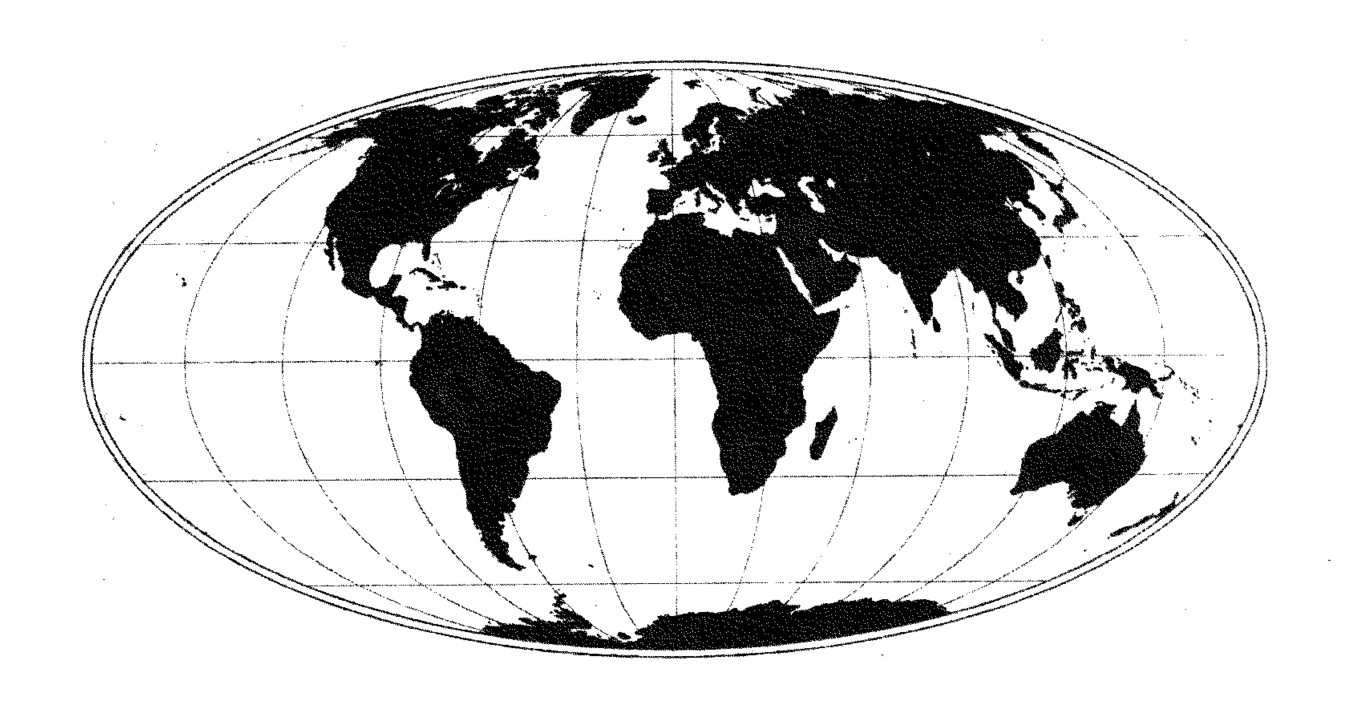
与此相似的是，《新闻周刊》1996 年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 48%的美国人相信 UFO（不明飞行物）真的存在，29%的人相信人类已经与外星人有过接触，而另有 48%的人相信政府有意掩盖了人类与外星人接触的信息。更为特别的是，有的占星师声称他们看见猫王在天王星上啃炸鸡。事实上，在这方面美国人并非与众不同，在法国，1995 年有近 50 000 名纳税人宣称自己依靠从事占星师、巫医、巫师、或类似的职业获取收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当时只有 36 000 名天主教牧师和 6000 名精神科医生。[4]

推荐读物

An interesting analysis of science and irrationality is given by M. Gardner, *Fads and Fallacies in the Name of Science* (Dover, 1957). A recent and fascinating survey of this subject is by the late space scientist, Carl Sagan, *The Demon-Haunted World: Science as a Candle in the Dark* (Random House, 1997). A similar survey focused on the United States, is by J. Gilbert, *Redeeming Culture: American 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注释

1. C.L. Riley et al., *Man Across the Sea: Problems in Pre-Columbian Contacts* (University of Texas, 1975), pp.448, 452—53.
2.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4, 1975.
3. Ibid., April 21, 1985.
4. *Newsweek*, July 8, 1996, p.50;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96.



第六编

西方崛起时的世界
(公元 1500—1763 年)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西端，并受到威胁。由于地处传统侵略路线——从中国北部横贯欧亚大陆、直抵中欧多瑙河流域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们历来就较易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因而也就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游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马札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只要帝国衰落下来，他们便趁机利用自身无与伦比的机动性闯入各文明中心。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发生了逆转。新兴的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了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游牧民族在欧亚大草原上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转变。整个欧亚大陆这时被两只巨大的钳臂所包围。其中一条钳臂由俄国横越西伯利亚，挺进到太平洋；另一条钳臂由西欧的扩张构成，西欧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与此同时，以哥伦布为首的其他西方人则向西冒险越过大西洋，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并环航全球。

诚然，在这数十年间土耳其的禁卫军正以无数亚洲前辈为榜样进逼多瑙河流域，围攻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但若将此事置于世界历史舞台，这只不过是一次仅具有局部意义的小行动。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最初伊比利亚人的海外扩张、其后西北欧人的活动以及同一时期俄国人朝太平洋方向的陆上扩张。

发现美洲和经好望角至东印度群岛的航道，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

——亚当·斯密

第22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的欧洲扩张中居于领先地位。这初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在1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由于有许多摩尔人和犹太人留居该地区，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成为穆斯林统治留下的一份遗产。此外，众所周知，16世纪后伊比利亚国家迅速衰落，并在整个近代中始终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那么，如何解释16世纪时这两个国家短暂而辉煌的扩张呢？本章首先探讨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起源问题，然后论述在东方和美洲大陆建立帝国的过程，最后阐明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衰落的原因和后果。

一、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根源

宗教是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无论在哪里它都不像在伊比利亚半岛那样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其长期反穆斯林的圣战记忆犹新，并始终为这种记忆所激励。对欧洲其他民族来说，伊斯兰教只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则是一个传统的、一直存在的敌人。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曾被穆斯林统治过，即便到15世纪，南部的格拉纳达仍然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此外，穆斯林还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不断增长的海上力量则使整个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他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远征是一时兴起，而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则认为，进行反伊斯兰教的斗争是其宗教义务和爱国需要的结合（参见地图24）。

航海家亨利王子最初以他在1415年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攻占北非的要塞城市休达时的骁勇善战而闻名。同样，伊莎贝拉女王为强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动，决心消灭穆斯林的据点格拉纳达，并将战争带到敌人在北非的领地，就像葡萄牙人先前在休达所做的那样。1482年伊莎贝拉开始了她对格拉纳达的讨伐，队伍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向前推进，直到1492年获取最后胜利。获胜之后，西班牙人立即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梅利利亚城。1492年女王还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要么接受天主教，要么离开西班牙；10年后，女王又对留居卡斯提尔的穆斯林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当地理大发现揭示出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消灭，有新的异教徒有待于从盲目崇拜中解救出来时，伊比利亚人的圣战也就随之扩展到了大洋彼岸。

诱使伊比利亚人航行海外的原因还有四个群岛——沿非洲海岸依次向南的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向西越过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这些群岛之所以很有吸引力，不仅仅因为其自身富饶多产，还因为它们有良好的战略基地和泊船港口。经过上诉罗马教皇和在当地多次争斗之后，加那利群岛归西班牙人所有，其他三个群岛则归属葡萄牙人。在整个15世纪中，更多富于冒险精神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水手们不断发现位于大洋远处的岛屿。自然，他们也会设想有更多的岛屿尚待发现和开发。1492年哥伦布与伊莎贝拉达成的协议规定，他应率领一支探险队“去发现和获取大洋中的岛屿和大陆”。

不过，在15世纪的海外冒险事业中占据领先地位的却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西班牙行动较迟，而且通常都是出于对葡萄牙活动的反应。葡萄牙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疆域不大，而且位于大西洋沿岸，三面为西班牙领土所包围。这使葡萄牙人可以免受将自己的财力浪费到欧洲战争中去的诱惑。在亨利王子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致力于远洋事业。其二是葡萄牙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了较多的航海知识。里斯本地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与佛兰德人之间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交通线上；葡萄牙人通过在皇家海军中雇用意大利船长和领航员获取了航海知识。亨利王子又通过集合起一群包括意大利人、加泰隆人，甚至还有一名丹麦人在内的出色的海员来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在亨利去世之后，国王继续其未竟的事业，使葡萄牙人成为在航海术和地理学方面知识最丰富的欧洲人。

1415年占领休达以后，葡萄牙对探险的兴趣迅速增强。穆斯林战俘泄露了有关穿过撒哈拉沙漠同苏丹各黑人王国进行古老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情报。在此前数百年中，后者一直用象牙、奴隶和黄金来换取各种制成品和盐。由于当时西欧，尤其是葡萄牙亟缺金银，所以派遣船队沿非洲海岸南下开发这一黄金贸易的可能性也就引起了亨利王子的兴趣。简而言之，亨利最初的目标仅限于非洲，而并未打算扩展到东方。

1445年，葡萄牙的早期探险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年亨利王子的船长们通过了沙漠海岸，并在它的南方发现了一片肥沃的绿洲。到亨利去世时，葡萄牙人已沿海

岸勘探到塞拉利昂,并建立起了许多沿海驿站,使他们至少能够进行自己想得到的一部分商队贸易。

在此期间,甚至是在亨利去世以前,葡萄牙人所向往的目标就已开始从非洲扩展到印度。当时,从欧洲前往东方的通路被控制整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势力所阻断,对欧洲人来说,地中海是一所牢狱,而不是一条通途。因此,除了作为中间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欧洲人都渴望找到一条"通往香料产地东印度群岛"的新路。亨利王子在行动之初并未想到印度,但是随着他的船队沿非洲海岸往前驶去,他的视野自然会从非洲的商队贸易扩大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从那时起,发现和控制香料路线也就成为了葡萄牙人政策的首要目标。

二、哥伦布发现美洲

鉴于葡萄牙在远洋航海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伟大发现即美洲大陆的发现在西班牙的赞助下取得似乎有悖常理。而似乎更有悖常理的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原因竟在于葡萄牙人的地理知识比西班牙人更先进,并正确地估算出哥伦布的计算结果是错的。到 15 世纪时,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但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大小以及大陆相对于海洋的准确位置。哥伦布根据马可·波罗对亚洲东西宽度的估计(一个过高的估计),根据这位旅行家关于日本距亚洲大陆有 1500 英里的报告(一个极高的估计)以及托勒密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一个过低的估计),推断出分隔欧洲和日本的大洋宽不到 3000 英里。因此他认为前往亚洲的最便捷之路应该是横渡大西洋的短期航行;这也是他向各国朝廷提出的方案。葡萄牙人由于亨利王子的缘故而富有实践经验,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他们确信地球比哥伦布所认为的还大,各大洋也更宽,前往东方的最近便之路是绕过非洲而不是横越大西洋。因而,1484 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请求资助时遭到拒绝。两年后,哥伦布来到西班牙朝廷,最初也遭到拒绝,但最后则赢得了伊莎贝拉女王的支持。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3 年 3 月结束第一次航行回来时,哥伦布在给加布热沃·桑切斯的信中描述了他的发现。这封信表现出哥伦布是多么急切地想说服人们,他已经发现了宝贵的土地,他非常想掠夺这些土地上的财富并将生活在其上的"诚实"而又热情的人们变

成奴隶。*

我认为,您如果听到我圆满完成任务的消息一定会很高兴,因此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告诉您我在这次航行中所做的一切和发现的所有情况。

离开卡迪兹之后的第33天,我进入了印度海,在那里,我发现了许多居住着不计其数的居民的岛屿。我通过发布公开声明和展示国王旗帜的办法替我们最富有的国王占领了所有这些岛屿,岛上的居民无人表示反抗……这些岛屿和其他所有我见到的或听说的岛屿上居住的男男女女都赤身裸体,只有少数妇女用树叶、树枝或她们专门为遮羞而纺的棉纱遮住身体。就像我前面谈到的,他们都没有铁,也没有武器;他们不会使用武器,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他们不会使用武器并非因为他们身体不健全,而是因为他们生性胆小,充满恐惧。他们用晒干的甘蔗作杆,一头固定着削尖的木结构,来做武器。但是他们却从不敢用这些东西,因为我每到一个新地方后,就会派出两三个下属进入当地人的村庄去和他们谈,这时通常出现的情况都是:印第安人冲上前来,但一见到我们的人开始接近他们,他们就会夺路而逃,父母顾不上孩子,孩子管不了父母。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什么伤害或有什么损失。相反,我将我所带的东西,如衣服和其他东西,都送给了那些我遇到的人或那些愿意和我说话的人。我从不索要任何回报,但他们还是天生地害怕和胆怯。但当他们看到自己很安全之后,所有的恐惧就都消失了。他们非常诚实,不耍花招,待人也十分慷慨。如果有人问他们要东西,没有人会拒绝;相反,他们自己还会邀请我们带走他们的东西。他们对我们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用非常珍贵的物品换取我们不值钱的东西;给他们蝇头小利他们就会喜不自胜,甚至不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也会很高兴……

最后,作为对我们这次出航和迅速返回的主要成绩和好处的总结,我愿对我们不可战胜的君王们承诺:如果我能得到他们小小的一点援助,我将回报给他们他们想要的任何数量的黄金,还有香料、棉花、玛蒂脂,以及红木,还有陛下们想要的奴隶。

……

由于这些事情已经完成,所以我只是简短地跟您讲述一下。再会。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海洋舰队司令

3月14日于里斯本

* Reprinted from *Old South Pamphlets*, vol. 2, No. 33 (Director of the Old South Work, 1897).

1492年8月2日,哥伦布率领三艘由可靠的水手和能干的船员操纵的帆船,从

帕洛斯角起航。10 月中旬他们登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将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哥伦布至死还确信他已抵达亚洲。他确信圣萨尔瓦多岛离日本所在的位置非常近,下一步就是找到日本。当他向西南航行抵达美洲大陆时,他相信自己到了马六甲海峡附近某地。哥伦布坚持自己的错误这一点带来了重大结果:它鼓舞人们进一步在南北美洲探险,直到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大笔财富。

西班牙君主坚定地支持哥伦布,投入大笔资金为他装备了另外三支远征队。但是直到 1519 年西班牙人才在墨西哥很偶然地发现了富裕的阿兹特克帝国。这次意外的发现距离哥伦布的首次探险已经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时间里,伴随西班牙人勘探西印度群岛中没有开发价值的众多岛屿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最初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重大失败。数千名冒险家成群结队地涌往西印度群岛,只是令人扫兴地找到少量黄金。然而,美洲大陆的发现的确引起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直接反应,它促使葡萄牙人环航非洲,由海路直抵印度。



图 119　木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这幅最先出现在一本印制于 1493 年的小册子的封面的木雕,可能是欧洲出现的第一幅描绘哥伦布到达美洲的绘画。图中,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坐在左边,指挥哥伦布和他的三条船登陆一个小岛。几乎全裸的土著人(画得比欧洲人身材高大)正纷纷望风逃避。

三、葡萄牙在亚洲

在此期间,葡萄牙人则一直在从他们沿非洲几内亚海岸的贸易中获取着丰厚的利润。粗胡椒、黄金、象牙、棉花、糖和奴隶这时已通过葡萄牙人之手进入欧洲贸易。亨利王子的后继者继续着他对西非海岸的开发。1487 年这一开发取得了惊人的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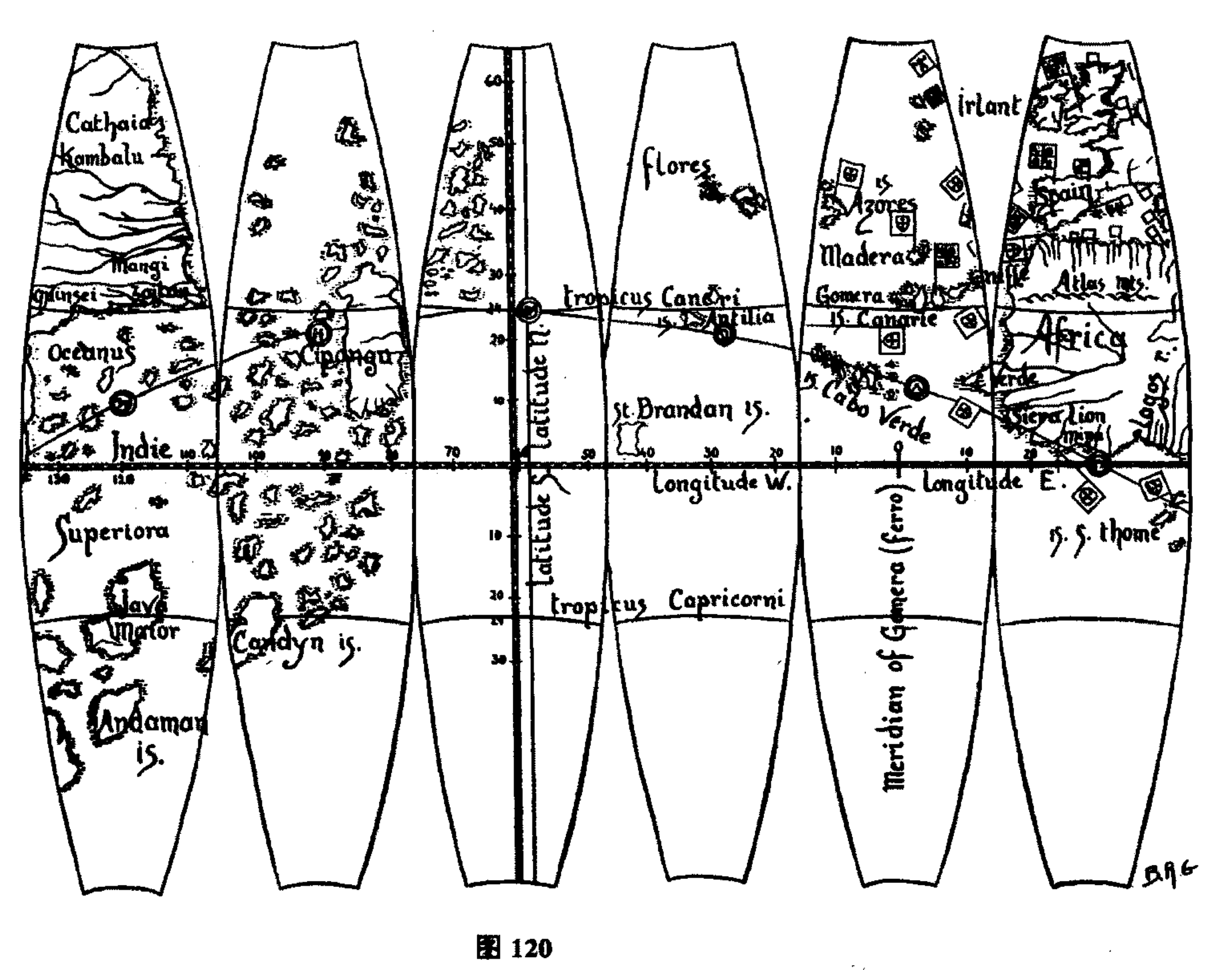


图 120

1492 年哥伦布所了解的世界就包含在这幅由纽伦堡地理学家马丁·贝海姆所绘的地图中。贝海姆制作了世界上第一个圆形地球仪,该地球仪中所绘的海洋部分都复制在此处。哥伦布从加纳利群岛(Canarie Islands, 在图的右侧第二部分)出发,他以为自己会首先登陆日本(图中左侧第二部分所标的 Cipangu)。当他在圣萨尔瓦多登陆时,他还以为是登陆在日本的外围岛屿。到达古巴时,他则认为自己正式到了日本。

展:巴托洛米乌·迪亚斯在沿海岸探险时遇上大风,持续了 13 天的大风一直将他的船队向南刮去,其时始终不见陆地;当风变小时,迪亚斯朝西非海岸驶去,却发现他们早已不知不觉绕过了海角。他在印度洋的莫塞尔贝登陆时,想要进一步探险,但他手下那些疲倦、受惊吓的船员则强迫他返航。返航途中迪亚斯第一次见到这个大海角,遂将它命名为风暴角;等他返回后,葡萄牙国王又重新将其命名为好望角。但是葡萄牙国王因为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原因而没有继续进行绕过好望角的远航。结果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哥伦布首先发现新大陆并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到达了东方。

更有见识的葡萄牙人虽然从最初起就对此半信半疑,但这时他们也加紧了其开辟和占有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1497 年 7 月 8 日,达·伽马率领四条帆船从葡萄牙启航,并于第二年 5 月底抵达卡利库特港。但是达·伽马在卡利库特并未受到热烈欢迎。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商人自然会因为其传统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感到恐惧而尽力阻挠这些欧洲闯入者。此外,葡萄牙的货物多半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

物,不适合印度市场。事实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这一点从达·伽马奉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物清晰可见:羊毛织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脸盆以及罐装的油和蜂蜜;这类礼物肯定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因此,达·伽马与卡利库特的通商之所以有困难,并不仅仅因为当地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还是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各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的制成品通常都会比东方产品质次却又价格高。



图121 达·伽马像
航海家达·伽马像。

达·伽马费力地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踏上归途,并于1499年9月返回家乡。这船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费用的60倍。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展现在满心欢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尔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的称号。葡萄牙人对这些称号的接受是相当认真的,他们决心垄断新航路的贸易,不仅将其他欧洲人,也把数百年来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排除出去。为了实现这些渴望,葡萄牙人实行了无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遇上他们所憎恨的穆斯林时。达·伽马曾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发现几条从麦加返航的无武装船只。他捕获了这些船只,并且——用他的一个葡萄牙同伴的话来说就是——"在搬空船上的货物之后,禁止任何人将船上的摩尔人带出来,然后下令把船烧了。"[1]

在经过数千年的隔绝之后,使欧亚大陆两种文化首次面对面的这一划时代相遇的性质就是如此。欧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们夺取并保持着主动,直到渐渐地但

却也是不可抗拒地变成全世界的主人。这种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统治乍看起来是难以理解的:为什么只有大约20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高度文明的、拥有更多人力物力资源的亚洲各国呢?

首要的原因就是葡萄牙人有能够利用不久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巨大的金银的优势。大批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库,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它们来的恰逢其时,使葡萄牙有足够的资金与东方通商。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原本会受到严重制约,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各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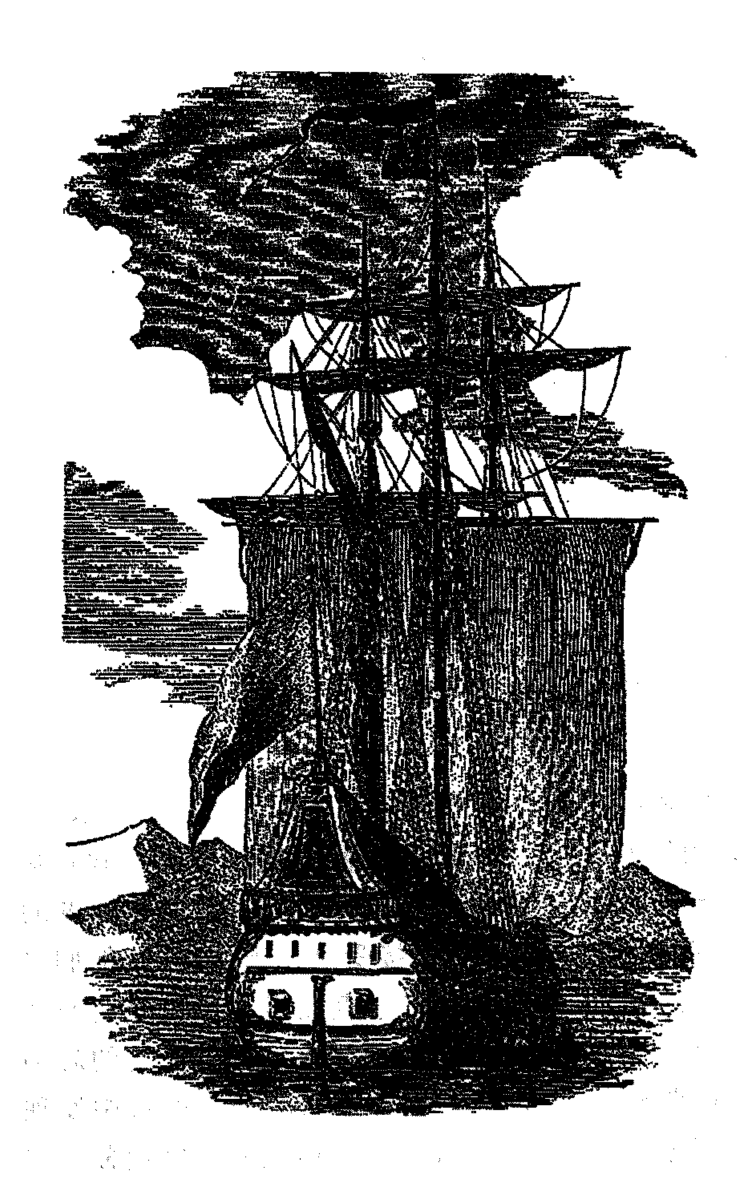


图122 达·伽马的旗舰

达·伽马的旗舰索·加布里埃尔号。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陆的一盘散沙。葡萄牙人到来时,印度北部正被新闯入的莫卧儿侵略者控制着,他们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贸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马拉巴尔海岸,则在一些印度教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陷于内争。相形之下,葡萄牙人及其欧洲后继者则只有一个单一的、持续不变的目的,这种目的

足以抵消他们在资源方面的劣势。虽然欧洲人显然是不团结的——他们之间充满了政治和宗教上纷争——但在向东扩张以获取利润并战胜伊斯兰教这一点上他们却完全一致。而且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欧洲人所表现出的志在必得的决心也要比亚洲各民族进行抵抗的意志更为坚定。当达·伽马完成历史性的航海归来时，葡萄牙朝廷准备迅速扩大成果。它为有组织的贸易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其中包括在马拉巴尔各港口设立商行驻外代理处和每年派出若干持有皇家特许状的舰队。



图 123　蒙巴萨的基督堡

建于蒙巴萨的基督堡，它是葡萄牙人建立的一个用来控制东非海岸的主要的要塞。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还由于他们的海军力量占有优势。葡萄牙人当时发展了有效的海军新火炮，这种火炮使他们能将舰船当作流动炮台，而不再是为部队提供膳宿的运输船。火炮而非步兵这时已成为海战的主要工具，它被用来攻击敌舰而不是舰上人员。而也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发展，葡萄牙人才能在印度洋上粉碎穆斯林的海军力量，从而赢得一个使他们大发横财的亚洲帝国。

这一帝国的缔造者是杰出的阿方索·德·亚伯奎，他从 1509 年至 1515 年任葡萄

牙的印度总督。他的策略是通过夺取对进出印度洋的狭窄海道的控制来粉碎阿拉伯人的贸易网。他占领了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分别是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关口。在印度,他攻占了位于马拉巴尔海岸中部的果阿城。果阿成为亚伯奎的主要海军基地和大本营,直到1961年以前它一直都是葡萄牙的属地。在东面,他攻克马六甲,控制了与远东通商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两年后,即1513年,第一艘抵达中国港口的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访问。葡萄牙人获得了在广州下游的澳门设立货栈和居留地的权利,他们在那里继续从事其在远东的事业。

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由于这些属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葡萄牙人由此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葡萄牙船队每年都会沿西非海岸——那里密布着为商船提供粮食和修缮服务的贸易站——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后,驶入葡萄牙的另一属地东非的莫桑比克港,然后乘季风越洋抵达科钦和锡兰,在那里将从邻近地区收购的香料装上船,随后再向东航行到马六甲,马六甲使葡萄牙人得以介入东亚贸易。他们在其中充当了中间人和运输人的角色。这样一来,葡萄牙人就不仅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获利丰厚,还从纯粹的亚洲贸易——如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中牟得厚利。

凭借这张由贸易站和要塞构成的网络,亚伯奎打破了长期以来阿拉伯商人对印度洋的垄断,并在此过程中和威尼斯商人争夺起他们以往通常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的“香料”。威尼斯人几个世纪以来都从亚历山大和地中海东部港口购买香料,现在他们发现这种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香料通过更长但也是更便宜的外洋航线被运往里斯本。这可以解释为何埃及人会在威尼斯人的全力支持下于1508年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去帮助印度王公把葡萄牙入侵者赶出印度洋。埃及人失败了,但是于1517年征服埃及的土耳其人继续反对葡萄牙人的运动,他们在其后数十年间派出了好几支舰队。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成功,香料依旧绕过好望角流向欧洲。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东的老航线就完全被弃置不用了。事实上,在被废止之后不久,老航线就重新赢回了其大部分失去的交易。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葡萄牙的贪官污吏在收受贿赂后通常乐于让阿拉伯人的船驶入红海和波斯湾。因此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也就得以在整个16世纪成功地与葡萄牙人进行竞争。直到下一世纪印度洋上出现效率更高、经济上更强大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时,老资格的意大利中间人和阿拉伯中间人才被排挤掉,传统的中东路线才让位于外洋航线。

四、世界的瓜分

欧洲人在开始其海外扩张时采用了一项便利的原则，即他们有权不顾有关的土著民族而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另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认的原则是，罗马教皇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地区的管辖权。早在 1454 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曾颁布过一道训令，授权葡萄牙人占有他们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进发时所发现的一些领土。当哥伦布从他确信已抵达东印度群岛的首次远航中返回时，西班牙朝廷担心葡萄牙人会提出反要求，于是就敦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的专有权。1493 年 5 月 4 日亚历山大教皇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 100 里格处划定一界线，以西地区授予西班牙，以东则属于葡萄牙。1494 年 6 月 7 日西班牙和葡萄牙谈判缔结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将分界线再西移 270 里格。这一改变的结果使葡萄牙获得了对巴西的所有权。

葡萄牙继达·伽马远航之后在香料贸易中大发其财，使得其他欧洲国家也都开始狂热地探索其他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哥伦布寻找中国一次又一次失败，但这却并没有毁掉向西航行抵达亚洲的希望。也许从新发现的种种荒凉地带之间穿过仍是可能的。这是 16 世纪初出现的新职业探险家的目标。这些探险家多半都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是当时最有知识、最富经验的探险家），他们不怎么忠于本民族，愿意为任何资助他们的君主进行探险。意大利人中包括为葡萄牙和西班牙效力的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为法国效劳的约翰·韦拉扎诺和为英国航海的卡伯特父子；葡萄牙人中则有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胡安·费尔南德斯和斐迪南·麦哲伦，他们都为西班牙王室效力。

在这些人中只有麦哲伦找到了通往亚洲的航道。随着香料货物经常性地运至里斯本，西班牙认识到自己正在输掉这场围绕香料群岛的竞赛。西班牙声称《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规定的分界线是笔直环绕全球的，所以他们就派麦哲伦去开辟向西前往亚洲的航道，希望他至少能够找到一些位于分界线西班牙一侧的香料群岛。

在这一航海事业的伟大诗篇中，麦哲伦率领一支由五艘各 100 吨位的帆船组成的船队，于 1519 年 9 月 10 日从塞维利亚起航，并于 10 月抵达如今镌刻着他名字的海峡。由于海上风高浪急，他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驶入太平洋。其间，一艘船失事，另一艘船也被迫丢弃，他率领余下的三艘船沿着智利海岸向北航行，至南纬 50 度处时折向西北。

在接下来的八十天中，他们仅仅发现了两个荒无人烟的孤岛。由于缺粮少水，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患上了严重的“坏血病”。3 月 6 日，他们驶抵一座可能是关岛的岛屿，在那里得到了粮食。同月 16 日船队到达菲律宾，麦哲伦和他手下的 40 名船员在一次战斗中被当地人杀害。残存的西班牙人依靠当地领港员的帮助，航行到婆

罗洲,最后于1520年11月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摩鹿加群岛即香料群岛。当时已在那里的葡萄牙人则毫不迟疑地进攻剩下的两艘西班牙船(还有一艘船已被丢弃在菲律宾)。尽管遇到重重障碍,西班牙人仍然获得了丁香,然后他们取道不同的航路起航回国。试图再次穿越太平洋返回的一艘船因遇逆风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获。另一艘船则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过望加锡海峡、越过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岸北航。1522年9月3日,这艘唯一幸存的船——船体严重漏水、船员已大批死亡的"维多利亚号"缓慢地驶入塞维利亚港。不过,这一船香料的价值已经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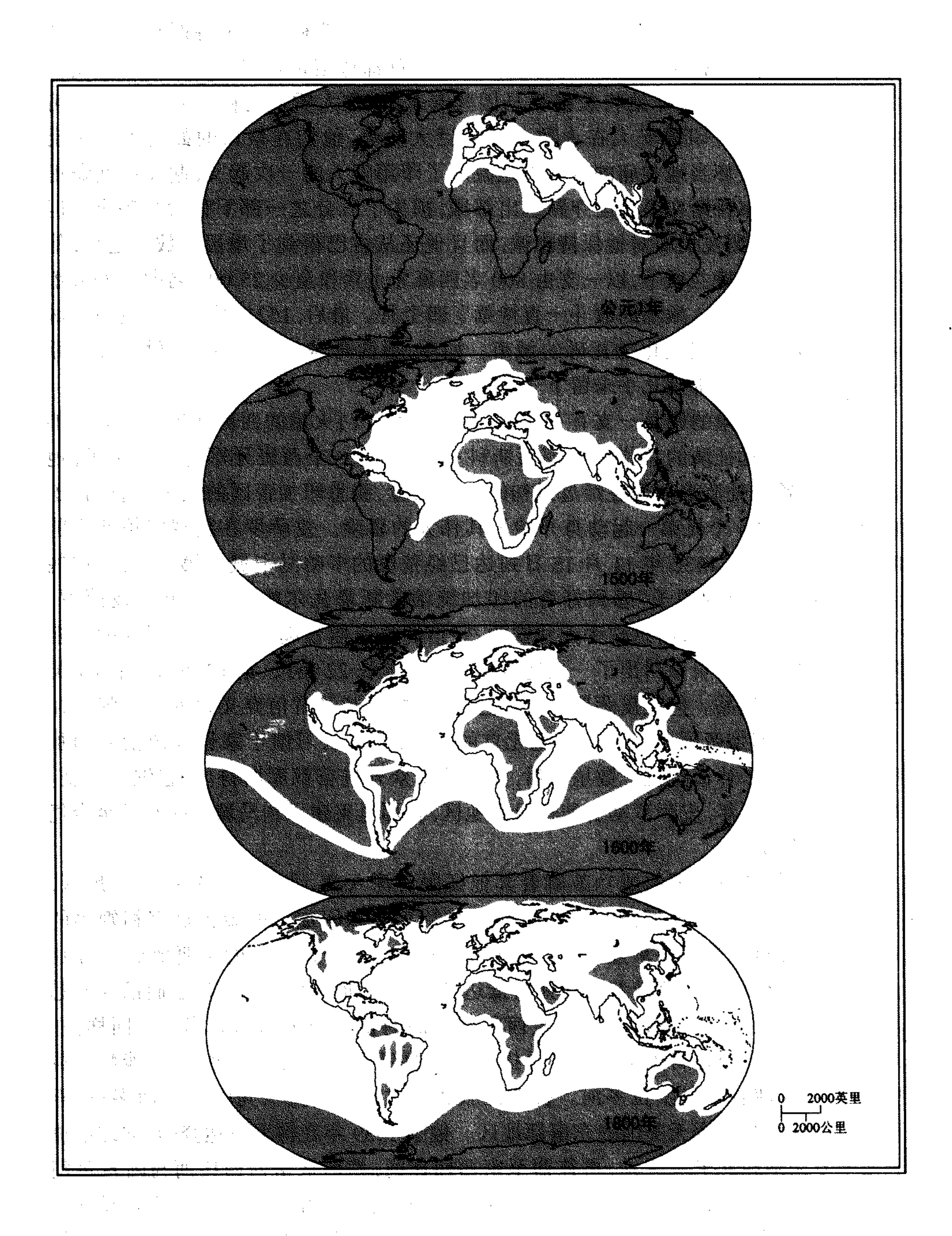
在这之后西班牙人又派出了一支远征队,远征队于1524年到达香料群岛。但是这次远征却遭到惨败,因为葡萄牙人已在那里站稳脚跟,向他们挑战已无利可图。此外,西班牙国王当时正同法国交战,急需军费。因此,1529年西班牙国王同葡萄牙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他放弃了对香料群岛的全部要求,并接受在香料群岛以东15度处划定的分界线;作为回报,他得到35万个达卡金币。这一条约标志着地理大发现史上重要一章的结束(见地图25)。葡萄牙人对香料群岛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605年该群岛落入荷兰人手中,而西班牙人则继续觊觎菲律宾群岛,并最终于1571年将其征服,尽管该群岛位于《萨拉戈萨条约》规定的分界线以东。不过,此前很久西班牙就已将其注意力转向美洲大陆,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其价值和东方的香料不相上下的大笔财富。

五、西班牙征服者和新西班牙

1519年麦哲伦离开塞维利亚开始了其著名的环球航行,同样是在这一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则离开古巴发动了同样著名的对阿兹特克帝国的远征。在科尔特斯的远征中迎来了所谓的征服者时期。从1500年至1520年是探险者时期,当时许多航海者打着各种旗帜探查整个南北美洲的东西两侧,以寻找通路。在随后的30年中,数千名西班牙冒险家赢得了第一个庞大的欧洲海外帝国。

这些冒险家是伊比利亚征伐传统的产物,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就是这些走运的战士中的一个。他出身望族,曾是位学法律而未成功的学生。1504年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5年后他在对古巴的征服战中取得卓著战功,遂当选为被派往尤卡坦的一支探险队的总指挥,负责调查传说中生活在内地文明城市的居民。1519年3月科尔特斯在今天的韦拉克鲁斯附近的海岸登陆。他只有600名部下、几门小炮、13支滑膛枪和16匹马。然而,正是凭借着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将赢得巨大财富,并成为一个高度先进的异国的主人。

科尔特斯一上岸就先毁掉所有的船只,以向部下表明其破釜沉舟之志。接着,经过几次战斗之后他与仇视阿兹特克霸主的各个部落达成协议。没有这些部落提



地图 25　西方对世界的了解（公元 1—1800 年）

供的食物、搬运夫和士兵，科尔特斯不可能赢得那么多胜利。科尔特斯利用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领蒙提祖马的迷信，得以和平进入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他虽然受到蒙提祖马的礼遇，却狡诈地将蒙提祖马囚禁起来，扣作人质。这种无耻的欺骗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印第安人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在祭司的鼓动下起来反抗。西班牙人毁坏当地神庙的政策更是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一次起义，起义期间蒙提祖马被杀。科尔特斯在黑夜里夺路逃出都城，损失了三分之一部下和大半辎重。但是，他的印第安盟友仍旧对他保持忠诚，而且他还从古巴得到了增援。数月之后，他又重返特诺奇蒂特兰城下，以一支由800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25 000名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开始攻城。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四个月。最后，1521年8月残余的守城者交出了几乎已经完全化为瓦砾的城市。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其原址上，而原先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则几乎未留下一处遗迹。

不过更为冒险的则是一支有180人、27匹马和2门火炮的西班牙远征队对印加帝国的征服。远征队的总指挥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是一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他目不识丁，曾到处流浪。他在经过最初的几次探险、获悉印加帝国的大体位置后，于1531年同他的4个兄弟一起动身开始了其伟大的冒险。皮萨罗在翻越安第斯山脉时耽搁了时日，于1532年11月15日到达已经荒废的卡哈马卡城。第二天，对这些陌生的“蓄络腮须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正式访问了皮萨罗。皮萨罗仿效科尔特斯，将这位手无寸铁的、轻信的皇帝监禁起来，并残杀了他的许多随从。皇帝为获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笔赎金——占地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达7英尺的一堆金银物品。但是皮萨罗在攫取这笔财物后，却又背信弃义地处死了阿塔瓦尔帕。于是，印加帝国也就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而早已习惯于家长式统治的印加居民也进行不了什么抵抗。数星期后，皮萨罗率众开进首都库斯科，将它洗劫一空。第二年，即1535年，皮萨罗动身前往沿海地区，在那里兴建了利马城——利马至今仍是秘鲁的首都。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成功鼓舞着其他征服者深入南、北美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寻找更多的战利品。他们没有找到可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财宝相媲美的财富，但却在这一过程中掌握了整个南美洲和很大一部分北美洲的主要地形。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从秘鲁沿着亚马孙河抵达其河口。而到16世纪末，他们已经熟悉了从加利福尼亚湾南到火地岛、北至西印度群岛的整个南美洲的海岸线。同样，在北美洲，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锡沃拉的七座黄金城，跋涉数千英里，发现了大峡谷和科罗拉多河。曾在征服秘鲁过程中崭露头角的埃尔南多·德索托则广泛地探察了今天美国的东南部地区。他于1539年在佛罗里达登陆，向北前进到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再往西至密西西比河，然后从密西西比河与阿肯色河的汇合处沿密西西比河抵达其河口。这些人和其他探险者一起为西班牙人开辟了美洲大陆，后来的拉萨尔、刘易斯和克拉克为操法语和英语的诸民族开辟美洲大陆的方式与他们完全相同。



图 124 墨西哥城之战

一幅 16 世纪阿兹特克人的绘画作品,描绘了西班牙人攻占墨西哥城的战斗。

到了 1550 年,征服者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此时西班牙人继续发展其海外属地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由于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不像亚、非两洲的土著居民那样密集,组织也松散得多,伊比利亚人得以在美洲大批地拓居并强行推广自己的文化。这样他们也就建立起了欧洲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帝国——而他们在非洲和亚洲的帝国则纯粹是商业性的。

这些恃强凌弱的征服者作为帝国的缔造者是颇具才干的,但他们作为帝国的行政官员就显得平庸无能。他们无法适应安定的生活,他们在长期的争斗和自相残杀的战争中使得自己的士兵大批死亡。最后西班牙王室被迫强行以树立王权和王室公正原则的官僚取代了征服者。

居于这一帝国行政结构顶端的是西印度事务院,它设在西班牙,受到君主的严密监督。它负责一切重要的任命,并对殖民地事务行使一般管辖权。美洲的最高权力被委托给分别坐镇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的两名总督。墨西哥城的总督负责新西班牙辖区,它包括北美洲所有的西属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岛、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群岛。利马的总督负责秘鲁辖区,它包括余下的南美洲西属殖民地。这两大总督辖区再分成较小的单位,由检审法院即地方议会统辖。这些法院的工作人员是专业律师,他们通常没有过多的家族自豪感或军事野心,因而是理想的王室仆人。16 世纪时,这种检审法院在美洲有 10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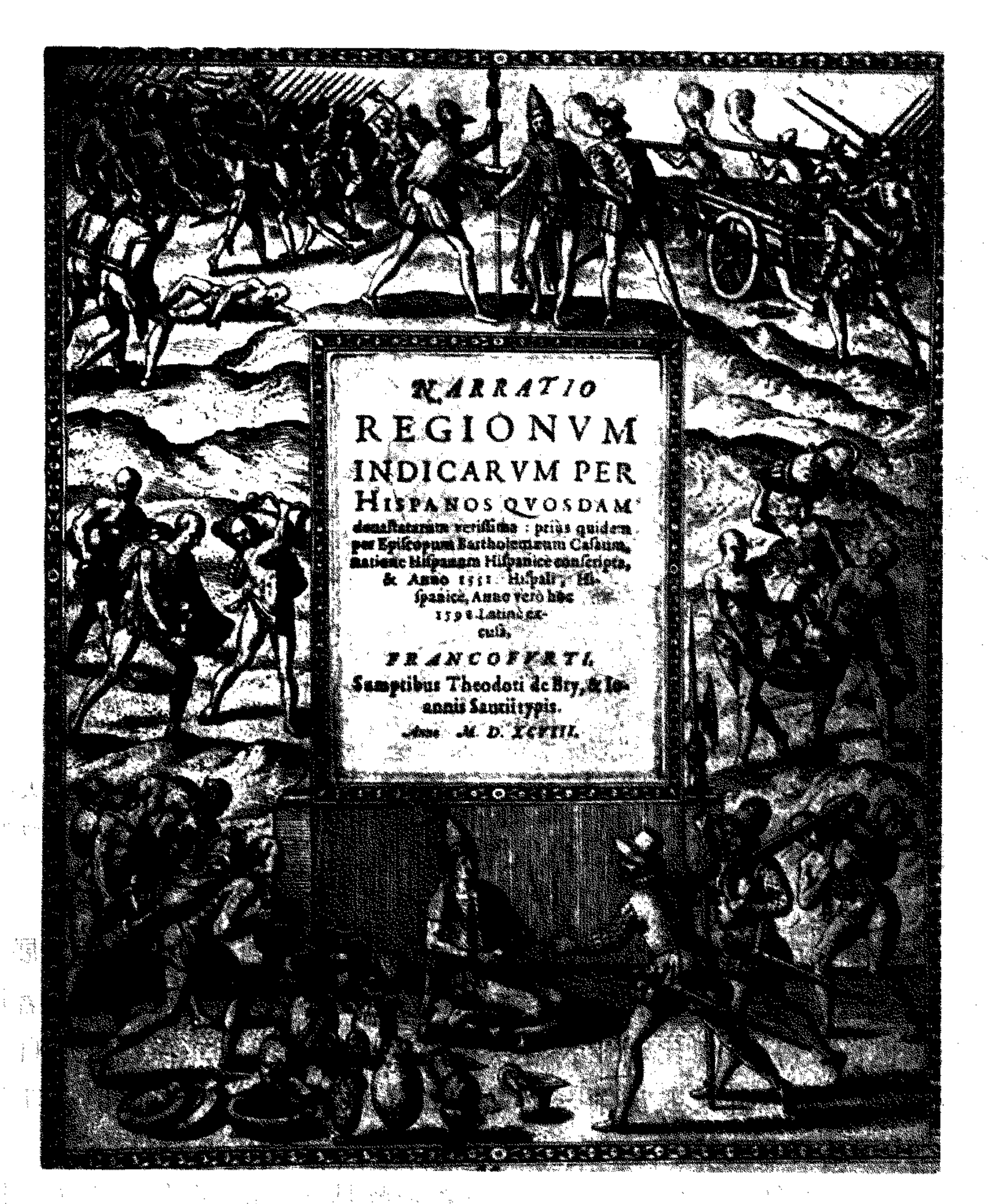


图125 巴托洛姆·莱克斯·卡萨斯

巴托洛姆·莱克斯·卡萨斯是一位西班牙传教士，他站在印第安土著人一边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暴行。他的作品描绘了西印度群岛上印第安土著人所遭受的不人道的残酷虐待。

西班牙行政管理者在南北美洲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君主准许有军功的征服者，即所谓的“保护者”或大授地主，向指定的印第安村庄收取规定的贡物，强迫村民服劳役。作为回报，大授地主则必须服兵役并支付教区牧师的薪水。强制劳役的规定显然打开了虐待土著的大门，因此在16世纪中叶这条规定被修改。在这之后土著虽然仍被强迫劳动，但这种强制现在是来自政府机构而非大授地主，而且须按官方工资标准支付报酬。毋庸讳言，这些保护措施有时并未得到执行——各殖民地距马德里实在是太远了，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过于隔绝。然而事实依旧是，西班牙人严肃而有良心地讨论了一个无先例可循的剥削问题。

对西班牙殖民地帝国的经济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因为有了土著劳力，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矿山的金银源源不断。法律规定所有的贵金属都必须运至官署加盖戳记，并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即“五一税”。在 1503 年至 1660 年间，西班牙从美洲攫取了有据可查的总计 18 600 吨白银和 200 吨黄金。至于那些未经注册就被私运入西班牙的金银据估计则占总数的 10％至 50％。

除了开矿外，拉丁美洲的主要产业就是大庄园农业和牲畜业以及位于热带沿海地区的单一作物种植园。大庄园雇用印第安劳力生产粮食，以供自己消费和出售给附近的城市及矿区。种植园则完全不同，它主要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而且仅生产一种供应欧洲市场的作物。最早的种植场是在大西洋各群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种植甘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后，这种经营方式又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以及稍后南北美洲的烟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大庄园和种植园生产的动植物产品的价值稳步增长，以至于到 17 世纪早期其价值已经超过了富于传奇色彩的金银的出口产值。

六、伊比利亚的衰落

16 世纪时伊比利亚国家在欧洲的海外事业中遥遥领先，并从东方的香料贸易和美洲的银矿、大庄园和种植园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是到了 16 世纪末，它们却从其各自的领先地位急速倒退——法国、荷兰和英国愈益成功地侵犯葡属东方帝国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权益。伊比利亚国家衰落的根源之一是它们卷入了 16、17 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在查理五世和菲利浦二世反对新教徒的战争中，在反对强悍的土耳其人的多次战役中，在皇室家族的对抗竞争，特别是法国人的王朝斗争中，西班牙耗尽了人力和财富。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是致命的。他们试图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扮演主要角色。这与后来英国的成功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时才进行干涉。这一战略使得英国人能够全力以赴地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则和法国一样，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大陆，并不断地卷入欧洲战争。最终结果则是，英国人建立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其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

伊比利亚国家无疑被国外纠纷大大削弱了，但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实质的原因则是它们在经济上一向长期依赖西北欧。这一点在其开始海外扩张前是这样，在其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非但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良机改变其经济上被控制的局面，反而还使得这些帝国作为母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样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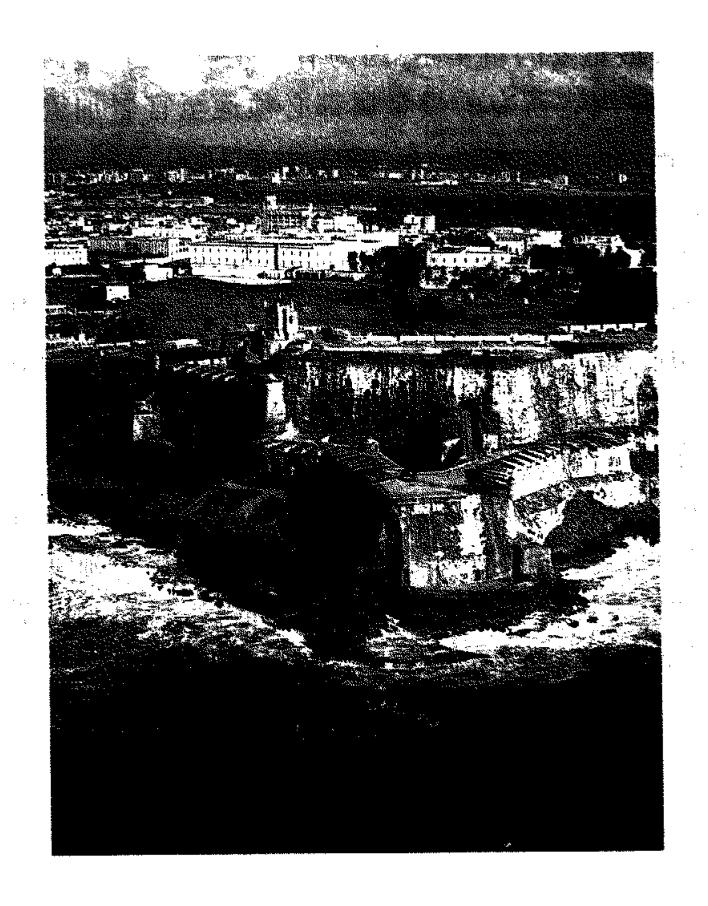


图 126
位于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港的埃尔莫罗堡。这个巨大的据点保卫着每年从墨西哥和秘鲁矿山中开采的黄金和白银运送回国的西班牙舰队。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北移,这与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也有不小关系。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21章),使得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规模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够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一般平民需要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迎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

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后者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发挥着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荷兰人在16世纪里,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此前的大西洋贸易一向由携带奢侈品北航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控制,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南行的荷兰人控制了。在这一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塞图巴尔的盐。作为交换,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毛织物。因此,相对于北欧国家勃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言,伊比利亚国家此时也开始像意大利各国一样,从发达社会沦落为落后社会(参见第20章第2部分意大利类似的衰落)。

这些经济上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做后盾,这也可以说明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

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也没有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时间海外制造品市场的扩大促进了西班牙工业的发展,然而,约 1560 年前后工业的发展一停止,长期的衰落也就开始了。

衰落的另一个看似荒谬的原因则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其工资仅略落后于暴涨的物价,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则都被控制得很低。这样一来就将西班牙工业置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飞涨所造成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 2%,但却拥有 95%—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 95%的农民几乎全都是无产者。剩下的 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有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都不能算中产阶级。比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黯然失色。因此,由于贵族蔑视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损于绅士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的确拥有一切优势——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因此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穷困潦倒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里——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 世纪上半世纪西班牙的经济繁荣最终没能维持下去。

经济繁荣的结束使得伊比利亚无法摆脱其传统的落后地位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依附。而这也注定了伊比利亚的殖民地处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首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 90%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大部分制成品。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在法律上严禁外国人参与,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由此一来西班牙商人以自己的名义出口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也就不可避免。此外,外国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言,通过代理人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商会的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了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以下这番抱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这一切,都被外国人轻易而舒适地夺走运回他们自己的祖国。"[2]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终结果是进一步刺激了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却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碍早该实行的基本制度改革。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突然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海湾产油国的情形与当年美洲金银带给伊比利亚国家的效应相类似。

在这些国家,巨额的石油收入都浪费在向工业国购买外国奢侈品。当海湾国家的油田枯竭时,石油收入的流入将会停止,正如美洲金银的流入将会停止一样。届时海湾国家的处境将会比伊比利亚国家更加不利,因为石油枯竭后,海湾国家剩下的将只有黄沙和枯井。

推荐读物

总论欧洲扩张的最佳著作有:J.H. Parry 所著的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Discovery, Exploration and Settelment* 1450—1650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3) 和 *European Reconnaisance: Selected Documents* (Harper & Row, 1968)。G.V. Scammell 所著的 *The World Encompassed: The First European Maritime Empires*, c.800—165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以下解释欧洲扩张的著作反映了印度的视角: K.M. Panikkar 所著的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Harper & Row, 1954); K.N. Chaudhuri 所著的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A.W. Crosby 所著的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6)分析了欧洲扩张引发的致命生物影响。C.R. Boxer 所著的 *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8)论述了欧洲扩张中的宗教因素。

关于葡萄牙的海上和殖民地事业,可参见 B.W. Diffie 所著的 *Prelude to Empire: Portugal Overseas before Henry the Navigato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1963); E. Bradford 所著的 *Southward the Caravels: The story of Henry the Navigato* (Hutchinson, 1961); C.R. Boxer 所著的 *The Portug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Knopf, 1969); G.R. Crone 所著的 *The Discovery of the East* (St. Martin's, 1972)。在对西班牙殖民体系的一般性分析中最好的著作是 C.H. Haring 所著的 *The Spanish Empire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1947); J. Lockhart 和 S.B. Schwart 所著的 *Early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3)。此外还有 C. Gibson 所著的 *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 A History of the Indians of the Valley of Mexico*, 1519—1810 (Stanford University, 1964); J. Descola 所著的 *Daily Life in Colonial Peru* 1710—1820 (Allen & Unwin, 1968); J.H. Parry 所著的 *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 (Knopf, 1966)。论述葡萄牙人在美洲的努力的著作有: G. Freyre 所著的 *Brazil, an Interpretation* (Knopf, 1945); C.R. Boxer 所著的 *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1750: *Growing Pains of a Coloni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3)。

最后,论述伊比利亚衰落根源和过程的著作有:J. Lynch 所著的 *Spain Under the Hapsburgs, Vol. I, Empire and Absolutism*, 1516—1598 (Oxford University, 1964); J.H. Elliott 所著的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6)；R.T. Davies 所著的 *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1501—1621 (Macmillan, 1954)和 *Spain in Decline*，1621—1700 (Macmillan, 1957)是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S.J.和 B.H. Stein 所著的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1970)。

注释

1. Cited by K.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Day, 1953), p.42.
2. Cited by *The New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I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7), p.454.

我希望看到亚当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将地球划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国王弗朗西斯一世

第23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在1600至1763年期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超了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这一进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西北欧从此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和活力的地区。西北欧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某种程度的文化上控制了整个世界，直到1914年为止。它们的做法和制度则成为各民族的典范。

虽然西北欧的世界霸权直到1763年以后才得以实现，但其基础则是在1600至1763年间奠定的。正是在这段时期，英国人获得了他们在印度的第一个立足点，荷兰人将葡萄牙人逐出东印度群岛，西北欧各强国在非洲海岸设立贸易站，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格兰德河上游北美洲的主人，并控制了格兰德河以南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

本章将分析西北欧争得上游的根源以及荷兰、法国和英国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斗争——这一斗争以1763年英国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殖民强国而告终。

一、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海外事业中，西北欧并非从完全的籍籍无名突然就跃居领先地位。如前章所述，基础在中世纪后期就已经打下了——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主要贸易航线也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除去经济优势外，西北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气氛也格外重视经济利益。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的贵族决不蔑视经商事业，他们总是乐于参加任何有可能获利的商业冒险。此外由于北方的阶

级流动性大得多，那里的商人和金融家也经常加入贵族行列。与西班牙的贵族制度造成国内经济衰退相反，西北欧这种宽松的环境大大促进了其经济发展。

最后，西北欧还从其物价—工资—地租变动的不同步中也得到了助益。16、17世纪时，英国的物价上涨了256%，而其工资则仅上涨145%；其地租也远远低于物价。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的三个主要成分——劳动者、地主和企业主——中，企业主在通货膨胀的这几个世纪里获得了极高的利润。这些利润被再投资于开矿冒险事业、工业企业和商业经营，结果使得西北欧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将1550至1650年这一历史时期描述如下："近代世界史上从未有过对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来说如此持久可贵的一个良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1] 近代资本主义在西北欧诞生解释了为什么西北欧国家会领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并支配了世界事务——这一支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西北欧国家自然会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获利的帝国。然而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忍住不去侵入这些帝国的范围。因此，英国人、丹麦人和法国人就转向伊比利亚活动范围之外的北大西洋。1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王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被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的食物。鳕鱼的经常、大量的供应对于一个当时有许多人每年总有一段时间过着忍饥挨饿生活的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还培育了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其后的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活动的海员基本上都是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

西北欧各国决不会只满足于捕获鳕鱼，他们仍在渴望着香料，但是他们也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因此，为了找到一条可以到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毫无成果的探险。他们认为，既然事实已经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以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1553年，一支由休·威洛比爵士和理查德·钱塞勒率领的远征队怀着取道东北航道驶抵中国的明确目的离开英国——他们面对的只是一道冰墙。但是这支远征队却成功地在白海海岸登陆，并与俄国沙皇伊凡四世建立起了直接联系。这一联系导致了为的是能在英国和俄国之间进行直接贸易的莫斯科公司的建立。其他寻找西北通道的企图也都失败了。约翰·戴维斯(1585至1587年间探险)、亨利·哈得孙(1607至1611年间探险)、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间探险)等探险家也都未能撞上好运。但是正如东北方向的探险带来了与俄罗斯人的贸易一样，西北探险家则发现了相互连接、为进入美洲大陆最盛产毛皮的地区提供了一道后门的哈得孙海峡和哈得孙湾。

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北欧人开始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而当时正在西属美洲崭露头角的英国闯入者则试图在和平的、商业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他们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业不能满足其殖民地需求这一点所提供的机会。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两种商品是布匹和黑奴，英国人能生产前者，并能在西非购买到后者。约翰·霍金斯爵士作为英国奴隶贸易的创始人出了名并发了财，因为他很精明，既能捕捉商机，又敢于大胆地抛开法律采取行动。1562 年他作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找到奴隶，再运到伊斯帕尼奥拉（海地）换取兽皮和糖。该项贸易的利润高得惊人，以至于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几名枢密院官员也对他的第二次航行进行了秘密投资。他如法炮制，然后，满载一船白银返回，成为英国的首富。

这种非法贸易遭到了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的强烈抗议。尽管霍金斯是以和平方式用奴隶来交换殖民地商品，但是按照西班牙法律，外国人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一律是非法的，所以这虽然算不上是海盗行径，但肯定是一种侵犯行为。不过霍金斯



图 127　理查德登陆

理查德在白海的霍尔莫格里登陆。

还是于1567年进行了他的第三次航行。但是这次航行却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船队五艘船中的三艘被击沉或捕获，其余两艘分别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在即将沉没的状态下于1569年返抵英国。

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经营，那就必然要通过其他手段来进行。获利的机会对英国人和其他北方人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他们无法抑制自己，更无法将其忘却。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新教的船长们是作为海盗和私掠船船长而不是作为和平但违法的商人前往西属西印度群岛的。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遣无敌舰队侵犯英国时，遇到的最强大的两个对手就是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霍金斯和德雷克使无敌舰队惨遭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无疑也是对其在西印度群岛蒙受灾难的一次甜蜜报复。

同西班牙的正式开战（葡萄牙其时也已卷入）消除了对新教势力的任何抑制性因素。他们大胆公开地闯入伊比利亚帝国——不仅闯入了西班牙的美洲，还闯入了葡萄牙的东方。而且他们愈是侵入就愈是受到鼓励，因为他们发现对手竟然出乎意外地虚弱。荷兰人是最早利用伊比利亚衰落所提供的机会的人。17世纪对荷兰来说将是它的一个"黄金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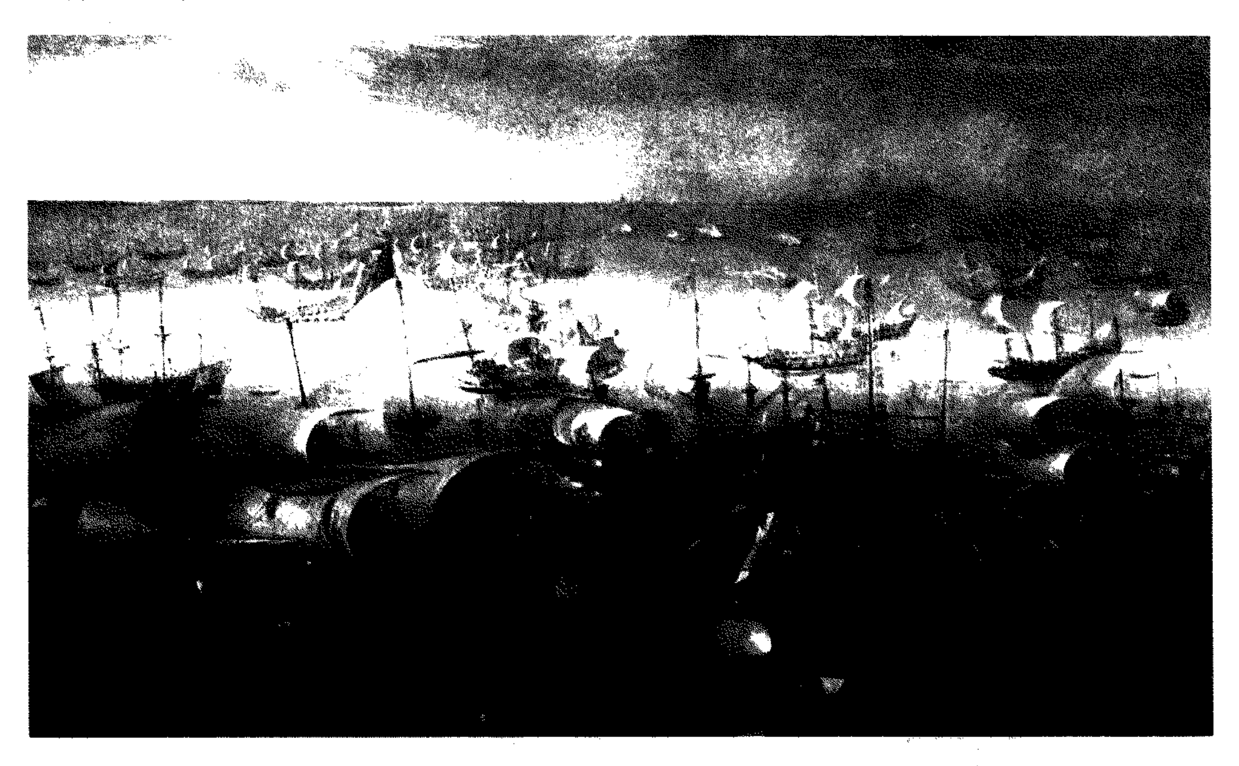


图128 打败无敌舰队

1588年腓力二世派遣大批无敌舰队进攻英国。而英国人则靠天气和荷兰所助打败并摧毁了西班牙舰队。西班牙舰队从此再也未能翻身。

二、荷兰的黄金世纪

17 世纪荷兰的势力和繁荣显著增长，部分地是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使然。荷兰背靠广大的德国内地，位于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一条为北南方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方向，从芬兰湾到英国——交叉的交通枢纽上。沿这些航线运送的商品主要有：比斯开湾的鲱鱼和盐，地中海地区的酒，英国和佛兰德的布匹，瑞典的铜和铁，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亚麻、大麻、木材和木制品。

荷兰人是从承担这些商品的运输开始起步的。荷兰商船队的崛起全靠当地的沿海渔业，他们发明了保存、腌制和烟熏的新方法，并向欧洲各地出口他们的捕获物，以换取谷物、木材和盐。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建立，荷兰人可以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得到帝国殖民地出产的货物，并运销欧洲各地。作为回报，他们则向伊比利亚国家供应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海军补给品。荷兰人用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船来运输货物。这种船造价低廉，但却拥有巨大的容积。此前典型的商船一向都是用笨重的木材来建造，船尾设有可架置火炮的炮座平台，在必要时作军舰用。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宽、船底平、居住舱室有限，因而具有最大的货舱空间，而且极其节省建船材料。这种缓慢丑陋但却便宜宽敞的大轮船是开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兰商船队的主要依靠。

16 世纪末荷兰人开始挑战葡萄牙的东方帝国。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搜集可靠资料，指导航海者找到绕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葡萄牙人为了对这类情报保密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但是他们的航海秘密最终还是被泄漏出去。荷兰人纷纷涌入东方海域。仅 1598 年一年中，远航东方的船队就不少于 5 支，船则有 22 艘。从最初起荷兰人就胜过了葡萄牙人。他们是更好的海员，能够用三桅商船更便宜地运输香料，而且由于他们的工业优于伊比利亚国家的工业，他们的商品也较后者价廉物美。

1602 年，荷兰人将他们的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早在 1600 年时英国人就已组织起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仍然敌不过荷兰人。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要比荷兰公司小得多，而且后来荷兰人还在东印度群岛修筑了一系列要塞。设立据点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条约形成联盟，联盟则又发展成了保护关系。到 17 世纪末，荷兰人直接管理的地区仅有一小块，但已成为荷兰保护国的国家却有很多，它们形成了一个大得多的地区。接着在 18、19 世纪期间荷兰全部并吞了这些保护国，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约 1700 年以后出口到欧洲的香料的价值减少了，不过荷兰人则通过将咖啡树引入东印度群岛发展起了一种新的经济资源。1711 年他们仅收获到 100 磅咖啡，而到 1723 年销售的咖啡就达到了 1200 万磅。这样随着欧洲人养成喝咖啡的爱好，荷兰人也就成了这种外来饮料的主要供应者。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这种种手段在整个

17和18世纪中平均每年可以得到18%的股息。

然而,荷兰人的海外活动也并非仅限于东印度群岛。在环绕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北极海域,荷兰人实际上垄断了捕鲸业。在俄国,他们远远胜过英国的莫斯科公司。此外他们还控制了繁盛的波罗的海贸易,成为西欧最重要的海军补给品——木材、沥青、焦油、制绳索用的大麻以及制风帆帆布用的亚麻——的主要供应者。

荷兰的商船队早在1600年时就拥有10 000艘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荷兰的造船厂机械化程度很高,几乎一天就能生产一条船,但其造船和操作费用却很低廉,所以荷兰船主可以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他们也因之而充当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运输业者。英国人直到18世纪才能在商船运输方面与荷兰人进行竞争。

在美洲,荷兰人于1612年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有利可图但又短命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在荷兰所有的殖民地中最持久的是1652年在南非好望角开拓的一小块殖民地。这里不是一个贸易站,而是一块为了向去往东方途中的船只提供燃料、水和新鲜食物而建立的真正的殖民地。这块殖民地很快就证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它向荷兰船和其他一些船只提供的鲜肉和新鲜蔬菜制服了坏血病,拯救了数千名海员的生命。如今,这些荷兰农民,或称布尔人的后裔占南非300万欧洲人口的五分之三。

在18世纪中,荷兰在经济发展和海外活动方面落在了英国和法国后面。其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英、法两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商船队。另一个原因则是它为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1652至1674年因商业纠纷与英国交战,1667至1713年因路易十四的领土野心而与法国交战——所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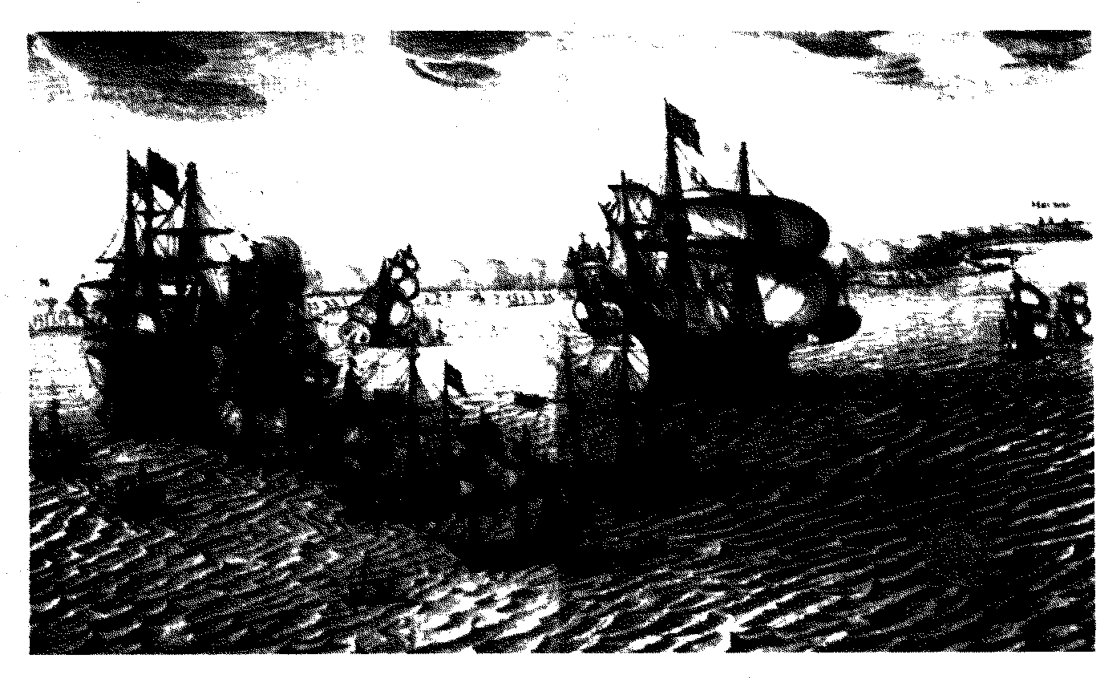


图129 荷兰人俘虏西班牙船只

到1600年时荷兰人已经构成了对西班牙海上优势的严峻挑战。图中荷兰人正在俘虏西班牙的船只。

或许荷兰人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荷兰人缺乏其竞争对手所拥有的资源。法国人拥有众多的人口、繁荣的农业和一个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均有出海口的富裕祖国。英国人也拥有较荷兰人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并享有海岛位置带来的巨大优势——地处海岛使他们无须付出时常遭受入侵的代价。此外，英国人还有其海外殖民地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作后盾，而荷兰人则仅在南非南端有一小块孤立的殖民地。因而英国输出品的价值就从1720年的800万英镑上升到1763年的1900万英镑，法国输出品的价值则由1716年的12 000万里弗尔增长为1789年的50 000万里弗尔。已达到自己顶峰的荷兰人完全不能与英法两国如此大规模的增长相匹敌。归根到底，荷兰在18世纪让位于英国和法国的原因与英、法两国在20世纪让位于美国和苏联的原因如出一辙。



图130　新阿姆斯特丹市容

图中所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市容(发表于1651年)。位于曼哈顿岛尖端的新阿姆斯特丹发展缓慢，只有几十所房屋和风车位于港口之外。图中该市后有欧洲船只，前有印第安人独木舟，暗示着与荷兰殖民地之间贸易的重要性。

三、英、法竞争

18世纪的标志是英法之间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两国面对面地在全世界——北美洲、非洲和印度——竞争。

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大约于同一时间开始建造，都位于大西洋沿海和西印度群岛。那里的土著居民更加稀少、原始，致使英国人和法

国人无法像西班牙人那样靠土著劳动者生活，尽管他们在一些产糖的岛上确是依靠黑奴劳动者。由于找不到贵金属，他们只好靠农业、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养活自己。

北美英属殖民地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主要生产烟草的弗吉尼亚及其紧邻；从事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的新英格兰及其不信奉国教的小片居留地；由于拥有能够带来极大利润的甘蔗种植园而受到最高评价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总的来说，这些英属殖民地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稠密，其人口远远多于法属殖民地人口。它们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其政治上的独立性。每个殖民地都有英国任命的一名总督、一个咨询会议和一个法院系统。同时几乎每个殖民地都还有一个民选的立法议会，它通常与委任的官员们不和。他们与伦敦政府争吵的原因一般在于，后者坚决认为所有殖民地的产品都应用英国船只运往英国。这在皇家官员看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也给了殖民地用自己产品垄断国内市场的权利。然而，殖民地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却由于不能使用更便宜的荷兰船只、不能将产品输往更加有利可图的非英国市场而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图 131 弗吉尼亚的劳工

这幅18世纪的弗吉尼亚香烟标签的右部描绘了一个正在吸烟的印第安人。图的左边是一个黑奴。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白人契约仆役占弗吉尼亚劳工中的绝大多数，但是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劳工结构就开始向黑人奴隶占主导转变。

北美法属殖民地的战略位置非常突出。最初的法国据点于1605年、1608年及1642年分别在阿卡迪亚(即新斯科舍)、魁北克及蒙特利尔建立。法国人以圣劳伦斯

河流域为其开拓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他们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陆水系向西推进到苏必利尔湖，向南推进至俄亥俄河。1682年法国贵族拉萨尔划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宣布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所有，并将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以纪念路易十四。这样一来就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因为18世纪英国王室发出的殖民地特许状大都规定授予"从大海到大海"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地区。显然，每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并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英、法两国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就会发生冲突。不过，最初法国人在土地占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他们的探险者最先开辟了这些地区，然后他们的官员又沿着从圣劳伦斯河到路易斯安那的路径修筑了许多要塞。大西洋沿岸的英属殖民地被有效地从圣劳伦斯湾到墨西哥湾一条巨大的弧形地带所包围。

法国人不仅占有北美洲的制高点，还拥有纪律和团结方面的巨大优势。法属殖民地不存在难以驾驭的民选机构。负责各殖民地防御的总督和处理财政、经济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皆由巴黎任命。这种安排较之摇摇欲坠的英国代议制制度更加灵活有效。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只能请求和怂恿他们的议会采取某种行动——他们几乎无法下达命令，尤其是在他们的薪水基金由议会投票决定之后。而在法属殖民地则是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下达命令，他们的部下则加以执行。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也是近邻。该地区主要的法属殖民地为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英属殖民地则为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巴哈马群岛。这些殖民地作为同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贸易站很有价值，但是最宝贵的东西还是它们的热带作物——糖、烟草和靛青——这些产品补充了法、英两国的经济。

英法两国在印度发生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其在北美洲不相上下。17世纪初英国人被荷兰人逐出东印度群岛后，便退到印度次大陆。到17世纪末他们已在印度营建了四个较大的据点：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西海岸的苏拉特和孟买。1604年法国人就已组织起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它很快就销声匿迹——直到1664年它才重又复兴。到17世纪末法国人才在两个较大的据点——加尔各答附近的金德讷格尔和马德拉斯附近的本地治里——安置下来。

在17世纪中凡是在印度居住、经商的欧洲人都是经过强大的莫卧儿皇帝容许的。要不是他们举止规矩、谦卑地请求享有经商的特权，后者原可能很轻易地就把他们赶进大海。但到18世纪时，由于莫卧儿帝国的崩溃，形势完全逆转了过来。皇帝阿克巴的继承者们对穆斯林大众的迫害，导致了印度教臣民的疏远和混乱。地方统治者趁机开始宣布独立，并建立起世袭的地方王朝。代表模糊的、早期意义上的印度民族主义的马拉塔人，从他们在孟买以南约100英里处的首都萨达拉扩张到离加尔各答不到200英里的地方。中央政权的瓦解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使它们得以从纯粹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地区霸主和纳贡人。它们修筑要塞、供养士兵、铸造货币并与周围的印度统治者缔结条约，因为印度已经不存在能够阻止他们扩展影响的中央政权。

四、英国的胜利

当时英、法两国在印度和南北美洲的帝国情况就是如此。这两个帝国在17、18世纪中的争斗最终以英国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其原因之一在于，法国更感兴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欧洲霸权。从16世纪开始，法国的波旁王朝就把其主要的注意力置于占有意大利的领土和针对奥地利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中。

英国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国人较法国人要多得多。到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的狭窄山麓的英国移民有30万人，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广大地区的法国人则仅有2万人。美国革命爆发时，英属殖民地的人口不少于200万人。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763年英国对法国的胜利以及20年后美利坚共和国对英国的胜利。



图132　英军攻占魁北克

在沃尔夫将军的指挥下，英国军队于1759年9月13日攻占魁北克。

英法两国的竞争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1763年英国大获全胜为止。在这期间一共爆发了接连四次英法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有两个方面：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欧洲方面的战争是围绕王朝野心、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野心进行的。海外方面的战争则起因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印度的势力均衡、美洲

相互冲突的领土要求、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条件以及对世界商船航线的控制。由于这些战争的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迥然不同，每次战争都是在欧洲以一名字相称，在美洲则有另一名称。所以这些战争载入史册的名称就是：奥洛斯堡联盟之战或威廉王之战(1689—1697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或安妮女王之战(1701—1713 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或乔治王之战(1740—1748 年)，七年战争或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 年)。

前三次战争的最后结果是，英国人获得了新斯科舍、纽芬兰和哈得孙湾地区。但是，这些征服也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法国人是否会保住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而把英国人限制在大西洋沿海地区呢？这一问题由第四次战争作了最后的回答——第四次战争也解决了印度的前途问题。

这场决战被称为七年战争，因为它在欧洲从 1756 至 1763 年进行了七年。1757 年战争发生重大转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威廉·皮特进入了英国内阁。皮特将财力集中于海军和殖民地，同时资助在欧洲继续作战的同盟者普鲁士的腓特烈。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战略是在德意志平原上争取到一个帝国。他加强了海军，清除了海上的法国人，而美洲殖民者则为他的领导所鼓舞，加入英国正规军，组成了一支大约 5 万人的军队。这支庞大的军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法国的堡垒。战争的高潮随着围攻魁北克而到来。魁北克是法属加拿大的中心，是矗立在圣劳伦斯河两岸的一个天然的大堡垒。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军司令官、将军詹姆斯·沃尔夫和法军司令官、



图 133　雅加达的源起

荷兰人在东印度地区的巴塔维尔建立了一个主要的贸易基地。这座被他们称为巴塔维尔的城市就是今日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将军蒙卡尔姆均告阵亡,但最后还是英国老兵们获得了胜利。1759年9月魁北克投降。第二年蒙特利尔的失陷则宣告了美洲法国殖民帝国的终结。

在印度英国人同样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里起决定性因素的又是海军优势:英国能从欧洲运来军队、金钱及供应品,同时又能阻止法国这样做。此外英国人还得到了罗伯特·克莱武的鼓舞人心的领导。克莱武是一名多年前职员出身的公司官员,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和理解印度政治的才能。1756年他一得知欧洲爆发战争就立即向孟加拉进军。在靠与欧洲通商致富的印度商人的支持下,克莱武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打败了亲法国的穆斯林统治者。他把自己的傀儡安插在王位上,并为自己和公司勒索了巨额赔款。在战争的余下阶段中,英国海军使克莱武能够随意地将军队在印度各地区之间调动,同时他还切断了法国各据点之间以及它们与法国之间的联系。1761年,随着法国交出其在本地治里的主要根据地,战争结束。

七年战争的海外方面是由美洲的魁北克和印度的本地治里的陷落决定的。但是欧洲方面的战争却一直拖延到1763年即交战国缔结《巴黎和约》时。在美洲法属殖民地中,法国仅保有南美洲的圭亚那、纽芬兰沿海无足轻重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以及包括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的少数岛屿。这样英国就从法国手中得到了整个圣劳伦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西班牙由于在战争晚期站在法国一边参战,因此它也被迫将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作为补偿,法国把路易斯安那西部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让给西班牙。在印度,法国人保留了他们在本地治里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设施——事务所、货栈和码头,但却被禁止修筑防御工事或与印度王公缔结政治联盟。这也就是说,法国人是作为商人而不是帝国建立者回到印度的。

在签订《巴黎和约》时,英国政治领袖霍勒斯·沃波尔评论道:"烧掉你们的希腊和罗马书籍——有关微不足道的人们的历史吧。"这句颇有远见卓识的评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和平解决方案长远的、世界性的含义。就欧洲而论,条约允许普鲁士仍占有西里西亚,从而成为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对手。然而对世界历史而言,更重要的事实则是法国在18世纪丢掉了北美洲和印度。这意味着格兰德河以北的美洲此后将要发展成为讲英语的世界的一部分。

法国被逐出印度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意味着英国人将在那里代替莫卧儿人。英国人一旦在德里安顿下来,就完全走上了通往世界帝国和世界主宰的道路。而也正是因为有了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的次大陆所提供的这块无与伦比的根据地,英国人才能在19世纪扩张到南亚其他地区,然后扩张到遥远的东亚。由于上述原因,1763年条约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其影响一直波及到今天。

推荐读物

总论欧洲海外扩张的著作请参见第 24 章的书目。论述 18 世纪时期的著作有 J.H. Parry 的 *Trade and Dominion: The Overseas European Empir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raeger, 1971); W. L. Dorn 所著的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63 (Harper & Row, 1940)。论述荷兰海外活动的著作有 C.R. Boxer 所著的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Knopf, 1965); D.W. Davies 所著的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 (Nijhoff, 1961); G. Musselman 所著的 *The Cradle of Colonialism* (Yale University, 1963)。N. Steensgaard 所著的 *The Asian Trade Reve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Universtiy of Chicago, 1974)和 H. Furber 所著的 *Rivival Empire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6)分析了荷兰人在亚洲取代葡萄牙人的原因。

两本总论法国海外活动的著作有 H.I. Priestly 所著的 *France Overseas Through the Old Regimes: A Study of European Expansion* (Prentice Hall, 1939);更专门的著作有:N. M. Crouse 所著的 *French Pioneers in the West Indies*, 1624—1664 (Columbia University, 1943)和 *The French Struggle for the West Indies*, 1665—1713 (Columbia University, 1943); G. M. Wrong 所著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France*, 2 vols (Macmilllan, 1928); S. P. Sen 所著的 *The French in India* (Mukhopadhyay, 1958)。

总论英国海外活动的杰作是: C.E. Carrington 所著的 *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0)和 W.B. Willcox 所著的 *Star of Empire: A Study of Britain as a World Power*, 1485—1945 (Knopf, 1950)。描述殖民战争的著作有: E.P. Hamilton 所著的 *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s: The Story of Battles and Forts in the Wilderness* (Doubleday, 1962)。F. Parkman 所著的 *Montcalm and Wolfe*, 2 vols (Boston, 1884)是描述美洲七年战争中最富戏剧性的阶段的经典之作。

注释

1. Cited by L. Huberman, *Man's Worldly Goods* (Harper & Row, 1936), p.103.

> *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上，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一直是疆界，即掌握一个奔放不羁的国家的自然资源的斗争；这个国家由于俄罗斯人不断的迁移和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融合，已经扩张到整个一块大陆里。*
>
> ——B.H.萨姆纳，《俄罗斯简史》

第24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当西欧人在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时，俄罗斯人则正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一片片广袤陆地的控制，是可以与美国向太平洋沿岸扩张的西进运动相媲美的一篇传奇史诗。实际上，不断向前推进的疆界给俄罗斯人的性格和俄罗斯制度留下了如同它给美国人所留下的同样持久的印记。其实在欧洲各民族中，并不只是俄罗斯人为一条疆界所影响。中世纪时期，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见第21章第1节)。欧洲各民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将他们移居的界线沿波罗的海海岸、沿多瑙河向东推进了几个世纪。但是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这种内部的拓殖不再处于主导地位，海外殖民取而代之——西欧诸民族开始把他们的精力集中于开辟和勘探新世界的边远地区。与之相反，俄罗斯人则继续由陆路扩张到从其家门口向外伸展的辽阔的欧洲平原上去。这一伟大的事业在若干世纪里迅速推进，直到1895年中亚的最后一个穆斯林汗国被征服为止。因此，疆界成为贯穿整个俄罗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像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那样，并不出人意料。本章将探讨俄罗斯向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扩张的性质和过程。

一、俄罗斯扩张的地理环境

为了理解俄罗斯人横越欧亚平原的惊人扩张，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些平原的地理情况。打开地图，打眼一看，首先看到的就是它们那令人惊愕的比例(见地图26)。

俄罗斯的疆域占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的总和还大。俄罗斯广袤陆地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地形上的惊人的一致。它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块平坦的平原区。虽然南北走向的乌拉尔山脉的确纵贯这些平原，而且人们通常也都认为它把俄罗斯分成了欧洲俄罗斯和亚洲俄罗斯两部分，但事实却是乌拉尔山脉只是一道平均高度仅2000英尺、狭长的、久经销蚀的山脉，而且它们逶迤南下到北纬51度处便不再延伸，留下了一块伸展到里海的、宽阔平坦的沙漠区为缺口。这种地形上的一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人能够如此迅速地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

组成今天大部分俄罗斯的欧亚平原被一条从黑海伸展到太平洋的天然边界所围绕。这条边界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山脉、沙漠和内海组成——它起始于西面的高加索山脉，往东依次为里海、乌斯秋尔特沙漠、咸海、克孜勒库姆沙漠、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山区、天山山脉、戈壁沙漠，最后则是向东延伸至太平洋的大兴安岭。围绕欧亚平原的山脉圈挡住了来自太平洋的湿风和来自印度洋的温暖季风，这有助于形成中亚的沙漠气候和西伯利亚寒冷、干燥的气候。西起波罗的海、东迄太平洋的整个辽阔的西伯利亚实际上有着同样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短暂炎热，冬季漫长酷寒。气候的一致与地形的一致一样促进了俄罗斯向东的扩张，因为边疆开发者在东西宽度达5 000英里的整个平原区感到同样的舒适。但是中亚沙漠地区看起来就显得有些陌生、可怕。这些沙漠被军事上强大的穆斯林汗国占据着，迥然有别于西伯利亚软弱的部落。结果，俄罗斯人直到他们抵达更北面的太平洋已有250年后才控制了中亚沙漠地带。

俄罗斯的扩张不仅受到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还受到河流系统的影响。由于地形平坦，俄罗斯的河流普遍又长又宽，没有湍流的阻碍，因而它们是非常宝贵的贸易、殖民和征服的通路和交通工具。乌拉尔山脉以西有许多著名的河流：流入波罗的海的西德维纳河、向南流入黑海的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和顿河以及先往东再折向南流入里海的伏尔加河。乌拉尔山脉以东灌溉西伯利亚平原的四大河流是西面的鄂毕河、中央的叶尼塞河、东北面的勒拿河和东南面的阿穆尔河。由于整个西伯利亚从巨大的西藏高原往下倾斜，这些河流中的前三条都向北流入北冰洋，而第四条则向东流入太平洋。这些河流和它们的许多支流连在一起，提供了一张一直伸展到太平洋的天然的交通干线网。这样俄罗斯的皮毛商人也就能够通过水陆联运东进，正如美洲的英法皮毛商人沿着类似的河流西进到太平洋一样。

影响俄罗斯人扩张速度和进程的最后一个地理因素是存在于俄罗斯各地区的土壤—植被带。有四种主要的土壤—植被带并行横穿俄罗斯东西（见地图27）。在遥远的北方，沿北冰洋海岸是荒芜的冻土带，全年除去夏季6至8个星期的生长期外一直封冻。冰土带的南面为泰加林带即森林带，它是四个植被区中最大的一个，宽600至1300英里，长4600英里，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1/5。

在森林带的南部边缘，森林渐渐稀疏，树木渐渐矮小，直到完全让位于开阔、无树木的大草原。在这里，可以见到由数千年的腐草形成的肥沃黑土。如今这里是俄

罗斯的腹地,但在过去的很多个世纪中,它却一直是苦难和灾祸的发源地。大草原曾经是欧亚大陆中部骑马掳掠的游牧民族的老窝。当这些游牧民族足够强大时,他们就沿着抵抗最少的路线出击——往往向西侵入中欧或者向东侵入中国。相比之下他们对东欧脆弱的俄罗斯人的进攻要更加频繁。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森林区的斯拉夫农民与大草原上的亚洲游牧民之间的连续不断的冲突。最初游牧民占了上风,结果是蒙古人对俄罗斯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但最终还是森林中的斯拉夫居民变得更强大,它们不仅赢得了自己的独立,还扩张到了欧亚平原以外的地方。

第四个区域即面积最小的沙漠区,它从中国开始,但向西仅伸展到里海。我们已经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不易进入、恶劣的气候和土著民族的军事才能——沙漠区直到 19 世纪末叶才为俄罗斯的扩张浪潮所吞没。

二、俄罗斯的早期扩张

大约在 1500 年前,俄罗斯人从他们在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涅曼河和德维纳河上游的发源地开始东进。他们以巨大的弧形扩散开,在辽阔平原的召唤下前进到北面的北冰洋沿岸、南面的黑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及更远的地方。由于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无法养活稠密的人口,因此他们的家宅非常分散,村落也很小,没有集中的村庄或城市。当时出现的少数城镇都是作为贸易中心沿着主要的水路发展起来的。位于连接南北交通的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控制东西贸易的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的情况就正是如此。长途贸易为公元 9 世纪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基辅是这个国家的中心,但是这个国家却仍然只是水路沿岸各公国的一个松散联盟。基辅自身由于坐落在森林区和大草原的交界处,极易受到侵犯,因而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与游牧骑兵不断地进行斗争。俄罗斯殖民者也无法移居到基辅以南和以东 150 英里外的地方,因为游牧民侵略的威胁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时时悬挂在他们头上。

1237 年这把剑终于降临了:蒙古人在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之后同样扫荡了俄罗斯地区。蒙古人接着又毁灭性地扫荡了中欧,一直推抵意大利和法国的大门口。然后他们又自动撤退,在欧洲仅维持了俄罗斯地区。但是蒙古人延伸到四面八方的庞大帝国作为一个统一体却很短命。它分裂成几个地区,其中所谓的金帐汗国包括了俄罗斯地区。金帐汗国的首都,亦即其后两世纪的俄罗斯首都,是位于今天伏尔加格勒附近的萨莱。就这样,森林和大草原之间的古老斗争随着大草原及其游牧民族的胜利而被决定性地解决了。

此时俄罗斯人交出了他们在大草原上的一些小飞地,撤回到森林深处。在那里,他们只要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纳贡,就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渐渐地俄罗斯人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发展起了一个新的民族中心——坐落在远离危险

大草原的森林深处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除了不易为游牧民接近外还具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由于许多大河流经莫斯科地区时相互几乎交叉，所以莫斯科能够通过内陆水系得益。另一个有利条件是公国的一代代统治者爱和平、尚俭朴、工心计。这些统治者耐心而冷酷地增加他们的领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14世纪刚开始时公国的面积大约为500平方英里，而到15世纪中叶时其面积就已增长到15 000平方英里。一个世纪后，即伊凡雷帝统治期间（1533—1584年在位），所有的俄罗斯公国都已被纳入莫斯科的统治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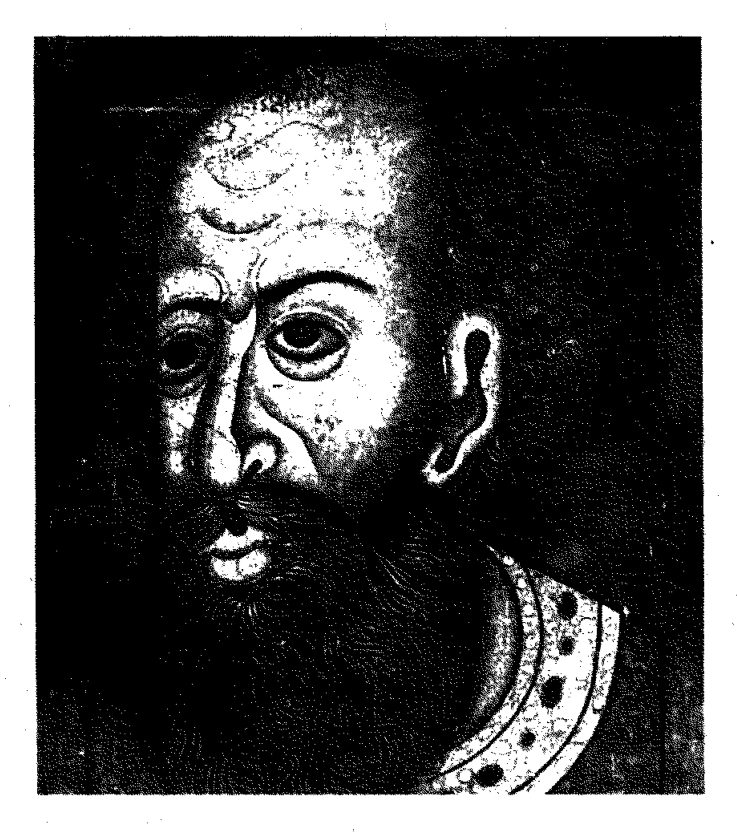


图134 伊凡大帝

人称"令人恐惧的伊凡"的伊凡大帝。

"俄罗斯土地的聚集"完全改变了俄罗斯人和蒙古人（现在更通常被称作鞑靼人）之间的均势。鞑靼人原先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他们内部团结一致，骑兵部队行动迅速，军事上更先进，这与内讧频繁的基辅国家迥然相异。然而到16世纪时，俄罗斯人已经统一在莫斯科之下，而金帐汗国则除去在乌拉尔山脉东面的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汗国外，还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这三个敌对的国家。此外，俄罗斯人的军事技术也正在向前发展，因为他们能够从西欧所取得的尤其是火枪和火炮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得益。凭借军事优势，俄罗斯人得以占领整个喀山汗国。他们顺着伏尔加河而下，扫荡了该河流域地区，并于1556年很轻易地就攻克了阿斯特拉罕。为了巩固占领地，俄罗斯人沿着伏尔加河岸修建了一系列设防据点，一直修到位于阿斯特拉罕的伏尔加河河口处。这样俄罗斯人也就成为了巨大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主人，并抵达了南面的里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此时，俄罗斯人向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的另一侧进行无限扩张的道路也随之而敞开了（见地图26）。

三、征服西伯利亚

虽然俄罗斯人的胜利使得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相继消亡，但是克里米亚和乌拉尔山脉另一侧的鞑靼人则仍旧保持独立，并不断袭扰俄罗斯殖民者。由于本章后面所要讨论的种种原因，俄罗斯人在 18 世纪末叶以前不得不忍受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劫掠。不过他们能轻易地就消灭了西伯利亚汗国，并从此开始了其面向太平洋的史诗般的进军。

翻越乌拉尔山脉和征服西伯利亚的主要是豪爽能干、被称为哥萨克人的边疆开发者。这些人与美国西部的边疆开发者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躲避农奴制的束缚而逃离俄罗斯或波兰的农民。他们的避难所是南面荒芜的草原区，在那里他们成为猎人、渔夫和畜牧者。正如美国的边疆开发者变为半印第安人一样，他们也变成了半鞑靼人。他们热爱自由、崇尚平等，但却又横蛮任性、



图 135　俄罗斯骑兵

征服了俄罗斯东部庞大领土的俄罗斯骑兵的装扮。

喜欢劫掠——只要看上去有利可图,他们随时都会乐意去当土匪和强盗。

这种边疆环境的一个典型产物就是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他21岁时因为盗马被判处死刑而逃到伏尔加河,成为河上一伙强盗的首领。他不加区别地劫掠俄罗斯船只和波斯商队,直到政府军队前来围剿。

此时强盗叶尔马克表现出了一个庞大帝国缔造者的品质。先前皮萨罗和科尔特斯在美洲为西班牙所做的事,他则在西伯利亚为俄罗斯做到了。叶尔马克凭借着征服者的大胆,认定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1581年9月1日,他率领840人出发,深入古楚汗的本土向他发动进攻。同西班牙征服者一样,叶尔马克也享有武器先进的巨大优势。他充分配备了火枪和火炮,并在激烈的战斗之后占据了古楚汗的首都锡比尔。俄罗斯人将这座都城的名字赋予了乌拉尔山脉以东的整个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就开始被称为锡比尔,即英语中的西伯利亚。通向太平洋的路就此洞开。



图136 西伯利亚的部落居民

西伯利亚的部落居民。他们依靠驯鹿的雪橇旅行。图的背景是一座俄罗斯城堡。

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是一个非凡成就。同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也是以小得惊人的力量就在短短几年中赢得了一个庞大帝国。他们的推进速度令人惊愕。叶尔马克在1581至1584年间出征,当时沃尔特·雷利爵士也于

1584 年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厄诺克岛登陆。到 1637 年为止俄罗斯人已在半个世纪里到达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其跨越的距离比起美国的太平洋岸至大西洋岸间的距离多了一半，而英国殖民者在这一期间则还没有翻越到阿勒格尼山脉的另一侧。

俄罗斯人迅速推进的原因可以有各种解释。就像我们已知的那样，气候、地形、植被和河流系统均有利于入侵者。而各土著民族则由于其人数少、武器差、组织涣散而处于不利地位。此外，还应考虑到哥萨克的毅力和勇气；他们跟法属加拿大的非法猎取毛皮者一样，在荒原地带忍受了极大的困苦和危险。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毛皮”——正是黑貂皮引诱着他们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连续不断地东进。



图 137　西伯利亚猎人

经过俄罗斯的扩张之后，西伯利亚的猎人已经为数不多了。这是 1706 年发现的一个西伯利亚猎人。

哥萨克人一边往前推进一边修筑类似于美洲边远地区的碉堡的设防据点或要塞，来保持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他们从锡比尔推进到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并沿着勒拿河于 1645 年到达北冰洋岸。两年后他们又行抵太平洋岸，在那里建立了鄂霍茨克要塞。

至此，俄罗斯人还未曾遇到过任何能够阻挡他们的力量。然而当他们继续向前推进到阿穆尔河流域时，强大的对手出现了。他们碰到了当时正值鼎盛的中华帝国的前哨基地(见第 19 章)。饥饿驱使俄罗斯人来到阿穆尔河流域。严寒的北方出产毛皮而非粮食，而欧洲俄罗斯的谷仓则仿佛是在另一颗行星上。因此俄罗斯人满怀希望——向南折到阿穆尔河流域——据土著传说那里土壤肥沃、长满金黄色的谷物，是一块极好的地方。

1643 到 1644 年间哥萨克瓦西里·波雅尔科夫顺阿穆尔河而下。继他之后又有一连串冒险家进入阿穆尔河流域。他们攻占了阿尔巴津城，修筑了一系列要塞，并以典型的哥萨克方式进行屠戮抢掠。他们在中国边境犯下的这些暴行最终惹怒了中国皇帝，1658 年他派出一支远征队北伐。中国人夺回阿尔巴津，把俄罗斯人从整

个阿穆尔河流域驱赶出去。在经过许多场小型战役之后，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1689年8月27日)。由于边界确立在沿阿穆尔河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所以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从争议流域地区撤走。作为回报，第四条条款授予俄罗斯人以商业特权；该条款规定，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地越过边界、不受干涉地从事贸易。在随后的年代中发展起的由商队进行的贸易，包括了俄罗斯人用来交换茶叶的黄金和毛皮。俄罗斯人正是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其日后的民族饮料。俄罗斯人很快就成为甚至比英国人更爱喝茶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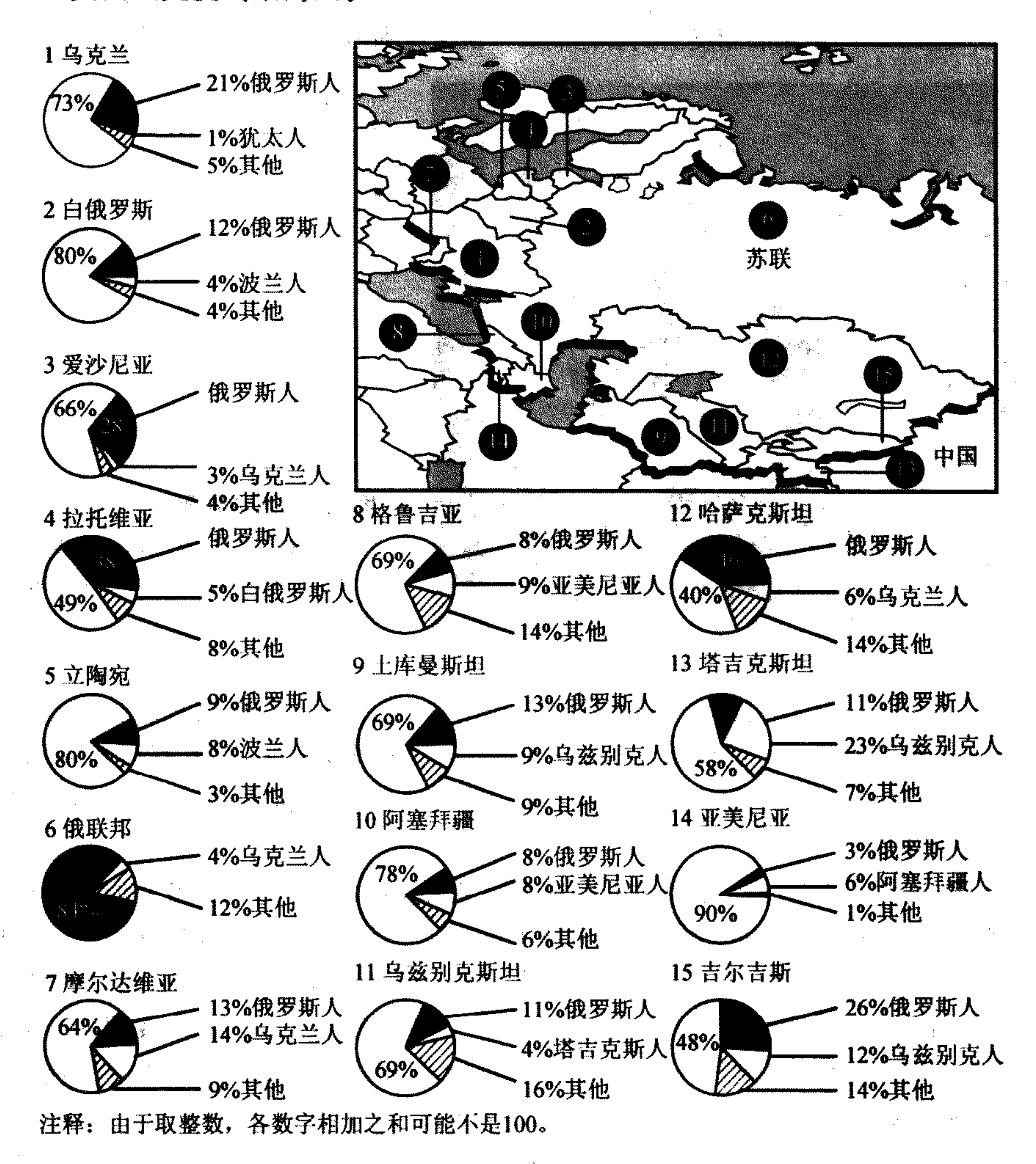


图138 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构成

这幅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构成图显示，在每个加盟共和国内，各个民族都保持了数量上的优势。因此，它们能在苏联为独联体取代时要求并赢得独立。(《洛杉矶时报》1990年1月28日)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罗斯人在亚洲扩张的第一阶段终于结束。在接下来的 170 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规定，停留在阿穆尔河流域以外地区。他们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已经比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的时代时强大得多，而中国人则相对地衰弱了。

四、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和发展

在整个 17 世纪里毛皮贸易一直是西伯利亚的支配产业。政府是主要的毛皮交易商，而毛皮则是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政府向土著收取的贡物或称“税”是皮毛，向俄罗斯的猎兽人和商人征收 10% 的税也要以最好的毛皮缴纳，另外它还保留了购买土著和俄罗斯人所获得的最好的毛皮的权利。到 1586 年为止国库已从上述各种来源收取了 20 万张黑貂皮、1 万张黑狐皮、50 万张松鼠皮以及许多海狸皮和貂皮。此外，政府还对毛皮方面的对外贸易实行垄断，从而获利丰厚。据估计，17 世纪中叶从西伯利亚毛皮中得到的岁入占国家总收入的 7% 到 30%。有位研究这个问题的杰出学者下结论说：“政府从皮毛贸易中支付掉它在西伯利亚的行政开支后仍保有大量盈余，并使国家增加了一块广阔的地区”。[1]

穿越西伯利亚的感想

1908 年一个年轻的俄国外交官由铁路穿越西伯利亚前往驻北京使馆。他的感想表明，西伯利亚是一个国家并且是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

在我赶赴北京的途中，我不得不穿越西伯利亚全境、满洲里和北部中国。穿越西伯利亚的旅行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你是初次来到西伯利亚时尤其如此。俄国的幅员之辽阔令人惊叹。经过一天、一个星期、十天的旅行，你依然在俄国境内。除了乌拉尔山脉和贝加尔湖畔的一列山脉之外这个国家完全是一片坦途。

当你离开俄国的欧洲部分之后，人口就开始变得稀少了，旅途中一小时一小时地看不到任何村庄和居民。只是在车站附近有几幢房屋。一般来说，当一辆快车到站之后，所有的当地人都会跑来注视着车上的旅客。尤其是在晚上，灯火把列车映照得光辉灿烂，车厢中隐约可见来自上海等远东港口城市的居民的优雅身形。这些旅行者在当地人眼中简直是天外来客。这些穿着皮毛服装的人物会在这些注定要在这些悲惨的车站中度过余生的人们心中激起多少嫉妒和不平啊！我想像一个尚未失去梦想能力的女孩等待在车站的月台之上。她听到了快车来临的声响，看见装饰豪华的列车徐徐驶入。列车在站内停靠五分钟。如同来自蓬莱仙境的旅客鱼贯下

车，跳上月台，在这里相互打趣，放声大笑。又是一声汽笛，列车载着旅客消失了，黑暗、空虚和沉闷又笼罩了站台。

老天真不公平，有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奢华地点之间不断移动，而另一些人却必须悲惨地滞留在一些被人遗忘的地方。毫无疑问，这将引起愤怒和不满。我坚信经过西伯利亚的列车在唤醒西伯利亚居民、从而加速革命的到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广漠无垠的空间和荒无人烟的景象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因此乘客们宁愿以用餐、饮茶和打扑克来消磨时间……

* *The Memoirs of Dmitrii Ivanovich Abrikossow*, MS, 1, 191—194, a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A. Lensen.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rchive of Russia and East European History and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在18世纪中商人和猎兽人开始让位于定居殖民者。大部分定居的移民都是为了逃避债权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农奴制的束缚而自愿移居到那里的农民。16、17世纪在欧洲俄罗斯得到发展并传播开来的农奴制从未在西伯利亚生根，这一点极其重要。原因似乎在于，农奴制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国家行使职能必不可少的贵族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贵族并没有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因而西伯利亚也就逃脱了贵族，从而也逃脱了农奴制的压迫。到1763年时西伯利亚人口增长的情况可由以下数字得到说明：

	土著	俄罗斯人和外国人	总数
1622年	173 000	23 000	196 000
1662年	288 000	105 000	393 000
1709年	200 000	229 227	429 227
1763年	260 000	420 000	680 000

十分重要的是，到1763年时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仅为42万，而北美英属13个殖民地的人口那时却已上升到150万至200万之间，大约为前者的四倍。这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先前在进行探险和征服时速度快得多，如今在移居殖民地时速度却又慢得多。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西伯利亚只能从俄罗斯获得移民，而美洲的殖民者却是从欧洲好几个国家而来。而且更重要的是，美洲对想要殖民的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西伯利亚的气候条件更类似于加拿大的气候条件。到1914年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大致相同——加拿大800万人、西伯利亚900万人——并不是偶然的，而面积小于加拿大或西伯利亚的美国的人口至1914年却已增长到1亿。

五、征服乌克兰

上文已经提到，16世纪中叶伊凡雷帝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还留下了两

个独立的汗国——南面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汗国和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鞑靼人汗国。后者在短短几年中为叶尔马克及其后继者所征服。但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则一直坚持到 18 世纪末。他们得以幸存的一个原因是享有奥斯曼帝国的强有力支持。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却被叶卡捷琳娜女皇打败，并被迫于 1792 年接受了《雅西条约》。这一条约使俄罗斯获得了东起库班河西至第聂伯河的整个黑海北岸。

整个乌克兰此时都已处在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森林终于战胜了大草原。只有中亚的沙漠地区仍在勉力支撑，但它也注定要在下一世纪受到莫斯科的统治。就这样，一个东欧的小公国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之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拥有除原来的斯拉夫人以外几十个少数民族。而且直到 1917 年这个国家仍是沙皇帝国。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这个国家成为苏联，1991 年苏联解体后它被独联体所取代。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的第 44 章中谈到这一问题。

尽管被沙皇和苏联统治了数个世纪，苏联的几十个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了他们独特的认同感，因此他们才能在 1991 年苏联解体时建立起独立国家。相比之下，组成美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和俄罗斯一样多，但他们却并没有要求独立。为什么在这两个国家会有这种根本的不同呢？

一种解释是，苏联是一个"民族的马赛克"，而美国则是一个"民族的熔炉"。之所以说苏联是一个马赛克，是因为几个世纪之前，正如上面谈到的，俄罗斯开始一路西进到太平洋，征服他们的邻居，然后把他们组合成一个帝国，这就像将很多不同颜色的玻璃拚在一起，组成一个马赛克。正如在马赛克里的玻璃都保留原来的颜色一样，沙皇—苏联马赛克里的各民族也都保留了他们的特性。1991 年马赛克破碎成为独立的国家。

美国也在西进到太平洋的过程中征服了很多印第安部落，但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印第安人人数远远比乌拉尔山和太平洋之间欧亚大陆上的人要少的多。这样美国人就可以将这些印第安人赶到为数不多的几个保留地中去。而这也就为全世界成百万的人移民到空旷的美国扫清了道路。在那些土地上，移民"混合"了起来，以至于今天很多不同民族的后裔常常生活在一个美国城市的街区或一个公寓里，成为邻居，而不是整个共和国包括全部或大部分某个民族，像前苏联的 15 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熔炉中的各个元素(墨西哥裔、朝鲜裔、华裔、日尔曼裔、非洲裔等)没有要求从美国独立或自治而前苏联中的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以及各个穆斯林种族集团却都要求独立的原因。第 448 页苏联共和国的民族构成图中提供的统计数字也说明了为什么苏联像一个马赛克解体了，而美国则以熔炉的形式生存了下来。

推荐读物

总论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著作有：F. A. Golder 所著的 *Rus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 (Clark, 1914)；R. J. Kerner 所著的 *The Urge to the Sea*：

The Course of Russi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nia, 1942); G.A. Sensen 编辑的 *Russian's Eastward Expansion in the North*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5); L.H. Neatby 所著的 *Discovery in Russian and Siberian Waters* (Ohio Universtiy, 1973)。

描述西伯利亚历史某一特定阶段的著作有: D.W. Treadgold 所著的 *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7); R.H. Fisher 所著的 *The Russsian Fur Trade*, 1550—17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43); G.V. Lantzeff 所著的 *Siber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43), V.Chen 所著的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ijhoff, 1966); A.S. Donnelly 所著的 *The Conquest of Bashkiria*, 1552—1740 (Yale University, 1968); JR. Gibson 所著的 *Feeding the Russian Fur Trade: Provisionment of the Okhotsk Seaboard and the Kamchatka Peninsul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9)。

注释

1. R.J. Kerner, *The Urge to the Se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42), p.86.

美洲的发现……确实带来了一场最实质性的变化。由于美洲为欧洲生产的全部日用品提供了一个新的和异常广阔的市场，这才使得社会分工的细化和艺术的进步成为可能——它们在欧洲古老经济环境下永远也不会发生……在这种意义上新大陆出产的银器也就成了交换的主要商品，通过它这两个边远部分的贸易往来得以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这两个原本相距遥远的大陆在很大部分上也是由此而被联系到了一起。

——亚当·斯密

第25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阶段的来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凭借其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先地位崛起为全球霸主。而在这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全球性的关联自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加紧密起来。因此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这些岁月也就构成了从公元1500年以前各地区孤立的时代到19世纪欧洲夺取世界霸权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而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在各领域发展起来的全球性关联的确切性质和程度（见地图28）。

一、新的全球性视野

欧洲海外和陆上扩张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大陆或一个半球。整个地球的形状首次被确定和绘入地图（见地图25）。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带头从事越洋探险的西欧人进行

的。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初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以前，欧洲人所掌握的准确知识仅限于北非和中东。他们关于印度的知识是模糊的，关于中亚、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识则更加模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真实存在当然是未曾想到过的，更不用说南极洲的存在了。



图139 狗人

根据马可·波罗的报告描绘的安达曼岛居民的图景。马可·波罗称他们的头部、眼睛和牙齿"就像狗的一样"。

但到1763年时情形就已迥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为人们所了解，虽然了解的详细程度有所不同。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经超出了海岸线之外：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非常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在格兰德河以北，西班牙人已经勘探了很多地区，徒然地寻找着黄金和传说中的城市，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利用独木舟和印第安人所了解的河流和湖泊路线在更北的地区漫游。

不过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则仍有大半未被探明；虽然澳大利亚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它在整体上却几乎尚未为人们所知。同样，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内地基本上也仍是一片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世纪马可·波罗的记叙仍是关于中亚知识的主要来源。总之，欧洲人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经获得了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在下一时期中，他们将侵入几块大陆的内地，并将探察南、北极地区。

二、人类和动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人的发现不仅带来了新的全球性视野，还导致了各种族在全球的重新分布。实际上，在公元 1500 年前一直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种族隔离现象。尼格罗人种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数岛屿上，蒙古人种聚居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人种集聚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不过今天这种格局已经彻底改变，其改变甚至达到了一半非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的程度。到 1763 年时，截然不同的种族分布格局已经清晰可辨。在亚洲，俄罗斯人开始慢慢越过乌拉尔山脉，迁徙到西伯利亚。种族构成方面的最大变化是向南北美洲的移民——欧洲人是自愿的，非洲人则是被迫的。

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迁移使得南北美洲从一个纯粹是蒙古种人的大陆变成了一个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黑人的迁移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叶，使得奴隶的总数达到了 1000 万左右。而欧洲移民的人数则也一直在稳步增长，它在 20 世纪初因每年有近 100 万人的到来而达到很高的水平。最终的结果则是，如今在美洲，人数最多的是白种人，明显占少数的人种按其从多到少的顺序依次为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黑白混血儿(见地图 29)。

人们对由于某些种族的人口减少和迁移而引起的新的世界种族格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它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其极为重大的意义也就被普遍忽视了。在直至 1763 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的情况是，欧洲人要求占有广阔的新地区，并在下



图 140　西班牙人入侵的岩画

印第安艺术家绘在亚利桑那州 del Muerto 峡谷的石壁上的图画记录了西班牙骑兵到来的图景。马是西班牙卖给印第安人的几种驯化过的动物中的一种。

一世纪向这些地区移民——不仅是南北美洲，还有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假设当时最先到达并拓殖人口稀少的大陆的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重绘世界种族地图了。而要是果真如此的话，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许就会更接近于二分之一，而不是现在的六分之一。

人类各种族的混合必然伴随着动植物的相应混合。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所有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由史前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驯化出来的。它们在1500年以前一直是从其各自的发源地缓慢地向外传播，之后它们就开始由横跨地球的人们在各大陆之间来回移植。各种驯养的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是东半球的一个重要贡献，美洲大陆没有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动物。美洲驼和羊驼相对而言价值不高。当然美洲的确有巨大的估计总数在4000万到6000万头的野牛群。印第安人猎杀它们作为食物，也利用它们的皮，但是他们每年只杀死30万头左右，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其自然死亡率。欧洲人起初杀野牛只是为了吃肉，1871年之后他们开始将牛皮制成商用皮革，屠宰量随即便上升为每年300万头，到19世纪末时野牛已经濒临灭绝。现在的野牛只剩下受到精心照管的区区几群。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了非常丰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种蚕豆、南瓜和西葫芦。这些原产于印第安的作物非常重要，它们构成了今天世界上全部植物食品产量的一半。除了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以及在现代药物学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几种美洲土生药材，尤其是制作可卡因和奴佛卡因用的古柯叶、制作麻醉剂用的箭毒、提取奎宁用的金鸡纳树皮、制作镇痛剂用的曼陀罗以及制作轻泻剂用的药鼠李。

当然，动植物的交流并不仅限于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之间。整个世界都卷入了这种交流，澳大利亚的情况显然就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世界上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等初级产品的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的物种都来源于外界。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今天，全球范围内人们之间和动植物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却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在进行——如果说过去是以独木舟和帆船传播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以汽船和喷气式飞机在传播了。由于这种混合经常是意外发生的，所以其结果有时也就会是灾难性的。例如，每天都有各种海洋生物随着船舱里的货物从地球的一端被运送到另一端，当船进入港口后，上亿的生物被倾倒出来，进入新的栖居地，有时候它们就会取代当地的生物。科学家检验了到达俄勒冈库斯湾的159艘日本船的压舱物，结果发现了367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其中大部分都是幼虫。“我们发现了虾、螃蟹、鱼、北极鹅、海胆、海星、虫、水母、蛤、蜗牛，简直包括了所有的海洋生物……可能被引入到新环境中的物种的5%到10%都活了下来。”[1]

货舱绝对不是控制物种扩散的唯一问题。今天最重要的扩散力量是迅速增长

的全球贸易和旅行。在活的动植物和种子上，在运送这些货物的轮船、飞机、卡车上，都附着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们被传播到全球各地。当然，这种扩散是双向的，从美国向外扩散，或者相反。拖鞋帽贝就是19世纪80年代被一船牡蛎从美国无意间输出到欧洲的。一种北美飞蛾现在正在蚕食中国中部大片地区的树木。而一种来自美国东南部的松树线虫则正在杀死日本的黑松树。

三、全球性经济关系

到18世纪后半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有史以来首次发展起来。而在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新的大宗生活必需品交易的扩大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跨大西洋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美洲种植园先是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后来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在欧洲销售的商品。由于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必须进口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谷物、鱼、布匹和金属制品，而且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了繁荣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制品被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则被运到欧洲。



图141 与当地人贸易

殖民者正与当地居民做交易。

当时新兴的大规模全球性贸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欧之间的商品交换。在这里，西欧还是得到了各种原料，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由于人口增加和大量耕地变为牧场，对谷物的需求很大。在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在1550至1600年间分别上涨了247%、187%和185%。这就促使谷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增，因此在这数十年间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

商品的价格通常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两倍。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制品以及殖民地商品;反过来它们则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还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即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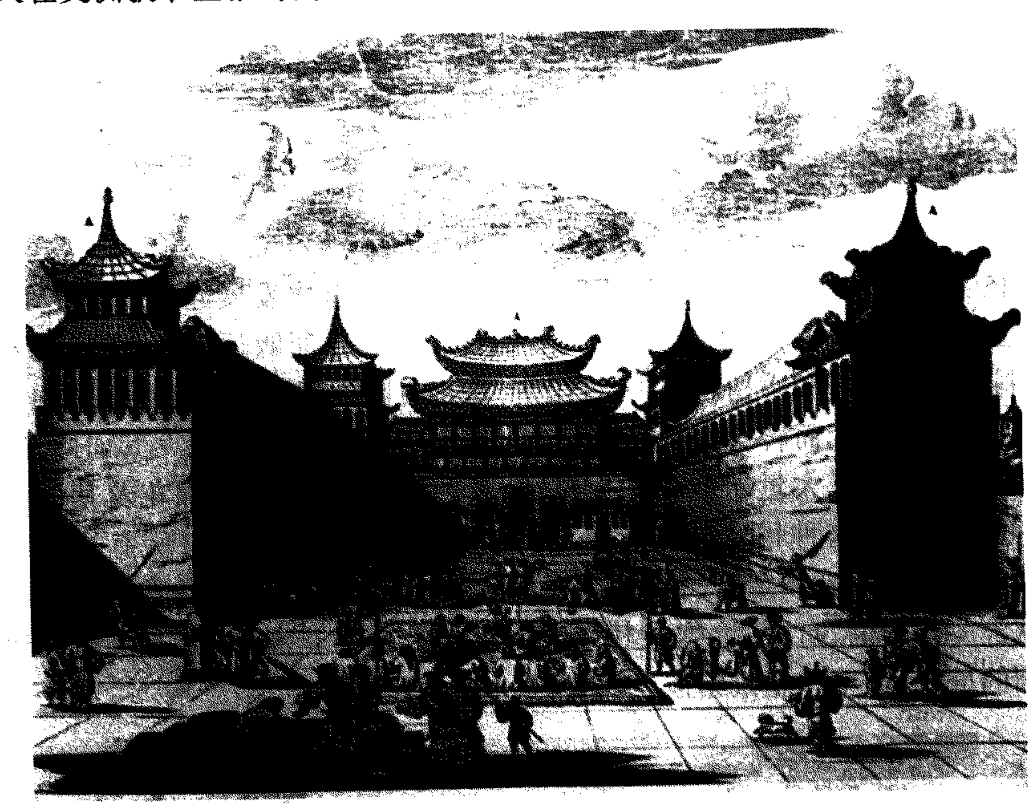


图 142 北京城里的荷兰贸易使团

1668 年,北京宫廷接待了由彼尔特·万·霍恩率领的荷兰贸易使团。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之所以比不上其与南北美洲或与东欧的贸易,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分量轻,颜色亮,价格低,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于是欧洲就开始大量进口。但是很快,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担心因购买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的人就对此加以反对。这些人为了保证通过禁止或削减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第二,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支付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纺织品而耗尽了自己的黄金。16 世纪到 18 世纪时的情况依然如故: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用金银支付它想要的亚洲产品。直到 18 世纪末,欧洲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这一问题。那时的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将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倾销到亚洲。而在此前由于亚洲不愿意接受欧洲金银除外的几乎所有其他物品,东西方贸易一直受到妨碍。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国际分工。全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加上西伯利亚)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越来越全力地进行工业生产。

新的全球性经济要求在原料生产区有充足的劳动力。美洲种植园通过大批输入非洲奴隶解决了这一问题。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人数众多。早期欧洲人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而留下了一份痛苦的遗产，因为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歧视和欠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冲突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欠发达也只不过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附关系的继续。

亚当·斯密谈欧洲的扩张

在其所著的世界名著《国富论》(1776)中，亚当·斯密对于殖民地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到殖民地的存在有助于除殖民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的财富的增加。*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两件事。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它们的影响非常巨大，但是在这些发现发生后的两到三个世纪中，它们的影响尚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显现出来。当时人类的智慧尚不能预见到人类将从这两个重大事件中获得哪些利益或遭受哪些不幸。这两件事把世界上相距最遥远的部分联结在一起，让它们能够互通有无，能够增加彼此的快乐，能够促进彼此的工业。因此，从整体趋势上看，这两个事件对人类是有益的。

其中，这些发现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将商业体系提升到了一个壮观和光荣的程度，如果没有这些发现，商业体系要达到这一程度是不可企及的。那个体系的目标就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而不是通过改良和耕种田地，通过城市工业而不是通过农村各行业，来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足。但是，作为这些发现的后果，欧洲的商业城镇不再只是作为世界的一个小部分(这部分指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制造者和运输者，现在它们已变成不计其数、欣欣向荣的美洲殖民地的商品制造者，也成了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各国完全意义上的运输者和部分意义上的制造者。两个新世界对欧洲的工业打开了大门，它们两个都比旧世界更巨大、更广阔，其中美洲市场还每天都在成长得更巨大。

的确，拥有美洲殖民地且能直接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国家享有着这一巨大的商

贸往来的全程参与权。但是,其他国家尽管遭受殖民地宗主国的恶意排挤和限制,经常也能享受到这一商贸往来的实际收益的一大部分。比如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其他国家的工业的实质性促进比它们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业的促进还要多。仅就亚麻布一项而言,据称这些殖民地的年消费额可以达到300万英镑以上,当然我不能保证这一数据的准确。但是这一巨大的消费产品却几乎全都是由法国、佛兰得斯、荷兰和德国提供。西班牙和葡萄牙仅提供一小部分。每年向这些殖民地提供的大量亚麻布而获得的资本都在这些其他的欧洲国家居民中分配,也形成了这些国家的税收。

* 亚当·斯密《国富论》(爱丁堡,1838), p.282。

为了参加这一新的全球性经济,南北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都需要有充裕、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有利可图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之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每年义务劳动3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动力。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很快就做出反应,将农民的义务劳动的时间大大延长,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更是已经增至每周6天。为了确保农民继续承担这种劳役,还逐渐通过了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最后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移自由的农奴,只能任由贵族强征勒索。

非洲也受到了新的全球经济的深刻影响,因为它是美洲种植园奴隶劳动力的来源。在出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非洲就已经有奴隶制存在,奴隶被用来打仗和耕作。奴隶也和黄金一起出口,他们沿着古老的商路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然后再被用船运到中东地区。据估计,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出现之前就已有350万到1000万非洲人被用这种方式卖掉了。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先锋葡萄牙人最初是把非洲人卖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做家务和农活,但其数量和后来被运到新大陆种植园的奴隶相比微不足道。土著印第安人无法被用做种植园工人,因为他们染上了来自欧洲的疾病,正在灭绝。种植园主起初想雇佣欧洲的契约工人,但是由于他们工资太高,而且自由散漫,于是就改用了非洲奴隶。第一批奴隶是哥伦布首次远航后不久运来的。16世纪20年代在秘鲁发现银矿,40年代在巴西建立起甘蔗种植园以后,奴隶数量激增。而自从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岛屿建立了生产烟草、大米和咖啡等作物的种植园以后,奴隶数量更是进一步增加。有关奴隶总数的估计相差很远,最新的研究表明,从1500年到1867年间约有1200万到2000万奴隶被强迫离开非洲。结果到1850年,南北美洲非洲裔奴隶的人数是白人的3—4倍。

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安哥拉和东非损失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口一开始就比较稀少,经济上常常接近于仅能糊口的水平,所以那里即使损失

的人口很少，其影响也是毁灭性的。相比之下，西非经济上较先进，人口较稠密，因此奴隶贩子的劫掠也就显得不那么具有毁灭性。从整个非洲大陆来看，由于奴隶贸易的时期从 1450 年一直延续到 1870 年，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人口据估计有 7000 万至 8000 万，故人口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不过，奴隶贸易对非洲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沿海地区和方圆四五百英里的内地则造成了腐蚀性、扰乱性的影响。携带朗姆酒、枪炮和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侵袭内地猎取奴隶的连锁反应。各种集团为了控制这种利润丰厚、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有些集团，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崛起了，有的集团如约鲁巴文明、贝宁文明和刚果王国则日渐衰落。不管怎么说，奴隶贸易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



图 143　种植园中的奴隶劳工

位于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园是奴隶劳工的一大需求源。此图显示出奴隶们正在榨取和提纯蔗糖，这些糖都将被销往欧洲消费市场。

然而，奴隶贸易除了占有奴隶之外，的确也还包括贸易。非洲人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后，作为回报，不仅得到了酒和武器，而且还得到了某些实用商品和经济上具有生产性的商品，包括纺织品、工具和供当地铁匠铺和作坊使用的原料。从长远来看，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是从南北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迅速在各部落中传播开去。这些新食物实际上能够供养大量人口，其数目或许会超过在奴隶贸易中失去的人口总数。但在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却并不是引入新粮食作物的关键因素。新作物近几个世纪以来在全

世界迅速得到传播,不论有没有奴隶制,它们无疑都会像传播到中国内地一样传播到非洲内地。

亚洲在各大洲中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都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不过亚洲大部分地区都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正出现在其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感觉到了欧洲早期经济扩张的影响。整个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

>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

欧洲也受到了全球性新经济的影响,但其影响全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自然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也就获益最多。其中有些利益也就慢慢地及于欧洲民众身上,茶叶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仅过了一个世纪它就已成为普通消费品。比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欧洲经济的刺激。就像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的那样,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从海外事业中积聚起来的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品的日渐增长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此期间欧洲突飞猛进,迅速上升为世界经济霸主。总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分工提高了世界生产率。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这种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从最初起西北欧就作为世界的企业主攫取了大部分利益,并损害了其他地区。从当前的种族冲突、富国与穷国间的显著差异、农奴制在整个东欧留下的伤痕以及遍及世界的奴隶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损害。

四、全球性政治关系

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段时期,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困在欧亚大陆西端,相反,他们已经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而从南面包围了穆斯林世界。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则通过征服西伯利亚而从北面包围了穆斯林世界。当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从而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领土。他们也因之而蓄积起了巨大的资源和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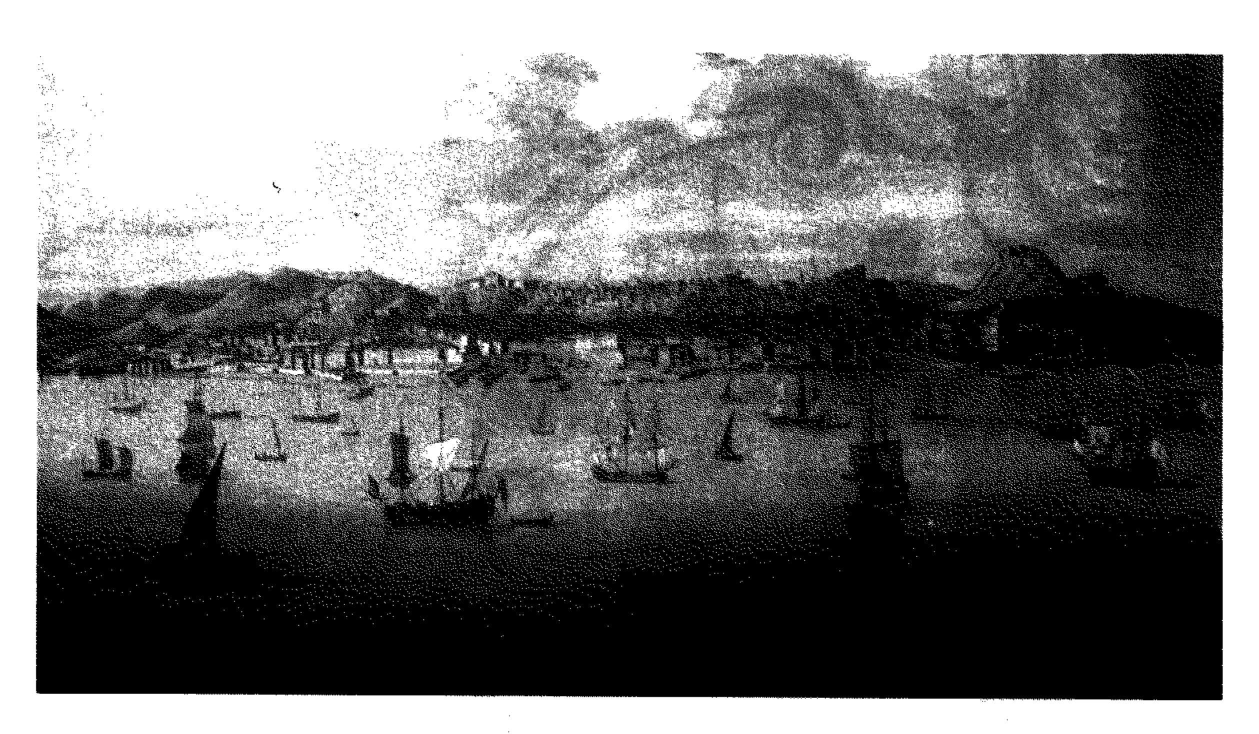


图 144　里斯本港中的英国帆船舰队

18 世纪的贸易和帝国都要靠海军来维系和保护。这些海军沿着各条航线巡逻，保护本国船只免遭海盗和走私者的骚扰以及敌军的进攻。这幅彼得·摩纳米绘于 1735 年的图画描绘了在葡萄牙里斯本港进行补给的英国帆船舰队。英国和葡萄牙是当时主要的贸易伙伴，英国用羊毛换取葡萄牙的酒。

这一切都说明世界均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堪与先前人口平衡方面的变化相比。此前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创造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扩展，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辐射全球而不仅仅是辐射欧亚大陆的新的中心也已崛起。从这个新中心——先是伊比利亚半岛，而后是西北欧——开始，一条条政治影响力的贸易路线向各方伸展，包围了整个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囊括非洲，向东到印度，囊括东南亚。

虽然欧洲人在 1763 年以前并未实际控制住这些地区的全部，但是他们已经有效地占领了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南北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虽然他们在全大陆范围进行殖民还要等到 19 世纪才开始。不过在非洲和亚洲，除去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外，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中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别处的各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组织有序，他们不允许在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比如说在西非，由于气候恶劣，欧洲人无法渗透到内陆。而且他们还受到沿海地区酋长们的阻挠，因为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酋长们处心积虑地想保住自己这一有利可图的地位。在印度，在达·伽马于 1498 年到达以后的 250 年中，欧洲人一直不能接近其核心。虽然在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也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但那显然是经过土著统治者同意的。而在中国和日本，就像俄罗斯人在进入阿穆尔河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根本不可能侵占它们的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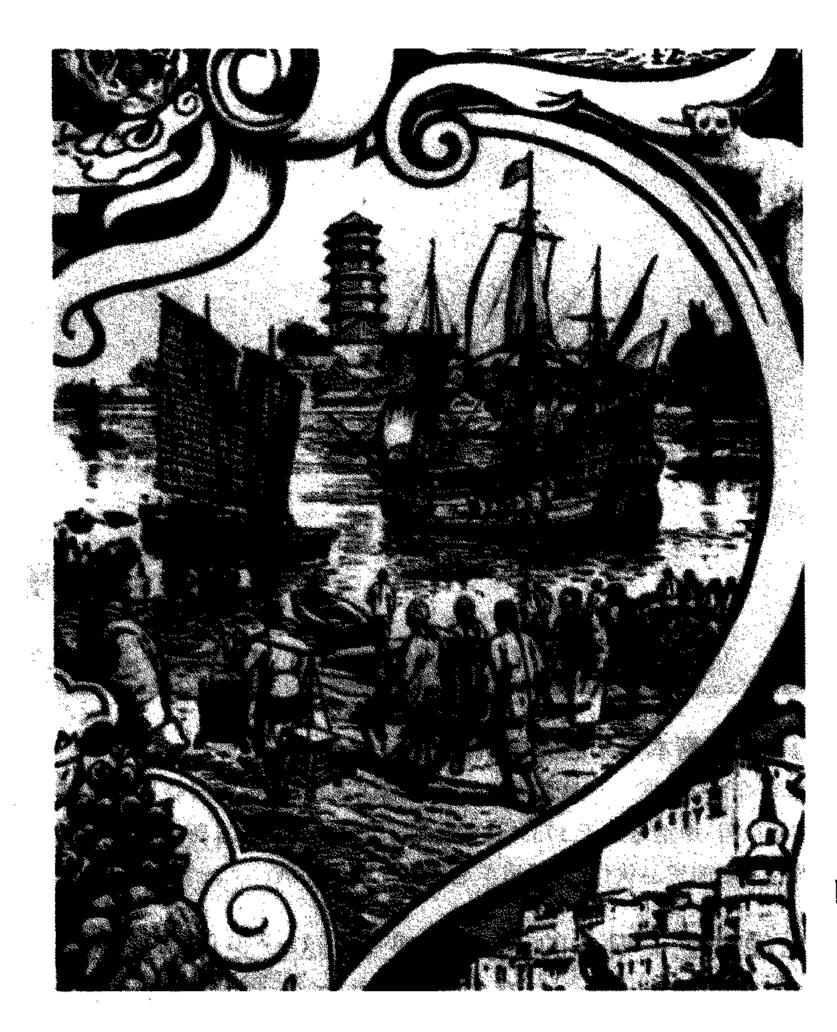


图145 到达天津的西方船只
西方船只到达中国天津。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政治领域,就像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已经取得了一半成就。它不再是欧亚大陆上一个相对封闭、无关紧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进行了扩张,并确立起其对相对人烟稀少、军事软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统治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

五、全球性文化关系

欧洲文化能否强行移植,就像欧洲能否进行政治统治一样,取决于各土著社会的情况。例如,欧洲文化能够被整个迁移到南北美洲,是因为各土著民族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已被驱逐。然而,即便是偶然来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会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残余的迹象。例如,用土砖砌造房屋,用没有锯过的松树原木作桁条,即椽子。同样,披在肩上的毛毯(塞拉普毛毯)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用两块毛毯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的庞乔头篷也是如此。拉美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与印第安人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经放弃了其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

又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像以往的神那样替他们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免灾祈福。也许在拉丁美洲的烹饪方面能够找到受印第安影响的最明显的证据：玉米粽子、玉米粉圆饼和各种辣菜都是以印第安两大名产蚕豆和玉米为基本原料而做成的。



图 146　休伦武士

一旦印第安人得到了欧洲的武器，印第安人内部的冲突就变得伤亡更大。这幅绘于 1657 年的雕版画绘制了一个休伦武士，他带了一杆枪，穿着缝得很紧的铠甲，它能为穿着者抵御滑膛枪弹的袭击提供些微防护。

在 1763 年以前的时期，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传播外，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各种土著文化的影响微不足道。在西非，土著酋长们基本上把欧洲商人限制在沿海贸易站。在中东、印度和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心，各土著民族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却也最看不起他们。甚至就在 17、18 世纪土耳其人自己日益衰落时，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表达其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1666 年土耳其首相对法国大使喊道："难道我不知道你？你这个异教徒，猪，狗，吃粪的家伙！"[3]

在印度次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 1560 年引进宗教法庭时，各土著民族的反应同样也是非常消极的。在 1600 年至 1773 年间共有 73 人因持异教观点而被判处火刑。印度人注意到了天主教的自相矛盾之处：它监禁、拷打和以火刑处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同时却又阻止寡妇自焚，而自焚按当时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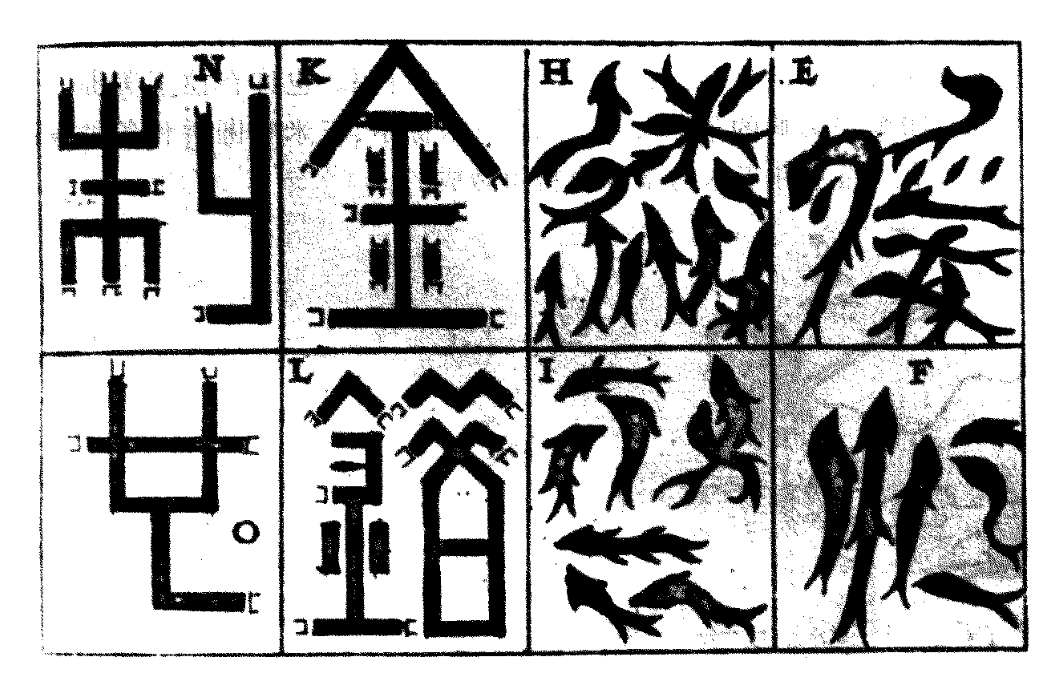


图147　古代汉字

一位基督教传教士试图复制古代汉字。

教的标准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更是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对西方基督教徒的评价。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经常酗酒、干坏事、打人、辱骂别人。"[4]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其在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起初较好（如第19章第3节所提到的）。耶稣会会士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士，也没有给大多数中国学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都不认同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以下这句谚语或许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普遍看法：只有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763年以前除天文学之类的专门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是欧洲人却刚好相反，他们对其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对于先熟悉起来的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即便是在帝国已经开始衰落的1634年，一位有创见的英国旅行家仍然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到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辉煌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5]17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在欧洲人中间失去了它的威望。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报道强烈地吸引。他们在了解过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更是完全入了迷。中国以其儒家道德体系、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

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标榜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凡间少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的……从而赢得统治权。"[6]

18世纪末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失，这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中国受到迫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而不是文化感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在1776至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6卷《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的研究报告》中。该书第11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仅收录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毛动物——的报告。

正如在17世纪欧洲人的兴趣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希腊，还有较小一部分则转移到了印度。古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至爱。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我们怎么能相信，在欧洲的导师希腊人学会阅读以前，东方各野蛮民族就已产生编年史和诗歌，并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7]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则开始热衷于印度文化。印度学者不愿将自己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少数欧洲人，多为耶稣会神父，还是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就像莱布尼茨被中国哲学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上公开赞美道："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的结构却是如此奇妙。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词汇更丰富，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种都要优美得多。"[8]

六、历史视野中的近代初期

从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与19世纪欧洲统治世界之间的中点。在经济上，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几乎将他们的贸易活动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尽管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广袤大洲的内地。洲际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却仍远远低于其后所达到的数量。

在政治上，世界还远远不是一个单一整体。震撼欧洲的伟大的七年战争并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却仅拥有少数几块飞地，而在远东他们更是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是作为商人他们也必须服从最具限制性、最专断的规章制度。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在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开始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总的来说，欧亚大陆各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留下的印象和影响要较后者给前者留下的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

种瞪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为战利品和贸易而战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焦急地探求良知，就像在如何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在这一时期结束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却起了显著变化。欧洲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褊狭。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吸引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被我们视作野蛮人，不过早在我们的祖先居住在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数世纪以前，他们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而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度的轻蔑。”以后各章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等民族”，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

推荐读物

论述现代早期欧洲扩张的一般性影响的著作有：I. Wallerstein 所著的多卷本著作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cademic Press, 1974ff.)；W.P. Webb 所著的 *The Great Frontier* (Houghton Miflin, 1952)；P.D. Curtin 所著的 *Cross 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4)；E.F. Frazier 所著的 *Race and Culture Contacts in the Modern World* (Knopf, 1957)；L.S. Stavrianos 所著的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William Morrow, 1981)。论述生态影响的著作有：C. Ponting 所著的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St. Martin's Press, 1991)。

更为详细地论述欧洲影响的著作有：E. Reynolds 所著的 *Stand the Storm: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Schocken, 1985)；S.J. 和 B.H. Stein 所著的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1970)；S.W. Mintz 所著的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Viking, 1985)；A.W. Crosby 所著的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ses of* 1492 (Greeenwood Publishing Co., 1972)；A.G. Price 所著的 *The Western Invasion of the Pacific and Its Continents: A Study of Moving Frontiers and Changing Landscapes* 1513—1958 (Clarendon, 1963)。

下述著作分析了相反的过程——海外扩张对欧洲自身的影响：F.D. Lach 所著的多卷本著作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5ff.)；J.E. Gillespie 所著的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s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 (Vol.91 in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1920)；A.I. Hallowell 所著的“*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Indian on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LIX (1957), pp.210—217; L.S.S. O'Maley 编辑的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1941)；A. Reinchwein 所著的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Knopf, 1925), P.J. Marshall 和 G. Williams 所著的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Perceptions of New*

World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注释

1. Cited by F. Whyte,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Oxford University, 1927), p.38.
2. Cited by A.C. Wood, *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 (Oxford University, 1935), p.230.
3. Cited by L.S.S. O'Malley, ed.,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1941), p.51.
4. H. Blount, "A Voyage into the Levant," in J. Pinkerton, 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 X* (London, 1808—1814), p.222.
5. Cited by D. Lach, "Leibniz and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I(October 1945), p.440.
6. Cited by A.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Knopf, 1925), p.152.
7. Cited by O'Malley, *Modern India*, p.546.
8. Cited by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p.151.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从世界历史看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公元1500年之后的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开始起了冲突。而在此前，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全球联系尚不存在，更不用说全球统一。数万年来人类一直生活在互相隔绝的状态中。当人们从其最初的发祥地——据推测是非洲——散居开时，他们就失去了与其邻人的联系。人们向四面八方扩散，直到占据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陆地，他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一过程。例如，最初的蒙古种人穿越西伯利亚东北部到达阿拉斯加后，又向整个北美和南美继续推进。人们在彼此相对隔绝的新社会中定居。经过几千年时间他们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语言和文化，甚至在形体特征上也产生了差别。这一过程一直扩展到全球，因而直至公元1500年种族隔离现象遍及全世界。所有黑人或黑色种人都生活于非洲，所有白人或高加索种人都生活于欧洲和中东，所有蒙古种人都生活于东亚和美洲，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则生活于澳洲。

当西方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进行其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也就开始让位于全球统一。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或被迫移居到新的大陆，各个种族也因之而不再互相隔绝。欧洲人由于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到19世纪时他们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并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于是也就成为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则天生低劣。19世纪的欧洲人和非欧洲人都认为西方霸权是理所应当的。人们认为西方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天经地义，是由上帝安排的。

在20世纪的今天，钟摆开始再度摆向地区自治。欧洲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年)才建立起其在世界范围的统治，而仅过了50年这种统治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加快了其前进步伐。政治瓦解表现为帝国统治的终结，文化分化范围则更为宽广，西方文化不再被认为与文明同义，而非西方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蛮。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仅受到直接挑战，甚至遭到抵制。1979年11月当美

国使馆人员在德黑兰被扣为人质时,西方记者曾向那些年轻的绑架者们提出了许多书面问题。而后者则作出了如下集体回答:“西方文化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极好的手段、一个使人远离本民族的工具。他们通过使一个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国的价值观来使之服从其统治。”这些绑架者还表达了其对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伊朗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我们要这些满脑子腐朽思想的人做什么用? 让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去吧! 这些腐朽的家伙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式后亦步亦趋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运动和革命而言他们毫无价值。”[1]

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仅限于年轻的激进派。许多持各种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赞同这种观点。印度政治理论家梅达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中提出,无论是西方民主还是苏联共产主义都不能为印度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模式。他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因为他认为这会把人贬低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产生一个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私自利的社会。他同样抵制共产主义,因为它强调经济事务和国家活动,个人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因而使生活丧失了丰富性和多样性。梅达因此得出结论说,“各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都有实现其功能的道路……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不能以西方社会为榜样加以改造。印度必须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殊情况的建设和发展战略。”[2]

对西方全球统治的反对不足为怪。因为这种统治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偏离现象,它产生于错综复杂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因而它的存在也必定是暂时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当前地区自治的力量同样也正在主要西方国家内部兴起,一些已经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亚群体也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黑人、讲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等少数民族群体。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脱离的倾向已经威胁到了加拿大的统一。同样,英国也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分离主义者。而法国则也正面临着来自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的挑战。

地区自治的要求也并非仅仅针对西方的中央政权。在伊朗,在普遍存在着对西方影响的反抗的同时,针对德黑兰中央政府统治的地方暴动——即由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发动的叛乱也是如火如荼。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伊朗面临地区自治的威胁要远远超过任何西方国家内部的自治的威胁。苏联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戈尔巴乔夫标榜“公开性”放松控制后,几十个少数民族立即要求自治。随后苏联就在20世纪90年代意外解体并为独联体取而代之。

我们这个时代动乱频仍,其中多数都是因为这两大相互矛盾力量的冲突而起。一方面,由于现代通讯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的发展,现代技术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统一起来;而另一方面,那些沉睡至今的大众则也开始觉醒并决心创造自己的未来,全球因此又陷入四分五裂。这种冲突是历史性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后的那几个世纪。在那段时期,西方探险家和商人首次把世

界上所有的居民都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注定会产生多方面影响,而且直至今天我们仍需面对这些影响,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克写道:“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经武装起自己,准备为了未来而不是过去背水一战。”[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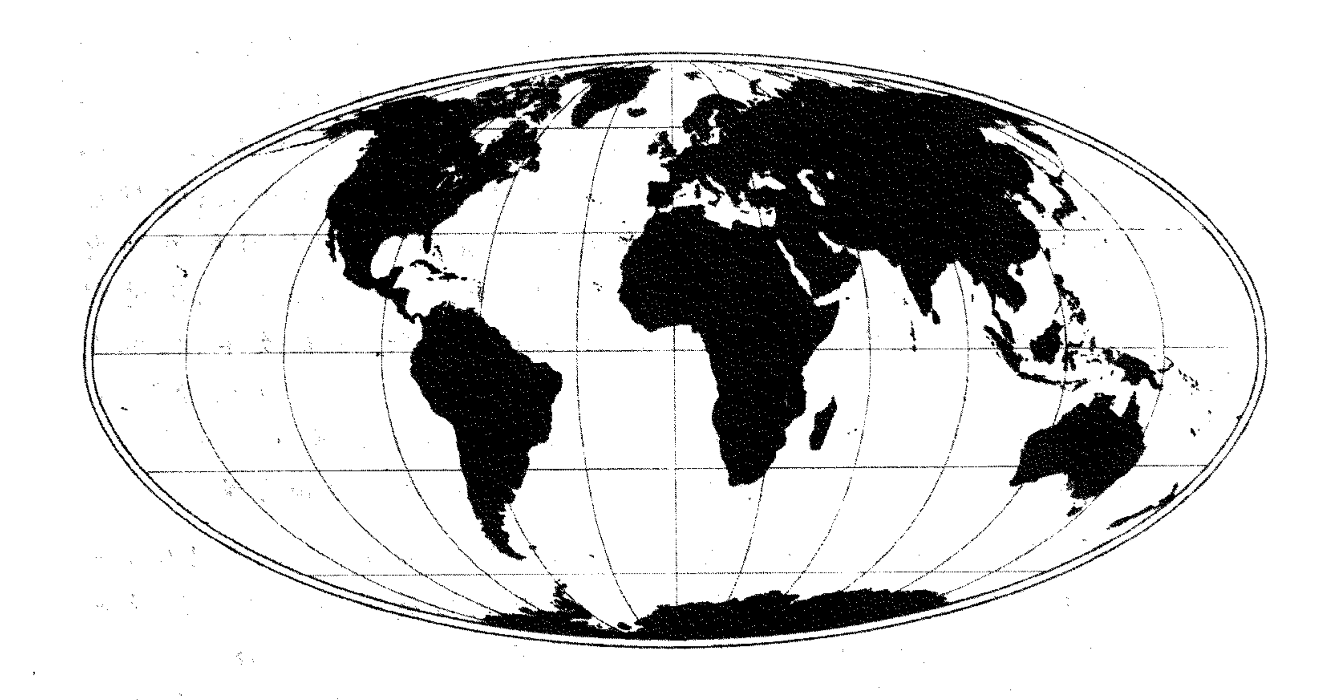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的结果日益变得捉摸不定。问题已经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看起来黑白分明。当亚洲人民成功地采纳和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时,这不仅仅是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同样,当社会主义国家放弃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时,这也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现在在第三世界中对所有外来模式的幻灭感都在增长,这种幻灭导致了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陷入混乱。中国总理周恩来所称的“天下大乱”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好描述。

推荐读物

E. Fischer 所著的 *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 修订版(Harvard University, 1948)对反抗西方统治进行了最好的总结。分析世界范围内对中央权威各方面挑战的著作有: L. Kohr 所著的 *The Breakdown of Nation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D. Morris 和 K. Hess 所著的 *Neighborhood Power: The New Localism* (Beacon, 1975); C. Bezold 编著的 *Anticipatory Democracy* (Random House, 1978); A. Amalrik 所著的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Harper & Row, 1979); H.C. d'Encausse 所著的 *Decline of an Empire: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n Revolt* (*Newsweek*, 1979); T.G. Verhelst 所著的 *No Life Without Roots: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Zed Books, 1990)对全球范围内西方发展模式的替代模式进行了总结。对“天下大乱”的最近考察是 Z. Brzezinsky 所著的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Scribner's, 1993). A. Rashid 所著的 *The Resurgence of Central Asia. Islam or Nationalism?* (Zed Books, 1994)分析了广袤的中亚地区的混乱情形。

注释

1.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1979. © 1979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2. V.R. Mehta, *Beyond Marxism: Toward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Manohar, 1978), p.92.
3.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80.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公元 1763—1914 年)

从1763年至1914年这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时期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据有显著地位。1763年时的欧洲仅在非洲和亚洲保留下来一些沿海据点，还远远不是世界的主人。然而，到1914时欧洲列强却已并吞了整个非洲，并建立起了对亚洲的有效控制；这种控制有的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东南亚；有的是间接的，如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欧洲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其现代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和加速。现代化进程早在此前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国家建设和海外扩张(见第20章)中就已经开始。这引发了一种以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锁反应，这些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力和力量。

这些革命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一提。第一个特点是，它们在1763年以前就已在扎实地进行。发生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内战是政治革命的一个主要阶段。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至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也可以在16和17世纪中找到：当时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股票的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1] 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直到19世纪才被充分地感觉到。而这也就是在本篇而不是在本书前面部分考察它们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特点是，这三大革命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它们互相依赖，相互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近代民族主义也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强有力地促进了科学进步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2]

在分析了欧洲三大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历程以后，我们将在本编各章节中探索它们对世界各地区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是如何使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化、非洲的瓜分以及对亚洲的支配成为可能的。

注释

1. 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0—1700),” *Economica* (November, 1929), p.356.
2. Cited by C. E. Robinson, “The English Philosophi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Today*, VI(February, 1956), p.121.

所谓的科学革命……使得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与之相比，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都仅仅具有插曲式的意义，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发生的内部更替……科学革命作为整个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显现，以至于我们通常对欧洲历史时期的划分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成为一种障碍。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英国的制造业体系及其催生人口密集城镇的惊人速度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曼彻斯特保护人

1832年11月17日

第26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人类物质文化的变化在过去的200年中比在此前5000年中发生的变化都还要巨大。18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人们使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同样的牲畜运人运物，同样的帆和桨驱动船只，同样的纺织材料缝制衣服，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但是今天，金属和塑料制品补充了石材和木材；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骡子；蒸汽、柴油、核动力船只取代了风力和人力；多种合成纤维与传统的棉布、羊毛和亚麻竞争；电力取代了蜡烛，成为只需轻轻按动开关就源源不断的能源。

这些伟大的变革都源自科学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回顾历史，似乎科学革命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意义更大。农业革命使人类进入文明，但是在前进了这一大步之后农业就未再作出其进一步的贡献。相反科学则借助于它的研究方法不断地稳步前进——科学本身包含了

无限进步的可能。我们只要想想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它现今日益加速发展的现实,那么即使我们还不能全面领会科学惊人的可能性和意义,至少也总可以做到赞赏它。此外,科学是属于全体人类的。由于科学乃是基于客观的研究方法,科学立场已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成果之一。事实上,也正是凭借着科学及与其相关的技术,才使得 19 世纪的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今天原先的从属民族正在力求通过探明西方对人类作出伟大而独特贡献的秘密来矫正其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平衡的状态。

显而易见,科学和工业革命对研究世界历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本章就将探索这些革命从近代初期的早期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发展过程。

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虽然科学的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但科学革命却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其原因似乎在于,科学仅在西方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西方,哲学—科学家才实现了其与匠人的联合并与之互相促进。而也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结合、科学家与匠人的结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在各个人类社会中,匠人们都发展了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加工木材、石头、金属、禾本科植物、纤维、块根植物和兽皮等方面的某些技术。他们通过观察和试验逐步改进自己的技术,有时可以达到诸如爱斯基摩人那样很高的水平。不过前近代社会所取得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制约,其原因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本身感兴趣,而并不关心其背后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他们不去探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总之,匠人关心的是实用的技术上的知识,而不是其背后的科学原因,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的确,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期也曾一起合作,创造出了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然而,直到近代以前其发展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而西方的伟大成就就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掌握实际知识与了解背后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了今日的支配力量。

那么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原因之一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大量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学者们不仅可以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可以学习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而更重要的则是它对生物科学的推动。医学院的学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特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但是若无匠人与学者之间鸿沟缩小这一有利的西欧社会氛围,人类的这些知识成果本身不

可能会引起科学革命。在文艺复兴期间,匠人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到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特别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这些行业在古典时代由奴隶经营,在文艺复兴时期则都由自由人经营。而且这些自由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差悬殊。文艺复兴时期工匠地位的提高加强了工匠与学者之间的联系,而双方也都作出了他们各自的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老的技术,并在其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的新发明。同样,学者则通过研究得出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风物以及中世纪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测及传统做法。这两种方法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的结合却产生了一种爆炸性的效果。

与工匠和学者的结合密切相关的是劳动与思想的结合。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将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强烈偏见。这种大概是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关联的偏见甚至在奴隶制度已经几乎消失以后,仍然存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即在仅靠脑力完成的工作和靠动手改变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例如,诗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属于前者,而雕刻家、釉工和铁器工人则属于后者。这种两分法的有害影响在医学领域里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内科医生的工作没有改变物质形态,因而被认为是"自由的";而按照同一标准,外科医生的工作则被看作"奴隶的"。实验由此受到轻视,活体解剖则被认为是非法的和令人厌恶的。

威廉·哈维(1578—1657)之所以能够作出心脏和血液运动的伟大发现,是因为他坚决反对对体力劳动的这种蔑视。数十年间他一直在进行各种艰苦的实验。他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多种生物的动静脉,谨慎、耐心地观察和记录其血液和心脏的运动。他还利用新的放大镜来观察马蜂、大黄蜂和苍蝇。这一程序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合情合理、显而易见的,但在哈维的时代却不可想象。在哈维生活的时代就能使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科学方法,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开发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新的植物、动物、恒星甚至新的人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观念和假想提出了挑战。与之相似,商业和工业的成长导致了技术上的进步,而技术进步反过来既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又受到了科学前进的刺激。远洋贸易引发了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需求。一批新的、有才智的、受过数学训练的工匠制造了罗盘、地图和仪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了航海学校,天文学也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就像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了传动和水泵技术的进步——这是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开端——冶金业则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日渐扩大的采矿作业使得新矿石甚至新金属如铋、锌和钴被发现。而要找到和提高分离、处理这些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就必须通过痛苦的实验。但是,包括氧化和还原、蒸馏和混合在内的化学的一般原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最后,这些领域里的新知识通过大学和印刷品得以促进和流传。其中印刷品在提高识字率和传

播新思想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

上述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或称哲学家以信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新时代的先驱。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已经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因而他们就开始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有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

"所有地区都在热心地忙于这项工作:我们发现每天交给[学会]的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的、专门的哲学家之手,而且来源于技工的工场、商人的航海旅程、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狩猎场和花园……"[1]

最初,科学从矿山和工场那里汲取的东西要比后者从它那里得到的多得多。在早期阶段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对科学的利用也就是少量、零星的——甚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科学不再处于从属地位:它已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了全新的工业。

二、科学革命的历程

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首先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有着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这是可以预见的。进步发生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方面的伟人包括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和牛顿(1642—1727)。哥白尼采纳某些古代哲学家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才是宇宙中心的观点,而后证明了这种观点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伽利略使用当时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宇宙的实况,从而为哥白尼的理论提供了实验支持。他在报告中说:"借助望远镜,任何人都可或多或少地观察到……银河系只不过是一团聚集在一起的无数的星体。如果把望远镜直接对准银河系的任何部分,眼前就会出现一大群星体……"

早期科学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一位可与欧几里德和爱因斯坦相媲美的伟人。除了在光学、流体动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之外,他还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宇宙中物质的每个粒子都对其他每个粒子有引力;引力与两个粒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2]

这是揭开天空面纱的一个轰动一时的、革命性的解释。牛顿已经发现了一个能够通过数学被证明的基本宇宙定律;这一定律既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观的物体。事实上,自然界就仿如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可以通过观察、实验

和计算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在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以分解为少数简单而统一的有理性的人能够发现的定律。随后人们就开始把牛顿的物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包括思想和知识在内的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物理领域。

18 世纪晚期正在进行中的工业革命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蒸汽机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蒸汽机提供了急需的动力来开动机器、火车头——当然最初它是被用来从矿井里排水。詹姆斯·瓦特综合运用技术创新和科学知识,将蒸汽机的机械效率提高到一个相当的水平。1769 年瓦特采用了一个始终保持低温的单独冷凝器,此后不久他又使用曲轴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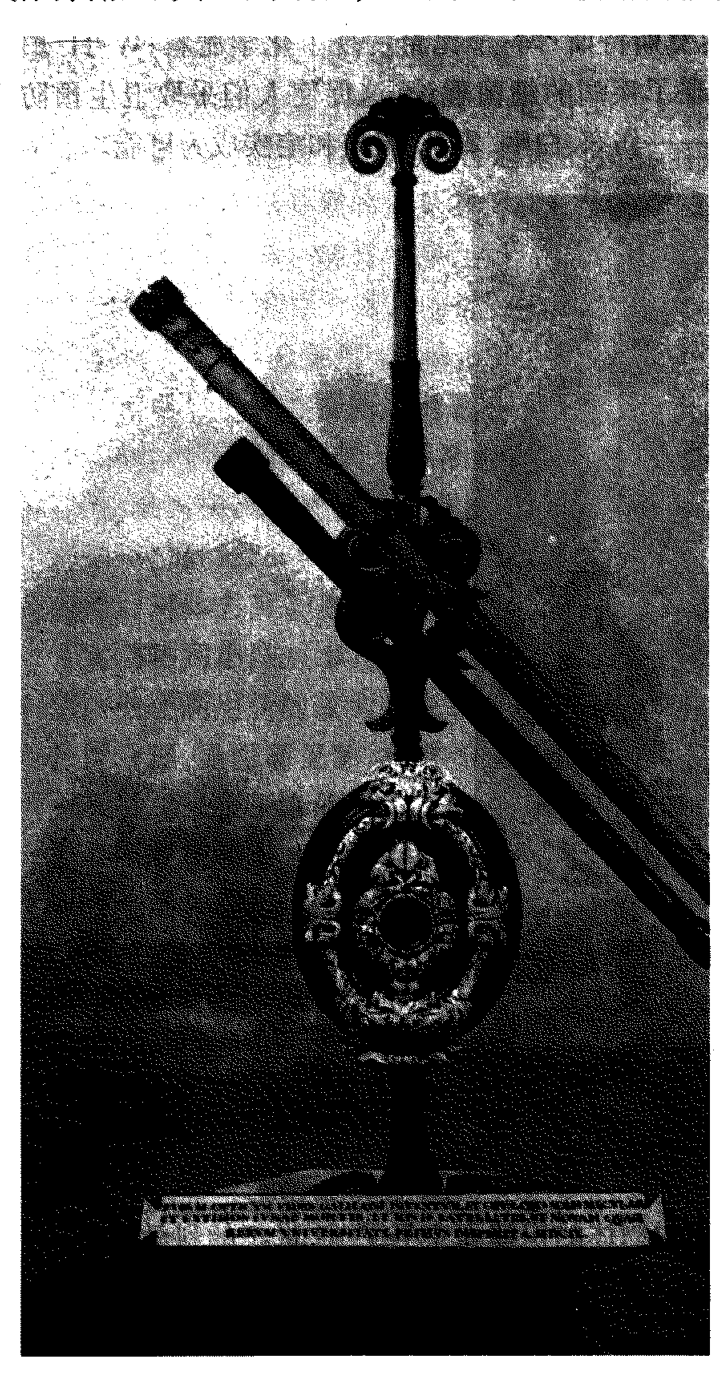


图 148　望远镜

伽利略在 1609 年之后所用的望远镜。他用它观测月球,探测金星周期性的相位,并发现了绝大多数木星的重要卫星。这些观测在 17 世纪有着革命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动。如果不是蒸汽机提供了相对无限的动力，工业革命很有可能会在仅仅增加了纺织品生产的速度后便逐渐消失，就像它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中国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曾取得过类似的技术进步。

19世纪前半叶进步最多的一门科学是化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与纺织业密切相关，而纺织业则在此数十年间经历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化学界的牛顿"是安东尼·拉瓦锡(1743—1794)，他发现的能量守恒定律堪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在化学反应中，尽管物质的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但质量却保持不变，物质的数量在反应前后是相同的，并可通过重量检验。19世纪拉瓦锡的后继者们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发现：贾斯特斯·冯·李比希发现了化学肥料；W·H·珀金发现了合成染料；路易·巴斯特发现了疾病的细菌理论，这促使人们采取卫生预防措施，从而使得控制为害已久的灾祸——伤寒、白喉、霍乱、鼠疫和疟疾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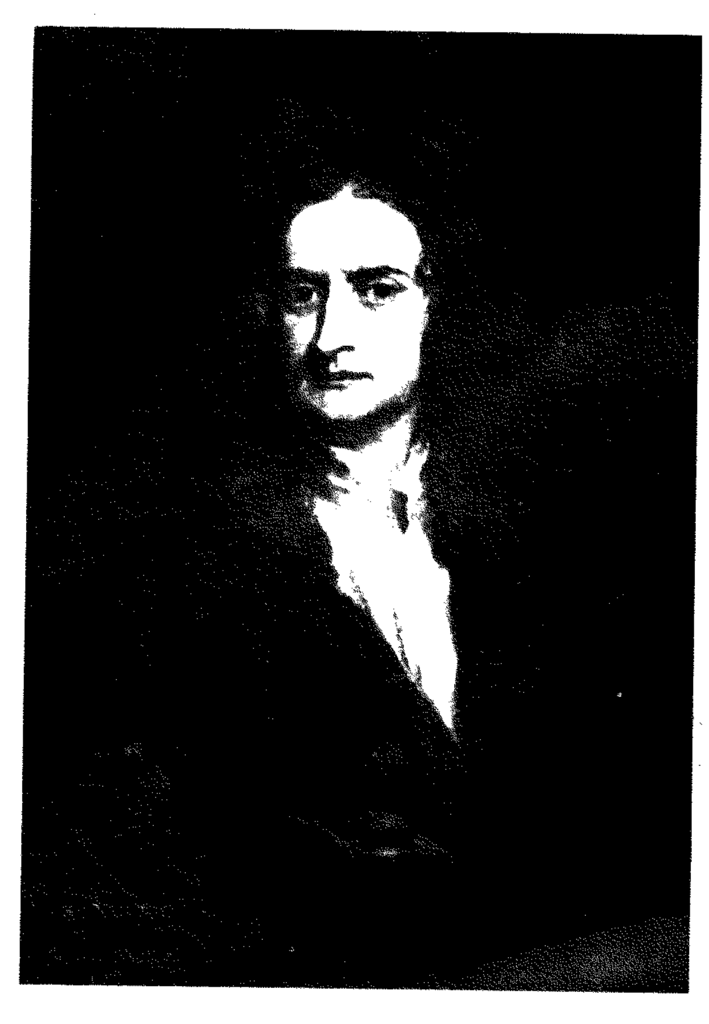


图149 牛顿像

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关于重力的数学和物理定律。牛顿相信宗教和科学是相互兼容、互为补充的，而对自然界的研究则能使人更好地认识上帝。这幅牛顿的画像由科耐勒爵士绘制。

就像牛顿因为发现了支配宇宙中物体的定律而主导了17世纪的科学一样，达尔文则因为发现了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主导了19世纪的科学。他的进化论认为，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它们是不同的、可变的，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自然结果。达尔文认为变

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

> “因为对每一个物种来说，它所产生的个体都要比可能生存下来的多得多，各生物间也因之而不断地进行生存斗争，因而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却是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就将在复杂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这样它也才能被自然选择。由于强大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都趋向于将变异了的新类型繁殖下去。”[3]

也许很难设想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是一个不规则的、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就像“自然选择”所提供的那样。不过统计学的计算结果却表明，即使一次突变仅仅导致 1% 的较好的生存机会，这一变化也会保留下来，并在经过 100 世代之后达到该物种的一半个体都发生了这种突变的程度。换言之，即使 101 个发生过突变的个体活下来后有 100 个失去了突变，突变仍会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短时间内传遍该物种。达尔文的学说虽然在其后的研究基础上得到了详细修改，但其要点已为现在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宗教界，则存在着激烈的反对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否定了神造世界说。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将人从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赶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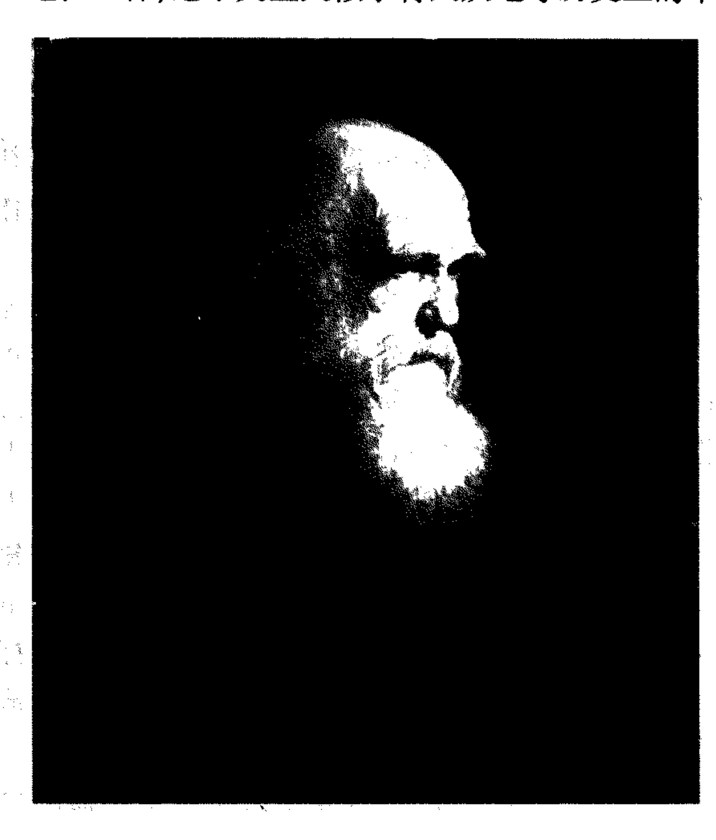


图 150 达尔文

在他所著的《物种的起源》(1859 年)和《人类的起源》(1871 年)这两本同等重要的书中，达尔文阐发了他奠立于自然选择理论基础上的进化论，并将其用于解释人类的起源。结果引发了一场不仅影响了生物学，还波及到宗教、哲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大争论。

尽管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达尔文主义仍然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

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对适者生存和生存竞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正是俾斯麦以"铁血"统一德国的时期。各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他们提供了支持和合法性。他们认为与自然界一样，政治活动中的最强者是得胜者，好战的程度决定了谁将在国际"生存竞争"中获胜。而在经济生活中，这是一个自由放任经营和粗俗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上、中层阶级生活舒适、心满意足，强烈反对国家为促进更大的社会平等而作任何干预。在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19世纪后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列强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则争辩说，按照现实成就判断，各土著民族弱小、低劣，需要优越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被应用到社会舞台上的达尔文的学说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未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被应用到这个方面，更不用说有这种意图了。然而，事实却仍然是它们被利用了，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们似乎为当时开始支配欧洲的物质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支持。简而言之，达尔文主义非常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下述名言相吻合：

>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所获。*

三、科学革命的意义

在19世纪结束时科学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19世纪初期科学仍处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边缘，但到19世纪末它不但为此前建立的老工业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还开始创造出全新的工业。它不但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还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引发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建立世界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科学也为19世纪的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之所以未对非西方民族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非西方民族已经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但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平等了。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为推动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利用了它们。这是一个不容否认且有说服力的事实。此后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也不再将欧洲人看做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野蛮人，他们勉强承认了欧洲科学革命的意义。今天，从前的殖民地人民的主要目标就是亲自经历这场独特的革命。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科学革命的世界意义总结如下：

"……证明了生命力如此强大，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作用，从最初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已经开始控制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纪基督教在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各个角落后开始支配其他事物一样。因此，当人们谈及最近几代人中被传入日本等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纪后半叶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维模式和文明的所有工具。"[4]

四、工业革命的根源

"工业革命"这种用词经常受到质疑，因为它描述的不是一个迅速的、一夜之间的变化，而是一个18世纪之前就早已开始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革命"。显然如果革命的含义是指一个突然开始和结束的惊人变化，那这并不是一场革命。

然而事实却是，在18世纪80年代生产力的确有了一个惊人的进步，正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称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阶段的起飞"。更明确地说就是，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商品，以致它不再依赖现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新的需要。这种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以往却无先例的现象的一个例子就是汽车制造业。不是上世纪初就存在对汽车的需求从而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福特"牌汽车的能力刺激了现代大众对汽车的大量需求。

考察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和时间有关。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后期，而不是此前100年或1000年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海外大扩张之后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是世界贸易商品方面的变化。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商品是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向运送的金银。但是在这之后新的海外产品开始逐渐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其商业价值也在不断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绶鸡以及其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鱼）。商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显著增长。1715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其出口商品则增加了7至8倍。英国贸易也取得了几乎同样惊人的增长——在1698至1775年这一时期中其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了4倍或5倍。不过在欧洲不断增长的贸易总量中，殖民地贸易所占的份额则愈来愈大。例如，1698年英国约有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之间进行的，但到17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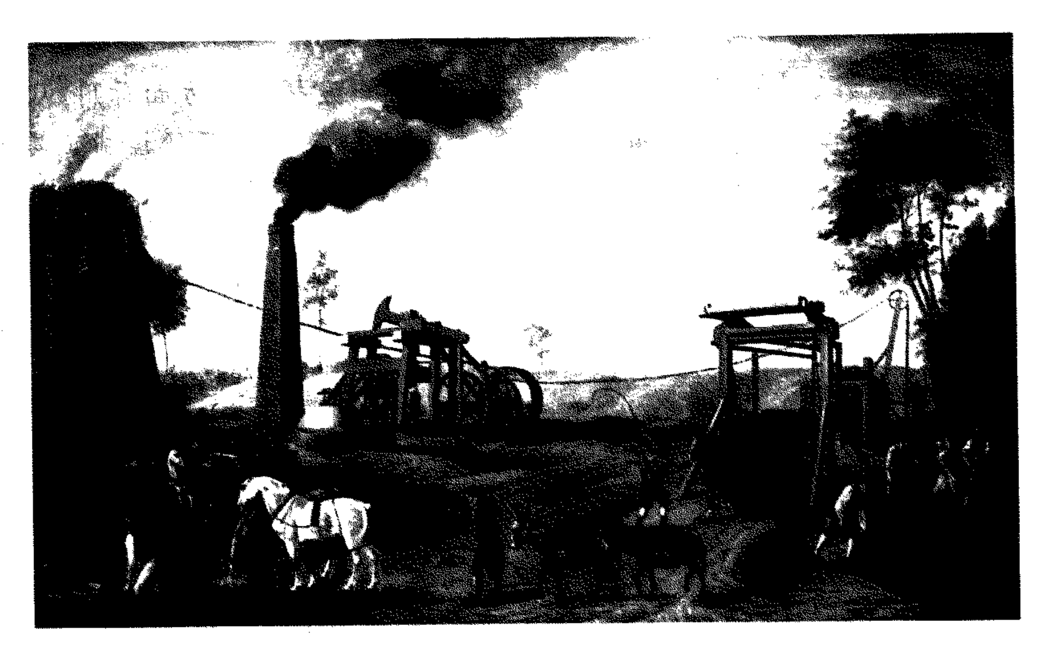


图151 英国煤矿坑口

这幅画表现了一个18世纪的英国煤矿的坑口的情景。画面左侧的机械包括一台蒸汽机,它为将矿井中的煤运到地面的设备以及抽出矿井中的水的水泵提供动力。英国富含煤矿带也是帮助它完成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数字就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商业革命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为制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许多巨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而为了满足这些新市场的需要,工业就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商业革命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它在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资本。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从西伯利亚和北美的毛皮贸易,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非洲的奴隶贸易,一些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利润中。调查结果表明,18世纪从印度和西印度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利润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的投资一样多。

早期铁路上的一段旅程

世界上最初的两条铁路分别于1825年和1830年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开放,女演员弗朗丝(范妮)·金伯尔幼年时曾在第二条铁路最初开放时搭乘过,以下是她对

此事的描述。

我父亲认识几位对这一事业(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最感兴趣的绅士,当史蒂芬孙提议进行 15 英里间道的试运行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邀请我父亲带着我参加,并且允许我坐在史蒂芬孙身旁,我认为这真是自己毕生最大的荣耀之一……他是一个颇严肃的人,棱角分明,面色低沉……

有人向我们介绍了将要带着我们在铁轨上奔跑的小小发动机……这个总是让我想去轻拍它的鼻息咻咻的小东西,现在被套在了我们的马车上,史蒂芬孙先生将我放在发动机的凳子上,和他坐在一处。我们以约 10 英里的时速开始了旅程。因为这匹蒸汽马对高低起伏的山路不是很适应,铁路要保持一定的水平高度,因此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沉到了地底下,有时候又像悬在半空中。几乎从一开始起我们的铁路就穿过了坚硬的山石,两边都是高达 60 英尺的石头,就像是两面墙壁。因此你很难想像这样的旅行有多么奇异:你看不到任何前进的原因,除了这个神奇的发动机以及它飞奔的白色气息和充满节奏的不变的步速……我们只走 15 英里,这个距离已经足够展示发动机的速度了……走完了这段多石的窄路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已经高出河岸 10 或 12 英尺了,然后我们到了一片辽阔的沼泽地,没有人能够走下去不沉没的,然而我们的铁路却载着我们在上面飞奔……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 15 英里了,火车在将要横跨一个又宽又深的峡谷时停了下来。史蒂芬孙把我放下来,带着我走到谷底。为了保持铁路的水平高度,史蒂芬孙建造了一个壮观的 9 拱高架桥,中间的一拱高 70 英尺。通过它我们看到了整个美丽的山谷……然后我们回到了其他人那里,给发动机供了水,因为发动机不能掉头,车厢被挂在后面。现在我们以它的最高速度——每小时 30 英里——出发,比鸟的飞翔速度还要快(因为他们曾经用猎鸟做过试验)。你难以想像切开空气向前跑的感觉是怎样的——它的动作也是无比圆滑的。

利润丰厚的商业企业,与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一起,解释了工业革命在 18 世纪晚期达到了“起飞”阶段的原因。但是这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在英国发轫?这是因为英国享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即它早已在基础性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中占据领先地位。由于英国的林业资源正被耗尽,它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来冶铁。到 1789 年法国革命时英国大约每年生产 1000 万吨煤,而法国则仅能生产 70 万吨煤。而且英国还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能够大批量产铁,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1780 年英国的铁产量还仅是法国的 1/3,到 1840 年它的产量就已变为法国的 3 倍多。这一切都意味着英国正在朝生产大众消费品方面前进,这些商品需求量大而且稳定。而法国则更偏重于专门生产需求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奢侈品。

另一个条件则是英国拥有更多可被用作工业革命资金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

英国的商业利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英国的宫廷和军费支出较法国更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政府的财政状况也较好。此外,银行业在英国也发展得更早、更有效,它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共同基金。

此外企业家人才大量集中在英国也值得注意。从事制铁业的达比全家、制造瓷器的库克沃西、经营棉纺织厂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布赖特父子以及投身于科学的道耳顿和爱丁顿等非国教徒人都做出了他们各自的卓越贡献,部分地解释了英国管理人才辈出的状况。打破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得在非国教徒中产生了很大一批实验家和发明家,而节俭则使他们可以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在奢侈的生活中挥霍掉。非国教徒在英国的影响由于来自大陆的同教人士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法国流失了相当多的经管管理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入了英国。

再一点就是英国在劳动力供应方面也占有优势。由于行会瓦解较早,又对传统的条块农田进行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行会及其多方面限制的消失使得采用分散的家庭作坊制度和建立机械化工厂变得更为容易。而始于16世纪的圈地运动则持续了3个世纪,它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自耕农不得不时常出卖劳动力,因为对公地和荒地的圈占使他们失去了其放牧的土地,并且也得不到燃料。早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上涨促成的,因此土地多半被用于放牧。其后,为迅速扩展的城市生产粮食变得更为重要,因此人们又开始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耕种粮食。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浪费土地的休闲制、选育良种和科学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耕耘机和自动播种机。

在1714年至1820年间共有超过600万英亩的英国土地被圈占。这一事实意味着严重的迁居问题,它给底层人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部分甚至全部土地,被迫租种土地或打散工,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去城里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使得关心社会的个别人极为恐惧,他们站出来直言不讳地反对。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令人不安和不快,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却实现了两个必不可少的功能——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因此,圈地可以被看作是19世纪英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的确,别的欧洲国家也发生过圈地运动,但其程度却要轻得多。例如在法国,法国大革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以至于加深了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使得他们不愿意收拾行李背井离乡。

五、工业革命的进程

只有强有力的需求才会刺激人们去创造各种发明。作为种种新发明基础的许多原理其实早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就已为人们所知,但就是由于缺乏刺激才未被应

用于工业。蒸汽动力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之一。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已为人们所知，但却仅仅被应用于开关庙宇的大门。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这种需要引发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蒸汽机。

棉纺织业的发展清晰地展现了这种“需求引起发明”的模式。一个领域的发明产生了不平衡，往往就会刺激其他领域的发明来纠正这种不平衡。例如，棉纺织工业之所以最先实现机械化是因为英国公众已经越来越喜爱最初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事实上，当时对棉织品的使用已经非常广泛，因此强大的旧毛纺行业在 1700 年设法通过了一个禁止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但该法律却并未禁止制造棉布，这就为本土工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而有生意头脑的中间人也是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机会。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使纺纱和织布提速，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当时设了很多奖项来奖励能够增加产量的发明，到 1830 年为止一系列的此类发明已经使纺织业完全机械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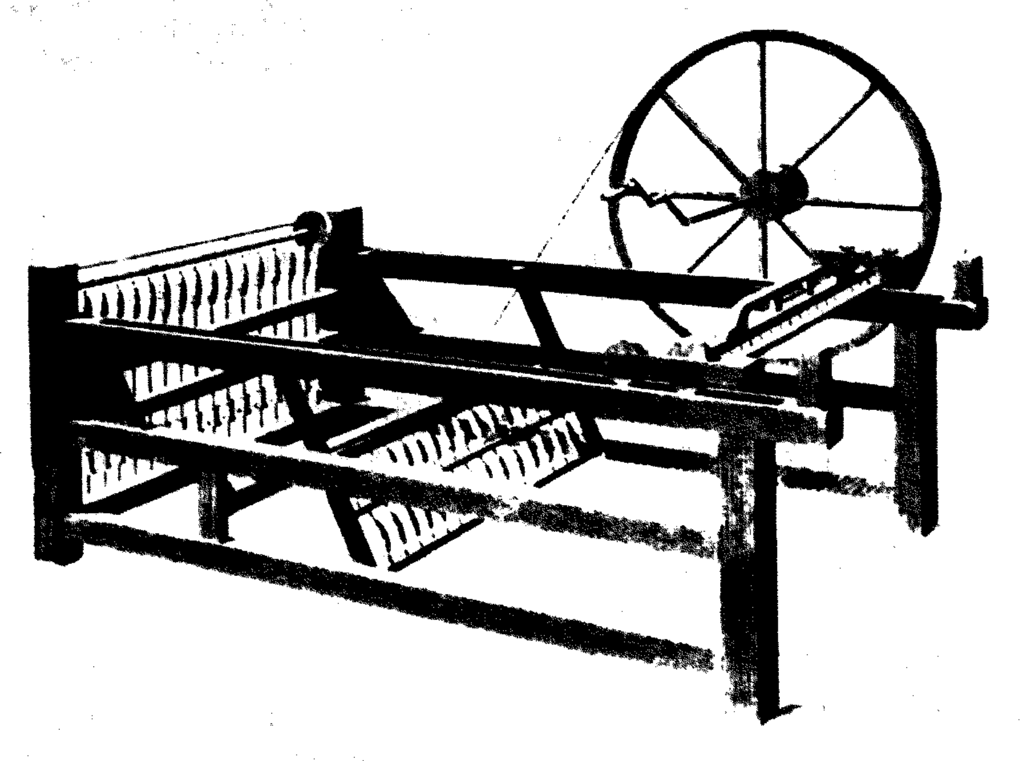


图 152　珍尼纺纱机

珍尼纺纱机。

其中较杰出的发明有：约翰·凯于 1733 年发明的能提高纺织速度的“飞梭”；理查德·阿克赖特于 1769 年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它能在滚柱间抽出又细又结实的线；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 1770 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使用这种机器一个人能够同时纺 8 根纱线，后来发展为 16 根纱线，最后则多达 100 多根；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的走锭纺纱机(1779 年)也是十分出色的。走锭纺纱机也被称为“缪尔”（骡子)纺纱机，因为



图 153 动力织布机

19世纪早期英国的动力织布机。

它综合了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的优点。这些新纺纱机生产的纱线很快就远远超出织布工的处理能力。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一新发明制作简陋,在商业上也无利可图,但是在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克服。到了19世纪20年代,在棉纺织工业中这种动力织机已经基本上取代了织布工人。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引起了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行业中的发明也激发了其他行业中相应的发明,以便使其他行业也能维持下去。新的棉纺机产生了对新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应该比传统的水车和马匹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强劲、更可靠。詹姆斯·瓦特在这方面做出了反应,他对约1702年前后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的原始蒸汽机作了多项改进。到1800年时已有500台左右的瓦特蒸汽机被付诸使用,其中有38%被用于抽水,剩下的则被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过分。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提供动力的手段,人类也由此而结束了其长期以来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依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新能源。不久人类还将开发储藏在地下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天然气。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大多数能源都被现代工业化国家利用的趋势。例如1975年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的11.5倍和29倍。在一个经

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取决于所能支配的能源的世界上,这些数字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实际上,19 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要求增加铁、钢和煤的供应量。这一点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革新得到了满足——亚伯拉罕·达比在熔化铁矿石中用焦硫代替了煤;亨利·科特发明了在去除熔融生铁中杂质的"搅炼"法;以及瓦特蒸汽机在矿井排水方面的应用。这种种事态发展产生的结果是,到 1800 年时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都还要多。英国的煤产量从 1770 年的 600 万吨上升到 1800 年的 1200 万吨,进而又上升到 1861 年的 5700 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也从 1770 年的 5 万吨增长到 1800 年的 13 万吨,进而则增长到 1861 年的 380 万吨。铁在产量和价格上都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进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又要求改进运输工具,以便运送大量的煤和矿石。这掀起了运河开凿热潮,使英国到 1830 年时拥有了 2500 英里长的运河。可以与运河时代相提并论的是伟大的筑路时代。1750 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硬化路面的技术,使其能够全年承受交通。这样,乘坐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也就从每小时 4 英里增至 6 英里、8 英里甚至 10 英里。

1830 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又遇到了来自铁路的挑战。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史蒂芬孙,1830 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 14 英里的时速行驶了 31 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拉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就因为它能够以比公路或运河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而支配了长途运输。到 1838 年英国已经拥有 500 英里铁路,1850 年这一数字增至 6600 英里,而到 1870 年英国则已拥有 15 500 英里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富尔顿是这方面的先驱。1807 年,他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1833 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航行到英国。5 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 16 天半和 13 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其航行时间仅为当时速度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 年塞缪尔·丘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线,它可以提前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还在通讯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只有用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传递音信,但在 18 世纪中叶人们发明了电报。1866 年人们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从而建立起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的即时通讯联络。

工业革命并未随着铁路或跨大西洋汽船、电报通信的出现而结束,今天这一进程仍在继续。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阶段是清晰可见的:第一阶段持续到 19 世纪中叶,包括棉纺织工业、采矿业、冶金业的机械化和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和运输业中的运用。第二个阶段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有两个特点:科学在工业上更直接的

THE WONDER of the AGE ! !

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special Patronage of Her Majesty & H.R.H. Prince Albert.

THE GALVANIC AND ELECTRO-MAGNETIC

TELEGRAPHS,

ON THE

GT. WESTERN RAILWAY.

May be seen in constant operation, daily, (Sundays excepted) from 9 till 8, at the

TELEGRAPH OFFICE, LONDON TERMINUS, PADDINGTON AND TELEGRAPH COTTAGE, SLOUGH STATION.

An Exhibition admitted by its numerous Visitors to be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ATTRACTIVE of any in this great Metropolis. In the list of visitors are the illustrious names of several of the Crowned Heads of Europe, and nearly the whole of the Nobility of England.

"*This Exhibition, which has so much excited Public attention of late, is well worthy a visit from all who love to see the wonders of science.*"—MORNING POST.

The Electric Telegraph is unlimited i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its communications; by its extraordinary agency a person in London could converse with another at New York, or at any other place however distant, as easily and nearly as rapidly as if both parties were in the same room. Questions proposed by Visitors will be asked by means of this Apparatus, and answers thereto will instantaneously be returned by a person 20 Miles off, who will also, at their request, ring a bell or fire a cannon, in an incredibly short space of time, after the signal for his doing so has been given.

The Electric Fluid travels at the rate of 280,000 Miles per Second.

By its powerful agency Murderers have been apprehended, (as in the late case of Tawell,)—Thieves detected; and lastly, which is of no little importance, the timely assistance of Medical aid has been procured in cases which otherwise would have proved fatal.

The great national importance of this wonderful invention is so well known that any further allusion here to its merits would be superfluous.

N.B. Despatches sent to and fro with the most confiding secrecy. Messengers in constant attendance, so that communications received by Telegraph, would be forwarded, if required, to any part of London, Windsor, Eton, &c.

ADMISSION ONE SHILLING.

T HOME, *Licensee.*

Nurton, Printer. 48, Church St. Portman Market.

图 154 1845 年的一份英文传单

应用和大生产技术的发展。尽管科学在其发展伊始对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它却逐渐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影响工业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就是煤衍生物；煤除了提供焦炭和照明用宝贵的煤气外，还能产生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真正的宝贝——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正如 19 世纪的德国在将科学应用到工业方面领先世界一样，美国则在大生产技术的发展方面居于领先。大生产有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以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将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亨利·福特发明的环形传送带，零件在传送带上传送，工人将其装配成模型——工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第二种生产方法是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来处理大量原料，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这种方法生产率巨大，这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以看出来：

>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运到相距 900 英里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美分。”[5]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工业革命的传播

在 19 世纪中工业革命逐渐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传播的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自然资源的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利时是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到 1870 年时大多数比利时人都已是城市居民，他们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继比利时之后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是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与此同时，非欧洲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起初是美国，随后是英国自治领和日本。后来者可以享受到更新和更有效的工厂的好处，英国则因之而丧失了其最初“世界工厂”的地位。

表 26.1 列举的各强国是按照工业生产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世界工业均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表 26.1 世界工业平衡变化(1860—1980年)

1860年	英国	法国	美国	德国
1880年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1900年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1980年	美国	日本	苏联	德国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平衡始终在持续地发生着变化。1995年世界经济增长了3.5%,但是大多数增长都是在欧洲之外实现的:美国和欧洲的增长率在2.6%和3.0%之间,而亚洲则达到了8.7%。1995年亚洲各国的增长率为,中国10.2%,韩国9.7%,越南9%,印尼7.5%。[6]

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对欧洲产生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增长早已开始。尽管19世纪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但是1914年欧洲大陆的人口却仍然膨胀到它在1750年的3倍以上。人口爆炸的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其次是医学上的。此前大部分人口死于传染病,而传染病的传播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水平。随着19世纪马铃薯种植的增加,人们的营养水平得到提高,对疾病的自然抵抗力也相应增强,死亡率自然也就随之下降。对俄国以西的大部分欧洲地区的人们来说,饥荒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即使有时会发生农作物歉收,新的运输工具也保证了来自外界的充足供应。同时工业革命还改进了下水道系统,饮用水也更加安全,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死亡率。因此死亡率统计显示,在主要的化学药品发明前30年,因主要传染病致死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

新医药科学的应用,例如接种疫苗、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等措施使得西北欧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从1800年至少30‰降低到1914年的15‰左右。因而欧洲的人口也就从1750年的14 000万迅速上升到1800年的18 800万、1850年的26 600万、1900年的40 100万和1914年的46 300万。欧洲的这一增长率比起世界其他地区要高得多,以至于它改变了世界的人口对比(见表26.2)。

表 26.2 世界人口

		欧洲	美国和加拿大	拉丁美洲	大洋洲	非洲	亚洲	总数
(百万)	1650年	100	1	12	2	100	330	545
	1750年	140	1	11	2	95	479	728
	1850年	266	26	33	2	95	749	1171
	1900年	401	81	63	6	120	937	1608
	1950年	572	166	164	13	219	1368	2502
	1990年	787	276	448	27	642	3113	5293

（续表）

		欧洲	美国和加拿大	拉丁美洲	大洋洲	非洲	亚洲	总数
（%）	1650 年	18.3	0.2	2.2	0.4	18.3	60.6	100
	1750 年	19.2	0.1	1.5	0.3	13.1	65.8	100
	1850 年	22.7	2.3	2.8	0.2	8.1	63.9	100
	1900 年	24.9	5.1	3.9	0.4	7.4	58.3	100
	1950 年	23.0	6.7	6.3	0.5	8.8	54.7	100
	1990 年	15.0	5.0	8.5	0.5	12.0	59.0	100

城　市　化

工业革命还引起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以往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其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分布于大河地区和冲击平原，如尼罗河流域、肥沃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大量人口涌入新的工业中心。由于能够从世界各地获得粮食，这些新增城市人口也就得以生存下来。与此同时，技术和医学上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也能够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使城市生活变得更可忍受、更令人满意。这些进步中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应洁净水、改善集中排水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保证充足粮食供应以及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 1930 年时城市人口已达 41 500 万，占人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在城市居住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到 1914 年时在像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里，其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里。

财富的增长

工业革命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史无前例地提高了生产率。这方面大不列颠首先受到影响，其资本从 1750 年的 5 亿英镑增长到 1800 年的 15 亿英镑、1833 年的 25 亿英镑、1865 年的 60 亿英镑。在 19 世纪后半期，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影响了整个世界。新西兰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稻米、马来西亚的橡胶、孟加拉的黄麻以及西欧和美国东部蒸蒸日上的工厂——所有这些资源都被编入了生气勃勃、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之网。表 26.3 中的数字表明了 19 世纪后半期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全世界发展的速度。

表26.3　工业生产的上升(1913年=100)

	德国	大不列颠	法国	俄国	意大利	美国	世界
1860年	14	34	26	8	—	8	14
1870年	18	44	34	13	17	11	19
1880年	25	53	43	17	23	17	26
1890年	40	62	56	27	40	39	43
1900年	65	79	66	61	56	54	60
1910年	89	85	89	84	99	89	88
1913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近年来,权威们在工业革命期间所产生的财富分配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看法。一部分人相信,所有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获益;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竞争不过新的机制商品而被淘汰。这些人与其他遭遇相似的人们一样都面临着同样严峻的考验:不得不迁居到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他们没有土地、房屋、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雇主。总之,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

但是在找到工作后,工人们却发现工作时间很长,一天工作16小时稀松平常。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将这一改变看作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超长也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其实与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相仿,但是在习惯工厂的纪律和适应机器生产的单调乏味方面工人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上下班,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味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雇主们自然会把他们的工资看作是一笔应尽可能降低的开支。因此许多雇主,尤其是纺织工业的雇主们往往更喜欢雇佣妇女和童工,因为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且更驯顺。对妇女和童工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至于议会的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都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形。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行业,而那些行业的情况则是最糟的。证人们向委员会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的确是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存在于整个英国工业。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处境,必须从当时而不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待。实际上,这些工人原来生活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稻草褥子里老鼠和虱子成群出没,风啸叫着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斑驳的灰泥墙。乡下散工的报酬非常低,因而他们不断涌入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到新工厂做工。此外,英国人口在工业革命早期剧增——这一事实与普遍的、未得到缓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难情景是不相符的。实际上,这些早期工厂的多数工人的

实际收入完全可能比其祖辈更高。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但到 19 世纪后半期我们完全确信,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的大幅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逐渐使得西欧的下层阶级也获得了实惠。在“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是在这之后西欧的工人就开始享有普遍的繁荣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 26.4 中的数字表明,在 1850 至 1913 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 1 倍。

表 26.4　实际工资的增长(1850—1913 年)(1913 年 = 100)

	1850 年	1860 年	1870 年	1880 年	1890 年	1900 年
大不列颠	57	64	70	81	90	100
法国	59.5	63	69	74.5	89.5	100

新消费主义

处于英国社会顶端的少数人和底层大众的收入同时增长,使得消费社会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成为可能。消费的欲望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就像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提到的一样:“fashion wears out more apparel than the man.”(流行的衣服永远比人们能穿破的衣服要多。)因此 18 世纪的英国所独有的不是消费欲望,而是大众消费的能力。在此前的人类社会中大众的收入太微薄,其将近 3/4 的收入都被用来购买食物,余钱还得购买其他必需品,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余力去买一时兴起想买的东西或是时尚物品。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时尚并不像现在这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和服、印度的腰布、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宽松裤、拉美的披风都是几个世纪以来一成不变。

18 世纪的英国是打破这个常规的第一个国家。这要归功于伴随其圈地运动后农业革命的实行、海外事业利润的大量涌入、工业革命导致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而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随着国民收入增长的一部分流向大众,一个比以往仅有顶层少数精英有购买力时的市场大得多的国内市场也就发展起来了。

商人们迅速改进其经营手段来迎合利润丰厚的国内市场。其实早在 18 世纪他们就已在运用一系列今天被认为是现代的销售技巧,包括市场调查、信用支票计划、手写账单、目录、报纸和杂志广告、不满意退款承诺等。这种大众商业的先驱之一是陶工乔萨·韦奇伍德,他坦诚地说:“时尚比美德更重要。”因而他制订了销售战略,使他的陶瓷成为全世界最知名、最受欢迎的陶瓷,尽管它往往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便宜。

一个研究新消费主义的学生总结说:“新消费主义使整个阶级开始购买它们从前从未有机会购买的东西。社会模仿效应使本来只买‘体面用品’的人开始购买‘奢侈用品’,使本来只买‘必需用品’的人开始买‘体面用品’……事实上,时尚及其利用



图155 时装店

18世纪时各种消费品的消费都大大增加了。这幅雕版画表现了一个可能是位于巴黎的商店。店内的女员工显然是在为一个女经理干活。她们正在制作各种衣物和帽子,以满足时装贸易的需求。

者提升了人们的'金钱体面'。"[7] 大众消费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而在20世纪它已成为全球社会的特点。

女性的新角色

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了新消费主义,而且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这场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极为深远,正如几百万年前农业革命对她们所产生的影响一样。一般来说,其主要影响就是迫使女性走出家庭,进入新的工薪经济。

前工业化时代的家庭经济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妻子、丈夫、甚至孩子们都在一起工作。这看起来似乎意味着愉悦、健康的家庭生活,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女性从事大量诸如纺线、织布、搭织布机等单调、重复的劳动。这些工作往往都是为其丈夫或父亲的工作做辅助准备的,因此她们常常需要长时间跟男性一起工作。而除此之外,她们还得做她们繁重的份内工作——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的工作场所从家庭转移到工厂和车间,女工作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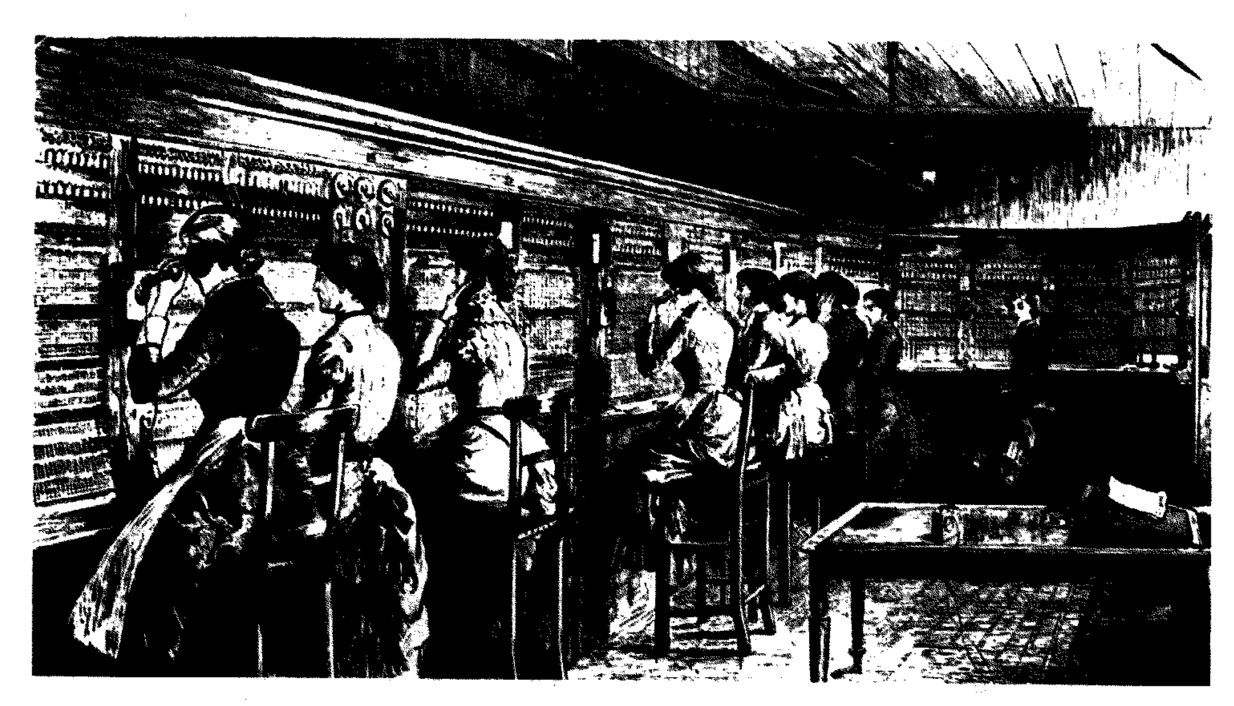


图 156　女话务员

正在一台电话交换机前工作的女工。电话的发明为女性开创了新的就业机会。

薪一族也成了金钱经济的一部分。这一变化对女性来说也有一些优势，比如因为工业家投入工厂和机器的资金更多而使得工厂极少停产，这就意味着工作更稳定。除了以年为单位雇佣的工人的年薪增长得更多以外，女工的工资也比其在家庭里收散活的收入要高得多。例如在 1914 年的曼彻斯特棉纺织厂，女工的周薪比起她们在家里绣手帕要高一倍。

但是新工厂里的工作也有一些男工和女工都不喜欢的负面因素。上面已经提到，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不健康，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太多。女性对这些剥削和不利格外脆弱，因为她们往往更温顺，不喜欢组织工会——工会的男性领导人也不鼓励、有时甚至还阻挠女性加入工会——而且女性一般也没有参加工会活动所需要的金钱和时间，因此在 19 世纪末女工的平均工资还不到男工的一半。

大部分女工在婚后和产后就都放弃了她们在工厂里的工作。但是由于丈夫的收入通常不够整个家庭的开销，她们也会尽可能地在家里做一些散活。这些临时性的工作包括收留寄宿生、缝纫、做假花、洗衣、照顾职业女性的孩子等。

在 19 世纪末，由于西欧婴儿道德观的急剧衰落，中产阶级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婴儿的出生率也下降了，而妻子们则也可以卸下长期怀孕的包袱。此外可以减轻家务动负担的省力的新式家电也出现了。综合上述这些因素，理论上家庭主妇的责任和工作量都应该大大减轻，可实际结果却远非如此。省力的家用设备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减轻家庭主妇的负担，因为廉价的佣人越来越少。现在母亲们发现，用洗衣机和电熨斗反而比过去用洗衣女工更累。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对中产阶级女性的主要期待不再是做家务，而是做母亲。

书刊杂志和社会舆论都在宣传这样一种观念:母亲应该关心全家人的身心健康。专家们为成功的现代母亲介绍新的"科学的"技巧。同时人们也期待着母亲们能够保留传统美德和女性特点。无怪乎许多中产阶级女性会对此感到焦虑和不满。一些人开始质疑婚姻要求她们服从丈夫和孩子的基本假设,结果也就出现了要求无论在家庭内外女性都应该享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得到更多机会的女权主义运动。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女性则没有时间、金钱和精力去为中产阶级妇女在家务与母亲角色之间挣扎的事情而烦恼。现实表明,她们没法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母亲和管家。她们不得不更多地去处理眼前的日常危机——失业,遭遗弃,疾病,长年的经济窘迫。对这些压力过大的工人阶级女性来说——她们占了女性的大多数——生活最后简化成了一场确保家庭能够应付日常开销的无穷无尽的斗争。



图157 油画贝尔里一家

家庭是中产阶级概念中一个稳定和受人尊重的生活的中心。这幅描绘贝尔里一家的画像是德加斯的作品。注意画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这暗示着他是与事业和家外的世界相连的;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站在孩子们中间,则表明她处于"主内"的地位。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早期帝国的欧化

在 1763 年以前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占据的是南北美洲，而在那之后列强则在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它们做的比这要多得多：欧洲人利用当地人口较稀少的情况成百万地进行移民并填补了那些相对空旷的地区。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工业革命是造成欧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知道生产率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引起了 19 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通过海外迁移找到了一条出路。铁路和汽船有效地将大批人口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则进一步促进了迁移，此外诸如爱尔兰的土豆饥荒这样的自然灾害也是迁移的原因之一。这种种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每过去 10 年，人口迁移的洪流便有一次巨大的增长。在 19 世纪 20 年代中总共才有 14.5 万人离开欧洲，19 世纪 50 年代中达到了大约 260 万人，而到了 1900 至 1910 年间移民人数则高达 900 万，这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有近 100 万移民(见地图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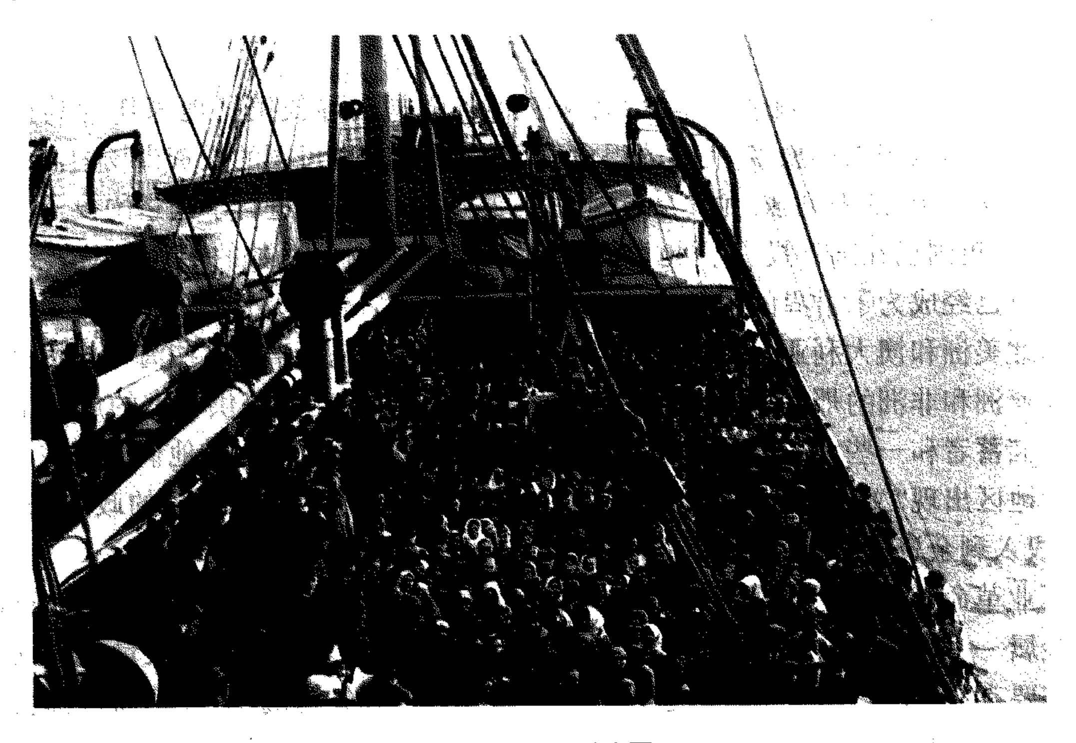


图 158　欧洲移民

1906 年欧洲移民正在去美国的路上。在 1846 年到 1932 年间，超过 5000 万欧洲移民到了美国、加拿大、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南非。

在1885年之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此后多数移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而言,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小部分又前往阿根廷和巴西。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规模极其巨大的人口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去大部分人涌入俄国的亚洲部分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完全是针对美洲和大洋洲的。其结果是,西伯利亚、美洲和除南非以外的英国自治领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设法活了下来,但幸存下来的却终究只是少数。

海外领地种族上的欧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这一进程将在第35章中进行描述。

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

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系统在亚非地区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1870年以后出现的建立帝国的巨大浪潮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它使全球大部分地区都沦为了少数欧洲强国的附属物。从攫取那些可以成为数量日益增长的制成品的市场的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很快19世纪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其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就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后者又使得各强国去寻找殖民地来作为其投资场所。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迫切。实际上,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到1914年英国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14年时欧洲已经成为了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目的地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海外投资就已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那些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此时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会为其资本的安全而担忧。他们渴望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因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就也刺激了新帝国主义的发展。

工业革命还引发了对机器用原料的需求。由于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大都来自世界上那些"未开化"地区,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大量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而这种投资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则通常都会导致强加的政治控制。

不过新帝国主义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相关,而是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因素之一是,列强希望得到像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



图 159 开发非洲

欧洲人对非洲的开发。照片拍的是属于一家位于南非的金矿公司的白人工头和黑人劳工。

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列强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正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因素之三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 19 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以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舆论却时常会要求国家进行反击。因此各国政府都知道,可以利用这类事件作为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得斯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定居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他希望我做的就是在英国人的非洲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红色。"[8]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综合起来,最后导致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可以让成吉思汗的征服都为之失色。在 1871 至 1900 年的 30 年间,英帝国的土地增加了 425 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 6600 万,法国土地增加 350 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 2600 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 50 万平方英里土地和 650 万人口,德国则增加了 100 万平方英里土地和 1300 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 90 万平方英里土地和 850 万居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到 1914 年时原本作为世界一小部分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俄罗斯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和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形势。在 20 世纪后半叶,大部分的

全球冲突都是对欧洲统治的反应。

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那么为何19世纪后期的欧洲大扩张应该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会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9]无疑,罗马人是实行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但是,"新帝国主义"一词还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就其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罗马通过掠夺、收集以粮食为主要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剥削却并未特别地影响其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和经济结构——其殖民地继续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生产几乎同样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像将一把铲子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传统的帝国主义也包含剥削,但却不包括根本性的经济社会变化:贡物仅仅归于某一统治集团而不归于另一统治集团。相形之下,新帝国主义则迫使被征服的国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西欧的生气勃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太复杂、太富于扩张性,因而不能说它与殖民地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进贡关系。

最初,欧洲征服者肯定是毫不迟疑地掠夺和征收贡物。英国人在印度就曾这样做过,正如早先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经过最初的阶段之后,欧洲生气勃勃的经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寻找原料产地和市场。因此,新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将工业革命推进到其逻辑上必然的结局——使工业国家即工业资本主义能以全球规模发挥作用。而这则导致了对世界人力物力资源的更为广泛、协调和有效的利用。无疑,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产生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世界生产率肯定无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0年间增加了3倍,在1860至1913年间增加了7倍。而世界贸易的价值则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亿英镑、1900年的40.25亿英镑和1913年的78.4亿英镑。

人们对于世界经济这块蛋糕增大所带来的好处的意见是一致的。争论集中在蛋糕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殖民地诸民族已经感觉到,他们过去所得到的少于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所得到的总量已明显增加,否则他们日渐增长的人口就无法供养。例如,有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1949年在矿物丰富的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从事开矿的欧洲

公司将他们的产品总共卖得 3670 万英镑。在这笔钱中，他们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仅为 1250 万英镑——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资金被转移到了国外。而且在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 1250 万英镑中，还有 410 万英镑是支付给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欧洲人。在这 3670 万英镑中，只有 200 万英镑是给了在矿井里干活的非洲人。然而，这些工人平均一年可以得到 41 英镑，而殖民地每个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则是每年 27 英镑。[10]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诸殖民地民族对增长了的生产率或外国公司支付的工资，印象并不很深。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可怜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与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较时。而且他们对于让自己担任苦力的角色也很不满，这一点甚至在有着工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地区也是如此。

显然，西方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应与殖民地民族对新帝国主义的反应有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并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变革的运动。但是这两者又有一个基本差别：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对本民族的雇主，而宁可反对外国统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们的反对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靠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支持的。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这些主义，正是它们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了解这一革命与了解工业革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不仅受西方的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还受到了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推荐读物

M. Boas 所著的 *History of Science*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58)的第十三卷列出了关于科学革命的优秀参考书目。考察整个科学史的杰出平装本著作有：W.C. Dampier 所著的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Harcourt Brace of Jovanovich, 1957)；A.R.和 M.B. Hall 合著的 *A Brief History of Scienc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F. S. Taylor 所著的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and Scientific Thought* (W. W. Norton, 1949)。W.C. Dampier Whetham 和 M. Dampier 所编的 *Cambridge Readings in the Literature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28)也是一本非常有益的书。

E.E. Lampard 所著的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terpretations and Perspectives*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57)第四卷是一本简洁分析有关工业革命的解释和文本的著作。全景式考察中最好的是 D.S. Landes 所著的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9)。A. Thompson 所著的 *The Dyna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ward Arnold, 1973)也富于启发性。关于工业革命从英国流传到其他地区的过程，请参见 W.D. Henderson 所著的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the Continent* (Cass, 1961)；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请参见 E.J. Hobshawn 所著的 *The Age of*

Revolution: *Europe*, 1789—1848 (Weidenfeld, 1962), E.P. Thompson 所著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Gollancz, 1963), T. McKeowan 所著的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Academic Press, 1977), N. McKendrick 等人所编的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L. Brockway 所著的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ion* (Academic Press, 1979); D.R. Headrick 所著的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1981); H. Magdoff 所著的 *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Age to the Present*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R. Bridenthal 和 C. Koonz 所编的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1977)第 11 到 14 章总结了工业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更详细论述这一点的著作有: L.A. Tilly 和 J.W. Scott 所著的 *Women Work and Famil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E.S. Riemer 和 J.C. Fout 所编的 *European Women*: *A Documentary History*, 1789—1945 (Schocken, 1980); J. Rendall 所著的 *The Origins of Modern Feminism*: *Women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60 (Macmillan, 1985)。

注释

1. T. Sprat,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of General Knowledge* (London, 1734), p.72.
2. *Siderius nuncius*, trans. E.S. Carolos (1880). Cited by M. Nicolson, *Science and Imagin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56), p.15.
3. Charles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 Vol.I (New York, 1872), p.3.
4. H. Butterfie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 (Bell, 1957), p.179.
5. Cited by L. Huberman, *We*, *the People*, rev. ed. (Harper & Row, 1947), p.218.
6. L.R. Brown, *Vital Signs 1996* (W.W. Norton, 1996), p.74.
7. Cited by N. McKendrick,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p.98.
8. Cited by Huberman, *We*, *the People*, p.263.
9. Definition from W.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2nd ed. (Knopf, 1935), p.67.
10. P. Deane, *Colonial Social Accoun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3), p.37.

一旦“张扬的自由”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了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

——G.W.F.黑格尔

第27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其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也构成其基础之一。政治革命的实质是，它终结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处于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出，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将此视为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情形，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世界性影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同经济革命一样，政治革命也是分为几个阶段发展起来的。如前所述，经济革命始于英国，而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最后则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一样：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着其开端，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着其进一步发展，接着它在19世纪影响了整个欧洲，最后它则在20世纪席卷了整个世界。

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并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两次革命息息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革命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产生了一个有新利益、有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意识形态的新阶级。其实我们只要简要地追溯一下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过程，就会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在中世纪初期西欧存在着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

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以自己的劳动供养以上两个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在财富和人数上的增长,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和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变得日益不满。于是它就与民族君主政权结成了一个互惠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以维护其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而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获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他们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赋税,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被称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获得它所指望得到的利益和权力的特殊纲领。

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转过来却又受到了来自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居住在拥挤城市中的工人的阶级意识日益觉醒。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同时还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不久我们就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的一种主要力量,而在20世纪它则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充满活力的信念,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个阶级并能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人们在传统上首先效忠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而到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则扩大到了新的民族君主身上。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都效忠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民族王朝、民族军队和民族教育制度相继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就把从前公爵领地的属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了涵盖一切的民族。新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里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而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着欧洲各民族越来越多的阶层行动起来,并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推动力和凝聚力。这样,政治革命就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道对欧洲统治世界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谐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的认同感——可以解释欧洲人为何能够轻松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一个可以说明为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不和睦会造成社会虚弱的突出的例子。印度当时仍然是一个迥然相异的民族、宗教以及相冲突的地区集团的集合体,所以它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一个半世纪里,这块拥有千百万人口、灿烂文明和古老历史传统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陆一直被为数很少的英国军人和官员不太费力地统

治着。当 1857 年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爆发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在我周围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的男人、妇女和孩子都兴高采烈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1]

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都曾感受过史蒂芬孙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了《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经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动乱都是这些激动人心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是英国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公开的内战，国会在战争中获胜。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到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士绅们的欢迎。它将敌对的贵族家族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切断了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分配了原本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了海军，实行了深得民心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 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 年在位)很快就挥霍掉了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给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了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摆脱国会进行统治，但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着国家的财政大权。他们试图通过出售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卖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但也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自由臣民都有自由经营其行业的权利"。[2]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次于 1640 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但对查理对金钱的需求不予理会，还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要求，于是 1642 年战斗就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

直到 1688 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都处于骚乱之中。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共同构成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分成五个阶段：从 1642 至 1645 年的第一个阶段为内战阶段，保皇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 1645 至 1649 年的第二个阶段中，获胜的清教徒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类似的情形后来在 1792 年的法国革命和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有重演。最后克伦威尔领导的温和派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 1649 年被处死

时，克伦威尔当上了史称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元首。

在从1649至1660年的第三个阶段里，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们极其有效而虔诚地统治着英国。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封建权利受到压制，宗教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继任共和政体护国主的是他的儿子理查。但是由于后者是个庸碌无能之辈，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刻板清苦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以成功复辟。从1660至1688年，英国革命经历了它的第四个阶段，史称王政复辟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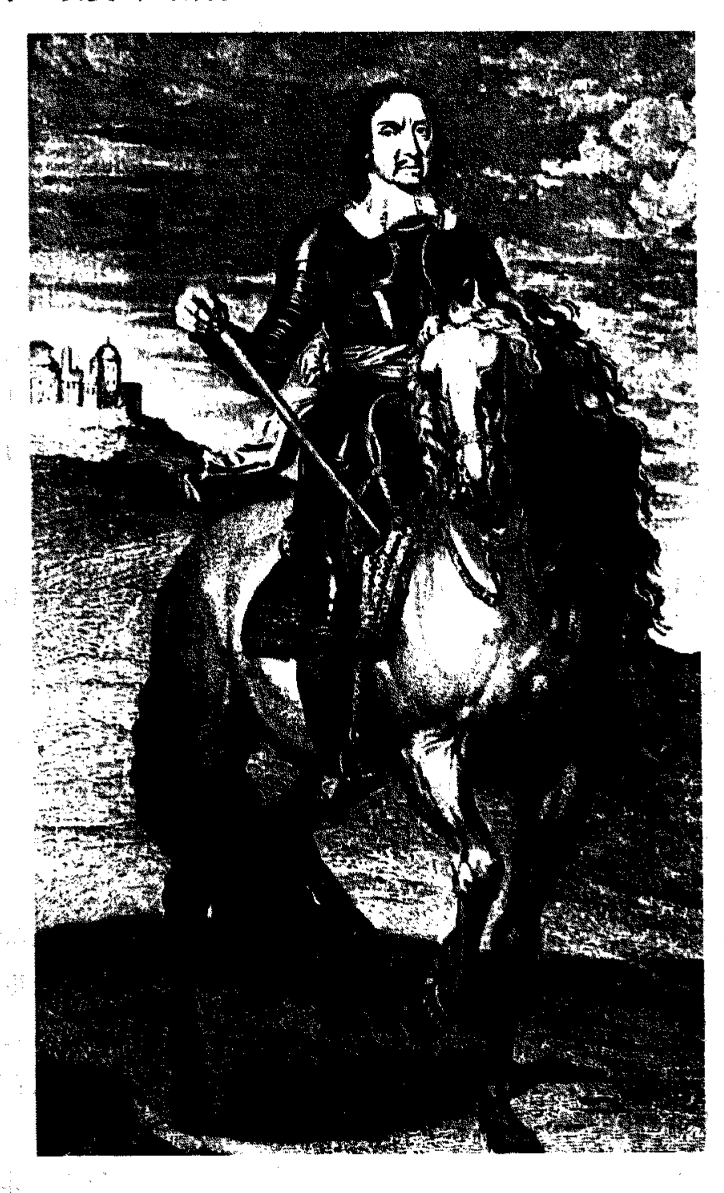


图160　克伦威尔

在英国内战当中，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打败了国王的军队。在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之后，克伦威尔掌管着短命的共和国，征服了爱尔兰和苏格兰，并于1653年成为护国主，直到1658年他死去。

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无力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的确试图恢复其个人统治；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得父子二人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到来而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新统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他接受

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这一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必须实行法治;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此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事实上,直到 19 世纪后期普选制得到确立时这一目标才得以实现,但是它的确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结束了半个世纪前就已开始的英国革命。

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有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及财产安全,但是清教徒们却并没有就此取得一致意见。他们表达了许多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宗教为例,当时有大量的新教派相继涌现,包括公理会、浸礼会和贵格会。而与之同时长老会教徒则正在力图将他们的教派建成全国性组织,以便让所有公民都入会。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毁于一旦,也许国家本身也会垮掉。正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人们创立了宗教宽容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这不仅仅是权宜之计,也是基于原则的。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国家支持的官方教派,其成员也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来讲当时已经确立起了这一原则: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信仰的基督教徒均应被授予良心的自由。

人身和财产权问题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甚至比宗教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左右两派。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长官和国会的忽视,分裂开始慢慢发生。平均地权派有力地表达了他们的呼声,“平均地权派”是对一个主要由城市下中层阶级和佃农发起的群众运动的蔑称。不过下议院在其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确实也包括了平均地权派的基本原则:“在凡间,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由人民选出,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3]

如果国会真的是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导致国会与平均地权派相互对立的问题又是什么呢?答案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下议院议员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或永久利益”的人——即财产所有者;而平均地权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议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4]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到底是实行立宪议会政体还是民主政体。许多赞成民主政体的人们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则因害怕这类改革而坚决反对平均地权派。

事实上,17 世纪的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下中层阶级和佃农具有小私有阶层的眼光,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富足的食品。但是 17 世纪英国

的社会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正如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也失败了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者都缺乏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社会革命的时机直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经培养出了大量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发展起了一种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而且反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三、启蒙运动

紧随着17世纪英国发生的大震荡，欧洲的政治革命也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即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基本上将过去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有在他们这个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出现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相信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那么这种不断进步是如何得以保持的呢？答案非常简单却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实际上，进步和理性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则都是那些被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这些哲人既不是正式的哲学家，也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而多半是文人或做普及工作的人——更像是记者，而不是哲学家。这些哲人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通过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他们相信不仅存在着控制物质世界的自然法则，也存在着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理性被用来检验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经过了其全盛时期且又摇摇欲坠的法国旧制度来说，这尤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些哲人使得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都遭受到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但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发展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原则，并打算通过这些原则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主义——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严格控制经济生活，即通常所称的重商主义的反应。重商主义在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被认为是确保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到18世纪时它却似乎已经变成多余甚至是有害的。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



图161　洛克像

约翰·洛克(1632—1704),他维护人民的权利,反对那些认为自己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们。

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译《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对自由放任主义作了经典论述。他论证说自利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动机,国家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政治家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在宗教方面,他们的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狂热和不宽容。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控制宇宙并支配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而去寻求一种由理性支配的自然宗教,其结果则是产生了种种从根本上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有些人就此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不过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则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多数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乐于接受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也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转而不加干涉。因此,自然神论者就能同时做两件相互冲突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既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特色的内容,如圣灵感孕、耶稣复活、基督神性和《圣经》中的神启。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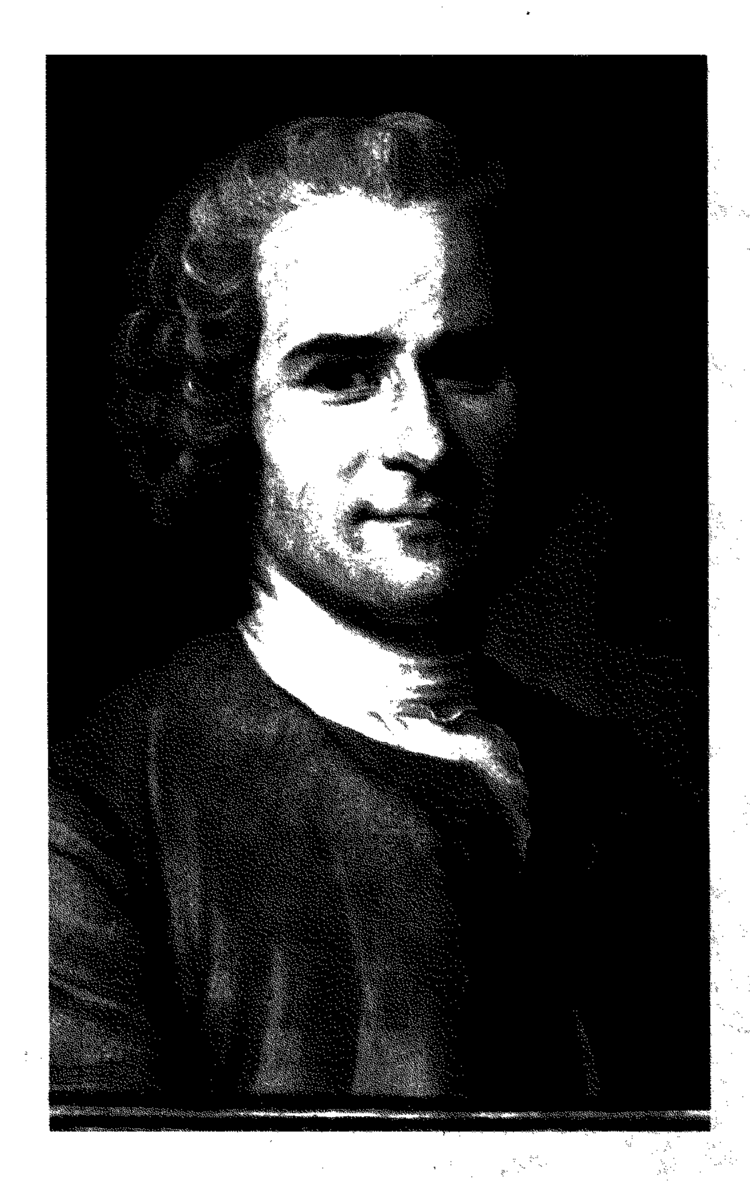


图162　卢梭像

让·雅克·卢梭(1712—1778)，他提出了一些启蒙运动中最深刻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断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词语——"社会契约"。其实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其发表于1690年的《政府论》一书中就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达成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则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只将统治权看作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了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人民的革命是正当的。

以上简短的介绍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所产生的意义。"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颠覆了传统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

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构成了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仅仅看作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作人类的成员。他们试图从全球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并试图发现与牛顿发现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普遍适用的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恒定法则，但是他们的著作却的确影响到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爱好思考的人们。他们最大的直接成就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接受他们的至少某些学说。虽然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却已经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虽然他们坚持认为政府权力依旧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它此时也已被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开明专制君主。

在这些开明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 年在位）、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 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 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其中口才最好的，她常常会说出启蒙运动的典型口号，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很危险"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未仅仅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叶卡捷琳娜大幅度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推进普鲁士农业做了大量工作；开明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当属约瑟夫二世，他在其统治期间由于试图根据新原则改造其帝国而殚精竭虑。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这是因为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妥协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开明专制君主实践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因为直到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深刻地影响到欧洲的大众。但是在 1789 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上就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典范。

我们先前已经提到过（第 25 章，第 3 节），这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们在政治上难以驾驭，它们的民选议会总是与从伦敦派来的总督及其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过，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法国，并通过 1763 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起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英国人和北美人民对他们所取得的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新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被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个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了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强化其对帝国的控制。这种强化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在消除了法国的威胁之

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足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也就是起因于英国的帝国权力和北美的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

在北美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都赞成诉诸暴力。事实上，人们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存在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关系，但激进主义者则要求改变与英帝国的关系，使殖民地从此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后者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发生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转移。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者遭到激烈反对，因为他们不想引入民主政体，而是希望能够像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无能的英国官员屡犯大错，激进主义者得以大行其道。

革命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详述。首先是1763年英国发布公告，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本是为了在能够制订出明晰的土地政策以前维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希望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则以为自己将因为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接下来英国政府施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的一部分繁重税赋转嫁到北美殖民者身上。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为击败法国人耗资巨大，将来为保护北美的边疆估计还需花费更多，这些税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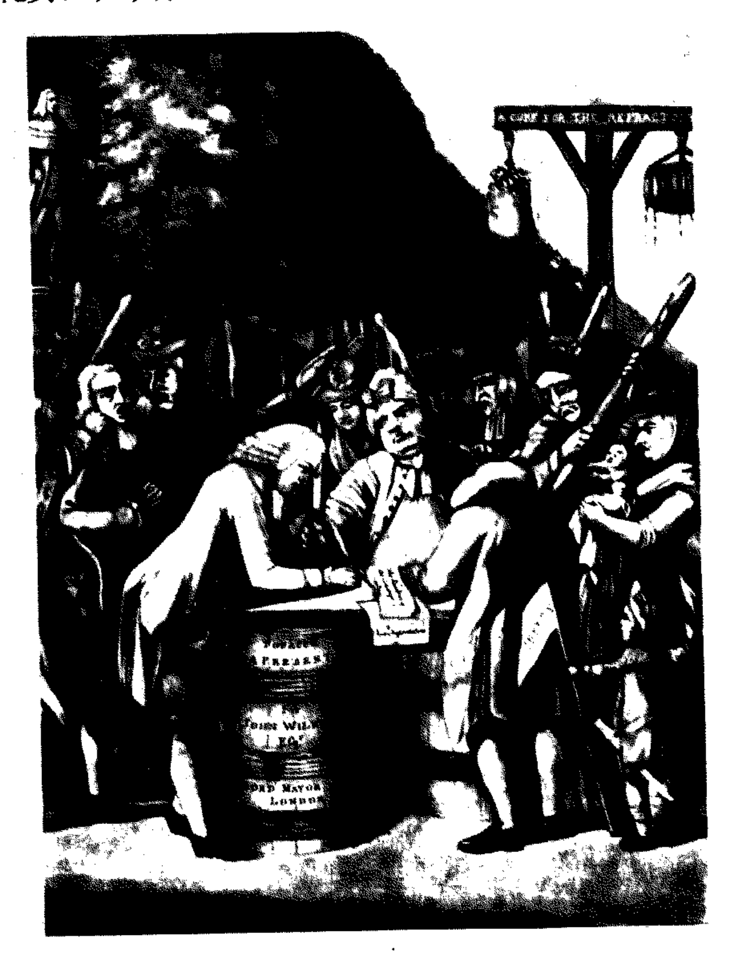


图163 高压统治法

为了反对1774年制定的高压统治法，第一次大陆会议号召美国人参加大陆联盟，并与英国人断绝商业往来。此后几年在伦敦印制的这幅画表现了如果弗吉尼亚人拒绝报名参加的话，他们会遭到怎样的下场。画的背景处是一个绞刑架，上面挂着一袋羽毛和一桶沥青。

但是殖民地居民则由于都受到了这些税收的影响而一致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全美会议,组织抵制英货,直到这些措施被取消为止。然而这时的英国政府却又采取了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以至于引起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托马斯·潘恩论美国革命

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年)是对美国革命的雄辩赞美。它也是对早期埃德蒙·伯克对法国革命所作负面反省的回应。潘恩是那个寄希望于更多革命会"开启人类新纪元"的时代的典型。

阿基米德对机械力量的描述也可以被运用到理性和自由身上:"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美国革命展现了理论上的机械力量。旧世界的政府是如此根深蒂固,独裁和旧习是如此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以至于在亚洲、非洲和欧洲都没有改革人们政治条件的开端——自由在全球都遭到禁锢,而理性则被视为叛逆,人们受到恐惧的奴役,害怕去思考。

但是所有真理要求的、需要的就是现身的自由,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本性。太阳不需要铭刻就能自别于黑暗,美国政府一旦将自己展现给世界就震惊了独裁主义,人们开始蔑视修修补补。

但是如果不是伴随着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美国的独立也只会被认为是从英国的简单分离,因而是无足轻重的……

如果人类有幸能够拥有普遍的和平、文明和商业,那么如果不对政府制度进行革命这一切就不可能到来。所有的君主政府都是好战的。战争是他们的交易,劫掠和财富是他们的目标。当这些政府继续存在时,和平连一天也不能存活。所有君主政府的历史除了令人作呕的人类惨状和偶尔的间歇期之外还有什么?厌倦了战争和人类的屠杀,他们坐下来休息,称之为和平。这绝对不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和平……

早期世界上发生的革命没有任何让全人类感兴趣的东西——它们改变的只是人物和措施,而不是原则——因而它们只是事物发展的平常的起起伏伏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应该被误称为"反革命",因为它恢复了在早期曾被征服和独裁所剥夺的权利。既然人间万物的潮流有消有长,方向各不相同,这里的道理也是一样。建立在道德理论、普遍和平制度和不可废弃的人类固有权利基础上的政府现在正从西方向东方扩展,这里的动力比利剑的政府从东方向西方的扩展还要强大。现在对它的进步感兴趣的已经不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它预示了一个人类种族的新纪元。

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London, 1972), pp. 1—5.



图164 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1773年，为了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美国的茶叶交税，"自由之子"组织的成员将自己假扮成印第安人，并将货船上的茶叶倒入海中。

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倾茶事件、旨在惩罚波士顿港口破坏行为的"强制法令"（不可容忍法令）——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与此同时，英国国会还于1774年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裔加拿大人制定了一个政府制度，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可以说，《魁北克法案》中积极方面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却将其谴责为又一道为了信仰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不可容忍的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又一次组织抵制英货。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去夺取那里的非法军火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列克星顿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果则是英国军队被围困在波士顿。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它开始指挥一场真正的战争，着手招募一支美国军队。

大陆会议仍然不愿和它的母国做最后的决裂，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情绪不断高涨。1776年1月潘恩出版了一本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广为传阅，它大大有助于大会在1776年7月4日做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全面展开后，法国对革命者的援助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在战争进行的前两年中并没有正式卷入，它只是把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殖民地。在关键性的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国人所用武器的90%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列强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对乔治·华盛顿所率领军队的胜利，以及最后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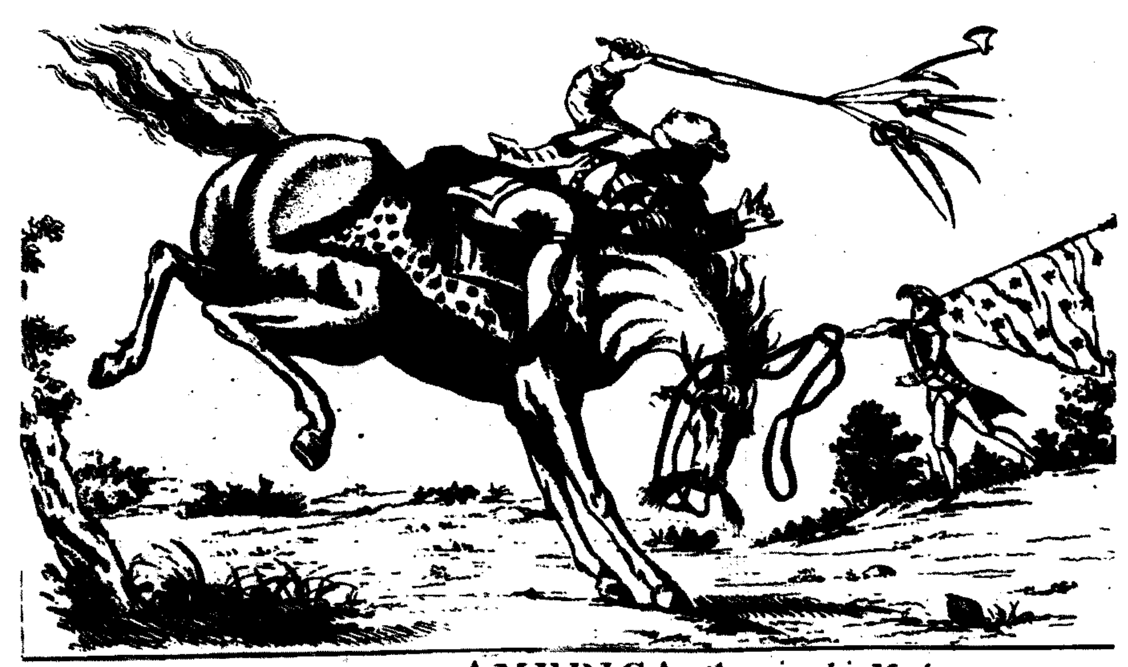


图165 美国革命

1779年的一幅漫画描绘了美国革命的结果。

国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都起了重要作用。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其边疆一直向西伸展到密西西比河。

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由于《独立宣言》已经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因而美国人民就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他们没收并拆分了亲英分子的大地产,赋予所有成年男子以选举权(但是不包括妇女)。许多州政府都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国家教会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国家法律。十三个州都接受了以《独立宣言》的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这一宪法保证公民的天赋权利。

虽然美国革命带来的这些变化并没有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带来的那样广泛和深刻——这些后来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促成了较美国革命多得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然而这一革命在当时却具有深远的影响。欧洲人普遍认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意味着启蒙运动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可行的政体。于是美国也就成了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并作为一块没有历史负担和枷锁的新大陆而备受羡慕。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较之英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显得格外突出。它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所引起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更多,影响的地域也更广。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够引人注目,但对各阶层人们均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也已出现。的确,以往长期居于舞台两侧的"人民"此时则开始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并一直留在那里。

那么为什么这一巨变会发生在法国呢?其根本原因就是: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故乡直到拿破仑上台之后才由一个开明专制君主进行统治。因此,法国是一个极其低效且不公正,以致其统治机构摇摇欲坠陷于停顿状态的国家。而也正是这种停顿状态,才使得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就其组织而言,法国的旧政权是贵族政权。所有的法国人在法律上都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其总数约为40万。第三等级包括所有其他人——2000多万农民、约400万城市商人和工匠。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却拥有约占全国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下的大部分益处。除了攫取了这些不相称的利益,他们还几乎被免除了全部税赋——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身份的。

如此一来,税负也就落到了第三等级,尤其是农民身上。后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却仅拥有30%的土地。而且农民还必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由于1720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入来源)却又远远滞后,这一税收负担也就变得特别繁重。

除了农民,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涨了22%。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则并未感到纳税方面的困难,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都还从物价上涨和法国贸易从1713至1789年间增长5倍中获得了不小的利益。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却也极不满意:他们怨恨他们受到了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不能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担任高级职位。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

贵族革命

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此。法国革命同自古以来的其他革命一样，一开始还是比较温和的，但却逐渐地变得越来越激进。实际上，它早在 1789 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前，就已在 1787 年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了。然后它经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回潮为止。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其在 16 和 17 世纪被王室夺走的政治权力。



图 166　法国的社会等级

这幅作于 18 世纪末期的漫画讽刺了法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它描画了一个戴着镣铐的穷人，他代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他们供养着一个贵族、一个主教和一个议员。贵族正在宣扬封建权利，主教手中拿着有关宗教迫害和僧侣特权的文书，而议员手里则拿着一个列着贵族统治的议会的权利的文件。

当时国王的特派员已经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则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的权力之大可以从自161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看出。因此当路易十六由于支持北美革命耗资巨大而发生财政困难时贵族就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这一点也就很可以理解。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地产所有者的社会地位而对所有地产都统一征税时，贵族和教士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特权阶层指责这种新税非法，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决定如此重大的改革。由于资金严重匮乏，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够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事实却证明他们的盘算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并未导致贵族的胜利，而是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第三等级从一开始起就是最有活力也是最起决定性作用的等级。第三等级共有代表600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则各为300名。而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则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夷特侯爵)，也都站到了第三等级一边。中产阶级的代表也有一些改变现状的想法——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大体上学会了应该如何去实现这种变革。他们还拥有政府迫切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希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平民们赢得了他们的第一次胜利。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的，第三等级就会永远处于三分之一的少数地位。但是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占据多数。国王路易是一个相当愚蠢而且思想贫乏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当平民径自宣布自己的会议为国民议会时路易投降了，他于6月23日下令三个等级合并。

但是国王的让步却并不代表其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安东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国王的真正意图在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时表露出来，因为该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与之同时，几个忠实的王军团则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而且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国王：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则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就在这一紧要关头，国民议会中的平民却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群众性阶段的革命。



图167　攻打巴士底狱

1789年7月14日群众蜂拥攻入巴黎的巴士底狱。这一事件的实际意义只是去解放关在狱中的一些人，但它却标志着巴黎群众第一次主导了革命的进程。

民众革命

此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而是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们则追随其领导。下层民众在内克被免职后爆发的革命中涌上街头，要求更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进行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士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此时已很少使用。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却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法国"巴士底日"就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在被庆祝的原因所在。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参与挽救了资产阶级，此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这样的时刻在随后

的岁月里还曾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在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则是反对整个欧洲旧秩序的斗争时均是如此。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农民在其长久苦难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狱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的激励下,纷纷拿起了武器。在许多农村,他们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年那些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许多其他重要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宣言》。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就人们的权利而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国家实质上是所有主权的来源……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力中……"但是宣言的最后一条则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其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显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规定的损失赔偿是公正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应当被剥夺这种权利。"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得"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则传播到整个世界。

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或宣言的革命原则,但是巴黎的下层民众却再次战胜了王室的反对。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饿民众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然后向凡尔赛的王宫进军。在这些民众的压力下,路易同意将宫廷迁到巴黎。王室成员住进了杜伊勒里宫(巴黎的一座宫殿),在那里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囚徒,而国民议会则设在附近的一所骑兵学校里。正是10月里那些充满骚动的日子才使得8月法令得以批准,而且它们也使得巴黎民众的影响大增——王室和国民议会现在都已开始受到民众行动的左右。

战争和恐怖

虽然巴黎的国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但是许多教士和贵族却仍然决心恢复他们刚刚失去的财产和特权。其中有些人逃亡国外,试图借助国外力量来进行一场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战争。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而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即吉伦特派也赞成战争,因为他们相信可以由此在法国建立一个共和国,革命学说也可以由此传播到整个欧洲。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反对法国一边。最初装备很差的法国人被击溃,但是无数的志愿者在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浪潮中成群结队地涌到了法国的旗帜下。与之同时,巴黎民众也加入了反对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安东内特的行动中。在民众的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时停止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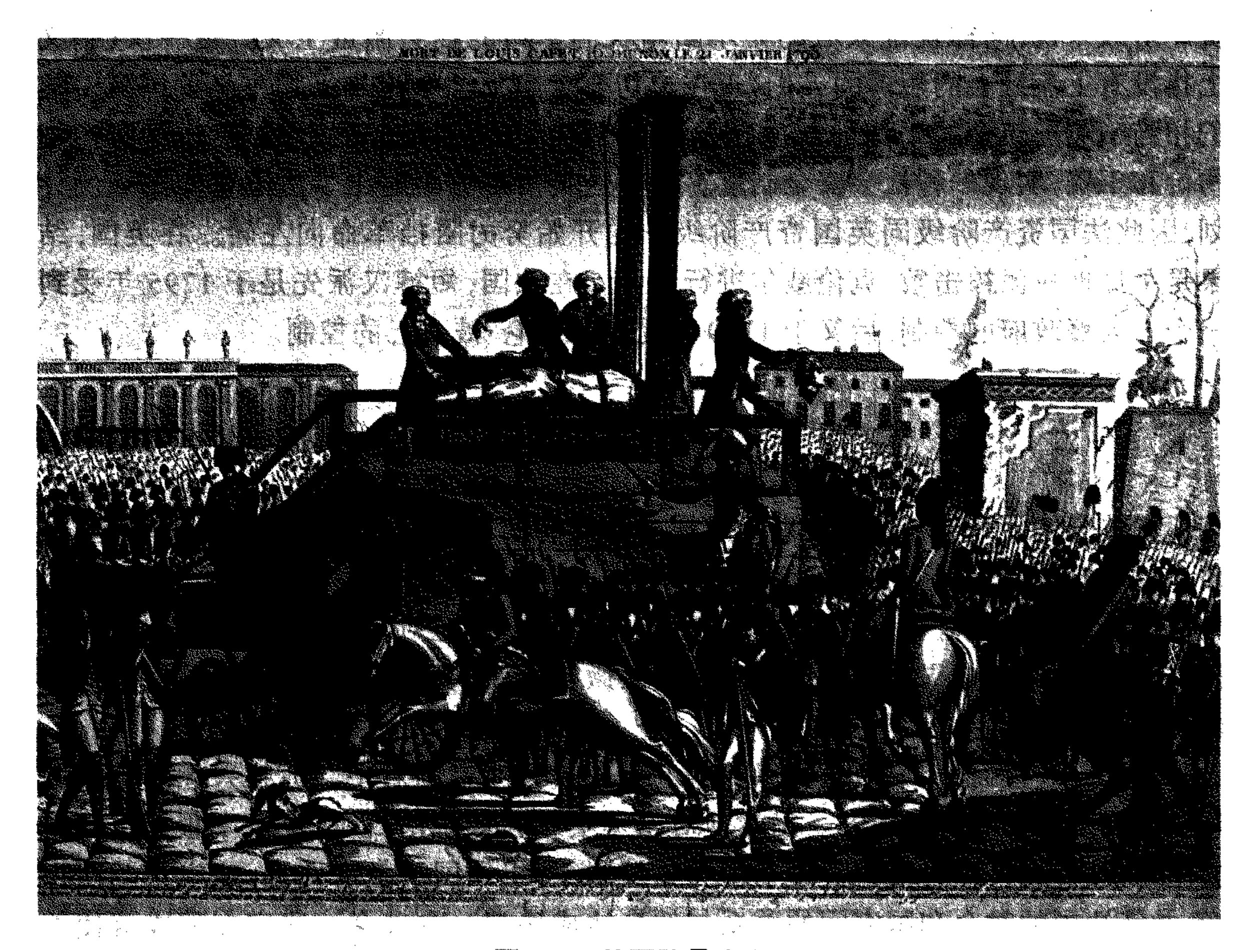


图 168　处死路易十六

1793 年 1 月 21 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1792 年 9 月 21 日，经过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正式召开，它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事实证明，革命干劲和民众支持结合起来无可匹敌，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 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对法国的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了著名的全民总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14 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他们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势如破竹。到 1795 年时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日益左倾，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经过普选产生的，还因为努力备战引发了它的革命热情。1793 年 6 月吉伦特派被更激进的雅各宾派所取代，此时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公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激昂的爱国精神任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问题立法，并通过残酷的恐怖统治来镇压反抗。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叛国罪或者仅仅因为爱国精神不够就受到指控，并被送到"国家剃刀"——即断头台之下。

但是恐怖统治却逐渐失去了控制，以至于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儿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继路易和安东内特之后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被送上了断头台。对

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不断增长的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短裤汉(字义上指没有上流社会的短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地权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实行政府控制物价和工资,实现一种社会安全制度。由于这类措施完全超出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开始努力阻挡革命向左转。在英国,结果是平均地权派被击败,克伦威尔进行统治。在法国,短裤汉派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5人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拿 破 仑

拿破仑作为一个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这种声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于1799至1804年作为第一执政,后又在1804至1814年间作为皇帝统治了法国。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巩固了革命成果的国内改革和在邻国激起了民族主义反应并最终导致他的垮台的军事战役。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统治效率很高。他把法律编集成法典,使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仑这些实在的成就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虽然也存在着渴望复辟旧制度或是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但是大多数人则都因为他结束了骚乱和建立起了一个可信任的、强有力的政府而向他欢呼。

但是,这种爱戴却被拿破仑自己所不断进行的战争给毁掉了。作为一个军事天才,拿破仑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于1810年达到他的事业的巅峰。他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而欧洲的其余地区则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对它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所有被他征服的地区都贯彻了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虽然各地的既得利益集团坐立不安,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却仍在许多地方获得了普遍支持。虽然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也都赞成这些变革,但事实仍然是它是一种外来统治,如有必要即可凭武力强加。拿破仑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用、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倦,虽然法国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对行政管理的法国式性质的印象比对其质量印象更深刻的时候来临了。

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也已经发展成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日益增

强的民族团结均源于此。但是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还是他于 1812 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像冰天雪地一样，灾难性地毁灭了拿破仑的大军。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就一落千丈，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这样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也就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从 1814 年 9 月到 1815 年 6 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重新绘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根据正统主义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量强大。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斯，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了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被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被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被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斯)则被划归奥地利。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和后来的局势有关的是德国和意大利仍然四分五裂：德国是一个由 39 个州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而意大利则是一个包括 9 个州的“地理名词”，这 9 个州因为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帅地位而由奥地利统治。

六、民族主义

那么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个伟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于 1821 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主人的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

> “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十分闭塞，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要想统治人民也就变得更困难了。”[5]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经看到过平均地权派、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兵和短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这种政治觉醒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 19 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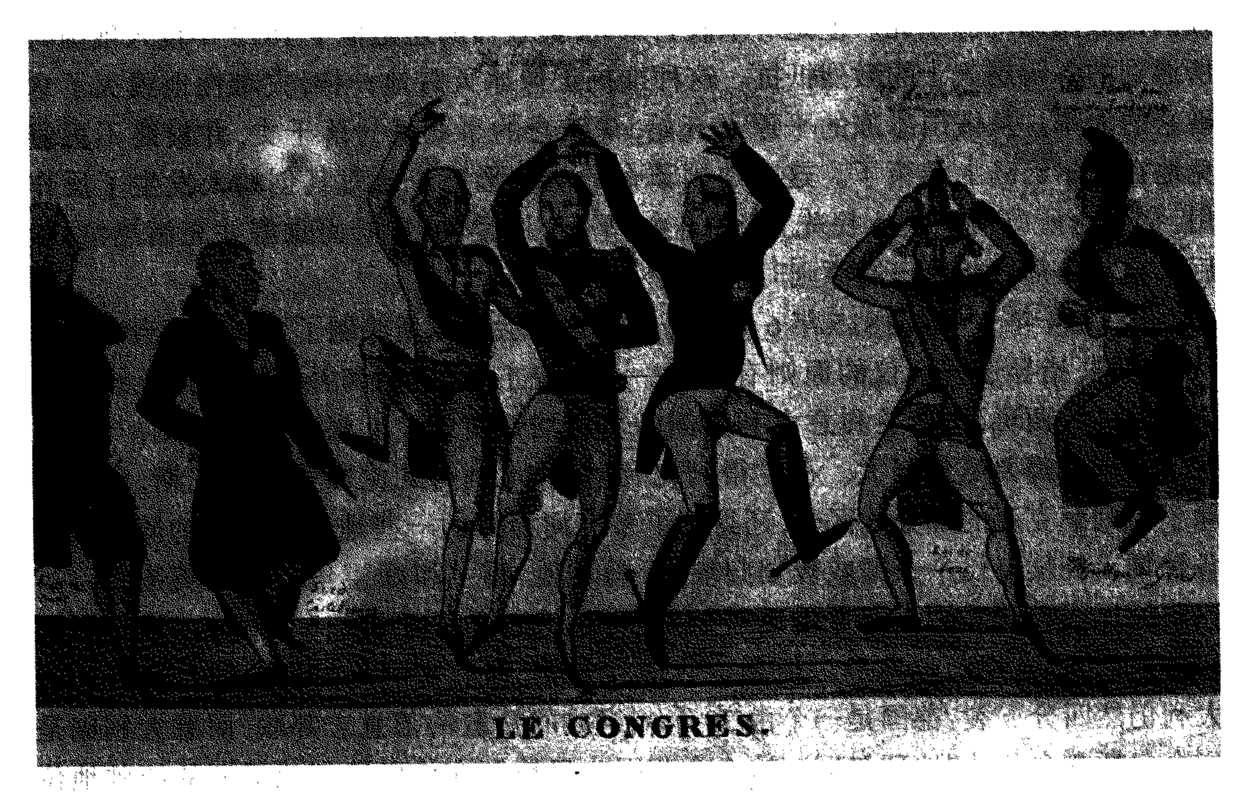


图169　维也纳会议

这幅政治漫画讽刺了维也纳会议的情形。塔兰德只是简单地观测风往哪边吹。卡斯尔雷犹豫不决，而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的君主因神圣同盟而舞到了一块。萨克森国王扶着他的王冠，日内瓦共和国向撒丁岛国王表现尊敬。

——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从那时起它们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在中世纪尚未成形，当时所有的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而且罗马帝国的普世主义也继续存在于天主教会、拉丁语和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无人知晓民众应该忠于国家这一点。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有三件事逐渐改变了忠诚的尺度：首先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其次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则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同质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进展都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虽然直到18世纪末以前人们还一直把国家与管辖国家的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称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直到18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民族主义才呈现出其近代的形式。由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而国

家也就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已经是由公民(19世纪末以前仅指有财产的公民)组成的，“这些公民居住于共同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发言权，并知道其共同(想像的或真实的)传统和其共同利益所在。”[6]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形式在法国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时期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在欧洲旧政权的进攻中生存下来，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的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并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教授法语并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由于写得浅显、通俗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之类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所有这些进展合在一起使得民族主义得以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的忠诚。

如前所述，对国家的这种认同感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这一扩散也是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因为工业革命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传媒(便宜的报纸、书刊和小册子)有可能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这样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了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它又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19世纪中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互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到19世纪后半期它却变得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由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土解决方案使得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在1815年以后民族主义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其必然结果就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并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同样，比利时人于1830年也进行了反抗，并摆脱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其于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举行的三次无效的起义之后，在1859至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而德国人则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起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了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经在西欧获胜。但在中欧和东欧，哈布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却仍是“各民族的监狱”。不过，这些监狱中的囚犯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周边取得成功。而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也因为已经认识到民族主义将会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

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它显然不可能无限期地奏效。帝国大厦的最初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到1878年时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经先后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布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36章第6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战后出现了几个新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表明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经能够独立存在。无论如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而在此后几十年间,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民族主义则又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中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催生。由于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因而就其理论和支持者来说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在英国革命期间,自由主义学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被付诸实践。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宗教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更准确地说,这些学说要求议会控制政府、政党独立存在、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权利。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却都没有投票权。因此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只是增进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的进展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在美国革命期间,美国人在限制奴隶制、扩展宗教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美国政府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制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方案一样,通过限制选举权,通过规定对总统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政府各部门的选举,精心地保护了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防止激进的民众运动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从而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法国革命要比美国革命显得更进步。《人权宣言》是18世

纪自由主义的经典,因为它以响亮的措辞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的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人权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而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则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罢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都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它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却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随着 19 世纪逐渐成为过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也在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再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就转变成了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 19 世纪末,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得以确立。甚至备受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也逐步得到了修正。以往政府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干预一向被看作对自然法则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无效的,但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与基本事实却并不相符。由于公民的自由权和选举权并不能使劳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所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于是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是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标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够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专门建立一个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社会,那么当代的弊病也就可以消除。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绝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由于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就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都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

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说："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物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7]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会激励人们提出更多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但也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结果只是相对保守的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出。



图170 平等女神

人人平等是革命时期的一个主要标记。这个平等女神像手里拿着一本《人权宣言》。

19世纪初出现了一派新的朝气蓬勃的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7）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尽管这些人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方案各不相同，但它们却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即他们都把其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他们却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这一问题。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求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发出的请求支持的呼吁做出响应，结果却白白等候了12年。这些改革者肯定没有考虑过革命或阶级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被付诸实践。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才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是马克思（1818—1883），他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空想社会主

义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去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准确的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马克思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最终将导致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而且马克思还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也就将由社会主义所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所取代一样。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将不害怕萧条，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有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就不再有购买力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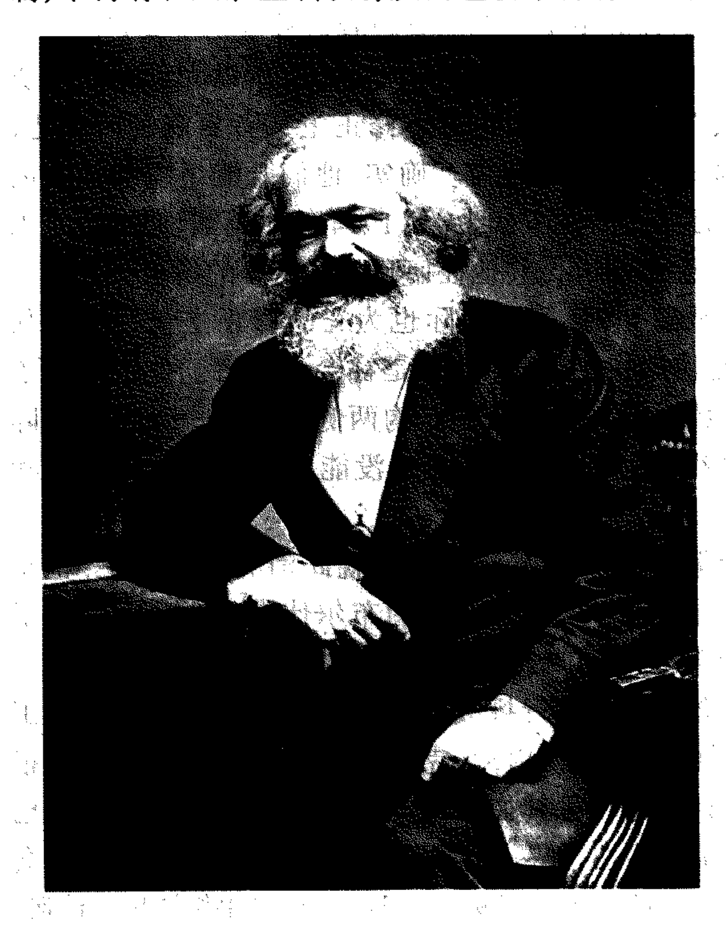


图171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哲学最终战胜了欧洲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他那里程碑式的著作直到今天依然引来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批评以及修正。

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理论家和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鼓动家和组织者。《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并因其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而受到广泛关注。但它却于1873年分裂，这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

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发展迅速,到1914年时它已由27个国家的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就其学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要温和得多。它基本上是一个修正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革命组织。

造成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重心的转移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因素是,在西欧各国选举权正在逐渐扩大,这就意味着工人可以利用选票而不是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个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得工人们更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斯坦表达了这样一种新观点:社会主义者应该“为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

由于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于他们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都分裂成了“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不过,相比之下修正主义者更能与时俱进,因而他们通常都会在其各自的政党里占据主导地位。确实,他们既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又能在选举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事实上,到1914年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都已在其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拥有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更多的席位。

但是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第二国际也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事实证明,其大多数成员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其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却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这样一来第二国际也就被扯了个粉碎,虽然战后它又得以复兴,但它却再也没能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也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四分五裂而就此消失。实际上,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建立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还组织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进行挑战。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农民和工人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工人享受的繁荣和自由,马克思主义在前殖民地赢得了很多信徒,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兵燹之后尤其如此。不过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也已经丧失了它的许多吸引力,因为事实证明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熠熠发光的理想大相径庭——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看到。

九、政治革命中的女性

女性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但其结果却各不相同。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女性没有坚持要求革命纲领正式接受并考虑她们的需求——相反她们还满足于做男性控制的政治运动中的附属物。在权力斗争中她们的支持当然

是很受欢迎的，但在赢得胜利之后她们就被忽视掉，并被迫重新回到革命前的从属地位。这一模式在从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到 20 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所有现代革命中都是很明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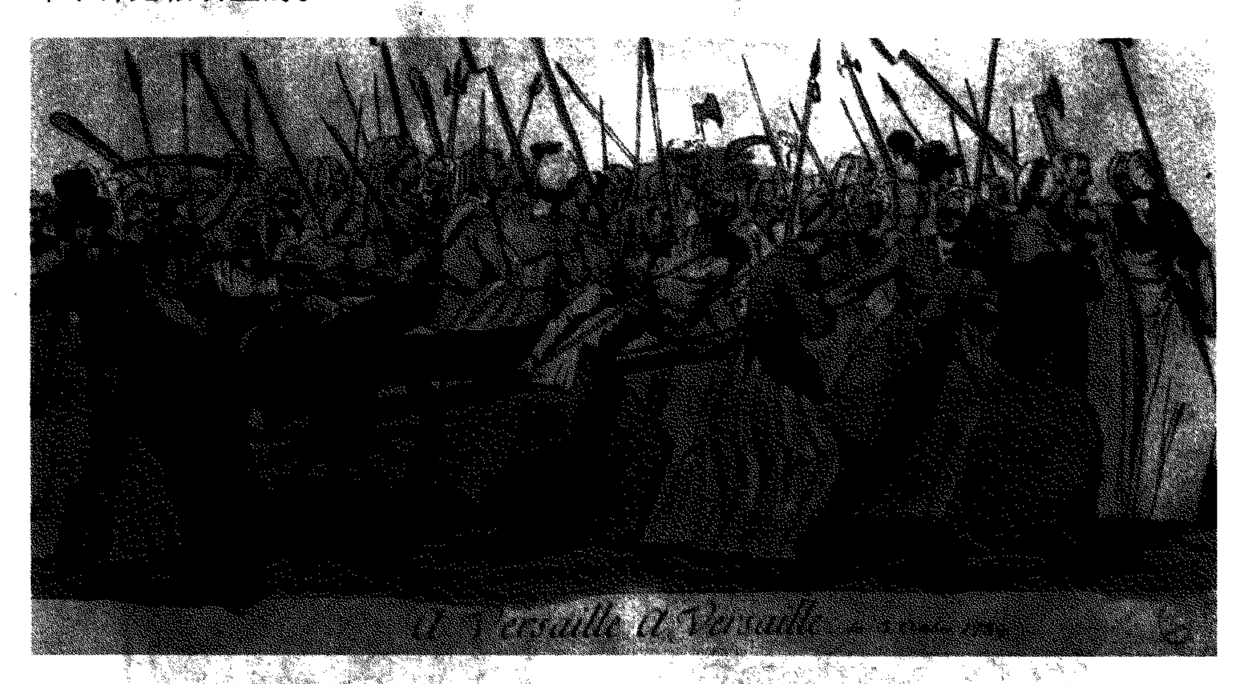


图 172 巴黎妇女革命

1789 年 10 月 5 日巴黎的妇女们进军凡尔赛宫，第二天皇室被迫和她们一道回到巴黎。此后法国政府就将在不断的乱民暴动的威胁下开展工作了。

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就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一模式的演进过程。在革命之前，法国女性和全欧洲的女性一样在婚前接受父亲的权威，在婚后则接受丈夫的权威。孔多塞侯爵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中的一个。但是侯爵的思想有些太过超前。现实中更容易被接受的是卢梭的观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进步的政治观点，但在小说《爱弥尔》(1761)中却建议女人"衣着俭朴，在家中辛勤劳作，永远不要到需要讲话的公众集会上去……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看到被孩子们围着，指挥佣人干活，为丈夫谋得幸福生活，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母亲更感人、更让人尊敬的一幕吗？"

革命开始时，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向等级会议提出书面要求。她们要求确保女性的嫁妆不被丈夫肆意挥霍，确保不遭受丈夫虐待，要求国家为因贫困而卖身的女性提供工作，还要求建立为女性增加就业机会的公共教育制度。但是由于这些女性没有为此而对会议施加压力，因此 1789 年 8 月 26 日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也就没有提及女性的权利。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女性则更加强硬，因为巴黎没有面包，她们在挨饿。1789 年 10 月她们游行到凡尔赛宫，将皇室带回巴黎，并称带回了"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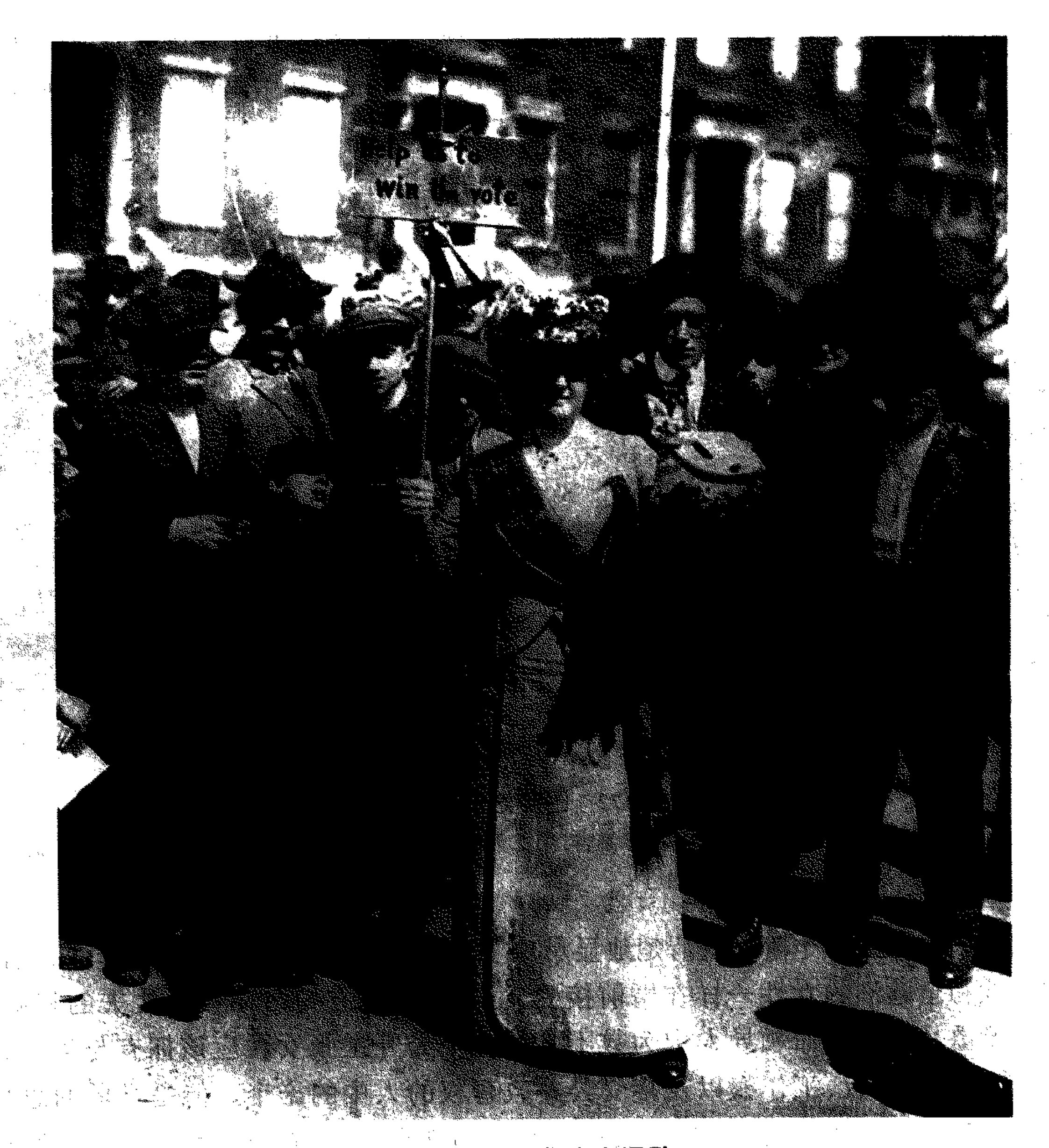


图173 女权主义运动

这是一位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成员。在20世纪早期妇女就已开始要求平等的选举权。

到了1790年时妇女们已经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要求获得选举权、参加集会的权利、担当法官的权利以及提出离婚的权利。这些要求在1791年女性领导人们发表的《女权宣言》中都有提及。1793年春天当国王以叛国罪被处死、法国遭到5支外国军队入侵时,女性表现得最为活跃。面临巨大压力的巴黎政府号召妇女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她们热情回应,在医院里卷绷带,为士兵们制作衬衫、长裤、帽子、袜子、手套。一些人甚至还自愿参加了革命军队的战斗。

感激的共和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使离婚合法化,使婚姻成为一个公民契约,分给妻子一部分家庭财产,女孩和男孩一样必须接受5年义务教育。“共和国革命妇女”在其活动鼎盛时期,其成员穿着长裤,腰间别着枪支,头戴红帽,在街上游行。

一年之后，外国入侵的危险刚一过去，女性革命者就开始遭到反对。当时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结束物价控制，减少面包配额。因而当投机者囤积起财富时，工人家庭也就受害最深。当绝望的男人和女人拿起武器时，公会召集常规军包围了起义街区。随后 1793 年的民主宪法被废弃了，刚刚得到的大多数妇女权利也一样——拿破仑通过在他的《法典》中重新恢复父亲和丈夫的绝对权威巩固了这一点。

出现反复的根本原因就是，女权事业在女性群众中缺乏支持。在革命期间，女性主要是对自己阶级的需要做出反应，而不是对自己的性别。她们上街游行更多地是为了社会改革和经济救济，而不是为了女性权利。但是当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拒绝社会重组并重趋保守之后，女性作为女性所得到的成果也就像工人阶级得到的成果一样丢失了。除了孔多塞，革命的高层领导人都全力拥护卢梭的主张，认为女性应该呆在家里。他们承认并称赞女性在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但在革命结束之后那些政治领导人就又开始发表演说宣称将来女性发挥作用的场所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外面。

不过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的主题在革命后也并没有被忘记。在整个 19 世纪中欧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重建了这一主题。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出版了自己的书刊杂志，并建立了一个全国和国际性的妇女联合会网络。这些组织促进女性教育，反对国家管理的娼妓制度，支持孤儿和未婚母亲，反对酗酒，发起和平运动，称战争是男性政治的最终表达，但其进展却微乎其微。因而在 19 世纪晚期女性运动的积极分子得出结论：除非女性与男性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政治权力，否则她们就无法实现目标。从此争取女性选举权也就成了所有国家选举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 20 世纪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至于女性享有选举权的国家从 1900 年的 1 个增加到 1910 年的 3 个、1920 年的 15 个、1930 年的 21 个、1940 年的 30 个、1950 年的 69 个、1960 年的 92 个、1970 年的 127 个、1975 年的 129 个。

然而，选举权却并没有像事先预想的那样成为解决所有女性问题的万灵药，因为在投票日投下一票并不会自动转移政治权力。没有多少女性被选举进入代议机构，在行政当局谋得职位的女性就更少了。事实上，国际妇女运动在赢得选举权之后活力大减。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那时出现的一些新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给女权运动注入了活力。这些新因素的起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全球女性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章中进行分析。

推荐读物

比较和解释英国、法国、俄国革命的著作有 C. Brinton 所著的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Random House, 1958)；R. W. Postgate 所著的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906* (Harper & Row, 1962)。

关于英国革命，请参见 P. Zagorin 所著的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

lish Revolu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4); C. Hill 所著的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English Revolution* (Clarendon, 1962)和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Viking, 1972)。关于启蒙主义运动的著作，请参考 R.B. Mowat 所著的 *The Age of Reason* (Houghton Mifflin, 1934), E. Cassirer 所著的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1); F. E. Manuel 编著的 *The Enlightenment* (Prentice Hall, 1965)。

研究美国革命的著作有：P. Maier 所著的 *From Resistence to Revoluti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New American Nation*"(Harper & Row, 1954)系列中包含的 L.H. Gipson 所著的 *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 1763—1775* 和 J.R. Alden 所著的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3*。关于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请参考 M. Kraus 所著的 *The North Atlantic Civilization* (D. Van Nostrand, 1957), G.D. Lillibridge 编著的 *The American Image Past and Present* (D.C. Heath, 1968)。

在论述法国革命的几千册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有：J.M. Thompson 第二次编辑的 *The French Revolution* (Blackwell, 1966); J.H. Stewart 编辑的读物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cmillan, 1951); R.R. Palmer 所著的 2 卷本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9, 1964)对 1760 年到 1800 年间西方世界的革命运动作了非常重要的分析。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有：O. Connelly 所著的 *French Revolution-Napoleonic Era*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9)。L. Hunt 所著的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G. Rude 所著的 *The Crowd in History: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1)。

现在已有论述民族主义的多卷本著作面世,其中较综合的有：B.C. Shafer 所著的 *Nationalism: Myth and Realit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5); K. R. Minogue 所著的 *Nationalism* (Basic Books, 1967)。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杰出的综合性著作有：H.J. Laski 所著的 *The Rise of Liberalism* (Harper & Row, 1936); J. R. Pennock 所著的 *Liberal Democracy: Its Merits and Prospect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50); J. Sigmann 所著的 *1848: The Romantic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Europe* (Harper & Row, 1973); J. S. Schapiro 所著的 *Liber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D. Van Nostrand, 1958)。

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多且充满争议。最近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评价,由 D. McLellan 编著的 *Marx: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St. Martin's Press, 1983); A. S. Lindemann 所著的 *A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Yale University, 1983); T. Bottomore 编辑的参考书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C. Wright Mills 编著的精装本读物：*The Marxists* (Dell, 1982)。

最后,关于总体考察女性角色的著作,请参考 R. Bridenthal 和 C. Koonz 所著的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1977)的相关章节;提供更详细细节的著作有: R.J. Evans 所著的 *The Feminists*: *Women's Emancipation Movements in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1840—1920* (Barnes & Noble, 1978); P. Stock 所著的 *Better Than Rubies*: *A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 (Putnam's, 1978); C. Banks 所著的 *Faces of Feminism*: *A Study of Feminism as a Socail Movement* (Oxford University, 1981); J. Kelly 所著的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注释

1. Cited by G. Wint, *The British in Asi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4), p.18.
2. Sir Edwin Sandys, in a speech in Parliament. Cited by J.L. Laski, *The Rise of Liberalism* (Harper & Row, 1936), p.117.
3. P. Zagor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166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I(1955), p.903.
4. A.S.P. Woodhouse, *Puritanism and Liberty* (Dent, 1938), p.55.
5. T. Kolokotrones and E. M. Edmonds, *Kolokotrones*, *Klepht and Warrior* (London, 1892), pp.127—28.
6. B.C. Shafer, *Nationalism*: *Myth and Realit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5), p.105.
7. Cited by D.W. Morris,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Social Revolt* (George Allen & Unwin, 1949), p.34.

俄罗斯渴望与西欧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来俄罗斯从那里获得了她最重要的思想、最有用的教诲和最大的乐趣。

——彼得·Y.恰达耶夫

第28章　俄　　国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考察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似乎有些有悖常理，因为俄罗斯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俄罗斯人也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从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有很大不同。因此，一代代俄罗斯思想家都受到了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问题的折磨。

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都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俄罗斯才能报答西方：先是报以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随后又报以布尔什维克革命所产生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但是在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罗斯的影响要比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罗斯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罗斯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是在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见第24章第2节)。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着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廷贸易往来密切，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各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西米尔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廷的一位公主，而他的两个女儿则分别嫁给了

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事件合起来孤立了俄罗斯。一件是公元990年前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接受基督教的拜占廷东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虽然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教义及其不断增长的实践在以后数十年间的发展却最终导致了这两个教会于1054年分道扬镳。而俄罗斯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被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争斗。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罗斯成为东正教惟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得俄罗斯人变得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他们对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不屑一顾。

切断俄罗斯与西方联系的另一件事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却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大部分残存的联系。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但是与世隔绝的俄罗斯却基本上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且蒙古人还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罗斯沙皇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他们的种族上的贡献也值得注意，像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就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



图174 彼得大帝

著名的沙皇彼得大帝。

在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统治时出现的俄罗斯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这是一种同质的文明，因为东正教塑造并左右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它也是一种基本上缺乏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而正是它们才使得西方充满活力，大肆扩张。那些思想比较解放且有远见的俄罗斯领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在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就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来作为一种自卫手段。而他们首先感兴趣的就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西化的过程。他以其钢铁般的意志和过人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都由他亲笔起草，而几乎所有的法令都由他授意制定。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类专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具有功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密码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通过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其实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岸边，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就像莫斯科是旧俄罗斯的象征一样。不过，这些变化大都是在国内很多人的激烈反对下完成的。彼得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不仅要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是他已经实施的一些



图175 圣彼得堡

沙皇彼得大帝建造的“面向西方的窗户”——圣彼得堡市。

改革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这些改革就其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改革,而且它们也只是影响了上层阶级中为数不多的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彼得未完成的工作由富有才华、引人注目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进行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让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她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却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经开始欧化。在彼得统治期间蓄胡子、穿着臃肿肥大的东方长袍的贵族,这时在他们的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交方面都纷纷模仿起凡尔赛宫廷。他们的子女也都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先以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这样一来俄罗斯的欧化也就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被限制在上层阶级内部。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在变得愈来愈宽,愈来愈危险。

这一社会差异的严重性在俄罗斯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已经变得很明显。1815至1818年间一支俄罗斯占领军驻扎在法国,军队中的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已经生活了4年的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在那里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并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因而当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罗斯时,他们发现沙皇的独裁简直让人无法容忍。

这种情绪可以解释所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这次起义爆发于1825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其首领多半是希望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使俄罗斯西方化的军官。但是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准备。更准确地说,俄罗斯缺乏商业、工业和已在西方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相反,那时存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被束缚的、无生气的农奴群众,即通常所说的"黑暗中的人们",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向往的西方式社会全都没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它使俄罗斯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哀叹上述差别,认为它们是俄罗斯发展速度较慢造成的,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促进俄罗斯赶上西方而做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决了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可以统一的基本看法,他们坚持认为每个国家都体现和表达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试图使一个国家模仿另一国家,其必然结果就将是矛盾和不一致。他们认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它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巨大区别。因此斯拉夫派把彼得以前时期同质的俄罗斯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是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为西方社会更优越,并因其唯物质至上、没有信仰、为冲突和革命所困而抵制它。

二、俄罗斯和欧洲，1856—1905年

存在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争端，不是通过一方去说服另一方这种方式，而是伴随着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给俄国社会所带来的无法抗拒的压力才得到解决的。俄罗斯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戏剧性地揭示了这种压力。战争是在俄罗斯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可是俄罗斯却被打败了并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罗斯削减黑海海军，拆毁它在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

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因为与许多事先就警告俄罗斯会因其没能跟上西方的脚步而即将遭到失败的西欧派人不同，斯拉夫派人则很有信心地预言俄罗斯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将会导致一场可与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实际上，这场失败暴露了旧制度的腐败和落后。俄罗斯的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形势却令人绝望地对俄罗斯士兵不利：他们所使用的步枪的射程只有西方军队步枪射程的三分之一，他们只有帆船可被用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副其实的医疗服务或食品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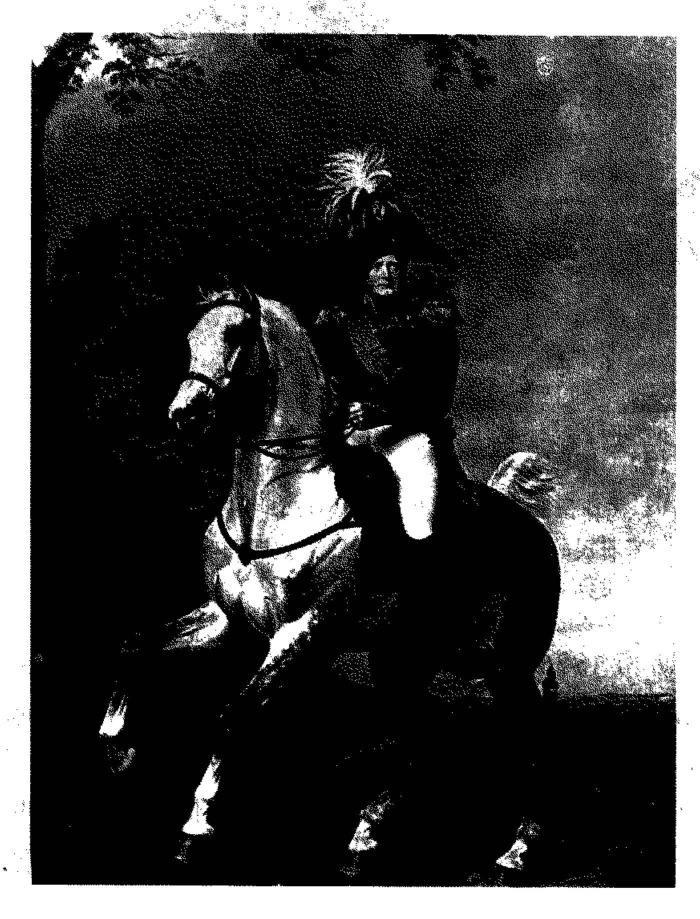


图176 亚历山大一世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刚继位时还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但到1815年之后他就逐渐变得反动了。

旧制度破产的前景导致了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就是解放农奴,农奴在战争以前也一直是极不安定的。事实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经爆发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不断上升的压力也就变得更加不可抗拒,于是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就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根据他在1861年3月1日颁布的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所有的农奴都被解放,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重新进行分配。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意义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发表的《解放宣言》都要重大:《解放宣言》仅关系到美国的少数黑人,而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则涉及到在俄罗斯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也都不可避免,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由于其决定性地促成了俄罗斯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旧制度。在1917年投入俄罗斯工业的5亿英镑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构成的。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381 000人上升到1890年的1 620 000人,进而又上升到1898年的3 000 000人。到1913年时俄罗斯的产铁量已经和法国一样多,而其产煤量则是法国的四分之三。



图177 俄国农村

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村的生活十分困苦。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于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农民却必须在59年中向政府缴纳赎身金,这样一来农民的生活标准就仍然很低。这幅图表现了农民们在政府机关外面耐心等待官员们享受完他们的午饭后回来办公。

这些发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罗斯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时的俄罗斯相比,与欧洲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却也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那样,引起了俄罗斯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而其中之一就是农民群众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绝没有满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多的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的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他

们对土地的渴望也在相应增长，并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于现状。农民不满的另一个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税赋：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还要缴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罗斯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得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日益频繁的农民反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起义反映了农民内心强烈的不满。

1901年建立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达了农民的不满，其政纲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与农民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在俄罗斯工业化初期，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劳动力受到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些条件下，俄罗斯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成立一样，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而且它也像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或像在俄罗斯被称作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20世纪初，除了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也对沙皇政权变得日益不满。反映这批人观点的政治组织是立宪民主党——通常根据其缩写将其称为卡德茨(Cadets)。该党建立于1905年，其纲领与英国自由党的纲领相似：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维持平衡。立宪民主党包括了俄罗斯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当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民选议会(杜马)时，立宪民主党由于了解议会程序而在议会讨论中起了领导作用。然而，立宪民主党却从未赢得过可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拥护者相比的大批追随者。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而且中产阶级还因为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势力所控制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此外，立宪民主党还特别容易屈服于沙皇独裁政府的压力，因为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使得他们不太愿意以暴制暴。

20世纪初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经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同质的社会，而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则最终在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中达到高潮。下面在考察这些大变动以前，我们将先来回顾一下导致1905年革命的日俄战争前俄罗斯的亚洲政策。

三、1905年以前的俄罗斯和亚洲

正如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所决定的一样，俄罗斯和亚洲之间的关系则由俄罗斯的优势来决定。由于这一优势的缘故，16至18世纪的俄罗斯已经能够制服西伯利亚的部落民族并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但在东南部他们却在强大的中国帝国面前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并不得不接受了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地区的《尼布楚条约》(见第24章第3节)。

18、19世纪期间俄罗斯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他们通过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从而建成了他们的帝国。获得阿拉斯加只不过是早先横跨西伯利亚向相对人烟稀少的地区推进的继续。但是在阿穆尔河流域俄罗斯人却战胜了中国帝国,而在中亚他们则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汗国。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够取得,是因为俄罗斯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虽然这种进步不能同西方相比,因为它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但它却足以使俄罗斯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俄罗斯人也就继续扩展他们的帝国疆界,直至受到那些在技术上势均力敌或占优势的势力的阻挡为止——那些势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满洲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

俄罗斯人向阿拉斯加的推进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位西化的沙皇对远东与对欧洲一样感兴趣,因此他挑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于1728年和1740年前往美洲大陆进行了两次探险。白令向东穿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洋,并在勘查了阿留申群岛后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陆。白令探险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亚洲和北美洲是在太平洋北部水域相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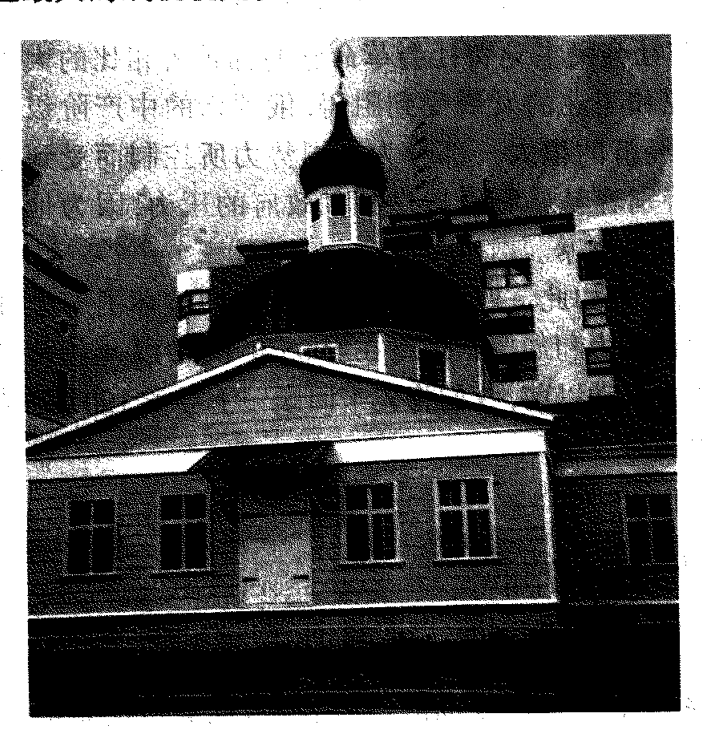


图178 东正教堂

位于原俄国治下阿拉斯加首府锡特卡的圣米歇尔东正教教堂。

俄罗斯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海獭皮贸易所吸引,紧跟在探险者后面。商人们先是剥削阿留申群岛的居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据点。由于阿留申群岛的居民没有武器,他们很容易受到武力袭击并遭到无情的剥削。1761年愤怒的乌姆纳克岛居

民袭击并杀死了许多俄罗斯商人,幸存的商人被迫逃离。阿留申群岛获得了5年的独立,在此期间岛民再次过着仅能果腹的渔猎生活。但是1766年俄罗斯人的雇佣军对阿留申岛民进行了报复,他们摧毁了村庄,杀戮了3000多人。在俄罗斯统治者的逼迫下,阿留申岛民又开始猎杀海獭。俄罗斯人对海獭皮的掠夺是永不知足的,因为这些海獭皮在中国能够获利4倍还多。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阿留申岛民和海獭都被杀戮殆尽。

1799年一些私人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了俄美公司。俄罗斯在阿拉斯加的杰出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巴拉诺夫,他精力充沛、独断专行地指挥各种活动达一代人的时间。巴拉诺夫的主要问题是要把粮食从西伯利亚运过世界上风暴和雾最多的一个海洋,因此他就派远征队沿着美洲海岸去建立能为阿拉斯加的据点提供补给的定居点。1811年11月俄罗斯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罗斯河旁建立了罗斯堡,到1819年时他们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这一扩张导致了俄罗斯与西班牙和美国的不和。实际上,俄罗斯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明显地有助于1823年门罗主义的发表。最后,俄罗斯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有的土地。而皮毛贸易的衰落也使得俄美公司濒于破产。俄罗斯人担心阿拉斯加距离自己太遥远而无法保护它不受美国扩张主义的侵害,并预料到迟早都会失去这一地区,遂于1867年以70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美国,也就是说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美分——一桩有史以来最划算的地产交易。

阿穆尔河流域

其时俄罗斯人在北美洲的活动重新引起了他们对阿穆尔河流域的兴趣,因为他们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可以作为向其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基地的出口。他们的确有了鄂霍茨克港,但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一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而且几乎不间断地被雾笼罩。因此俄罗斯人再次觊觎上了宽阔的、可通航的阿穆尔河,虽然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早已将他们从这条河边赶走。

俄罗斯人的兴趣受到中英1839至1842年间所谓鸦片战争的进一步刺激(见第31章第1节)。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英国并吞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获得绝对优势。俄罗斯人这时决心在阿穆尔河流域定居,以免英国人下一步获得对阿穆尔河河口的控制,从而堵住他们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俄罗斯人实现了他们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地区的所有目标。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年轻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野心和干劲,他于1847年38岁时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的软弱,那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将俄罗斯人从阿穆尔河流域赶走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个空壳子。

虽然穆拉维约夫伯爵已经拥有总督的广泛权力,但是他却仍然越权派遣从事探险的远征队把俄罗斯旗帜插到外国的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耐维尔斯科伊船



图179 旅顺口之战

1904年日本军队占领旅顺港的要塞。这是日俄战争中的一场主要战役。在这一仗中,日军战死50 000人,是俄军人数损失的10倍。

长(后来的海军上将)在堪察加半岛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他在撵走萨哈林岛上的日本移民后踏勘并占领了该岛,他在阿穆尔河使用汽船,他鼓励俄罗斯殖民者定居阿穆尔河流域,并沿阿穆尔河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据点。俄罗斯之所以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扩张成功,是因为整个地区都无人居住,中国对该地区只有微弱的宗主权,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控制。实际上,中国朝廷完全不知道俄罗斯的做法,是俄罗斯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中国。

5年后,也就是1856年,战事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中国又遭惨败,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作其他更多的让步。穆拉维约夫抓住这一机会,警告中国要注意英国控制阿穆尔河的危险,并提议俄中两国共同防守这一地区,结果则是订立了《瑷珲条约》(1858年)。根据这一条约,俄罗斯除了获得阿穆尔河北岸至乌苏里江的土地外,还和中国一起对直到海边的乌苏里江两岸土地行使共同管辖权。

穆拉维约夫这时仔细地勘探了新赢得的地区,发现由于阿穆尔河下游区的结冰情况,控制该河的两岸对航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他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并意味深长地把它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当时中国已经卷入与西方强国的进一步纠纷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俄罗斯驻北京公使尼古拉·伊格纳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提供了帮助,成功地使联军在不太苛刻的条件下撤离北京。作为报答中国政府心甘情愿地签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把从乌苏里江直到

海边的阿穆尔河两岸土地以及从阿穆尔河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都给了俄罗斯。随着赢得这些新的、辽阔的边疆地区(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这种扩张直到20世纪初才又重新开始——20世纪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试图向南侵入朝鲜和满洲,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

中 亚

在此期间俄罗斯人也正在侵入中亚,不过他们向这一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才开始的。之所以会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与北方有利可图的皮毛贸易相比的经济刺激。此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亚的气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俄罗斯人所习惯的气候和植被。紧靠着西伯利亚南部的是居住着哈萨克游牧民的草原区。再往南去就是大沙漠,上面点缀着供养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这些古老的穆斯林汗国的肥沃绿洲。19世纪末以前,这些汗国在军事上比起分散的西伯利亚部落要强大得多。

在1827至1854年这近30年间俄罗斯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从而首次进入中亚。他们希望锡尔河能够充当一条永久的天然边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远离首都、渴求荣誉和晋升的地方指挥官野心勃勃,时常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政府有所行动。而掳掠集团的经常性的骚扰也致使俄罗斯人不顾圣彼得堡的疑虑和英国的抗议奋力往前推进。

中亚穆斯林文明传说中的中心,一个又一个地陷入正在前进中的俄罗斯人之手——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于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这些猛烈的推进使得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惊恐,危机和关于战争的谣言一再出现。然而这一世纪最终还是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过去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英俄相隔的距离非常遥远,运输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间的斗争不是围绕武器的较量,而是围绕控制介于它们之间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来进行的。

俄罗斯的统治有效地改变了中亚。在积极方面,俄罗斯人废除了普遍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仅仅在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0 000名奴隶。俄罗斯人还铺筑了铁路,其中著名的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它既帮助了俄罗斯人进行征服,又帮助了他们实现现代化。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罗斯纺织工业不断增长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惊人的增长。1884年在俄罗斯人的倡议下,有300俄亩土地(1俄亩=2.7英亩)被用于种棉花。到1899年时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猛增到90 000俄亩。此外俄罗斯人还引进了某些土地改革,包括减少农民的税赋和农民须对国家及地主履行的义务。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人有计划地征用哈萨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了普遍的饥荒。而且俄罗斯人也并没有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他们把

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给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诸如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之类的领域里，他们也不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活跃。因而最终结果就是，在给中亚和沙皇帝国的其他地区带来许多变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为俄罗斯人的到来而受到什么影响。尽管有了铁路建设和棉花栽培的传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是生活在为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的壁垒所分隔开来的不同的世界里。

满洲和日俄战争

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正在缓慢地接近完成，它为俄罗斯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路。他预见到俄罗斯将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因而他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获得上述地位的最佳手段。

1895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见第31章第1节)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中国再次轻易地被打败，它再三恳求英国和美国出面进行调解。英美两国的拒绝迫使中国接受了《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罗斯这时却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了干涉，并迫使日本人归还了辽东半岛。

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与俄罗斯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并将建造穿过满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中俄合资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一个私营公司，但实际上却为俄罗斯政府所拥有，归俄罗斯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它已在满洲铺设了总长为1596英里的铁路。

1898年为了对包括战略港口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进行为期25年的租借，俄罗斯跟中国进行了谈判。随后俄罗斯就开始了其在远东的下一步推进。两年后俄罗斯人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混乱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俄罗斯人这种稳步的蚕食使得日本人大为惊恐，因为日本人对亚洲大陆也有他们自己的野心。由于不能独自阻挡俄罗斯人，日本人决定通过结盟来加强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们与英国缔结了军事联盟(详见第31章第4节)，这一后盾增强了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决心向俄罗斯进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议，俄罗斯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承认俄罗斯“在满洲铁路方面的特殊利益”。

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俄罗斯人的意见有些分歧：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接受提议，因为他感兴趣的是经济渗透，而不是有战争危险的政治吞并；但是有影响的俄罗斯冒险家们由于其在朝鲜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而希望政府能够促进他们的

个人财富；俄罗斯军界由于他们在旅顺港的现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漫长距离而想在朝鲜沿海一带获得一个基地；而俄罗斯的某些政治家则因为担心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也赞成以一次"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充当民众骚动的避雷针。无疑，在后三种人的心目中，或者说在军人的心目中，俄罗斯将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胜。

这些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当了道。他们设法免去了维特的职务，实际上这也就是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由于有与英国的联盟作保障，再加上担心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竣工，日本人迅速而果断地发动了攻击。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正式宣战就袭击了驻扎在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

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总是战胜俄罗斯。由于俄罗斯军队是在离欧洲俄罗斯的工业中心数千英里远的地方作战，所以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中日本人包围了旅顺港，他们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战争的第二阶段由在满洲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日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并把俄罗斯人赶到了沈阳以北。然而这些战役却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俄罗斯军队非但没有受损，反而还随着交通的改善而得到了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却赢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性的胜利。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在航行了相当于地球圆周三分之二以上的距离后，于1905年5月27日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它立刻就遭到了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实际上，短短几小时内所有的俄罗斯舰船就都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则仅仅失去了几艘驱逐舰。

由于这一大败，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罗斯人准备议和。而在日本人这方面他们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他们仍然贫乏的资源却已被战争榨干。1905年9月5日双方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根据和约，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其在满洲的所有优惠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这样，日本人就阻挡住了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时，俄罗斯才得以恢复其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失去的领土。

四、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及其后果，1905—1914年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的风暴则正在俄罗斯后方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日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并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变得益发严重。最后则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的"流血星期日"——皇家禁卫军

向赤手空拳在圣彼得堡冬宫前面请愿的数千人开了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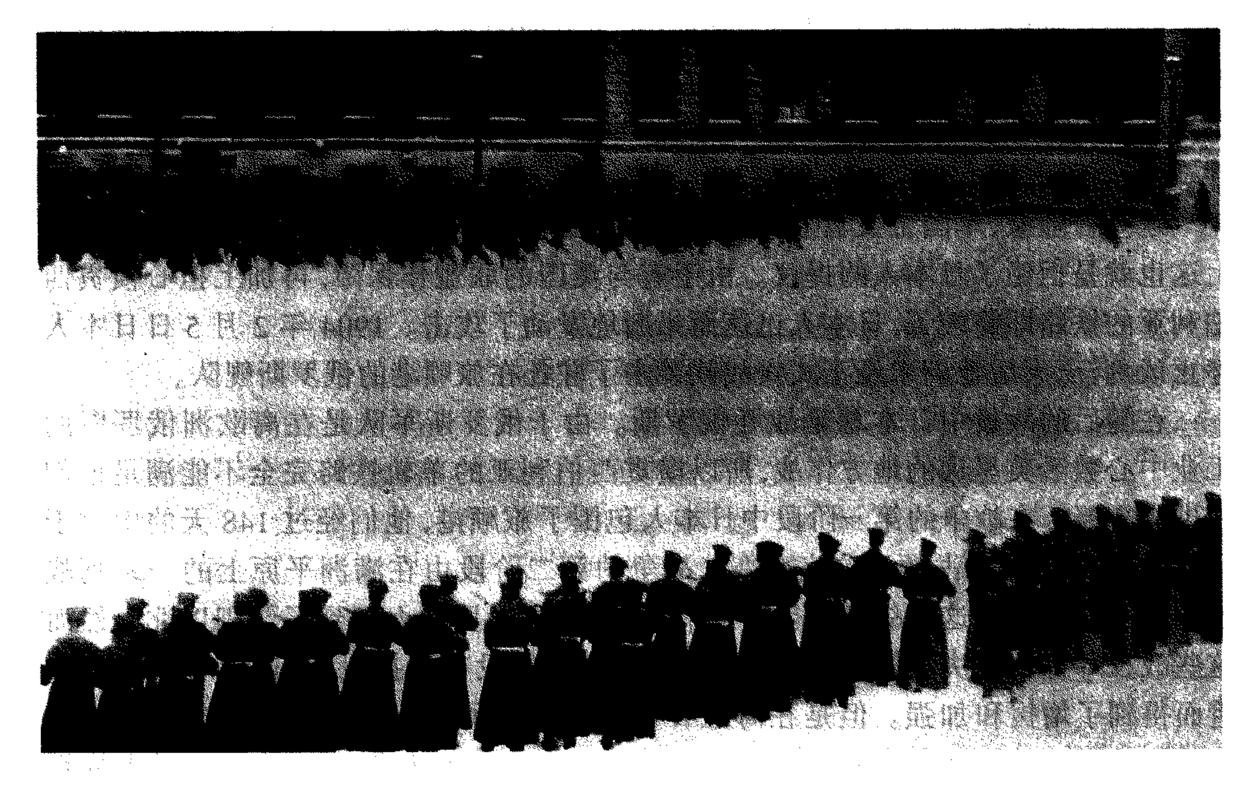


图180 一月大屠杀

1905年1月22日是一个血腥的星期五。当天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军队向正在进行和平游行请愿的工人开了火。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沙皇政府与俄国工人阶级之间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和解的机会了。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许多俄罗斯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都转而反对沙皇政权,致使1905年的俄罗斯大革命突然发生。大动荡在帝国政府能够重新树立其权威以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间,这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被统治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打家劫舍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舰只。全世界都目睹了整个民族举行罢工这一非凡景象。此时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这一宣言读起来就像是政府的一份罪行自供状。它允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并准许俄罗斯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却已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则要求由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经强大到能够进行回击了。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

的签订，使得许多军队能够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的适时的贷款也大大地加强了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莫斯科工人举行的危及政权的起义。其时，温和派由于厌倦了无休止的暴力正转向政府一边。因此，到1906年初时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从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政府军队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烧毁整个的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专制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而它的预算权则受到严厉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即出现了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杜马的自由派成员以牙还牙，号召国民拒绝纳税，但却应者寥寥。事实上，到这时革命已经退潮，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却给俄罗斯的历史进程留下了印记。俄罗斯这时已经有了一个立宪政体，尽管杜马权力很小。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但结果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对政府发动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以至于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令人满意地保守和屈从。不过，专制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确实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越来越走向兴盛，直到它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推倒为止。

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罗斯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做出了贡献。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显现出其作为革命活动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却证明这只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08年的9万人，进而又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到1912年时罢工人数则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的两年中始终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俄国军队在前线所遭到的灾难性的失败，乌云再次聚集起来，而沙皇政权也随之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可以说，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是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的。

推荐读物

论述俄国与西方关系的各个方面的著作有：D.W. Treadgold 所著的 *The West in Russian and China*, Vol. I, *Russia*, *1472—1917*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3)；W.L. Blackwell 所著的 *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Industrialization*, *1800—1860*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8)；T.H. Von Laue 所著的 *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Columbia University, 1963)；M. Malia 所著的 *Russia Under Western Eyes*: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Khrushchev* (Whiley, 1964)；最近的研究是 L.

Hughes 所著的 *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Yale University, 1998）。

关于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请参考 G. V. Lantzeff 和 R. A. Pierce 合著的 *Eastward to Empire: 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on the Russian Open Frontier to 1750*（McGill University, 1973）；E. E. Bacon 所著的 *Central Assia Under Russian Rule: A Study in Cultural Change*（Cornell University, 1966）；S. Becher 所著的 *Russia's Protectorates in Central Asia: Bukhara and Khiva, 1865—1924*（Harvard University, 1968）。

毋庸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社会的所有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第29章 中 东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罗斯的影响，而中东各民族的反应也是多种多样。诚然，受到影响并做出反应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但也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19世纪期间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但它仍然是一个各民族、各宗教以及各种相互冲突的集团的集合体。我们在第18章中曾经提到，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在宗教集团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组成的神权国家。由于这些集团——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社区、罗马天主教社区和犹太人社区——能在各自教会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此若干世纪以来各穆斯林民族(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一直生活在半自治和自给自足的社区里，比邻而居。尽管有个别非穆斯林人确实在民族服装、生活习惯、居住区和税收上遭到不公平待遇，但是各社区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这一松散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环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也就必须考虑到各地区环境和反应的显著差异。鉴此，我们现在将不从整体上去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基督教人口占优势的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穆斯林居统治地位的小亚细亚和阿拉伯穆斯林居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各民族被土耳其统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都认为这几个世纪是暴政继续肆虐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但是这种看法与实际的事态发展却不相符，因为巴尔干各民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之中，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的话，这本可以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大的麻烦。然而，在前几个世纪中土耳其人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时并不比统治亚洲的穆斯林臣民时更麻烦。

究其原因，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廷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土耳其征服者显得更能干而仁慈。奥斯曼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负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欧洲基督教徒都无法相比的自由。然而在18、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却发生了剧变。在这段时间里，奥斯曼权力和实力的衰落导致了腐败和敲诈勒索的盛行，而后者又转过来驱使此时正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来进行自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巴尔干各民族正在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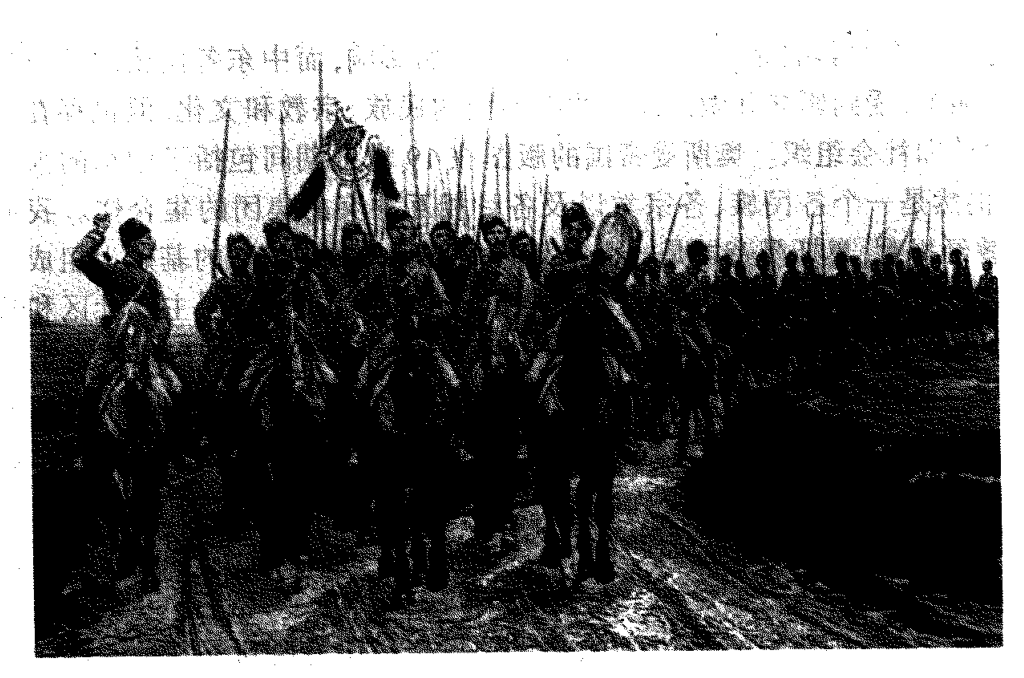


图181 俄土战争

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这幅19世纪的版画表现了骑马的哥萨克宫廷卫队。

巴尔干各民族比奥斯曼帝国内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更早并更深刻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由于他们多半都是基督教徒，所以比起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来他们也

就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邻近欧洲，使得人、商品和思想都比较容易越过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汇聚到巴尔干半岛，因此随着18、19世纪商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需要不断增长，从而也就促进了巴尔干半岛农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而这些商品的出口反过来也有助于巴尔干当地商人和水手阶层的成长。同时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和产量不断提高。半岛各地，通常是封闭的山区，出现了重要的制造中心——那里的工匠们从业时受到土耳其人的干涉最少。最后，商业和工业的兴起还促进了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和爱琴海诸岛间的航运业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出口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并主要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火药。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并充满好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原本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此时已渐趋腐败无能，加之到国外旅行并经常侨居国外的商人和海员总喜欢把自己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无疑他们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以及巴尔干同胞的前途就取决于尽早摆脱土耳其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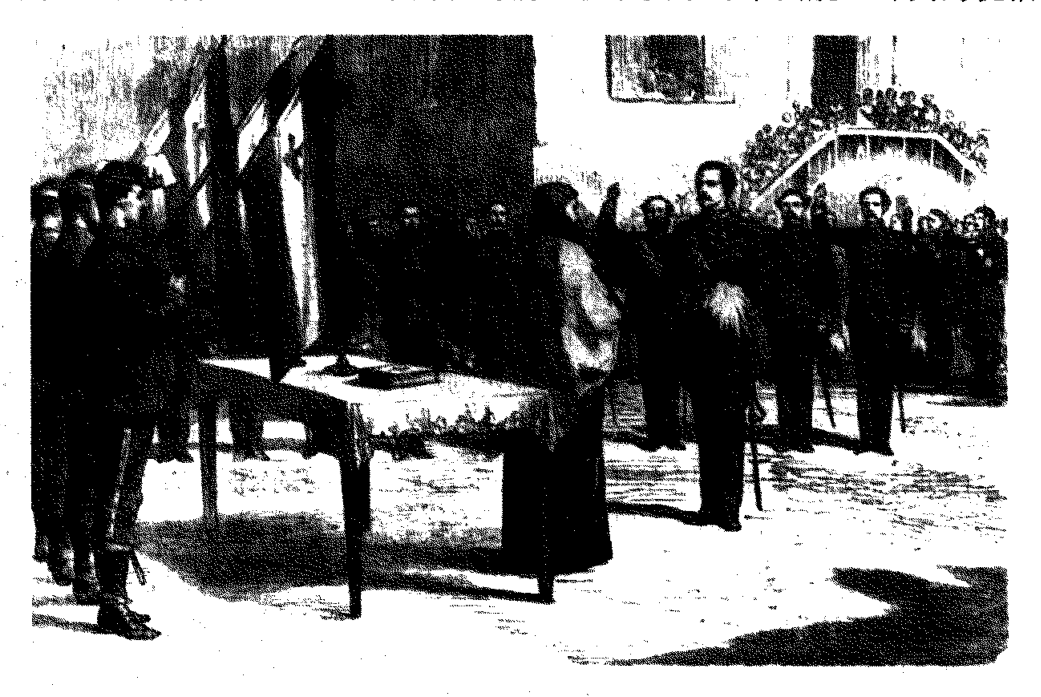


图182　巴尔干的基督教

这幅画描绘了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正对国王米兰一世宣誓效忠。这一仪式表现了巴尔干地区基督教的影响。

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罗斯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都对其同胞心智上的觉醒作出了贡献。他们用母语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轻人提供去外国读大学的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接受教育，而且意味着出现了

一种新型的、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这一教育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变得更加直接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政治上觉醒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以当时一个希腊革命者的话为证就是："总的来说，法国革命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性……近东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行动时，他们便开始采取解放自己的措施。"[1]

巴尔干各民族的觉醒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与西方交往频繁，古典和拜占廷的光荣传统提升了其民族自尊心，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其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了在匈牙利南部一些大塞尔维亚新定居点有积极影响之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也可以看出巴尔干其他民族复兴速度较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且定居在奥斯曼首都的近畿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东马其顿坚固的新定居点附近；巴尔干半岛上特有的严重社会分化使得罗马尼亚人深受其害，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社会和毫无生气的农民阶层；而阿尔巴尼亚人则因为其原始的部落制和被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所分裂而处于最糟的境地。

这些因素也说明了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起义的原因。希腊人在经过1821至1829年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是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了起义，但却直到1815年才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他们于1859年赢得自治，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则更迟些，他们1878年获得自治，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内战，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剩余领土——他们仅保留了从君士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这样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就自168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后退，1815年退缩到多瑙河，1878年缩小到巴尔干半岛中部，1913年则缩小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衰落，巴尔干各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促进准备在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发展，从而在促进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要比它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有很多因素可以说明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就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而且缺乏自己的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各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了其与西方的一种联系，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历史很漫长。另外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的农民一般都麻木不仁，其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法官总是激烈地反对西方，而其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则通常仅仅对保住自己的官职和升迁感兴趣。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其各自国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土耳其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因而虽然在土耳其人中间也有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也就是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欧洲的病夫”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是“欧洲的病夫”。那么为什么说它病了？英国商人和外交官查理·艾略特爵士的记述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描述了自己曾想让卡拉奇的总督对发展项目感兴趣和对方拒绝反应的过程。

我猜想我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寻找特许权的人，或是中间代理商。我的职业的本质就是让东方人买那些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从火柴到铁路。我贿赂他们，让他们买我的东西；他们贿赂我们，让我们开比实际数额更多的票据（这些票据是由奥斯曼政府支付的）。于是我们双方就都能赚钱……

“如果你能开发”[我对他说]，“贵帝国的商业和物质资源，基督徒和土耳其人将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督徒将会想支持你们的帝国，因为这也是他们繁荣的来源。”

“我们土耳其人，”总督回答说，“不知道如何赚钱；我们只知道如何得到钱。你想引入的制度使基督徒能够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榨取金钱并据为己有。谁将从这些铁路、港口和码头的特许中获益？法国人，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但是决

不会有一个穆斯林。你还记得我帮你修筑的从多罗格莱德(Durograd)到摩洛伯利斯(Moropolis)的铁路吗？法国人乘坐它旅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卖票，最后金钱都流向了犹太人那里。但是土耳其人能从铁路中得到什么？土耳其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

我应该说，"就像通过特许安排流到您口袋里的钱一样多。"但是我忍住没有这样公开反驳，而是让总督继续说下去。"这个国家是一道汤，"他说，"每个人除了喝它一口之外别无他图。我们以传统的方式用大勺子喝汤，你们在汤碗底上钻些小洞，用管子往外吸。然后你们提议说，用勺子喝汤应该被废除，因为已经过时了。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没有钻，不明白用管子喝汤的伎俩。"

"但是您亲身体验了奥斯曼帝国能从商业事业中得到的好处。"

"哦，我是吮过管子，"总督说，"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用勺子。"

Charles Eliot *Turkey in Europe*, 2nd ed. (Edward Arnold, 1908), pp. 94—97.

然而在整个19世纪中奥斯曼帝国却同俄罗斯一样以许多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被西方所渗透、影响和控制，其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罗斯人一样，发现要自保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为了阻止俄罗斯对中东的扩张，积极鼓励土耳其人搞军事现代化。被派到国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除了吸收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思想意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当奥斯曼旧政权于1908年被最后推翻时，发动政变的既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方小团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产生了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时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 00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徒，因为穆斯林禁止改宗。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大学里，却可发现相当多的土耳其学生。

与文化影响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1869年，在经过10年由法国外交官斐迪南·德·雷赛布发起成立并管理的一个欧洲财团的建设之后，苏伊士运河终于开通。该运河使得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商路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欠了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银行家一大笔债务。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时其债务总数已达2亿英镑。他们每年约需1 200万英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一数目已经达到帝国岁入的一半以上。外国势力除去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其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政事业。

虽然所有这些西方压力和控制所产生的影响难以精确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已经逐渐地瓦解了一向坚如磐石的伊斯兰教结构。而真正的瓦解则是由在西方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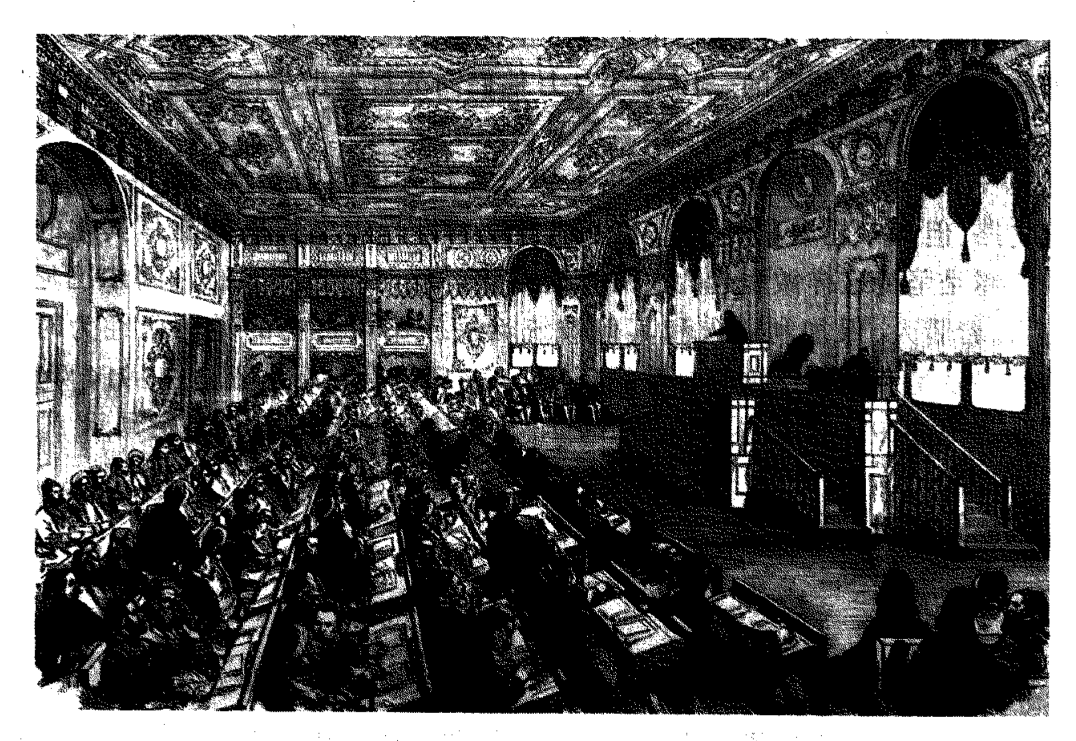


图 183 第一届奥斯曼议会

1877年奥斯曼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本图来自1877年4月14日的《伦敦新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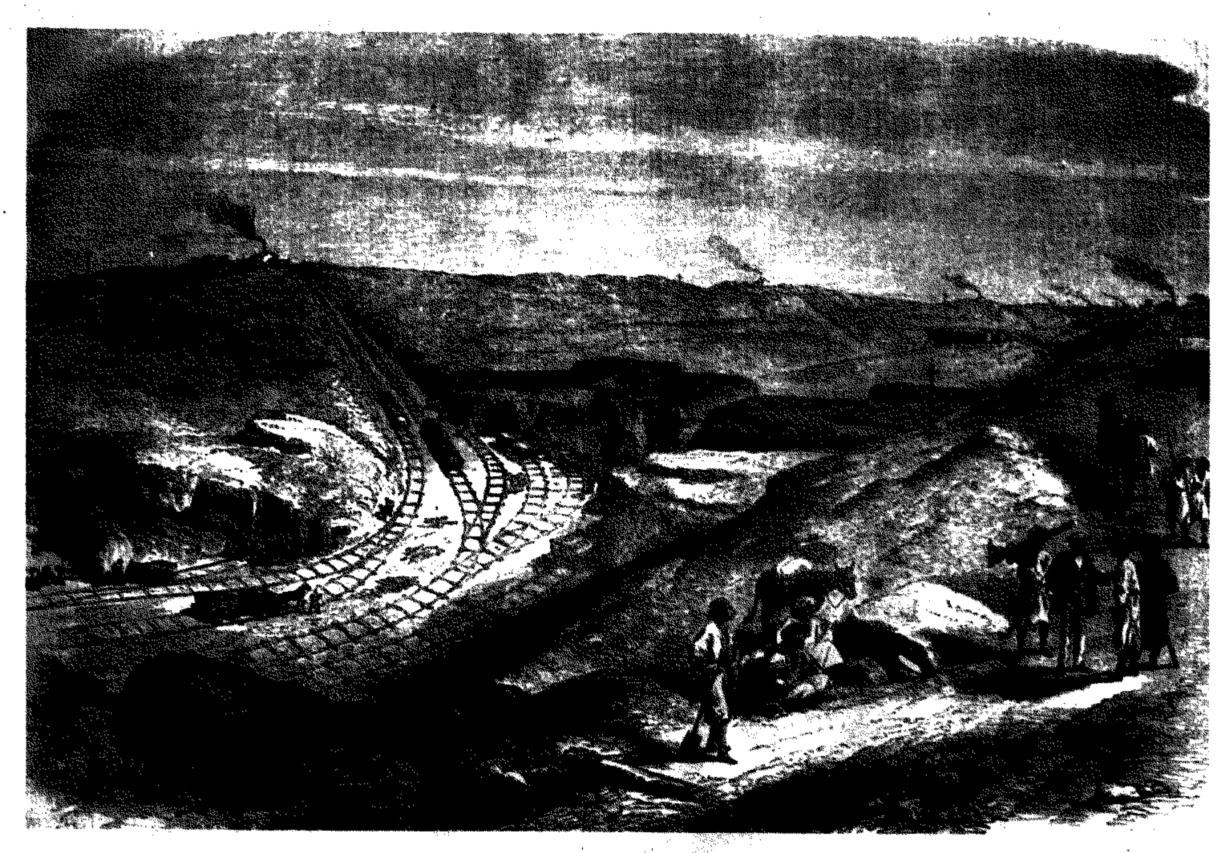


图 184 开凿苏伊士运河

开凿苏伊士运河。

习过的青年军官实现的——他们正是在那里认识到阿卜杜拉·哈米德苏丹反对一切改革的政策是过时而危险的。1908年7月他们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苏丹不接受宪法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苏丹被迫接受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土耳其人试图强化他们的帝国使其走上现代化之路，但却未能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越是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也就越多。此时再想要阻止住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被统治民族不可抗拒的觉醒已经为时太晚。事情的结果就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这一循环使得奥斯曼帝国到1914年前一直陷于混乱之中。1914年土耳其人作出了加入同盟国的决定，这一决定预示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三、阿拉伯人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自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起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势力，但是在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其舰队后，拿破仑就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拿破仑远征对埃及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军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连接地中海和红海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以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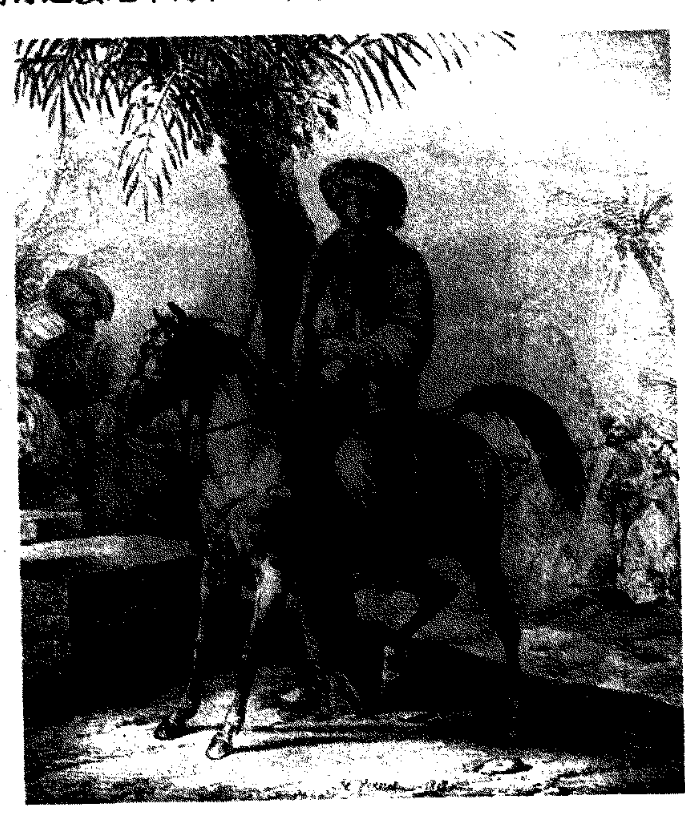


图185 阿里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在这幅画中，这位著名的埃及摄政王被描绘成了一位骑术师的模样。

在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拿破仑还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也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的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重要性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中东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有很多，而且都是革命性的。他兴建了埃及第一个现代灌溉系统；引进了棉花栽培，从此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放了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到国外学习；开办了各种学校，虽然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了一所翻译学校，在 1835 至 1848 年间将大约 2 000 本欧洲著作译成阿拉伯语。此外穆罕默德·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立起中东第一支现代陆军和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批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都由于国内的不足和欧洲列强反对埃及扩张和工业化而失败。

不过这些成就还是一度使得埃及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强国。穆罕默德轻而易举地就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天以色列、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他的目标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地区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但是一个能够控制前往印度路线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是不符合英帝国的利益的，穆罕默德为外力所迫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不过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的自主的统治者。大国的利益使得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延迟了一个多世纪。

推荐读物

相关书目有：R.H. Davison 所著的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59)；B. Lewis 和 P.M. Holt 所著的 *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1962)。

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通史著作有：L.S. Stavrianos 所著的 *The Balkans Since 1453*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8)；B. Jelavich 所著的 2 卷 *History of the Balk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3)；B. Lewis 所著的 *The Middle East：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 2000 *Years* (Scribner, 1996)。论述西方对中东的文化影响的著作有：D. Lerner 所著的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ng the Middle East* (Free Press, 1958)；B. Lewis 所著的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University of Indiana, 1964)和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Norton, 1982)。关于西方的经济影响，参见 C. Issawi 编著的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1914*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6)；J.R. Lampe 和 M.R. Jackson 所著的 *Balkan Economic History：1550—1950* (Indiana University, 1982)。

注释

1. Ch. Photios, *Apomnemoneumata peri tes Hellenikes Epanastaseos* [Memoirs on the Greek Revolution], Vol.I (Athens, 1899), p.1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非西方社会，它不仅受到西方武器的进攻和打击，而且为西方武器蹂躏和彻底征服；它不仅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其后为西方行政官员所统治……因此印度与西方交往的经历比中国或土耳其更痛苦、更耻辱，比俄国或日本与西方相处的经历则还要痛苦、耻辱得多。

——阿诺德·J.汤因比

第30章 印　　度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已经先后多次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所侵入。这些侵入者中的每一个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痕迹，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传统社会的发展。但是英国人的历史作用则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其他侵入者主要引起社会顶层的变化，但英国人的影响却是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可以在英国社会动态扩张的性质中找到，这种性质逐渐破坏了相对静止而自给自足的印度社会。要了解这一侵入和改造的过程，首先必须研究印度传统社会的性质，然后我们将考察英国影响的性质和印度对这种影响的反应。

一、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前工业时代，印度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村庄。在村庄内部，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集体的组织形式既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姓和村庄的忠诚阻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照古老的风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收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

或其等价物。这就构成了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交纳给国家的份额因时而异: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各村庄集体负责交纳以产品或货币为主要形式的田赋,农民只要交纳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图186 印度的部落民

住在印度班杰罗的部落社区的一群男人正与村中的老者进行讨论。

由于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都十分原始,村庄往往很容易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占星术家。陶工用陶轮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简单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铁匠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书记员处理法律文件,为不同村庄的人们互通信息写信;村镇牧人白天放牛,晚上把牛归还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师常常由同一个人兼任;占星术家为播种、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事项指明吉祥的时间。这些工匠和专门职业者以近似易货贸易的方式为他们的村庄服务。他们服务的报酬是从农民家中得到谷物,或从村里得到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免税土地。种姓制度把这些世袭的、传统的职业和职责分工变成了义务。

在村庄的政治制度方面,每个村庄都有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它在今天被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即 Panchayat, "Pancha"的意思是"五")。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的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 进行审判, 收集赋税, 修理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招待途经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义务劳动的不定

期的需求外，村庄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了少数盐、铁之类的必需品外基本上不依赖其他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其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相反，它们或者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或者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或者是商业中心，如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商路上的米尔扎布尔。

一些印度作家往往把这一传统社会浪漫化，把乡村生活描绘成一首恬淡的田园诗，以缓慢而醉人的节奏代代相传。确实，集体组织如联合家庭、种姓和乡村自治会等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当地村庄中的责任、权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的确可以过上一种安宁而满意的生活。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维持秩序，因而村民们也就经常会受到贪婪的税吏和强盗团伙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17世纪莫卧儿帝国崩溃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即使是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的基本情况也仍然几乎没有被改变：一个个地区遭到蹂躏，但到了最后农民又恢复了其传统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二、英国的征服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的村庄相对而言是一成不变而又自给自足的。但在探讨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先来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够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很轻易地就征服了整个印度。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在葡萄牙的亚



图187　詹姆士·托德

一位印度艺术家所绘的詹姆士·托德于1880年左右乘坐皇室的大象参加庆典游行的情景。

布奎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欧洲人仅能坚守住其在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就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却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沦落到英国的统治之下。

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就是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威已经衰落(见第18章第3节)。这使得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够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并建立起个人王朝。与此同时,印度教徒则通过组织一个其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人赢得了对整个德干的控制,并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卧儿王朝。随着官员们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势力相互勾结,印度在18世纪中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国人才能够挑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自己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满洲帝国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都得与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



图188 茶农

一位茶农在他的田地中。这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典型景象。这些位于斯里兰卡和印度东北部,尤其是阿萨姆的大型茶园是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主要财源。它们也是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南亚次大陆森林减少的部分原因。

严重削弱印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够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在中国它们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纪时贸易对印度经济的影响还很有限,因为贸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到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当时那里出现了富裕的土著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越来越不安分。正是这些商人中一个叫贾嘎特·塞斯的人,收买了那些本来听命于孟加拉的"纳瓦布",即总督的将军。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故意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损失了65个人。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普拉西是"一笔交易,而不是一场战斗"。

这时英国人已经成为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总督。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征税的权利。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敲诈创造了许多机会,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土著官员的许多"礼物",他们为自己及其在伦敦的上司积聚了财富。

在孟加拉的立足点为英国人提供了在印度进一步扩张所必需的基地和资源。他们开始向北推进,寻找天然边界。在东北面,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他们击败了廓尔喀人,后者此后站在英国人一边战斗。同样,在西北面,他们最后则战胜了旁遮普高傲的锡克人。就这样,到19世纪中叶时英国人已经成了整个印度的主人。

三、英国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东印度公司在最初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区时进行了残暴的剥削。这些暴行在英国引致公众的议论。这一点与某些政治原因合在一起,促使国会在1773和1784年通过了置公司于伦敦政府监督之下的法令:东印度公司继续在印度从事贸易和管理,它的军队也继续在印度作战,不过它的所有行动都被置于英国政府和议会的监督之下——直到1857年印度起义。

这场起义并非像某些印度作家所称的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相反它主要是为某些因为英国人损害了其利益而心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1848至1856年间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撵走了许多王公,从而在留下的王公中间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团也对英国人心怀不满:铁路和电报的引进极大地扰乱了印度人中保守分子的生活,开办了西式学校,某些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法律上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和寡妇殉葬(即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之类的习俗。印度兵即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在遥远的地区作战但却得不到额外津贴而不满。使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子弹是起义爆发的导

火索,因为这种子弹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使得这场兵变在某些分散的地区变成了民众起义。



图 189 网球赛后

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面貌。此相片摄于1894年潘加查拉某官邸的一场网球赛后。

当起义于1857年5月10日爆发时,英国人很感意外并被迫采取守势。但是起义主要限于北方,并没有扩大到全国,甚至大多数重要的土邦仍忠于英国人并为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援助。这样大约4个月后英国人就得以进行反攻,到1858年7月时起义已被镇压。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了许多俘虏,英国人则烧毁了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村民。

在起义被镇压后一个月,国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以君主统治来代替的"印度法令"。此后统治印度的就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最高权力人物即印度国务大臣则在伦敦。英国对印度统治的效率反映在以下事实中:1900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员总共有4000人,而印度的文职行政官员则有500 000人。1910年时,印度军队由69 000个英国人和130 000个印度人组成。少数英国士兵和官员统治了人多地广的次大陆。

四、英国的影响

英国对印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这一点很自然,因为英国人到达印度就是为了寻找市场和商品。在19世纪中人们对诸如黄麻、含油种籽、小麦、棉花等原

材料的需求很大。这些商品通过新建的铁路网被运送到海港——铁路网到1870年时全长4000英里，到1880年时全长7000英里，到1939年时则达41 000英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得货船在伦敦和卡拉奇之间行驶的距离从10 800英里缩小到6100英里，从而便利了印度原料的出口。印度也因之而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原料产地。由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很高，整个19世纪印度都处于出超地位。

印度原本应该将剩余资本用于发展现代工业，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而且直到今天印度仍是不发达国家。由于英国非但没有努力促进印度的制造业，反而在关键时刻还积极地进行阻挠，因此印度也就没有机会为其国内的幼稚工业建立起有效的关税保护，以对抗从英国工厂里源源流出的机器制造产品。印度经济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流产的现代化”。印度已经进入国际市场并赢得了大量的贸易盈余，但其过时的国民经济却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英国人及其同伙“撇去了一个未经动员的农业社会表面的经济作物”，以此代替了发生在欧洲的经济现代化。

与此同时，得益于西方的医疗科学、卫生措施和饥荒救济安排，印度的人口从1872年的25 500万增加到1921年的30 500万。早期欧洲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人口增长，但最后却都被城市中涌现的新工厂给吸收了。既然在印度没有出现这样的工业化，几百万新增人口也就只能重新回到农业上寻找出路。这自然对土地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直到今天，印度经济中最尖锐的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这也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方面的最大问题，因为它们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经历了“流产的现代化”。[1]



图190 织棉布

19世纪早期一个印度人织棉布的景象。

英国的统治不只是在经济上,也在思想文化上对印度产生了深刻影响。1823年当英国任命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时,这种影响便开始产生了。在此后数十年间建立起了一种国家教育制度,它包括大学、培养教师的师范学院、中学和为群众开办的地方小学。在1885至1900年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人数从11 000人上升到23 000人,中学的人数从429 000人上升到633 000人。同时,印刷机的采用也大大促进了印度的文化生活。梵文著作成为公共财产而不再是婆罗门小心翼翼守护着的专利品。报纸不仅以英语,而且以近代的各种印度语言出版。

这些变化都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的文化氛围,但它们却没有影响到群众——群众仍然完全未接受教育——而且最初它们也没有影响到穆斯林,穆斯林仍然普遍敌视新学校和新书籍,因而英式教育几乎为少数印度教上层阶级所专有。但是这已经足以引起一个已持续到现在的连锁反应。英式教育创造了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化并接受自由、理性的意识形态的新印度阶层。这批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利用欧洲的意识形态来攻击英国的统治,并组织了一个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最终导致了印度的独立。

五、印度民族主义

英国的思想文化影响促进了印度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高涨和创造力,这种高涨和创造力通常被称为印度复兴。为了正确评价这一运动的意义,应该注意到,当英国人到来时,印度教正处于一种相当受压迫和道德崩坏的状态。在穆斯林统治的前700年中印度教受到轻视,被认为是一个被统治种族的迷信思想。它缺乏威望、组织和积极的领导。但是当英国人推翻莫卧儿王朝的统治时,印度教700年来首次处于与伊斯兰教平等的地位。当英国人开办学校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不相同,他们热切地成群结队地涌向学校。他们也由此在两个方面得益:在新的官僚机构中担任职务;由于与西方的交往而经历了心智的复兴。

西方因素在印度教徒中间引起了三种反应或三种学派,不过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有着许多一致的地方。第一种反应是全心全意不加批判地亲西方反传统:西方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优越的和更可取的。

第二种反应是完全的拒绝。西方更强大不可否认,然而它的思想却是颠覆性的,它的风俗也是令人厌恶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印度人——无论他是印度教徒或是穆斯林——应该向这种邪恶的东西妥协。相反,他们应该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接触,以传统方式生活。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种姓统治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无保留地接受原来的权威,并反对废除殉节或杀婴风俗之类的改革。

印度人的印度

提拉克(B.G Tilak)是早期印度民族主义者,他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并提出"印度人的印度"的口号。这种民族主义感情在下文1906年他的演讲片断中表露无遗。

一个事实是这个外来的政府已经毁了我们的国家。我们都对此感到惊奇,几乎头晕目眩。我们本来以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英国政府是从云端屈尊降贵,从帖木儿人和成吉思汗手中拯救我们的国家。他们还说他们帮忙避免的不只是外来侵略,还有内战。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很高兴的,但是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清楚,是这个国家已经建立的和平导致了这一切……——我们不再掐彼此的脖子,这样一个外国人就可以来掐我们的脖子了。在这个国家建立英国的和平和统治是为了让外国政府可以剥削我国。近来这种英国和平和统治的效果已经被意识到了。很不幸我们没能早一点认识到这个。英国的教育、扩大的贫困和对我们的统治者更加熟悉让我们和我们的领袖睁开了眼睛……你们的工业应被彻底毁掉,被外国统治毁掉;你们的财富流出国外,生活水准降到没有其他人能够忍受的最低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良方可以拯救自己吗?良方不是请愿,而是抵制。我们说准备好你们的军队,组织起你们的力量,然后开始干吧,这样他们才不能拒绝你们的要求……每一个英国人都知道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只是一小撮,因而欺骗你们让你们相信你们是软弱的而他们是强大的就是他们每个人分内的事。这就是政治。我们已经被这种政策欺骗得够久了。新的党希望你们做的是,意识到你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事实……我们不会帮助他们征税和维持和平。我们不会帮助他们用印度的鲜血和金钱在我们的疆界之外打仗。我们不会帮助他们进行司法管理。我们会有自己的法院,而且当时机到来时我们不会再交税。你们能联合起来,用自己的努力做到这一切吗?如果你们能,从明天起你们就自由了……

B.G. Tilak, *His Writings and Speeches* (Ganesh and Co., 1923), pp.55—67.

对西方的第三种、也是最通常的一种反应,则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彻底拒绝之间的妥协。它接受西方的世俗主义和知识的精华,但也试图从内部改革印度教,试图在摆脱印度教腐朽和粗俗的外壳的同时保持它的基本真理。这一学派的杰出领袖是被广大民众尊称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汉·罗伊。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婆罗门家庭,由于看到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场面他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他是一个求知欲极为旺盛的学生,他在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后又学习英语并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强烈地吸引,为了阅读

《圣经》原文而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罗伊拒绝形式上的教条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启示。罗伊还向梵社(神社)即由他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度教。梵社是欧洲启蒙运动学说与《奥义书》哲学观点折中的产物。

拉姆·莫汉·罗伊不仅是印度宗教复兴的最早领袖,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义运动的最早领袖。这在印度是一种新现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割据,而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英国的统治下发展起来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英国人深信他们是精英种族,由神注定要永久统治印度。这种种族主义——在起义以后显露得特别强烈——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印度人不论其条件如何,都不可能升迁到某些职衔以上;在社会生活中,印度人被禁止进入某些旅馆、俱乐部和公园。在这些情况下,一种对立的文化与民族意识自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渐渐发展起来。

英国人强加给印度半岛前所未有的统一也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形成。整个印度首次处于一个统治者之下。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物质化的统一。而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则又出现了同样重要的前所未有的语言的统一。

英式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整个文学和政治思想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也逐渐学会了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技巧。报纸、讲台上的演说、编写小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庞大的请愿——所有这些都被用作适合于民族主义磨坊的待磨的谷物。

拉姆·莫汉·罗伊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早期的民族主义者是英国的崇拜者,他们倡导与英国进行合作。但是在1890年以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他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运动改造为人民群众的运动,因此他对印度教的许多习俗持教条式的支持态度,甚至于还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并支持童婚。但他同时也为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的义务教育而奋斗。提拉克以诸如"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要得到它"之类的口号赢得了全国的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这一点帮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的忙。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发了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事件更是格外振奋人心,它被认为是对西方人天生占优势这一断言的一个实际而明显的驳斥。虽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范围很广,但它却也基本上仅限于知识分子中间。它几乎只是一场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而

不是他们在乡村的广大同胞的痛苦、不满和愿望。因而在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鸿沟一直持续存在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甘地越过。甘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人民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被他赋予了政治含义的宗教概念(见第38章第4节)。

总之,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全然不同于其对俄国或中东的影响。在俄国,西方施加了决定性的文化和经济影响,但是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强大而独立的。另一方面,虽然近东在经济和军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但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仍得以保持独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反,印度则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被英国彻底征服。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在旁遮普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印度人没有选择欧洲文明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权,从而也就比任何亚洲主要地区都受到了西方更大的影响。

推荐读物

关于印度历史的著作有:R. I. Crane 所著的 *The Hisotry of India: Its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58); W.T. de Bary 编辑的 *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50)是对一些原始材料的汇编。J.E. Schwartzberg 编辑的 *A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8)。

优秀的印度通史著作有:P. Spear 所著的 *A History of India* (Penguin, 1956); S. Wolpert 所著的 *A New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1982);研究英国在印统治的著作有:R.P. Masani 所著的 *Britain in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1961); P. Woodruff 所著的 *The Men Who Ruled India*, 2vols (Jonathan Cape, 1954—1955); H. Furber 所著的 *John Company at Work* (Harvard University, 1951); M. D. Lewis 编著的论文集 *The British in India: Imperialism or Trusteeship* (D.C. Heath, 1962)反映了各种不同观点。

L.S.S. O'Malley 所著的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1941)是欧洲对印度影响方面最细致的研究。关于印度的知识界和民族主义发展趋势,请参考 A. Seal 所著的 *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8); B.T. McCully 所著的 *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dian Natio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1940); A. Ward 所著的 *Our Bones Are Scattered: The Cawnpore Massacres and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 (Henry Holt, 1997); J.R. McLane 所著的 *Indian Nationalism and Early Congr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7)和所收集的文件集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India* (Prentice Hall, 1970)。

注释

1. Cited by E. Stokes, "The First Century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India: Social Revolution or Social Stagnation," *Past & Present* (February, 1973), p.153.

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史的线索。

——费正清

第31章　中国和日本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就是，远东无疑是欧亚大陆上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的位置比印度更东和更北。或许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起其地理上的孤立要显得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无法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则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以唆使反对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以让欧洲人利用。

由于上述原因，远东这两国才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仅仅是断断续续的管制贸易之中。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和日本相继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虽然这一冲击并不像在印度那样势不可挡，但是这两个远东国家却都受到了根本性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日本采纳和利用了西方列强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其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没能以西方的方式重新组织自己。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它也不可能像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因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于动荡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来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了一个独特而自成体系的社会。

它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这一明显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和从属的。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开始了他们同西方的首次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和英国人也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则出现了俄罗斯人，他们是从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入侵者亲近(见第19章第3节)，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三次灾难性的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闭关自守和骄傲自满：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傲慢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就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其影响至今仍在震撼着远东和全球。

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各大洋。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扫除中国设在贸易往来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自从欧洲水手在17世纪中将吸鸦片的恶习传入中国，这一恶习就从各个港口迅速蔓延开去。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商品的兴趣不大。但是现在鸦片市场却完全改变了贸易平衡，变得对英国人有利。北京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两次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但是由于这一贸易利润丰厚，以致中国官员乐于接受贿赂，允许走私。



图191 鸦片战争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武装舢板根本不是英国炮舰的对手。这场战争以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

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战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林则徐查封了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行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英国战舰的冲突，1839年11月战争爆发了。此后的战争进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令人绝望的军事劣势。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悬殊得多。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在16和19世纪中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则仍停留在低水平阶段，比起阿兹特克人的技术也高不了多少。1842年北京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依据《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但是《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欧洲人渴望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以实现其贸易扩张。另一方面，中国人则认为这些条约承认的特权太多。由于双方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情绪，1856年再次爆发战争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北京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时，英国人轰炸了广东。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英法联军的力量不可抵挡，中国人被迫在1858年与1860年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图192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5—1908）在北京的宫廷里把持着中国的权柄。

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耻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中我们将会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经能够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来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其水平为当时所有其他东方国家都所不及之后，日本便迫使朝鲜接受了一些内容模糊的要求。而中国也声称对朝鲜拥有宗主权。1894年8月两支军队发生冲突，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再次被轻易击溃，1895年4月北京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一些领土给日本。

与日本人的战争给了中国的傲慢自满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落后的武器配备在拥有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些年间，欧洲列强就已经趁中国衰弱之际，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除了获得这些领土外，西方国家还将中国本身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列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在这些势力范围内被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就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域和这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满洲、山东和福建则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19世纪后半叶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并开始重新评价和组织自己。下面我们就沿着这一轨迹来看看中国人是怎样缓慢而不情愿地试图进行改革和革命的。

二、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日本击败中国引起了年青皇帝光绪的注意，他意识到有必要对帝国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1898年夏他颁发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该段日子被称为"百日维新"。他们将地方政府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建立新学校传播欧洲的学风，鼓励西方式的生产方法，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军队。但是这些措施始终都是一纸空谈，因为皇太后一直维护旧秩序。她废黜了年轻的皇帝，宣布由她自己摄政，紧跟着她又废除所有的改革法令并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全部权力，他们积极引导社会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起地方民兵以抵抗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义和团在官方的默许下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已有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驻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在几个月内八国联军就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 300万美元。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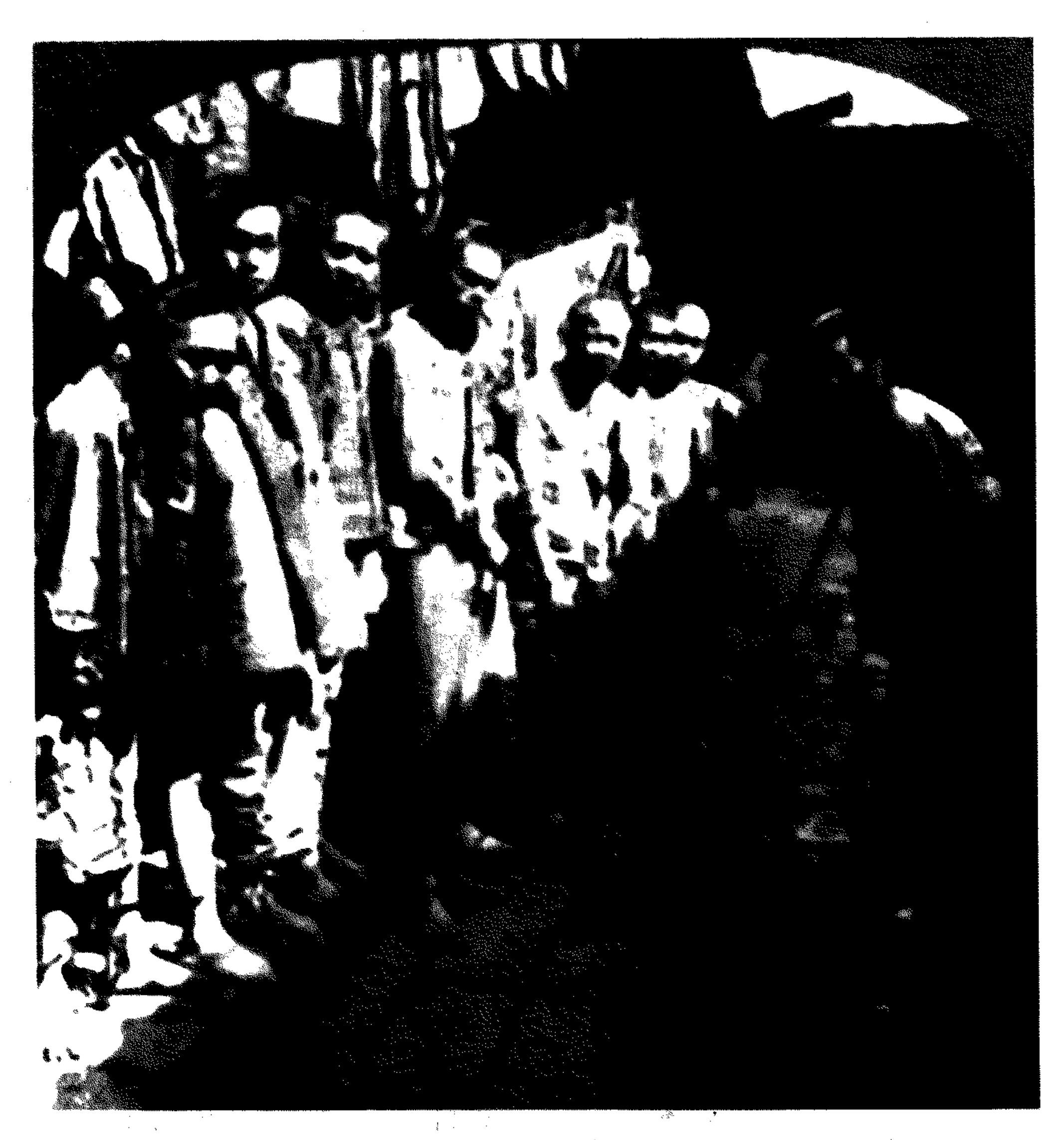


图193　义和团

广州监狱中等待处决的义和团参加者。

国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下面进行革命——这一革命于1911年爆发，它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政体。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逸仙博士(1866—1925)。同先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受到的西方教育至少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一样多。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三角洲，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他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中学。然后他进了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并于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一种良好的、科学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心系穷人，总是为穷人的福利牵肠挂肚。

怀着这种感情，孙中山不久便离开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使他

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孙中山的主要支持来自海外的中国商人，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则仍然无知而冷漠。虽然广东革命党人小规模的起义遭到镇压，但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革命者设在汉口的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却导致了附近帝国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然迅速席卷全国。这时正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 1911 年 12 月 30 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可是尽管孙中山名义上是领导人，他却未能控制全国。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该党在 1913 年 4 月国会选举时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是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官僚和军阀手中，他们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拥有国家统治权的民国政府。相反，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使中国陷入一种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1926 年以前的民国初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



图 194 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 1911 年共和革命之父。

这一悲惨结果可以用以下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始终都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都由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成，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其次，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除佛教外，中国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尽管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其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最后，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由于他们建立的制度显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因此它们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三、日本的现代化

历史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的解释。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推动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并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不像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西方的影响。此外由于日本有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悠久传统，因而在它于19世纪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就较少，痛苦也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精挑细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同中国帝国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就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亦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它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地扩大了它的势力。日本军人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居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等诸多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但也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德川幕府逐一切断了日本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到了17世纪中期唯一被保留的联系就是与少数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的荷兰商人(见第19章第6节)。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这个国家还是取得了某些发展，而这些发展则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长期和平促进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实力。人口从1600年的180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人口的增长则不太均衡：1700年，江户人口接近100万，大阪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急剧增长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促使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而这种交换反过来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因此，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这又导致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在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限。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充分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必要性。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



图195 佩里登陆日本

1853年佩里司令在递交完菲尔莫尔总统的信后与幕府官员交谈。

封信,信中要求美国具有经商特权、开放装煤港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一星期后佩里在率领舰队离开日本时警告说,他将于来年春天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他明确表示,要么签订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并于3月31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根据该条款,日本将开放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充给养;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条约规定,美国将非常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其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8年签订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将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在同美国签订过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相继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同此前的中国一样,这时日本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于中国。

西方入侵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产生了一个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签订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受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则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他们在1858至1865年间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随着1867年天皇与德川幕府领导人的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从而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

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成为这时日本卓越的领导力量,使得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现代化。与中国的文人学士完全不同,日本年轻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他们愿意并有能力在那些方面做些一些事情。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是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仍在不遗余力地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那丝毫不足为怪。事实上,当初之所以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就是为了向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护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下列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有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根据上述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会完全不同于中国人。

日本的新领导人仅仅对那些能够增强民族力量的组成成分感兴趣。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成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也就是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其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利益。它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被请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及思想的一致性,国家也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募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就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等手段来确保其所需工业的建立。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纺织工业等轻工业,而且注意支持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等重工业,因为后者对提供军需品是必不可少的。一旦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就会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掌握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一情况到现在依然如此。

日本人还仔细审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并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为自己提供诸如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于1889年按正式仪式颁布了宪法。该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上述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就随时有权制止这些权利。因此这一宪法只是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议会制的门面,实际上它却维护了寡头

政治的统治和对天皇的崇拜。确也是，宪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则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图 196 首届日本国会

1890 年在山县有朋主政期间日本首届国会开幕。带剑的明治天皇坐在右边的一个华盖下。在画的左上部可以看到皇后和她的侍女们。这幢位于日比谷公园西边的两层建筑在 1891 年 1 月被大火焚毁，但在同年 10 月又新建了一幢国会大厦。

由于采用了这一宪法并进行了一些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经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其他国家对其主权实施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1894 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又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的惊人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就放弃了他们的对日特权。到 1899 年时日本已经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了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桎梏的国家。

四、日本的扩张

日本在完成了其自身的现代化之后，就开始了其向亚洲大陆逐步扩张的进程。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以及它的军事领导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也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焦点。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都必须为自己的利益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如本章前面所述，日本打败了中国并

在 1910 年吞并了朝鲜。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一个更为强劲的对手——俄国。正如前章所述(第 28 章第 3 节)，日本曾提出与俄国平分战利品，但却被俄国拒绝。随后日本人赢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根据《朴次茅斯和约》(1905 年 9 月 5 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

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均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它向各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非神圣和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

推荐读物

关于背景材料，请参见第 21 章的参考书目。总论西方对东亚影响的著作中最优秀的有：E.O. Reischauer, J.K. Fairbank 和 A.M. Craig 合著的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Civilization* rev. ed. (Houghton Mifflin, 1978); J.K. Fairbank 所著的 *China, A New History* (Harvard, 1992); G.M. Beckmann 所著的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Harper & Row, 1962); J.K. Fairbank 所著的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 Row, 1986)。关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最重要的著作是 Ssu-ye Teng 和 J.K. Fairbank 编著的包含解释性论文的文件集：*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University, 1954)。

研究西方对日本影响的杰出著作有：R. Tsunoda 编辑的文件集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58); G.B. Sansom 的分析著作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Knopf, 1950)。同样值得一提的有：E.O. Reischauer 所著的：*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 rev. ed. (Knopf, 1970); J. Halliday 所著的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 (Pantheon, 1975), W.W. Lockwood 所著的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1868—1938*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4)。

关于西方的远东政策，请参见 W.L. Langer 所著的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rev. ed. (Knopf, 1956)。关于日本和中国对西方的不同反应问题，请参见 N. Jacobs 所著的 *The Origin of Modern Capitalism and Eastern Asia* (Hong Kong University, 1958); F.V. Maulder 所著的 *Japa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7)。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回；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一手创造的新局势。

——简·克里斯蒂安·斯穆茨

第32章 非　洲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其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的统治已经及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向南入侵时间较晚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组织程度更高和抵抗也更有力。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盛产金银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深入内地的财富。因而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除了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追回了其先前失去的时间。他们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虽然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几乎不受欧洲入侵者影响的生活，但是非洲各民族已经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欧洲人的影响之下，而且程度甚至比亚洲人还要深。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而言，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但是由于这些奴隶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因而也就没有进入内地的任何必要。奴隶制此时在非洲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并被接受的制度：战俘、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都被迫沦为奴隶。但是由于这些奴隶通常被视为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身份也不一定传给下一代，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非洲传统的奴隶制度比欧洲人组织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较富于人情味。然而，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埃德华·雷

诺德警告说："西方人垄断了残酷和非人道的奴隶制度是一种表象，包括剥夺生命在内的奴隶制度的极端形式对非洲人和西方人来说一样普通……非洲奴隶制度与西方奴隶制的起源和影响不同，但仍然是奴隶制度——对人的剥削和征服。"[1] 同样不能否定的是，若没有非洲酋长们的参与，整船整船的奴隶也不可能被运送到美洲的种植园中。这些酋长们围捕他们的同胞，将他们卖给等候在海岸的欧洲船长，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图197 黑奴贸易

这幅18世纪后期的雕版画表现了在非洲沿海的欧洲奴隶贩子。它描绘了将黑人变成黑奴那痛苦而又非人的过程的第一步。

尽管如此，事实却仍然是欧洲人进行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量和性质都与非洲传统的奴隶制度截然不同。它从最初起就主要是经济性质的，西方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都是纯粹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所以他们都倾向于让奴隶劳作至死，如果这样做比仁慈地对待他们更有利润的话。当欧洲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非洲奴隶贸易时，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道性。也许是潜意识里他们想掩饰自己的残酷，他们渐渐开始轻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也就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利用基督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辩称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向文明和真正信仰的转变。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以为是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但这只是奴隶贸易的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0年，当年向新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

切需要劳力。由于奴隶市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都卷入了这一贸易，以便分享厚利。16世纪时控制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17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是荷兰，18世纪则是英国。西非沿岸分布着约40个欧洲要塞，它们被用来防御敌对国商队的攻击和关押等待运过大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们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在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后，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新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售出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由于信风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速度快、时间短，平均行程只需要60天。然而，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却高达10%至55%，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爆发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坏。奴隶的待遇几乎都一样：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少得可怜的食物。而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过程中，奴隶的死亡率甚至还要更高。突击队为了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一整天在酷暑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宁的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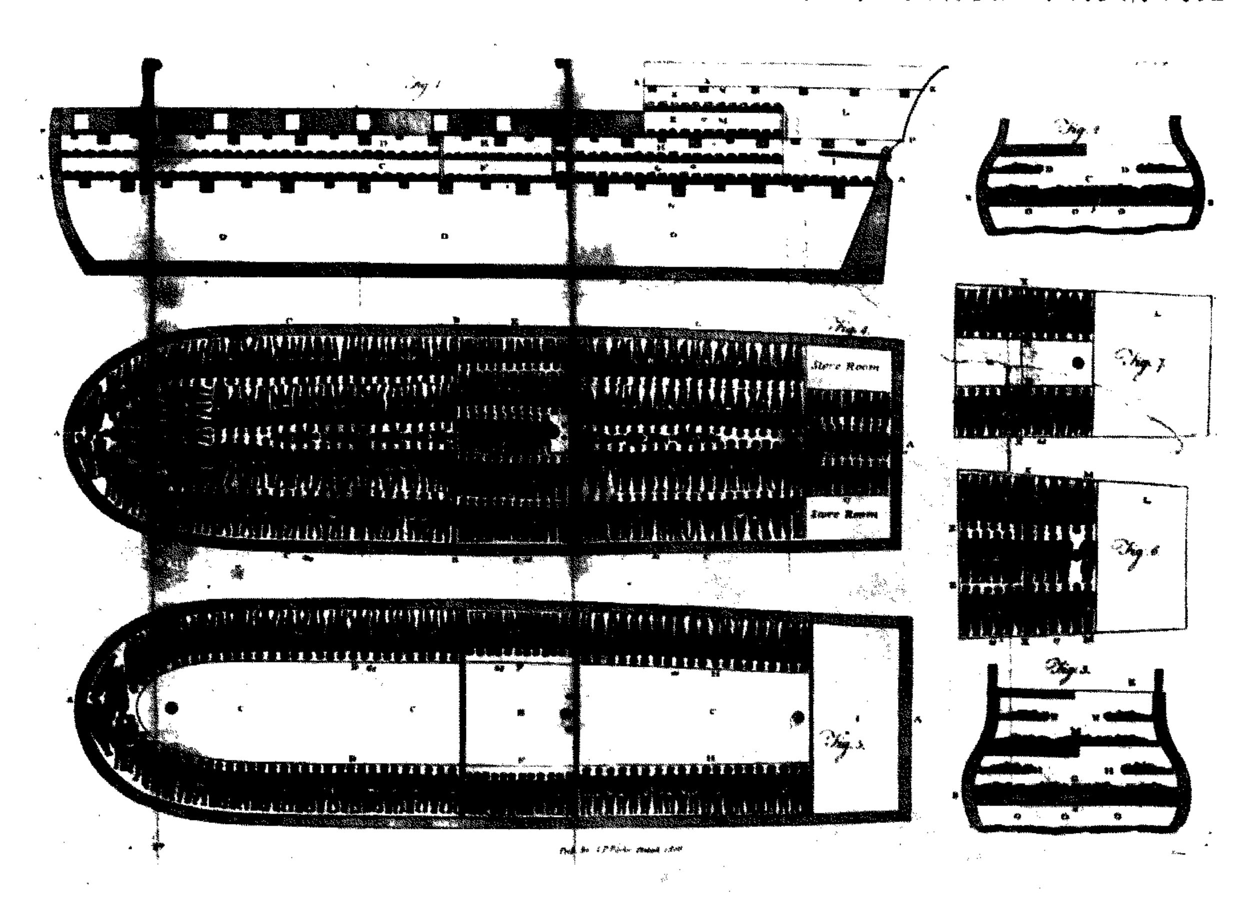


图198 奴隶运输船

美国内战之前穿梭在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船的剖面图。

虫叮咬的痛苦。而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像牛一样被一丝不挂地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虽然美洲种植园接收到的奴隶约为1200万到2000万人之间,但据估计非洲损失的人口是这一数字的4倍(见第25章第3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置若罔闻,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由于利润丰厚,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以换得20到30英镑。这些非洲领导人在奴隶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欧洲人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并承受着25%到50%的死亡率。非洲经纪人由于可以从这种贸易中获得暴利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动议。但是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的确也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确实有为数不多的非洲酋长曾经试图阻止对他们同胞的这种残忍的贸易,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别的继续进行这种贸易的酋长能够得到火器,威胁他们的生存。因而这些少数的持不同意见的酋长也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图199 肯尼亚的清真寺

位于肯尼亚拉姆岛东南海岸边希拉的星期五清真寺。它是一直延续到19世纪早期的斯瓦希里建筑的绝佳代表。它是当地仅存的一座建于20世纪之前的带尖塔的清真寺。斯瓦希里人在拉姆岛上的居住点始建于约15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顶峰,拥有庞大的财富。

同样，南北美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各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运者还是国内各酒商和制造商，也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每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的回报是如此丰厚，以至于18世纪像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等城市的繁荣主要就是依赖这一交易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在人们的眼睛上蒙上一层厚厚的膜，即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2]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然很有朝气地致力于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1823年他们又成立了反对奴隶制度协会，倡议不仅结束奴隶贸易，也要结束奴隶制度。工业革命的进步帮了这些废奴主义者的忙；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经失效，因而他们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够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土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效仿它的榜样，并允许英国军舰捕捉挂有别国国旗的贩奴船。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四分之一的海军力量，即56艘船只、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但是直到新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也在1888年前后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这种封锁才有可能获得彻底成功。

然而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在被取缔时，阿拉伯人却仍在中非和东非，继续这种贸易——当然其规模要小得多。其实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奴隶贸易，而在整个19世纪中，甚至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贸易仍在进行。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被装上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大部分奴隶都在印度洋一些岛屿上的丁香种植园和甘蔗种植园中工作。这一贸易比起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绝，尽管英国海军不断地在红海和印度洋上巡逻，但它却仍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二、探险时代

废奴运动直接促进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通过进入奴隶被俘的内地来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对地理科学爱好的日益增长也使得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那些未经勘探过的地区。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促使许多非凡而引人注目的探险家在19世

纪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的成立。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调查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尼日尔河盆地和西非。

对尼日尔河上游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是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逆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顿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维多利亚湖,最后顺着尼罗河而下,穿过埃及抵达地中海。

在所有的探险家中戴维·利文斯通是最杰出的,他走遍了非洲大陆。记者亨利·斯坦利也是一位杰出的探险者,他在1877年发现了刚果河在西海岸的河口。两年后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此时,非洲探险的时代已经让位于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例如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其邻近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都已被废弃,因为合法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的运营。此时的欧洲政治家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

但到1870年后,种种因素(见第26章第7节)却又促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逆转。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因而未被占领且毫无防御的非洲大陆也就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军人物。起初,利奥波德的主要兴趣在东非。但在斯坦利于1876至1877年间考察过刚果盆地之后,他立即觉察到了这一巨大的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已看到了这一机会,只是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而已。于是,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在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移交给了“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和接受象征性报偿就意味着他们将会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按照传统,非洲酋长是受人民之托掌管其土地,因而他出卖土地就像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然而这却是帝国主义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种种阴谋诡计的直接后果就是,1884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

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的前提必须是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完毕。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防止出现对其事业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他的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刚果人口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至1908年间减少了一半(从2000万下降到1000万)。但是随着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逐渐被泄漏，利奥波德不得不于1908年将他的刚果领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此时私人领地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制止了那些暴行，不过变相的强迫劳动却依然存在。



图200 莱索托国的创立者

姆什韦什韦是莱索托国的国王和创立者。并不是所有的班图人都沿袭沙卡的尚武习气，姆什韦什韦是属于Sotho班图的一个次部落的王子，他带领臣民打败了祖鲁人的进攻，并领着他们迁到南部非洲的一座山上要塞里。在那里，他通过外交手段和决心意志创立了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国竟然一直存在到现在。1868年英国人把这个小王国变成了巴苏陀兰(莱索托的旧称)保护国。1966年这个王国取得独立，由姆什韦什韦的曾孙姆什韦什韦二世统领。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其过去在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建立的贸易站向内地推进，设想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但是由于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西海岸也拥有据点，法国人在争夺内地的竞赛中不得不迂回绕过他们的对手。他们大体上是成功的。除了英国人在尼日利亚和德国人在喀麦隆能够有效地向内地扩张，西非其他所有地区，连同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都变成了巨大的法国领地。

英国人和德国人于1886年和1890年签订了两个协定，以解决其在东非的领土争端。德国人继续保有被称为德属东非保护地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则分得英属东非保护地以及乌干达保护地；德属东非保护地在1919年以后取名为坦噶尼喀，英属东

非保护地后来则被称为肯尼亚殖民地。

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参加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贫瘠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1896年时他们进一步冒险，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比大多数非洲人更能有效地进行抵抗，因为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80 000人的军队。在打败了10 000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后，他的王国仍旧独立于欧洲人的统治之外。到1914年时，除了西海岸的利比亚外，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上惟一保持独立的国家。而即使是建立于1882年、作为获得了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 Liber，意为“自由”），到1911年时实际上也已因其财政崩溃和内部混乱而沦为美国的保护地。

这种史无前例的领土扩张的最终结果就是整个非洲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只有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例外。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瓜分非洲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能以非洲人来反对非洲人（正如他们在征服美洲时用印第安人对付印第安人一样）。另一个原因则是非洲人进行的是面对面的前沿战，这使他们成为欧洲人杀伤力巨大的火炮的牺牲品。在战场上被打败后，他们通常撤退到有围城的城市中，然而这些城市面对欧洲的火炮也同样脆弱。其实如果进行游击战，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和当地人的支持本来可以让他们支持更长的时间，从而使欧洲人因为代价太高而放弃征服。非洲人根本不能抵挡河上的战船、海岸的战舰、射速超过每秒10发子弹的加特林和马克西姆机关枪。

尽管存在这些极为不利的因素，非洲人却绝不是任人摆布的走卒，在一些地区他们进行了足以严重迟滞欧洲人进程的抵抗。征服西非花了25年的时间，而象牙海岸的部分地区、马里、尼日尔、东北部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动荡则直到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才被平息。这些领导非洲抵抗的人们今天都已成为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民族英雄。

四、欧洲的影响

经济影响

由于瓜分非洲乃是出于明显的经济动机，因此，毫不奇怪，伴随瓜分而来的是经济上的急剧变化。欧洲不再满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隶——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也不再需要奴隶，因为技术已经提供了各种大量机械。相反，西方需要非洲内地所发现的原料，因为它现在已经拥有提取这些原料的技术手段。

在金伯利发现金刚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现黄金（1884年）后，在非

洲资源开发方面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罗得西亚和刚果也发现了同样大量的矿产财富:在罗得西亚发现了金和铜,在刚果发现了金、铜和金刚石。西海岸的许多地区都盛产热带雨林产品,如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探险者曾报告说,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结果欧洲移民者成群结队地蜂拥而入,尤其是涌入南罗得西亚和东非。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最理想的地产以从事农业。

为了运输矿产品和农产品,欧洲人开始着手在非洲铺设铁路网,正如他们早先在亚洲所做的那样。铺设这些铁路是为了便利产品出口,而并非为了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扩大生产和修建交通工具的刺激下,贸易达到了使传统的物物交换让位于货币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也不再用奴隶、砂金、羽毛和象牙同欧洲人交换盐、料器、布匹、朗姆酒和杜松子酒等。到19世纪末时,英国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已在这里普遍使用。

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自然对土著居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气候温和的高原区,居民们由于其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响最大。在某些情况下,整片整片的土地全供白人使用,即使田地闲着,非洲人也不能耕种。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种植园里劳动,领取工资;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上,通过为他们劳动来取得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特权。在其他地区,非洲人发现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如果非洲人拒绝提供种植园和矿山所需要的劳力,白人就会采用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就是通过征收人头税来迫使非洲人为了挣钱交税而去干活。由于上述种种发展,非洲人传统的经济自给自足程度降低了。他们不再仅仅为养家糊口而工作,而是日益被卷入货币经济中,并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地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文化影响

与商人、投资者、移民一起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还有传教士,他们对非洲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最早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其他人对非洲文化的影响都是间接的和偶然的,如他们强迫非洲人离开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矿山去工作时的情形就是如此。但传教士却是带着改变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开目的来到这里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运用了三大工具:教育、医学和宗教。

学校提供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是传教站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学校的影响力特别大,因为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事业交给了传教士。在许多方面,教会学校就其影响而言都是建设性的:他们经常教学生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农业技术、如何遵守健康法和公共卫生的基本行为规范。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欧洲语

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进行阅读和写作。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给非洲本土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也不可避免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了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常常教导学生说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错误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学生开始不太听从其父母和长辈的教导，而更多地听从他们认为应该予以尊敬的欧洲老师的教导。此外，教会学校使用的是欧洲课本，讲授欧洲多于讲授非洲——在法国殖民地使用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就是以讲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课文开头的。教会教育还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因此，受过几年此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的村庄。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从而也就进一步地脱离了其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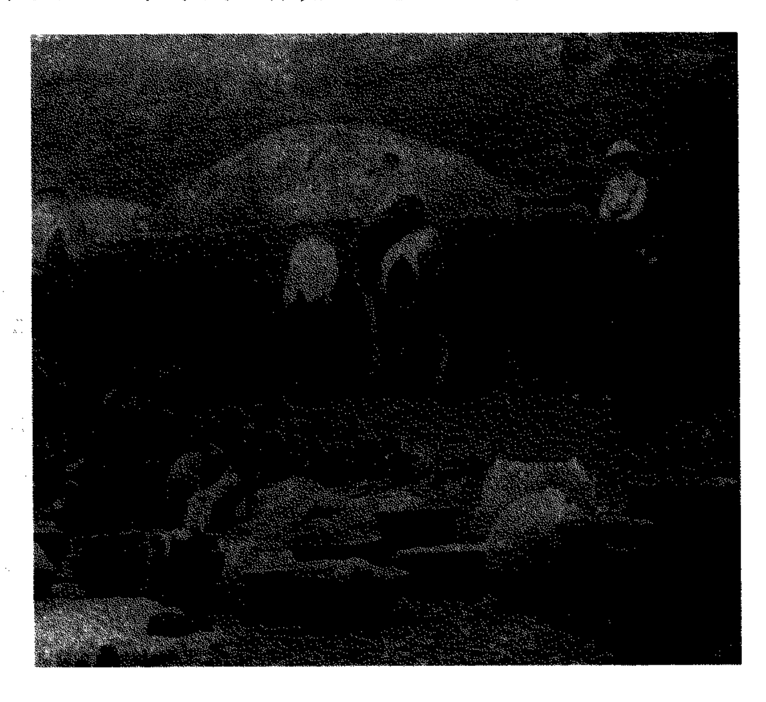


图 201　非洲传教

一个传教士来到了一个祖鲁村落。19世纪时欧洲和美国兴起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在全世界撒布福音”的运动，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在非洲开展传教活动。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不过，除了救人之外，医学还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了疑问。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徒劳无功之后将病人治好。因此，人们也不再指望依靠传统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然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是传统的宗教却已不再是一种使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有效的粘合剂。

医学医生和祈雨医生

西方传教士给非洲带去的不只是新的宗教，还有新的文化。新旧之间的冲撞在以下戴维·利文斯通（医学医生）和一个本地祁雨医生之间的争论中表露无遗。

祈雨医生：你不应该在对我们的知识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蔑视它。

医学医生：我并没有蔑视我不懂的东西；我只是认为你说你们有可以影响降雨的药物这是错的。

祈雨医生：这恰恰便是人们谈自己不懂的问题的方式。当我们第一次睁开眼睛，发现我们的祖先制造了雨，我们只是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你们来库鲁曼是为了玉米，你们可以灌溉花园而不需降雨，但是我们不行。如果我们没有雨，牲畜将失去牧场，奶牛将无法产奶，孩子将羸弱而亡，女人将投奔他邦。如果女人都跑到能降雨、产玉米的部落，我们整个的部落就将四散而亡。我们的火焰就将熄灭。

医学医生：我非常同意你对雨的价值的评论，但是你不能用药物来对云彩下魔咒。你等到云彩来的时候才使用药物，然后把只属于上帝的功劳归于自己。

祈雨医生：我用我的药，你用你的；你我都是医生，医生可不是骗子。你给病人下药，有时候上帝喜欢用你的药治愈他，有时候并不——病人会死掉。当他治愈时，你将上帝的功劳归于自身。我也是一样。有时候上帝赐予我们雨水，有时候不。当他赐予我们的时候，我抢了上帝的功劳。当病人死掉的时候，你并不会失去对药物的信心，不下雨的时候我也一样。如果你希望我不再使用我的药物，为什么却继续你自己的呢？

医学医生：我只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生物用药，即使没有治愈也可以观察到效果。你假装对云彩下魔咒，可是它们高高在上，你的药根本无法企及。通常都是你的烟朝向和云彩相反的方向。上帝自己就可以命令云彩，只要尝试和耐心等待，没有你的药上帝也会赐予我们雨水。

祈雨医生：哈哈！直到今天早晨我都认为白人是很聪明的。谁曾尝试过饥饿？死亡难道是愉快的吗？

医学医生：你能做到一个地点下雨而另一个地点不下吗？

祈雨医生：我不认为是在尝试。我愿意看到整个国家一片苍翠，万众欢腾，女人击掌，向我奉献花环以表谢意。

医学医生：我认为你既欺骗他们，也欺骗自己。

祈雨医生：好吧，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有一对。（意为两人都是无赖）

以上只是他们逻辑的一个样本。如果准确理解他们的语言，这些推理是相当尖锐的。这些争论是广为人知的，我试图竭尽所能去说服哪怕是一个人，他们是错的，但却从未成功过——他们对药物即是魔咒的信仰极为坚定。一般来说，争论就是产

生这样的印象：你根本不着急下雨；这证明你对他们的福祉毫不关心，而这种思想的传播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D.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J. Murray, 1857), pp. 22—25.

政治影响

对传统的部族当权者而言，最严重也是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阶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中都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适用于欧洲而不应适用于非洲。他们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促使他们发起政治运动。通常他们只能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他们在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做官员的职位也很低。此外，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他们仅仅因为自己皮肤的黑色而仍处于从属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会唤起民族主义，就因为它强调了个人的判断力和主动性。安哥拉一份杂志的作者阐明了这一点："告诉一个人他能随意解释《圣经》，就是向他暗示一种过分的自治权，使他变成反叛者……一个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倾向于——并不是说积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3]

推荐读物

关于非洲通史，请见第22章的参考书目和 P.D. Curtin 所著的 *African History* 第56卷(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64)。关于奴隶贸易的最新著作是 E. Reynolds 所作的司法研究 *Stand the Storm: A History of Atlantic Slave Trade* (Shocken, 1985)，书中提供有注释齐全的参考书目。*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989年第30卷第1期的特别专题："Atlantic Slave Trade: Scale, Structure and Supply"提供了更新的研究成果。如果想知道1500年后1 000万非洲人如何离开故乡以及如何适应新环境，可以参考 M.L. Kilson 和 R.I. Rotberg 编著的 *The African Diaspora: Interpretative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G.W. Irwin 所著的 *Africans Abroa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Black Diaspora in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uring the Age of Slavery* (Columbia University, 1977)；关于废奴运动，请参考 E. Williams 所著的 *Capitalism and Slave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44)；R. Anstey 所著的 *The Atlantic Slavery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 (Humanities Press, 1975); S. Miers 所著的 *Britain and the Ending of the Slave Trade* (Longman, 1975)。

对非洲探险者们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非洲大陆开放方面的多彩材料。M. Perham 和 J. Simmons 合著的 *African Discovery*: *An Anthology of Exploration* (Faber &Faber, 1942)是一本非常方便查阅的论文集; C. Hibbert 所著的 *African Explored*: *Europeans in the Dark Continent* (Penguin, 1985)提供了有关非洲探险的一般概述。

研究瓜分非洲的著作有: A. Boahen 所著的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1987); T. Pakenham 所著的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Random House, 1991)。最后,关于西方对非洲影响的著作有 P.D. Curtin 编著的 *Africa and the West*: *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European Cul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2); R. W. July 所著的 *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 (Praeger, 1968); A. D. Roberts 编著的 *The Colonial Movement in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6)。

注释

1. E. Reynolds, *Stand the Storm*: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Schocken, 1985), p.13.
2. Cited by H. Russell, *Human Cargoes* (Longman, 1948), p.36.
3. Cited by T. Hodgkin,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New York University, 1957), p.98.

后来西班牙人决意去追猎(古巴)山区的印第安人,并在这里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他们毁灭了不久前我们还看到的这整个岛屿,消灭了这里的人口;人们遗憾而痛苦地看到这座岛上已无人居住,变成了一片荒野。

——巴托洛姆·德拉斯·卡萨斯, 1552 年

这些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像狼群在一个日渐开化、人口愈加稠密的国度里绝迹一样。

——詹姆斯·斯蒂芬, 1841 年

第 33 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19 世纪欧洲对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影响远远胜过它对亚洲和非洲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如此广泛和具有戏剧性,以至于称其为彻底的欧化更合适。

欧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统治或文化渗透,还包括现实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有形取代——这种情况曾在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烟较稀少的地区发生过。人口稀少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走。千百万欧洲移民带着他们的政治制度、谋生方法和文化传统蜂拥而入,占据了土著居民的领土。因此,与海外领土种族上的欧化相伴而来的必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

一、种族上的欧化

在第 26 章第 7 节中我们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能够产生如此多的移民和千百万人为什么愿意离开他们祖先的家园,甘冒各种未知的风险到遥远的大陆去。1763 年就已存在的狭长的欧洲殖民地,到 1914 年时已经扩展到了整块整块的大陆,其中

也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这两个地方在早些时候还无人去过。

表1 南北美洲的种族分布(单位:百万)

	白人		黑人		印第安人
	1835年	1935年	1835年	1935年	1935年
北美洲	13.8	124.3	2.6	12.4	1.8
中美洲	1.9	6.9	2.7	8.4	21.4
南美洲	2.9	40.9	4.5	18.7	29.2
合计	18.6	172.1	9.8	39.5	52.4

绝大多数欧洲移民都去了南北美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在南北美洲,而且这两块大陆还蕴藏了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经济机会。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自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形成以后,移民中却有为数极多的人到北美洲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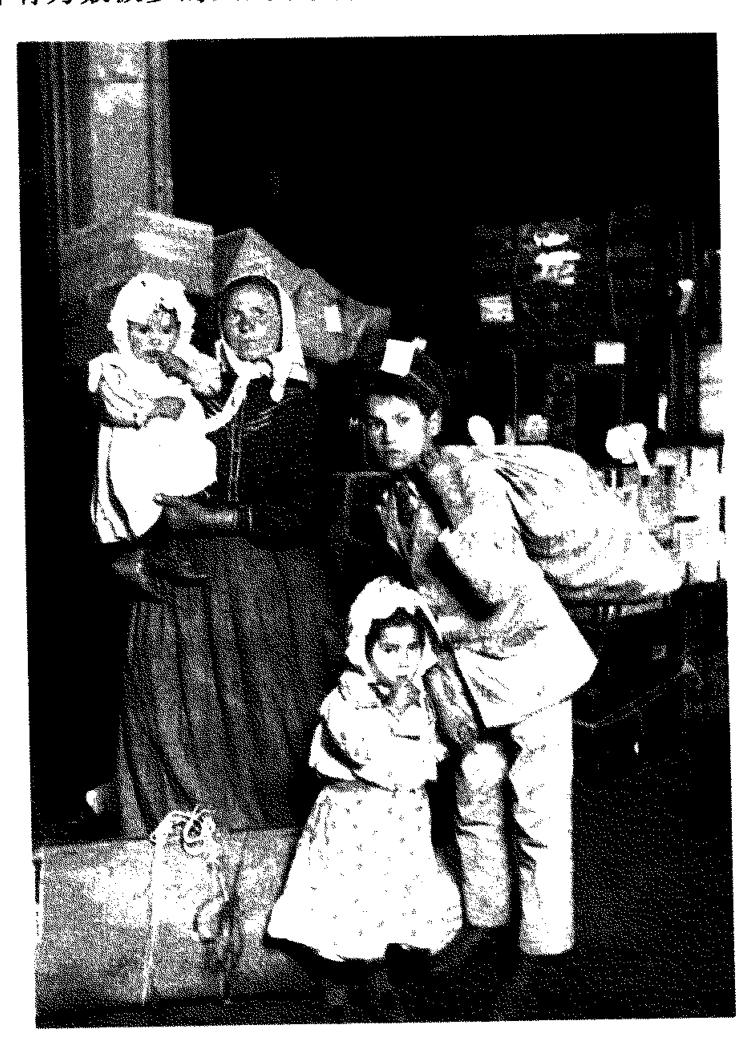


图202 移民美国

1900年前后纽约伊利斯岛上的意大利移民。由于刚刚到达一片新土地,这些来自意大利南部的新来者的脸上显出了焦虑和希望。截止1900年,意大利向西半球的移民超过了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点解释了人们更多移民北美洲这一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尽管对欧

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数所做的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但人们却一致认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谓的拉丁美洲。由于这些土著民族负担了所需的全部劳动，欧洲移居者无需从事劳动，因而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

相反，在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由于印第安人比较稀少，不能提供劳力资源，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法国人，无论是砍伐森林，耕作已开垦的土地，还是在沿海水域捕鱼，都得自己去干。在这种情况下，北美洲迫切需要定居者，为此英属北美殖民地不论种族、语言、信仰，向所有的移民开放。到1835年时中美洲和南美洲仅有480万欧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却有1380万。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移民不断增加，它于1900至1910年间达到其顶峰。在这10年中每年几乎都有100万人迁移。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涌进了每一块大陆，结果尽管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但这时也已有相当多的欧洲人到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定居。



图203　天花

由于缺乏对这种欧洲病的生物抵抗力，天花在美洲土著人中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幅阿兹特克人画的画表现了在1520年席卷特诺奇蒂特兰的天花大传染中染上天花的阿兹特克人。历史学家估计，在一年中墨西哥中部的居民有一半患病死去。这场大灾难削弱了阿兹特克人抵抗西班牙人入侵的能力。

成百万人移居美洲导致的结果是几百万土著居民被取代——这种取代的范围之广直到今天才为人所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坚持认为，美洲大陆大部分是无人居

住的，从各大洲来的殖民者可以自由定居。直到现在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才发现此说的谬误。研究表明，1500年左右的新大陆与旧大陆在人口密度上相差无几[1]：中国有1亿人，地中海地区有6000万到7000万，美洲有8000万左右(在黑死病和其他当时欧亚大陆上盛行的疾病未流行前)。当哥伦布到达美洲时这里绝不是无人居住的，1492年时在现在美国所在的地区上估计生活着500万人，而到了1809年就只剩下了60万。

死亡的部分原因是暴力和过度劳动，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移民们无意中从欧亚大陆和非洲带来的疾病。科学家已经列出了这些疾病的清单。这些疾病对于脆弱的美洲人来说是致命的，就像14世纪的黑死病对欧洲人来说那样。这些单子上列出的一连串令人胆寒的疾病应该为人类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大屠杀负主要责任，尽管不是全部责任。这些疾病包括：天花、麻疹、白喉、沙眼、百日咳、水痘、黑死病、疟疾、伤寒症、霍乱、黄热病、登革热、猩红热、阿米巴痢疾、流感以及几种肺结核。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同样是从欧亚大陆移民来的美洲印第安人却没有获得免疫力呢？一种解释说，在遥远的古代，当时移民来的印第安人仍然处在采集食物的阶段，那些疾病尚未出现。而且他们是从西伯利亚移民而来，当地稀少的人口和寒冷的天气也不足以产生传染病。因此印第安人来到美洲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免疫力，而在他们到达这片空旷无人的新大陆之后就更无法获得免疫。所以当欧洲人到达美洲时，面对欧洲人从欧洲带来的疾病和他们的仆人从非洲带来的疾病，印第安人变得不堪一击，终至灭绝。

就移民的具体来源来说，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拉丁美洲各国的移民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不过19世纪后期也有大批移民来自意大利和德国。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绝大多数移民都来自西北欧，而在1890年以后则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移民来自西北欧，其余三分之二的移民都来自东欧和南欧。不过英国自治领的移民的来源却受到限制，他们主要来自不列颠群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些辽阔的地区，自治领也放宽了其移民政策。

这些迁移的最终结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种族上的欧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已经变得以欧洲人为主，不过也有一些较大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仍占优势(为总人口的58%)，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奴隶贸易而被运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种族欧化的另一个例外。据估计，约有1200万到2000万奴隶在横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来，最终到达新大陆。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北美洲约占总人口的10%，在中美洲占30%，在南美洲占21%。南非是种族欧化的第三个例外：在这里，土著非洲人以大于3:1的比例在数量上超过了白人(不论是布尔人还是英国血统的人)。

最后，19世纪发展起来的欧洲热带医学学派降低了热带欧洲人的死亡率，这也促进了人口的欧化。这些学派的基础是罗伯特·科赫、路易·巴斯德等微生物学家的研究和在热带地区负责军人医疗的军医的观察。经过反复试验，他们发现为部队提

供洁净的水、丢弃下水道污水和使用蚊帐对付热带昆虫的重要性。美国人在古巴和巴拿马首先使用了这些方法，从而成功地遏制了疟疾和黄热病的爆发。

二、政治上的欧化

伴随种族欧化而来的是政治上的欧化。政治欧化有很多种形式，它们反映了各个殖民地母国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海外领地的不同条件。例如，拉美殖民地和英国的 13 个殖民地通过武装革命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早期赢得了独立。而英国自治领则是在 19 世纪晚期通过英国议会的法案赢得了自治，因此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英联邦的成员，它们在承认英国王室管辖权的同时享有全面的自治。

俄克拉荷马购地热

欧洲人涌入印第安人土地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 1893 年俄克拉荷马切诺基地带的开放。下面是一个叫做比利·麦根提的参与者的描述。

我已经进入了俄克拉荷马切诺基地带，挑出了我想要登记的土地——在康普河岸边，总共 160 英亩。那块地顺坡延展而下，地势如此之好，你一定能犁出像肋骨一样平滑的犁沟。在树丛中，你一定能种出可供全国水果市场的桃树。我将播下种子，收获金钱。

然后我将发现自己是个能干的姑娘，在这片土地上生下一大群孩子……

开工的那天，我把鸡都赶出来……到 8 点钟的时候，也就是开工后 4 个小时，男人们和马匹已经密密麻麻地聚齐了，就算是闪电也不能打散他们。

男人们像狗一样互相咒骂、咆哮，因为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大车赶到别人前头。他们用拳头打了起来，狗也咬作一团。

11 点 50 分。距天崩地裂的时刻还有 10 分钟。每分钟都过得像一年。11 点 55 分了，但是负责保安的士兵却没有注意到我的马的前蹄已经越线 2 尺多。

11 点 59 分。现在谈话声像扎堆的狂蜂一样响亮。负责下令开始的官员踩在了线上。他一手拿表，一手拿枪。他看着表举起了枪。

他开了一枪。车轮转动！鞭声响亮！蹄声轰鸣！开始奔跑……

在我身边，车轮与马鞍较量、男人与男人竞赛，马车撞击着马车。为了让马跑得更快些，连马皮都被鞭子抽红了。驾车人站在马车上，一旦人和车靠得太近，他们就鞭打旁边的车和马……

当我们到达河边的时候，我一下子跳下马车，跳到了我挑的那块地上。

我抓起石头和木棍来给我的160英亩划界……当我放下最后一块标志物时，我折下一根三叶杨的树枝，把我的大手帕绑在上头。因为法律规定，占完地后你必须竖起像旗子一样的标志。

然后我站起来，向第一块可以称为自己的土地望去。我的心跳声像刚才的马蹄声一样响亮。

“你现在是个人物了，比尔。”我对自己说，“你有最好的马，你赢得了最好的土地。你赛过了他们所有的人，真的，你将来种的地也会比他们都好。”

Bill McGinty, “*Plow Fever*”, in Harold Preece, *Living Pioneers* (Thomas Y. Crowell, 1952), pp.190—201.

Charlestown, July 24th, 1769.
TO BE SOLD,
On THURSDAY the third Day
of AUGUST next,
A CARGO
OF
NINETY-FOUR
PRIME, HEALTHY
NEGROES,
CONSISTING OF
Thirty-nine MEN, Fifteen BOYS,
Twenty-four WOMEN, and
Sixteen GIRLS.
JUST ARRIVED,
In the Brigantine DEMBIA, *Francis Bare*, Master, from SIERRA-LEON, by
DAVID & JOHN DEAS.

图204　黑奴广告

这是一幅1769年的路边广告，它宣称有一船黑奴从西非运到了南加利福尼亚的加累斯顿。当时，奴隶占北美殖民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运来的黑奴男女比例基本上对等。这一做法最终有利于黑奴家庭和社区的形成。

另一个政治欧化多样性的例子是北美 13 个殖民地的成功统一和他们最终作为美利坚合众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扩张，而拉美则经历了政治上的分裂。最后一个例子是美国和英国自治领的政治稳定与拉美无休止的军事政变的对比。美国一直将其 1787 年宪法沿用至今，而每个拉美国家则平均都采用过多达 10 部宪法。

总之，政治上的欧化涉及到欧洲政治制度向海外领地的移植。但是在这一移植的过程中也会有适应和变化。如果让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政治领导人去领导一个派系、民族集团及大城市核心集团之间很不平衡的美国政党，他会全然不知所措。如果让他去面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连不断出现的宪法和军事首脑，他就会更加手足无措。

三、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

同政治领域的欧化一样，经济领域的欧化也十分普遍。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海外领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在 1820 年至 1830 年间，占美国总出口量 36％的商品被运往英国，占美国总进口量 43％的商品则来自英国。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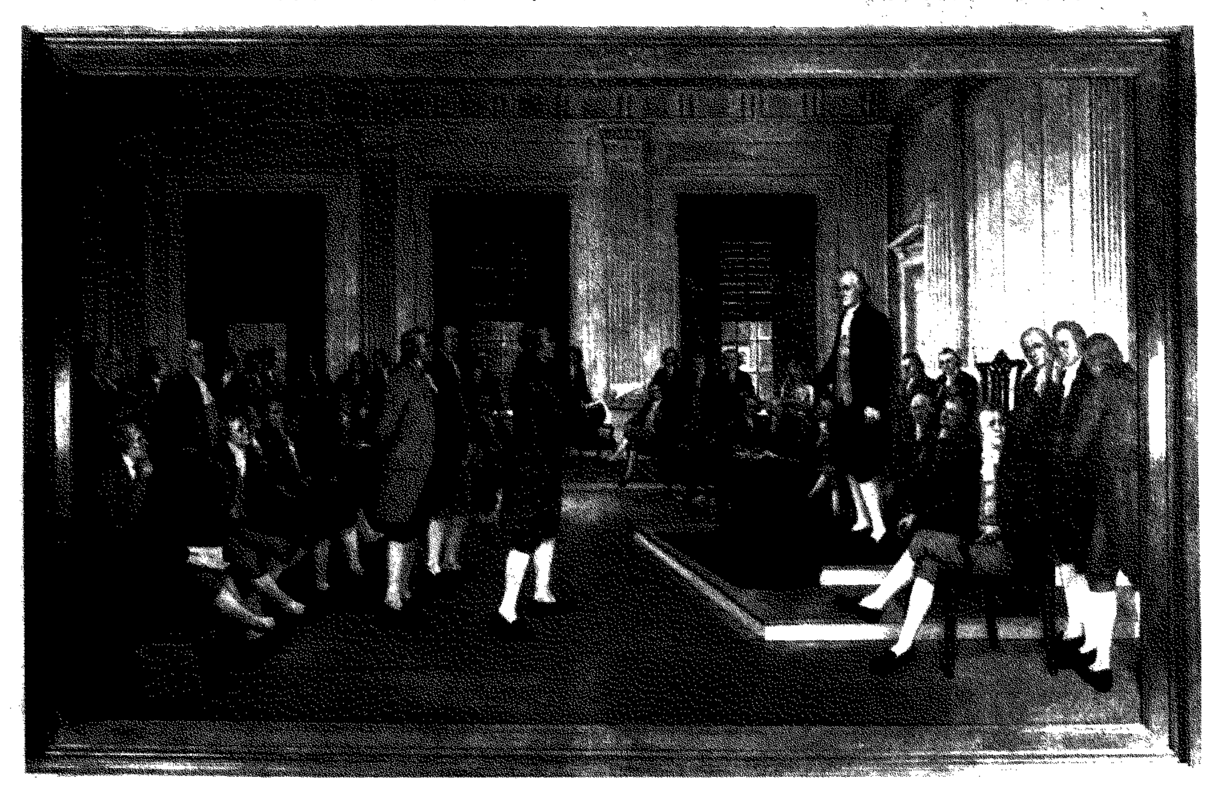


图 205　制定美国宪法

1787 年美国召开制宪会议，着手制定美国宪法。1789 年，在达成谅解确认宪法将在不久后进行修正并加入《权利法案》之后各州接受了美国宪法。从此一个大胆的政治实验开始了，其内容即是检验共和制能否在一个大国获得成功。

世纪期间,尤其是在铺设铁路时,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国在美国的总投资额已经不少于72亿美元。而在相对欠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其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则还要深得多。

伴随着种族、政治和经济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欧化。仍留在英联邦内的地区是这样,许多赢得独立的地区几乎也是一样。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殖民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文化。这种形式的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都说西班牙语,而且信奉罗马天主教。人们看到,这种文化上的欧化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要街道为基础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沿毡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用的毛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也是典型的西班牙文化形式,男尊女卑,年轻女性受到严密的监督。此外人们还倾向于认为有身份的人从事体力劳动不体面、不合适。



图206 墨西哥革命

1914年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军队在霍奇米尔科行进。妇女们和男人们并肩战斗,并在墨西哥革命中起了突出作用。

虽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仍然很大且很普遍，尤其是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这一影响(见第25章第5节)在烹饪、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面至今仍有所体现。此外由于拉丁美洲运进了数以百万的奴隶在种植园里从事劳动，因此它的文化中还含有相当大的非洲成分。这种非洲的影响在大多数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表现得最为强烈，不过，有关这种影响的种种例子，尤其是音乐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都能看到。

与拉丁美洲的文化相比美国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比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有25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词汇；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包括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也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同样，与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拉美国家相比美国也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但其影响在美国也还是相当大的：黑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2%，而印第安人则仅占0.5%。不过尽管美国文化含有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还是起源于欧洲，只不过这种欧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应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推荐读物

总论欧洲化进程的著作有：E. Fischer 所著的 *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Age* (Harvard University, 1948)；L. Hartz 所著的 *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4)；W.B. Hamilton 编著的 *The Transfer of Institutions* (Duke University, 1964)；P.D. Curtin 所著的 *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9)分析了种族欧洲化的医学障碍；A.W. Crosby 所著的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M.E. Sharpe, 1994)用生物学的方法分析欧洲化进程，令人着迷。

注释

1. M. Lunenfeld, *1492: Discovery, Invasion, Encounter* (D.C. Heath, 1991), pp.321—326.

我们诱使他们精神堕落，我们带给他们物欲和疾病，而这些物欲和疾病，只能搅乱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直以来享受着的幸福安详，此外别无他用。如果有谁否认这一事实，那么请他告诉我，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美洲土著人究竟得到了什么？

——詹姆斯·库克船长

第34章 波利尼西亚

一、岛屿和航海者

从欧洲人在15世纪时偶然发现的美洲大陆往外望去，就是浩瀚的以大洋洲而知名的太平洋。因为由众多岛屿构成，所以大洋洲也被称为波利尼西亚。从美洲的西海岸到亚洲大陆，波利尼西亚绵延几千英里。由于太平洋与欧洲大陆相去甚远，因而对欧洲人而言，直到他们发现了更容易到达的美洲和非洲大陆之后很久这里始终都是一块未知的领域。

欧洲人之所以对波利尼西亚在这么长时间里始终一无所知，不仅因为它远在世界的另一头，还因为它缺少像其他地区那样能够吸引欧洲人的富饶物产。在太平洋上没有一处像孕育出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这样伟大文明的广阔草原和富饶河谷。相反，太平洋世界中拥有的只是浩瀚的大洋，以及遍布其中的数千个小岛。这些散布的碎片如此微小，如果不把新圭亚那和新西兰两个大岛计算在内，所有小岛相连后的总面积也只相当于英格兰或纽约州。

尽管太平洋各岛屿缺少欧亚大陆的丰富物产，然而岛上仍然出产一些作物。根据澳大利亚权威部门认定，依靠这些作物，土著居民可以“比他们那些赚钱谋生，食用罐装食物的后代们生活得更好。”[1]

这里主要出产的是两种乔木作物和两种根用作物。乔木作物是指椰子树和木

菠萝。没有椰子,这里大多数岛屿上的居民就都将无法生存。直到今天,岛上居民仍然每天食用至少五个椰子果,既当食物,又作饮料;同时椰子木则可被用来建造房屋、木船,它还是制作渔叉的材料;椰树叶可用作茅草屋顶,或制成扇子和席子。同样重要的作物还有木菠萝,木菠萝的繁殖能力很强,每年能生产大约150个重达2—5公斤的果实。这些果实既可烤来吃,也可在坑中发酵后制成面团保存数月之久。

根用作物是薯蓣和野芋。薯蓣是一种淀粉块茎,通常有30磅或更重些,经过蒸煮、剥皮,可以磨制成粉。野芋也是一种淀粉块茎作物,可做蔬菜、布丁,或磨制成粉。应该提及的还有香蕉,野生或种植的香蕉也是一些岛屿上的重要作物。

这些农作物是殖民者带到这些散布的岛屿上来的。出于人口的压力,他们扬帆出海,跨越太平洋,从南亚来到这里。在公元前1100—公元前1000年时他们还居住在汤加—萨摩亚地区,而到了公元300年左右他们就已经到达了马克萨斯群岛;又过了一两个世纪以后,他们就已经航行到了北达夏威夷东距南美洲海岸2000英里的地方。在那里的复活岛上,他们发掘出了很特异的巨型石制头像,高度从30—50英尺不等。这些勇敢的“太平洋上的北欧海盗”向南最远到达了被他们称为“新西兰”的地方——他们抵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公元800年了。除了对广大土地的占领,殖民者们还带来了无法抑制的文化同化。19世纪伟大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就惊异地发现:在夏威夷,在地处遥远南方的新西兰,他的部下竟然可以用同一种语言与当地人进行贸易。

二、商贸与殖民地

与持续而系统化地探索和殖民占领非洲和南北美洲相反,欧洲人在最初接触大洋洲时采取的是间断的行动。太平洋流域仅仅被视为一条通路,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在同阿卡普尔科及亚洲进行利润丰厚的贸易活动(用墨西哥银交换丝织品和瓷器等中国的特产)时这条通路十分有用,有时也以这条通路进一步探索一条从北部太平洋经过北美洲的北极部分直达哈得孙湾的海上通道。

18世纪晚期欧洲人重新将太平洋海域看作一个有其内在价值的区域。他们被这里在世界市场上很有价值的海产品所吸引。在那个时代各种植物油尚未大规模生产,因而鲸鱼油和海狗油十分贵重。同时,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而且还在这里发现了石油。鲸骨与鲸须重量轻、硬度高、有韧性,可用于制作弹力紧身衣和衬衫的搭扣,以及其他许多现在已被塑料取代的用途。海洋动物的皮毛也十分贵重,特别是海獭,其华贵的皮毛尤其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太平洋还有其他许多特产,包括味道好闻的檀香,在中国人们把它用作祭祀焚烧活动中的香火用品;生猪和腌猪肉可做行船的伙食,也可出口到欧洲——比欧洲当地的猪肉要便宜许多;次要一些的则有珊瑚礁地区的产品,如珍珠贝、玳瑁贝、食用海参,还有蛞蝓——一种在中国

极为受宠的精致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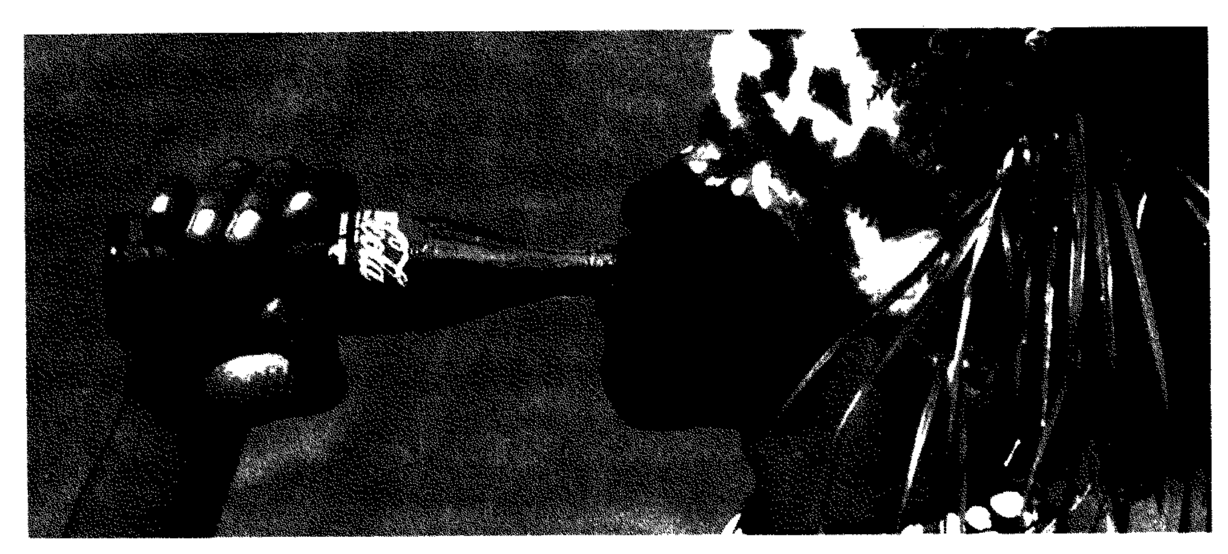


图 207 跨国公司的影响

西方跨国公司的扩张改变了全球消费模式，破坏了无数传统的生活方式。

同其他地区一样，在波利尼西亚，最先迎来的也是欧洲商贸对当地经济的渗透，而紧随其后或相伴而来的就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政治入侵。北部太平洋地区就是如此：早在 18 世纪初期彼得大帝派遣维特斯·白令到远东考察亚洲和北美洲的连接情况时，俄国人就已经开始在北部太平洋地区活动了。在那次考察中俄国人发现，海獭和海狗皮的价值之高，能与西班牙人在阿兹特克和印加王国得来的金条相媲美。为了利用这个机会，莫斯科于 1799 年特许俄美公司成立，并迅速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到 1818 年时该公司已运出了 80 000 只海獭和 1 495 000 条海狗皮。在北部太平洋海域捕杀这些动物的过程中，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也被充分利用。在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物的领导下，俄美公司希望能在这里长期定居，而不是只把这里当作一个贸易中转站。截止 1820 年，约有 15 个俄国人聚居地散布在白令海峡和罗斯堡之间的海岸上。而这里与旧金山北部相距仅只 1000 公里。

不过这些定居者却并没能使太平洋沿岸逐渐呈现俄国化，就如大西洋沿岸受到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同化那样。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大量俄国移民移居到北部太平洋地区来，而定居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从纽芬兰到火地岛的大批西欧移民的情况则与之不同。在喷气时代到来之前，行船横渡海洋要比穿越隔断俄国腹地与太平洋海岸绵延数千英里的西伯利亚野生地带容易得多。因此那十五批定居者只是各自孤立地抵达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建立了落脚点而已。而诺沃—阿克罕吉尔斯克(现称锡特卡)最大的定居点也只有 222 个居民。

其他的定居群落规模更小，因此没有人可以在这里扎下根去。他们居住在沿海岸的简陋棚屋里，一些西方企业主会定期到那里从俄国人手上买走一些便宜货，然后拿到广东以高价卖出。因此当 1867 年俄国将阿拉斯加廉价售与美国的时候，其实莫斯科也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美国白人的掠夺者名声在太平洋海域十分响亮，

其时美国的殖民地开拓者正乘着他们的有顶马车以不可阻挡之势由陆路向西海岸进发。

与俄国人毫无成效的努力相对的是，西欧人很快就占领了太平洋海域，正如他们先前占领大西洋一样。他们拥有的非常先进的商业和航海资源使得他们可以将其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具有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岛屿上，再一个一个地攻破它们。例如，1874年英国占领斐济，1880年法国占领塔西提岛。1898年继西班牙—美国战争之后，美国占领了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西兰军队占领了萨摩亚，澳大利亚军队抢走了德属新几内亚和部分俾斯麦群岛。因此，到1914年时大西洋已经和非洲一样，被瓜分并被纳入到世界级的欧洲帝国里面去了。

三、欧洲的影响

欧洲对波利尼西亚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对非洲和亚欧地区的影响。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太平洋岛屿上人口稀少，没有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去抵御来自另一种千年古老文明的同化，而在这种文明背后还有几亿人口的支持，这与当地几千人的微弱力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这几千人很快就被来自各国的移民所同化。这些移民是被“太平洋上的天堂岛屿”的魅力吸引来的。由于这些岛屿上没有那些常见的热带病，它使得欧洲定居者可以免受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遭遇的疾病伤害，于是岛屿自身的诱人之处也就显得更加动人了。单就疟疾病而言，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多数太平洋中的岛屿上都没有疟疾，原因很简单，只因为在这些岛屿上没有按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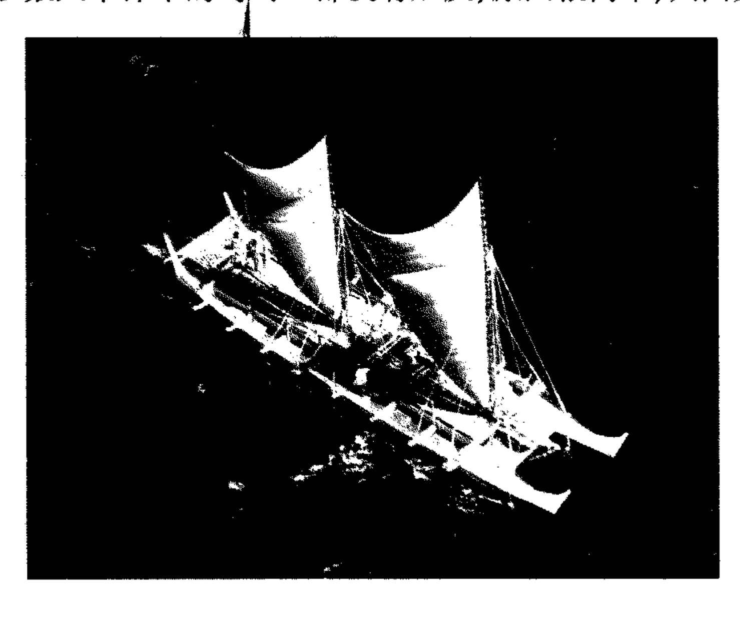


图208 独木舟

一条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类似于曾曲折地横渡太平洋的大型双体独木舟。

与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在大洋洲，人口的分布也影响到疾病的分布和文化的

分裂。伴随着欧洲工具和织布机的进口,当地的器具被逐渐抛弃。利用树皮织布的技术被遗忘了,制作大型双人木船——他们的祖先曾经驾着它跨越太平洋——的技术现在也已经失传了。甚至冲浪运动也显得多余,而逐渐被人们所摒弃。由于食用欧洲式的食物,那些曾为早期探险者所羡慕的完美的波利尼西亚牙齿也开始逐渐退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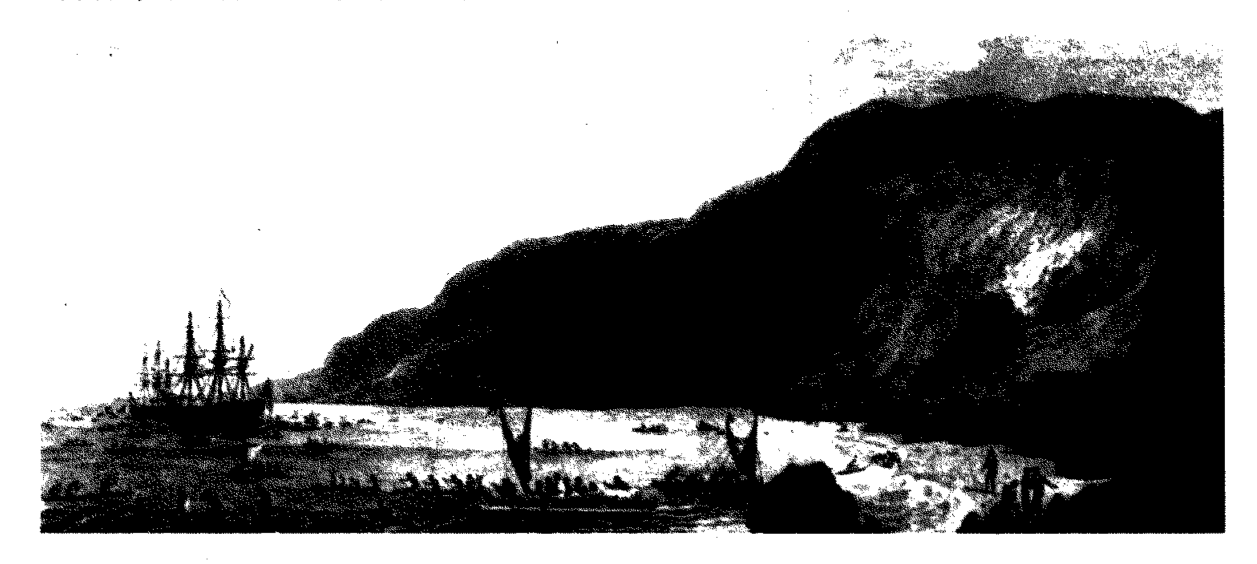


图 209　库克船长

当詹姆斯·库克船长到达夏威夷的时候,他的船队在 Kealakakua 湾下锚。夏威夷人驾着独木舟穿过汹涌的波涛到船队边上兜售。

比牙齿退化更可怕的是一些新的疾病开始出现,比如结核症、天花、痢疾,以及各种性病。现在这些疾病正在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人口下降也正在吞噬着波利尼西亚,这与当年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模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在库克船长于 1769 年到达塔西提岛的时候,岛上居民有 40 000 人左右。到 18 世纪末,据传教士得到的报告显示,战争和疾病已经使得这一人口数字锐减到 15 000 人。到 1830 年时这里的人口减少到 9000,进而又减少到现在的 6000 人。

对于在塔西提岛居民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库克曾反复强调过一种责任。

"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于这些贫穷的人们,如果他们从不曾了解先进的生活和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舒适,或许情况反倒会好得多……再要回到他们曾经的古老和缺憾中去,重拾那些已为人摒弃、早已被我们所遗弃的发明创造,现在恐怕已经太晚了。因为等到他们现在所拥有的铁具用坏时,那些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技能已经都忘光了。现在,石斧已经变得十分稀有,正如 8 年前铁器的罕见一样,而骨针和石针则已经看不到了。"[2]

值得注意的是,库克船长并不仅仅惊异于发生在太平洋岛民身上的悲哀,他还

认识到这些悲剧只是全球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我们诱使他们精神堕落,我们带给他们物欲和疾病,而这些物欲和疾病,只能搅乱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一直以来享受着的幸福安详,此外别无他用。如果有谁否认这一事实,那么请他告诉我,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美洲土著人究竟得到了什么?"[3]

值得注意的还有,库克不仅对塔西提这样可爱的岛屿上的居民感到同情,对于相对不很友好且尚未开化的澳洲原著民他也非常同情。这些原著民留给库克的第一印象是"对某些人而言,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但实际上他们远比欧洲人快乐得多。"库克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对此也表示赞同:"我说过,这里生活着一群快乐的人,尽管他们一无所有。"[4]



图 210 油画:上帝的一天

受不了19世纪末期变化速度加快的压力,保罗·高更(1848—1903)离开了他的法国同胞,到了南洋。在那里,他过着一种更简朴、看起来也更无所事事的生活。在他1894年绘制的画作《上帝的一天》中,他将这里的环境描绘得如此浪漫。

这些赞美表达了欧洲人的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深怀自信,对于自身文化的技术先进性及其所带来的物质享受感到自满。而另一方面,虽然太平洋岛民和其他原著民在技术上明显落后,又缺乏那些令欧洲人自以为是的各种发明创造,但他们看起来却生活得很满足,甚至"更加快乐"。于是一些欧洲人创造了"高贵的野蛮

人"这一概念：快乐地生活，贴近自然，远离文明的束缚和压力。那些欧洲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对其所生存的社会感到不快，就对"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尤其感兴趣。对他们而言，敌人就是文明本身，所以他们发挥浪漫的联想，把波利尼西亚视为天堂，一个田园式的岛屿社会。

这种浪漫之中含有相当的嫉妒，正如班克斯在塔西提岛上的观察，"爱情是这里的首要工作。"他写道：这种美好的环境只有在岛上才有可能，男人们只需干很少的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于是他们就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追求爱情。一个男人"种四棵木菠萝，这样的工作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因此他也就不必像与他同龄的欧洲人那样，年复一年地为家庭辛苦工作，收获谷物，这样他自然就有闲暇去谈恋爱了。"[5]

随着欧洲人对太平洋岛屿认识的不断深入，对"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更加现实的评价。欧洲人逐渐意识到隐藏在太平洋文化之下那些可怕的内在现实，这一现实包括诸如战争、杀害新生儿、各种强制性的禁忌、以活人祭祀和奴隶制等社会问题，以及各种自然灾害，比如能对岛屿造成重创的阶段性的飓风、海啸。

欧洲人对于波利尼西亚的矛盾心理，从传教士、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明。波利尼西亚人以通奸为乐、以只穿内裤舞蹈为乐、以礼拜日游戏为乐，这些都使传教士望而却步。他们强烈反对这些行为，但却怎样也无法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反应略微积极一些的是欧洲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这一点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佐证。比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小说（著名的《摩比·迪克》）；高更根据他在塔西提岛的经历创作的绘画作品；以及罗伯特·路易斯·史帝文森的一生经历，他曾率领全家成员，携带多年积蓄，拖着患有慢性病的身体，举家搬迁到夏威夷、塔西提、马克萨斯群岛，并最终到达萨摩亚。

这些早期的波利尼西亚崇拜者和居民可以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伙伴。每年都有成群的旅游者一批一批地涌向这些岛屿，他们也是要在每日生活的压力中寻求一丝喘息。这种安排看来互惠互利，旅游者可以休息享受，而当地人也乐于获取丰厚的旅游业收入。但在另一方面，即使是一次简单的波利尼西亚短途旅行，也都揭示了库克船长的观点。库克认为，今天我们对波利尼西亚文化的长期破坏，像16世纪的情况一样严重和令人焦虑。这种破坏不仅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破坏，还有对于人类健康的破坏，对于他们祖先生长生活的这些岛屿的破坏。

关于文化，在遥远的复活岛上波利尼西亚人已经感受到了危机和焦虑，于是他们建立了"文化保护组织"。这一组织的创建者明确地提出了组织的观点："我想睡觉我就睡觉。我想吃饭我就吃饭。即使一个礼拜不花一分钱，我也照样过日子。如果我们不当心的话，人们将会把这个岛屿变成又一个夏威夷或塔西提，在那里惟一重要的只有钱。"[6]

关于人类健康，库克船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那些拥有完美牙齿的波利尼西



图211　复活岛石雕

七尊巨大的石雕在阿基维圣坛上列成一排。这些雕像是复活岛上的土著拉帕努伊人建造的。有六百多尊雕像是以有“石像摇篮”之称的拉拉库火山凿来的火山岩雕成的，而且它们全都面朝西方。

亚人，“他们行走优雅，奔跑灵活。”而这些早期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们可与其祖先截然不同。今天，在多民族的夏威夷岛上，波利尼西亚人是健康状况最糟的人群。就平均水平而言，他们的心脏病死亡率高出44%，癌症死亡率高出39%，意外死亡率高出31%，而糖尿病死亡率则高出196%。[7]

比文化和健康上的衰退更能令人警醒的，还是与海平面上升相伴而来的陆地的消失。受到“温室”效应的升温影响，气候变暖，冰山和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从而导致海洋面积扩大。尽管人们对于这一现象和趋势的规模和速度众说不一，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场史无前例且无可预测的“浪潮”正在席卷整个波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这些不是风暴，是浪潮，”位于新几内亚附近的马绍尔群岛的报纸编辑吉夫·约翰逊这样说，“美好的天气里，海水突然涌进你的起居室。显然太平洋上正在发生着什么，而这些岛屿也已经感受到了。在这里它与心的距离如此接近，因为你们正在谈论着的是人类的生存问题。这突如其来的惊吓使人们担心他们的国家行将消失。”[8]

不只是马绍尔群岛报的编辑一人在关注他家乡的安全问题。美国总统也在全国环境会议（1997年6月26日）上发表讲话，表达了他对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关心：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总量已经达到了200 00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一数字还在迅速攀升。科学家预言，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逆转，到下一世

纪末海平面将上升二英尺甚至更多。到那时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和其他沿海地区将被淹没；在亚洲，孟加拉国 17%的国土面积，现正居住着 600 万人口的土地，也将从此不再；岛屿之间相连的部分，如马尔代夫，将从地图上彻底消失。除非我们能够逆转这一趋势。”[9]

注释

1. D.H.K. Spate, *Paradise Found and Los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34.
2. Cited by A. Moorehead, *The Fatal Impact: An Account of the Invasion of the South Pacific 1767—1840* (Harper & Row, 1966), p.70.
3. Ibid., pp.55, 56.
4. Ibid., p.117.
5. Cited by Spate, *Paradise Found*, p.35.
6.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93.
7. Kathryn True, "Reclaiming Tradition," *In Context*, No.39, p.54.
8.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97.
9. *New York Times*, June 27, 1997.

首先，我想向你们再次强调，东方诸民族新近被唤起的雄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重重困难和巨大的危险。这一冲突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是无法预言的。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西方思想和西方观念已对东方各民族产生了富有生气的影响。这种影响已在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身上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

——罗纳谢勋爵，1909 年

第 35 章　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1763 至 1914 年间作为一个欧洲直接或间接成为全球主人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据有突出地位。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在另一方面，就在 1914 年前十年中也发生了一些对欧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就是日本打败俄国。此外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下骚动也值得注意。下面我们将首先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后考察对这种优势的早期挑战。

一、欧洲的政治优势

虽然欧洲在 1500 年至 1763 年间就已经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并控制了各大洋和西伯利亚及南北美洲人烟稀少的地区，但对亚洲和非洲来说，其影响在 18 世纪末时仍然微不足道。在非洲，仅在沿海地区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和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同样，在印度，欧洲人也被限制在沿海少数几个贸易站，实际上他们还未开始影响辽阔的内地。在东亚，尽管西方人要求进一步交往，但还是被严格限

制在广州和九州。假如18世纪后期欧洲同非洲和亚洲的关系由于某种奇迹而突然中断的话，那么三个世纪以来的交往就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几乎只有几座被破坏了的贸易站和教堂才会让人想起那些曾经越海而来的入侵者——而日常生活也就会与过去几千年一样以传统的方式继续下去。

但到1914年时，形势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强，世界上大片大片的地区——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都已欧化。欧洲人成群结队地向这些地区移民，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虽然到1914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确实已赢得政治上的独立，英国自治领也已实现自治，但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自治领已被欧化，它们在种族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都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广袤的土地，包括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在内，全都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面积达16 819 000平方英里的亚洲地区，至少有9 443 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处于欧洲统治之下。其中6 496 000平方英里由俄罗斯统治，1 998 000平方英里归英国统治，587 000平方英里被荷兰统治，248 000平方英里由法国统治，114 000平方英里归美国统治，193平方英里的小块领土被德国统治。与这些辽阔的殖民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这个1914年亚洲惟一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161 000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却已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既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小国，也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名义上的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方案不能达成一致。

这样，到1914年时欧洲已经称霸全球。这是一个始于500年前葡萄牙船长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期的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现在，随着权力史无前例的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经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中心（见地图30）。

二、欧洲的经济优势

1914年时的欧洲霸权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欧洲实行的经济控制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它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此外，欧洲还成为世界的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它惟一的对手美国则仅占23.3%。虽然美国到1913年时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

在欧洲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出之下，全球经济空前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庞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洋底铺设了516 000多公里的电

缆。到 1914 年时，已有总吨位达 5000 万吨的 3 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几条运河的开凿也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 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 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 4000 英里，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 8000 英里。而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建成则打开了各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 1869 年和 1885 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 1905 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 1914 年基本铺设完工。



图 212　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

1869 年 5 月 10 日，太平洋联盟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现在的南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派蒙特实现对接。一个值得纪念的场景是，一颗由加利福尼亚纯金制成的道钉打进了铁路，象征着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网的完工。

各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一个惊人增长。在 1860 年至 1913 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 6 倍，而在 1851 年至 1913 年间世界贸易额则增加了 12 倍。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1800 年欧洲宗主国生活水平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生活水平的比率是 3:1，而到 1914 年时这一比率则增加到 7:1。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农民的日常生活。货币在早先时期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发挥了一个辅助作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需要。也可能已有少数农产品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但那也并不是为了赚钱。相反，其目的只是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如盐和小件铁器之类的必需品。由于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易货交易来履行纳税义务，所以也就根本没有货币参与。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开始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就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到此时已在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到变幻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封闭、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提高生产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却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和令人不快的。

欧洲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此时思想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中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他们对接触西方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盲目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则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以下印度一位杰出人士写于1925年的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被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惑。个人被赋予公民权、秘密审判权取代传统权威、海关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都在一个东方民族未曾预料的情况下突然而到来，而原来这个东方民族则只知道遵循古老的法令和传统……英国的什么都是好的——甚至连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而不是英国的则都值得怀疑……积累到一定时候，反作用力突然出现了。崇拜西方的一切使我们现在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将使我们复兴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1]

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

为：他们的卓越地位来源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的人是不同的，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导劳动，能指引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劣等种族。这样就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责任论来掩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19 世纪末(1899 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其著名的短诗中恰如其分地写道：

>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 将你们培育的最好的东西传播开来——
> 让你们的子孙离家远去
> 去满足你们的俘虏的需要……[2]

与 1899 年那位英国诗人在论及“白人的责任”时的信心十足相反，1992 年一位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巴西尔·戴维森出版了一本叫做《黑人的负担》的书。他指的是英国人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一些制度和惯例。事实证明它们不切实际，它们是黑人的“负担”，而不是白人的“责任”。

与现代人的反省态度相反，在吉卜林的时代欧洲人几乎被认为是上天注定的统治者。他们在印度被恭敬地称为“大人”(sahib)，在中东被称为“先生”(effendi)，在非洲被称为“老爷”(bwana)，而在拉丁美洲则被称为“恩主”(patron)。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开始用短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主义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也一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 1904 年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或者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整体联系日益松散的软弱无能行为，最终可能导致某一文明国家的干涉，在美洲如此，在其他地方也一样。”[3] 同样，1904 年美国的一位传教士、著名出版家的父亲亨利·W. 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4]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

> “这个世界几乎已被瓜分完毕，剩余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殖民。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5]

他看起来似乎有些过于自信了，然而这种自信却是建立在坚实的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的。西方技术继续以加速度发展，今天罗德斯商业上的继承者们甚至更加自信。花旗公司前总裁乔治·穆尔在 1987 年指出，在未来 25 年的时间内世界将由一小



图213 印第安人反叛

1857年印第安人的反叛是一个证明一个弱势社会在一个更强、更具侵略性社会的威胁下一般会以退却和逃避作回应的例子。

撮大金融机构统治，这些金融机构将在太空设立总部以逃脱政府的监管。尽管罗德斯苦于星球遥不可及，但他现在的继承者则认为这些星球不但是可及的，而且将会成为他们的私人发射台。

五、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看上去似乎是牢固而永恒的。但只要人们清醒地回顾一下便可轻易发觉，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着的复仇者正在慢慢觉醒，正在对西方统治权发起最早的攻击。

纵观历史，每逢弱小的社会受到强大而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断绝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则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优点——这也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 19 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都有很多例子。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 1857—1858 年的印度兵变和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详见第 30 章第 3 节和第 31 章第 2 节)。虽然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它们却都未能构成对欧洲霸权的有力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往昔的美好岁月。而西方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事业的活力则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各土著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以便运用这些来反对西方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图 214　日本女工

弱势社会对于更强和更具侵略性社会的威胁的第二类反应可以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日本丝绸厂里的纺织女工作例子。直到 20 世纪，女工都占日本产业工人的一多半。她们在离开小学后到结婚之前会工作几年。由于她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宿舍拥挤不堪，她们经常会感染上肺结核。

在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行这种政策的民族是日本。他们先于 1894—1895 年打败了衰弱的中华帝国，接着又在 1904—1905 年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详见第 31 章第 3 节和第 4 节)。一个亚洲小王国战胜一个欧洲强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

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带来了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影响深远的事件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28章第4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得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觉察到了各殖民地国家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潮流，他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 “我认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即使是在波斯这样的地方，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态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人们似乎已开始被一种新的精神支配；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建立另一种更好的政府形式……看来东方正在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出现了实现“中国人的中国”理想的倾向。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似乎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显著增加和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因而不能将其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惯于忍耐的人起来反对西方肆无忌惮的剥削。”[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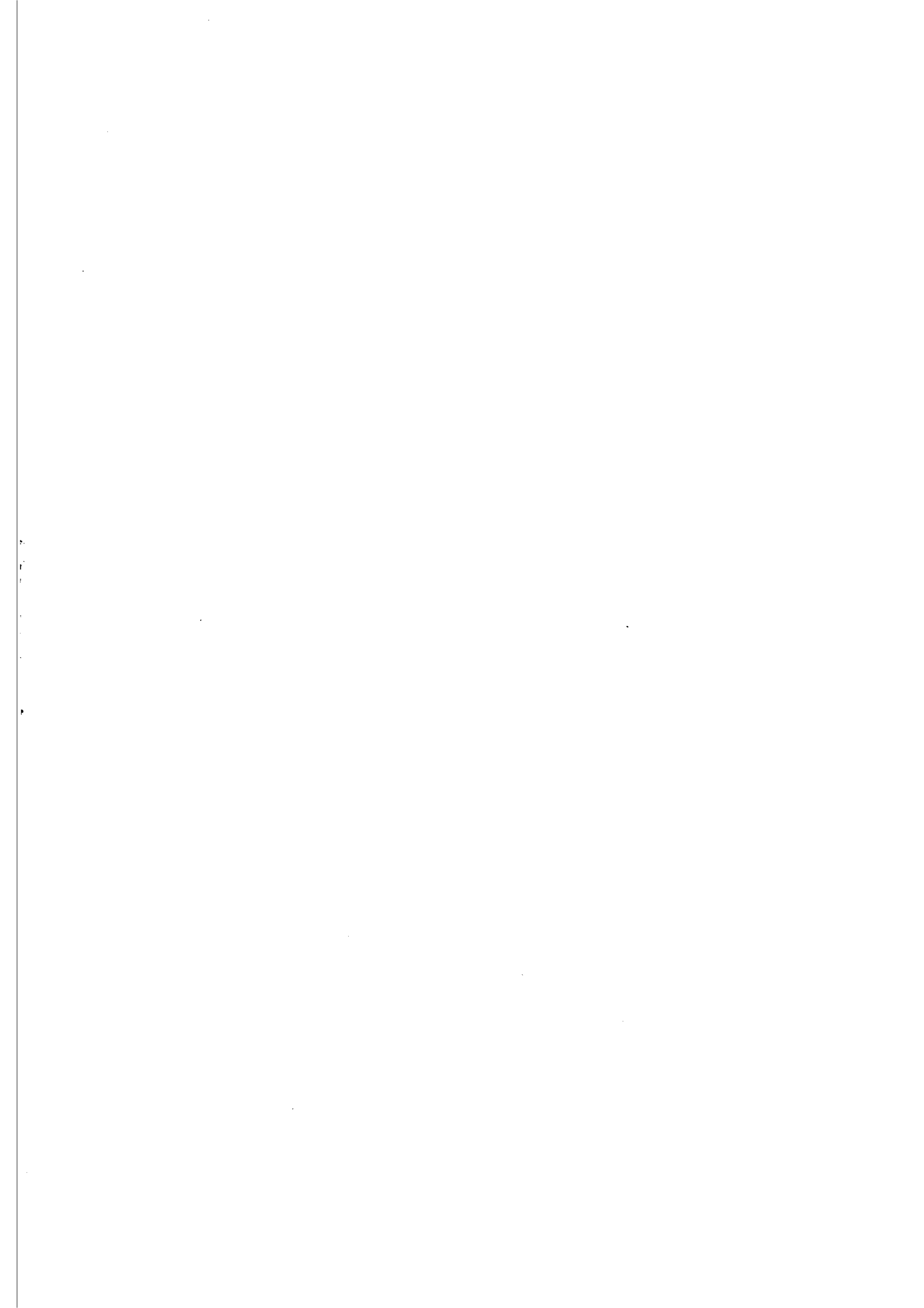
事实证明这一分析很有先见之明。在此后几年中，亚洲各地，从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到东部的中华帝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和长盛不衰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虽然在1914年以前欧洲列强尚能够镇压反抗，然而早期的反抗却也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民族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会横扫整个世界。

推荐读物

最重要的论述1914年前对欧洲全球霸权构成挑战的著作有：E.R. Wolf 所著的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per & Row, 1969)；J. Romein 所著的 *The Watershed of Two Eras: Europe in* 1900 (Wesleyan University, 1978)；L.S. Stavrianos 所著的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William Morrow, 1981)；R. Storry 所著的 *Jap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 (St. Martin's Press, 1979)。

注释

1. S. Banerjea, cited in L. S. S. O'Malley, *Modern India and the West* (Oxford University, 1941), p. 766.
2. From "The White Man's Burden," in *Rudyard Kipling's Verse: Definitive Edition* (Doubleday).
3. Cited by R.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0), p. 403.
4. Cited by J. Israel, "'For God, for China and for Yale'—The Open Door in Ac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1970), p. 801.
5. W. T. Stead, *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Cecil Joyn Rhodes* (London, 1902), p. 190.
6. E. G. Browne, *The Persian Revolution of* 1905—1909 (Cambridge University, 1910), pp. 120—123.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革命将会首先发生在工业化国家而不是殖民地。他指出，西方资本家将剩余资金投资于殖民地是因为在那里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与当时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认为这些投资将会继续下去，殖民地将会与其西欧母国一样实现工业化。他在其出版于1867年的名著《资本论》中写道："工业化发达国家展示了欠发达国家未来的图景。"

同样，马克思预期，随着殖民地变得日益工业化和更加繁荣，西方的老制造业中心将会逐渐落后并造成大量失业。而这反过来将最终迫使西方工人揭竿而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因而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事实上，马克思在致其好友恩格斯的一封信(1858年10月8日)中还表达了一种担忧——他认为当欧洲变成社会主义之后，繁荣的殖民地国家仍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会进攻和"粉碎"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恰好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革命首先发生的地方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如今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国家。因此可以说历史颠覆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首先，西方的工人赢得了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利增加了工资，组织了福利国家。由于福利国家会在发生诸如事故、疾病、失业的状况下向工人提供帮助，因而西方工人对现状较为满意，从而也就成为了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其次，处于第三世界的各殖民地并未实现工业化。由于西方制造业者不希望看到来自海外的竞争而积极反对在殖民地发展工业，因而殖民地仍保持着西方工厂的原材料供应者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者的身份。这种格局的问题在于，自1880年以来世界原材料的价格跌势不止，而制成品的价格则持续上扬。同样数量的原材料所能交换的制成品数量在1938年比1880年时下降了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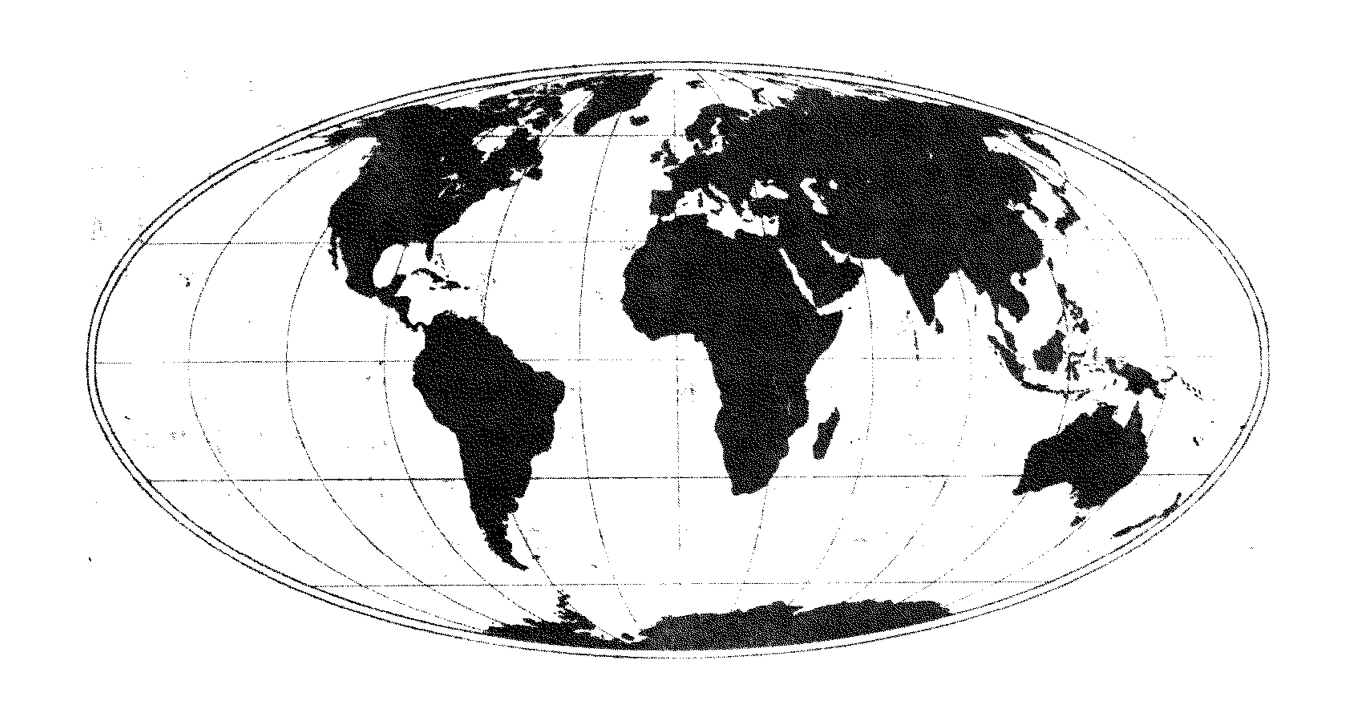
这种不利于第三世界的倾向——经济学家称其为"贸易条件"——是造成今天第三世界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导致这些经济问题的产生(参见第27章第8节)。而最终结果就是，富国和穷国——发达的第一世界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均收入之比不断扩大：1800

年时这一比率为3:1,1914年变为7:1,1975年则变为12:1。

这些数字也解释了为何历史未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展。在马克思预言之前,所有的重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发生在西方。但是到了20世纪,所有的重大革命都发生在第三世界:1917年的俄国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1975年的印度支那革命、1976年的葡萄牙非洲革命、1979年的伊朗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1980年的津巴布韦革命。而在20世纪90年代则发生了一件更加令人惊奇的事件,它再次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1917年以来在第三世界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倒台。苏联、东欧及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正在狂热地寻求能够替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这些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论及。

推荐读物

关于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令人意料之外的互动,许多论述当代全球发展趋向的著作都曾论及。值得一提的是, J. Hough所著的 *The Struggle for the Third World*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L. S. Stavrianos所著的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William Morrow, 1981); P. Worsley所著的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4), G. Chaliand所著的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Myths and Prospects* (Viking, 1977).



第八编

1914 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西方世界同时经历了衰落与成功。事实上，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发展趋势是互相强化的。全球一体化的空前发展，导致西方技术、观念、制度等以加速度进行扩散。但正是这种扩散削弱了西方的全球霸权。1914年之前的西方世界看起来似乎是坚不可摧的，但殖民地人民通过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明对西方进行了更有效的抵抗。正因为如此，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同时见证了西方的衰落与成功。

两种趋势的结合可以解释为何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如此混乱。从新闻标题或电视屏幕上就可以看到，北京、开罗和新德里在国际事务中与巴黎、伦敦和华盛顿一样地位显赫。无论何处，曾经沉默的大众正在占领历史舞台，大声喊出他们的要求，而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

在亚洲人看来，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
——K.M.潘尼卡(印度外交官、历史学家)

第36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1914年秋,正当欧洲国家纷纷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整个欧洲的灯光都在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要正确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已经存在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模模糊糊意识到的新领袖、新制度及新的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像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十分反常地全面支配世界的欧洲时代的结束。到大战结束时,欧洲对整个世界的控制已经明显削弱,而且在各地都受到挑战。虽然这些挑战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但是这一平静期却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并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不论从欧洲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引人注目。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及其世界性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了一项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引起的条款。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还

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结果它激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围绕这场争论有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发表——还导致了一批批文件的出版，总计达6万多份。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这场论战才平息下来，出现了较少关心"战争罪行"而更多关注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力量的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已能分清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紧张的数星期中才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五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和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经济上的竞争

首先考虑到经济上竞争，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海外市场的争夺。例如：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1910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德国仅占13.2%；但到1914年时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却已经下降到14%，而德国则略有上升，为14.3%，稍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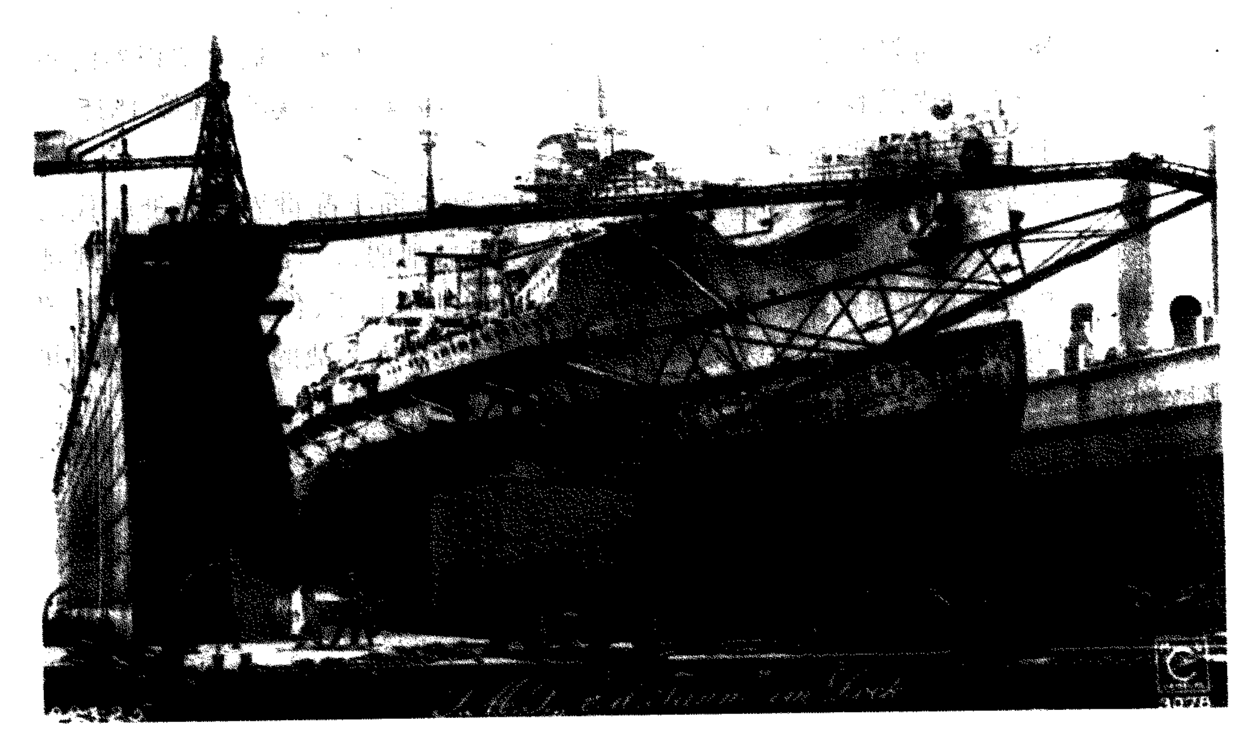


图215 无畏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一流的海军实力可以通过它的无畏战舰反映出来。这是正在船坞中的无畏舰。

德国工业总产量的激增意味着英国在海外市场上遇到了激烈的竞争。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确实使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竞争还刺激了海军军备竞赛,从而又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商船航线和商船运输。1897 年,在海军上将冯·梯尔匹茨的主持下,德国开始实施新的造舰计划,这使英德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但却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势力平衡。德皇建造强大海军和最强陆军的决心是促使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

殖民地的争夺

经济竞争和国内困难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列强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其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能够拥有海外市场。德国人由于直到 1871 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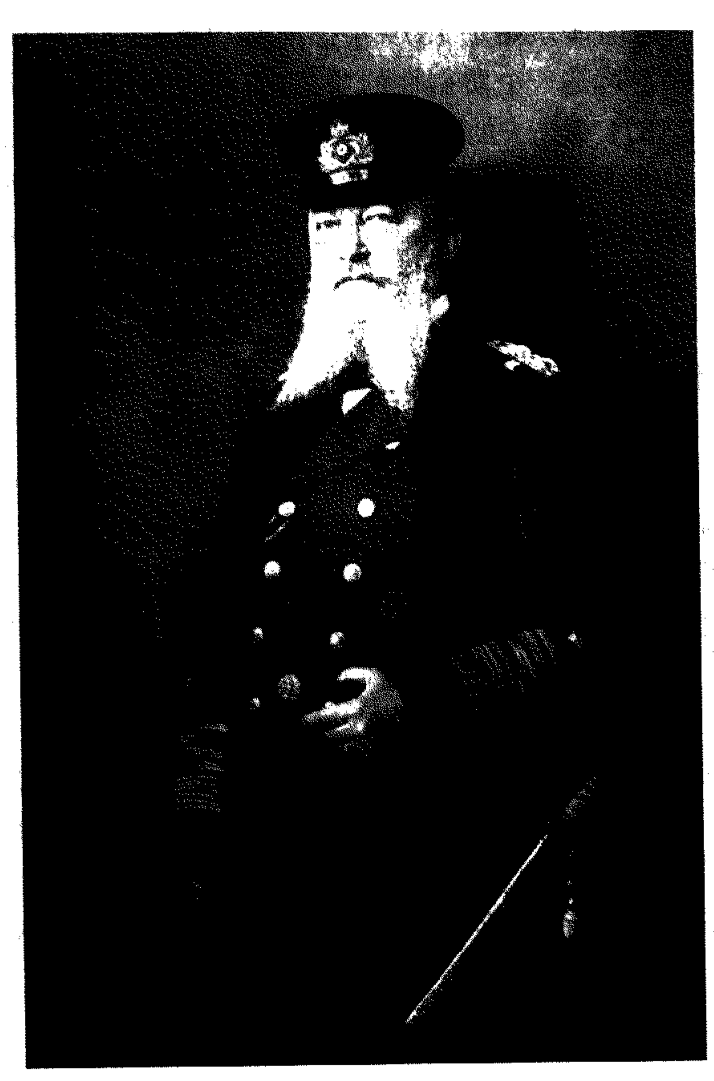


图 216 梯尔匹茨

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范·梯尔匹茨(1849—1930)负责将德国海军建成一支可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部队。这反映了德皇威廉二世想让德国在欧洲列强中一枝独秀的欲望。

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富裕的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也必须拥有"阳光下的地盘"。但是德国人发现,几乎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他们都受到了辽阔的英国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竞争决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暹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都相继发生了冲突。在一战爆发前的30年间,这些围绕殖民地产生的争端制造了一种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

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

对殖民地的争夺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而这些联盟体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因为法国人想收复其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个条约还旨在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俄国人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不断发生冲突。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三国同盟,其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的三国同盟无论就其宗旨或盟约条款来说,都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容易满足的国家,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势不可挡的集团,加之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着严重分歧,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在事实上都是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将波斯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见地图31)。

这样,所有的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该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其各自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就担心同盟的瓦解会使自己陷于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都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则不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卷入其中。

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情绪

另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很难对付,那里的法国人始终不肯服从德国的统治。但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噩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的多民族帝国正处于几乎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斯拉夫民族的对抗。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哈布斯堡官员做出了帝国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这个决定对好战的塞尔维亚人尤其适用。他们正吵吵闹闹地要求与多瑙河对岸独立的塞尔维亚统一到一起。所以,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后,苛刻的条件便被送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则是法国和英国。同样,奥匈帝国也有德国支持,理论上还有意大利支持。这样一来民族自决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的结合也就使欧洲陷入大屠杀之中。

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最后一个背景因素——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使得萨拉热窝暗杀之后的事态向战争方向发展的趋势难以避免。19世纪后期由于科学和军事的结合,欧洲军事技术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飞跃。旧式武器得到改良,包括飞机和潜水艇在内的新式武器被引进。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德国的克虏伯公司、法国的施奈德—克卢索公司等私人军火公司煽动起军备竞赛:他们卖武器给一个国家,引起邻国恐慌并刺激邻国也来购买他们的产品。主要强国的军事领导人纷纷通过大量购买最新式武器的方式来谋求安全。然后他们协调巨大的武器库和铁路网,准备详细的动员计划,以便在敌人组成联盟时能将数量庞大的军需物资和应征入伍的士兵运往战争前线。

一旦战争动员计划A或B或C或不管什么的按钮被启动,人员和物资就可以按计划像钟摆一样动起来,而且是以一种大规模的方式进行。这时候不可能再撤销命令,因为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将会停滞,国家的国防将处在混乱的、无保护的状态。因此,不管是皇帝还是首相都无法逆转大的动员。这种"军事时间表的紧急性"成为那些在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之后寻求和平解决的人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在8月4日战争真正爆发前,当时的外交家还能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谋求和平,然而今天连几个星期的时间都不可能有了。现在的军事运载技术已经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跨越一个大洲,而上千个拥有电脑决策程序的自动战斗系统更是使得核战争真正爆发时,人类几乎没有参与的时间。

二、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族青年学生,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普林西普行刺绝不是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后是塞尔维亚秘密组织"不统一毋宁死",即众所周知的"黑手党"。黑手党于1911年成立于贝尔格莱德,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理想——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支持这一组织,它认为该组织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激进的、好战的组织,但这却并不妨碍黑手党组织成为一个进行有效的鼓动和恐怖活动的地下革命组织。





图217 萨拉热窝刺杀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兰兹·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这一天中王储夫妇被塞尔维亚人培训和指使的年青革命分子刺杀,由此导致的危机引发了一战。左图为刺杀后不久奥匈帝国的警察逮住一个凶手的情景。

不幸的弗兰兹·斐迪南因为同意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而使这些塞尔维亚革命者有了可乘之机。在选定出访的 6 月 28 日这一天,当大公及其妻子在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晨进行访问时,至少有六位刺客身带炸弹和左轮手枪等候在指定的路线上。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当队伍在街道拐角处停下来时,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儿。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一枪射向弗兰兹·斐迪南,一枪射向波斯尼亚总督波西奥莱克将军。可是第二枪射偏,击中了大公夫人。医生还未来得及抢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7 月 23 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了包含几个条件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 7 月 25 日的答复几乎接受了所有条件,但却拒绝奥地利官员在塞尔维亚领土上参与调查该案。奥地利立刻断绝了同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 7 月 28 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为了报复于 7 月 30 日实施全国总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了为期 12 个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总动员。由于没有得到答复,德国便于 8 月 1 日向俄国宣战,并于 8 月 3 日向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宣战。就在同一天,德国入侵比利时,开始了实际的战争行动。英国在德国卷入后就开始干预,但由于其对法国的军事承诺是秘密的而没有公开进行干预。现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则为英国参战提供了一个可以对公众进行解释的很好的借口。这样,欧洲各强国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才过去 5 个星期时就已开始互相进攻。

三、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 年

1914 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胜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漫长而又残酷的折磨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财富和伤亡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会出现血腥的僵持局面是因为从战争伊始,防御性武器就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但是这在深壕沟、铁丝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却完全无效。因而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 70 万人,法国 85 万人,英国 9 万人。与各总参谋部的计划相反,此时西线的战斗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不过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上的情况则并非如此;那里由于彼此相隔甚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必须采取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士。这一战略很奏效,因为德国人不得不从比利时调集了四个师去支援东线。德国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彻底击溃了进

入东普鲁士的两支俄国军队,从而也就解决了问题。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其优良的铁路网,集中兵力首先进攻俄国的一支军队,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到9月中旬,东普鲁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与此同时,奥地利人则在巴尔干战线上遭受着屈辱的挫折。在萨拉热窝差点让普林西普的子弹送了命的波西奥莱克将军急于捣毁"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万人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但是他遭到了35万塞尔维亚军队的抵抗;他们当中90%的人都是参加过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老兵。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中,这些塞尔维亚人就迫使奥地利人在损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况下退回到德里纳河以西。9月波西奥莱克再次发动进攻,并于12月2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塞尔维亚人再次发动反攻,到这个月底时塞尔维亚指挥官得意洋洋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一个自由的敌军士兵都没剩。"[1]

1915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德军新任总司令埃里希·冯·法金汉的决定左右了1915年的一些战役。鉴于西线的僵持局面,法金汉把兵力集中到了东线,力图击败俄国人。5月1日德奥联军发动进攻,至夏末联军已平均推进了200英里。俄国除军事上共伤亡250万人外,还丢失了15%的领土,损失了10%的铁路,失去了30%的工业,丧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再也无法复原的打击。

当时西线的消耗战仍在继续。法国的霞飞将军坚信,密集的炮火轰炸加上大部队的正面攻击必将带来胜利。但是接二连三的进攻却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结果只是人员伤亡惨重。

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导致了著名的达达尼尔战役。由于土耳其入盟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自动关闭,致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国战舰和4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但水雷和岸防火力使协约国遭受巨大损失而被迫撤退。接着,协约国又试图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但协约国在加里波利海滩登陆后,面对毁灭性的机枪火力,只拿下了几个浅滩立足点。土耳其人牢牢地把守住了海滩上的高地,最后协约国不得不面对事实,并于1916年1月永久撤退。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失败以及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14日加入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塞尔维亚人的灭亡。10月6日,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三国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三面进攻塞尔维亚。到该年年底时,整个国家已全被占领。

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使协约国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弥补了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失败。尽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地利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对

岸“未收复的”领土。协约国这时慷慨地提出将这些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很有效,4 月 29 日意大利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在一个月内加入战争,作为对协议国在领土方面许诺的回报。

1916 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 1916 年时同盟国已经在军事上占尽了优势。可是尽管它们已经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欧洲大陆,它们却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为了达成这样一个协议,1916 年 2 月德国人发动了对法国要塞凡尔登的全面进攻。作为反击,英国人则向索姆河西北地区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事实却再次证明:防守比进攻更有优势。在 1916 年所进行的这两次战役中,德军共死伤 85 万人,英法死伤 95 万,但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向前推进超过 7 英里。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则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领导下,于 1916 年在东线展开了一次成功的攻势。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罗马尼亚于 1916 年 8 月 27 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同盟国这时决定教训一下罗马尼亚,以警告其他企图效仿罗马尼亚做法的中立国。德国、奥地利、比



图 218　阵地战

法国军队正在西线展开进攻。图中的壕沟争夺战是 20 世纪第一场大型国际冲突的典型场景。战壕边有铁刺和机枪保护,使防守者能处于有利态势。

利时和土耳其军队全速前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袭击了罗马尼亚。到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人已经丢失了其三分之二的国土,包括他们的首都。

在罗马尼亚卷入战争后,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惟一的中立国。1917 年 6 月 27 日希腊终于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协约国 1918 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

1917 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与此同时,可怕的流血战仍在西线继续,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1916 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 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这时一向谨小慎微的霞飞将军已经被大胆的尼韦勒将军所接替。尼韦勒以极大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闪电战,说这种闪电战能以极少的伤亡赢得胜利。尽管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勒的进攻型战略还是被接受了。

当时,德国人也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使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有可能带来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认为英国将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

我们不久就将看到,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不过陆上的防御战略却使德国人获益匪浅。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齐格菲防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韦尼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最残忍的一次还击。兴登堡的防御战略对德国人非常有用,他们使协约国蒙受了 40 万人的伤亡,而自己则只伤亡 25 万人。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和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尽管做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却还是看不到战争的尽头,以至于在战壕中以及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都出现了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是:1917 年 7 月 19 日德国国会以 212 票对 126 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1917 年 11 月 21 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的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去世,新继位的年轻皇帝查理开始谋求议和。同样在英国,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写了一封公开信,预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结束冲突,西方文明就将崩溃。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 年的俄国革命

事实证明 1917 年是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这两个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诚然,日本在 1914 年 8 月 21 日就已参加了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而现在,美国的介入则意味着一个非欧洲大国将迅速决定战争结果。

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使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立即具有了世界性影响。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诸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各从属民族国家之类的欧洲局部问题大不相同。因此可以说,正是在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三 月 革 命

1917 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 3 月,第二次在 11 月;前者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则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 月 8 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致使食品和燃料极度匮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遂于 3 月 11 日下令解散杜马。而杜马领导人则拒不服从这一命令。沙皇发现他不可能再强迫杜马服从自己——这种无力表现在各个方面,从而暗含着革命自身的到来。当沙皇尼古拉于 3 月 15 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王位时,俄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一个合法和真实的政府。

为了避免街上的激进分子接管政权,某种新机构必须立刻建立。3 月 12 日临时政府成立,由它来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长,惟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视。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却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它拼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一个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像沙皇专制政权在 3 月时那样孤立无助地崩溃了。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持认为,重新分配土地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论点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采取权宜手段,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民众。



图219　革命的葬礼

俄国革命牺牲者的葬礼上的各色旗帜,1917年3月23日,彼得格勒。

苏维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明显缺乏的品质——同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

苏维埃随着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是很自然的。由于起源和成分的缘故,苏维埃一点也不像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分配。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中,而且很快也出现于乡村和军队里。这样一来,苏维埃运动也就迅速地遍及全国,并在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

向彼得格勒(先前叫圣彼得堡,很快又以列宁格勒出名)政权进行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游行和举行暴动;而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并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都须经士兵苏维埃部署后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被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 月 16 日,列宁返回俄国并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这些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了许多异议,尤其引起争论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要求。这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然而时间却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战争持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 4 月份似乎还是稀奇古怪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 1917 年年底时,许多人都在准备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战斗,以便摆脱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阻碍人们获得他们极为向往的和平和土地。

舆论转变的最早迹象是 5 月 17 日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被迫辞职。米留可夫极力主张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这使他非常不得人心,结果被迫辞职。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组成了新的临时政府,新临时政府一直执政到 7 月 20 日以前。从 7 月 20 日起,一直以有影响的掌权者形象出现的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新政府。到这时,国民的倾向已经完全转向左派,以致新部长们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政界的激进分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反对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这时正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

克伦斯基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摆脱极端分子"。在努力防止人们对财产所进行的越来越严重的侵夺时,他警告说将来的立宪会议对 7 月 25 日以后进行的土地转让不会予以承认。他还试图通过对某些罪行再采用死刑的办法在军队中恢复严守纪律的风貌。这些措施自然使得克伦斯基极不受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欢迎。此外随着舆论日趋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到 10 月时,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起义日期定在 11 月 7 日。

但是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这里没有战斗,因为 11 月时的克伦斯基就如同 3 月时的尼古拉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虔诚的支持者。不

过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支持。最终于11月25日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党派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占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虽然它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被这时已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给驱散了,但是它的结构却揭示了各党派当时各拥有多少追随者。



图220 列宁与托洛茨基

1919年列宁与托洛茨基(敬礼者)一同在莫斯科红场上。此照片来自于赫曼·阿泽班克摄制的纪录片。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红军取得1918年到1920年俄罗斯内战的胜利。而到1921年,由于战争、革命和内战,俄国经济已濒临崩溃。

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满足人民和平的愿望。1918年3月3日它同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其严厉的条款要求俄国不仅放弃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而且放弃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这些割让包括6 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俄国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都分布在这一地区,而更具灾难性的是,这一地区蕴藏着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见地图32)。

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到了 1917 年时，威尔逊本人却在将这个国家引向战争。从中立走向干预的一个原因是备战运动——1916 年 6 月 3 日威尔逊政府通过了《国防法》，这一法案标志着备战运动达到高潮。运动期间的军事宣传使美国人有了参战的心理准备。另一个因素则是美国因潘乔·维拉袭击新墨西哥州而武装干预墨西哥(1916 年 3 月至 1917 年 8 月)。虽然这次干涉并没有带来什么，但是没有多少痛苦和牺牲的军事行动却让美国人体验到了乐趣。美国介入战争的另一个趋动因素是美国的金融和工业一直在向协约国赊卖军用物资，如果他们的主顾失败了，这些金融业和工业就也将被毁掉。而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导致美国人员和舰只的损失也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最后，1917 年 3 月沙皇政权被推翻使美国有可能加入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来反对中欧的专制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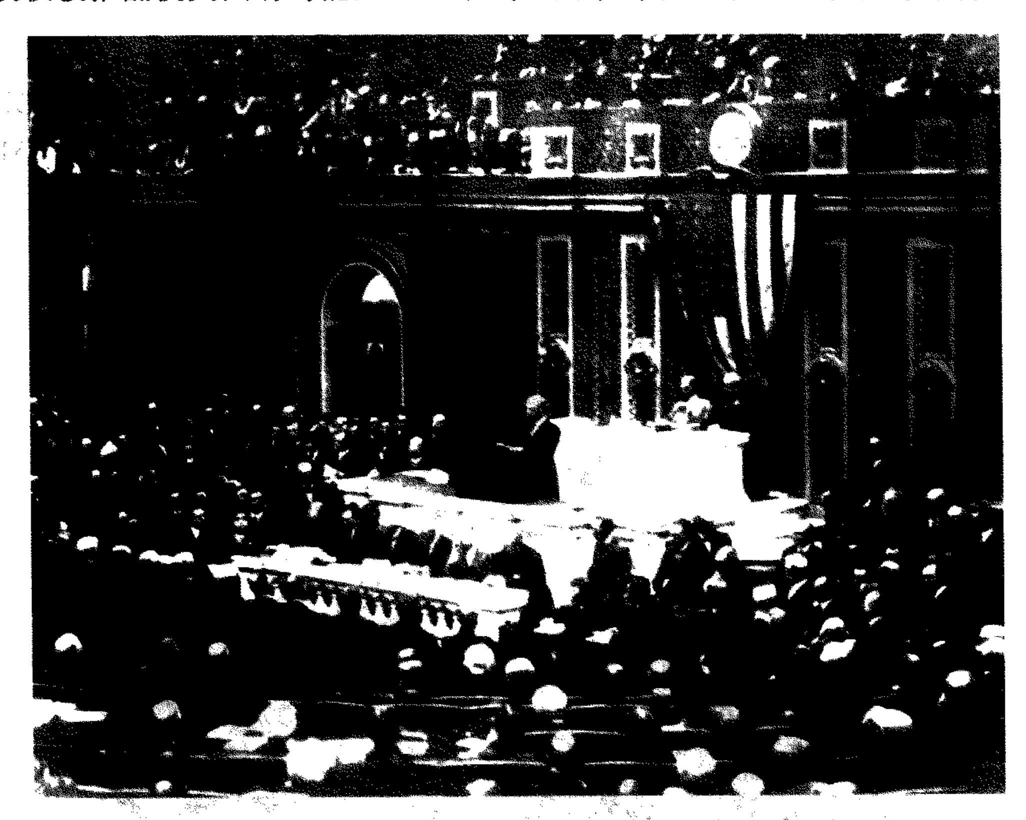


图 221　威尔逊宣战

1917 年 4 月 2 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国会宣读参战命令。他预见到"我们会遇到几个月严重的考验和牺牲"。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促成威尔逊总统在 1917 年 4 月对德国宣战。威尔逊总统著

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具体而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这十四点中著名的几点是:反对秘密外交,订立"公开和约",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削减军备,根据各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必须以对各殖民列强的要求予以同等重视的原则公正裁决殖民地问题,以及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美国的参战具有多大的决定性,在表36.1中所列举的有关交战国军需品生产量的统计数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在1918年3月这个月中,共计84 889名美军到达西线,6月这个数字上升到306 350人。这样协约国的指挥官就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军。果然不出所料,1918年同盟国一个接一个地投降了。

表36.1 交战国军需品的生产量 (百万吨)

	1914年8月1日		1914年9月15日		1917年	
	协约国	同盟国	协约国	同盟国	协约国	同盟国
生铁	22	22	16	25	50	15
钢	19	21	16	25	58	16
煤	394	331	346	355	851	340

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涉及到30个主权国家,推翻了4个帝国,产生了7个新的国家,死亡人数为:战斗人员约850万,非战斗人员约100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



图222 阵亡士兵

1918年11月最后几个在西线阵亡的英国士兵中的一员。一战造成的巨大灾难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虚弱和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和平解决

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 年 6 月 28 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 年 9 月 10 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 年 3 月 22 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19 年 11 月 27 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以及 1920 年 8 月 20 日对土耳其的《塞夫尔条约》。这一全面和平解决对世界历史来说有三个重要意义: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以及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成立国际联盟有两个目标,其首要目的就是维护和平。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起共同防御侵略、仲裁或调查争端和在裁定后的三个月之内避免战争的义务。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为了这个目的,国联建立了一些专门性的机构,如卫生组织、智力合作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许多临时的咨询委员会。总的说来,国联在履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证明了它的存在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也将看到,国联却未能在维持和平方面取得成功,而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因而这一失败也就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重新划分欧洲边界这一点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已经明确提出,并通过各种和平条约正式得到落实,其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海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地区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则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民族自决原则在划分新边界时一定受到了尊重。的确,关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日耳曼少数民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就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议。不过即便是存在有这些偏差,新边界也远比旧边界更符合民族主义愿望。少数民族的数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少得多(见地图 32)。

尽管调停人通常会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却绝对不会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做。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就能清楚地觉察出这种差别对待:这一纲领明确地阐明了应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但与此形成鲜明对



图223 阿拉伯代表

同盟国为了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积极支持阿拉伯人脱离土耳其独立。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中就包括帮助领导阿拉伯人起义的英国上校T.E.劳伦斯，也有阿拉伯地区的代表。图中的阿拉伯代表有：费萨尔王子，侯赛因国王的第三个儿子，站在居前的正中央；T.E.劳伦斯上校站在中间一排的右起第二个位置；努日·巴萨·萨义德准将站在中间一排左起第二个位置。

照的却是，《纲领》第五条宣称：在殖民地，“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视；政府的权利范围应予确定。”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在决定着这些“利益”是什么，因而其结果也就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

《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大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尽管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七、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呈现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却也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其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显得更完整。

不过,在这一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启了欧洲霸权的削弱进程——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减弱。

在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其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都能产生大量的利润。而在一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其全部对外投资。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可以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中看出来。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但到1919年时它却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而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更是已上升到88亿美元。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的许多工业区都已遭到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推动下,犹如雨后春笋般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这样,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也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像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已转到了大西洋彼岸。

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就已是现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全球每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却使欧洲人士气沮丧,逐渐失去了信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在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广大欧洲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这两位非欧洲人的指导。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骚动。当他于1918年12月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则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冒着烟的城乡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3]

最终，欧洲的霸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也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拼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他们也不再被认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统治有色人种的人了。而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恭顺。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不仅在欧洲，在殖民地世界也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力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亚洲的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但是现在他们的后裔却很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博士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惟一的伙伴和兄弟就是苏俄工农红军。"[4]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深刻的政治结果。美国黑人领袖W.E.B.杜波伊斯是少数几个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人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较蒙昧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5]

推荐读物

最近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著作有：G.F. Kennan所著的 *The Fateful Al-*

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antheon, 1984); J. Joll 所著的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gman, 1985); G. Barraclough 所著的 *From Agadir to Armageddon: Anatomy of a Crisis* (Holmes and Meier, 1981),它强调从阿加迪尔到萨拉热窝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暗示这种效应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同样存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广泛的意义,请参考 H. Holborn 所著的 *The 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 (Knopf, 1951); M. Ferro 所著的 *The Great War 1914—1918*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J. Winter 所著的 *Sites of Memory, Sites of Mourn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an Culture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5)。

关于俄国革命最精细的研究是 E. H. Carr 所著的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3 vol (MacMillan, 1953)。也可参见 H. Salisbury 所作的阐释, *Black Night, White Snow: Russia's Revolution, 1905—1917* (Doubleday, 1978)。文献材料有 J. Bunyan 和 H. H. Fisher 所著的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Standford University, 1934); R.P. Browder 和 A.F. Kerensky 所著的 *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1917, 3 vols. (Stanford University, 1961)。此外还有 J. Bradley 所著的 *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7—1920* (Basic Books, 1968)。P. Dukes 所著的 *October and the World: Perspectives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t. Martin's Press, 1979)。

关于《凡尔赛和约》,可以参考 A.J. Mayer 所著的权威之作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Peacemaking: Containm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 at Versailles 1918—1919* (Knopf, 1967); N. G. Levin, Jr. 所著的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68)揭示了美国发挥的作用; A. Walworth 所著的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W. W. Norton, 1986)也具有参考价值。

注释

1. Cited by J.C. Adams, *Flight in Win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42), p.29.
2. Cited by R.S.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3 (Doubleday, 1922), p.451.
3. C. Seymour, 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Vol. 4 (Houghton Mifflin, 1928), p.389.
4. Cited by K.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Day, 1953), p.364.
5. Cited by R. Emerson and M. Kilson, "The American Dilemma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Rise of Africa and Negro America," *Daedalus*, Vol.94 (Fall 1965), p.1057.

自日本战胜俄国那天起，亚洲各国人民就抱有摆脱欧洲压迫的希望。这一希望在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最终在印度引起了一系列独立运动……如果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诉诸武力。

——孙中山，1924年

第37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就是殖民地地区出现的革命浪潮。虽然这些革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的那些年里，但却正是战争本身直接促进了革命。只是革命的最终结果各不相同：土耳其人达到了他们提出的大多数目标，而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则只获得了宪法上的适度让步。这些起义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最终摧毁欧洲各帝国的大动乱的序幕。

一、土耳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惊人和成功。当然他们在大战期间遭到了惨败，接着又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然而他们很快就挽回了败局，他们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从而赢得了一个有着较为有利的条款的新条约。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原始而受人轻视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要理解这一异乎寻常的结果，就必须回顾一下战时有关奥斯曼帝国的复杂的外交活动。英国是大战几年中有关中东的大部分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发起者，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理人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协约国之间的秘密条约共有四个：1915年3月至4月的《君士坦丁堡协定》，



图224 华盛顿会议

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与会代表从左到右依次为:日本外相L. Gonyo,日本国防顾问S. Yada,美国国务卿休斯,K. Tanaka将军,海军副总司令Kato,以及Kato的助手E.R. Schipp。

1915年4月26日的《伦敦协定》,1916年4月26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1917年4月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根据这些条约,俄国可以得到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峡及小亚细亚东北的大片内地;意大利将获得小亚细亚西南地区;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及阿卡;法国则将获得叙利亚沿海和俄国势力范围以东的腹地。这些密约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留给土耳其人的仅是其故国北部的20 000平方英里土地。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和犹太代表缔结的某些条约直接相抵触。

1914年11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国,英国人就同阿拉伯领导人麦加王子埃米尔·侯赛因谈判缔结了军事联盟。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战后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是这一承诺却与英国人早先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思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相冲突。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就已作为对愈演愈烈的排犹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在欧洲犹太人中间发展起来。1897年成立于巴塞尔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曾经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圣经》中的祖国)建立一个犹太定居点。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趁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于奥斯曼帝国灭亡之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们获

得了成功：1917 年 11 月 2 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思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协约国之间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秘密条约是相互冲突的。



图 225 凯末尔

凯末尔在乘专列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安果拉(现安卡拉)途中透过车窗留影。

事情的最终结果是签订了《塞夫尔条约》(1920 年 8 月 10 日)。法国托管叙利亚，而英国除保护国埃及外，还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意大利分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因其首相韦尼泽洛斯巧妙的外交手腕而获得了爱琴海上的几座岛屿、东色雷斯以及对士麦拿地区的五年管辖权——对士麦拿地区的最后处置将在五年后由公民投票决定。亚美尼亚和汉志王国的独立得到承认。最后，苏联由于同协约国干涉势力发生武装冲突，由于公布和否定了沙皇的大臣们所签订的秘密条约，而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相反，君士坦丁堡这一战略要地却处于土耳其的主权之下，不过土耳其海峡则将被非军事化并被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由于这些条款与过去给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原则也完全相反，整个中东掀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各种因素结合到一起使得土耳其人能够彻底废除《塞夫尔条约》，而阿拉伯人则在经过十年的顽强斗争之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土耳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因在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而成名。停战之后他带头反对《塞夫尔条约》，完全乐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却坚决拒绝割让东色雷斯，拒绝接受有

关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凯末尔的支持者赢得了多数席位。1920年1月召开的议会接受了凯末尔的计划。1920年4月23日议会宣布废除苏丹政权——它实际上是同盟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囚犯——并建立了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共和国。



图226 犹太移民

1920年，犹太殖民者在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点的途中。

年轻的共和国不仅要与苏丹斗争，还必须反对战胜的协约国。它之所以能够打败似乎是势不可挡的对手，是因为凯末尔富有灵感的领导，以及广大土耳其人民对他忠实的支持——他们由于1919年春希腊军队在士麦拿的登陆而空前团结。凯末尔还巧妙地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与它们分别缔结条约，从而孤立了士麦拿的希腊人。1922年9月凯末尔成功地进入士麦拿，不仅是希腊军队，就连世代居住在士麦拿地区的希腊平民也都被迫撤退。

这时凯末尔就能够要求修改《塞夫尔条约》了。经过长期谈判，1923年7月24日签订了《洛桑和约》。在创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又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凯末尔毫不留情地清除了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新的改革就像奔腾的激流一项接着一项：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小亚细亚中心地带的安卡拉；废除了哈里发制；压制所有的宗教团体；采用了一部宪法以及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至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

二、阿拉伯中东

当土耳其人成功地撕毁《塞夫尔条约》之际，阿拉伯人则正在顽强地抵抗指派给他们的受托管理国。与黑森协议相反，叙利亚—黎巴嫩已作为托管地分给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已成为英国的托管地，而埃及则已完全由英国人控制。对阿拉伯国家的这种粗暴的瓜分行径必然会导致骚动，因为战争本身已在阿拉伯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绪。

战后争取独立的斗争发展出了一种共同的形式：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了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了其各自托管地的秩序，重申了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托管地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虽然这一点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它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但在巴勒斯坦，情况却很特殊，因为那里的形势很快就恶化成由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阿拉伯人坚持认为《贝尔福宣言》违背了先前对阿拉伯人的承诺。1921 年，为了安抚阿拉伯人，英国人试图单独划出一部分区域作为独立的外约旦州——这并不在托管条款关于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相关规定中。

在巴勒斯坦，当犹太移民大量涌入的同时，有些担心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对英国人的斗争逐渐升级。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犹太人秘密移居该地区。”但是这同一条款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显然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必自相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权利和地位”这样的程度。但他们却未能预见到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犹太移民从 1932 年的 9553 人猛增到 1933 年的 30 327 人、1934 年的 42 359 人和 1935 年的 61 854 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 1919 年的 65 000 人上升到 1939 年的 45 万人。

其实只要犹太人的涌入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而实际上他们也确曾欢迎过有钱、有干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早些时候就已从犹太人在恢复肥力耗尽的土地、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就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犹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排犹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可悲的弊病……我们不是排犹主义者；我们也是闪米特人。然而，如今西方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我们蒙受损害。你们认为这样做公正吗？”[1]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英国的反应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个调查委员会已对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企图满足三方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的利益。例如，1939 年 5 月的白皮书提出，巴

勒斯坦在10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提出对犹太人迁移和购买土地加以明确的限制。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拒绝了英国人的建议,巴勒斯坦的争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远没有得到解决。

三、印度

20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可预见的时间里似乎显得十分牢固。1912年,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加冕,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见仪式。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众口一词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齐心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至少有90万印度人在英国军队中当战斗员,另外还有30万印度人在当劳工。

可是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过了30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的影响和海外服役对成千上万名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返回家园的士兵所起的扰乱性作用。战争刚结束后几年中的一系列灾害也促成了动乱:1918年的季风不足给印度的许多地区都带来了饥荒,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则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动乱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在战后奉行压制政策。



图227 拉·甘地

印度现代国家之父、"伟大的灵魂"、"圣人"拉·甘地。

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见第30章第5节)。它实质上仍是一个极少得到乡村民众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而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他的语言简要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69 000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各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这种合作停止,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因此反英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教育和指导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进行抵制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的运动。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来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而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教导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与甘地一起出现的是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不过尼赫鲁却完全不同于他那位神秘的、苦行主义的领袖。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

印度民族主义者不但在尼赫鲁与甘地之间产生了分裂,还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敌对的集团。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在许多年里它几乎一直都没有什么追随者。穆斯林联盟直到1935年由孟买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要起来。他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穆斯林民众反应强烈,因为印度的许多穆斯林认为,他们与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邻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处更多。真纳在选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四、中国

在中国,孙中山于1911年创立了中华民国,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国民党(见第31章第2节)。可是尽管孙中山是总统,是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实权却掌握在官僚和军阀的手中,军阀控制着各地。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和中国的领袖,在修建铁路、公路、建立工业、提高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事实最终证明这些漏洞是致命的。广大农民所迫切需要的土地改革由于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

制而被忽视。蒋介石的一党制独裁政府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宪法手段来坚持自己的权利。只有革命才是惟一的选择。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它的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社会的纲领吸引了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孙中山曾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但蒋介石却强烈反对共产党人的激进社会主义。他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但是由于共产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广大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他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亲身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绝对是异端邪说,但毛泽东却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图228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1937年在华北的陕西省发表演说。

在与“围剿”进行了几年的斗争后,毛泽东最终冲出包围,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艰苦奋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由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同时日本人在东部沿海的进攻又削弱了蒋的政府,毛泽东逐渐地扩大了他的力量,最终迫使蒋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湾地区,毛泽东成为中国大陆的领导者。

推荐读物

总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起义的著作有：H. Kohn 所著的 *The Age of Nationalism: 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 (Harper & Row, 1962)；M. Edwardes 所著的 *Asia in the European Age, 1498—1955* (Thames & Hudson, 1961)；J. Romein 所著的 *The Asian Century* (George Allen & Unwin, 1962)。

关于一战期间的中东地区外交，请参考 M. Kent 编著的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关于凯末尔治下土耳其的复兴，请参考 S. R. Sonyel 所著的 *Turkish Diplomacy, 1918—1923: 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 (Sage, 1975)。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请参考 N. Safran 所著的 *Egypt in 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ty* (Harvard University, 1961)；Z. N. Zeine 所著的 *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 Western Diplomacy at the Rise and Fall of Feisal's Kingdom in Syria* (Khayat, 1960)；A. Hourani 所著的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Oxford University, 1962)；S. G. Haim 编著的 *Arab Natioanalism: An Ant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4)。

关于印度的杰出人物的著作有：M. K. Gandhi 所著的 *An Autobiography: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Beacon Press, 1957)和 *All Men Are Brothers: Life and Thoughts of Mahatma Gandhi as Told in HIs Own Words* (UNESCO, 1958)；E. Erikson 所著的 *Gandhi's Truth* (W. W. Norton, 1970)以及 *Toward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Jawaharlal Nehru* (Harper & Row, 1941)。

关于中国杰出人物的著作有：H. Z. Schiffrin 所著的 *Sun-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9)；E. Hahn 所著的 *Chi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Doubleday, 1955)；M. Meisner 所著的 *Mao's China* (Free Press, 1977)。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最得力的著作有：L. Bianco 所著的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H. R. Issacs 所著的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nd rev. ed. (Atheneum, 1968)；J. E. Sheridan 所著的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Free Press, 1975)。

注释

1. Cited by W. R. Polk, "What the Arabs Think," *Headline Series*, No. 96, p. 38.

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未能通过种种手段将当初已屈服了的俄国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这一失败如今变成了我们的沉重负担。

——温斯顿·丘吉尔，1949 年 4 月 1 日

第 38 章　1929 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在殖民地世界处于民族革命的痛苦中时，欧洲本身也正为社会革命所困扰。整个欧洲大陆的旧秩序都正受到质疑，这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影响。因此，1929 年前十年的欧洲历史主要是一部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历史。在苏俄，共产主义在经历数年内战和外来干涉之后取得了胜利。在中欧，激进的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从德国的自由魏玛共和国到匈牙利的右派霍尔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国家——已相继出现。相比之下西欧则未遭到如此剧烈的动荡，然而即使在西欧，其传统议会机构的权力也因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和内阁不稳而大打折扣。不过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时，欧洲的秩序似乎正在恢复：经济在日趋繁荣，失业人口在减少，各种国际问题似乎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苏联致力于五年计划而非世界革命而得到解决。在大萧条促成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以前，欧洲正在恢复常态——或者看上去如此。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于 1918 年 3 月 3 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见第 36 章第 4 节），希望能从战争状态转到建立社会新秩序这一不那么残酷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再进行三年多的战争，以对付反革命势力和外来干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对革命的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和

商人——他们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各种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成员也同样热衷于反革命活动，其中社会革命党人人数最多。他们在需要进行社会革命这一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一致，但却憎恨布尔什维克垄断革命。他们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7日发动的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为在1917年11月25日选出的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占到370席，其他各党派代表也占159席。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图229　苏联内战中的儿童

苏联内战时，饥荒笼罩着农村。这是一组营养不良的儿童的照片。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得到了西方列强的鼓动和支援，后者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原因——布尔什维克进行世界革命的刺耳的煽动是其中之一。而且布尔什维克将外国资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债的做法自然也不见容于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于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就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帮助干涉势力和反革命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边境地区——阿尔汉格尔—摩尔曼斯克北部地区、波罗的海沿海诸省、乌克兰、顿河地区、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不久便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西方列强除了向这些政府慷慨提供资金和军用物资外，还在某些战线提供了军事顾问和小股分遣部队。起先布尔什维克连遭败绩，其原因很简单，旧的沙俄军队已经四分五裂，却又没有可以代替的军队。国防人民委员列昂·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红军。到1918年年底时，红军的人数约达50万。这支军队时常不得不在二十四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因为全国各地都在发生叛乱，而且协约国军队也在沿海地区登陆(见地图32)。

直到1921年，内战和外敌入侵一直都在一起蹂躏着俄国。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后却是红军取得了胜利。也许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

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经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自行其是。但是在不得不做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农民和布尔什维克

英国工党秘书C.R.布克斯顿于1920年6月访问了俄国。他所写的关于俄国农民态度的报告,解释了只占俄国总人口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取胜的原因。*

接待我的主人名叫亚历山大·彼得维奇·埃米连诺夫。他属于俄国的"中农",他们占全村人口的大多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属于"贫农"。人们告诉我,全村"富农"仅有四、五个……

十月革命前接待我的主人有八英亩田地,在该地区中居于平均水平。现在他拥有超过八十五英亩的田地。在以后的访问过程中,这个了不起的事实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出现。这的确很了不起,因为接待我的那位主人代表着一个类型,他代表的不只是成千上万人,而是数以百万计的人……

"你看那边,"埃米连诺夫指着村外无边无际、连绵起伏的大草原说,"所有这些以前都是地主的财产。"……

"谁拥有这些土地?"我问。

"形形色色的地主。有一个是哥萨克,两个是萨马拉商人。还有一个德国人,名叫施密特,他从皇帝那里买到了这些土地。还有些土地归教会所有。有一处是察里津家族的玛丽亚·费德诺娃的地产。"

"后来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几乎都跑光了,"他用不以为然的口吻回答说,"有些现在还在萨马拉。但我想,他们大多数都逃出了俄国。"……

"那农民们现在怎么想他们呢?"我问埃米连诺夫。

"革命是一件好事情。每个人都赞成革命。人们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他们都喜欢革命。"

"为什么人们不喜欢共产党呢?"

"因为共产党老是担心我们。他们是城里人,不了解这个国家。有权有势的委员们不断下来。我们不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新的法令也在不断地颁布。人们都给搞糊涂了。你刚搞懂了一个,另一个不同的法又来了。"

"村里大多数人属于哪个党派?"

"什么党也不是。他们是无党派人士。"

根据我的判断,农民们的普遍态度是他们在土地问题上感激布尔什维克政府;赞同“人人平等”的原则;他们经常谈论“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们的理想社会。但是他们又强烈地抱怨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抱怨强制性捐献,担心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秩序的缺失;而他们的抱怨则又经常不被政府理解。他们认为政府是造成所有这些罪恶的根源,而农民则总是处在一个比城里人低下的位置。

但是,即便是有所有这些抱怨,如果要他们在高尔察克与苏维埃政府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农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农民赞成革命,而现在苏维埃政府又是革命的代表。他们也抱怨它,咒骂它,但是当有机会推翻它时,他们又说“不”。

* C.R. Buxton, *In a Russian Village* (Labour Publishing Co. 1922), pp.14—15,19,21,26—27,47—48.

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外来干涉对有关各方都是一场灾难。它蹂躏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岸的俄罗斯农村,使得大批俄罗斯人民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恶化了。苏联领导人怀有的“被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恐惧感进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宣言又过于认真。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是如此深刻而又持久,以至于它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并大大地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魏玛共和国

当苏俄内战正酣时,欧洲面临的关键问题则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向西方传播。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同志认为,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向西方传播,他们的事业就注定要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不能想像革命会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罗斯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而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尤其是德国的事态发展,因为德国显然是一个关键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战无不胜,从而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所保障。

最初看上去,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在海军发生兵变和革命从波罗的海各港口传入内地以后,与俄罗斯的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各大城市。当时的革命运动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共产主义似乎很

有可能吞没欧洲大陆——至少也会抵达莱茵河。然而，事情的最终结果却并没有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可以解释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知足而无心革命。诚然，1914年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却很保守，它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非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裕，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罗斯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而且在德国革命时期战争已经结束，这又与俄罗斯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低落，进行叛乱。在德国，当最后摊牌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够号召起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激进派支持革命和苏维埃德国，保守派则既反对革命也反对苏维埃。最后保守派占了上风，因而德国在1919年1月19日举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新诞生的德国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而不是一个苏维埃德国。

中欧的革命与倒退

虽然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确保了其余中欧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然而欧洲这一地区却在许多年里一直都在被骚乱和起义所困扰。在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觉醒和活跃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无数的农民新兵因其战争经历而大大地开阔了视野：他们不仅看到了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看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也深深地影响了农民。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这无疑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和阶级意识的大地震。最后长年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破坏和苦难则使革命形势变得更趋严峻，尤其是在那些已经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这种革命骚动的具体表现因国家和当地情况不同而异。在这当中各国共产党并没有起到突出的作用，不过匈牙利是个例外。1919年，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创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然而由于农民的敌意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入侵，它只存活了不足一年。1920年2月在罗马尼亚军队撤离时，以米克洛什·霍尔蒂海军上将为首的右翼政府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尔蒂在两次大战之间一直执政，在此期间匈牙利是中欧惟一一个几乎完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或类似改革的国家。

在其他大多数中欧国家中，由农民政党替人民大众道出了不满。下列农民领袖曾在战后数年中就职：1919年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亚就职；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职；1926年文森特·维托斯在波兰就职；1928年尤利乌·马纽在罗马尼亚就职。然而由于奉行和平主义和厌恶暴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

能够长期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地位牢固的军人和官僚的伤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全力争夺政权。农民领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为政治机会所吸引的律师和城市知识分子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了农民政党。在这样的领导下,各农民政党通常都是代表富农的利益,与广大贫农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农民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革职。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被暗杀,鲍里斯国王建立了一个独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被刺杀,第二年亚历山大国王建立了他的独裁政府。在波兰,维托斯政权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除掉——后者对全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935年他本人死去为止。1930年马纽被国王卡罗尔二世解除职务——卡罗尔二世数次废立政府,10年后他被迫逃离罗马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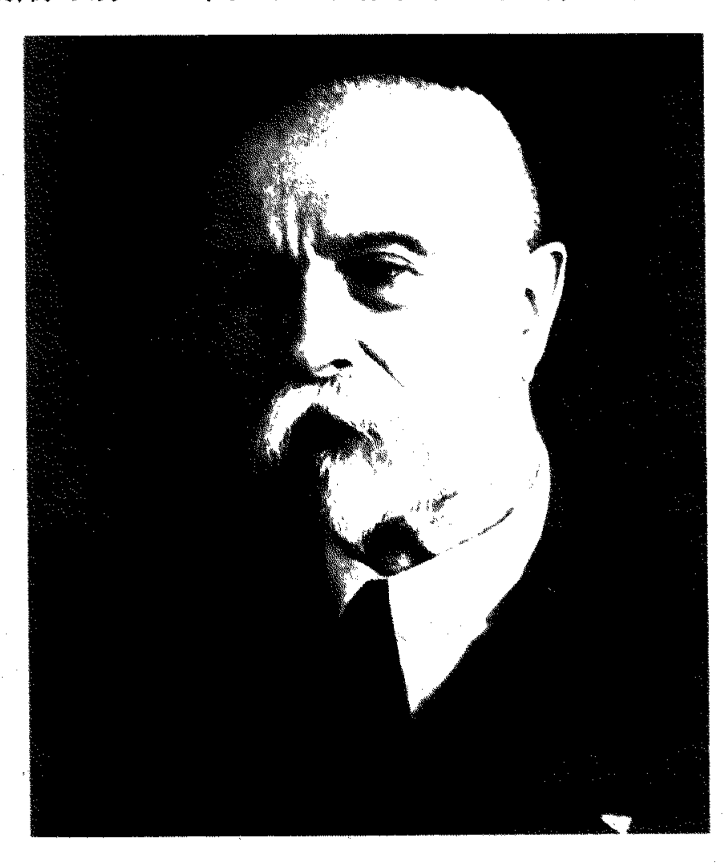


图230 捷克首任总统

托马斯·马萨里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捷克是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中东欧惟一成功的民主制国家。

奥地利和希腊的政局也是大同小异。由于种种原因,农民政党从未在这两个国家生根。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而希腊则于1936年公然建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整个中欧就都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例外。这个国家之所以如此独特,是因为它拥有下述有利条件:识字率高、自哈布斯堡王朝继承的官僚训练有素、扬·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强有力的领导、能比其他以农业为主的中东欧国家提供更高生活水平和更大安全感的稳定的国民经济。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正当布尔什维主义、平均地权论和传统的议会制度为在中东欧夺取支配权而相互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正在意大利出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平均地权论是在20世纪初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的，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则是在1922年10月随着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而戏剧性地出现的。

意大利的战后状况为法西斯主义之流惊人的、反理性的暴力运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至1919年时，意大利只享有过短短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体是个藏污纳垢之地，党内“大佬”们在其中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一脆弱的政治结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为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正在衰落，海外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发挥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此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种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藐视意大利要求的做法则使这种不安更趋严重。由此导致的失望和自尊心受损使局势变得一触即发。

打算利用这一局面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铁匠的儿子。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以其煽动性的演说而引起众人瞩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作“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为官方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仍是一位革命者和和平主义者，但到第二个月他便在此时正迫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其盟国的法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的刺激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也由之而得以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并通过它开展了一场猛烈的主张进行干涉的宣传。

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他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直至因受伤奉命退伍。此后他便偃旗息鼓，默默无闻，直到他于1919年建立起第一个“战斗队”，组织了法西斯党为止。统一和权力成为墨索里尼反对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冲突的口号。最初他只是得到了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但在20年代他却迅速崛起。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一种真空状态，而墨索里尼则立刻填补了这种真空状态。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有产阶级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支持。这些人被随处可见的夺取工厂和土地的景象吓坏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的堡垒。政府和富人阶层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予以支持和援助。



图231 墨索里尼

1939年意大利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

1922年秋墨索里尼通过明确保证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利益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也作好了政变的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黑衫党党员只须象征性地向罗马行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坐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虽然墨索里尼是通过技术上合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他无意尊重宪法程序这一点不久就暴露无遗。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手段，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则仅拥有35席。两个月后，由于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墨索里尼开始面临重大危机。人们普遍怀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但是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墨索里尼得以幸存下来。到1926年秋时，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采取攻势。他解散了原先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这时的意大利已经成为一党制国家，而议会则变成了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

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渐形成了它的某些独特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实行组合国政体；在这种制度下，议员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当选。从理论上来讲，它似乎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保护下的方式消除了阶级冲突。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

制订这种规划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树立使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装饰以高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四通八达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四、西欧的民主问题

西欧不存在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等类似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更加根深蒂固，因此其主要的社会结构也就更加健全，并享有民众更多的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经成为战争中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进了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困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尤其严重的自然是经济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其长期而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战争刚刚结束后也曾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被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从 1920 年起经济萧条就开始出现，到 1921 年 3 月时已有 200 多万人失业。整个 20 年代中失业一直在继续，而在 30 年代形势则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是从 1920 年而不是从 1929 年就已开始，而且几乎是毫无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数百万家庭都要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来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使人们在心理上如同在经济上一样不健全。最后失业者也都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



图 232　鲍尔温首相

保守党的斯坦利·鲍尔温在 1926 年大罢工时是英国首相。他那坚定、冷峻的面容使许多投票人都认为他具有当时政府最需要的品质。

这些状况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为希望摆脱困境而越来越转向支持工党。因此,经济危机使得英国政治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党都有其各自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而最终结果则是保守党斯坦利和工党麦克唐纳交替组阁,但却没有一个内阁能够大幅改善国家的命运。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起大多数邻邦都要好些。法国有一个结构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像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脆弱。战争的和平解决使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的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法国的经济。与英国只有两三个政党不同,法国拥有五六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更换得更频繁。从左派到右派,其主要政党依次是主要代表城乡劳动者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的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党,以及通常带有强烈的天主教色彩代表大企业和大财团的右派各党,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

在战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基础上的"民族集团"内阁进行统治。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来,他决心要求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却又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时,一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贬值到3美分多一点。1926年7月普恩加来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他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到1926年年底时,法郎的币值达到一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免去了自己五分之四的国债。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来的成功使他连任了三年总理,创下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由法国及其中东欧的盟国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罗斯的屈服,法国此时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因为德国和俄罗斯显然迟早都会设法重申自己的主张,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而持久的基础。

从理论上来讲,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已经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款要求

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但困难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国联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国因其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而不愿将其安全交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它转向那些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利益的欧洲小国。法国于 1920 年 9 月、1921 年和 1924 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

这一联盟体系基本上是反德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在 1925 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则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态度。他们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的政策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张伯伦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结果产生了于 1925 年 10 月签订的包括一系列协定的《洛迦诺公约》。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修订条约，同意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而英国和意大利则为这一条款提供了保证。



图 233 纸币垒的积木

1923 年德国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变得一文不值，孩子们用成捆的纸币垒积木玩。

在当时,《洛迦诺公约》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迦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迦诺精神”禁止战争,代之以“调解、仲裁与和平”。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晖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签订,从而使这一建议得以付诸实现。由于公约只拒绝战争而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很快就有60多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虽然公约只依靠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光是有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同样充满希望的是同德国关系的改善。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赔款的支付问题,协约国也与德国达成了协议。从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始,德国与协约国就一战的赔偿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以1930年的“杨格计划”结束,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为80亿美元,58年内分期付清。

在20年代末期人们普遍有一种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的感觉:德国和它的宿敌似乎已经和解;德国人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也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经济在日趋繁荣,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新奇而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39章第1节)。虽然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都认为这一计划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但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诺精神”似乎是有意义和有内容的,人们相信欧洲此时已经能够安定下来,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去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推荐读物

关于俄国内战和协约国干涉的标准描述有:E.H. Carr所著的三卷本著作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Macmillan, 1951—1953); J. Bradley所著的 *Allied Intervention in Russia, 1917—1920* (Basic Books, 1968); G.F. Kennan所著的 *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Little, Brown, 1961); D. Footman所著的 *Civil War in Russia* (Praeger, 1962)。最近的关于俄国革命及其后的苏维埃政权的批评性研究是 R. Pipes所著的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Knopf, 1993)。

研究1918年及其后德国国内的批评浪潮的著作有R.G.L. White所著的 *Vanguard of Nazisms: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 War Germany, 1918—1923* (Harvard University, 1923); R. Coper所著的 *Failure of a Revolution: Germany in 1918—1919*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5); W.T. Angress所著的 *Stillborn Revo-*

lution: *The Communist Bid for Power in Germany*, *1921—1923*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4); C.B. Burdick 和 R.H. Lutz 编辑的文件集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8—1919* (Praeger, 1966)。

近年来考察塑造中东欧力量的力作有：H. Seton-Watson 所著的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1946); L.S. Stavrianos 所著的 *The Balkans Since 1453*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59); W.E. Moore 所著的 *Economic Demograph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 (League of Nations, 1945)。

关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可称为标准之作的有：C. Seton-Watson 所著的 *Italy from Liberation to Fascis 1870—1925* (Methuen, 1967); I. Kirkpatrick 所著的 *Mussolini*: *A Study in Power* (Hawthorne, 1964); E. Wiskemann 所著的 *Fascism in Italy*: *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Macmillan, 1969); M. Gallo 所著的 *Mussolini's Italy* (Macmillan, 1973); D.M. Smith 所著的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Viking, 1976); E.R. Tannenbaum 所著的 *The Fascist Experience*: *Italian Society and Culture*, *1922—1945* (Basic Books, 1972)。

关于当时英国方方面面的情况，C.L. Mowat 所著的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5)概括性强，同时不失慎重；A.J.P. Taylor 所著的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Oxford University, 1965)描摹得十分生动。关于法国的情况，D.W. Brogan 所著的 *France Under the Republic*, *1870—1939* (Harper & Row, 1940)细致入微；D. Thompson 所著的 *Democracy in France* (Oxford University, 1952)更加明晰。信息灵通的记者 A. Werth 也有这方面的著述，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France in Ferment* (Jarrolds, 1935)。

> 1931年这一年因为一个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几年。这一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认真思考并坦率议论着西方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失灵的可能性。
>
> ——阿诺德·J.汤因比

第39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在安定下来，进入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给彻底破坏了，大萧条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已经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国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频繁更替。而这种国内政治上的不稳定反过来又直接地、也是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缓解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而大萧条也就成为了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而1929年以后的几年则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接连不断，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还因为苏联几个五年计划的成功而变得更加突显。在西方经济确实是乱成一团的同时，苏联则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格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它的确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一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也就显得特别突出，它们互相推动，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成为俄罗斯的主人,就面临着创建他们已经广泛宣传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挑战。但是他们很快也就发现,对迎接这一挑战他们毫无准备——没有任何历史模式可供遵循。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1]

但是起初却几乎连实验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生存斗争压倒了一切。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的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为了提供前线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个特征是强行征用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起初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不可能实现,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之计已经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于是它立即被摒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用。同时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接连不断的战争,国家经济也已陷于瘫痪状态: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而最大的灾难则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旱灾,它造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

新经济政策

务实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们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仍然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而言,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只是一次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新经济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战时遗留的危机。到1926年时,苏联的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是由于此时人口也已增加了800万,因此还未达到战

前人均产值的标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面临着“前进的两步”怎么走的问题。在1925年逝世前不久,列宁已经决定了要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他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道路。列宁逝世后,尼古拉·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最杰出的倡导者。布哈林的个性温和而热情,他对体育、科学、艺术和政治都有浓厚兴趣。他相信新经济政策中的市场关系能够“成长”为社会主义。他支持这一路线,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强制,而且符合他最钟爱的“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存在的,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存在”的原则。[2]



图 234 斯大林
列宁的继任者,约瑟夫·斯大林。

不过尽管布哈林是列宁最喜爱和最受人们欢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的观点却没有在党内占上风,因为他不是“官僚结构的建筑师”[3] 斯大林的对手。斯大林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这个国家中惟一真正的力量,遂利用党总书记的身份变成了党和国家的主人。在经过犹豫之后,他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支持工业和农业都由莫斯科的计划支配的集权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将要像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样继续管理工厂,而且还要通过农业集体化来控制农业。

苏联计划经济

1928年斯大林实施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任命,他们在莫斯科的笼统计划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草拟出每个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订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1600页之多。

在农业方面,五年计划要求实施农业集体化。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很多农民特别是富农的反对,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因而有时在有些地区富农们会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对此苏联政府则通过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村庄,把他们关进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来进行报复。最后,虽然有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政府还是取得了最终胜利。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 400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图235 集体农庄的仪式

俄国农民举行仪式,欢迎他们的集体农庄新添了拖拉机。

虽然苏联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却一直都非常令人失望。苏联农场要比美国农场能够多出 50%的土地和 10 倍的人力，但其产量却仅相当于美国农场的四分之三。造成这一悬殊差别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的气候更不利于农业生产。另一个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挨饿的状态——苏联农场所能得到的机械和肥料只相当于美国农场的一半。但苏联农业的主要困难还是在于莫斯科的控制过于严密——苏联官员告诉农民们耕种什么，何时耕种，何时育苗，使用多少肥料，什么时候收割。而农民们则宁愿在自己的私人土地上劳作，在那里他们可以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耕种，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农产品来得到最高回报，而不是政府为集体农庄上的农产品制定的低价格。因此，私人土地虽然只占总耕地面积的 3%到 5%，却生产了苏联农产品的 25%到 30%。

与大多数农场是作为农业合作社经营的不同，斯大林计划经济下的大多数工厂主要归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经营。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获得最大产量而软硬兼施。一方面，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者就被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虽然当时也可以成立工会并予以承认，但工人们却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苏联工业迅速增长，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则只提取了苏联的二分之一。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够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 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则大致相反。到 1932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其中除了工业产量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 1928 年至 1952 年这 25 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从斯大林主要关心的世界实力平衡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全部工业产量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从 1921 年的 1.5%增长到了 1939 年的 10%和 1966 年的 20%。

不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在漠视苏联公民的愿望，使他们受损的情况下取得的，苏联公民被迫忍受现在的贫困——消费品匮乏而又昂贵却又质量低劣——为将来而努力工作。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 46%—48%，但要按人均计算的话，其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五分之二，因为其劳动力比美国要多四分之一。

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对苏联人民而言，五年计划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们使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起来，得以在二战中打败希特勒。五年计划也把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社会：其识字率从 1897 的为 28.4%上升到 1926 年

的56.6%、1939年的87.4%和1959年的98.5%。在医疗卫生方面，在1913年到1961年间，外科医生的数量从23 200人增加到425 700人，预期寿命从32岁上升到69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人273降到32。同样，在社会服务方面，五年计划则为苏联公民提供了免费的医疗保护、老年补助金、疾病和残疾人津贴、产假、带薪休假以及子女补助。

但是苏联人民也忍受了五年计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与农民联盟的结束。这一联盟是在1917年革命时建立起来的，但是其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野蛮压迫却无法让人轻易忘掉。此后农民就将集体农庄视为外来的、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而消极怠工，以至于他们在自己自留地上的高生产率与在集体农庄上的低生产率形成了鲜明对照。而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反过来又影响了苏联工业的表现：由于农业没有生产出足以支持工业经济的产品，于是工厂工人也被迫为一系列的五年计划付出代价。当苏联政府每年拿出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作再投资时，这也就意味着低工资和消费品短缺。一个苏联工人的反应很典型："他们假装给我们工资，于是我们也假装我们在工作。"

五年计划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但其影响对西方世界和不发达国家来说则有所不同。西方人在刚开始时很是怀疑苏联创造新社会的计划，很多人都认为它一定会失败。而随着一系列五年计划的展开，怀疑逐渐变成了真正的兴趣。但是那些有足够兴趣访问苏联的西方人通常却又对苏联的印象都不好，如果还不能称为幻灭的话。他们对苏联人的衣衫褴褛、食物单调、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感到震惊。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管制和所有传播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苏联社会却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乐园。不过在另一方面，大部分西方人也都同意，没有五年计划造成的工业增长，苏联就不可能在二战中对打败希特勒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欠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是一个在30年内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的国家。使这一惊人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它的边界从朝鲜起，经过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能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匹敌的成就，包括灌溉工程、纺织工厂、机器工厂、健康设施和教育体系等。这些共和国的识字率由1914年的约20%上升到1940年的75%、1960年的90%以上。

但在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实验的多面影响却完全转变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们将在第44章第3节中看到，近几十年来苏联的计划经济慢慢地落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后面，而其个人权利和自由在此期间则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保护，因而也就导致了其自身在90年代的解体和消失，并被独联体所取代。

二、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在 1929 年初,美国看起来似乎日趋繁荣。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在 1921 年时平均仅为 67(1923 年到 1925 年为 100),但到 1928 年 7 月时就已上升到 110,而到 1929 年 6 月时则已上升到 126。不过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 1929 年夏季的三个月中,西屋公司的股票从 151 上升到 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 268 上升到 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 165 上升到 258。实业家、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 1929 年 9 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4]

然而事实却证明这种自信是毫无道理的——1929 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随之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之久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想不到结局的原因之一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债权大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就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则通常都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保持高水平关税,这种贸易顺差还在被逐步拉大。此外,20 世纪 20 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在 1913 至 1924 年间从 19.24 亿美元增加到 44.99 亿美元,即世界黄金总供应量的一半。

有好几年,这种不平衡都因美国对国外的大规模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 年至 1928 年间美国平均每年对外投资总额达 11 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还是加强了不平衡,因而它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当必须偿还债务时,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商品,这时美国的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就会因此而受损。此外有些国家感到必须拖欠债务,这则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国内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 1920 年到 1929 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 2%,而其生产率却猛增了 55%。与此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 年每个农场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场工人收入的 40%,而到 1930 年时这一比例已经低于 30%。农村的贫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农业人口要占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造成 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许多银行都是独立经营的,不过其中有些银行则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即将到来的金融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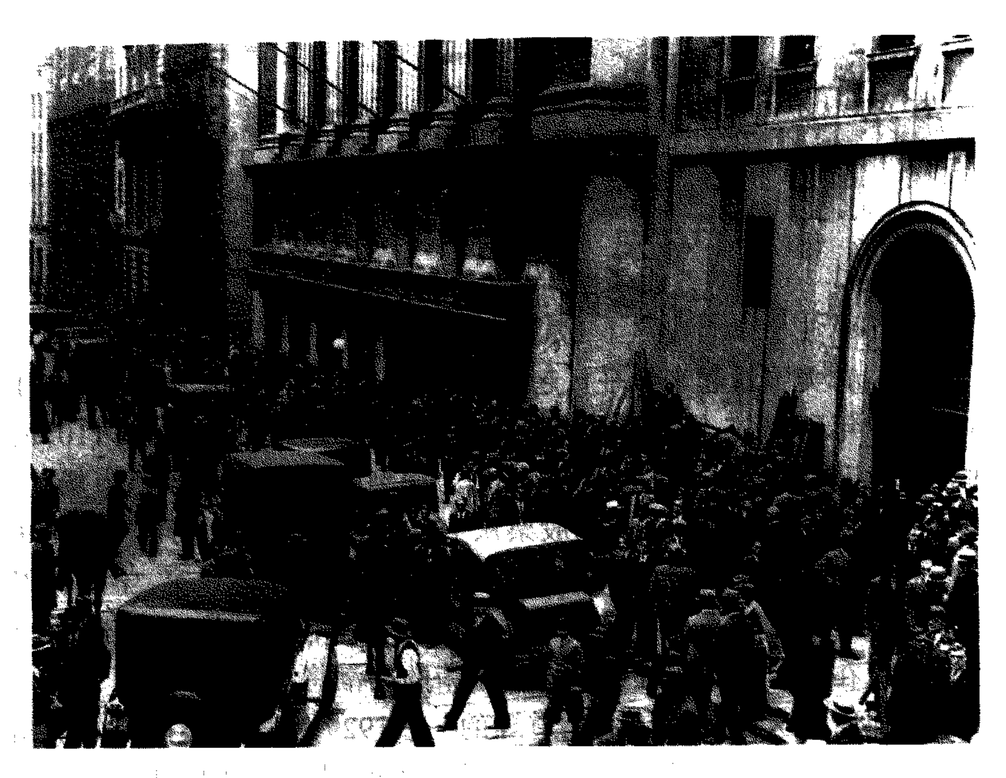


图236 华尔街股灾

1929年10月29日人群聚集在纽约华尔街，当天纽约股市崩盘。美国的大萧条耗尽了它原本可以用于欧洲的投资。

暴。因而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扩散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也就引发了一个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连锁反应。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就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股价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下降一直持续了三年。在此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下降到8。到1933年时，此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而商品贸易则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不仅是强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毫无疑问，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而在前几次危机中，最大也不过下降了7%。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

1933年的242亿美元。还应该指出的是,以往的国际贸易最大也就是在1907—1908年的危机中曾下降了7%。

美国富足生活中的贫困

就其强度、波及范围和持续时间而言,美国的大萧条都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国会委员会于1932年2月所做的下列证词,描述了大萧条对美国的影响。*

正如我(俄克拉荷马州议员奥斯卡·阿美林格)已经指出的,在最近三个月中,我访问了这个富裕和美丽的国家的大约20个州。以下是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在华盛顿州我被告知,整个夏季和冬季,森林大火都在这个地区肆虐,而引起这场大火的原因则是失业的森林工人和破产的农民想借此挣几个灭火补贴。在我离开西雅图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看到几个妇人在当地大超市的弃货堆中找寻食物。许多蒙大拿市民告诉我,几千蒲耳式的小麦都被弃在麦田中无人收割,因为小麦的价格是如此的低,以至于卖小麦所得的钱还不足以支付收割小麦的成本。在俄勒冈州,我看到几千蒲耳式的苹果烂在果园里。只有绝对没有半点瑕疵的苹果才能卖得出去,装有200个苹果的一篓苹果只能卖到40到50美分。而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却因为父母的贫穷而在整个冬天都吃不到一个苹果。

当我在俄勒冈时,波特兰市的市民悲伤地讲述了一个事实:数以千计的羊羔都被牧羊人杀了,因为他们把羊卖给市场所得的钱还付不了运费。尽管俄勒冈的牧羊人不得不将羊肉喂了鹰鹫,但我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却看到人们在垃圾筒中寻找肉类。我把这件事讲给芝加哥餐馆中的一个人听时,他告诉了我他养羊的经验。他说他在今年秋天杀了3000只羊,将它们都抛到大峡谷中去了,因为把一头羊运到市场要花1.10美元的运费,但在市场里一头羊还卖不到1美元。他还说他已经养不起这些羊了,而他又不能让羊挨饿,所以他干脆就将它们都杀了抛进山谷。

西部和西南部的路上挤满了饥饿的搭便车者。每一条铁路线的两侧都能见到无家可归者燃起的营地篝火。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坚硬的路面上行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次麦子和棉花大跌价中变得一无所有的佃农。在阿肯色州的克拉斯维尔和拉舍尔维尔之间的公路上,我让一个家庭搭了一段便车。那家妇女怀抱着一个用破衣包裹着的小鸡。当我问她从哪儿买了这只鸡时,她一开始告诉我她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死鸡,接着她又强作欢颜地补充道:"那些人许诺我们锅里会有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这一只了……"

农民因为工人的贫困而变得贫困;同时,工人也因为农民的贫困而生活困苦。这两类人都没有钱去购买对方的产品,因此我们也就同时在同一个国家中遇到了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现象。

* *Un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Labo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72nd Congress, 1st Sessi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2), pp.98—99.

社会和政治影响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也引起了相应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大规模失业,这个问题已经达到了悲惨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口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其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工会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失业,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则只能打零工。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在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在德国,由于失业率更高,挫折感和紧张情绪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而这也最终使得希特勒的成功有了可能,因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位奥地利海关小官员的儿子,早年他曾去过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在那里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1914年希特勒从维也纳漂泊到慕尼黑并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巴伐利亚政治团体。战争结束后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发起的一场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很轻易地就给镇压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回忆录。他在书中发泄了他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宣传煽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 000张选票;而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转折点发生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上,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 407 000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3%。希特勒是通过许诺解决失业问题、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以及污蔑犹太人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和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而赢得支持的。其实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就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响却很小。是大萧条为他赢得了狂热的听众,他成为了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找到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此后希特勒的政治资本更是不断增加。在1932年7月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猛增到13 799 000张,他们的



图 237　希特勒

在 1927 年纽伦堡的一次纳粹集会上，阿道夫·希特勒停下他的敞篷车，接受周围人群的欢呼。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纳粹运动只是魏玛共和国需要面对的许多麻烦之一。

席位也猛增到 230 席。1933 年 1 月希特勒成为内阁总理，开始像墨索里尼一样用宣传和恐怖来统治德国。

大萧条使希特勒的成功具备了一定的可能，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将这种可能性转化成现实的是以下几个原因的混合：希特勒个人的煽动天才、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他的反对者的短视——他们削弱了他但却没能团结起来反对他。1934 年 8 月 2 日兴登堡的恰好去世使得希特勒能够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9 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 1932 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迦诺时代的国际形势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说道：

"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谊，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采取了一种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危险的态度。"[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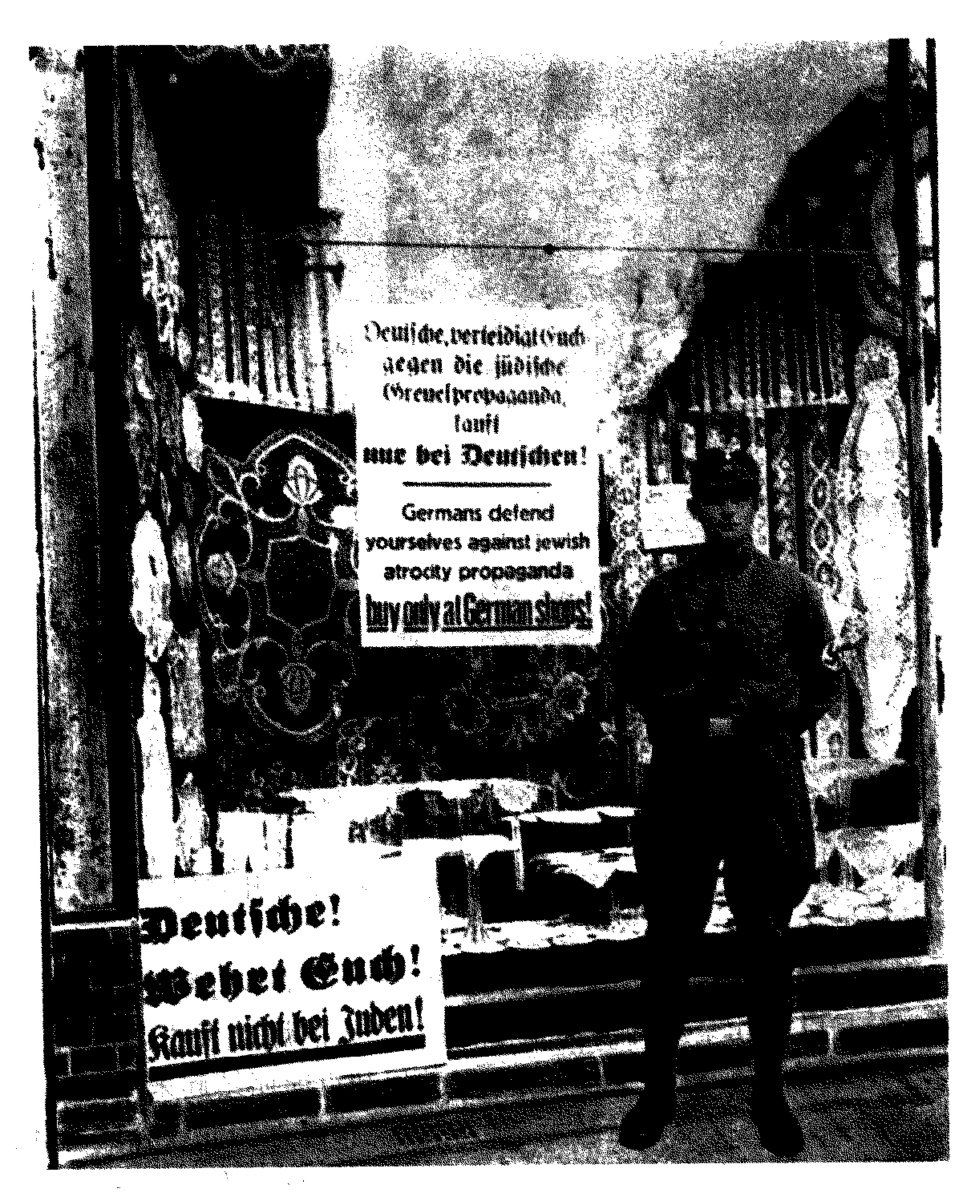


图 238　骚扰犹太人

掌权后不久，纳粹政府即开始骚扰犹太人的生意。政府要求非犹太人的德国公民不要从犹太人的商店中购买商品。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债的国际协定，已经无法实行。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推到崩溃边缘的各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这一点不久就变得显而易见。

大萧条的另一个影响是使顽固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各国都采取了诸如高关税、严格限制进口配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措施以自卫。而这些措施则又必然会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

公认的国家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军所作的种种尝试也逐渐停止，裁军让位于各种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始于1932年2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0个月，但它却与经济会议一样毫无成果。整个20世纪30年代，各国都在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于重整军备。这一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虚构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也是因为实行了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才迅速地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

此时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迟早会被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而"生存空间"便是一个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不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缺乏生存空间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对此一个显而易见的出路就是扩张，必要时则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这个推论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大萧条除去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起到了使"穷"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而且它还为那种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正当理由。

这就是引起张伯伦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了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推荐读物

R. Munting 所著的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SSR* (St. Martin's Press, 1982)是对五年计划来龙去脉的一个很好的简明总结。对新经济政策及计划进行再评价的著作有：S. Cohen 所著的 *Rethinking the Soviet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1985)；M. Lewin 所著的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Pantheon, 1985)；C. Bettelheim 所著的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2 vol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1978)；S. Brucan 所著的 *The Post-Brezhnev Era: An Insider's View* (Praeger, 1983)。分析新经济计划的全球性影响的著作有；E.H. Carr 所著的 *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Macmillan, 1954)；C.K. Wilber 所著的 *The Soviet Model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70)；R. Pipes 所著的 *Communism: The Vanished Spectre* (Oxford University, 1994)。

分析大萧条的著作有：J. K. Galbraith 所著的 *The Great Crash, 1929*

(Houghton Mifflin, 1955); G. Rees 所著的 *The Great Slump: Capitalism in Crisis* (Harper & Row, 1971); C. P. Kindleberger 所著的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5); J. A. Garrity 所著的 *The Great Depressi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关于希特勒的崛起, W. L. Shirer 所著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Simon & Schuster, 1960)充满了勇气; A. Bullock 所著的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Harper & Row, 1952)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传记; J. Toland 所著的 *Adolf Hitler* (Doubleday, 1976)。关于希特勒崛起的环境是有争议的, R. F. Hamilton 所著的 *Who Voted for Hit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2)、H. A. Turner, Jr. 所著的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Oxford University, 1985)、D. Abraham 所著的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1)观点各不相同。

注释

1. Cited by S. and B.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lization*, Vol. 2 (Gollanez, 1937), p. 605.
2. Cited by S. F. Cohen,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1985), p. 77.
3. M. Lewin, *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W. W. Norton, 1968), p. 517.
4. H. E. Salisbur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1953.
5. Cited by J. K.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 (Houghton Mifflin, 1955), pp. 20, 75.

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福煦元帅，1919年

第40章　走向战争(1929—1939年)

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而30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争的10年。德国和日本在30年代上台的新领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领土的和约，他们有决心也有办法去这样做。他们大规模的重整军备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势力均衡。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企图挑战现状的惟一的修正主义国家——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也给修正主义运动增添了力量，从而导致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力量布局。由于欧洲大陆盟国坚持维护现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变现状，而因五年计划强大起来的苏联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也就发展起来了。这三方力量的互动解释了20世30年代一再发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满洲”

第一个重大的侵略行动是日本采取的，因为它想要实现其获取大陆领土这一蓄谋已久的野心。在过去几年里日本的经济和军队领导人一直都在鼓吹，日本应该征服一个使日本能够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其他地区的帝国。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为他们提供了大批听众，正如希特勒在德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事业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们也充分意识到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业情况和其他问题。这些周密的分析使日本人决定在1931年进攻中国的“满洲”。

“满洲”成为日本扩张的首选目标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东北角上的这个地区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松散；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

煤和辽阔而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经通过过去的条约获得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可被用来为其侵略行径寻找借口。

1931年9月18日晚，一颗炸弹将日本人控制的通往沈阳北部地区的南满铁路炸坏了一小段。在1946年6月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上，曾于1931年任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男爵承认，是当时的几个军官筹划了这一事件，他虽设法阻止但却未能成功。他的证言可以通过驻扎在关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即当时所称的“关东军”作出反应时的速度和精确性得到证实。关东军未经宣战就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1932年1月下旬对哈尔滨的占领意味着“满洲”各种有组织的抵抗的结束。1932年3月，日本在它的占领区成立了“满州国”。

当时中国政府向国际联盟求助，国联派出的调查团于1932年10月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将“满洲”变成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又在日本管辖下的自治国。1933年2月25日国联正式通过了这份报告。但是第二个月日本就退出了国联，于是“满洲国”也就变成了一个傀儡国。

回想起来，满洲事件作为对国际联盟和旨在维护现状的整个外交结构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是很引人注目的。而日本毫不费力就获得了大片富饶的新领地，这对意大利和德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也起了作用——满洲事件引发了一连串的侵略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见地图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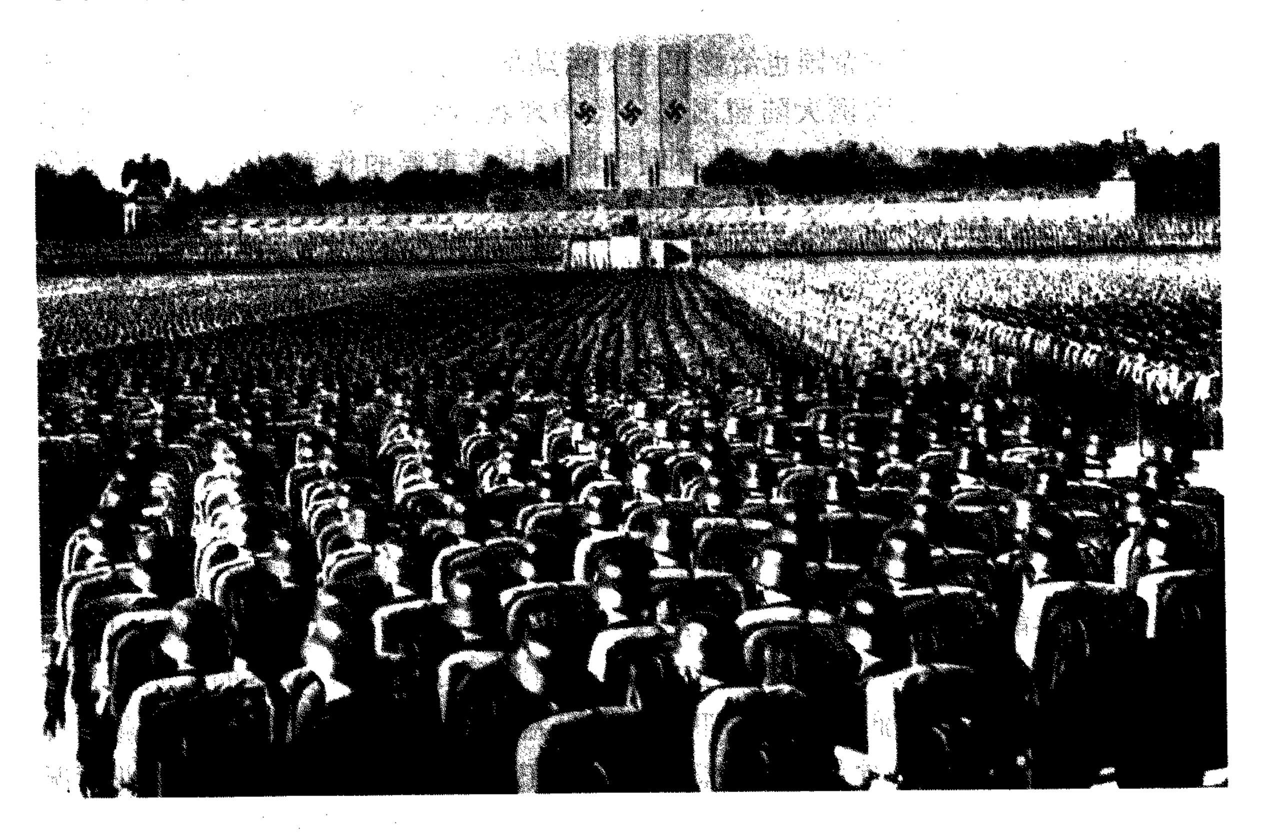


图239 党卫军

德国以惊人的数目重新武装，完全抛弃了它在《凡尔赛和约》中承诺的义务，并为战争作准备。图为1938年纳粹德国党卫军集会。

二、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则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欧洲现状的威胁。此前数年，法国与邻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等组成的联盟体系几乎是很轻松地在统治着欧洲大陆。但是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条款，并与墨索里尼一起开始颠覆凡尔赛体系的大厦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也就发生了剧变。

1935 年 3 月 16 日希特勒违背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虽然西方国家口头上也都同意共同行动来反对德国的威胁，但是由于它们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于是德国也就再次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势力均衡，因为德国陆军和工事现在已经把法国和它的中东欧盟友分隔开来。



图 240　墨索里尼的表演

墨索里尼决心使意大利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产粮国。1938 年，他因天气炎热而赤膊站在一个农业集会的木板台上，宣告意大利将再也不用向其他国家要求进口粮食了。

正如日本对"满洲"的成功侵略鼓励了欧洲的侵略一样,希特勒重新武装未受到挑战的事实也鼓励了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的军团侵入独立的非洲王国埃塞俄比亚——促成这一赤裸裸的侵略的因素有好几个,包括墨索里尼对恢复古罗马帝国光荣的狂热和他希望殖民地扩张能减轻国内经济压力。国联做出反应,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投票决定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

但是,言行不一的情形却又一次出现了。这次是因为各国对经济制裁存在分歧:国联的支持者希望使经济制裁发挥效力,因此主张制裁包括关键物资,特别是石油;但是一些英法的大臣则反对,他们担心如果包括石油,墨索里尼就会像日本一样退出国联,加入希特勒一方。最后绥靖主义者占了上风,因而不幸的埃塞俄比亚的前途也就被决定——埃塞俄比亚在意大利军团面前崩溃了。

埃塞俄比亚部族首领以其自取灭亡的傲慢和无知藐视游击战,认为它毫无价值、有失身份。他们企图进行阵地战,结果却遭到了无情的炮击、轰炸,甚至还被喷洒了芥子气。在经过了一场长达7个月的战役之后,意大利人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罗马和平,它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的'这一简单的、不可改变的、明确的短语中"。于是在牺牲了3000人和损失了10亿美元之后,墨索里尼赢得了一个拥有35万平方英里土地、1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帝国。

在接下来的3年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第一个就是干涉西班牙内战。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生存空间理论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通过宣扬需要生存空间来为他们的征服行为进行辩护。他们将他们国家的问题怪罪于他们所在的帝国缺乏资源和市场。以下言论就是这两位领导人的论点。*

希特勒,1930年:如果德国人不能解决自己国家空间缺乏的问题,或是不能为自己的工业打开国内市场,那它2000年的历史就付诸东流了。因为德国就会在世界舞台上消失,更有活力的人会来继承德国的遗产的……

必须抢占并保有空间。那些懒惰的人种根本就没有权力占有土地。土地应归属于那些勤劳耕种它们并能保护它们的人们。如果一国国民丢掉了土地,他们同时也就丢弃了生命。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防卫他们的国土,它的每个国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没有更高的正义规则规定一国国民必须挨饿。惟一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它创造正义……

并不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权利都是国会创造的,武力也能创造权利。问题是我

们是希望生存,还是希望死亡。我们比全世界其他民族有更多的权利拥有更多的土地,因为我们的人口密度实在是太大了。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可以运用这个原则: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的人。

墨索里尼,1933 年:……法西斯主义与当今流行的政治理念大不相同,它更多地考虑和考察人类的未来和发展,它既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存在,也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功用。因此它否认和平主义,认为这一主义生来就否认斗争,害怕牺牲。战争本身就能将所有人的精力发挥到极致,并为有勇气运用它的人烙上崇高的印记……

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成长,即国家的扩张,是一个民族活力的基本体现,它表明这个国家尚未开始腐朽。那些正处于上升途中的人们,或是那些经历了腐朽阶段正在复兴的人们,都是帝国主义者。

* Voelkischer Beobachter, May 7, 1930; and Benito Mussolini,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octrines of Fascism," *Political Quarterly* (July-September 1933), p.356.

三、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的意义非比寻常,因为它实质上是两种冲突的统一体:一种是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大国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 世纪的西班牙已经截然不同于 16 世纪的西班牙——那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和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此期间,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 1898 年的西—美战争;美国很轻易地就夺走了西班牙大部分残留的殖民地,使西班牙颜面尽失。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牢固统治这个国家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大约 35 000 名大地主占有了全部可耕地的 50%左右。地主都为在外地主,他们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们的收入,不对生产作出任何贡献。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与士兵人数相比,军官人数多得惊人,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政治。最后,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其富有和影响力巨大的机构,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并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发挥着很大影响。这股巨大的势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权运动:攻击教士和修女、内战期间大规模地破坏教会财产——这类现象在西班牙历史上比比皆是。

1902 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的现状就是如此。在他统治期间西班牙为频繁的内阁更换、众多的罢工、兵变和暗杀所困扰,加之大萧条使形势变

得更加不稳，最后阿方索决定恢复宪法并于1931年4月举行国内选举。投票结果对现政权极为不利，共和党人获得了50个省会中46个省会的选票。公众舆论已经表露得非常明显，阿方索像1789年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即议会的选举。这一立宪会议于7月召开，其成员分为三大派：保守主义的右派、共和主义的中间派和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组成的左派。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宪法宣布：无论男女都有普选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会财产收归国有。

这种左倾自然引起了西班牙既得利益集团的警觉。在这一关头，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国与意大利的纵容下和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领导下举起了反革命的旗帜。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军队发动叛乱，第二天本土上的许多将军也都拿起了武器。叛军即自封的民族主义者迅速地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区。在叛乱的头几个星期，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约一半国土，之后他们重整旗鼓并设法控制了中部地区的马德里、北部地区的巴斯克诸省和高度发达、拥有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等大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此时忠于共和政府者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工业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拥有非常巨大的黄金储备的首都。然而尽管拥有这些有利条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从国外获得与那些民族主义者从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同样多的武器。



图241　佛朗哥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于1936年领导了一场反对合法选举的政府的叛乱，造成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图为他在西班牙北部城市布尔戈斯的街上行进。

有两年时间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民族主义者控制了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区,而忠于共和政府者则控制了更加发达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但到 1938 年中期时,一直以来主要援助忠于共和政府者的苏联政府突然决定停止援助,从而使得佛朗哥的军队能够打破这一僵持状态。到 1938 年 12 月底时民族主义者已经占领了巴塞罗那,而随着来年 3 月马德里的沦陷,内战也就宣告结束。

对西班牙而言,这种长期的苦难使得其 2500 万人口中的 75 万人遭受伤亡,每 7 个未受伤害的人中就有一个人已无栖身之地。对西方列强来说,这场内战是又一次令人吃惊的失败。正如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一样,面对轴心国的侵略它们再次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优柔寡断——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

四、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1938 年是轴心国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1938 年 2 月 12 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巴伐利亚高山别墅进行会谈。在那里,元首要求奥地利做出严重损害其主权的各种让步。舒施尼格进行了抵



图 242　慕尼黑会议

1938 年 9 月 29 日或 30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会晤了英国和法国的首脑,以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同盟国的领袖们抛弃了这个小民主国家,徒劳地试图绥靖希特勒从而避免战争。图中,希特勒坐在正中,坐在他右边的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

抗,计划定于3月13日就以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你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奥地利吗?"

在接下来的危机中,大国没有帮到奥地利一点忙。张伯伦在2月22日对众议院的讲话中宣告:"……我们不可去设法骗得弱小国家相信国联将反对侵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它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干涉起不了什么作用"。[1]3月13日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就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他的出生地。这样德国通过电话就接管了奥地利,而这一事件在国际联盟中竟未被提起。

随着安全地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标对准了其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而且它还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但是由于苏台德边界地区存在着300万日耳曼少数民族,从而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容易受到纳粹的宣传和颠覆。

随着奥地利的消失,苏台德问题突然成为一个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威胁——它此时已被扩张了的德国三面包围。而更为严重的是,确有某些迹象表明英、法政府准备放弃捷克斯洛伐克,就像它们先前放弃奥地利一样。1938年9月随着英法在慕尼黑同意德国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广大的边境地区,捷克斯洛伐克果真被抛弃了。

五、战争的到来

随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随着希特勒对波兰提出新的强硬要求,西方列强不得不面对德国无限制扩张这一前景。英法于3月31日保证在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为"的情况下给波兰人以援助。轴心国的下一个行动是,意大利于4月侵略并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英国和法国又针锋相对地作出保证:如果意大利进一步向巴尔干扩张,英法将全力支持罗马尼亚和希腊。

但是除非英国和苏联一致行动,否则这些对东欧国家的许诺就毫无价值。正如丘吉尔于5月19日向众议院所宣布的那样,"如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我们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保障,而如果没有苏联,也就不可能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2] 显然双方在形成一个"和平战线"上有着共同利益,但是由于双方彼此之间深深的不信任,它们却没能这样去做。英法担心苏联利用与西方的条约向东欧扩张,而苏联则怀疑英法不会在希特勒进攻苏联时兑现援助的诺言,结果只留下苏联对抗希特勒。

当英国官员向在伦敦的德国代表提及签订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时,这种不信任升级到了灾难性的地步;这一条约将使英国摆脱它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疑虑重重的俄国人预见到了英国将重蹈覆辙,不过这次是针对他们的。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斯大林转向了一向是他不共戴天敌人的轴心国。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

犯条约,同意缔约国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条约不包含如果缔约国之一侵略他国就会使该条约无效的所谓的“例外条款”,而这种例外条款是苏联与所有其他国家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特点。也许这种省略与条约中的一个秘密议定书有关,这一议定书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将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而波兰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希特勒因为在东侧赢得了保障,便认为可以放手出击了。1939 年 9 月 1 日清晨,德国的军队、坦克和飞机未经宣战就已全线越过波兰边界。9 月 3 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宣战。墨索里尼尽管发表过有关轴心国“钢铁般条约”的演讲,但他却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拉开了大幕。

推荐读物

下列著作对 20 世纪 30 年代外交的解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G.L. Weinberg 所著的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1936* 和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0, 1980)认为希特勒应为战争负责,因其要求在中东欧自由行动。A.J.P. Taylor 所著的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amilton, 1961)认为战争主要应归咎于英法的失误。J. Remak 所著的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rentice Hall, 1975)简明扼要地描述了走向战争的过程。

关于日本扩张主义的背景,请参考 A. Iriye 所著的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D.M. Brown 所著的 *Nationalism in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5); Y.C. Maxon 所著的 *Control of Jap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Military Rivalry, 1930—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7); J.B. Crowley 所著的 *Japan's Request for Aut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6)。关于扩张的实情,参考 D. Bergamini 所著的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Morrow, 1971); J.M. Maki 所著的 *Conflict and Tension in the Far East: Key Documents, 1894—1960*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1); D. Borg 所著的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Harvard University, 1964); F.C. Jones 所著的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ts Rise and Fall, 1937—1945* (Oxford University, 1954)。

关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请参考 G.W. Baer 所著的 *The Coming of Italian-Ethiopian War* (Harvard University, 1961); A. Mockler 所著的 *Haile Selassie's War: The Italo-Ethiopian Campaign* (Random House, 1985); G.W. Baer 所著的 *Test Case: Italy, Ethiopia and the League of the Nations* (Hoover Institution, 1976); A. Sbacchi 所著的 *Ethiopia Under Mussolini: Fascism and the Colonial Ex-*

perience (Zed Press, 1985)。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背景,请参考 E. E. Malefakis 所著的 *Agrarian Reform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Spain: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Yale University, 1970); P. Preston 编著的 *Revolution and War in Spain 1931—1939* (Methuen, 1985)。关于战争本身的研究,请参考以下观点各异的著作: D. A. Puzzo 所著的 *Spain and the Great Powers, 1936—1941* (Columbia University, 1962); H. Thomas 所著的 *The Spanish Civil War* (Harper & Row, 1961); G. Jackson 所著的 *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1931—1939*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5); B. Bolloten 所著的 *The Grand Camouflage* (Hollis and Carter, 1961); S. G. Payne 所著的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Modern Spain* (Stanford University, 1967)和 *The Spanish Revolution* (W. W. Norton, 1970)。

以下观点各异的著作描述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世界形势迅速走向战争这一过程: F. W. Deakin 所著的 *The Brutal Friendship: Mussolini, Hitler and the Fall of Italian Fascism*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2); G. F. Kennan 所著的 *Russia and the West* (Little, Brown, 1960); E. H. Carr 所著的 *German-Soviet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Hopkins, 1951); M. George 所著的 *The Warped Vis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33—1939* (University of Pittburgh, 1965); A. A. Offner 所著的 *American Appeasement: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Germany: 1933—1938* (Harvard University, 1969); T. Taylor 所著的 *Munich: The Price of Peace* (Doubleday, 1979)。最近关于走向战争过程的研究成果是 D. C. Watt 所著的 *How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1939* (Pantheon, 1989),它有效地利用了德国外交部被俘获的档案材料,对战争双方领导人物的评价也发人深省。

注释

1.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XV(March 5, 1938), p. 9.
2.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athering Storm* (Houghton Mifflin, 1948), p. 376.

下一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

——爱因斯坦

第4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在与斯大林签订条约时,希特勒的目标是确保在他消灭波兰期间苏联保持中立,然后就能够调集部队进攻英国和法国——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他曾私下宣布:“就让我们把这一条约看作确保我们后方的东西吧。”至于苏联,也被列在他将来的牺牲者的名单上。“目前苏联并不危险,”他说道,“只有当我们在西欧行动自由时,我们才能对抗苏联。在以后的一两年中,目前的局面将继续维持”。[1] 因此,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已制订出了他的征服计划:首先是波兰,其次是西欧,最后才是苏联。他按此计划行事,由此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直到苏联和西欧变得十分强大,足以掌握主动权为止。

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从由东欧少数民族问题引起的欧洲冲突开始的。在最初的两年中,各战役只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然后日本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正如美国1917年的参战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一样。但此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似之处已不复存在。随着日本闪电般地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区比前一次世界大战要多得多。此外两次大战在运用的战略和武器上也迥然相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事实证明以战壕和机枪群为基础的防守优于进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事实则证明以坦克和飞机为基础的进攻强于防守。这一点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特有的战线富于流动性的特点。整个的国家乃至整块的大陆来回易主,这与1914年至1918年间西线血腥的僵持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争的欧洲阶段

瓜分波兰

在波兰,德国人第一次展示了其新式"闪电战"的致命威力。首先,一波一波的俯冲轰炸机轰炸通讯线路,制造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然后,装甲师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个缺口,深深侵入后方,摧毁运输和通讯设施,将抵抗部队切割成碎片。最后则是较轻便的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出击,必要时在飞机和大炮的援助下,"肃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

不幸的波兰由于其地形平坦和装备陈旧,正好是一块适合这种类型战争的"鱼脯"。10天内,这场战役的胜负实际上就已经被决定。德国的坦克群和飞机群随着日渐衰弱的抵抗迅速横扫波兰农村。德军推进的速度迫使斯大林采取行动,以便接管他在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时所坚持要求的领土。9月17日苏联红军穿过边界进入波兰东部,两天后他们与得胜的德国人建立了联系。9月27日华沙沦陷,波兰领导人先是逃到罗马尼亚,然后又逃往法国。两天后他们的国家即被瓜分:德国人占领了拥有2200万人口的37 000平方英里土地,苏联人则占领了拥有1300万人口的77 000平方英里土地。这样不到一个月时间,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已完全从地图上消失了(见地图35)。

此时苏联政府利用《莫斯科条约》中的秘密议定书加强了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地位。1939年9月和10月,它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苏联军事基地。作为补偿,立陶宛得到了它所长期渴望的、以往一向是波兰一部分的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地区。接着苏联又对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和北冰洋内的佩萨莫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在遭到芬兰政府的拒绝之后,苏联红军于11月30日向芬兰发动了进攻。

芬兰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于是国联将苏联开除。芬兰人对苏联人猛攻的抵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在曼纳林防线击退了苏联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严重低估了芬兰力量的苏联人派出正规军向芬兰发起大规模进攻。到3月中旬时他们摧毁了曼纳林防线,芬兰人被迫求和。随后签订的条约使苏联人获得了包括佩萨莫地区、维堡港口、芬兰湾中的几座岛屿和汉科海军基地在内的比他们原先要求的还要多的领土。

苏联人对芬兰和波罗的海其他国家的这些行动,反映了在苏德合作的幌子背后存在的竞争和不信任。波罗的海地区的日耳曼人数世纪以来一直在梅梅尔和里加这样的中心城市居支配地位,但是由于苏联的坚决要求,他们撤退到了德国——这

一情况也充分表明了上述这一点。

从波兰到法国

与此同时,西线则一直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中。当波兰被瓜分时,英国和法国只能无能为力地站在一旁。他们不能进入已被德国人严密封锁的波罗的海,他们的空军无法飞越德国领空,他们的陆军则遇到了希特勒自 1936 年占领莱茵兰后所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的阻挡。因此法国人只得牢牢地守在马其诺防线上,而在齐格非防线另一侧的德国人也未采取任何行动。

事实证明这种表面上的平静是靠不住的。1940 年 4 月 9 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横扫丹麦,并登上了挪威海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挪威海岸的峡湾,这些峡湾能为德国潜艇提供非常宝贵的基地,还能保护船只将瑞典的铁矿石沿海岸运到德国。丹麦人无法抵抗,但挪威人在英国的支持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到 6 月初时法国本身也处于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于是同盟国远征军驶离挪威,挪威政府也随之前往伦敦避难。



图 243　德国进攻波兰

德国入侵波兰的初期,一支摩托化德军正快速进入波兰。

盟国在挪威的挫折不久就因德军在 7 周内便横扫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惊人的闪电战而相形见绌。5 月 10 日德国人进攻荷兰和比利时,两天后又进攻法国。荷兰人的

防守5天内就土崩瓦解。比利时人坚持得稍久些,但到5月28日时国王利奥波德宣布投降,比利时军队停止抵抗。此时,德国人已经绕过马其诺防线的最北端——这条防线从来没有延伸到海洋——并穿过阿登森林,在色当把法国人的防线打开了一个50英里长的缺口。装甲师此时迅速向西朝英吉利海峡挺进,并于5月21日到达。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使法国北部的英、法和比利时军队与法国主力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佛兰德的盟国军队,主要是英国军队,退缩到了敦刻尔克——他们从那里撤退到英国。

6月4日盟国军队完成敦刻尔克撤退后,德国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并于6月13日占领巴黎。士气低落的法国政府接受了条件苛刻的停战协定,其中包括释放所有的德国战俘,遣散法国军队,交出法国军舰,由德国占领法国一半多的领土。

德国闪电战的惊人影响反映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伤亡中:在整个战役中,法国损失了约10万人,其他同盟国损失了2万人,德国损失了45 000人。这些损失还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进攻所蒙受的损失的一半。法国被认为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迅速崩溃自然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打击。有人指责说,叛国和怯懦是造成这一巨大灾难的原因。虽然这些指责也并非毫无根据,但另一些因素却似乎更具决定性。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苏德条约的影响,这一条约使得希特勒能够将军队集中在一条战线上。此外,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德国在好几个方面,特别是发展闪电战新战术方面所占有的优势。

不列颠战役

在敦刻尔克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希特勒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也会识时务地投降。但是他却低估了英国人民和他们的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以其特有的胆识和果断告诉他的人民,告诉全世界:“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着陆地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中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当时希特勒正犹豫不决,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走——法国出人意料的迅速沦陷使他大为吃惊。起初他试图同英国人达成协议,当他的提议被置之不理时他便调动了空军,他确信只需通过空袭,而无须采用危险的渡海方法,便能征服英国。

此后的空袭演变成了关键性的不列颠战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较大的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大规模的空战中,纳粹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2670架对1475架。但是,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更先进,因为英国人比德国人晚几年才开始大量生产飞机。而且英国人还使用了雷达,雷达是一种新发明,它能使敌机在距离其目标还有50至100英里时就被“发现”。在这些优势的帮助下,英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几千名战斗机飞行员同少数波兰、捷克、法国和比利时飞行员一起,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德国空军,也使希特勒进攻英国的机会彻底落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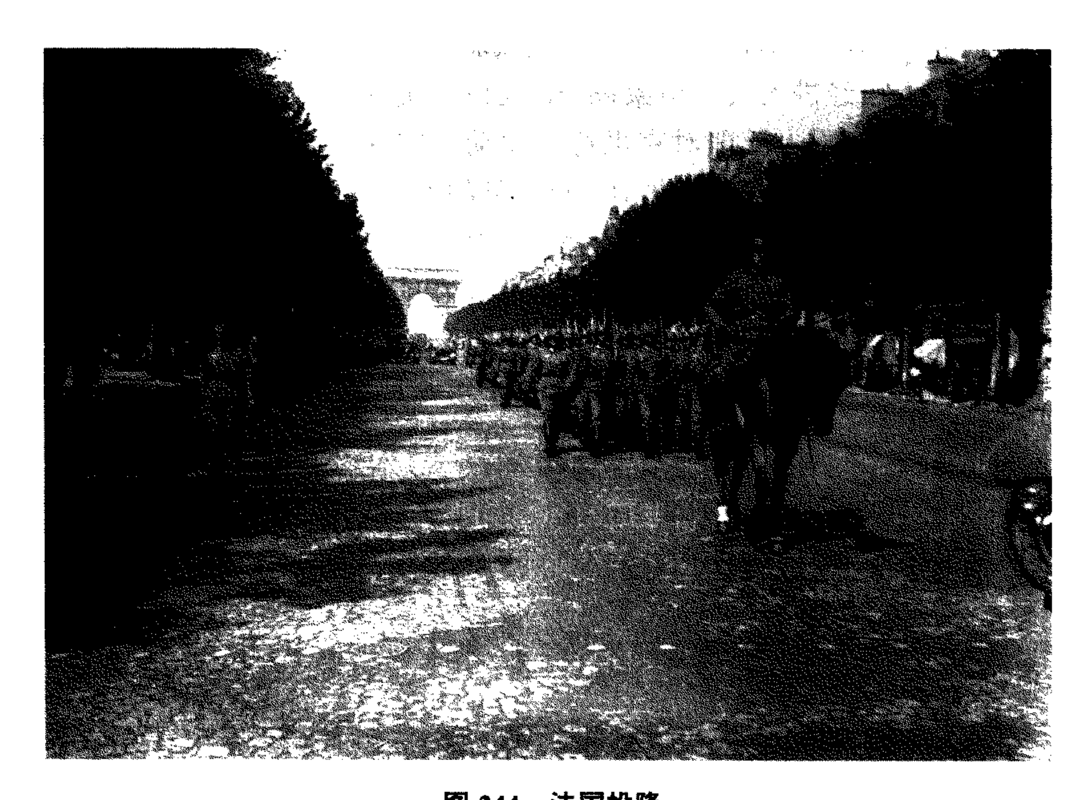


图244　法国投降

在法国的防卫迅速瓦解之后，1940年9月德国军队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

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征服

由于不列颠战役的失败，希特勒做出了次年春天入侵苏联的重大决定。为了准备预定的侵略计划，希特勒向罗马尼亚派遣了部队，以便让罗马尼亚军队作好进攻苏联的准备。然而就在希特勒占领罗马尼亚时，墨索里尼却向希腊发动了蹩脚的侵略。墨索里尼以为这将是一次不费吹灰之力的占领，但事实却证明它是一次可耻的失败。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越过边界进入希腊，希望胜利挺进雅典。但在越过希阿边境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之后，他们便于11月11日在梅索沃战役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希腊人经常利用意大利人笨重的装甲师在伊皮鲁斯山脉中的不便占领高地，从那里切断并包围下面的敌人。到11月中旬时他们已将意大利人逐出边境，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希腊人攻占了阿尔巴尼亚的大城市。一时间，墨索里尼似乎还得忍受亚得里亚海的敦刻尔克大溃退的痛苦。

希特勒无法对意大利人笨拙的行动袖手旁观，尤其是因为英国人正将空军部队派往希腊，而这则会给他进攻苏联带来麻烦。于是他于4月6日发出指令，实施“马里塔作战计划”，征服希腊和南斯拉夫。同在波兰和法国一样，纳粹德国的装甲师和空军以破竹之势前进。巴尔干半岛的高山地形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有

效的障碍,而且英国的陆军和空军部队也太软弱,未能挡住潮水般涌来的德军。到4月13日时德国人已经进入贝尔格莱德,10天以后英国人将他们的部队从希腊南部撤到了克里特岛。德国人随即对克里特岛发动了空降突袭,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料到会遭到来自克里特岛以北180英里处的希腊本土的空袭。尽管德国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到6月初他们最终还是完全控制了该岛。

除在巴尔干半岛上取胜外,希特勒的军队还在能力出众、精力充沛的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领导下在北非取得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在将巴尔干和北非控制在手中之后,希特勒便命令他的陆军在1941年6月22日越过苏联的边境线(见地图35)。

二、战争的全球阶段

入侵苏联

1939年8月斯大林由于种种原因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对西方领导人极不信任,因而希望赢得加强军队和工业建设的时间。他还预料到德国和西方列强迟早会进行一场消耗战,而苏联则可拜互不侵犯条约之赐超然于战争之外,直到战争对它有利时再介入。“如果战争爆发,”他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绝不可能按兵不动。我们将不得不参战,但我们必须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在天平上放上一个决定性的砝码,它将使天平倾斜。”[2] 这一战略是精明的,然而它却使苏联自食其果并差点毁了这个国家。该战略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德军和西方军队势均力敌,双方会互相残杀,从而使苏联红军成为欧洲大陆上居支配地位的军队。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德国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从而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而苏联则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

最初看上去,苏联似乎也会像波兰和法国那样迅速崩溃。德国各装甲师以他们此时早已熟悉的方式冲破边境上的防御工事,深入到后方,包围了苏联所有的军队,抓获了成千上万名俘虏。到该年年底时,德国军队已经向东深入600英里,占领了苏联工业化程度最高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德国人的获胜除了突袭这一重要因素外,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占优势:希特勒以一支约300万人的军队攻击对方近200万人的军队。当然苏联人有大批后备兵可资利用,但是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使得苏联很难迅速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备兵。而且德军由于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各种环境下都作过战,因而它还拥有具备作战经验这一显著优势。此外,斯大林拒绝认真对待纳粹很快就将进攻苏联的警告,因此多数飞机第一天还在机场上就被炸毁了。另外还应该想到



图 245　纳粹集中营

图为 1945 年 4 月,美军解放诺得霍森集中营时发现的一些死者。1933 年纳粹德国就建立起了第一个集中营,关押反对政府的人。征服波兰后,那里新建的集中营就成了杀戮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大约 600 万犹太人在这些集中营中遭到谋杀。即使是集中营关押的没准备被屠杀的人(如政治犯和诸如吉普赛人、同性恋者、"耶和华的见证人"教徒等"不受欢迎的人")的处境也是极端残酷,数以万计的这类关押者死在那里。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

的是,这不是苏联和德国之间,而是苏联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是说,苏联红军不仅要对付德国军队,还要对付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大量军队。苏联的兵工厂除了与德国的兵工厂竞争外,还要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工厂竞争。因此尽管 1941 年苏联的钢产量几乎与德国的钢产量相等,但它仍要比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钢产量少一半以上。最后,进攻的德国军队还得到了苏联大量老百姓的支持。其中一些人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另一些人则是仍然痛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政策和大规模流放西伯利亚政策的农民。因此,很多苏联人都与他们认为不那么邪恶的德国人进行合作。

鉴于上述因素,德国人得以迅速深入到苏联腹地,并差不多完全包围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但是苏联红军却仍然未受重创,他们甚至还于 12 月发动了一次反攻。希特勒没有赢得完全胜利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占领国人民的支持,因为很多占领国人民都被迫在德国的工厂和农田里像奴隶一样工作。此外,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也引起很多人的反抗,因为该政策将东欧民族视为劣等民族,认为应该消灭他们,

由优等的日耳曼人来代替——希特勒的东欧新秩序计划要求消灭3000万斯拉夫人。更糟糕的是，希特勒决定通过灭绝所有纳粹控制区的犹太人的方法来"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希特勒在波兰的胜利使他控制了200万到300万犹太人，在西方的胜利又增加了50万，进攻苏联后又增加了300万。在德国军队的身后就跟着特别行动队，他们充当了屠杀班的角色。1941年下半年他们还使用了流动的毒气车。由于要屠杀的人数太多，他们建立了5个大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效率最高，创下了每天杀害12 000人的骇人听闻的记录。

就这样，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一数字占全欧洲犹太人的四分之三，占全世界犹太人的五分之二。但是受害者却也并不只是犹太人——500万新教徒、300万天主教徒和50万吉普赛人也在集中营里消失了。这种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人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种族灭绝"(genocide)来描述它。它由希腊语表示种族的词头"geno"和拉丁语表示屠杀的词尾"cide"组成。当然大规模的屠杀也不只是发生在20世纪，但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20世纪的种族屠杀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它是在专制政权的蓄意命令下冷酷地实施的，种族灭绝的执行者利用了当今所有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手段，使有计划的大屠杀变得系统而彻底。"[3]

纳粹还对这些囚犯进行了系统的利用：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让他们充当劳力，在他们死后则将其用作"原料"。他们下令将尸体的骨灰用作肥料，头发制成床垫，骨头敲碎制成磷酸盐，脂肪用来做肥皂，金银假牙被取出存在第三帝国银行的保险库里。

就二战的进程而言，种族灭绝的暴行不但是一种犯罪，同时也是一种短视行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主义的肆意妄为和欧洲大陆一些名誉扫地的政权让成百万的人与之离心离德。如果不是受到德国种族主义分子更加残酷的压迫的话，他们原本是会支持希特勒的新秩序的。而最终结果则是只有一小撮妥协分子跟纳粹合作，直到纳粹走向失败。被占领国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抵抗力量，这是导致希特勒最终灭亡的重要因素。

日本袭击珍珠港

随着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突然袭击了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从欧洲冲突转变为全球冲突。战争初期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决心保持中立，但是希特勒出人意料的胜利，尤其是法国的沦陷，迫使美国的决策人开始质疑：持中立态度能否使美国免受卷入战争之害？如果希特勒征服英国，然后控制大西洋——这在当时似乎绝不是不可能的事——征服计划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美洲大陆？

这些因素使华盛顿断定，避免卷入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向那些仍在与德国作战的国家提供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签订《驱逐舰与基地协议》(1940年9月2日)从中立逐步转向非战，又制订《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和



图 246　珍珠港事件

1941 年 12 月 7 日夏威夷岛上的珍珠港。

签署《大西洋宪章》(1941 年 8 月 12 日)从非战转向不宣而战。

在努力限制轴心国在西方扩张的同时,罗斯福总统还试图制止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然而一届又一届的东京政府由于欧洲事态的发展所提供的所谓的良机而变得越来越好战。希特勒的胜利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富饶领地几乎失去了防卫,因此只要美国不干涉日本人占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日本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陆军准备直接向英国、法国和美国挑战,但海军、外交家和实业家则多半不同意这种做法。1941 年 10 月赞成与美国和解的首相近卫文麿辞职,于是转折点出现了。东条英机将军成为内阁和军部的首脑,他决定跟美国算账。正如 1904 年日本不宣而战进攻旅顺港将战争强加给俄国一样,1941 年 12 月 7 日他们袭击了珍珠港。在几小时之内,除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被炸毁外,珍珠港上的八艘战列舰中有五艘被击毁。与此同时,另一支日本特遣部队则摧毁了美军在菲律宾的大部分飞机。紧跟着德国和意大利也向美国宣战。美国就这样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完全卷入了这场战争。

1942 年:轴心国胜利的一年

1942 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几乎在各处都取得了胜利。强大的攻势蹂躏了苏

联、北非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就像一只三只爪的爪子在抓取欧亚半球。日本人取得了最惊人的胜利,他们迅速地征服了从阿留申群岛到澳大利亚、从关岛到印度的广大太平洋地区。日本人的成功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时机恰到好处。法国和荷兰已被占领,英国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命,美国则刚开始从和平时期的经济转向战时经济。另外,在与中国游击队斗争的几年中,他们已经将士兵训练得能够从侧翼和背后进攻。这些技巧在东南亚丛林与西方的战斗中十分有效。最后日本人还从殖民地人民痛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剥削中获益匪浅——日本侵略者狡猾地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诸如"亚洲人的亚洲"之类的口号。

这些因素解释了日本人接连不断、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从香港到关岛、新加坡,到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直抵印度的边界。在5个月内,日本人只伤亡15 000人就赢得了一个拥有1亿多人口、能提供世界95%的橡胶原料、90%的大麻和三分之二的锡的帝国。

与此同时,在苏联战场上,希特勒则于1942年6月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由于前一年的事实已经证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坚不可摧,因此他这时命令部队南下。他的目标是到达伏尔加河和里海,由此将苏联切成两半,切断苏联红军来自高加索的石油供应。正如在1941年那样,装甲师首先迅速席卷了平坦的草原地区,然后主力坦克部队也就跟着到达了比斯大林格勒略北的伏尔加河。

在北非,1942年也是德国人取得胜利的一年。1941年3月,积极进取的隆美尔将军指挥非洲军团发动了一次进攻,迫使英国人穿过利比亚向埃及边境撤退。1942年5月,他继续发动进攻,越过边境进入埃及,到达距离亚历山大只有50英里的阿拉曼。隆美尔是如此深信自己将取得彻底胜利,以至于他为胜利进入开罗还特意挑选了一匹白色的战马。

此时轴心国在每条战线上都处于最幸运之时。在北非,隆美尔正准备进攻开罗;在苏联,德国军队已经到达伏尔加河;在太平洋,日本人似乎正在准备猛扑澳大利亚和印度。

1943年:形势的逆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三年中,轴心国没有遭遇任何阻碍。但到1942年底,随着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英国人在埃及的突破性进展、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墨索里尼的垮台、盟军对德国连续不断的轰炸和日本舰队在太平洋的失败,战争开始出现了转折。

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座城市。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始于8月22日。到9月中旬时德国人已经进入这座城市的中心,但也正是在那里他们陷入了困境。正当士兵们在地下室里,在屋顶上,在下水道里短兵相接时,两支苏联军队从东面渡过伏尔加河,分别从斯大林格勒的北面和南面发动进攻,以巨大的

钳形包围了围攻的德军。伏尔加河畔的德军这时已经陷入绝境。1943年2月3日12万人向苏联人投降，他们是原先那支有334 000人的部队的幸存者。此后苏联人便掌握了主动权，而德国人则反攻为守，以防止他们的撤退变成大溃逃(见地图36)。



图247　斯大林格勒战役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俄国士兵英勇抵抗。他们挖掘壕沟将城中的建筑物联结起来。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击败，这标志着俄国战场出现了一个转折。此后俄军就一往无前地向挺进。

在德国人被迫从苏联撤退的同时，他们及其意大利盟军也正在被赶出北非。英军新任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从埃及发动攻势，沿海岸线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击溃，并于1943年1月占领的黎波里。此时英美联军已在北非的另一端，即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英美联军向西挺进到突尼斯，又在1943年7月进入西西里岛。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渡过麦士拿海峡，进入意大利本土。

墨索里尼因为这些灾难而丢了职位，并最终丢掉了性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持不同政见的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劝说下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职务，将他关进了监狱。埃塞俄比亚征服者皮埃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组成了新的政府，他在1943年9月3日与同盟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德国人立即做出反应，他们攻取了罗马，占领了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地区。通过一次大胆的袭击，纳粹伞兵将墨索里尼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这位饱经风霜的“领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共和国”，并表示了他将战斗到底的决心。在此后的一年半里意大利成了一个分裂的和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德国人与他们的傀儡墨索里尼在北部，同盟国与巴多格里奥的临时政府在南部。

此时，第三帝国本土正在遭受着日益增多的空袭。到1943年时，英国人在夜里袭击，美国人在白天袭击，从而使得昼夜不停的轰炸成为可能。每小时扔在德国城市里的炸弹比整个不列颠战役中所扔的炸弹都还要多。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正在遭受着与其轴心国同伴在欧洲所遭受的类似的失败。日本人在取得了最初6个月的惊人胜利之后，其攻势终于被挡住，然后被迫以加速度后退。促成战争进程中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资源和生产率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尽管日本人精神十分狂热，但是美国经济一旦转入战争状态就完全压倒了日本经济。例如，战争初期的灾难使美国只剩下3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但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两年内，其航空母舰的数目便猛增到50艘。同样，海军飞机的数量也从1941年的3638架上升到1944年的30 070架，潜艇的数量则从1941年的11艘增加到1944年的77艘，而登陆船则更是从1941年的123艘猛增到1945年的54 206艘。

日本人压根就不能同美国工厂的浪潮相对抗。1942年8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迈出了他们通往东京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美国逐步攻占了南太平洋上的其他一些敌军基地。到1944年年中时美国人已经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关岛，从而将日本本土诸岛纳于新型的B-29轰炸机的射程之内。这是结束日本短暂的全盛时期的开端。

欧洲的解放

1944年至1945年，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向西挺进的苏联红军和从西面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的英美联军解放。诺曼底登陆于6月6日发起，庞大的舰队由4000艘商船和700艘军舰组成。盟军在法国地下游击队的宝贵支持下巩固了滩头阵地。到8月初时，勇敢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乔治·巴顿将军正迅速地穿过法国北部进逼巴黎。月底法国和美国军队解放了这座城市，此时公认的法国人民领袖戴高乐将军凯旋归来，驱车前往巴黎圣母院。

在西方列强解放法国的同时，苏联红军则正从东方迅速推进，在1944年春已将德国军队赶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之后，苏联红军便开始发动总攻。在北部，到9月时，苏联人已击败芬兰，迫使其退出战争；在中部，他们越过了波兰的新、老边界，挺进到华沙城下；在南部，他们到达了罗马尼亚中心地区的多瑙河河口。9月，罗马尼亚年轻的国王米哈伊乘机让他的国家退出了战争，从而为苏联红军打开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门。保加利亚也仿照罗马尼亚的做法，向苏联求和并站在苏联一边重新参战。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军由于此时处于被围歼的危险之中而开始尽快撤退。当他们撤退时，南斯拉夫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开始下山，并接手控制了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一事态促成了苏联和西方列强之间即将到来的“冷战”。在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援助下，也由于那年冬天格外暖和，苏联红军得以打进奥地利和德国。到1945年4月时苏联人已经占领了维也纳，并正奋力渡过距柏林只有40

英里的奥得河。其时,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也在西线取得了相应的进展。1944年12月他们曾在比利时的阿登山脉被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在稳住阵脚后他们很快就推进到了莱茵河。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退却的德军竟然忘记炸掉位于波恩以南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大桥。盟军成群地拥过大桥,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莱茵兰,并俘获了25万名俘虏。接着盟军的7个军迅速地向东穿过正在土崩瓦解的第三帝国。他们原本可以轻松地拿下柏林,因为此时红军还在奥得河上,而德军又将其兵力集中到东线对付苏联人,柏林几乎是不设防的。不过出于战略和外交考虑,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不去摘取这个胜利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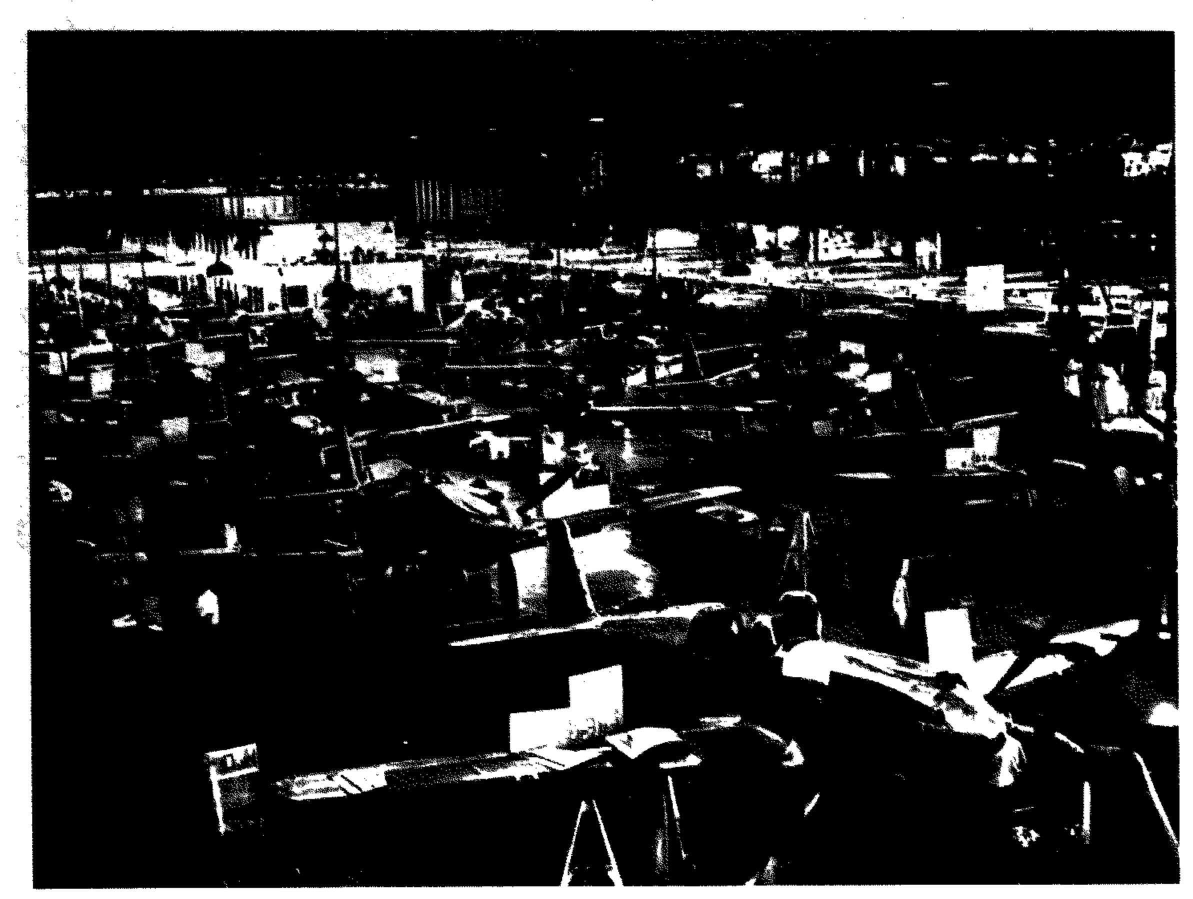


图248　美国的飞机制造厂

美国的飞机制造厂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图为1942年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的一个飞机制造厂。

当朱可夫在4月16日向柏林发起总攻的时候,盟军只是站在一旁观战。9天后,朱可夫元帅就已包围了这座城市。同在这一天,4月25日,美国的一支侦察队同苏军的先头部队在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易北河河边的托尔高村会师。4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和他的伴侣爱娃·布劳恩在炮弹不断落下的地下混凝土掩体里自杀。5月2日,柏林向苏联人投降。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纳粹密使在兰斯向西方列强、在柏林向苏联无条件投降。同时,德军驻意大利指挥官也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定。墨

索里尼在企图逃往瑞士时被游击队逮捕，并被立即处决。在米兰，他和他的情妇的尸体一起被吊起来示众。



图249　诺曼底登陆

1944年6月6日，即D日，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此图为两天后所摄，从图中可以看到士兵和装备排起长队从滩头向内陆挺进，去增援进攻部队。

日本的投降

德国和意大利的投降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上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到1944年年中时，他们的本土诸岛就已遭到了以硫黄岛和冲绳岛为基地的B-29轰炸机的轰炸。美国空军以这两座岛屿为基地，使日本人口稠密的城市像德国那样遭到了暴风雨般的轰炸。不过日本人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的房屋的薄木板和纸板结构在烈火中俨然就是引火物。

不过应对日本参战负责的军国主义者们却始终不愿承认错误，更不愿开始认真的和平谈判。然而就在他们犹疑不决时，一连串突然降临的前所未有的灾难结束了他们的优柔寡断。1945年8月6日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将一颗原子弹扔在广岛，炸毁了五分之三的城市，炸死了14万居民。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迅速

地越过边境进入"满洲"。最后的打击是 8 月 9 日在长崎市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7 万人被炸死。可是此时日本的极端军国主义者却仍反对全面投降,一时间战争似乎将恶化成由顽固的军官领导的游击战。但是天皇在内阁和政界元老的劝说下决定投降,并于 8 月 14 日接受了同盟国的最后通牒。9 月 2 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上,举行了正式的投降签字仪式。



图 250　日本投降

正式的日本投降受降仪式由麦克阿瑟将军主持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残酷并且破坏力也更大。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2840 万人的伤亡数字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达到了 5000 万人。其中苏联伤亡 2000 万人,中国伤亡 1500 万人,德国伤亡 500 万人,日本伤亡 250 万人,英国和法国伤亡 100 万人,美国伤亡 30 万人。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 5000 万伤亡人数中,有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死于残酷的谋杀另有——他们由于种族灭绝、宗教矛盾、政治原因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而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给灭绝了。

三、世界历史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削弱了欧洲的全球霸权,由于这种削弱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这两次大战对世界历史具有某些类似的意义。不过,它们也存在着种种重要差别,这些差别对当今的国际舞台仍具有重要意义。比起先前的霍亨索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欧洲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欧洲和亚洲旧秩序的破坏要大得多。德国人侵占了整个欧洲大陆,日本人则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但是这两大帝国也都很短命。到1945年时它们就都已不复存在,致使两个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地区陷入权力真空。而也正是这两大权力真空的存在,连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使各交战国不能在1945年之后立即签署全面的和平条约。

两次大战战后时期的另一个差别是,1945年以后殖民地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这与1918年以后帝国权力的强化形成了鲜明对照。20年内,欧洲幅员辽阔的各个帝国几乎全部消失。因此在战后不久全球就开始了两个最显著的进程——殖民地革命和冷战。这也是以下两章的主题。

推荐读物

最吸引人也是最发人深省的二战史著作是 S. Terkel 所著的"*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Pantheon, 1984)。L. Morton 所著的 *Writings on World War II*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67)在人物传记资料方面十分有用。最好的二战通史有 B. H. Liddell Hart 所著的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utnam's, 1970); G. Wright 所著的 *The Ordeal of Total War 1939—1945* (Harper & Row, 1969); M. B. Hoyle 所著的 *A World in Flames: A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theneum, 1970); R. A. Divine 所著的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War* II (Quadrangle Books, 1969)。

W. L. Shirer 所著的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Simon & Schuster, 1969)对法国的陷落作了生动的描述。研究德俄战争几个阶段的著作有: B. Whaley 所著的 *Codeword Barbarossa* (MIT, 1973); G. I. Zhukov 所著的 *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 (Harper & Row, 1969); A. Werth 所著的 *Russia at War, 1941—1945* (E. P. Dutton, 1964); W. Craig 所著的 *Enemy at the Gates: The Battle for Stalingrad* (E. P. Dutton, 1973); H. E. Salisbury 所著的 *The* 900 *Days: The Siege of Leningrad* (Harper & Row, 1969)。关于希特勒在东欧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及做法的著作有: M. Gilbert 所著的 *The Holocaust*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5); G. Fleming 所著的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

D.J. Goldhagen所著的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Knopf, 1996),它认为很多德国人不是在服从屠杀犹太人的命令,而是认为自己在做“正确之事”。

分析导致日本加入太平洋战争的外交过程的著作有:H. Feis所著的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0); J.M. Meskill所著的 *Hitler and Japan: The Hollow Alliance* (Atherton, 1966)。R. Wohlsetter所著的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64)对珍珠港偷袭背景的分析是十分权威的。D. Congdon编著的 *Combat: The Pacific Theater: World War* II (1959)由Dell出版了平装本,是一本太平洋战争的优秀文选。J. Toland所著的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Bantam Books, 1970)是从日本视角出发描述战争的。H. Feis所著的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0)捍卫了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性,而G. Alperowitz所著的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sdam* (Random House, 1965)和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Knopf, 1995)则攻击美国,认为使用原子弹不过是反苏的步骤; R.J. Lifton所著的 *Death in Life: Survivors of Hiroshima* (Random House, 1968)分析了原子弹的人道主义意义。J. Dower所著的 *War without Mercy* (Pantheon, 1986)通过揭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和日本集团内都在盛行种族主义,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R. Overy所著的 *Why the Allies Won* (Norton, 1996)认为战争临近结束之时仍然难分胜负,同盟国的胜利并非预先注定。

最后,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的1985年8月号全部登载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后果及当前人类前途的重要文章,值得一读。

注释

1. Cited by A. Dallin, "The Fateful Pact: Prelude 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1, 1948), p.40.
2. Cited by Dallin, "Fateful Pact", p.163.
3. A.J. Toynbee, *Exper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1969), p.241.

今后，那些[海外]国家的土著居民也许会越来越强大，欧洲本地人也许会越来越软弱，因此，世界各地人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许会达到相同的程度。相同的勇气和力量引起相互间的惧怕，从而能使独立国家因惧怕而放弃他们的不公正行为，使他们的不公正行为变成对相互权利的某种尊重。但是，国家间的广泛商业往来自然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也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交流更有可能造成以上所说的力量的相同。

——亚当·斯密

第42章　诸帝国的终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就在于它们给殖民地带来的后果不同。欧洲对殖民地的控制尽管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削弱了，但却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它还因为获得了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了各殖民帝国并极其迅速地终结了欧洲的统治。正如欧洲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迅速获得大部分殖民地一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在1944年至1985年间共有96个国家赢得了独立，这些国家拥有10亿多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42.1)。在海外取得如此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时欧洲人似乎又退回到了500年前他们曾从那里向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见地图37)。表42.1也揭示出，继海外亚非殖民地与母国分离之后，欧洲多民族国家也解体成几个单一民族国家。从表上可以看出，在1991年和1992年，苏联被13个继承国、南斯拉夫被3个继承国、捷克斯洛伐克被2个继承国所取代。

表 42.1 独立的进程

赢得独立的国家	所摆脱的国家	年份
叙利亚	法国	1944
黎巴嫩	法国	1944
约旦	英国	1946
菲律宾	美国	1946
印度	英国	1947
巴基斯坦	英国	1947
缅甸	英国	1948
朝鲜	日本	1948
韩国	日本	1948
以色列	英国	1948
斯里兰卡(锡兰)	英国	1948
印度尼西亚	荷兰	1949
利比亚	意大利	1952
柬埔寨	法国	1954
老挝	法国	1954
北越	法国	1954
南越	法国	1954
苏丹	英国-埃及	1956
摩洛哥	法国	1956
突尼斯	法国	1956
加纳	英国	1957
马来亚	英国	1957
几内亚	法国	1958
刚果共和国	比利时	1960
索马里	意大利	1960
尼日利亚	英国	1960
喀麦隆	法国	1960
马里	法国	1960
塞内加尔	法国	1960
马达加斯加	法国	1960
多哥	法国	1960
塞浦路斯	英国	1960
象牙海岸	法国	1960
上沃尔特	法国	1960
尼日尔	法国	1960
达荷美	法国	1960
刚果民主共和国	法国	1960
中非共和国	法国	1960
乍得	法国	1960

（续表）

赢得独立的国家	所摆脱的国家	年份
加蓬	法国	1960
毛里塔尼亚	法国	1960
塞拉利昂	英国	1961
坦噶尼喀	英国	1961
阿尔及利亚	法国	1962
布隆迪	比利时	1962
牙买加	英国	1962
卢旺达	比利时	1962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英国	1962
乌干达	英国	1962
西萨摩亚	新西兰	1962
肯尼亚	英国	1963
桑给巴尔	英国	1963
马耳他	英国	1964
马拉维	英国	1964
赞比亚	英国	1964
冈比亚	英国	1965
马尔代夫群岛	英国	1965
新加坡	英国	1965
圭亚那	英国	1966
博茨瓦纳	英国	1966
莱索托	英国	1966
巴巴多斯	英国	1966
南也门	英国	1967
毛里求斯	英国	1968
斯威士兰	英国	1968
赤道几内亚	西班牙	1968
瑙鲁	澳大利亚	1968
斐济	英国	1970
汤加	英国	1970
孟加拉	巴基斯坦	1971
巴林	英国	1971
不丹	英国	1971
阿曼	英国	1971
卡塔尔	英国	1971
阿联酋	英国	1971
巴哈马	英国	1973
格林纳达	英国	1974
几内亚比绍	葡萄牙	1974

(续表)

赢得独立的国家	所摆脱的国家	年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葡萄牙	1975
莫桑比克	葡萄牙	1975
佛得角群岛	葡萄牙	1975
科摩罗群岛	法国	1975
塞舌尔	英国	1976
吉布提	法国	1977
所罗门群岛	英国	1978
图瓦卢	英国	1978
圣卢西亚	英国	1979
基里巴斯	英国	1979
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英国	1980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英国	1980
安提瓜和巴布达	英国	1981
伯利兹	英国	1981
瓦努阿图	英法共管地	1981
圣克里斯托弗和内维斯	英国	1983
文莱	英国	1984
纳米比亚	南非	1990
马绍尔群岛	美国托管地	1991
俄罗斯联邦	苏联	1991
爱沙尼亚	苏联	1991
拉脱维亚	苏联	1991
立陶宛	苏联	1991
摩尔多瓦	苏联	1992
哈萨克斯坦	苏联	1992
吉尔吉斯斯坦	苏联	1992
乌兹别克斯坦	苏联	1992
亚美尼亚	苏联	1992
塔吉克斯坦	苏联	1992
土库曼斯坦	苏联	1992
阿塞拜疆	苏联	1992
格鲁吉亚	苏联	1992
斯洛文尼亚	南斯拉夫	199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南斯拉夫	1992
克罗地亚	南斯拉夫	1992
捷克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	(1992年12月31日解体)
斯洛伐克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	(1992年12月31日解体)

一、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的领导人都表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但实际上亚洲所有的殖民地都在战后 10 年内成为独立国家，而非洲所有的殖民地也都在战后 20 年内独立。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最初的殖民主义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前地衰落了：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则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情绪在各帝国国内也得到了发展。早先殖民地中的白人曾十分自信地断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如今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其臣民的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怀疑。1935 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就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因而西方全球霸权的结束既是由于它丧失了统治的力量，同样也是由于西方丧失了统治的意志。

在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刺激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就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西方的军事威望立马土崩瓦解。加之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而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占领地时，他们则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样赢得了自由，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是深化了从 20 世纪初起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一迅速发展的运动的势头(见第 37 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一运动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当地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并实现了其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考察了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等——这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改营中的服役，更是进一步促进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而 200 多万印度人则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 4 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会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最后，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二、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因为英国并未与他们协商。1942年8月7日国大党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英国的反



图251 印度妇女投票

一个蒙着头巾的妇女在印度农村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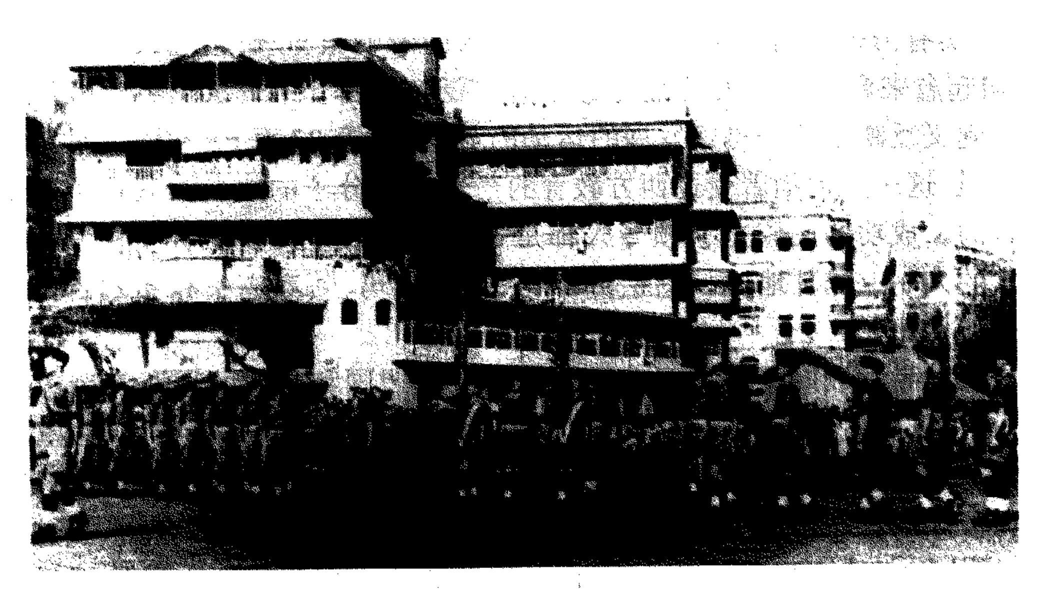


图252 英军撤出印度

最后一队英军撤出印度。

应是进行大规模的镇压：6 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所有的国大党领袖。在剩下的几年战争期间，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

1945 年 7 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成为印度事务中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工党历来都主张印度独立，此时艾德礼首相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他的政党的许诺和同情，事实是他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选择。英国不能再违背印度人民的意愿继续统治印度了，它也没有太多这样去做的欲望。战争期间，印度的行政机构人员已经愈来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而且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也早已经厌倦。因此艾德礼此时能在不太遭到国内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从前的“帝国明珠”之间的联系。

与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党派领导人仓促的会面和商谈结果表明，任何维持印度统一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因此 1947 年 7 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8 月 15 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成为英联邦中的两个独立国家。

三、东南亚

与印度不同，东南亚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人占领过。可以看出，在 1942 年至 1945 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种共同模式。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都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见第 41 章第 2 节）。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始。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如果当初日本人真能实践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够得到东南亚大部分民众的有力支持。然而日本军方却另有打算，因此这些原则很快就让人觉得是空洞的、没有说服力的宣传口号。这些军事领袖并没有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视为由处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一系列卫星国。由于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地依靠当地供应给养，结果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而且他们还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而反过来，他们能向当地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强大，无力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过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就迅速地恶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长他们的占领，他们无疑会遭遇大规模的起义。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 1945 年便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而且在许多地区他们都把武器分发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因而在日本人撤退后的 10 年内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也就不足为奇。各国赢得独立的方式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其各自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

印度的现实之后,在处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方面也是最现实的。1948年1月他们承认缅甸为英联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2月又准许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不过马来亚的独立却被延迟到了1957年2月,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的种族成分混杂,那里的马来亚人和华人各占总人口的40%多一点,此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数欧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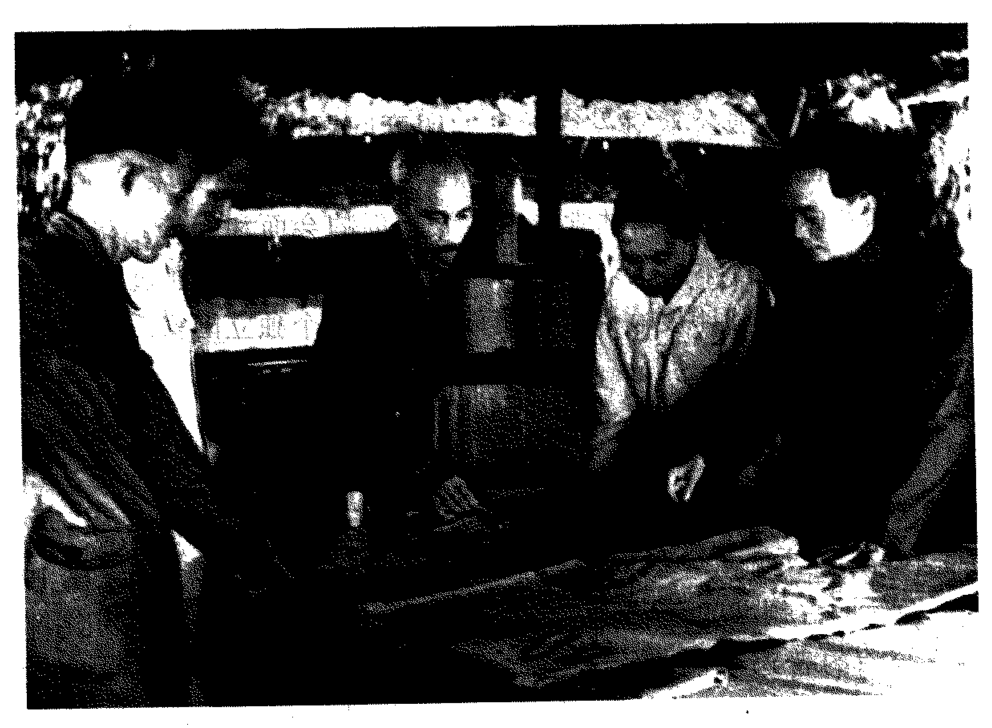


图253 胡志明

胡志明(1892—1969),中间立者,在1954年抗法战争中与他的顾问们在一起。

法国人和荷兰人的臣民也要求独立,但是由于法国人和荷兰人更加顽固,因此其境遇也就要糟得多。荷兰人愿意给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却不足以使他们满意。双方谈判破裂后,荷兰人便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一直进行到1947年,最后荷兰人还是承认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但是武装冲突的遗留影响却使以后两国的关系发生恶化。尽管在同一国王治下的荷印联邦存在了好几年,但它在1954年苏加诺退出后便解散了。在其后几年中,两国的关系因为荷兰人拒绝将荷属新几内亚交给这个新共和国而变得更加紧张。1957年印度尼西亚为了报复没收了荷兰人价值10亿多美元的资产,1960年它又断绝了同海牙的外交关系。三年后苏加诺控制了西伊里安,从而清除了一个比英帝国大部分地区还要古老的帝国的最后残余。

法国人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的战斗,但是最后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组成。越盟,即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了反对法国恢复其统治的抵抗运动。虽然越盟成分多样,但它却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国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胡志明领导。1945年胡志明宣布成立临时

的越南共和国。法国人拒不承认这一新政权，战争随即爆发。法国人轻而易举地就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场消耗战却旷日持久。

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把在财政上支持法国人作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 1954 年时北越大部分地区已处在越盟的控制中，同年法国人在奠边府遭到惨败。随即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承认了整个越南的独立，规定以北纬 17 度线为界将越南暂时划分为两部分，要求在国际监督下于 1956 年举行选举，以使国家重新统一。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给了胡志明半个国家，并使他期望在两年内得到另外半个国家，因为他在抗法战争中的经历已经使他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美国开始在南越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天主教领导人吴庭艳。吴庭艳的政策激起了农民和势力强大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致使 1963 年他的政权被推翻，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政变，直到华盛顿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绍先后掌权为止。他们二人之所以能在西贡坚持下去，仅仅是因为美国不断升级的干涉：先是以资金和武器援助，然后发展到派"顾问"、战斗部队和轰炸。尽管轰炸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水平并有 50 多万美军投入了战斗，但要想获得胜利却仍很渺茫。而与此同时战争拖得越久，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也就变得越强烈。

尼克松总统谋求通过与中国和苏联的秘密外交来平息反战浪潮。这一努力在他于 1972 年对北京和莫斯科所进行的广为人知的访问中达到高潮。最终双方于 1973 年 1 月 27 日在巴黎签订了停火协定，条件与 1954 年的《日内瓦协定》基本相同。这两个协定都要求将越南临时划分为共产主义的北方和非共产主义的南方；南越的前途由选举决定；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所有外国军队从所有印支国家撤军——法国在 1954 年，美国在 1973 年；协定还要求一个基本上没什么权力的小型国际委员会监督这两个协定的执行。

美国在 1973 年赢得了它自己在 1954 年所反对的东西，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一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46 000 名美国人战死，60 万南越平民和士兵死亡，北越死亡人数估计达到 90 万。这场战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包括军人吸毒、严峻的国内分裂、因高达 1460 亿美元的战争总支出造成的资金匮乏等而被忽视的日趋恶化的国内问题。但是 1973 年的《巴黎协定》也并没有最终结束战争——战争一直拖到 1975 年 4 月北越推翻腐败的南方政权。

四、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它在亚洲更引人注目。在亚洲，由于存在古老的当地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进行动员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而且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正如亚洲在战后第一个 10 年中获得解放一样，

非洲则在战后第二个10年中也获得了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在此后独立。由于非洲各地区民族主义觉醒的过程因其不同的历史背景而迥然相异，因此非洲殖民地革命不应被看作非洲大陆上的革命，而应被分别看作在热带非洲、南非和中东的革命。

不过即使在热带非洲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西非，一个基本因素是炎热和潮湿的气候，这阻挡了大批的欧洲移民。由于没有多少坚持与母国保留联系的欧洲移民，母国政府相对比较容易同意西非国家独立。黄金海岸的情况就是如此。杰出的非洲政治领袖恩克鲁玛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他在回国后建立了真正以民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会党。在根据新宪法于1951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该党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在黄金海岸的行政机构中给了恩克鲁玛一个更重要的职位。1957年黄金海岸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国。



图254 加纳的铁皮棚

加纳阿卡拉简陋的铁皮棚屋。这与现代都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热带非洲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失控。尼日利亚1960年的独立是最具决定性的，因为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周围的法属殖民地也受到了非殖民地化风潮的影响，到1960年年底时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殖民地都赢得了独立。

但在东非，事态的进程却截然不同。由于宜人的气候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那里通常被称为“白人的国家”。欧洲移民很快就占据了最好的耕地，而失去土地的非洲人则随即组织了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茅茅”。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移民们强烈支持政府对“茅茅”的镇压。斗争旷日持久，在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后英国人才认识到，企图在西非执行和解政策而在东非推行强硬政策是徒劳的。

因此，他们释放了东非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东非人的人类学著作，因涉嫌同情“茅茅”运动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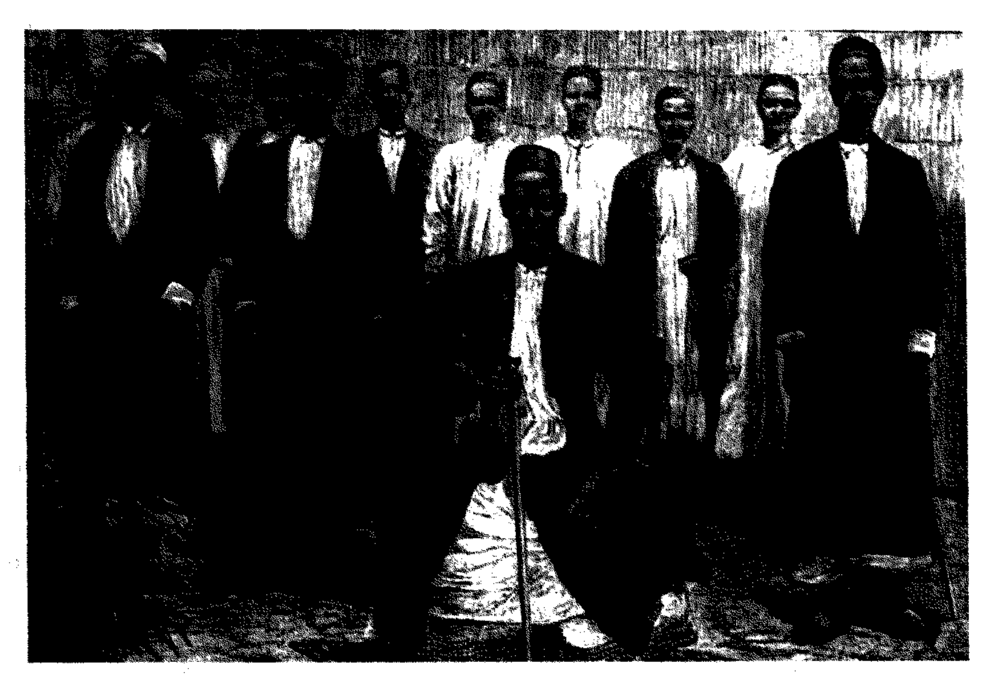


图255　乌干达国王

乌干达国王穆提萨和他的朝廷。他以精明过人、外交手腕高超、实行独裁统治、常有残暴的举动而著称，他是少数几个能够维持一个强大而成功的军队和朝廷的非洲统治者之一。他的军队和朝廷使他能够有效地打消埃及和英国侵犯他的领土的企图。

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肯尼塔在被释放后像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并于1963年成为肯尼亚总理。同年，肯尼亚在内罗毕为获得宝贵的自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正式成为独立的国家。

五、南非

当我们将目光从东非转到南非我们发现，南非也和东非一样经历了冲突和暴力，并且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大量欧洲移民的存在。实际上，南非是1652年荷兰人在好望角登陆时开始成为欧洲的殖民地的。荷兰人殖民的目的是为了给荷兰船队提供它们在绕过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的漫长航程中所需要的给养（水、肉类和蔬菜）。随着荷兰的衰落，1814年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海角上这个孤零零的据点。但是荷兰定居者，即布尔人，却拒绝接受新的帝国当局——他们北上建立了独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由于1871年和1886年在这两个地方发现了钻石和黄金，英国人遂出兵占领了这两个共和国，结果则爆发了布尔战争（1899—1902年）。最后布尔人接受了英国统治，作为回报英国人则给予他们自治权。1909年英国人兑现承诺，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

半个多世纪以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脱

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亚非新成员国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参与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班图斯坦只占南非14%的土地,而非洲人却占南非3 170万总人口(1984年)的73.8%。白人只占14.8%,欧洲裔的移民后代占白人的五分之三。其他种族成分是混血人种(9.3%)和亚裔(2.9%)。

南非的白人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因为议员构成的分配比例有利于他们占优势的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予非白种人同等机会他们就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是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项不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的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那么整个南非的经济都会崩溃。除了混血种人和印度人的劳动力外,非洲劳动力也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他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连三分之一的非洲人都不能养活,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而最重要的则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是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他们要求在南非联邦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图256 曼德拉

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总统,从而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和关押了他28年的白人少数政府。

种族隔离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南非得以长存,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拥有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正如在对沙佩维尔(1960年)和索韦托

(1976年)的黑人抗议进行大屠杀所表现出来的一样。这一战略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很有效,但是此后来自国内外的一波波反抗浪潮就开始真正威胁到种族隔离制度。反抗包括几个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愤怒的一代"——完全被疏离的年轻黑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黑人工会,他们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斗争中利用了与白人雇主谈判的权利。这些反抗造成的混乱促使南非的商人们公开呼吁取消种族隔离制,甚至要求会见被囚禁的非洲国民大会党领袖。同样,南非的神职人员,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戴斯芒·图图主教也拒绝种族隔离制度,他批评政府利用"法律和秩序"和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压制黑人政治诉求的借口。

最后比勒陀利亚政府还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外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教会、学校和工会界的反对。这种强烈的反对导致美国政府在1985年9月采取了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措施,包括禁止贷款、出售计算机和进口克鲁格金币。彼得·W.博萨顶不住这种压力,于1989年辞职。

博萨的战略是依赖政府占优势的武力来对付没有选举权的黑人,强制推行"伟大的"种族隔离战略,但是他的继任者德克勒克却宣称,必须在占大多数的黑人的"一人一票"的要求和白人"永远不给"的反应之间找到一条调和的道路。1990年2月德克勒克开始了他对这种道路的探索:使非洲国民大会党合法化,释放已被关押28年的该党领袖曼德拉。德克勒克甚至走得更远:他宣称未来的南非应该实现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当然他补充说必须在赋予选举权的时候保证"权力制衡",以保护包括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尽管存在着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但是最终结果却证明,通过举行一次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4天自由选举,和平地走向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和民主的新南非仍是可能的。1994年4月下旬选举举行,曼德拉的非洲国民大会党赢得了62.7%的选票(新议会中的252席),德克勒克的国民党得到30.4%的选票(82席),以祖鲁人为主的因卡塔自由党获得了5.8%的选票,而由前军队领导人康斯坦·维留恩(Constand Viljoen)领导的支持建立白人家园的自由阵线则只得到2.8%的选票。曼德拉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成为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作为第二大党的领袖成为副总统。

新南非与其实行宗族隔离的前身的对照十分鲜明。新南非宪法明文规定:"需要创立一种新秩序,使得所有的南非人都能拥有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立宪的国家的公民权,不分男女、种族,一律平等,都有权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

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人们不应忘记,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白人利用奉为圭臬的美国南部黑人隔离法建立起来的,南非人民成功地超越了这种隔离主义的传统。而就在他们取得胜利的同时,在美国的洛杉矶,黑人罗德尼·金在经历了毒打、暴乱和抢劫之后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真的能够和睦相处吗?"

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还不能说南非人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双方

的领导人都受到来自外界的鼓励,他们已经向答案迈出了第一步。当然今后它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新南非继承的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1990年白人控制着87%的土地和95%的生产工具,而为满足白人社会需要的人均政府支出则比黑人要高出5—6倍。[1] 因而毫不奇怪,从这种舒适安排中受益的人们是不可能不经过激烈的抵抗就放弃其特权的。

六、中　　东

中东的动乱和暴力甚至比非洲更为突出,不过其基本原因却并不是外来殖民者的入侵,而是由于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各种宗教的固守己见和对立的教义而发生冲突。

这种敌对在巴勒斯坦表现得尤其明显。上文已经提到,一战后巴勒斯坦已经成为三种对立的利益即犹太复国主义渴望、阿拉伯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主义关切的目标之间的战场。在二战中和希特勒在欧洲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这些利益的冲突日益被激化。种族灭绝引起了要求向绝望的犹太幸存者开放巴勒斯坦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阿拉伯联盟立即反对,但联合国大会却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分开。第二年犹太人根据这一划分决议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它被称为以色列。杜鲁门迅速地承认了这个新国家,但是阿拉伯人也同样迅速地派军队越过了以色列边界。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与人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以色列人不仅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而且还向前推进占领了比联合国大会决定分给他们的还要多的领土。阿拉伯人要求归还土地,以色列人则坚决拒绝,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在一场阿拉伯人发起的战争中赢来的土地,而且这些多出来的土地也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犹太移民所需要的。

这一问题形成了僵局,并引发了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这种恶化的趋势直到1993年9月13日才被遏止——至少是暂时的——这一天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签署了一个协定。协定呼吁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临时机构,“在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时期”代表加沙和西岸,并“将找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协定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搞了一些情绪化的集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反对协定的利库德联盟的领袖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充满激情的演说:“拉宾先生,你说的话是对希伯伦400名犹太人的蔑视。我要告诉你,不只是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是它4000年的历史将我们牢牢地系在这块土地上。你说《圣经》不是我们的契约,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圣经》是我们的训令,我们的契约。”[2]

这种政治规则和宗教戒律式的表述在另一方——诸如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图 257　巴以和谈

1993 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图为以色列首相拉宾和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正在握手，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旁边看着这一幕。

斯、伊斯兰圣战或真主党之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也被复制。这些组织更加激进好战，因为它们基于宗教原则拒绝接受巴解组织的意愿——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哈马斯组织的宪章中说："所有巴勒斯坦领土都是一种永远属于穆斯林的财产。"——内塔尼亚胡关于"我们的训令"和"我们的契约"的伊斯兰版本。

这种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的全部含义在 1995 年 11 月 4 日表现了出来。这一天一个犹太教学生伊戈尔·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枪杀死了拉宾总理。阿米尔反复解释说，他的目标是阻止拉宾实施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协议。"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的上帝……(与巴解的协议)引起的损失将是不可逆转的……我只是按上帝的旨意行动，我不会后悔。"[3]

"不后悔"同样也是因参加一次袭击行动杀害了一个犹太定居者而被称为英雄的阿比尔·威海蒂的反应。当从狱中获释后有人问她是否后悔时，她说："当然不。他是一个定居者，这里是被占领土。他们在这里的存在是非法的，这是对非法占领的合法抵抗。除此之外，别无他途。"[4]

推荐读物

分析二战后殖民地革命的著作有：R. Emerson 所著的 *From Empire to Nation*：

The Rise to Self 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1960); D. Horowitz 所著的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Penguin, 1969); L. Kaplan 编著的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Vintage, 1973); R.J. Barnet 所著的 *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 (World, 1968)。

关于印度赢得独立的过程,请参考 M.J. Akbar 所著的 *Nehru: The Making of India* (Viking, 1989); V.P. Menon 所著的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7)。漫长的越南战争激发了诸多研究,以下著作是最新进和最有价值的: General B. Palmer, Jr.所著的 *The 25-Year War: America's Role in Vietnam* (Simon & Schuster, 1985); G.M. Kahin 所著的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Knopf, 1986); G. Kolko 所著的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Pantheon, 1986)。

关于非洲的觉醒,请参考 I. Wallerstein 所著的 *Africa: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Random House, 1963); P. Gifford 和 W.R. Louis 编著的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 Decolonialization, 1940—1960* (Yale University, 1982); R. Emerson 和 L. Killson 编著的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of Africa* (Prentice Hall, 1965); R.I. Rotberg 和 A.A. Mazrui 所著的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1972)。

关于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崛起,请参考 G. Lenczowski 编著的 *The Political Awak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Prentice Hall, 1970); A. Home 所著的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Viking, 1977); P.J. Vatikiotis 所著的 *Nasser and His Generation* (St. Martin's Press, 1978); A. Hourani 所著的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下列著作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T. Draper 所著的 *Israel and World Politics* (Viking, 1967)和 *The Israeli-Arab Reader* (Bantam Books, 1969); E.W. Said 所著的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Times Books, 1980); M. Benvenisti 所著的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Villard, 1986); D.K. Shipler 所著的 *Arab and Jew: 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 (Times Books, 1986); Y. Harkabi 所著的 *Israel's Fateful Hour* (Harper & Row, 1988); T.L. Friedman 所著的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注释

1.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 1990.
2. *New York Times*, October 6, 1995.
3.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1995; March 28, 1996.
4.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1997.

在战时并不难保持团结，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彼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分裂。

——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43章　大同盟、冷战及其后果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导致了革命对西欧的威胁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尽管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但是革命却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其原因之一就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六年来他们经常遭到空袭，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许多人还因逃难、作苦力或被监禁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战争中被杀死的士兵超过1500万，平民则有1000万，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这一伤亡数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数字的2倍，所蒙受的物质损失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物质损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都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动荡。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的家园。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援机构将1200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各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随之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得大多数欧洲人因为疲惫不堪和士气低落而不想革命。

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对整个欧洲的占领。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的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是一种由莫斯科指挥的、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非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而也正是这三大强国应该对逐渐破坏战时的大同盟和引起冷战的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争期间,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其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1]

两个月后,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在宪章中,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措辞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6月,美国和苏联又签订了《美苏租借协定》。这两个条约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8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此时断定共产国际已经没有价值。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都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继续在那里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之后,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够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还将会更加严重。

但是在临近战争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却开始发生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国家利益而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却因其内部不和而分裂了,并在两、三年内便被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更是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到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经无法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撤离巴尔干半岛,而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促使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作为缓冲地带,划入英苏的共同势力范围。这样丘吉尔基于不利的战略形势也就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优势地位。

丘吉尔和斯大林瓜分巴尔干半岛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于 1944 年 10 月 9 日在莫斯科会晤。丘吉尔留下了以下绘声绘色的描述，讲述了两人当时是如何划分英国和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的。*

看来是谈正事的时候了，于是我说："让我们开始处理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事务吧。你们的军队正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我们在那里有利益、传教士和特工。我们别在小问题上纠缠不已。就英国和苏联而言，你看这样分好不好：你们在罗马尼亚有 90% 的压倒优势，我们在希腊有 90% 的发言权，我们在南斯拉夫平起平坐？"翻译正在译这些话时，我将这种划分写在半张纸上：

罗马尼亚	
苏联	90%
其他国家	10%
希腊	
英国(和美国一道)	90%
俄国	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苏联	75%
其他国家	25%

我将这张纸推给正在听翻译的斯大林。稍微停了一会儿，他拿起蓝色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勾，又将它推回到我这边。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确定它的时间不会比写的时间长……

此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写着铅笔字的纸停在桌子中间。过了一会儿之后我说："我们用这种非正式的方式确定了这些关系到数百万人命运的问题，这是不是有点荒谬？我们还是烧了这张纸吧。""不，你留着它吧。"斯大林说。

* W.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Houghton Mifflin, 1953), pp. 227—228.

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后撤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却发现希腊抵抗力量已经抢在他们之前占领了

所有城镇。不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力量并没有阻挡英军,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实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方针。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就能像民族主义者铁托一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力量一味顺从,但事实却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这对丘吉尔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为了确保实现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这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一致的),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把国家政权转到他中意的希腊皇家流亡政府手中就是至关重要的。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都给提了出来,但却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争端最终促成了一场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在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力量撤离了该地区。

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扎条约》)。该协定规定,抵抗力量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允诺在希腊进行选举并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样丘吉尔也就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力量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了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



图258 雅尔塔会议

1945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在雅尔塔最后一次会晤。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碰头，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这时已经不得不对有关战后解决方案的种种问题进行专门而务实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未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做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应将德国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其中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

在雅尔塔所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经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看来，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边界，苏联将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在一战后划定，但随后就被遗忘。波兰将从德国东部领土中得到补偿。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将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加以扩大，接受亲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不过一个笼统的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则从理论上打消了流亡政府代表的疑虑。通过这一宣言，三大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能广泛代表所有民主人士，能保证通过自由选举尽快成立关心人民意愿的政府的临时政府机构……”

从表面上来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并不重要。事实证明，《宣言》毫无意义，而且是发生摩擦的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的解释极为不同。美国按照字义解释了这一《宣言》——即可以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没有势力范围。美国可以自由地采取这种立场，因为前一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

相反，斯大林则坚持遵守《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因而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力量时，他完全保持沉默。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够尊重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优势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他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三国会议上变得十分清楚。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要求自由选举时，斯大林的反应是：“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2]“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大同盟在此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尽管已经埋下不和的种子，人们还是普遍对雅尔塔会议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大同盟的顶峰。战时同盟国的合作还表现在联合国的成立上。在1945年4月至6月

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的宪章。到1990年时，会员国的数目已经是最初的三倍。新会员国中有些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都是亚非新独立的国家。同其前身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妥善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还是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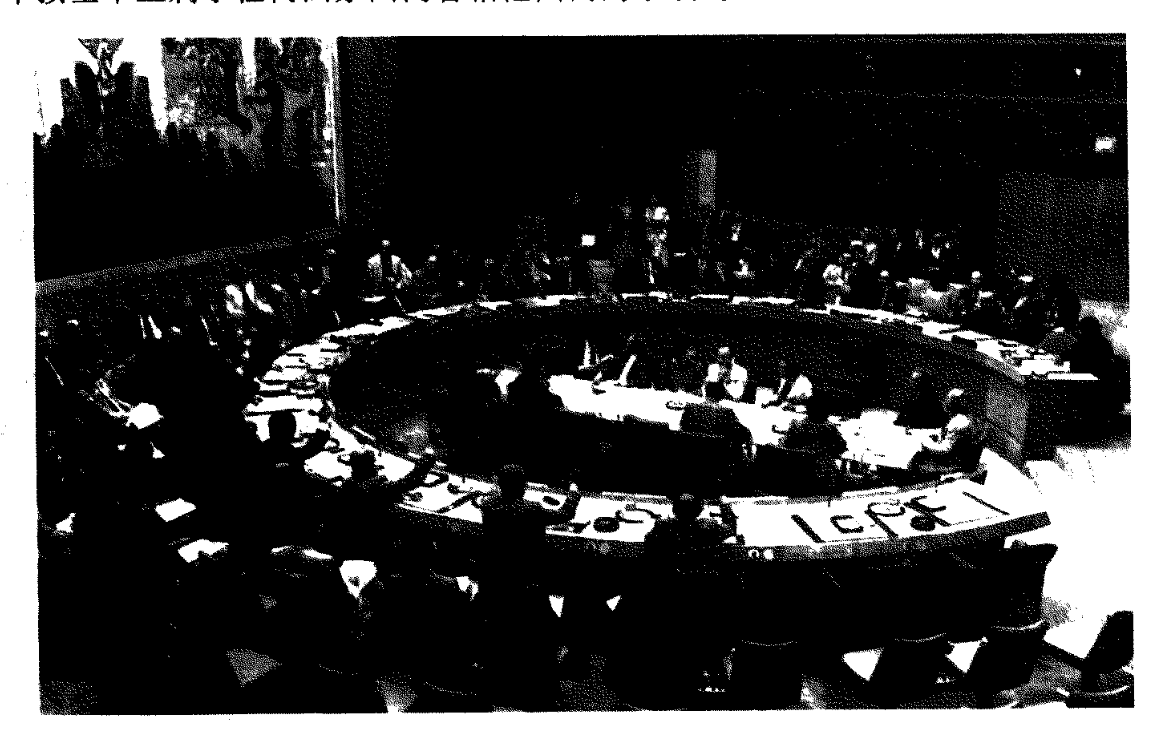


图259 联合国安理会

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开会。

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和6个经联合国大会推荐，由联大选出，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所有实质性的决议都必须经过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因为人们认识到只有大国意见一致时才能维护和平。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一理事会制定了种种计划，目的是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的人提供更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疟疾患者，拯救占儿童总数40%的、不满一岁就死去的婴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总数一半的文盲。

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各种非政治性活动都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在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上的成绩却也是时好时坏。它通过成为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而帮助防止了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它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克什米尔这些地区的战争，但是它却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埃

及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即"灌木丛火"战争。而且在1962年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和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联合国也没有举行任何磋商。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同国联一样: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端的机器,但却不能下令使用这台机器。

在联合国成立两个月后日本投降,远东战争就此结束。这也使得获胜的同盟国能够专心致志地建立和平。1947年2月10日他们的外交部长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所有的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边界。

二、欧洲的冷战

在签订了和约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这种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的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要求对权力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再调整。而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调整也是很困难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的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在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权力关系再调整也就变得更复杂、更危险。随即到来的冷战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状况太糟,使得许多穷困的农民都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国际形势日益恶化,使得苏联集团唆使援助游击队来反对英国支持的雅典政府。

这种情况促使民众大力支持起义。起义从北部山区蔓延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一些较大的岛屿。镇压起义的可能性看起来很小,因此希腊面临着长期内战的前景,并存在着共产党最终获胜的可能性。为了应付这一紧急情况,杜鲁门总统宣布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则。他说"希腊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胁,"他要求国会拨出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就这样,美国负起了阻止共产党在地中海东部扩大其影响的责任。

事实证明,这一任务远比预料中的还要艰巨。在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间,美国大约花费了4亿美元军费和3亿美元经济援助。但是尽管希腊政府军得到了如此慷慨的援助,它却还是不能制服敌人。1949年这种均势发生了有利于希腊政府军的决定性的转变。由于铁托元帅与斯大林闹翻,他封锁了南斯拉夫边境,阻止苏联向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而与此同时,雅典军队为了打一场灵活的进攻战而不是固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也正在重新接受美国军官的训练。因此1949年秋政府军得以将游击队赶出他们的山区据点,并能到达和封锁北部边界。

在经济领域中,与杜鲁门主义相似的是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到1951年12月31日这一计划终止时,美国为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总共支付



图 260 冷战始作俑者

杜鲁门总统正欢迎国务卿马歇尔从欧洲归来。杜鲁门和马歇尔是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

了125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投资和欧洲的人力物力一起,使欧洲得以迅速复原,并使其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是从东西方关系这一角度来看,马歇尔计划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1949年1月莫斯科设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将它作为东欧的与马歇尔计划的对等物。

这样共产党世界和西方世界就被区分开来了。此时冷战已经全面展开,在随后的5年中一个又一个危机不幸地接踵而至。一方采取行动,对方就会采取反行动,这些行动和反行动最终在两个对抗性的军事集团建立时达到了高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称北约(1949年4月),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5月),其成员国有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国。因此欧洲也像德国一样被冷战切成了两半。

三、远东的冷战

1950年冷战的焦点由欧洲转移到远东。这时在欧洲东方与西方已形成均势。但远东的均势却被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所打破。正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副产品。

蒋介石早在 1928 年就已成为中国的主人，但从一开始他的国民党政权就受到了其两大不共戴天之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处境更是变得格外艰难。

1945 年 8 月日本的投降使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接管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而展开了激烈争夺。共产党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接管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蒋介石则立刻取消了这些命令，宣称没有他的命令共产党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但共产党人并不理睬他的命令，于是在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共产党人占领了大城市周围的农村。他们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苏联人将日本人在“满洲”交出的武器转交给他们。民族主义者则由于得到了美国海、空军在运输方面提供的帮助而占领了各大城市。

1948 年底共产党军队从“满洲”突然发起猛攻，攻克了华北各大城市。到 1949 年 4 月时他们已在横渡长江，成扇形向华南地区展开。共产党在南方的发展速度甚至远快于其在北方，到 1949 年年底时它已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逃往台湾岛，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在欧洲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远东也出现了冷战。但是当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冷战也就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国介入前为第一阶段，中国介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时，朝鲜军队长驱直入到离半岛南端的釜山港不到 50 英里的地方。此后，1950 年 9 月 14 日，一支美国军队在北方离三八线很近的仁川登陆，并在 12 天内夺回了韩国首都汉城。朝鲜军队因其交通线被切断而不得不仓促地后撤，正如他们先前轻率地向前推进一样。到 9 月底时，联合国军队已经到达三八线。

当时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由于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已经回到了安理会，这一问题便被转交给联合国大会。1950 年 10 月 7 日大会决定“……为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政府而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地占领了朝鲜首都平壤。到 11 月 22 日时，他们已经到达了朝鲜和中国东北之间的分界线鸭绿江。

此时，随着中国“志愿军”在苏联制造的喷气式飞机的支持下发起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迅速南进，看上去就像在重复战争的第一阶段。1951 年 1 月初他们重新占领了汉城，但是联合国军队这时又恢复并坚守住了阵地。3 月汉城再次易主，到 6 月时战线大体上维持在三八线一带。

到 1951 年年中时，整个战线已明显处于僵持状态。经过两年激烈的、时常中断的谈判之后，交战双方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条款反映了军事上的僵持状态：朝韩之间的分界线大体上仍与战前相同。西方列强成功地遏制了朝鲜的共产主义，而中国人则保卫了朝鲜，使它成为“满洲”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缓冲国。当时朝鲜南北的大部分农村都已遭到破坏，并有大约 10％的朝鲜人被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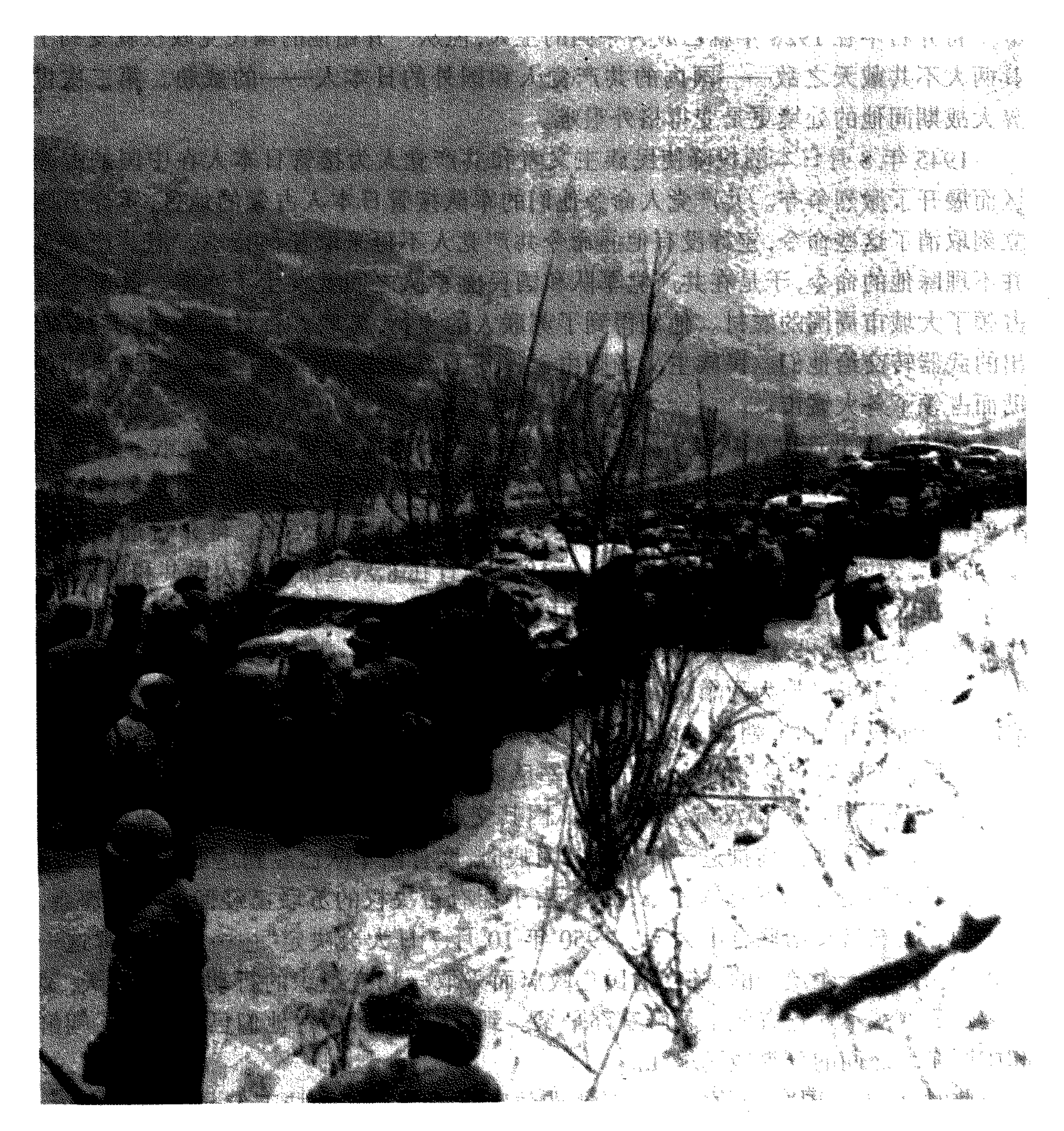


图261 朝鲜战争

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既要与朝鲜和中国的军队作斗争,还要和恶劣的气候斗争。朝鲜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冰雪和寒冷帮了中国军队的大忙,1950年11月他们因此而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并把美军赶回了韩国。

四、冷战结束

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西欧和东欧国家都被迫求助于两个新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

联。在军事上，西欧依赖美国组织的北约，东欧则依赖苏联组织的华约。在经济上，西欧依赖美国资助的马歇尔计划，东欧则依赖苏联组织的经互会——它在理论上来说应从苏联获得援助，但实际情况却正相反。

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主导地位被接受的原因是，面对冷战产生的压力他们的支持是必要的。但到 1953 年，冷战在爆发几年后开始冷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 1953 年斯大林的去世——他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偏执和僵化。接替他的年轻一代准备在缓和国内独裁统治的同时也缓和国外的冷战。而与此同时，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在美国接替了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利于国际“解冻”，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够在朝鲜实现妥协的和平，而杜鲁门政府则会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很难实现这一点。因此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结束，也消除了当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最严重的一个根源。

8 月，苏联政府宣布说它也掌握了制造氢弹的秘密。矛盾的是，这一声明却加强了和解的势头。人们都知道，美国在比基尼岛爆炸的氢弹的威力是它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 750 倍，广岛的那一颗杀死了 78 000 人。因而除了狂热的冷战斗士，人们都感觉到战争不再是国家政策的可行性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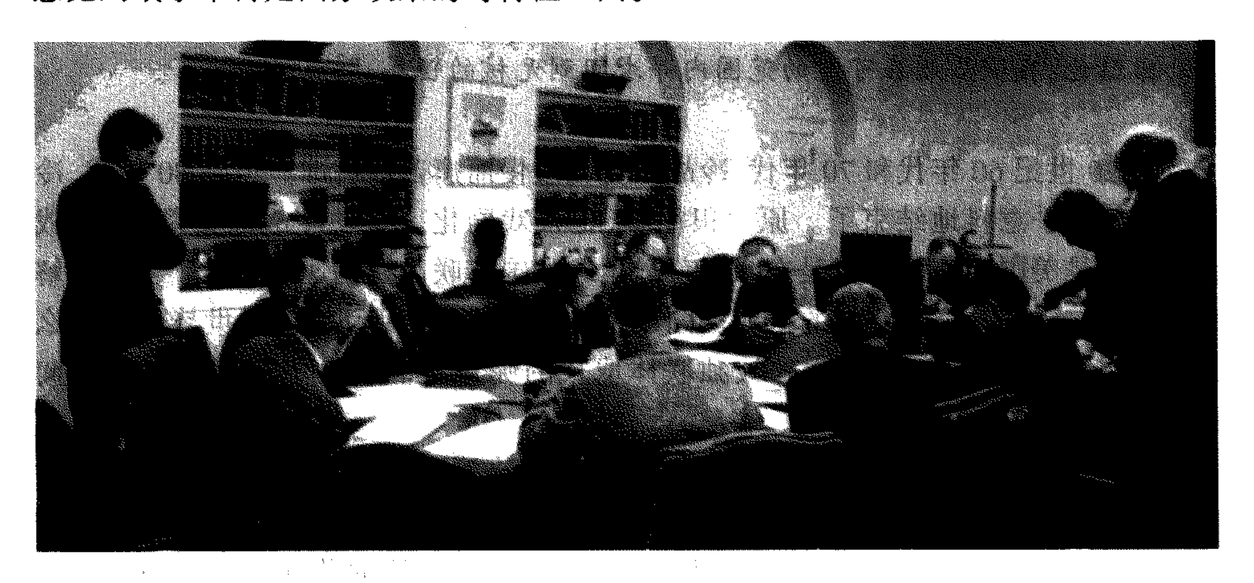


图 262　古巴导弹危机

在古巴发现了苏联导弹之后，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助手们召开了一个冗长而又累人的会议，探讨各种可能的反应措施。本图显示总统(右起第二人)倚在桌上，他的兄弟、最高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左边踱步。

氢弹的威慑效果在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了出来，此后更是有所加强。美国空军情报显示：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很快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处于这些导弹的射程之内。1962 年 10 月 22 日肯尼迪总统明确宣布“封锁”，阻止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并要求苏联拆除战略导弹。但是它却没有要求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甚至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御导弹。当一艘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了航向，美国在查出一艘苏联油轮没有运载进攻性武器之后予以放行时，两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事实便很清楚了。最后，10 月 28 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经命令苏联撤

回导弹,在联合国监督下拆除所有在古巴的苏联基地。作为回报,美国结束封锁,保证不会侵略古巴。

尽管古巴危机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它确曾一触即发。当时的情形是如此凶险,以至于它催生了一些限制核武器的协定:控制核武器试验的协定(1963年);禁止外空核武器的协定(1967年);拉美无核区的协定(1967年);在现有核国家以外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1968年);海底禁止核武器的协定(1971年);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协定(1971年);第一个西方—苏联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2年)。这些协定实质性地缓解了冷战期间的紧张局势。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时候确实是千钧一发,其惊险程度甚至连当时被吓坏了的世界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1989年7月,当美国和苏联官员在莫斯科会面,回顾和反省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一切才都变得清楚起来。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从莫斯科讨论中得出以下结论:

> "导弹危机充满了错误信息、错误判断、错误计算……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回到无核的世界。"[3]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冷战一直在缓慢而痛苦地解冻。但到80年代,冷战却突然出乎意料地结束了。原因很简单,也很戏剧化。发动冷战需要两方,二战后这两方是美国和苏联。但是在80年代,超级大国苏联已经迅速衰弱到了实际上解体的程度。看到苏联从我们的世界地图上消失而被独联体所取代,举世皆惊。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又是如何解体并被独联体取代的呢?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这个问题。

与苏联解体一样令人吃惊的是苏联和中国的决裂。当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时候,苏联迅速地承认了这个国家。包括英国和印度在内的十几个国家也都这样做了。但是美国则继续承认流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因而转向莫斯科,并于1950年与对方签署了一个有效期为30年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该条约规定,苏联将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开始进行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同盟开始显露出一些分裂的迹象。这个共产党世界内巨大而宿命的分裂的根源似乎部分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部分则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两国间的问题出现在诸如边界划分这样的传统利益方面。在苏联地图上曾经有过对两国间2000英里边界的精确划分。而在中国地图上,有些边界则标明"未划定",它们包括帕米尔高原、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些岛屿和几乎全部与蒙古的边界。这些领土从前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在19世纪被沙俄吞并,现在中国共产党主张拥有其主权。双方沿着这些有争议的边界线发生了许多武装冲突。



图 263　中苏交恶

1958年毛泽东与苏联主席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交谈。到此时中苏已经开始交恶了。

在中苏争端的最初，似乎意识形态问题比起边界问题要更为重要。中国多年的革命斗争已经催生了一种新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一种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个人行为受为社会服务的愿望而不是私利驱使。因此尽管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在继续工业化和提高生产率方面是成功的，毛泽东还是不愿意接受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和这些计划的基础——官僚精英主义。这可以解释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的口号是“没有官僚的组织”和“为人民服务”。苏联人认为这是笃定要失败的乌托邦式浪漫主义。这是他们停止向毛泽东提供援助的一个原因。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毛泽东的继承者发起了“现代化”运动，不仅采取了以前被视为“修正主义者”的措施，而且还沿着这条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得更远——甚至走到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些措施包括废除人民公社，恢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在工厂里以个人经理取代革命委员会；奖优惩劣；从工业的自力更生转向大量进口产品和技术。

毛泽东以后时代的举措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世界。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也已不再是与西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亲密盟友，相反他们正在寻求满足本

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的实用经济战略方面相互竞争。冷战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让位于一个十分不同的世界，这一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成型并将持续到21世纪。

推荐读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的外交是很多历史学家辩论的题目。持传统观点即苏联应为冷战爆发负主要责任的研究有：H. Thomas所著的 *Armed Truce: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6* (Atheneum, 1987)；R.J. Maddox所著的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3)；J.L. Gaddis所著的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1973)。修正派则认为西方应负主要责任，或至少比苏联负更多责任。最早详细阐述这一观点的是D.F. Fleming所著的 *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1917—1960*, 2 vols, (George Allen & Unwin, 1961)，这篇论文的观点在下列研究成果的阐发下不断丰富起来：G. Kolko所著的 *The Politics of War: The World and U.S. Foreign Policy 1943—1945* (Random House, 1969)；W. La Feber所著的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John Wiley, 1968)；T.G. Paterson编著的 *Cold War Critics: Alternatives to American Policy in the Truman Years* (Quadrangle Books, 1972)；N.D. Houghton编著的 *Struggle against History: U.S.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Simon & Schuster, 1972)；B.A. Weisberger所著的 *Cold War, Cold Pea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since 1945* (Houghton Mifflin, 1984)。关于杜鲁门主义和近东的情况，请参考B. Kuniholm所著的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0)；L.S. Wittner所著的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82)。最后，R.L. Garthoff所著的 *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 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Brookings, 1985)检视了1966年以来的美苏关系。

关于美国的远东政策，以下著作观点各不相同：Y. Nagai和A. Iriye所著的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1977)；Tang, Tsou所著的 *American'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W.I. Cohen所著的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John Wiley, 1971)；B. Cumings所著的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J. Halliday和B. Cumings所著的 *Korea: The Unknown War* (Pantheon, 1988)。

关于全球两极体制的终结，请参考W.S. Vucinich编著的 *At the Brink of War and Peace: The Tito-Stalin Split in a Historic Perspective* (Columbia University, 1982)；W.G. Rosenberg和M.B. Young所著的 *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1982)；R.J.

Barnet 所著的 *The Alliance: America, Europe and Japan* (Simon & Schuster, 1983)。

注释

1. W.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rand Alliance* (Houghton Mifflin, 1950), p.373.
2. P.E. Mosely, "Face to Face with Russia," *Headline Series*, No.70 (July-August 1948), p.23.
3.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1989.

我们正处于人们迄今所知最大的技术革命之中，这一革命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远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变革或早期的工业革命更深刻，当然也更迅速……

——C.P.斯诺，1966 年

第 44 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当代的一些重大问题，是所有社会的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1985 年，为了不顾一切地追求安全，大约有 10 000 亿美元被投资于军备。但是，钱花得越多就越不安全。两个超级大国已经积聚了最大规模的武器储备，可是美国人和苏联人同小小的瑞士或斯里兰卡的人民一样不安全。同样，失业和贫穷通常是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关的两大灾难，但是今天，不仅仅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西欧和北美的千百万人也在深受其苦。生态环境的恶化通常归因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短视政策，这些国家准许人们伐光国内的热带森林，让沙漠占据可耕地，然而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美国中西部的表土就像沙尘暴时代一样继续遭受侵蚀；加利福尼亚肥沃的中央谷地的一部分正在变成含盐的沙漠；在美国东北部、加拿大东部和欧洲北部，酸雨正在使森林变成褐色，使湖泊变成毫无生气的蓝色，更不用说伦敦、巴黎和科隆的一些著名纪念碑遭到侵蚀了。

那么这些给全球各地带来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起作用的力量有很多，但最基本的力量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第 26 章里我们已经着重提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对欧洲地区和非欧洲地区的决定性影响，今天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更要深刻得多，迅速得多，而且遍及方方面面。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先来考察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起源和性质，然后分析其对世界各地区和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和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多项技术突破,这几项重大技术突破的意义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值得将它们归类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实例:核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发了诸如蒸汽动力、电和汽油发动机之类的新能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墨西哥沙漠里的一声爆炸标志着人类掌握了核能。随着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核能首先被用于军事目的。今天,核能已被用于许多其他目的,如核动力船、生物医学研究、医学诊断和治疗以及核动力工厂。

实例:取代劳动力的机器。第一次工业革命制造了节省劳力的机器,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正在制造取代劳动力的机器。这些新机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在二战期间使用的高射炮台,这些炮台里装满了计算机——电子存储器和指示机器如何对储存的资料进行加工的程序的结合体。因为有了微型半导体即芯片,计算机的体积也就可以比过去更小,运算也更快。它们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被用于电站、写字楼、超市的收银台、纺织厂、电话交换机和工厂的生产线。计算机是机器人的"大脑",今天这些机器人可以从事焊接、油漆、搬运物资等工作,明天它们还可被用来做家务。

实例:航天科学。当德国人用他们的 V-2 火箭轰炸伦敦时,他们是在使用几年后带领人类走向航天时代的武器。1957 年 10 月 4 日俄国人把人造卫星 1 号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这是人类第一次冲破重力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探测宇宙空间。当时还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见这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宇宙空间为制造商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如失重、无边无际的真空以及超高温和超低温,从而也就产生了很多计划,有的是为了建造自动化太空制药厂,以生产各种疫苗和纯组织培养液,有的是为了建造自动化太空工厂,以生产电路中使用的近乎完美的晶体,有的是为了建造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通过微波将能量传送到地球。更为前卫的是美国物理学家杰拉德·K.奥尼尔和前苏联天体物理学家 I.S.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预测,他们预测人类将在宇宙空间建造巨大的平台或岛屿,在其上生活的人最终也许将会比在地球上住的人都还要多。

实例:基因工程。1953 年科学家们发现了 DNA(脱氧核糖核酸)这种携带所有生物遗传密码物质的化学结构。自从学会通过 DNA 阅读基因信息以来,科学家们还学会了通过切断和拼接基因,通过让动物和人的基因在细菌体内繁殖,甚至通过在试管里制造全新的人造基因,来编写他们自己的基因信息。因此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阅读并修改基因密码,并创造出新的基因密码来。其实人类从大约 10 000 年前开始驯化动植物起就一直在对基因施加影响,但是现在这种影响已经变得直接而迅速。科学家现在不是在动植物中经过许多代后作出选择,而是在一个个单独的基

因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处置。这种基因工程为新的农业革命创造了种种可能性。在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已经创造出胰岛素、生长激素以及包括一种防止牛患上严重传染病口蹄疫的疫苗在内的若干新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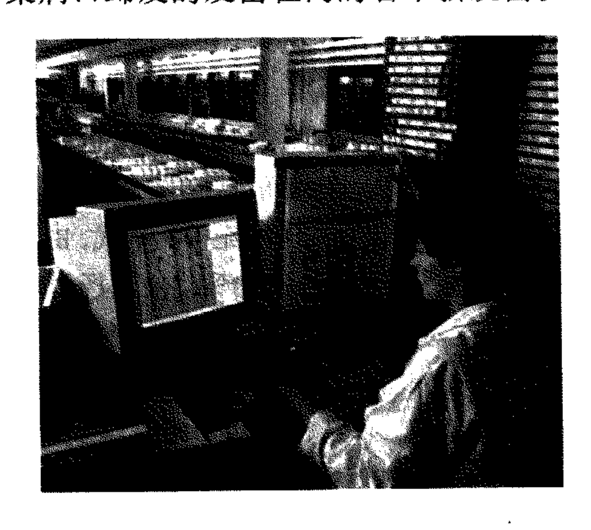


图264　基因检测

科学家们对基因在促进严重疾病的逐步成长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的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多。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进行一场检测以预测你自身的长期健康吗?

实例: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两部分:积累信息和传播信息。今天积累知识的速度是空前的和爆炸性的——仅世界各地每24小时公布的科学信息的数量就足以填满7套24卷一套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样空前的和爆炸性的是用计算机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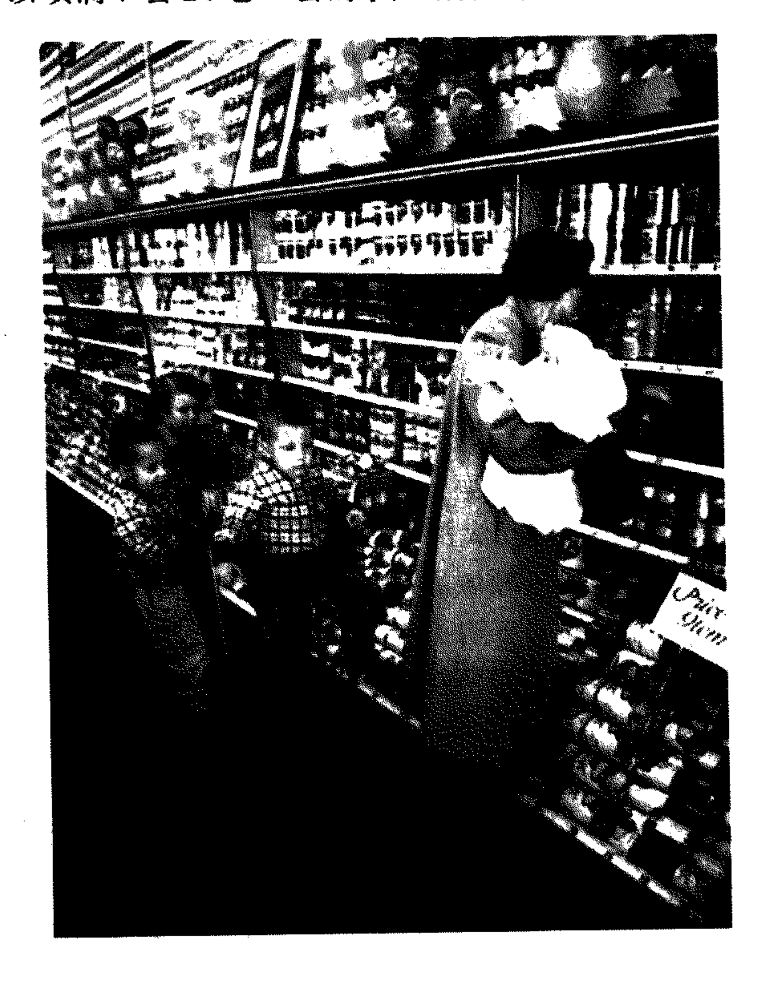


图265　美国生活模式

1954年1月美国《生活》杂志描写了几个前卫的郊区人。作为种族隔离居住的反映,所有被采访的家庭都是白人。图中的这个家庭正享受着"舒心而稳定的生活,她家达到了许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五位数的收入"。一年有12 291美元的收入就足够他们轻松地支付在丹佛拥有六个房间的房屋的还款,并能让他们买到一个大件——标价389美元的电视机。

存和检索信息的速度,以及以光速——特别是通过卫星——向全世界传递信息的速度。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机或计算机得到这些信息。

实例:新农业革命。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农业革命,它以圈地、经过改良的种子、科学饲养以及新农业机械为特征(第27章第4节)。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也是一场农业革命("绿色革命"),不过这场农业革命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农产品需求大增、农产品价格急遽上升而引起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各种新的杂交品种连同灌溉、肥料和农药一起大大增加了作物产量。20世纪90年代,由于基因工程的发展,继第一次"绿色革命"之后发生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科学家将取自不同生物的基因材料加以混合、配对。正如这一技术已经带来人胰岛素和干扰素等有用物质一样,它如今也正被应用于农业,以制造出能在含盐的或干燥的土壤中生长的植物;这类植物能够自行制造氮肥,不易感染由病毒、细菌、真菌和蠕虫引起的疾病,产量更大,营养价值也更高。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快的一个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对它的发源地——欧洲大陆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很深远。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也不例外。但是由于这场革命的强度比前一次要迅猛得多,因而它对世界各地的影响相应地也就更加全面,也更具破坏性。

二、对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影响

战后的繁荣与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分别以前所未有的5.6%和7.3%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这一长期繁荣是由若干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补偿战时损失的需要,大战期间被忽视和抑制的对商品与劳务的巨大需求,电子学和喷气式飞机运输等领域的军事技术转为民用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和整个冷战年代中巨大的军事购买力。

在这一繁荣时期,一些跨国公司充当了全球经济扩张的急先锋。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某些革新,包括集装箱运输、卫星通讯和现金管理电脑系统,它们现在第一次获得了在全球进行经营所需的技术。这些革新使这一时期的中等跨国公司有可能在11个不同的国家生产22种产品。跨国公司现在不仅能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制成品,还能输出工厂;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通常跟跨国公司本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差不多,有时甚至更低。因此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期里,

跨国公司年平均增长率为 10%，而非跨国公司则仅为 4%。

这一全球性的繁荣也逐渐使工人阶级有所获益，至少在工业化国家如此。实际工资大幅提升，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一度的假期旅游以及分期购买私人住宅、轿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提供了足够金钱。这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必要的购买力，可以避免过去屡屡发生的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然而事实却证明，他们的乐观同 1929 年经济大崩溃前夕经济学家的乐观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繁荣让位于“滞胀”——一种让人无计可施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结合。战时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战争期间被推迟的消费者需求也已得到满足，不断扩张的工业生产力因为造成了生产过剩而达到了它的极限。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了剩余物资的出现，因为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大都未从全球繁荣中受益，至少没有作为消费者受益。而且海外工厂支付的低工资也限制了当地的购买力。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1950 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欠发达国家的 10 倍，到 1965 年时这一比率变为 15:1；据世界银行预计，到 20 世纪末这一比率将会达到 30:1。



图 266　贫富差距

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芭芭拉，一个富裕的家庭闲逛过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房屋价格上涨和许多精神病院的关门，迫使更多的美国人流落街头。80 年代后期估计全美的无家可归者在 30 万到 300 万之间，具体数字取决于如何定义无家可归的概念和估计者的政治目的。

二战后繁荣的一个基本的结构性弱点是，这一繁荣依靠一体化的全球生产，但却缺乏全球消费作为支撑。而且这一不平衡还因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的原材料价格不成比例地下降和它们所负担的沉重外债而变得更加严重。到 1986 年时第三世界

国家的外债已经接近10 000亿美元,支付债务利息占去了其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一半。为了支付债务利息,第三世界各国政府都减少了它们的社会支出和进口。但是由于工业国三分之一的出口目的地是第三世界,所以第三世界进口额的减少立即导致了第一世界失业人数的增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5个成员国中,其失业率在1973年平均为3.4%,在1979年平均为5%,在1983年平均为8.3%,1995年则平均为11.3%。失业率的上升转而又引起对保护性关税的需求——这使人们不由又回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导致大萧条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这些经济问题驱散了二战后的自信心和愉快。那些认为繁荣衰退循环已被他们最终赶走的经济学家现在开始变得有些困惑不安。在国际高级研究协会联合会的一次会议期间(1983年6月),来自15个国家的学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都差强人意。“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正常秩序被打乱了的星球上,这个星球以一些与当代现实无关的经济概念为基础……我们想对那些基本信条提出异议,看看是否能修正或调整它们。”[1]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1996年报告中提到,全世界有30%的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充分,这也充分说明了修正或调整的必要。

社会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上的一些挫折给经济学家们带来了许多困惑,但是它们对许多已经开始习惯于较富裕生活的人来说则更具破坏性。20世纪70年代期间,联邦政府鼓励美国农民增加他们对海外市场的产品出口,以抵消不断上升的贸易逆差。农民们热情地响应政府号召,从而使得美国的农业出口额从1971年的80亿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438亿美元。但是接下来由于华盛顿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禁止对苏联出口,由于美元定价过高——相当于是在1984年向所有的美国出口商品征收了32%的附加税,由于财政上受束缚的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减少了各种进口物,其国外市场又突然缩小,在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农业出口物的物价水平下降了21%,出口量则下降了20%。

此时的美国农民一下子发现自己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中——这尤其是因为许多人为了买更多的土地和设备,以响应政府发出的生产更多产品的呼吁,以高利率进行了大量借款。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家庭农场的数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其顶峰时期的680万下降到1980年的280万,进而又下降到1994年的190万。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在1985年,农场家庭的收入仅为非农场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在生活在农场的人当中,贫困率为24%,而非农场居民的贫困率则为15%。由此产生的情绪与社会的混乱反映在自杀率中:1984年衣阿华州各农业县的自杀率比全国平均自杀率要高出一倍。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混乱在都市社区也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远远低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但许多城市工人仍然

认为自己现在更贫困。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失业被想当然地认为通常是周期性的,因此它一定会随着由不景气到繁荣的过渡而告终。但在今天,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再去做这种推测。理由之一是,随着工厂由人工昂贵的国家迁移到人工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能要求和得到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高工资。另一个理由是,自动装置和机器人的普及正在取代工厂里的"蓝领工人"和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整个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已经从 1970 年 1 月的 1000 万上升到 1983 年 1 月的 3100 万。的确,虽然工厂工作正在减少,但服务性工作(银行收纳员、供应快餐的工作人员、旅馆接待员、娱乐与健康的服务员)却也正在迅速增加——只是服务性行业的工资要大大低于制造业的工资。

这些统计资料的人道主义含义已经在 1985 年的一份报告中被阐述得很清楚。这份报告是一个由 22 名成员组成、调查美国饥饿问题的特别工作组提交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J. 拉里·布朗。这个特别工作组除了在寻找"饥饿的面孔"的过程中采访那些挨饿的人本人外,还采访了州长、市长、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这些调查者断定,大约有 2000 万美国人民正在挨饿,其具体含义是,他们无力购买足够的食物并定期地完全耗尽食物。这些医生说:"在美国,饥饿是一场全国性的健康流行病。我们的判断是,美国的饥饿问题在最近 10 至 15 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相信,今天,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论去哪个城市、哪个州,都会发现那里存在着广泛的饥饿。"[2]

福特罕姆大学的社会学家在其于 1993 年 10 月发布的年度社会健康报告中揭示了美国的饥饿问题。报告通过分析人口调查局提供的社会问题报告来评估美国的社会福利。人口调查局的报告指出了美国面对的最主要的十六个社会问题,包括失业、青少年自杀、高辍学率和住房负担重等。报告指出,1973 年的社会问题状况最好,当时的指标值是 77.5,但调查当年的指标值却已经降到了 38.8,这一降幅使调查者感到非常"震惊"。[3]

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对社会主义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社会主义世界最终解体。我们注意到(第 40 章第 1 节),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已经加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使它在 1932 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接着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承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苏联经济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但是由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期间获得了急剧上升的收益,苏联的经济复苏十分迅速。也正是这一成功促使赫鲁晓夫在 1961 年夸口说,苏联的工业产量到 1980 年将超过美国的工业产量。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苏联的发展速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逐渐慢了下来,因此苏联的经济不是

赶上和超过美国,而是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苏联经济减速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这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斯大林时期人力和自然资源都可以大量获得。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日渐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这使中央计划一切的做法变得日益困难也愈来愈无效。不过也许苏联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方面的——苏联的工人、技师和科学家不愿意只是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而不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当年斯大林主要是在同来自乡村未受教育的农民打交道,但在今天,苏联的劳动力中包括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经理和专业人员;如果苏联要积极地参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需要开发这些人的创造力。但这件事却至今不能进行,因而其结果也就是灾难性的——正如洞察力极强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所注意到的。1970年3月,萨哈罗夫和一个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的同伴一起发出了一封《苏联科学家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对苏联的种种毛病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值得引用:

"为什么我们不仅未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正如人们所知,甚至不能在这场革命中跟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脚步呢?难道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同样的机会?难道资本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场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

当然不是。我们陷入困境的根源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恰恰相反,在于我们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那些特点和情况。这一根源在于反民主的传统,在于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经制定但却至今仍未被废除的一些公共行为的准则……

在社会政治范围内,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很多,凡是不能消除这些障碍物的措施都是注定无效的……

从我们的国外朋友那里,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作一辆巨大的卡车,这辆卡车的驾驶员用一只脚使劲往下踩加速器,同时用另一只脚踩刹车。更聪明地利用这一刹车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如果不采取一种导向民主化的做法,我们的国家还能指望什么呢?它只能期待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回复到一个二流的地区大国的地位。"[4]

从1964年到1982年,即勃列日涅夫长期统治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聪明地利用这一刹车"的请求一直被弃之一旁。相反,人们仍在使劲往下踩刹车。对那些陆续有人提出的分散苏联经济——给地方工厂和行政机关一些主动权的建议,苏联

官僚都予以制止，甚至还将那些发出同样呼声的人们看作潜在的颠覆工具把他们关押起来，谁要接近他们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并被记录下来。



图 267　苏联解体

1991 年未遂政变之后，鲍尔斯·叶利钦立即罢黜了当时独联体的首脑戈尔巴乔夫。图为两人同时出现在即将解体的苏联的议会上。

使劲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是萨哈罗夫所预言的那样。事实证明，严格管制和墨守成规与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水火不容。今天全球经济的特点是：快速的技术革新、不断改变的消费者的爱好以及一体化世界市场中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一切均要求灵活、高效和适应性强——这些品质是苏联繁复的党和国家官僚机构所明显缺乏的。因此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1950 年至 1970 年间的 5% 至 6% 下降到 1971 年至 1975 年间的 3.7%，进而又下降到 1976 年至 1980 年间的 2.7%。结果苏联非但没有像赫鲁晓夫所预料的那样超过美国，反而被日本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随着勃列日涅夫及其昙花一现的后继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建国的一代都已离开了历史舞台。1985 年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掌握了政权。这一代人已经认识到，在当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里，只要一只脚踩刹车，另一只脚踩加速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抛在时代后面。在 1986 年 2 月 25 日开幕的第二十七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批评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种种缺点，他所用的语言使人想起萨哈罗夫在 1970 年发出的警告，并证明这一警告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府如一潭死水、只在原地踏步，我们的工作劲头在衰退，官

像主义逐步上升——这一切都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经济上的困境开始逐步形成……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也随即落后了……遗憾的是，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经济机构中的任何变革都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这种于我们不利的局面要求进行变革，但是能在不改变任何事物的情况下改善局面吗？"[5]

戈尔巴乔夫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以彼得大帝式的风格修正其前任的政策。1987年6月他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坦率地说，他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变化……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非常的复杂……我们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我确信，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犯错。"[6]

戈尔巴乔夫使用的词语"害怕犯错"与罗斯福总统的"除了恐惧之外无所畏惧"惊人地相似。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重组堪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相类比。两者都是对带来创伤的危机——胡佛的大萧条和勃列日涅夫的经济停滞——的反应。两者都是由民族精英的领导者自上而下指导进行的。罗斯福和戈尔巴乔夫都对推翻社会制度的革命不感兴趣，而对能保留和重新焕发这些制度活力的改革情有独钟。尽管其改革目的都是保守的，这两个领导人都既遭到了害怕不确定未来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要求施行社会外科手术而不仅仅是一时急救的激进派的反对。因此罗斯福被右派批判为本阶级的背叛者，并遭到了诸如主张"分享我们的财富"计划的路易斯安那州长休伊·朗一样的左派激进主义者的批判。

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战争开设了工厂，创造了工作机会，从而结束了大萧条的噩梦。但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不幸的是，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将他解救出困境。当然，这对于世界来说则可能是幸运的。因此戈尔巴乔夫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与比罗斯福所面对的还要艰巨的一系列困难直接斗争。这些问题包括组成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中难以控制的少数民族——由于遭遇了至少与美国30年代大萧条一样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们的敌意增加了。戈尔巴乔夫的重组计划提高了人们对经济条件改善的期望。然而，与此相反，经济形势却每况愈下。因为效率低下的企业被迫减少薪水甚至裁员，致使失业率直线上升。而由此而来的社会动乱则加剧了种族骚乱和冲突，正如在美国和西欧也发生过的那样——当时少数移民被指责应该为失业和低工资负责。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堆积如山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到1991年时他已经被叶利钦所取代。苏联自身也解体了，被一个称作独联体的松散政治联合体所取代。另一个人们不喜欢旧的共产主义秩序的证明是，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决定恢复该城在沙皇时代的名字——圣彼得堡。



图 268　立陶宛的独立游行

1990 年立陶宛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者。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即将终结时,原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

叶利钦的变革措施比戈尔巴乔夫愿意做的要更多——使苏联解体,叶利钦希望这些改变能让独联体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在农业方面,他取消了国有和集体农庄。在工业方面,他于 1993 年将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但是另外一个预料之外的不受欢迎的改变却是——大批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受过高素质训练的科学家的向外移民。随着对境外移民限制的取消,1987 年有 39 000 人离开苏联,1991 年为 60 万,1992 年达到 100 万。在过去,大部分的移民都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比如犹太人、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现在有如此众多的顶尖科学家都移居国外,有人担心留下的将不足以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家。

对很多俄国人来说,同样值得警惕的还有意识形态的真空。在过去,官方的斯大林意识形态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拥有所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中央计划委员会为经济制定计划并监督经济的运行。最初,这种战略似乎运行得令人满意。但是到 1990 年为止,俄国人却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国家似乎真的就要沦落为一个“二流的地区国家”的事实,正如萨哈罗夫在 70 年代曾经警告过的一样。因此尽管过去他们吹嘘过要“超过”美国,俄国人现在却正面对着灾难性的经济滑坡和令人尴尬的意识形态困境。

当第二次工业革命以非常危险的速度展开的时候,全世界几百万人都必须修正

社会制度以适应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艰巨和令人不安的任务,它要求在数不清的互相竞争的社会制度中仔细地区分好坏,这就将我们又带回到了一个自古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见第1章第1节)——在技术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存在的长期的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将这个问题定义为:在运用智慧扩大知识和如何利用扩大了的知识之间寻找平衡的问题。



图269　改革的代价

近几年来原苏联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经济改革使得有些人富得流油,但也使其他人不得不为购买食物而削减其他日用品的支出。

幸运的是,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经历了很多野蛮主义的20世纪可能仍然会在令人目眩的创造与创新中结束。但在另一方面,如果20世纪没那么幸运,在不幸中结束的话,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非常严酷的。从北爱尔兰到卢旺达,从波斯尼亚到苏联解体后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独联体,到处蔓延的野蛮已经开始有了预兆。

四、对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的历史便是由政治上的胜利与经济上的灾难共同构成的。在摧毁殖民地帝国并在帝国废墟上创立新的独立国家时,政治上的胜利达到高潮(见第43章)。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时达到顶点。经济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第

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提高了生产力。但是这却并没有给大多数农民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缺乏购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设备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拥有中型或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才可能参加绿色革命,但他们却往往不种粮食作物,而改种更为有利可图的出口作物。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这类机器能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却迫使已经就业不足的农民逃往城市贫民区。在那里,他们通常会发现自己同在乡下时一样是多余的人。这一模式在墨西哥很明显,那里效率最高的农场现在正在为美国市场生产储藏可以过冬的水果和蔬菜,而玉米和豆类这种主要产品却是从美国进口,而且许许多多背井离乡的农民正在越过边境去寻找工作。与此同时,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到1980年时已经增长到几乎失控的地步,达到1400万——预计在以后20年中它还会再增长1400万。

各大洲都在迅猛地进行都市化。因此到2000年时估计第三世界将有40个拥有500万或更多人口的大都会,而像这样的大都会在第一世界中也只有12个。1990年全球最大的大都会按照降序排列,分别是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芝加哥、维也纳、东京、圣彼得堡、费城和曼彻斯特。到2000年时预计这一名单就应该是:墨西哥城、圣保罗、东京、纽约、上海、北京、里约热内卢、孟买、加尔各答和雅加达。有关这一全球都市化的重要一点是,至今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因此新到这些城市的人不得不去做那种收入仅敷支出的工作,那种工作可以使他们免于挨饿,但对国民经济却没起什么好的作用。他们靠做沿街叫卖货物、擦鞋、替人跑腿、推小车和蹬人力车这样的工作来糊口度日。

五、对全球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分别给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产生了特有的影响,也对所有这些世界的人们产生了一些同样的一般性的深刻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变革都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打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变迫使人们从动荡的游牧生活转向稳定的村庄生活。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同样意义深远。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于其前所未有的新技术的威力,影响更为广泛,也更具分裂性。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种全球影响中的四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对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战争的影响。

对生态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它不仅给地球上的居民留下了印记,也给地球这个星球本身留下了印记。因为地球是人类的家园,所以这种影响是生态

上的。其实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里人们都在对环境施加影响,这仅仅因为人是人,有人的需要,掌握了人的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只是石头工具和火。但是今天他们的影响则更为巨大,因为人类的技术爆炸和人口爆炸结合在了一起。

过去和现在生态环境的对比在西芒人的生活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西芒人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游牧民族,大约有2000人到3000人。他们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理会对环境的影响:他们把河水当作澡盆、洗衣房、厕所、钓鱼场,也当作饮用水的来源。同样地,他们随便地在耕种过程中放火烧林,在用火清除了的空地上播种,然后恢复游牧生活,收集动物们在没有保护的地方的残留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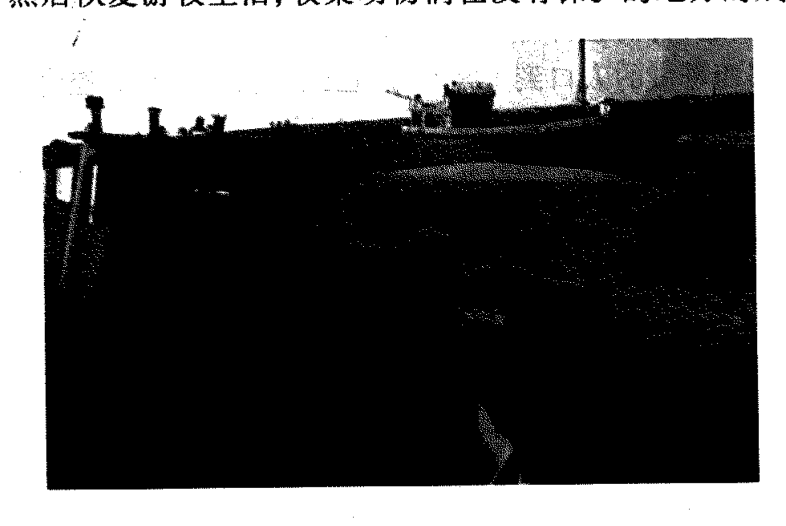


图270 今日咸海

咸海位于前苏联的南部地区,连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它一度水源充足,盛产鱼类。但在今天,由于对资源的过度开采的政策失误,咸海已经消失了。

西芒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每天平均消费不足5000千卡(其中的40%来自于人力,60%来自燃烧的柴火),而美国公民每天的消费量则是25万千卡。所以西芒人的生活很有节制,几乎对他们的河流和周围的森林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而这种行为在我们的世界中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机器在不停地扩张,而居民的人数也从几千膨胀为几十亿。[7]

由于机器和居民都在以加速度增长,所以生态环境也在恶化。农业和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养活更多的人成为可能,而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公共健康措施则又降低了死亡率,因此世界人口快速地增长。尽管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在1830年达到第一个10亿,但此后只过了100年就又增长了10亿,而增长到第3个、第4个和第5个10亿则只分别花了30年、15年和11年。

这些新近充斥地球的几十亿人一旦用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生产的机器装备起来,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家园带来了更大的而且似乎是还要无限增加下去的压力,这些压力比起我们祖先带来的要大得多。即便是在人口相对稀少、资源禀赋优越的美国,这种压力的痕迹也仍是随处可见:为从内布拉斯加到得克萨斯潘汉多之间的大草原地带灌溉的奥格拉拉大蓄水层枯竭了;加利福尼亚的牧场和长岛的马铃薯耕地被用来开发房地产;西北部残存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全国99%的有毒垃圾堆未被清理,仍在污染全国的水源。

生态困境并不仅限于美国，它已经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播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国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现在是第二大工业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但是由于中国向前猛冲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是由其国内巨大的煤炭储备推动的，而煤炭的燃烧释放碳，是最不清洁的燃料，因此中国现在在污染物排放榜上高居第二名——到 2025 年它也许会升至第一位。中国消费者(有超过 10 亿)无疑会与其他任何地方的消费者一样努力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会想要更多家庭轿车、冰箱、家庭采暖设备、消费品，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生产和开采更多的能源。一些环境主义者已经开始质疑这些“一无所有的人”不断升级的消费期望。但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指出，是西欧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他们不能指责“一无所有的人”，不能认为他们应该做“永远一无所有的人”。[8]

对种族关系的影响

有史以来，技术就一直以决定人口增长和人口迁移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种族关系。例如，当我们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热带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技术，能够生火，制作衣服，搭建房屋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从非洲的基地扩展到整个欧洲和亚洲，并最终到达美洲和澳洲。同样，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农业和工业上的进步则使欧洲人口从 1650 年的 1 亿剧增至 1914 年的 4.63 亿。这也使得大批欧洲人在 18 和 19 世纪移居到西伯利亚和美洲的人烟稀少之地成为可能。今天，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同样的移民潮也在出现，尽管是反向的——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由于食物产量增加和健康科技进步(大众免疫、DDT、口腔再水化疗法)使得欠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急剧下降，而其出生率仍保持很高的水平，因此在 1950 年和 1970 年间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是 1.1% 和 2.2%。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是发达世界的两倍，这种新的模式将很难改变，因为第三世界的人口主要是年轻人。这对未来的意义在表 44.1 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它表明世界总人口正在以持续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它也表明了欠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口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表 44.1　人口预测：1950—2100 年(单位：百万)

	1950 年	1980 年	2000 年	2025 年	2050 年	2100 年
欠发达国家	1 670	3 284	4 922	7 061	8 548	9 741
发达国家	834	1 140	1 284	1 393	1 425	1 454
全世界	2 504	4 424	6 206	8 454	9 973	11 195

第三世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发现很难养活自己，因为正如上文所述，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已陷入停顿。因此这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们一旦有机会就会离开贫困的祖国，接受在发达世界里任何性质的工作。由于在二战后的黄金岁月里很多工作都是开放的，因此大约有 1500 万到 2000 万工人移居到西北欧——德国、



图271 人口压力

穷国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们的人口规模;富国则因为生活水平高而可以保护环境。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出行依靠人力而不是汽油。但是一旦将来这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富起来,那会给环境带来怎样的后果?

英国、法国和北欧国家。其中很多移民都来自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其他移民则来自其他各洲,主要是北非、巴基斯坦、印度和西印度群岛。

欧洲人最初还是比较欢迎这些移民的,他们称其为“来宾工人”,[9] 认为他们过几年后就会带着积蓄衣锦还乡。但是这些新移民的举动却并没有如他们所愿。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在移居国扎下了根,自然也就不愿再漂泊下去。而他们出生在新国家的孩子也自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法国人或瑞典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或西印度群岛人。但无论如何,当战后经济的黄金时代结束、失业成为欧洲人面临的严重问题时,以往的“来宾工人”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受欢迎。相反,他们现在被人憎恨,有时甚至受到失业人员的攻击。一些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向那些愿意回家的移民提供津贴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困境,但却极少有人接受津贴。

欧洲人渐渐地也是不情愿地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的暂时性问题,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陆。现在,这些一直洁身自好的欧洲人,看到在他们的城市中出现新建的清真寺的尖塔,听到每天都从这些清真寺里传出大声的祈祷声,接受全天候以外语播出的电视和广播频道,应付穆斯林孩子在公立学校被教唱“向上的基督士兵”这首歌时的抗议,这些

都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体验。

美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不和谐:1995 年美国的人口调查研究揭示,美国 8.7%的人口(2260 万人口)都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在加利福尼亚,25%的人口是在外地出生的,纽约是 16%。事实上,这个问题的专家总结说,如果目前多种族混合的速度持续下去,大部分美国人的脸孔将在几代人的时间中从白色变为棕色,美国混合种族家庭出生的孩子的数目将会从 1970 年的 50 万上升到 1990 年的 200 万。

这种程度的种族改变在美国也产生了与在其他地方一样的影响。一份 1994 年路易斯·哈里斯的美国人口调查显示,有色种族认为他们比白人的机会更少,但是有色种族内部也几乎同样憎恨彼此,尽管他们在反对白人的时候是一个集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是,“我们拥有的多样性和少数民族团体越多,就必须克服越多的偏见和歧视。”[10]

想来的确是有些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大规模的移民正在全世界制造少数民族团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偏见和冲突。但最终结果也不一定就是全球恐惧,正如老虎·伍兹的生涯所昭示的一样:他是一个高尔夫大师赛的冠军,他的血管里流的是泰国、美国黑人、高加索美国人和印度美国人的混血。

对于性别关系的影响

在整个历史中,性别关系如同种族关系一样,也受到了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在采集食物的年代,女人们作为食物采集者至少为家庭提供了与男人同等的食物,因而她们能够享有同等的地位。随着农业革命的出现女人们放弃了流浪生活和村社生活,她们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在家中抚养孩子和从事家务劳动,从而也就再不能为家庭的食物需求作出同等的贡献。不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为妇女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工厂和有薪工作成为抚养孩子和家务劳动之外的又一选择(参阅第 26 章,第 6 节)。

而后建立的公共学校也使妇女们受益匪浅。在那里,她们可以接受与男子们相同的教育。到 20 世纪初期,妇女已经赢得了选举的权利。1900 年时妇女参加全国选举的权利仅在一国实现,而到 1950 年时,她们已经可以在 69 个国家参与选举;1975 年则是 129 个国家。今天,除了一些阿拉伯国家(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外,妇女的选举权已经遍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医学技术的发展使避孕药成为可能,而这则为妇女们提供了控制其生育功能的手段。从此以后她们不再因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设想而受到限制,并摆脱了“自然意志”对于男女社会角色的定义。对于母亲的角色,妇女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计划生育使妇女们可以在生养子女以后重操旧业或是干脆另谋新职。然而世界上却只有 50%的妇女使用避孕药,而就在这 50%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正确使用这种器具。此中原因多种

多样:政府和教会的反对,丈夫的阻止——他们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的雄性魅力或是为了传宗接代继承家业而想要生个儿子。



图 272 日本妇女投票

战后刚刚享有投票权的日本妇女正在投票。

今天妇女地位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教育大门对妇女们敞开。全球女性文盲正在迅速减少,其速度不亚于男性文盲者的降低速度。1960年时只有59%的世界妇女不是文盲,而到1985年这一数字就已上升到68%。然而妇女们仍然面临着在教育内容和质量方面的差别待遇问题:从最早期的学校教育开始,女孩子们就被引导学习那些在厨房和起居室里更为实用的技能和知识,而较少接触那些与大千世界相关的主题;人们鼓励女孩子学习艺术、文学、家政和缝纫,却让男孩子们学习工程、数学、物理学以及机械(参见地图38)。

而教育内容上的差别又是导致男女实际收入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妇女角色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全球有大批妇女都加入到了劳动者的行列。1890年时美国还只有18.9%的成年妇女参加工作,但到1940年时这一比例就已上升到25.8%,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则已上升到35%,到1984年更是上升到54%。

对妇女而言,参与经济活动是一件有着多重效果的好事。它使得妇女们更加独立,同时也开阔了眼界并获得了了解自己潜能的新机会。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国家经济中来,也使国家的生产和财富得到了相应的增长。举例而言,在美国,夫妇同时工作使很多家庭都可以享有更大的居所、豪华轿车、定期休假,并可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新的地位在给妇女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一些不利,其中之一就是家庭以外的职业使妇女们要同时承担家庭内外工作的双重压力。

除了每天的工作外,美国妇女们平均每周还要花24.2小时在各种家务劳动之上,而男人们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则只是每周12.6小时。在前苏联,这种差别就更大:妇女们每周做家务25—28小时,而男人们却只有4—6小时。在日本,即使妻子也是职业女性,男人们做家务的时间每天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除了这种经济上的从属关系以外,全世界的妇女们还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持续的暴力侵袭。以暴力对待妻子和其他妇女,这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以至于它早就被宽容地视为可接受的行为。如果有人因其政治观点而被杀害,人们普遍会谴责这种行为是违反人权。但是如果有人仅仅因为自己是女人而挨打甚至遇害,普遍的解释却是"文化传统"。而且这还并不只是非正常或不开化文明所特有的缺点。在美国,每十五秒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毒打,而每五分钟则有一名妇女被强奸。

在很多文化中,暴力对待妇女甚至从女孩子出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期望子嗣的社会压力之大,使得印度和中国的妇女们采用羊膜穿刺术——一种用于检测出生缺陷的遗传检测法——测试她们婴儿的性别。如果测试表明婴儿是女孩,孩子往往会被流产。举例而言,在孟买一家诊所的8000例人工流产中,有7999个婴儿都是女孩。这项技术发展背后所隐藏的动机正好反映在这家诊所宣传性别测试的广告中,这则广告宣称花38元流产一个女孩总好过以后花3800元为她置嫁妆。同样,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引发了很多杀害女婴的事件,以至于1982年湖北省一个村子里一岁婴孩的男女比例竟然为503:100(平均比例为106:100)。

杀害女婴的最终后果是全世界少了大约1亿的女性。这些女婴或被流产、或是刚一出生就被杀死、或是死于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或是因生病却得不到救助而死去——女孩腹泻,就会被家庭成员视为讨厌的东西;而男孩患了腹泻,就是很严重的情况,需要医生诊治。一位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员承认,"男孩生病,父母会立刻送他去医院。而女孩生病,父母们则会自我安慰'让我们等一等,看明天她会怎样。'"

在非洲和中东的部分地区,年轻的女孩们还承受着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割礼。这种手术将女孩子全部或部分的外生殖器切除,这种残害形式剥夺了受害者性行为时的感觉,而且在手术过程和以后生产的过程中受害者还将面临更大的生命危险。产生这种习俗的根源就是要降低年轻女性的性欲望,从而确保她们在结婚之前的处女之身。而各方要彻底废除女子割礼的努力之所以在当地受到阻碍,其原因就是外国组织和外国意识危及了"一项重要的非洲传统"。正如肯尼亚的女性杂志*VIA*中写道的那样:"没有任何'非洲的'是不公正和暴力的,无论它是否虐待妻子、母亲、或贫民,无论它是否实行割礼。那些男人们,穿着三件套西装和锃亮皮鞋的男人们,他们可以将任何不公正强加于妇女身上,而只说一句'这是非洲的'。"

1997年12月埃及国家最高法庭宣布,针对妇女的割礼不是《可兰经》授权的一项伊斯兰宗教实践——直到此时埃及妇女们才真正赢得了胜利。埃及妇女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整个非洲的反残害运动——非洲每年有200万妇女遭受这一酷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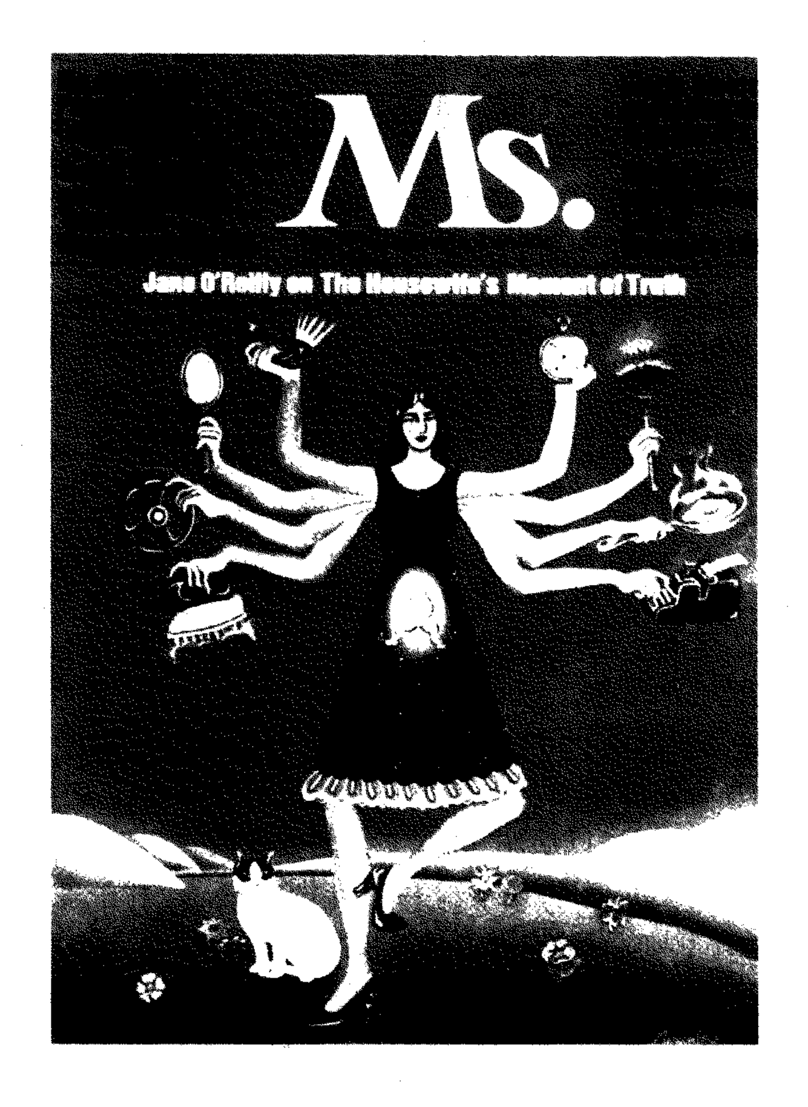


图273 《女士》杂志

《女士》杂志创刊于1972年。在格罗里·斯坦利任主编时，该杂志试图从激进的女权主义杂志变成面向大众的读物。《女士》杂志强调女性应该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它还力图帮助美国人重新思考传统的性别分工。

对于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在战争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直接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意图。这些战争时期的发明有雷达（英国）、原子弹（美国）、弹道导弹（德国）和电子计算机（美国）。

与技术进步同样重要的是对军队、科学研究者和企业经营者的一体化。这是一个高度有效的联合体，可以形成所谓的“按需发明”。实战的经验刺激了将现有武器改造形成新型武器的需求，诸如（一战时期）坦克、毒气和潜水艇，都是为适应战争需求而发明的新武器。这种需求与科学研究者—军队—企业经营者的三部曲联系起来往往能够得到有效的满足，以至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二战以后这种科学研究者—军队—企业经营者复合体的秩序之所以得以建立起来，正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受到了“军工综合体”的危险性的触动。这一综合体的范围在实施策略防御计划（SDI，或“星球大战”）时以及1983年国会开始授权拨款

时都有所体现。到 1987 年在已经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有 80 所大学(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总金额涉及 3.5 亿美元)和 460 家企业(以 Lockheed 为首,总金额涉及 10 亿美元)参与其中。

在这种情况下,按需发明的成就不断涌现,在二战后的整个冷战时期这一趋势从未减弱。虽然早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爱因斯坦就曾警告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无法平衡的大灾难边缘",但是军备竞赛却仍是愈演愈烈,每一项新的军事发明都带来一项防御和抵抗这一发明的军事技术。1945 年美国发射 A 导弹,紧随其后苏联于 1949 年也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导弹;1952 年美国发射 H 导弹,1953 年苏联研究该项技术也取得了成功;1968 年苏联研制成反弹道导弹,1972 年美国也成功地实现了发射。这种军备竞赛的最终结果就是积累形成了一个全球 50 000 颗核武器的大火药库。



图 274　轰炸过后的科隆

盟军的空袭给德国造成了惨重的损害。图为空袭给莱茵河上的科隆城带来的巨大破坏。

在各国科学家的联合之下,这种僵持状态背后隐藏着的危机渐渐浮出水面。1983 年 11 月来自几个国家的科学家们指出,即使现存核武器只有一小部分被引爆,都势必将引发一个"核冬天"。剧烈的爆炸和大量的烟尘、油烟及灰尘将会遮住太阳,将地球推进一个寒冷、黑暗的世界,而且这样的状态将会持续三个月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全球环境的变化足以引起地球上一些主要动植物物种的灭绝。在这样的大灾难中,人类的逝去也是无法避免的。"

这一令人震惊的论断促使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始了一项研究。一些人质疑全

球变冷是否严重到被形容为“冬天”的地步，并据此提出了“核秋天”的说法。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达成一致，认为核战争将毁灭保护人类免受太阳系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他们同时警告说，核武器的直接摧毁以及核战争的辐射影响将会使上百万人口受到伤害，而在全世界50亿人口中还将有10亿到40亿死于全球粮食匮乏导致的饥荒。因此像印度这样大量国民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即使没有一颗原子弹在其国土内爆炸，也仍将遭受最严重的人口死亡。这就是曾经一度威胁着人类的可怕前景(1982年)，每年有6500亿美元用于发展军备，平均每分钟的花销就是100万。这种天文数字的花费所带来的并不是人们所刻意追求的安全，相反却是核秋天的寒冷——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糟的就是核冬天。



图275 核扩散

尽管美俄这两个超级核大国近年来已经开始削减它们的核武器，但是核扩散却仍在威胁着全球安全。21世纪初可能会有15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它们中有许多都是地区冲突的当事国。

对人类自我毁灭讨论最多的还是那具有嘲讽意味的可能性，它就像认为一切人类想像的事物都可以通过人类的技术实现一样荒谬。然而这种谬误与我们对于人类进化的审视却正相吻合，它暗示我们正是以往各项技术进步和发明使人类的暴力行径从个人之间的仇怨发展升级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参见第2章中“人类自然的本源”)早在人类还仅只是食物采集者角色的时候，人类没有任何战争动机，也缺乏大规模战争的手段。直到技术进步、人类的财富积累也达到了值得为之一战的地步，人类发动战争的手段和动机才算齐备起来。人类是伴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走到这步田地的，而也正是这场农业和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同时也缔造出了

一个与此前各个社会形态截然不同的富裕文明。对于敛财者而言，肥沃的耕地、殷实的谷仓以及集中了众多财富的城市中心都成了他们有价值的战利品。战争由此变得有利可图，并得以迅速蔓延——游牧民大举迁离沙漠草原，罗马独裁者利用战争发现和掠夺新的疆土，征服者们以枪炮和十字架横扫几大洲，后来者又用炮舰和机械武器乃至近些年才出现的直升机、电子计算机来征服世界、建立帝国。

我们这个年代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当农业和工业革命使战争变得有利可图，甚至成为必然的同时，我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却使战争无利可获并变得没有出路。这也正是为什么爱因斯坦警告说我们正面临着在新的“思维方式”和“无法平衡的大灾难”之间做抉择。我们人类并不是面临这一抉择的惟一种群。此前已有不胜枚举的种群都曾面临过同样的威胁，只是由于这些种群遗传结构中的环境适应能力较差，难以适应像冰川年代突袭这样的环境骤变，所以它们最终大都灭绝了。但与这些种群有着根本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大脑去创造我们的生存环境(运用各种技术，例如火的使用、制作服装以及建造掩体)来适应我们自身的需求。不过由于现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活力和强大技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以一种超常的速度为我们创建一个不断需要快速适应能力的生存环境，因此目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再次合理地运用自己的头脑，这一次是要适应一个由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组成的新世界。面临这样的挑战，相较于其他已经消逝的种群，我们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并非是来自如冰川时期那样神秘而不可知的威胁。与以往那些种群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适应一个超越我们控制能力和眼界的生存环境，而是如何使我们人类创造的生存环境更加适应我们的需求。

最近核能科学家委员会的“世界末日之钟”倒计时的分针在午夜之前从三分钟调到了十四分钟，这使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或许伯特兰·罗素说“Man will sooner die than think”(人们将比预想的更快地消亡)是太过悲观了。但是回顾过去百年，不必要的死亡多达几百万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 21 世纪这支倒计时钟的分针会朝哪个方向走，也无法预知它是否仍然只是作为一个标志而存在，更无法预知它是否会像那支在广岛被发掘出的时钟一样，时间流逝，而它的指针却永远安安静静，永远停留在 8:15 分之上。

推荐读物

正如人类过去所经历的过渡时期一样，这一次的过渡期也激发了很多关于人类前途命运的讨论。最新近最引人深思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是生物学家 M.E. Clark 所著的 *Adriadne's Thread: The Search for New Modes of Thinking* (St. Martin's Press, 1989)。作者对她著作的副标题做了十分尽责、有力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解释和指南。以下著作同样值得一提：A. Toffler 所著的 *Preview and Premises* (South End Press, 1984)；L.S. Stavrianos 所著的 *Lifelines from Our Past* (M.E. Sharpe,

1992); M.G. Raskin 所著的 *The Common Good: Its Politics, Policies and Philosoph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6); F.M. Lappé 所著的 *Rediscovering America's Values* (Ballantine Books, 1989); R.N. Bellah 等编著的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Harper & Row, 1986)。联合国的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Oxford University, 1993)也特别富于启迪。

注释

1.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1985.
2. Ibid., November 20 and December 11, 1984; March 3, 1986;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0, 1986.
3.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1996.
4. Ibid., April, 1970.
5. Ibid., February 26, 1986.
6.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7, 1987.
7. *UN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85*, p.31, Table 3/2.
8.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pring 1989), p.4.
9. Cited by L. Heise, "Crimes of Gender," *World-Watch*, March-April 1989, p.19.
10. *New York Times*, March 3, 1994.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我们对人类过去的研究已经到了最后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当每个主要阶段结束时，我们都要停下来像整理存货一样审视一下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对象。我们不停地自问："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在这本书的每一编的结尾我们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最后一章里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比以前的章节更长，因为和以往的时代相比现在每年都有更多的历史事件发生，同时也因为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总结过去几千年历史里人类所取得的进步和所犯的错误。

这本书所做的调查范围很广，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人类取得了超乎想像的成就。很早以前，很可能就是在非洲出现了人类，那时我们还很弱小、稀少，看起来是没有抵抗能力的生物，我们的未来也因为所处的世界竞争激烈而显得没有保证。我们没有大象那么大，没有狮子那么强壮，没有羚羊那么迅速，也没有像臭鼬、豪猪或乌龟那样的自我保护手段。然而今天我们已经成为超越其他所有物种的种族，这主要是因为只有我们才懂得如何运用客观环境来为我们服务——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这个种族，而不是像其他所有种族那样去适应环境。

因而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已去世的空间科学家卡尔·萨根提到了这个特点，[1] 他认为当前的高科技已经可以确保人类不会因为环绕地球周围的小行星爆炸造成的恶果而灭绝，也不会因为冰川时代的再次来临而灭绝。由于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确定，我们可以使那些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者用原子弹使它们变成灰烬。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一面巨大的镜子集中将太阳光发射到地球上，利用太阳能来阻止冰川时代的再次发生。这些科学技术为现代人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在未来不会成为这些宇宙灾难的受害者，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人类还会去其他的星球定居，成为首个多星球种族，这将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大的保护措施，使人类免于受到未来灾难的威胁。

这样安全也就成了人类的首要任务。一些科学家期盼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未来。斯坦福大学的工程教授及系统理论专家威利斯·哈曼宣称："我看到这个地球上发生了各种各样美妙的有创造力的事情。人们创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经济，新的企业形式，新的社区。新的社会在一点一点地建成，它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因为它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或与它相近的东西。它是有机的……我们的时代是人类生存过的最美好的时代之一。我对将要发生的一切非常有信心。"[2] 对我们的时代有同样赞

誉的还有卡尔—科技的地球化学家哈里森·布朗,"我很自信地认为,今天人类已经拥有比自己所估计的更大的力量。我相信人类已经有力量建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人们可以过着自由、富足、有创造力的生活……我相信人类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使伯利克里统治的黄金时代变得微不足道。"[3]

与这些让人愉快的设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现在国际上广为流传的一些书籍,它们的书名让人非常沮丧,像什么"世界末日"、"未来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对未来的悲观情绪也不只限于书店里面的书籍。一个国际小组调查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中国台湾地区、黎巴嫩和新西兰的30 000多名男女,发现这些人中有严重心理消沉病史的数目要比他们的祖父母那代高出3倍。[4]

我们的时代遇到了一个谜。一方面现代人成功地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方面也因为自我怀疑而变得步履蹒跚——不是害怕会死在山峰上,而是害怕会死在"死亡之谷"中。不过这种对自我表现的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哈曼和布朗所设想的美好前景同时存在的则是充斥在报纸标题及电视节目中的地狱场景。福特罕姆大学的年报《社会健康指数》描述了这种可能性与现实的差距。这个报告以人口普查数据中对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高中辍学率及是否能得到供得起的住房等统计数据为基础,检测了美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这个指数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该年报的主任用了"糟糕可怕"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个结果。

那为什么在一些科学家预想的美妙社会与实际存在的恐怖情况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呢?答案可以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机制。文化是从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产生的,体现了这个社会中的生存机制。各种文化的价值观都在最大限度地为这个社会的团结和生存服务。因而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般都要最大限度地完成种族繁衍,最大限度地完成物质生产,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生存。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有通过文化每个人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任何威胁文化价值的东西都变得像威胁基本生存物质——比如食物和水——一样严重,因此人们极不愿意忍受任何对传统文化的重大更改。历史上,文化总是对变化进行强烈的反抗。即使在今天,当科技的更新需要社会文化产生相应的变化时,这种抵抗也同样存在。不过科技变革基本上还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一般都提高了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更则引起了恐慌和抵抗,因为它威胁到了传统的、人们已经习惯的价值和实践。

上述分歧在历史中一直存在,结果使得在科技发展如同狂风暴雨一样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状态的同时,社会的进步却相对停滞落后。这种分歧可被用来解释玷污了人类历史的大多数的暴力和血腥屠杀。而且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分歧间接地和消极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只要看看新闻报纸的大标题及电视就可以一目了然。

实例：工作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旧石器时代采集食物的人类比现代人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现在的食物采集者，从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到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的“功人”，一般每周只用15—20个小时来采集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有大量时间来进行社会交际，其中包括按照规定的方式准备和享用食物。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种方式中度过的，但在大约1万年前这种生活方式随着农业革命的发展开始起了变化。

农业革命引发了技术实现突破后的一系列反应——冶金、制轮、纺织、造瓷、造币——以及现代社会中18世纪末节省劳力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替代劳动力的高科技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会提高人类的生产力，但令人费解的是它们也都延长了人类每天的劳动时间。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来耕种、培养、收获农作物以及驯养牲畜。同样，在工业革命中工厂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0—16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后来工作日开始逐步减少。1900年的时候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60个小时，1935年其工作时间按照法律规定减少到了40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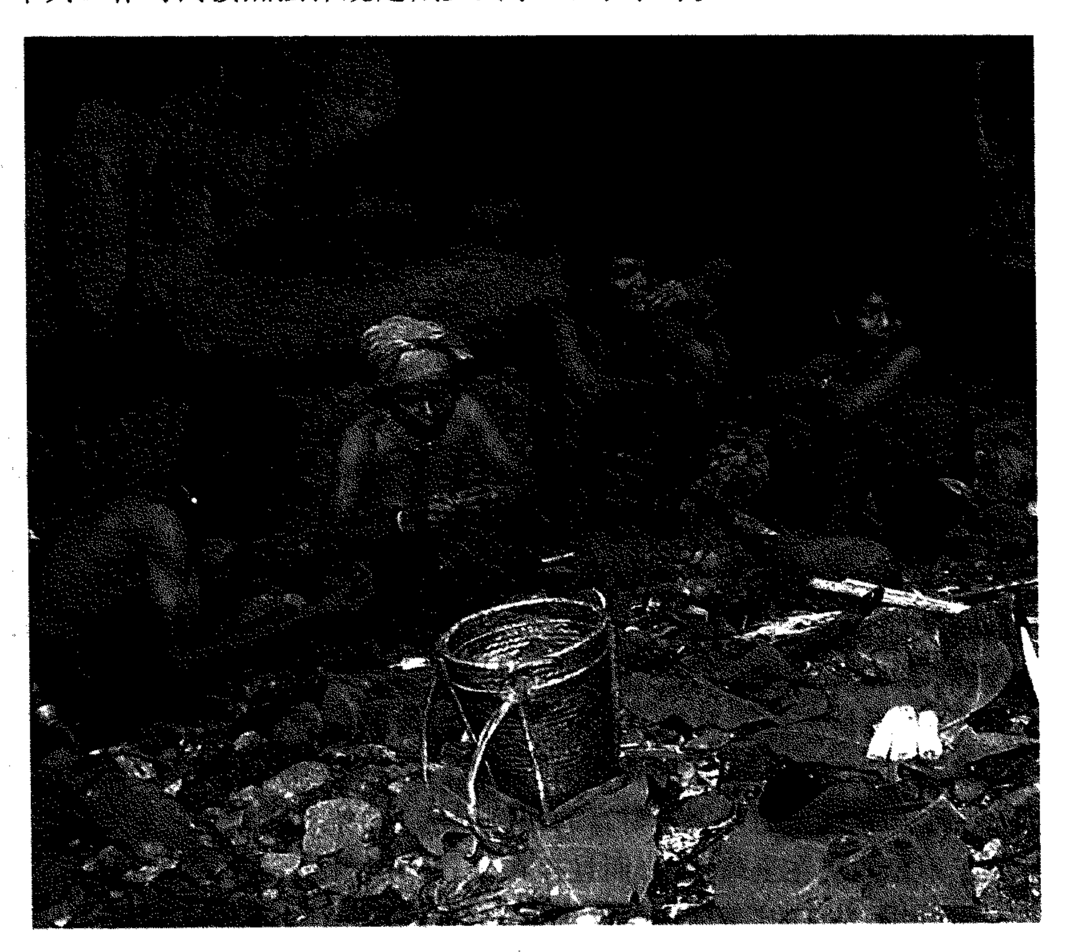


图276 巴图族的简单生活

图中所示为像菲律宾唐巴图族这样又小又简单的部族成员与自然和谐地生存在一起——他们并没有力量来影响自然界。尽管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比这样的人高级，但事实是我们可以、也必须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器人及其他可以代替劳动力的设备的出现使人期望这可以进一步减少工作时间。1992年美国前任劳联主席威廉姆·格林宣称，“唯一的选择就是失业或休息”。[5] 现在选择已经做出了，它就是失业。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都拒绝缩短工作时间的建议，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使企业失去与国内外对手竞争的能力。于是在这个机器人和计算机的时代，美国出了一本名为《过于劳累的美国人》这样的书籍。同时，日本人也创造了一个词汇叫“过劳死”，用来指一种因为过度工作而造成死亡的致命疾病。根据日本国家公众健康学院的定义，这种疾病“可以导致高血压症状恶化，并最终导致最后的死亡。”[6] 实际上，现在“过劳死”在日本是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致命疾病。

与此同时，格林关于休息或失业的预言也被全球性的就业危机所证实。世界上有28亿劳动力，至少有1.2亿人失业。另外还有5亿人被称为“未充分就业人口”，意思是说他们只能勉强找到工作，其收入不足以支付生活的支出。[7]

实例：不公正

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分离不仅导致了机器人时代的“过劳死”，而且导致了社会的不公正，即在全球性富足的时代却存在着全球性的营养不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不公正是人类天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贪得无厌和富于侵略的本性，然而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却从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人类并不是天生就有合作性或掠夺性的。实际上人性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它会被现实所流行的文化形态塑造成各种形式。比如，在旧石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文化就很难教会人们贪得无厌的恶习。[8] 因为这些游牧民族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要迁移到一个新营地，如果他们积累个人财物，那么每隔几周或几个月他们就要很麻烦地去重新安置它们。

然而随着农业革命的发展和人类社会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质财产变得易于打理，从而也就成为人们欲望中追求的东西。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过渡，导致了无地农民和有地贵族之间、世袭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致命的分裂。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技术和经济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9]

上面这位社会学家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技术和生产力日益发达的时代得到了更充分的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导致更多的社会不公正。据联合国1994年的《人权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大量收入的分配都是不公正的。报告中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10]

不公正不仅体现在全球范围，而且存在于各国国内社会中。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主席拉瑞·布朗为首的“美国医生反饥饿任务力量”在其1985年的报告中详细地说明了这点。这个组织走访了州长、教师、部长、社会工作者和饥民本人。他们得出结论，大约2000万美国公民生活于饥饿之中，即他们无力购买适当的食品和定期消耗光所有食物。上述组织的医生说：“在美国，饥饿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根据我

们的判断,现在美国的饥饿问题比过去10—15年间的任何时候范围更广、程度更严重。我们认为,今天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的每个地区都已成为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调查发现,没有哪个城市、哪个州可以避免广泛的饥饿的存在。”[11]

对日本的“过劳死”和美国流行的饥饿进行了仔细研究后,哲学家罗素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人类将比预想的更快地消亡。”在我们生存的20世纪,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这说明了罗素判断的正确性。而且如果我们只把自己看作一个长长的生物链中的一环,前景就将更可悲。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生存着大约4000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更进一步看,在历史上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生存在地球上。也就是说现在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种仍然存在,这说明在地球物种的生存率中99.9%的物种都是失败的。



图277 美国的贫困人群

虽然少数民族好像更容易处于弱势地位,但是美国的穷人却大部分都是白人。而且虽然城里人的贫穷所引发的关注更多,但农村居民实际上比城里人更容易陷入贫穷的深渊。

尽管我们人类目前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们的行星中多种多样的物种的存在和消失也让我们不得不关心自己的命运。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一些曾经在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物种也消亡了,因为它们不能调整自己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如冰川时代的来临。这就是人类与那99.9%失败物种的不同之处,因为我们卓越的智慧让自己具备了独一无二的能力来改造这个世界以适应我们的需要,而不是像其他物种一样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因此,人类,也只有人类,是造物主,而不是

自己命运的产物。然而我们的智慧却并没有保证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是正确的:我们的技术能够让我们建造出所想像的任何世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创造过什么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 进一步讲,正像有些环境学家所警告的,我们是不是在使自己生活的星球不适合于生存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正在复制一个如星象学家米奇奥·卡库所总结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型呢? 卡库认为在我们银河中的2000亿颗星球当中成千上万的星球上有大量的智慧生物存在,然而地球人对100光年以外各种星球所从事过的探索和正在进行的探索却一无所获。一些科学家认为,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他们能够提纯铀用类似曾经恐吓过地球人的“核冬天”来自我毁灭。卡库总结道:“也许其他的文明是自我毁灭的。当然这已无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个部分的明显贫瘠可能说明了这一点。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我们的地球可能也会成为一个供其他文明研究的死文明。”[12]

上述推测几乎毫无理由,因为人类从古至今从没停止过去做自己所能做的愚蠢的事情。但是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面临着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日益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让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了全球繁荣。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贫穷之苦,他们只能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然而我们今天的富有已经很少再来自自然资源,而更多地依靠我们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因此我们现有的蛋糕也就不再是有限的,我们也不再需要为生存而进行无情的争斗,也不再需要现实政治中以我为先、将罪恶感抛在脑后的思想。当然传统的现实政治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被抛弃,就像上面揭露全球流行的不公正时提供的数据所证明的那样。

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着的通讯革命,它使得全部人类进步的成果都可以让所有人迅速地了解和使用。这样,像掌握农业和冶金术这样基本的进步就不必经过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都还纯粹是区域性的成就,只能应用在一个区域内。通常这样的成就在缓慢地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之前,只在有限的和封闭的区域内被人所了解。然后这些成就就会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巨大的变化,各个民族将它们从石器时代传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以此类推。

今天,人类已经不再局限于使用自然界的土壤中出产的物质。我们不需要从岩石中提炼像宝石、铜和铁矿石等物质,再花很高的费用把它们送到某加工中心。相反,科学家们会先在实验室中设计出某种需要的物质,然后让这些“人造物质”流行起来。这样,从传统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到今天人造时代的加速进步就是建立在塑料、制陶、合成和其他定制物质的基础上的。

这个新时代建立在由分子组成的大量人造物质和科学家特制物质的基础上。那些定制的物质可以根据需要变得比金属更强、更便宜,它们可以被用来建造飞机、机车和所谓的“生物物质”(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来制造尾骨、骨移植、人造动脉,甚至是整个人造心脏。

人类与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基本相同的变化。在天花病毒这个全世界都恐惧的疾病中，这一点得到了非常突出的证明。至少2000年以前，天花病毒首先出现在远东地区，公元8世纪它传播到了欧洲，然后它又随着哥伦布来到了美洲。随着欧洲向其他大陆的扩张，该病毒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死亡。随后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群岛上的居民也都遭受到了这种灭绝种族的疾病之苦。该病毒也曾在欧洲持续不断——达到了瘟疫的程度——并最终夺去了欧洲大陆人口的三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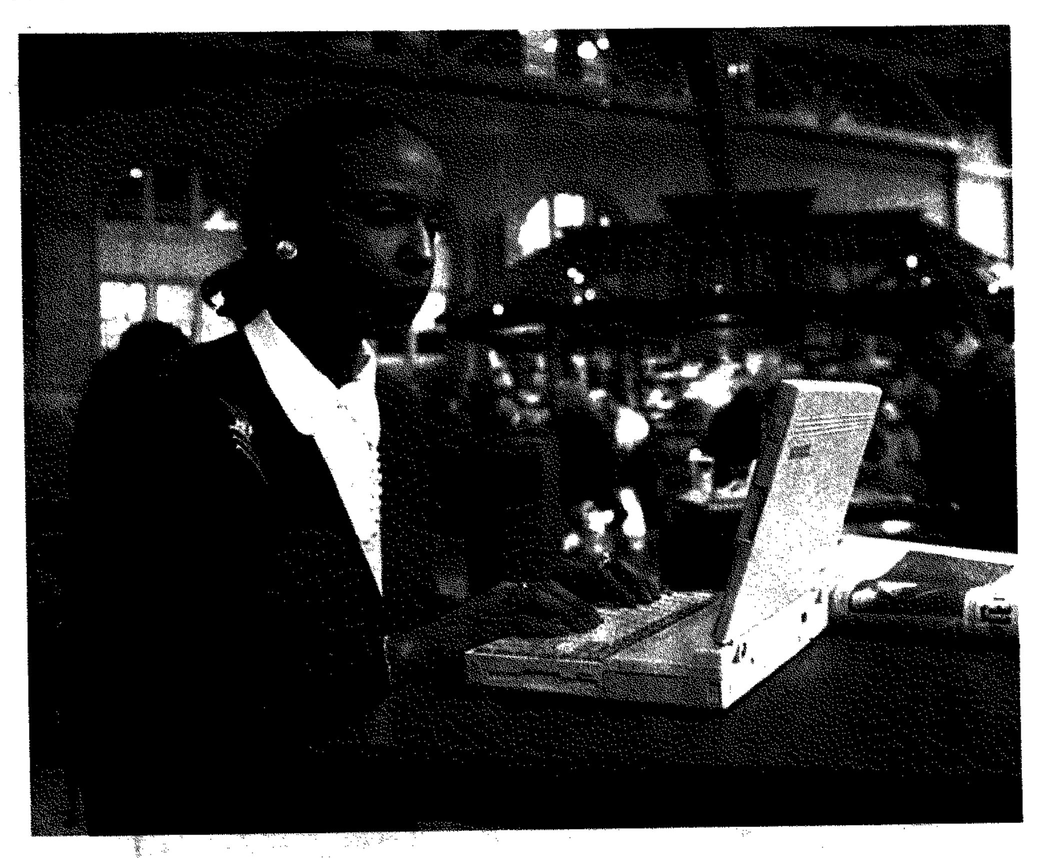


图278 现代办公

一个世纪以前，工业革命将大批劳动力吸引到大机器和能源资源所在的工厂里面。今天，相反的趋势在进行当中，现在通讯革命允许人们在任何地方创造思想和处理信息。

直到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接种或者感染牛痘的人可以预防天花，天花病毒才开始被驯服。今天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已经完全倒置了，只有一点病毒被储存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面。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毒是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的，1980年所有自然状态下生存的天花病毒都被消灭掉了。

科学家们曾经建议将实验室中仅存的一些天花病毒也都毁掉，以防止它们从实验室中外泄。但是最终决定还是保留这些病毒，因为担心将来的研究会需要它们。当然这种担心已经越来越少，因为科学家已经研制出无害的天花病毒DNA模型，并且相信他们现在有完整的基因图谱，这样即使病毒全部被消灭，科学家也仍可以进行研究试验。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同意将1999年6月30

日设定为毁灭所有剩余天花病毒的最后时间。这样，人类的统治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也就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物理学家维纳·汉森伯格总结道："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面对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发现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伙伴或者对手。"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就是，人类这种主导权正是上述全球精神忧郁症的根源。在铲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

与我们内在的自己、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这不仅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被证明是所向无敌的——还需要我们为知识的王冠添加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以便提供正确的目的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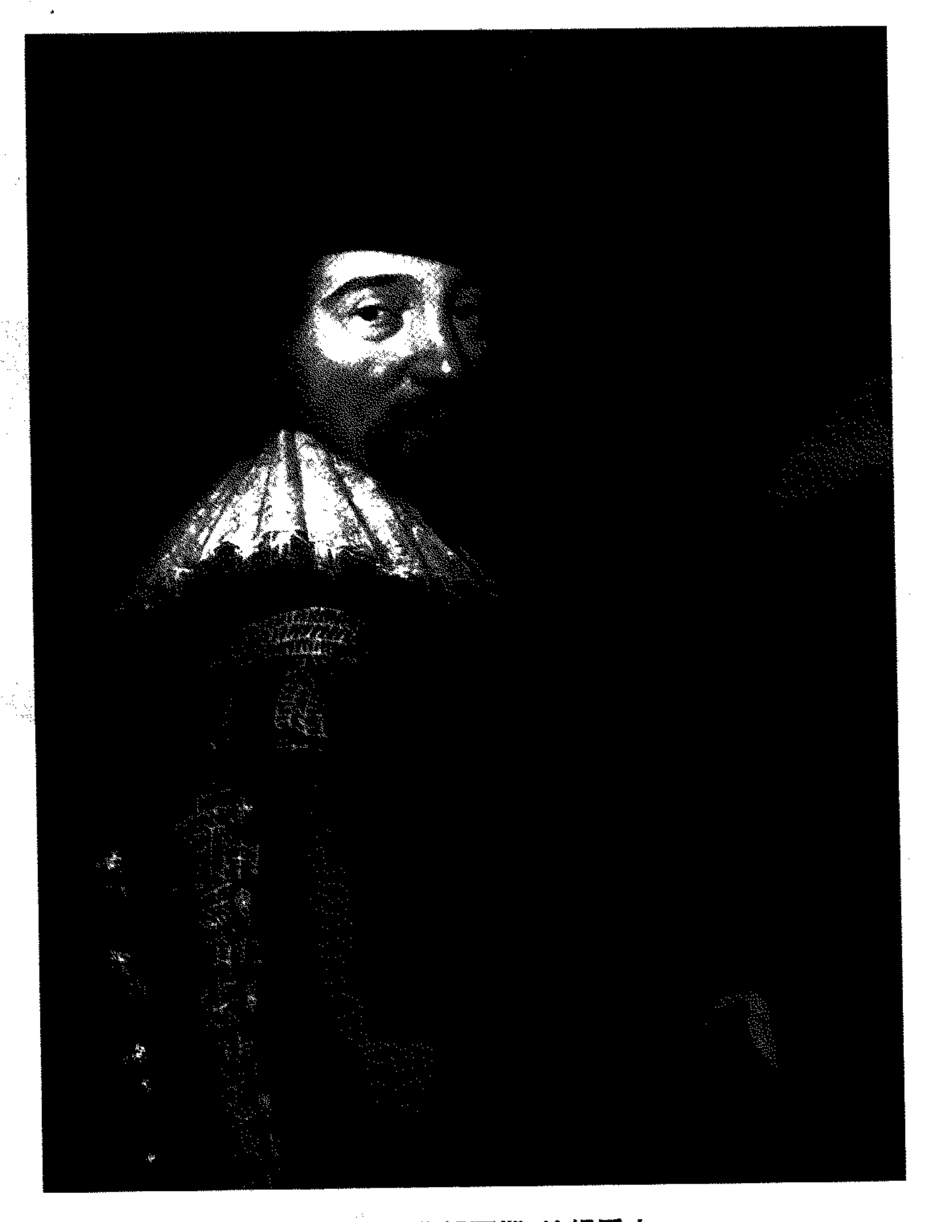


图 279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

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1626)，被认为是经验主义和科学实验之父。他认为，科学是为"生活的利益和好处"而被利用的一个工具，它应该为改善人类状况提供帮助。

向。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提醒人们既要注意它的巨大发展潜力,又要警惕它的危害。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是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带着"谦逊和慈悲"的心情来进行,不要"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争辩,或为了相对于其他人的优越感,或为了利益和名誉,或为了权力,或任何这些内在的东西;而应为了生活的利益和好处。"[13]

福特罕姆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屏幕上的每日新闻都清楚地表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忽略了培根的告诫。在这个分析中,关键词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词提出了有关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否像以前曾遇到过的那么多困境一样,只是最终可以被克服的暂时的障碍呢?或者因为困境是建立在人类预先设定的富于掠夺性和贪得无厌的基因基础上,所以这种困境是永恒的?

如果预先设定的基因决定了命运这个假设被接受的话,那么全球的悲观情绪就容易理解了。但是这个假设并没有得到必要的证明,最近的研究对这个以往被人们接受的命运决定的假设提出了怀疑。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锋是生物学家玛利·克拉克,她不仅反对以基因为基础的人性掠夺与贪得无厌的假说,而且提出"人类需要理论"来取而代之。这个理论认为"社会中所发生的冲突几乎都是因为在邻居之间以这种生物需求建立的合作被一种或另外的社会安排所打乱。"[14]

认为合作而不是冲突是人类更本质的趋势的观点得到了密西西比河沿岸伊利诺斯小城尼奥塔的有力支持。在1992年中西部洪水期间,驻扎在附近新兵营地中的一伙被判刑的黑人西班牙裔毒贩被派到尼奥塔来加固被猛涨的洪水所威胁的大堤。当他们到达这个小城时,其中一个犯人心情复杂地说:"等着看,用不了多久就有人叫我们黑鬼!"几个月后,根据自己的经验,这个犯人写道:"我们一直在等待,但是并没有人这么做。"他们不仅没有被侮辱,相反却赢得了尊重。在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后,这些犯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尊敬和赞赏。"他们送来百事可乐",其中一个犯人回忆道,"他们让我们坐在荫凉处,从他们的水龙头上喝水。他们非常友善。他们给我们烤牛肉和鸡肉晚餐。夹肉面包、苹果派,想要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们都感谢我们。"尽管在关于洪水的报道中媒体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所有的亲身参与者却都没有忘记这次经历的重要意义。一个犯人写下了他们在向大堤扔沙袋时所唱的一首歌:

在尼奥塔,他们说
食物非常的可口
他们每天给我们吃两顿饭
现在,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噢,上帝,我们不允许你发洪水
因为这里有爱
在尼奥塔,他们说

人们非常的善良
我们的皮肤虽然有不同的颜色
但他们并不介意[15]

思想在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就像被证明的那样到了“清扫”的时候。城市的居民要么选择更多的入狱者，要么选择一群学生支援者。对于入狱者，市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决定，因此在短期内多种群的中西部人能够通过相互发现与尊重改变其旧有的恐惧和偏见。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证明：水位的上升迫使整个群落一起为之工作，而这样做可以使他们超越旧有的恐惧和偏见，因此这种（态度）转变是可能的。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全球的水位也正在上升，这也助长了全球人类超越旧有的恐惧和偏见。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大机构的快速衰退促进了这种转变，而这则又迫使个人不得不接管日益运作不良的体系。职能和责任不再可能被安全地委托给控制中心，不论它是白宫、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正在必要地重新获得权利和管理，为社会重建创造建筑。

实例：前苏联

苏联共和国的基层环境主义者们就他们土地上到处弥漫的生态恶化问题与克里姆林宫发生了冲突。他们持续不断地组织运动，这促进了苏联帝国民主转变的迸发。苏联解体后环境主义者们继续他们的努力，他们现在正在通过社会生态协会的运作来寻求独联体的继任者对广泛的环境和人权问题承担起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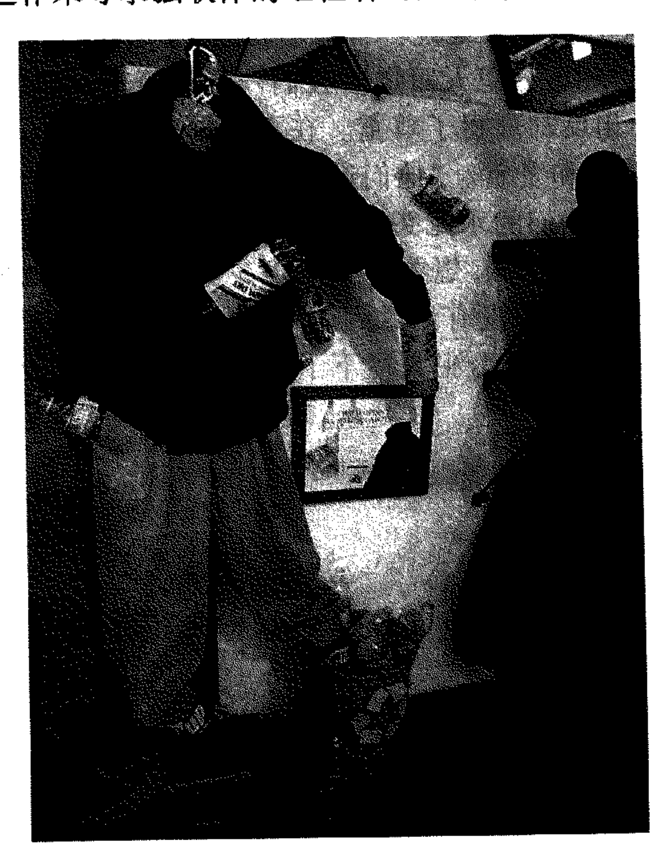


图280　饮料瓶变纤维

21世纪的挑战在于以行动超越这样一个想法，即采用新颖和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回收原料，而不是丢掉“废物”。也许今年的饮料瓶会成为明年时装的纤维。

实例：瑞典

一个广泛的市民运动正致力于将瑞典转变为一个典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在杰出科学家的支持下，市民领导人们正在尝试定义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细节。他们把结论写入一封信中，以国王的名义分发给瑞典的每户居民和学校。瑞典的49个地方政府、瑞典农民联盟和瑞典的22个大公司都正在参与国家的再评估和重新。

实例：肯尼亚

肯尼亚妇女的"绿带运动"已经成立了1500个基层托儿所，种植了1000多棵树。她们的进取心也已鼓舞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妇女进行同样的活动。

实例：以色列

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间的山顶上有一个居住着140户居民的村庄，它的名字叫奈维·沙勒姆或瓦哈特·沙勒姆，它们在希伯来和阿拉伯语中都是"和平的绿洲"的意思。村庄由两名阿拉伯人和两名犹太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运作。有很多户家庭正在排队等候村庄的承认以加入进来。现在村庄正在计划成立一所大学来教授如何处理冲突。"和平与共存"，一个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说道，"在这个国家是如此的不现实。要传授这些知识，人们需要展示像'和平的绿洲'村庄这样的事实来表明现实的人是可以实现的。"[16]

实例：美国

在美国正在兴起"自助"和"互助"运动。这种运动由这样的人员构成：他们面临同样关注的问题或处于相同的境地，他们需要志愿的情感支持以及行动上互助。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两名酗酒者倡导的相互帮助"匿名酗酒者"运动的鼓舞。关于对"自助"和"互助"运动的需要可以从美国自助组织不断增长的成员数目上窥见一斑：70年代其成员数目是500万—800万，80年代其数目达到了1200万—1800万。这一运动包括"匿名吸毒者"、"匿名暴食者"、"匿名阳痿者"、"匿名神经病者"、"匿名抑郁者"、"匿名虐待者"、"性爱成瘾者"、"匿名同性恋者"、"匿名工作狂者"以及数目众多的其他类型。一个参与该运动的学生解释说："人们想要控制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他们不能控制国际问题，但是他们可能控制发生在邻居中的抑郁问题或哮喘。人们不想仅仅只成为消费者，他们想成为社会的参与者。"[17]

人民大众的这种活力可以回溯到智者托马斯·杰斐逊时代，他在两个世纪前签署《独立宣言》时欢欣鼓舞地宣布："所有的眼睛都向人权睁开了或正在睁开……人不再是生下来身后就背着马鞍，也不是上帝赞许的极少数特权人脚踢和合法驾驭的奴隶。"[18]觉醒的杰斐逊将会毫无疑问地惊讶发现：在21世纪前夜，各大陆的眼睛都正在睁开，而不是少数的西方国家；各阶级的眼睛都正在睁开，而不是仅仅少数受过教育的富有阶层。

这种新萌发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表明，现在的忧郁症是

不合时宜的。当然这不是一个自我欺骗幻想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悲观预言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客观实际地重新评价业已存在的实践和机构,留存有用的抛弃无用的时代。精确地说,现在正在进行什么呢,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东欧国家正在抛弃旧有的计划经济,还是与此同时进行的力图保留原来的"安全网"的努力呢?

正在进行的实验不再局限于平衡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的关系,它也包含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比如美国的多样化强调的是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多样化则强调的是福利国家与工人参与决策制订)和社会主义的其他形式(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苏联的不确定性,那里的一位经济学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建议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思想的纯洁性[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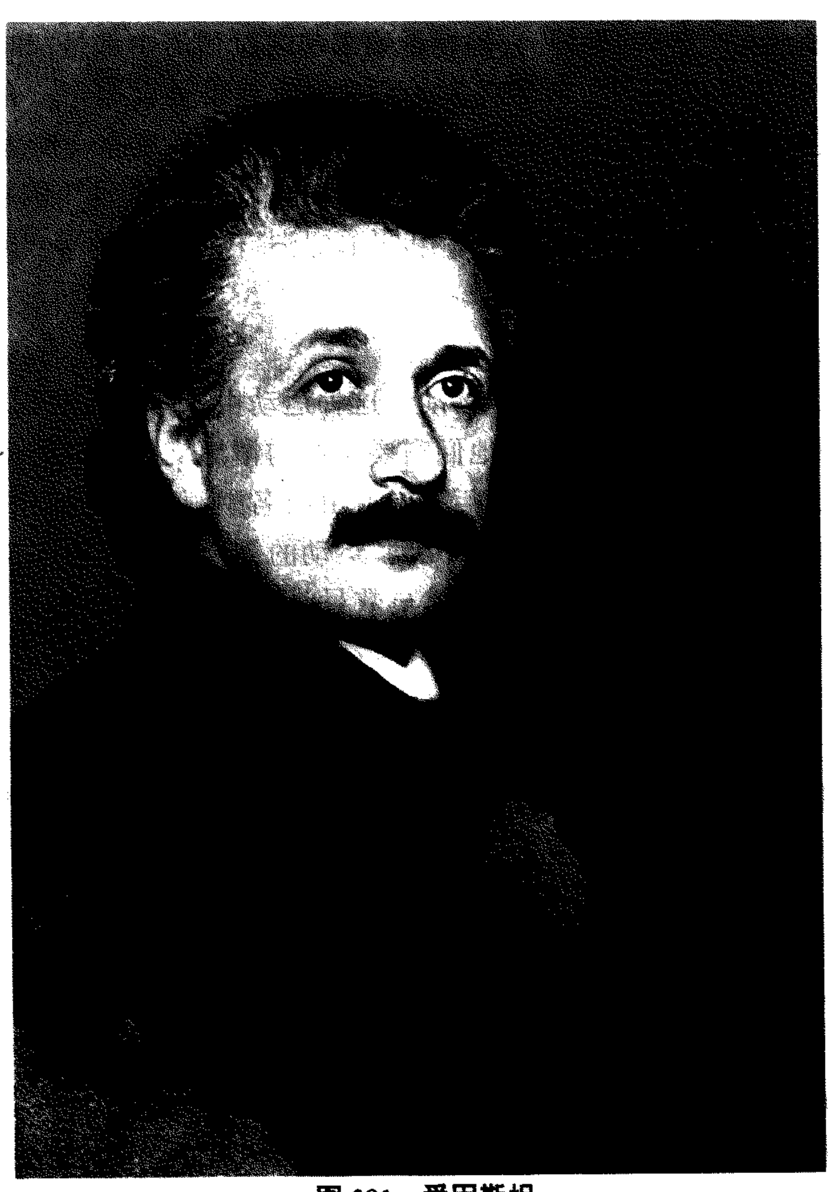


图 281 爱因斯坦

20世纪50年代时,爱因斯坦一再强调培根几个世纪前就已论证过的基本伦理假设"我们思想的创造将是一种祈祷,而不是诅咒。"

如此之欢欣鼓舞表明,21 世纪是一个兼有巨大潜力和挑战的世纪。缺少水晶球,历史学家就不能预测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们能够预测,即合理地确信,21 世纪既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反乌托邦的,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纪。实际上,被实现的无数可能性将由人类决定——具有崇高品质的聪明种类才是创造者,而不是宿命的生物。但是考虑到可能被创造的价值,创造力这一礼物就提供不了确定的东西,正如现在倾向于培根的"劣性"所表明的那样。在未来的世纪里,这种趋向可能似乎会使罗素的关于"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思考"的格言合法化。关于这种可能性,另一位英国哲学家伯克也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

如果善良的人不保持沉默和选择做些事情,那么他们应当做什么呢? 我们这里仍有当代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提出的至理名言来引导我们。爱因斯坦晚年对于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变得尤为关注。他接下来的结论值得注意,20 世纪 50 年代时,爱因斯坦一再强调培根几个世纪前就已论证过的基本伦理假设。对于培根来讲,科学是可以用来使"生活受益和利用的工具"。爱因斯坦同样坚持认为,"我们思想的创造将是一种祈祷,而不是诅咒"。

> 如果只是为了让你的工作会增加对人的福祉你才应当理解应用科学,这是不够的。关注人自身和他的命运必须形成对各种技术持久的兴趣和关注劳工组织与货物分配这样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我们思想的创造将是一种祈祷,而不是对人类的诅咒。在你的图表和方程式中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20]

爱因斯坦认真地相信他描述的"祈祷"的可行性,他坚决反对通过基因预先决定人类命运的建议:"在残酷的互相消灭或自我毁灭的命运下,人类不应因其生理构成而被谴责。"[21]

即使人类并不像爱因斯坦所讲的那样具有天生的自我毁灭性,他们疯狂发展的技术仍然让他们不断遭受各种社会问题之痛。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不公正:美国现在的头号杀手是过度饮食和肥胖,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却是营养不良和饥饿。人道主义角度所表现出的不公正在下一页的两幅图片中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上面的图片中,苏丹一个穷困潦倒的小女孩儿骨瘦如柴,她瘫倒在地,无力保卫自己,而旁边正有一只秃鹫等待着以她为食;而在下面的图片中,美国的一个儿童则正得到母亲的悉心爱护。

与不公正同样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核时代的战争,这一点在 1998 年 5 月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巴基斯坦马上针锋相对进行了同等的核试验。虽然南亚核武器竞赛所导致的危险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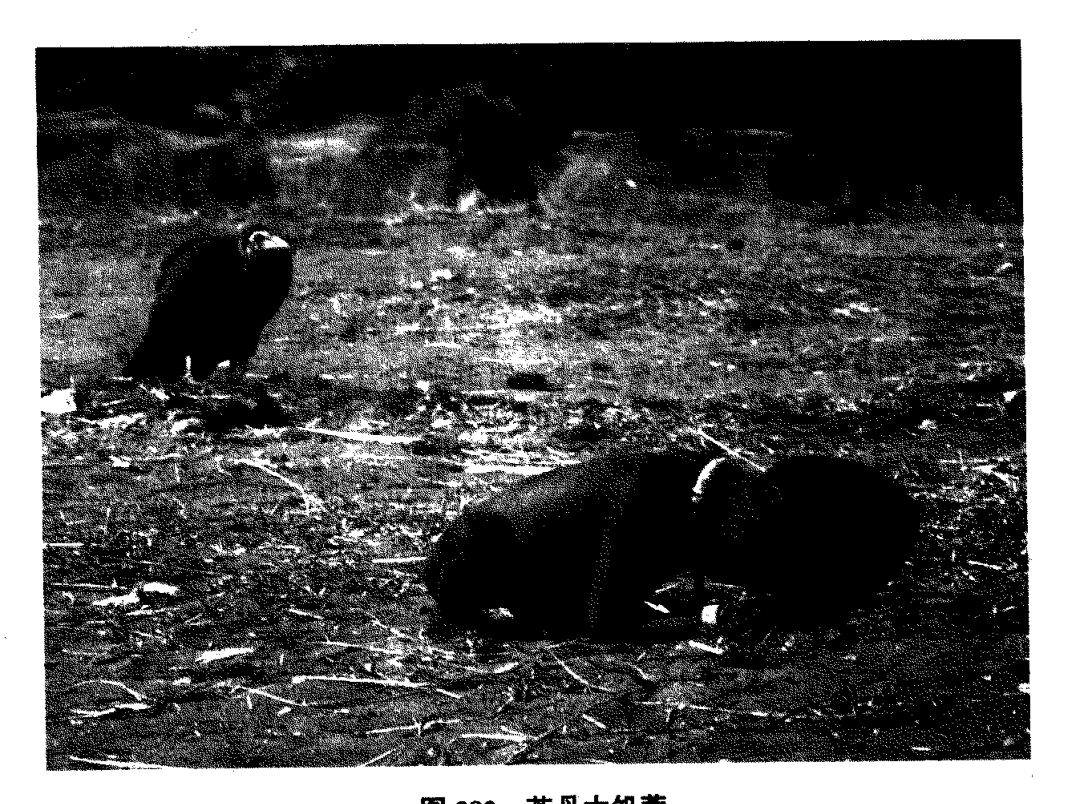


图282 苏丹大饥荒

苏丹大饥荒期间，一只秃鹫正瞧着一个因饥饿瘫倒在地的小女孩。



图283 我们的后代

出生在舒适家庭中的孩子们不一定会充分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机会。历史表明，虽然我们过去的成就光辉灿烂，但是同时我们也几乎不能避免做我们所能做的傻事。当然由于我们的基因和技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自由地做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牺牲者。



图 284 印度核试验

1998 年 5 月 20 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参观印度进行了五次核试验的实验场时受到印度妇女的夹道欢迎。瓦杰帕伊说，印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安全。图中标语为：我们为核试验感到骄傲！

在这两个国度内，对核试验优点和缺点激烈的争论却成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副产品。上面图中游行者手中挥舞的标语就说明了这一充满矛盾的情况。

这些标语表现出印度人对政府核试验的不同反应。这种不同证明了爱因斯坦的论点，即：人类并非“甘受残酷和外来的命运所摆布”。换句话说就是，21 世纪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它将由我们来创造。这个结论被以下事实所证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游行者成功地说服两国政府在 1998 年 9 月宣布将签署一个禁止核试验的国际条约。[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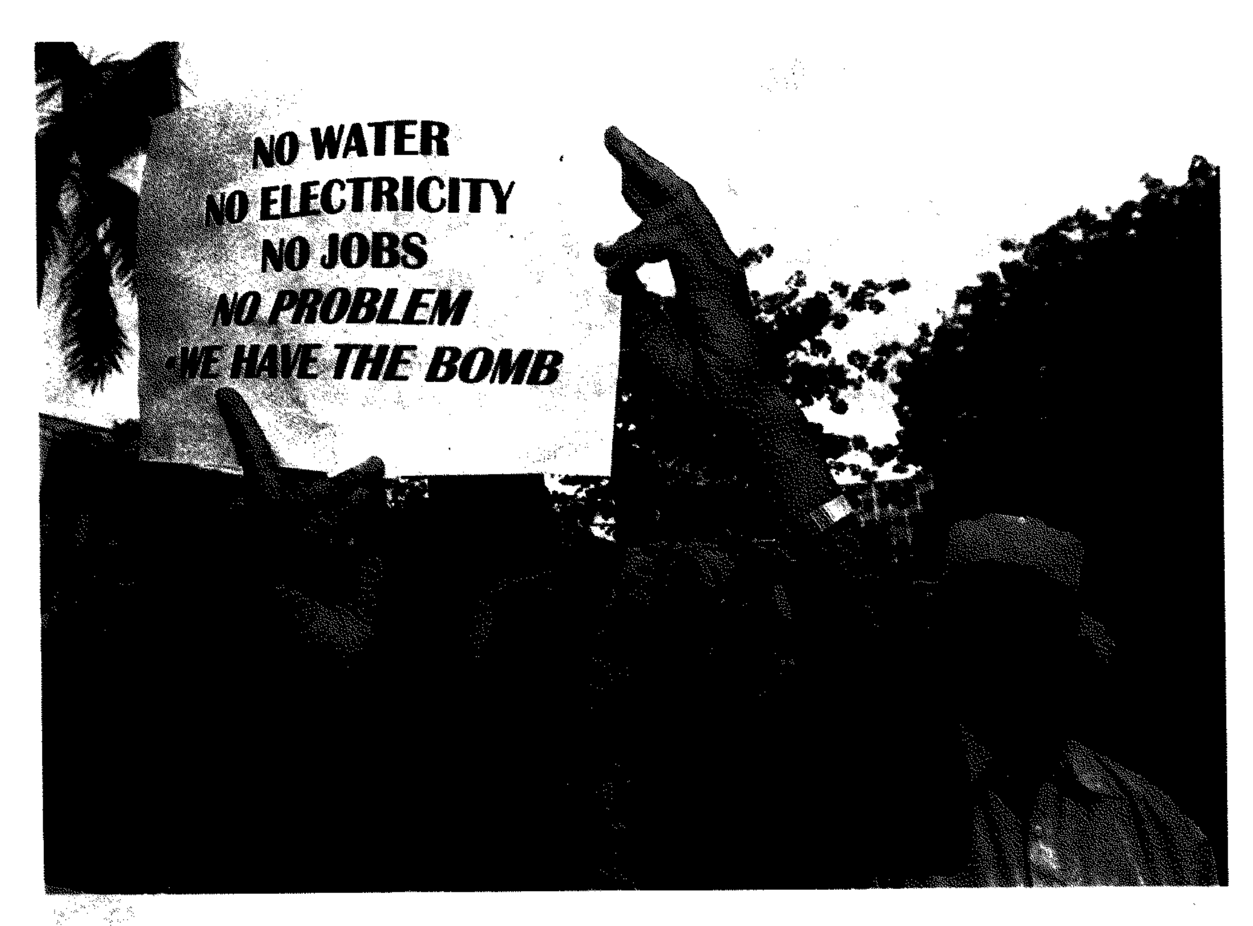


图285 巴基斯坦核试验

在印度于同月稍早时间进行过核试验之后,巴基斯坦也进行了五次核试验。1998年5月29日,在新德里发生了反核游行,抗议印度政府的新霸权。图中标语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工作,没有问题——我们有炸弹。

注释

1. C. Sagan, *Pale Blue Dot* (Random House, 1994); and *The Demon-Haunted World* (Random House, 1995).
2. *Business Ethics* (March-April 1992), p.30.
3. CBS Television Network,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y 21, 1967.
4.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5, 1989;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992.
5. Cited in J. Rifkin, *The End of Work* (Putnam, 1995), p.222.
6. Ibid., p.186.
7.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State of the World*, 1997 (W.W. Norton, 1997), p.123.
8. A. Bandura, *Aggression* (Prentice Hall, 1973), pp.113, 322.
9. G. Lenski,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McGraw-Hill, 1974).
10.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5.
11. *Hunger in America*. *The Growing Epidemic* (Harvard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1985), pp.xiii, xiv.

12. M. Kaku, "Apocalypse When?" *Guardian* (November 20, 1991), p.11.
13. Cited in A. Pacey, *The Culture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1983), pp.114—15, 178—79.
14. M.E. Clark, "Meaningful Social Bonding as a Universal Human Need," in J. Burton, ed., *Human Needs Theory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sic] (St. Martin's Press). Mor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are available in the important study by M.E. Clark, *Ariadne's Thread* (St. Martin's Press, 1989).
15. *New York Times*, July 29, 1993.
16.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1, 1997.
17. Frank Riessman, Director of National Self-Help Clearinghouse, ci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6, 1988.
18. Cited in H.S. Commager, "The Revolution as a World Ideal," *Saturday Review* (December 13, 1975), p.13.
19.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87.
20. This Einstein statement was the theme of the "1985 Carnahan Conference on Harmonizing Technology with Society," held on August 22—23 1985,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exington, Kentucky.
21. Albert Einstein, *Out of My Later Years*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127.
22.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1998.

后　　记

重译本书的目的，既是为给国人介绍这本经过6次丰富和完善的史学名著，也是为缅怀刚刚仙逝的著名史学家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于今年3月23日辞世，享年91岁，他生前就被公认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之一。他1913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是希腊人的后裔，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史学士，并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毕生致力于两大事业：第一件事是教学。他大学毕业后即在昆士大学(Queens University)执教，从1946年起就任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直至1973年退休。退休后，他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担任了18年兼职教授，到1992年才完全停止教学。他和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一起被誉为"开创美国世界史教学的两个加拿大人"。

第二件事是治学。他一生研究成果斐然，共有18部著作，其中最突出的有：《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Lifelines from Our Past)、《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Balkans Since 1453)、《1500年前的人类的史诗》(The Epic of Man to 1500: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现代人的史诗》(The Epic of Modern Man: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 Rift)等。他的观点和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本人也因此而于1951年荣获古根海姆奖、1953年获福特杰出教师奖、1967年获洛克菲勒基金奖。

本书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学术上的集大成之作，书中鲜明地体现了他一生研究世界史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不要割断历史传承性，二是必须将世界历史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认为，理解今日社会现象的关键就在于以全球的视角解读人类历史。因此，本书的整体性和现实性非常突出。每一个历史事件和现象在书中都不是孤立出现的，它们都被恰如其分地置于一个统一的历史坐标之中进行分析，它们对现今世界的影响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另外，正如程亚文先生在《读罗素〈中国问题〉》一书中所言及的："在胆敢抛弃'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有良心'的西方学者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无疑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他曾以如椽巨笔，向人们全面描述了西方文明自十五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对非西方文明的征服历程，证明了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以及后来的新殖民主义已使整个人类社会成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并按经济关系划分出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两个部分，中心与边缘、统治与被统治、

依附与被依附，是第一世界(西方文明)与第三世界(非西方文明)几百年来国际关系的事实。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这是一种弱肉强食、非常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本书跳出了西方史学著作中常有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窠臼，持论较为公允，且作者在史料真实性的考证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史实可信度高，是一部难得的史学名著。因此，本书于 1970 年首度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籍，被译成多种文字，行销全球。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对本书也格外垂青，在首印后的 30 年中，6 度对本书进行完善，直至 1999 年修订的最后一版，也就是目前我们翻译的这个版本。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对本书进行丰富、精炼、更新、变革既体现在本书的篇章结构上，也体现在栏目设置、史实增删、论点更新，甚至还体现在插图的改进上。如果大家曾读过本书的上海社科版的话，相信大家再阅读本书仍能感到受益匪浅，也能在书中处处感受到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完善本书时的苦心和为此付出的努力。

我们也要感谢吴象婴、梁赤民先生，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借鉴，1982 年版中许多翻译精当之处，至今让人有难改一字的叹服。我们这次的翻译，可以说是站在吴、梁两位先生的肩上完成的，我们要再次向两位先生致谢。

本书的译校和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帮助，我们愿向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前四部分主要由王昶、徐正源翻译，后四部分主要由董书慧译成，鲁心茵、尹明明、侯艳萍、丁志勇、蒋周腾、梁宇、晋朝华、晋朝启、杨景百、丁虹艳、罗旭辉、张颖、左广、章志煜也参与了本书正文、插图和地图的翻译。囿于我们水平的有限，译文中乖谬之处定然不少。

敬请读者批评雅正，并将意见反馈我们，以便我们今后加以改正。

译　者

2004 年 12 月 21 日